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战史资料选编

(一)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说 明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是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的印证和补充，是为从事党史军史研究人员提供参考而编辑出版的。

红二方面军的历史文献、资料比较丰富，本书只是有选择地进行了编辑。所选资料中，有相当一部分属首次公开发表。全书按照红二方面军的战斗历程，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红二军团暨湘鄂西和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红六军团坚持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向黔东转移，以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红二方面军长征。每个历史阶段的资料选编包括历史文献、回忆史料、调查材料及其他参考资料。另外还附有一些有关书目、文章的目录索引，以备查阅。

本书辑收的资料，大体按时间顺序编排。文件标题，凡由编者加拟的，用*号标明；对错别字，将正字加于其后，用[]号表示；对漏字、加字，用<>号表示；对衍字，用 号框起；对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者，用×号代替；对缺损字，用 号代替。需加以说明的，尽可能作了注释。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编辑、考证方面难免有错误、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

全国的工人农民及一般革命平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革命之危急存亡的时候，对于你们发表宣言，意思是要解释明白国民政府在反动阴谋之下的政局，以及本党为保持民众之革命胜利而奋斗的政策。

一年以前，国民党的政权还不过在广东一省，而在此之前，甚至广东省内还有许多区域，和中国其他各地一样，都在反动军阀的掌握之中。——这些反动军阀，继续不断的自相攻战，极其残酷的压迫平民，将我们中国零星分割而出卖于外国帝国主义，维持着垂死的封建制度；这种特殊的封建制度，使几万万民众永久的处于奴隶地位，永久的穷困饥饿。然而从国民党改组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指导之下，造成了广东的革命基础；从广东向北发展，得着全国各地革命平民的响应，居然将许多巨大的军阀逐一的打倒，——这些大军阀的武装力量，其实比国民革命军要厉害得多呢。吴佩孚的势力被歼灭于两湖，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也被打败，最近张作霖又在河南败绩。中国之大部分，已经脱离旧时军阀的统治，民众应当可以自由的组织起来，以求自己及中国之最后解放。革命运动的力量，已经有伟大的表演，甚至列强帝国主义也不得不向群众的猛进让步：例如英国在汉口九江的租界竟不能不交还中国，并且始终不敢公开的实行其久已准备的武装干涉。这种革命胜利的原因何在呢？何以军阀帝国主义不能不对于革命民众的进攻而退却呢？

革命胜利的原因，当然不在某某总司令某某军长的善战，亦不在某某领袖的善于外交，而在于革命得着中国人民之极大多数的赞助，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努力，并且有各种被压迫阶级因反抗一切剥削而团结的坚固的革命联盟。中国革命之伟大领袖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根据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明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革命之进行当在此三大政策领导之下的时候，国民革命日见其巩固发展，而成为革命敌人所震慑失措的伟大力量。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内军阀的压迫，已经几十百年，如今走上了自由解放独立的道路，眼见得可以得着经济发展的前途；所以中国的农民，本是几百千年受豪绅地主的压迫；中国的工人，本是在囚徒牛马似的条件之下工作；中国的贫苦市民、手工工人以及小商人，本是异常的贫困，日趋于破产；——他们这些极大多数的中国平民，在这一时期之中都奋起斗争，力求自己的解放。民众在三大政策之下得以勇猛前进，捶碎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制度之锁链，而锻炼解放中国的武器，以力争极大多数人民之民权，以解除中国之束缚，以消灭中国经济发展之障碍。

然而一方面固然逐步的得着胜利，中国劳动民众固然警醒起来努力于自己的组织和斗争，而别方面，平民之明的暗的仇敌，也就觉察得到自己的危险，寻找种种方法来阻遏革命进展的潮流。他们的手段和方法有许多种。外国帝国主义者派遣军舰军队到中国，驱使他们的爪牙北方军阀作战，并且挑拨离间国民革命军的长官。以前军阀是公开的反对国民党的，后来看见不能够反对革命的伟大旗帜，于是假意归顺革命，戴起国民党的假面具，想在国民党内部来从事破坏革命。至于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买办阶级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更是用尽方法压迫工农运动，或是公开的用武力来摧残，或是秘密

的用挑拨离间、造谣诬告的手段来破坏。资产阶级呢，他以前是和群众运动同路的，随后看见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吓退了，于是宁可跑到革命的敌人方面去，只要能够镇压工农运动。——可见中国资产阶级，宁可心甘情愿的替帝国主义者当奴才，婢膝奴颜的求他们谅解，却不肯牺牲一个大钱来改善工农的生活！

再则，国民革命军中本来有许多长官，冒着国民党的招牌而自己扩充武力，搜括金钱；到后来，他们看见民众的胜利将近实现，各种各式的军阀制度都要完全灭亡，——就公开的背叛革命，同着资产阶级共同积聚力量，以攫取国民革命的指导权，压迫工农，而与人民的仇敌妥协。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的叛变，便是这种阴谋的第一步，然而没有完全成功。这是因为北伐的胜利解放了中部中国，民众运动积极的自动的发展，表现伟大的新的力量，足以打击军事独裁的暴力。然而蒋介石的野心不死，他到今年三月间，便公开的叛离国民政府，夺取东南诸省，自江西至上海沿途屠杀工农，而把持国民党于自己掌握之中。

这就是对于国民革命的第一次严重的打击。

当时国民党的领袖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对于这种阶级分化的现象，持什么样的态度呢？那时国民党指导机关的革命性还没有用尽，它们所代表的社会阶级也还有些前进的勇气。今年三月间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就足以表示国民党的指导机关，还能够依据于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以抵抗反动。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完全赞助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使它易于团结大多数人民而与封建资产阶级及反动潮流相奋斗；并且中国共产党决定自己的党员应加入国民政府，以分负武汉国民党在此艰巨时期的重任。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许多议决案，形成我们联盟的政纲。这些决议是：巩固党权推翻军事独裁；镇压一切反革命；实行乡村自治，召集省民会议以实现国家政权之民主化；为赞助工农经济状况之改善而设立农政部劳工部，以便制定改良社会之法则，而实行之；坚决的赞助工农群众运动，以及其他。

所以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足以悉显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决心抵抗反动进攻，而且愿意广大的发展工农运动，以保障国民革命之向前进展。

国民党既然有这种决心，共产党自然更加要与国民党巩固的联合，而为双方共同的任务奋斗。共产党派遣自己的党员加入国民政府，同时当然认定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将要很诚意的履行自己第三次全体会议所规定的责任，当能和本党党员之参加政府者共同努力于革命斗争之进展。

然而最近几月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大民大大的失望。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并不实行那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及责任。国民党中央自己将人民的希望打消了，——中国人民原本是相信国民党的中央及其许多领袖是革命的！

正因为人民相信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是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那国民政府领域之内反抗封建余孽列强侵略的工农运动，乃有如此迅速和广大的规模。两湖农民有好几百万都奋起斗争，反抗封建阶级的统治，反对豪绅地主、贪官污吏及军阀，要求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标语之实现，要求平民政权之建立。城市中的工人，也努力的起来推翻残酷的牛马似的劳动条件。如果国民党中央真能依据民众运动，那么千余万有组织的农民，二百八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必定要成为国民革命之极巩固的基础。那时，中国的封建制度，必定要受着致命的打击而不能复

活。然而国民党的指导机关不愿意如此！国民党中央与垂死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关系，却比它与中国新兴的革命力量的关系更加密切些；因此国民党的许多领袖消极动摇犹豫得不堪言状，其结果，领导权又落在反动军人之手。

今年四月间，国民党中央已经拒绝公布土地委员会关于土地制度改良的决议草案，当然更不说实行了。而劳动法的制定与公布更遇到许多阻碍。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照理应当注意中国平民之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手工工人的呼声，但是它却不是如此，它专听豪绅地主出身的反动军官，——这些反动的军官是时时反对农民运动的。今年四五月间，正是应当实行社会改良以扫除城乡封建关系之根株，而与反动派以致命的打击的时候，正是应当武装工农以抵抗反革命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国民党领袖及国民政府，反而发出许多训令宣言，专以限制工农运动，更使动摇犹豫的分子转移于反动派方面去，并放任反动派使能自由的准备进攻革命。反动军官利用这些犹豫动摇的政策，而公开的反攻民众运动。反动的恶浪陆续继起：蒋介石走狗的杨森进攻鄂西，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变于湖北、西北，夏斗寅进窥武昌，许克祥实行政变于湖南，以及最近冯玉祥表明反对工农群众运动及共产党。工农的血流遍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消灭！

现在早已到了国民党中央应当选择正道的最后时机：究竟是同着革命前进还是同着反动后退！直到最近，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仍旧是不肯决然的同着革命前进，仍旧继续限制群众运动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动不受任何惩罚。对于湖南的反革命政变，没有任何的处置，国民政府反而默认这些政变而加以掩护，与以合法的根据，使反动派得以完全摧残工农运动。湖北夏斗寅的反动势力并未歼灭，其实很有充足的军力足以办到。而湖北各县的反动派，却摧灭了许多的农民协会。国民政府不但绝无肃清反动的办法，反而事实上帮助反动派的进攻，——因为政府的政策是解散或改组工农团体，这些工农团体的罪状，就是努力牺牲以反抗封建制度而已！

这种情形是国民党中央多数领袖公开的赞助反革命军官，一般都是动摇妥协的政策，其结果，使反革命在武汉首都，也筑下巩固的基础。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

本党的观察，认为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多数领袖的这种政策，——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撕灭。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可使宰割中国的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及其他军阀的旧统治，仍旧一变而为瓜分中国的蒋介石、冯玉祥、许克祥等新式军阀伪国民党之统治。中国仍将继续受着残酷的剥削，革命将受普遍的摧残，民众将更受无限痛苦，封建的、无政府状态将要高奏凯旋，帝国主义的统治更加可以稳定。中国共产党永久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民众利益而奋斗，决不能对于国民党中央现时这种政策负责。中国共产党反对这种政策，因为对于它，民众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几千共产党员，在革命军进攻武昌、南昌的时候，在攻打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的时候，在广东的田间、上海、广州的街市反抗蒋介石派叛徒的时候，在湖南、湖北反抗反动军官的时候，——战死的战死，被残杀的被残杀，凡此一切已足证明共产党永久与工农民众共同奋斗，不顾任何巨大的牺牲，——就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抛弃劳动

民众的时候，亦是如此。

因此一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一切工人、农民、兵士及一般革命平民，不论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都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与你们共同奋斗到底的，必定能够引导民众经过革命的一切艰苦时期，去达到最后的胜利，国民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必将努力奋斗，反抗反动军官、封建豪绅及资产阶级完全攫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阴谋，反抗他们屠杀工农剥削民众的政策；他们这种阴谋和暴行，是使革命破产，实在就是和帝国主义妥协。——因为抛弃土地革命，就是抛弃消灭封建制度的革命运动，而封建制度不消灭，帝国主义的压迫是决不能推翻的。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力争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实行关税自主，解放中国。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力争国家的统一，建立地方及中央的民权主义的政治。

中国共产党将要反对一切封建余孽，力求革命之完全胜利，以求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之发展。

中国共产党将要更加努力，以实现并巩固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及苏联之真正联盟。

中国共产党更将继续增进工人利益的斗争：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的严格确定，改良劳动条件，救济失业工人，保护女工童工，力争工人罢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及工人之武装自卫。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解放农民之斗争：地主的田地无代价的交与耕种的农民，保护小田主的田地享有权，不没收的田地当实行极大限度的减租，废除苛捐杂税陋规苛约，改良雇农之待遇增加其工资，解除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之武装，推翻其政权，力争农民武装自卫之权，建立乡村自治，限制高利盘剥，设立农民合作社，要求国家以充分的经济辅助农业，并实行拨款借贷于农民。

中国共产党亦将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废除一切直接间接的苛捐杂税，制定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反对新旧军阀阻碍商业交通，保护本国工商业以反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反对买办高利盘剥者之剥削小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更将为兵士的利益而斗争：要求兵晌按时发给，反对克扣兵恼，要求改良兵士的待遇及生活条件，反对新旧军阀牺牲兵士的生命而从事于争权夺利的私战，主张兵士退伍后应由国家发给土地或与以工作，使得从事于和平的生产事业。对于归入革命营垒的所谓土匪游民亦应当如此。

凡此一切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都要和国民党党员群众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共同去实行——因此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如果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真能实行这种革命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制度及反动派的阴谋，那么，中国共产党必以全力赞助这种真正革命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永久认为革命的利益、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较之保存某种政治联盟、领袖结合高出十倍。中国共产党不能放任背叛革命的军人以及犹豫骑墙的政治家冒充国民党假借孙中山先生的旗号以自文饰。中国共产党决意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只要他们能够诚实的坚决的根据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民族解放、民权政治、

民生改善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赞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是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之遗训。所以中国共产党必定严厉的揭发一切假借孙中山先生旗号的伪国民党之出卖革命。

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光荣的旗帜，永久是在革命的民众，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群众方面，决非反动的妥协的伪国民党所能盗窃的。中国几万万的民众始终要认得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民众的力量始终要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 (一九二七年七月)

中国工农的斗争，乃是共产国际第一线阵地上的斗争。中国革命，仍继续为共产国际底注意中心。

在注意到下列各点时：

一、中国事件底疾速的展开速度，使该国的政治局面和社会阶级力量之相互关系，不断发生变化；

二、中国革命，因军阀和雇佣部队之叛变，因反革命力量之结合，因最近一时期所受的一连串的局部的失败，而遭受了特殊的困难；

三、最后在注意到最近中国共产党领导所犯的一连串的最严重的错误时，——

共产国际认为必须以如下的决定（为了发挥共产国际执委随时所发出的指示而采取的），诉于全体同志、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一切分部之前：

（一）共产党人正确策略底最重要和最必需的先决条件，乃是对革命局势当前阶段之一切特质加以最严格的冷静的马列主义的估计，对革命所经过的阶段加以正确的规定，只有了解了当前时局之特质，才能正确地规定斗争着的共产党之特殊任务，才能提出合于实际生活的革命的口号，才能确定无产阶级先锋队之正确策略。需要十分明确和十分具体地规定中国革命现时阶段的内容，并且为了这一点，需要批判地认识革命过程底全部进程。

（二）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曾把中国革命的性质规定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在发展的现阶段上——而同时其锋芒又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共产国际执委曾指出，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之趋势。七次扩大会议在规中国各种斗争的社会力量之位置和比重时，同时曾指出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之势必加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势必日益分解，并首先预先预言了大资产阶级之势必退出革命。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这一点出发，曾作了指示，叫准备工农去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武装力量。这是在蒋介石叛变前几个月的事。以后的事件（本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达到了其流血的顶点）证实了共产国际底这种预测：各阶级发生了根本的变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而投到敌人的阵营里去了；革命遭受了局部的失败，而推移到新的更高的阶段了。

（三）本年五月所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曾又作了详细的决议案。这次全体会议已将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当作既成事实为出发的。这次全体会议，曾规定了蒋介石叛变以后所造成的局势之具体特点，并对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相适应的处理路线。这次全会的总指示曾是：面向群众，竭力解开土地革命，武装工人和贫农，扫清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道路，坚决使国民党民主化。这次全体会议曾明确而毫不含糊地描出了独立的共产党方面跟国民党左派在武汉政府内可能进行共同工作的那些必要条件。这次全体会议认为，当前局势之微妙地方，乃是三个阵营（一是封建军阀张作霖的阵营，二是还在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作斗争但已屠杀工农的蒋介石的阵营，三是武汉的革命的阵营）之存在，共产国际执委在其决定中，曾谓强调军阀与某些军事部队的不可靠，乃是非常重要的，与此相联系，并认为“改组军队、创立绝对可靠的革命部队，与工农组织保持联系，保证军

队中的干部人员，将雇佣军队改变为革命的正规军队等等问题，特别尖锐地提出来了”。

共产国际根据这些决定的精神，随时给中国同志作了指示。

（四）最近几个礼拜来，事件更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共产国际认为这些事件中主要而特殊的有以下各点：

阶级的矛盾更加而且非常显著的尖锐化了。中国无产阶级之群众运动，已经广泛地展开了。群众的土地农民运动也广泛地展开。对于该国一切毫无例外的政治集团，都露骨地提出了对于土地革命态度的问题。军阀和军队官佐都公开地投入反革命的阵营，而宣布自己为农民的敌人了。长沙叛变了将领，大肆屠杀农民，不论武汉国民政府，也不论国民党上层领导者，对此种叛变都没有予以制止。冯玉祥也叛变革命了，他与蒋介石勾结在一起（徐州会见），要求武汉政府投降。武汉总司令唐生智，也在屠杀工农，残杀共产党员，把他们逐出军队。反革命的军阀，从蒋介石起到唐生智止，正在携手言欢。同时，武汉底统治分子，掩饰反革命军阀底行动，帮助他们，解除工人的武装，搜查无产阶级的组织，制止土地革命，进行反对共产党员的斗争。而国民党上层领导者，也赶急准备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开除出去。这样，武汉已成了反革命的力量了。

事件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中国斗争的当前时局的基本特色与特质，就是这样的。不过这种特殊的环境，在关于政权、关于对武汉政府态度、关于合作、关于以后斗争方针等问题上，却给中国同志们指出了相适应的策略方向。

（五）共产国际依靠着列宁的学说，过去曾经认为而且现在也认为，在一定的阶段上，在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斗争的范围以内，与它的联盟和联合，是正常的，是完全允许的和必要的。在革命进程底一定阶段上，援助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或其军阀、买办势力之军事行动，也是可允许的，而且甚至必需的，因为这种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对革命事业有益的。

从列宁主义的这个观点看来，（把中国革命）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比，都是应加以驳斥的，而且已经驳斥倒了，在俄国，布尔塞维主义抛弃了与反革命的自由主义之一切和任何妥协，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与资产阶级各集团的联盟及对其军事力量予一援助，只有在此举不妨害中国共产党底独立工作的范围以内，只有在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还没有出面反对工人和农民，只有在资产阶级还能够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历史任务以前，才能许可的。当北伐解放了群众的革命运动的时候，援助北伐，那是完全正确的。当武汉还在反对蒋介石的南京的时候，援助武汉，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联盟的策略，自从武汉政府投降革命底敌人的那一刹那起，就根本变成谬误的了。那在革命底前一个阶段上所适用的，现在已经绝对不适用了。

自然，党的领导底一定的困难，也正是在这里，对于象中国共产党这样年青而无经验的党之领导，尤其如此。加以事件之自发的、不可制止的突飞发展，在时间上缩短了斗争的阶段，使过程迅速地转移，并减少了所采取的某一策略方针还可适用的时期，因之，上述的困难，更形增加了。在紧张的革命局势之环境下，必须要高度迅速地抓紧时机之特点；必须要善于临机应变；必须要迅速地、适时地更换口号；必须要随时改编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队伍；必须要对已经改变了的局势，作强有力的反应。当联盟由革命斗争之因素变成它的桎梏的时候，必须要断然地撕破这种联盟。

(六) 如果在革命发展底一定阶段上，中国共产党方面援助武汉政府曾经是需要的，那末现在援助武汉政府的方针，对中国共产党便是自取死亡，要把它投到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的。不顾共产国际底劝告，国民党上层领导者，在事实上不仅没有援助土地革命，而且放纵了土地革命底敌人。他们批准了解除工人的武装、征剿农民、以及唐生智之流的弹压政策。他们在种种借口之下，把讨伐南京延期，而且实行怠工。武汉政府底革命作用已经完结了，现在它变成了反革命的力量了。武汉急进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可能还敢作出“急进的”、假革命的“英勇姿态”，如宣布讨伐南京之类（如果解除了工人的武装，压迫土地革命，那末，这种讨伐底革命意义，就等于零了）。不过这种装模作样并没有改变事情底社会阶级的本质。武汉已成为反革命之帮凶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底领导核心和中国全体同志所应当十二分明确地考虑到的新的和特殊的东西。

(七) 中国共产党底现今的领导机关，近来曾犯了一连串的重大的政治错误。中国共产党应当依照共产国际底指示，展开和领导土地革命，公开地批评和揭穿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底“急进”的领导者之不彻底的和怯懦的立场，警告群众预防军阀方面叛变的可能，武装大量的工人，十二分坚决地推动国民党和武汉政府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没有执行这些指示。中央不是领导土地革命，而在许多场合之下，作了制止土地革命底因素。党的个别领导者，提出了显系机会主义的口号：“只有在革命扩大以后（?!），再加深革命”，或如“先占领北平，然后再进行土地革命”，这些口号，曾被党的代表大会所推翻了，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代表大会表现了党的群众的情绪。中国共产党大批党员群众在社会下层人民中间——在农民、工人、城市贫民中间，曾经进行了自我牺牲的真正革命的斗争，这时中国共产党底领导机关所进行的却是逼迫群众后退的路线。共产国际执委底革命指示，却被中国共产党底领导机关所拒绝了。而且甚至达到这种地步，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竟然“同意了”解除工人的武装！不顾武汉政府头子们底显然反革命的行为，谭平山毫无勇气公开宣布退出国民政府，而代以毫无原则的和怯懦的“请假”。共产国际在秘密的指示中，一再最严厉地批评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共产国际曾经警告，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央不纠正自己的错误，那末，它就要公开地批评它了。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拒绝了共产国际底指示，共产国际执委认为，公开号召中国共产党党员起来反对中央的机会主义，乃是自己的革命责任。

(八) 共产国际认为，必须马上纠正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底这些错误，并将此事通知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

共产国际认为：

1. 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刻不容缓地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
2. 在退出武汉政府时，需要发表一个原则性的政治宣言，说明采取这个步骤的理由，是因为武汉政府仇视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要求严办一切迫害工人和农民的分分子，从各方面揭穿武汉政府底政策；
3. 但不退出国民党，仍留在该党内，即使国民党领导杆正在进行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开除出去的运动。与国民党的下层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他们中间提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行动的决议案，要求撤换现在的国民党领导机关，并在这一基础上面，筹备召集国民党的代表大会；
4. 用一切办法加强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间的工作，建立群众性的工人组

织，巩固职工会，准备工人群众去进行坚决的行动，领导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

5. 展开土地革命，继续用“平民”式的方式，即用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人、农民、城市贫民联盟之革命行动，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斗争；有系统地武装工人和农民；

6. 鉴于压迫和惨杀，应建立战斗的不合法的党的机关；

7. 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底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认为，关于党的一般政策，特别是关于党的领导之政策问题，获得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共产国际执委号召全体党员根据共产国际底决定，团结党的队伍。共产国际执委号召全体党员与党的领导底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共产国际执委在满意地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底正确立场和党员群众底英勇斗争时，确信中国共产党显露了自己有充分的力量，足以改造自己本身的领导和否认破坏了共产国际底国际纪律的领袖们。必须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他们因与党的全体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用这种办法可以克服现在党的领导之机会主义。

共产国际执委认为，伟大的中国革命之进程，已把这样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唤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和政治行动了，以致任何力量都不能压服他们的运动了。在正确的领导之下，胜利将是属于中国工人和农民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

(一) 根据中央最近农民斗争之议决案，决定这个行动大纲，准备在湘鄂粤赣四省实现。

(二) 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在这里党的政策需要新的变更，革命的社会势力需要新的聚集和训练，现时反动的统治始终没有稳定，农民群众满心期望秋收胜利，因为新遭了挫折，正在寻找他们新的奋斗的方略，“秋收暴动”是对于这个客观情势的适当的答案。这次抗租抗税的暴动是土地革命急剧发展之新阶段，他至少要动摇反动的旧军阀的政权，在湘粤则有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可能的前途。

(三) 党过去对农民革命有一错误政策，就是抑制农民保护小地主利益的政策：具体的表现便是强农民建设与小地主联盟的乡村自治，及五次大会后对于国民党种种限制农民革命的训令不加反抗，反在实际上指令下级党部执行国民党之反动训令。这个错误是由党对小资产阶级的整个政策来的，现在国际第八次扩大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联合小资产阶级，这一个新的指示证明过去湖南农民实行农会专政反对乡村自治是对的，对小地主不可避免的打击所谓“幼稚”“过火”的现象不足害怕而应当积极的去领导的。明白了这个才能不自陷于矛盾的狭巷中，而可以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

(四) 暴动的战略：

(1) 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

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对各地的暴动及革命的政权尽可能的联络，向反革命势力进攻。

(2) 由农会通告，对祠堂庙宇，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之大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五十亩以下之地主实行减租，其租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以佃七东三为大致标准。

(3) 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歼灭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并没收其财产。

(4) 实行对反动政府拒绝交纳任何税捐，并实行对于反革命势力的经济封锁如阻禁拒卖军米等。

(5) 自耕农土地不没收，自耕农及已取得大地主田地之佃农应对其革命政权(农会)交纳田税，税额由农民协会决定之。

(6) 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之分配。

兹将四省农民秋收暴动的每省具体工作抄一份于下：

鄂：湖北暴动大纲政治上给现统治者一个扰乱，使其不能稳定，牵制其对江西压迫；经济上实行四抗(租，税，捐，粮)。

其他可根据大纲拟一具体的计划。

湘：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

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

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

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

赣：1.马上夺取乡县政权；2.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3.尽量杀戮土豪劣绅与反革命派；4.积极参加革命军对反革命派的军事战争。

粤：革命军所占地方，原则与江西相同；军力暂未达到地方即起来暴动响应，夺取乡村政权，建设农会威力，并实行土地革命政纲；如有可能立即夺取县政权，用以引导革命政权夺取全省。

安中原

注释

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指工农民主专政。

安中原，时为中共中央的代号。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文件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小 引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

自七月初旬武汉国民政府公开的反动以来，本党中央政治局已转入秘密状态而组织上有所改变，即派定五人为常务委员会，代表中央政治局职权，并决定派独秀同志赴莫斯科商定此后之总政策。当时即先接受国际电令，宣言本党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号召国民党党员群众及一般民众起来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即七月十二日的中国共产党对政局宣言。这一关键已是本党改变政策之开始。不久，国际方面又有电令来召集全党紧急的正式会议，以审查旧政策及旧指导机关，而决定新的政策。但是，那时正是七月底的时候，时局紧急，因此，先由常委发出七月二十九日的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同志书；同时设法召集附近各省代表准备开会。可是也因为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等到八月七日，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之新书记中夏同志。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同志开会。这一会议，到者有中央委员十二人，候补委员三人，青年团中央委员五人，地方代表二人。国际新代表出席报告召集这次会议的意义。虽因人数不足不能作全党正式的中央委员全体紧急会议，但是这八七会议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议事日程如下：

- 一、国际代表报告；
- 二、紧急会议告全党同志书；
- 三、党的新任务报告——分四项：
 - A. 追认告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中的左派国民党政纲
 - B. 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
 - C. 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
 - D. 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
- 四、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

会议结果，通过上述各议案，兹印布如下，并选举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九人，候补七人。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

农民的革命运动在国民政府的境域内有了广大的发展（主要的在湖南）现在却遇见暂时的失败。地主、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成份依据军队的武力与国民政府的机关联合着进攻，给农民运动以很大的打击。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应当认为是共产党方面对于农民的群众暴动没有坚决的革命指导，这是由于党的指导对于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带有机会主义的犹豫及摇动政策。

共产党对于农民运动指导的摇动不定（由地方机关直至党的中央）是反映小资产阶级之动摇，客观上弄到破坏农民暴动。共产党应当转变过去的方向，坚决的发展与提高农民革命。如果对此问题还要继续的动摇，就有使共产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变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危险。

虽农民革命运动有暂时的失败与紊乱，但在最近期间不仅客观上有新的

提高的可能，而且这种重新高涨是不可免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组织之捣毁，农村中的白色恐怖之盛行，随之而经济压迫之增加等等，都只是加紧农村中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必然准备着新的革命爆发，比前次的规模和力量更要超越。

农民运动不得无产阶级政党有系统的革命指导，很容易无组织的，凌乱的，自然的爆发，反动军阀可以不费力量把他镇压下去，因之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在最近的期间，农民暴动的口号应当是：

- 一、农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
- 二、肃清土豪乡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
- 三、没收重利盘剥者财产，用以改良农村中贫民的生活。
- 四、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
- 五、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
- 六、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之。
- 七、由农民协会取消重利盘剥者的债务苛刻的租约与苛约。
- 八、解除民团团防等类的武装与其他地主的军队，而武装农民。
- 九、改良雇农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工资待遇等等）。
- 十、对于乡村一般失业贫民，革命政权当尽可能的筹措基金救济之，并与以工作（如合作社等类办法）。
- 十一、对于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抗纳，并实行抗租。

国民政府所下的减租二五的命令，很明显的是现在国民党领袖之一种欺骗手段，因之，我们党对于国民政府之决议，应揭破他的阴谋虚伪。因为这种减租不能实现，所以必须提出实行完全抗租的口号以答复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这一骗人的决议案和命令。对于武汉国民政府，现在已和对于新旧军阀的政府一样，本党必须引导农民反对他。对于每次摧残农民都要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尤其要经常的反对一切豪绅军阀御用的假农民协会。

最近开始暴动的口号之中，本党不提出没收小田主土地的口号，是为着要使城乡间广大的小私有财产者之分子中立，但是，并不是说是农民运动不免要起而反对出租田地的小田主的时候，共产党可以认为这种事情是过火的是反革命的。共产党应当力求农民运动之中能有最大的组织性，但是共产党决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咒骂“无政府行为”所吓退——不论自然爆发的农民运动走的如何远，都应当如此。因为本党之农民革命问题上的行动政纲，在这一整个的时期中本是“耕者有其田”这一极通俗的口号，足以引起农民革命运动，一直发展到土地国有及完全重新分配土地。

再则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应当是农民协会的中心，农民暴动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联合一般失业的贫民会党等势力——应当明显的定出收取富豪财产以救济贫民之政策。

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

我们革命已经到了最严重而向新的方向进展的时期，必须有新的策略去领导劳动群众起来，发展伟大的组织，猛往直前的奋斗，方能使无产阶级真

正获得领导权，而求达工农独裁之实现，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联合并领导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完成民权革命，而进于社会革命。

此种总的任务之下，职工运动目前的重要点，就是真工会与假工会之战，现在南京武汉政府，已经都是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政权，成为反革命的工具。可是他们仍旧打着国民党是革命的假招牌，还要说保护工农，维持工农等的欺人的空话。因此，他们尽着想法把持伪工会机关——其实这种骗术，多已暴露无遗。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的领导工农群众反对这些政府，反对北方军阀的政府，对于他们摧残工会或所谓改组工会，都应当立刻坚决的号召群众起来反对。

职工运动中之现时所应特别注意的便是：

(一) 工会应当是真正工人阶级的组织，群众的组织，从一般工会机关直到全国总工会，都是在本党指导之下，由群众所选举出来。现在各地如上海、南京、广东、福建、浙江、安徽等省，以及最近湖北省总工会机关都被反革命派所占领或改组，全国总工会也遭同样的摧残。蒋介石、李济琛、唐生智，汪精卫、陈公博等，派出御用走狗，把各地工会机关占领，这种冒牌的假工会，工贼工会，我们要尽力去反对他，各工会都要发宣言，示威，罢工及经常的广大宣传，否认这些假工会，使个个工人都了解真假，并来拥护共产党所领导的原有的真正工会。

(二) 工会须由工人做领袖，反对一切反革命御用走狗侵入我们真正工会。因为这些走狗受了帝国主义资本家直接间接的指使，正在用各种方法来欺骗压迫工人，法西斯蒂改良主义同时并进。我们应当派少数得力同志参加假工会之中，做破坏的工作，拆散他们的团体，打倒他们的一切信用，遇有伪工会到群众之中活动的时候，便对他们提出工人的要求，以揭露其真相。

(三) 本党应当领导群众力争真正工会之公开，实行工人结社集会言论罢工的自由之政治斗争，再则工人阶级目前最急切的要求，便是经济问题，因为不但工人受着一般的经济金融恐慌及资本家的加紧剥削，而且反动潮流之下资本家必定向工人店员进攻，悔弃旧约，取消工人已得之胜利。本党应当领导工人努力于反抗这种反攻及一切剥削的经济斗争。这种经济斗争，不但以改良工人生活为目的，而且可以增进工人的革命化，并强固其战斗力，决用不着怕工人只顾经济斗争而忘却政治，将来成为经济主义。现在中国情况之下，每次经济斗争，只要有共产党的指导，必然增进政治斗争的剧烈，经济斗争是政治胜利的必要条件。

(四) 经济斗争之目前要求是：

一、八小时工作制，手工业及店员至多不得超过十小时，童工女工至多不得超过八小时，并不做夜工。

二、失业的救济，应由国家及资产阶级担负（须将失业工人组织为有力量的团体）。

三、妇女产前产后应有八个星期（五十六天）的休息照发工资。

四、同样工作，须有同样工资。

五、劳动保险及工厂工人住宅之卫生设备。

六、增加工资，并按照物质高涨照加工资。

七、工资须发现金，不得以信用低落的钞票或国库券等代替。

(五) 现在职工运动在严重的压迫之中，各工会应有秘密的组织，以防反革命的摧残，而保存我们的实力；各地工运同志，党团支部，更须加以严

密的防护，并绝对服从党的指挥，不能有丝毫疏忽。

（六）现时的严重压迫之下，工人更应当有自卫的秘密组织，然不要重视个人的暗杀政策，当注意组织群众的斗争。

（七）注意于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权。

（八）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如果反革命的资本家闭厂怠工实行经济封锁，则工会应领导工人实行占领某工厂交于当地革命政府管理。

（九）应选有觉悟的工人到农村间去做农民运动，并可轮流派工人到乡间工作，使工农关系在实际上密切起来。

（十）职工运动中手工工人店员的斗争占极重要的位置——中国大多数小城市中，甚至只有手工工人及店员。本党必须坚决的领导他们斗争，组织他们的职业工会，力争改良他们的生活及政治社会地位。

（十一）职工运动中以后要更加多注意产业工人，特别是：铁路、海员、电报、水电、电话、邮政、运输、兵工厂等工人……他们不仅是我们的主要基础，并且在土地革命的阶段中他们是打破封建势力及在城市中的大本营之伟大力量。（十二）职工运动是本党的基本工作，应改正以前把他看做部分工作之错误应以整个的党来指导他，所以各级党部之工人部应即取消，另设职工运动委员会，经过党部委员会直接指导职工运动中的党团。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

（一）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之临时政治局以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组织之。

（二）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之一切职权。（三）中央所在地最近数月内仍在武汉。同时须组织南方局于广东，至少须有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三人加入。

（四）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按期出版秘密的党的政治机关报，而传播于全国。机关报之党报委员会，由政治局委任之。政治局之下应设一特别的出版委员会，专掌传播党的机关报及中央一切宣传品的责任。北方顺直省委（或北方局），南方局，以至上海省委之下，亦应设立出版机关及传播秘密宣传品传单等工作。

（五）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与出版委员会的散布宣传品的工作相联络，担任传达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等等的职任；并兼办探听反革命线索及其他各种消息各地环境的特务工作。各省亦应有此等机关之组织，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

（六）现时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各级党部委员会，省委，市委，县委，区委都应当在最近期间改造成下列的方式：每一党部委员会之中，分出三人至八人之常务委员会——为指导机关，由其上级党部机关批准：此等常务委员会即应执行各该党部委员会之一切职权。每一党部都应严格的与其上级及下级党部建立极密切的极秘密的联系。极严格的秘密规律，都应与以严厉的工作之基本条件。虽极小的破坏秘密规律，是秘密状态中资的工作之基本条件。虽极处分（一直到开除）。各级党部都应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以扩

大党的影响（如组织各式各样的学生团体，小商人团体，妇女团体，俱乐部等类之组织，利用尚未被封之工会等等，在这些组织之中组织党团，受党的严密的指导，各种伪国民党的下级党部之下，也是如此）。但是即使在最公开的条件之下亦应有秘密组织及工作，这是现时环境中最主要的职任。

（七）秘密状态之中，保存工会的组织亦是最重要的职任之一。一切工会中应当速建立起党团来，人数不要超过五人至七人，须完全服从相当的党的委员会之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工会机关的指导，应由各级党部从速审查，换有经验的工人（农民）同志担任这种指导。

（八）严守党的纪律尤其为秘密党之必要条件。党部机关之一切决议之决定，调遣等等，应当绝对的服从，一切党员，不论其地位如何都应如此。凡破坏纪律者，都应从严惩办（停止职务，开除党籍等等）。

（九）一切支部应当立刻进行秘密工作，并即按照此种目的而改造。每一支部都应当分成五人至八人的若干小组，每组有一组长（并应有候补者），以与支部干事会联络（如支部之下尚有按生产部门的“分部”，则与“分部”干事会或书记联络）。各小组尽可能的每星期集会一次，进行一切党的基本工作，经过这些小组进行各该企业中（工厂等）的工作。

（十）每一支部之中，须挑出最可靠的同志——负责同志；支部干事会与负责同志应有特别的联络——应按期召集负责同志开会，或全部的集会，或代表的集会。

（十一）每一区的党部亦是如此，在小城市或村镇，则可由全体党部之中挑选负责同志，直接与市委或县委联络，经过这些负责同志，党部委员会即易指导该地全体的党部。

（十二）每一党部委员会之下，现时须即组织审查委员会，（各省委就是监查委员会）以审查各该党部之党员有否不可靠的分子。这种审查不应带有清党的性质，而只是去掉对于党部不可靠的分子，以及可疑的分子。我们党应当在此过渡于秘密状态之际，极力保存多量的党员、要使每个党员都不与党部脱离关系。

（十三）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武汉党部转入秘密状态的关键，因为此处有好几千党员而大半都是没有经过秘密状态的，中央应当帮助湖北省委进行这种改组的工作而直接的督促他。

（十四）自省委以下各级党部委员会之成份，都应经过上级机关重新审查，使能更新而巩固。应当注意提拔工人同志到党部委员会里负重大责任，而肃清其中曾经在最近几日表现机会主义的分子。

（十五）现时秘密状态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权。但是集权制度不应当变成消灭党内的民权主义。最近党所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需要彻底的讨论，付在群众之中加以审查，并根据之以审查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因此，不论如何严重的压迫，必须在本次会议后，设法极慎密的进行党内的讨论：先由支部讨论，然后在各省之区、县、市、省开秘密会议，详细讨论党的政策问题，而根据这种讨论，改造各级党部的机关。

（十六）党对于青年团的关系，须有极严格的变更。须切实实现各级党部与团互派代表的原则，——团部代表有表决权，并引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参加党的政策问题之讨论。

注释

这一段文字混乱，疑有误，原文如此。

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月×日)

一、目前两湖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形，纯是一个暴动的局面，本党当前唯一重要责任，就是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革命政权，如此才能保障革命猛烈的继续进展。

二、两湖的暴动尚未开始，在时间上已经是失败，这是犹豫不决与不相信农民的群众力量的结果，如此便要丧失革命。

二、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的群众力量，军队与土匪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副力，坐待军队与土匪的行动，或许纯全依靠军队的行动而忽略农民之本身之组织力量与行动，这也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表现。这样领导暴动，暴动无疑的要归于失败。这不是暴动，这是一种军事的冒险，或者军事投机。

四、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号，因为两湖的环境不同，两湖应各有其中心区域，应各创成一种独立的暴动局面以发展暴动，但总的政治目标口号与行动须一致。

五、湖南暴动可分为三大区，……如此全省范围的暴动，应普遍的以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为号召的中心，此革命委员会于暴动成功之后组织湖南省临时革命政府。

六、南北暴动应划成下列各区：……

七、暴动组织在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之下，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某农民暴动区域军事的指导用某区农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工农军的数量在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成为正式的革命军队，同时仍保存地方军队性质的工军与农军，执行各境当地警卫，以之为革命的新警察的基础。在暴动尚未发动之前，应将工人纠察队改称工人革命军，农民自卫军即应改称农民革命军。

八、对于土匪的政策应当以我们的口号去宣传他们组织他们于农民协会之下，或革命委员会之下，使他们在暴动时成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动成功之后予以改编。

对于反唐的杂色军队（许克祥除外），如能对于暴动取中立的态度，则可利用其中立以便迅速发展暴动，并须设法与其兵士接近宣传他们，暴动成功后，对于此种部队酌量予以解散或改编。似这决不是说要牺牲我们的根本主张以换取他们的中立。在暴动中对于有反暴动倾向的杂色军队和土匪，虽然他们是反唐的，也要立刻解决他们。

九、暴动为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即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事实的结果是全部），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气没收其财产，实行乡村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民选革命政府，消灭一切非农民非工人革命的武装。

十、暴动之前须极端注意兵士中的宣传，鼓动他们起来杀戮反革命的军官；一有可能，便应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这种组织应是广泛的群众的。暴动之中要吸引兵士参加。这种革命兵士的组织可以做改编新革命军的成分。

十一、暴动的口号：暴动打倒武汉政府，暴动杀尽土豪劣绅反革命的大地主及一切反动派，暴动为死难民众复仇，暴动没收地主的土地，暴动实行

耕者有其田，暴动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暴动恢复一切革命民众团体，暴动实行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暴动实行民选革命政府，暴动打倒叛国叛党的汪精卫，暴动打倒残杀两湖人民的新军阀唐生智，暴动组织革命军，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平民和兵士的革命联合万岁，农民革命胜利万岁，革命委员会万岁！

十二、各区的暴动在未发动之先，在离城较远一点的乡村即应杀戮土豪劣绅反动的大地主，提高农民革命的热情，举行各区农民群众大会，多作群众的政治宣传（按照上列的口号加上实际的事实），如发传单讲演、壁报、告示等。在暴动方开始，首先即须征集所有的力量攻打某乡区的中心城市，屠杀政府的官吏，宣布革命委员会政权，然后才能发展普遍的暴动。

十二、暴动方开始即须掘断铁路，破坏水陆交通，占领破坏邮政机关，割断所有的电线，造成敌人的绝端恐慌的状态，然后才可便于暴动的发展。但因交通机关的破坏，同时影响于我们自己的联络，各暴动区域应当想出特别传递消息的方法，切不可因此而迟延等待某区的暴动，即令暴动发生后各方关系断绝，亦应按照预定的未成功与已成功的地点猛烈的进攻，绝不可犹豫，犹豫便是破坏暴动的胜利。

十四、暴动胜利的地方，应无情的镇压肃清反革命。对于买办及反动的资本家，如果他们经济怠工或封闭工厂，则工会应当占领工厂，以之交给革命政权管理。至于反革命的豪绅则应坚决的没收其财产。但必须注意应用正式革命政权机关实行这种没收，严禁私人的抢掠侵吞。

十五、长沙武汉两湖省委，应有一特别的暴动计划。

十六、各区的暴动内部的指挥为各区的特别委员会，直接归省委指挥。

注释

此决议案原载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四期，从内容看似为中共中央的决议，故收录于此。

此文时间为编者判定。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中央最近的策略及客观的革命形势

本年八月里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已经考察武汉七月反动之后中国的一般政治状况，断定那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稳定，在现时中国这种社会经济政治的基础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央那时指明：一般政治军事经济的大危机，因资产阶级军阀反革命的结果，必然要大大的扩大发展起来，这是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事实。

中央曾经指出：虽然中国革命受着两次巨大的失败；四月间沪粤的反动，七月间武汉的反动，然而中国革命决不会就此长期的消沉，所以中央认为这种悲观的观念是绝对不正确的。中央那时认为必须继续扩大深入革命的斗争，并且要坚决的采取组织工农武装暴动的政策。以后的政局，完全证明中央这种考察是正确的，中央的大政方针是对的，固然南昌暴动及南征广东的革命军队失败于潮汕，固然广东两湖的农民暴动一处也没有确定的大规模的胜利，但是革命虽然又遇着了这几处部分的新失败，然而三个月来一般的斗争经验，更证明了本党的策略完全是对的。最近的一期，各地工农民众的斗争又重新猛烈的爆发，一般政治状况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经过了很严重的变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考察现时的新时机而决定适应这种客观时机的策略。

二中国社会的总危机与农业经济

中国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虽然胜利，然而那些产生伟大的中国革命之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仍旧存着。沪粤武汉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解决那些中国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而且更加使这些矛盾剧烈起来，增多起来，更加使这些矛盾的爆发急遽起来。这就是因为得着胜利的反动势力，竭力在那里巩固中国的旧制度——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是陈旧腐朽落后野蛮的制度，于是这种情形的背景里，那一般的总危机便尽量大大开展起来。这就必然要引起无产阶级、城市贫民，尤其是农民的广大群众之革命斗争的高潮。

农业经济的衰落破败，一天天的更加带着天崩地陷的爆裂性质。今年(一九二七年)是相当的“丰年”(除直隶、山东两省已经完全被战祸天灾所破灭之外，其他各省的天时，照例应当使农业经济相当的改善，但是事实上差不多全国都因过去的灾荒与战祸，同样是成千累万的人饿死杀死，不过是比灾歉的直鲁略好些)，可是这所谓“丰年”，不但没有阻止些农民经济的崩败，而且更加增进农民经济崩败的过程。因为“丰所”的结果，人民反而要多出些钱米租费给地主和政府(例如浙江今年借口丰年迫缴历年欠赋)，地主和重利盘剥吞要追取农民的旧欠，买办和商人要抑低农产品的价钱，军阀更借口增加税捐至两倍三倍(江苏今年增收田漕的亩捐)。所以所谓“丰年”即使不比荒年更加使农民破产，至少也和荒年一样。地主的剥削农民，商人重利盘剥者的剥削农民，军阀的掠夺农民，豪绅官僚等等的压迫农民，现在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弄得农民不但不能恢复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于不能保存自己的性命，各省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已经被这些有产阶级剥削到不能一日忍受的地步，农业经济的“重复生产”，即使在极隘小的范围内也简直是不可能的了。除地主商贾重利盘剥者的直接剥削外，军阀

还要掠夺农民，他们不但征发粮食牲口，并且要拉夫，再则因为战祸连年的关系，水利灌溉防旱防水的工作，都大受妨害，国家秩序混乱分崩，天灾日益频数（这些天灾亦大半由于中国社会制度而来的），还有财政金融的紊乱，使乡村中多量的出产品流入城市而不能得着相等的报酬，商业和市场的停滞纷扰，使农业经济上技术方面的准备也日益破毁，乡村中土匪蜂起等等。——凡此种种，都使农业经济崩败衰落。农业经济的危机是一天天的增加，而有天崩地陷似的暴落的趋势，这种危机的唯一出路，只有工农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剧烈的土地关系的变革。

三工商业的危机

中国工商业及金融中的危机，尤其有明显的表演。中国革命客观上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造成统一全国的国内市场，没有统一全国的国内市场，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一革命任务，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阶段中就应当解决的。但是国民党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走近解决这一任务的一步，而且更加使这一任务的解决远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不但增加中国的分裂离析，而且发生许多新的混战，各省之间有战争，每省之内也有战争，现在全中国都是混战。商业交通在各省之间固然是时常断绝，就是在一省之内也往往东阻西隔，各省都是紊乱的金融状况，原料机器燃料的运输减少了不少。有些地方简直断绝了。反革命的屡次政变之后，外国资本家的竞争势力又增加了好几倍。再则中国农民的家庭工业，手工艺等类的事业，更加破产停滞。国内国外的贸易都是日益衰落（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输入减少百分之五十）。外国资本利用银价的低落，财政的紊乱及国民党的屈服，更加在中国多量搜刮金钱财货。全国的破产穷困，经济的衰落，都在一日千丈的堕落下去。几百万农民，几十万工人店员，都在失业，都从商业及一般生产过程之中排斥出来。资产阶级军阀国民党的反动，就是如此的“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四帝国主义侵略之急进

资产阶级军阀的反革命，在国际关系上，便是完全降伏于外国资本主义，而增加帝国主义的侵略。英国帝国主义已经实际上夺回了汉口的英租界，而且完完全全统治了上海。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得着了绝大的胜利，满洲、内蒙正在变成完全的日本殖民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投降了外国资本，他已经抛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不敢再争收回租界的问题；关税自主的问题，他竟无耻的完全屈服。他绝对的背叛了民族解放运动。现时国民党的所谓“反帝国主义”宣传，一忽而反英，一忽而反日，都不过掩饰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替帝国主义当走狗的那种无耻的奴性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只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矛盾，而实在则替其中最强的当工具。从革命开始到现在，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统治力，从没有现在这样强大的。伟大的中国之被压迫的半殖民地的地位，虽然以前一向是治者阶级向帝国主义做买卖的“投机事实”的对象，但是从没有现在资产阶级军阀反动（国民党）治下这样厉害的。

五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

国内政策方面，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便是只能采取法西斯蒂主义及亚洲式的野蛮专制之凶恶手段。白色恐怖，穷凶极恶的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劳动民众，这种反革命政策，在国民党治下，达到了空前的野蛮程度。中国旧式的野蛮毒刑，对于革命党人的非刑拷打，还要加上建立黄色工会的把戏和警

察包探所组织的工贼性的“工会”，渗入工人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日益增长同时他自身之内的分化崩溃的过程却也在急转直下的前进，中国资产阶级，固然绝对没有能力实行反抗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反动的革命使命，而在群众运动高涨的最初期，便背叛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更没有能力做稳定团结反动势力的动力。对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要他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统一中国，建立集权的国家，或者就在资产阶级地主联合的基础上统一中国，都简直是他没有丝毫能力去实行的事，这是他历史上的命运。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地主的联盟，其结果是使中国更加分崩离析，使割据互争的局面更加纠纷，自然要造成继续不断循环不息的军阀混乱的屠杀战争，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各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最不成熟最没有力量的阶级，最不能负起历史上的改造社会制度之责任的阶级。一切建立巩固的国家政权之尝试，就算在一个小小省县的范围里罢，都是完完全全破产。无间断的屠杀混战及空前的贪婪淫佚腐化，——便是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国家机关之致命伤。国民党曾经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如今很快的腐化堕落，完完全全变成无主义无目的的帝国主义走狗的狗窠，屠杀工农的刽子手的党，贪赃舞弊杀人凶犯投机奸商的官僚党，这事实很明显的反映着资产阶级反动的全部腐化崩败的景象。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八月间便预言：国民党要变成一个象样的资产阶级反动的政府党，尚且是不可能的事，这是很对的。本次会议完全赞同中央九月间关于取消组织左派国民党之计划及提出苏维埃口号之决议。本党认为国民党左派组织失败之经验，证明国民党的旗帜已经完全变成白色恐怖的旗帜，凡是真正革命分子，只有团结在共产党旗帜之下。本党不但要号召一切革命分子退出国民党，而且要努力揭发国民党的欺骗压迫民众的罪恶，要领导民众起来推翻国民党。

中国资产阶级是历史上的流产，甚至于连造成自己政党的能力都没有。他们不能造出一个有一定政纲的党，更不用说要他造出一个真有政治意识的政纲了。

六中国革命的前途

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特别的作用，使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完全没有稳定的可能。经过革命的三次失败，仿佛反动稳定是件可能的事。但是必须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及政治制度能够由改良主义的方法，解决一些，同时，必须在现时国际国内之中，有渐进的、作算是非常迟缓痛苦的改变社会制度之可能，可是实际上现时在中国没有这些条件。中国没有这样一个阶级，能够负起责任来，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不过是夺取革命领导权蒙蔽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手段，领导权到手之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立刻便不得不将他转交给豪绅地主阶级，就是完成反革命势力的复辟，结果是反革命的领导权仍旧在豪绅地主阶级手里，而不在资产阶级手里。如汪精卫等类的政客，想“改良”土地关系（如应允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等），可是这种政策在几天之内便完全破产，单是这一例子便证明改良政策不过是公开的欺骗。再则全世界客观的形势是革命的，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又在急进的施行，这种情形也就是使中国没有由改良主义得着外国资本家的帮助，而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要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完成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使中国完全永久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二）帝国主义战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战胜苏联。此外中国不能由改良主义的方法去达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却还有一个

理由，就是革命虽然受着屡次很大的失败，而中国劳动民众革命运动的力量不但还有很多很多没有用尽，而且现在刚在重新爆发革命斗争的高潮。

最近几月的经验，铁一般的证明这件事。中国伟大的革命已经唤起如此广大的工农苦力群众，他们都起来实行独立的政治斗争；民众激愤的革命力量，决非几个月的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所能完全扑灭的。

所有这一些情形，都使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这一观察，并不带着“革命在最短期间必定完全胜利”的幻想。中国的客观情形是如此；直接革命的形势之时期，并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中国革命带着长期的性质，但是是无间断的性质。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一）在革命性质上，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推翻封建军阀的民权革命，所以中国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所谓二次革命的理论）；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二）在革命速度上，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因为治者阶级之间自身的冲突矛盾非常剧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的到处爆发，而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这种继续不断的革命爆发，显然证明中国革命之无间断性。总之，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速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

七革命的高涨与低落的问题

中国革命的无间断的性质，只要看最近各重要省份里农民暴动的高涨，就可以证明。九月间农民暴动普遍广东湖南。虽然这种互相隔绝的群众自发的暴动，遭着屡次失败，然而农民运动的爆发仍旧继续着，有些地方（如湖北）甚至于更加厉害起来。十月间农民暴动又在江苏、直隶、热河、山东开始了。同时几个主要的无产阶级区域，如上海、广州、武汉，经过一期退落情形之后，工人运动又带起比较猛烈的革命性质。农民运动的潮流，已经引起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爆发，不过暂时还比较的弱罢了。南京与武汉军阀争夺地盘的屠杀战争强盗战争开始之后，劳动平民反（更？——校者）加受着痛苦，广大的工农群众更加愤激。虽然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非常之严重的压迫屠杀搜捕，然而群众的革命斗争，却正在刚经失败损伤的地方，陆续的继起。群众正在自己失败的经验上，学习革命的斗争。

固然，过分估量革命的高涨及群众的革命力量组织力量，因而认为可以有大范围内立刻的胜利，这是错误的；然而经过革命三次大败之后，在现今这种反动局面之下，群众的革命斗争终于重新爆发；如果对于这种情形估量太少，那就是不可救药不能轻恕的错误。

因为革命潮流的低落条件，至少是：（一）资产阶级军阀统治的稳定；（二）改良主义的渐次实行；（三）革命群众之溃散与消沉。单是敌人的屠杀进攻，不但还不是革命的溃散，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才使敌人惊惶失措而拼命的严厉镇压。但是，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布尔塞维克的党，不去积极发动群众，领导革命潮流的发展，而以为自然的革命高潮到来，自会胜利，那也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八现时的总策略

现时形势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总策略，便是：（一）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二）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三）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中国共产党应当避免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武装暴动的发动，那是会变成拼命的“孤注”的，然而党应当去领袖一切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之发动。所以共产主义者应当做一切农民暴动的指导者。如果农民暴动的发动，事实上不能有多分准备起见而推迟，如果这种暴动事实上不能估量到较大范围内的胜利，那么，党应当使这种暴动采取游击式的战争（不去占领县城或巨大的地域，长久的时期，不去费力建立大规模的军队等等，而以人数虽少却是团结巩固的暴动军，经常不断的袭击政府的军队或地主的武装）。这种游击战争，随后很容易发展而生巨大的农民暴动，进一步而达到在较大的范围内夺取政权。固然，游击战争开始之后，攻袭城市，尤其是小县城，是农民群众常有的倾向，本党尤当领导这种斗争，使适合于战术上的目的，袭其不备，夺其武装，杀戮豪绅，摧毁其各种权力机关。但是，农民暴动之后，如果专意占据县城而忽略乡村中土地革命的根本工作，不去发动更多更广的群众，不使群众自己取得土地取得政权（苏维埃），那么，这便是军事的机会主义。

至于城市之中，则游击战争的策略，比较起来要难实行得多，所以往往城市之中有不适宜采用这种策略的时候，要到城市之中已经最终决定举行暴动，巷战已经开始，那时，党才可以运用这种游击战争的策略。

然而现在在一切工业区域，已经要建立工人的武装队自卫队，训练战术，利用他们在日常的反抗黄色工会的斗争之中，这已经是工业城市之中现时所不可迟缓的任务之一了。城市暴动的必须条件是：（一）工人群众的革命高涨及革命情绪——工人日常经济斗争的加紧与扩大，形成总的政治斗争；（二）治者阶级统治之动摇崩溃的形势；（三）一般市民（中层阶级）的慌乱犹豫摇动，对于治者阶级厌恶而反对，甚至于同情于治者阶级之颠覆；（四）工人阶级之革命力量之组织，技术上的准备。因此，党不但不应当在城市之中只注意到所谓军事工作之准备，而忽略各市以及各县工人手工工人店员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之指导与发动，而且应当更加加紧这种斗争，每一次极小的斗争之中，也要引导工人群众去了解暴动夺取政权之必要，及与农民暴动联合推翻统治阶级之必要；这样，于是切实的在政治上准备城市之中暴动，关于工人暴动与农民暴动的联络关系，是党的最重要的责任，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和赞助，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能获得最终胜利的；但是，这种联络，只有经过党的组织与规定计划。群众的暴动，不论在城市或乡村，都要适合当地的环境与时机，既不能互相等待，亦不能在明明没有立即暴动的形势中，而以军事投机的方式做军事上的互相影响。

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

再则，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之下，可以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是军事投机主义，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发动，固然是军事投机主义，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不以发动群众为根本政策，不相信群众的力量，

而只相信军事的力量，只知道军事上的布置准备攻守进退的规划，因此，暴动之中只见军事的行动，并不充分发展群众斗争的根本工作，二是借口准备的不充分或者采取等待政策，而不发动当地的群众，甚至群众已经多数的起来暴动，尚且对于领导这种暴动仍旧是怠工或动摇犹豫，这种倾向的不信任群众力量，不发动群众的政策，甚至阻止群众自发的斗争，可以使党在群众之中丧失政治生命。党对于这两种错误的倾向应预先指出他们的危险性而努力扫除之，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众暴动的责任，固然是使他尽可能的有最大限度的组织性，但是，一切群众自发的斗争，即使是党所认为过早的，党也有起而领导之责任。

最后，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对于一般贫民苦力群众（小资产阶级群众）应当尽力吸引他们参加工农的斗争；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存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怕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

现在虽还没有到总暴动的时机，而党的任务却正在于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党不但要努力去组织农民自发的暴动，而且要去领导贫苦农民，领导起潜伏待发的暴动，发动游击斗争；应当发动工人的阶级斗争，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领导他们汇合而成总暴动，获得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胜利。

九苏维埃的口号与工农政纲

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兵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党应当在文字口头的宣传上，对于最广泛的群众解释：“为建立工农兵手工工人城市贫民代表会议政府，而实行革命斗争的必要。”（“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但是，只有确实无疑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巨大高潮，暴动之稳固的胜利已有保证，只有到了这种时候，方才可以并且应当组织苏维埃，以为革命的政权机关。这所谓“暴动之稳固的胜利，已有保证”，是说暴动在一定区域内已经有固守较长时间的可能；只要有这种可能，便应当建立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只要暴动真正是发动群众的，那么，暴动胜利时，这便是事实上不能不执行的任务。至于游击的农民暴动，还只在袭击移动的时候，当然，那组织暴动的当地革命委员会，继续以临时政权的性质为暴动之指导机关。总之各地农民暴动的发动，应当以当地农民的秘密团体（农民协会等）所推出的革命委员会来指导（城市暴动便是工会等推举的革命委员会）；应当尽量发动群众，引进更多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实行自动手（“民众式”）的没收土地，杀戮豪绅、工贼，摧毁中国一切旧社会关系，实行游击式的战斗——解除敌人的武装，组织工农革命军；这种暴动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内得胜而有固守的规划之可能，便应当建立苏维埃（农民代表会议）；如果已能占据城市一县或数县，以至于一省，工农暴动已经联合起来而获得胜利，那便有建立苏维埃之必要。城市中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之建立，尤其要吸引广大的工人手工工人店员的群众；城市暴动一开始，甚至尚未开始之前，已经要有群众斗争组织的雏形，如总同盟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大会、革命委员会等，要积极领导这种群众斗争的组织，使成为革命的暴动的中心机关，实行革命暴动独裁的机关。暴动胜利一有巩固的可能，这类的群众组织便要变成苏维埃，而为革命的政权机关。暴动的胜利，只有在建立苏维埃

的过程中，能使工农群众真正自己获得政权，而更加尽量的来发展革命巩固革命的胜利。——所以苏维埃的组织既不能在胜利绝未巩固之时开始，因为这可以陷于忽略军事战斗而专事选举，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成见，因而减弱革命的独裁制以至党的领导权之危险；苏维埃的组织也更不能借口于军事尚未了结，基础尚未稳固，而延迟推宕，因为这便更加要增长暴动中的军事投机主义，这便将工农暴动完全变为军事行动，只去攻城夺地，只知道军事上的规划。

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是武装暴动的总口号。城市贫民应当包括工匠手工农业者及一般非剥削者的小资产阶级。

党应当在斗争的过程中组织农民于农民协会等类的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依各地的情形群众的信仰而定）。这种农民组织必须是贫苦农民群众（破产贫困之自耕农、佃农、雇农、失业农民）之阶级斗争的组织，且是暴动的组织（决不能视为类似工会的经济的组织）。然而党应当确定方针：暴动胜利之时，要农民协会变为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现时就应当宣传苏维埃的口号及农民协会的过渡作用。所以苏维埃口号并不与组织农民协会相冲突，可是“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应当取消，苏维埃口号之外，还要团结农民于土地革命的旗帜之下，农民暴动未发动的地方，秘密的农民团体是有需要的，本党应当引导他们到抗租抗税不还债的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没收土地，本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总方针，已经载在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之中。党应当坚决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分子犹豫圆滑的修改或谬解土地问题上的党的主张。土地革命的主要口号应当是：完全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耕者有其田，完全取消租田制度，同盟抗租抗税，取消一切苛约、重利债务，没收豪绅重利盘剥者的财产，歼灭豪绅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本党坚决的反对用减租、没收大地主、打倒劣绅恶地主等改良主义的口号，来替代上述的革命口号。本党应当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极端严厉绝无顾借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游击战争之中也是如此。

城市之中，除苏维埃口号以外，还有劳动问题党纲：八小时工作制，绝对地增加工资，规定休息日，社会保险，要求监督生产等。再则，应当对于工人群众及城市贫民解释，并且要在暴动胜利之时实行下列的事：例如没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财产，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大工厂大商店银行矿山铁路等，收归国有，工厂归工人管，厉行劳动法，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的工厂，歼灭一切工贼反革命派，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改良贫民生活，如建筑工人贫民住宅等。只有在这种革命的口号之下，本党才能组织被压迫群众的暴动，而得到胜利。

十反对军阀战争与军事问题

反对一切军阀战争的问题，是中国现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赞成中央最近所发反对军阀战争的宣言，认为对于军阀战争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的政策，是非常之对的。“失败主义”便是要使交战的双方军阀都失败，因为军阀的失败崩溃，就可以开展群众革命运动的环境，而使工农暴动容易得胜。本次扩大会议更特别的指明：失败主义的革命策略，在南北新旧军阀战争的时候，对于本党是天经地义。对于劳动民众，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的统治，与白崇禧、唐生智、汪精卫的统治是一样的。北方军阀大半自身便是很大的地主和重利盘剥者，是最

大的官僚买办资本家的代表（商业资本与重利资本及官僚大地主的政权）；南方军阀是豪绅地主（重利盘剥者）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他们双方虽然现在还是反动之中互不相同的种类，可是工人阶级及农民对于他们的态度是一样的。本党的任务，便是在一切军阀战争之中，努力将这种军阀战争变成革命战争，将这种屠杀掠夺的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富豪军阀的国内战争。本党应当向劳动工农民众解释的，对付军阀屠杀战争之唯一方法，便是各地工农兵士群众起来实行推翻自己当地的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之革命暴动。本党应当组织群众以备暴动，在优越的时候发动群众而指导他们暴动，领导工农群众起来夺取这些混战殃民的军队的枪支武器。

中央认为必须更加加紧在一般广泛的平民群众之中做反对军阀的宣传。“反对战争”的口号，中央认为是对的。但是宣传这一口号的时候，必须解释，要能永久消灭这种军阀的掠夺战争，只有劳动贫民的革命胜利，而建立苏维埃的政权。

军队之中的革命工作，因为战争的关系，更加重要而更加要加紧破坏这些军阀军队的工作。中央现时特别指明，虽然中央政治局屡次提及这一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到处受摧残，或者简直没有做。农民暴动屡次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央认为就是这一工作没有丝毫成绩的缘故。本次会议现时特别命令各级党部立刻开始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的秘密工作。除主要的革命口号之外，军队中的宣传，可以加上下列的要求：例如，增加兵士饷项，要求发清欠饷，给兵士好衣服好住所，废除肉刑，反对军官侮辱兵士，兵士监督军官的财政收支等等，本党应当号召兵士参加工农暴动，没收军阀财产，兵士派选代表参加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的政权。

同时，中央认为必须特别指出：中国革命总经验，尤其是屡次失败的教训，都证明要使中国现在的雇佣军队，变成革命斗争靠得住的工具，是不可能的，因此，凡是暴动胜利而有可能组织正式的革命军队的地方，本党应当组织完全与雇佣军队不同的工农革命军，工农革命军组织上的主要原则，便是志愿兵制度，工农革命军的主要成分，应当是阶级觉悟的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党代表政治部的制度，应当在新军队的各级组织之中建立起来。新军队中应当有集权的军需供给的机关。新军队的名称定为工农革命军。

十一 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八七紧急会议以来的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阶级斗争剧烈的时期，这种情形自然的结果，竟使本党以全力去指导无产阶级农民的斗争；在这种艰苦困难的条件之下，本党所以没有能分一部分注意到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上来。同时，正在这一时期之中，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保镖的军阀（国民党）逐步屈服，实行其卖国的亲帝国主义的使命。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工人苦力群众赤手空拳夺回来的英租界，国民党竟归还了英帝国主义者，这是何等的耻辱。九月一日实行关税自主，也竟取消了。南京政府曾经企图使盐务署的外国督办服从自己，但是英国领事几声抗议便把国民党吓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蒙，而国民党政府一句硬话也不敢说。所有这些事实都更加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是彻底的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无产阶级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引进极广大的农民与城市贫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锋，应当领袖中国劳动民众的民族解放运动，——严格的揭发治者阶级的卖国行为，以及国民党虚伪的“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本党应当号召无产阶级及广泛的被剥削民众起来奋斗：反对帝国主义，

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立刻撤退外国海陆军，没收外国资本家的工厂、企业、银行——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中国人民公有，取消一切外债——满清政府及军阀政府零更出卖中国所借的外债。

同时，本党应当经常不断的对工人及一般劳动民众解释：中国人民要完全战胜帝国主义，只有推翻治者阶级，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真正的平民政权——苏维埃政权，同时，也只有得着国际无产阶级的赞助。

十二机会主义之遗毒

八七紧急会议虽然严厉的反对以前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半孟雪维克主义的政治方针，中央临时政治局虽然屡次纠正地方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然而党内仍旧有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之遗毒。叶贺潮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南昌暴动政治上意义的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前敌指挥者不是实行革命的政策，而是在各种主要问题上采取妥协的改良主义的方针（只提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之上地，主张减租到收获百分之三十，不注意农民群众的革命宣传，不准工农自动的独立的实行杀戮豪绅地主反革命派，抛弃征发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之政策等等）。军事上很坏的策略，也表现前敌党的指导，没有革命的建议力，没有果断的意志和方针，许多次的农民暴动之中，指导者犹豫动摇，没有革命的坚决的意志，都是多次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机会主义的特点，便是不相信群众运动的力量，不去依据工农民众，而总想依靠靠不住的军队力量，总只想做勾结杂色军阀的把戏。中央这次会议认为必须以全党的力量，来排除这种危险的致命的机会主义之遗毒，这种机会主义遗毒犹存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党的指导干部是非无产阶级的成分，本次会议命令各级党部立刻用最坚决的方法，使指导干部工人化，肃清其中的机会主义的分子。要知道最近两湖广东及叶贺南征的失败，其原因由于主观上的错误的占极大部分，没有坚固健全的非机会主义的党的指导，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再则，本会议认为还要预防党内别一种危险倾向发生之可能，——这种倾向便是对于工人阶级日常的经济斗争，部分要求的斗争，职工运动的工作，估量太少。其实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不但和指导部分要求的斗争的工作不冲突，而且更加要党积极的去领导工人阶级要求改善自己生活的日常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共产党发展成为群众的革命的组织。

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组织任务之重要

最近的革命斗争之中，组织问题更加占了第一等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布尔什维克化，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之革命化，都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在于他的组织，全在于他有革命的阶级的组织，尤其是对于工人阶级的先锋——共产党。共产党应当有布尔塞维克的组织，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式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成为群众的力量，决不能尽他在工农革命里的领袖及领导者的历史使命。最近劳动民众革命运动所受的历次失败，就是我们本党所受的历次失败，很明显的暴露出革命营垒里组织上的弱点和缺点，这许多弱点和缺点，不仅是表现本党在组织上不能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奋斗，而且党员的本身在有些地方（如湖北）当反动势力比较严重的时候，便公开的脱党以至为敌人当侦探；有些地方整个的党的组织甚至根本瓦解。同时本党自从放弃机会主义之后，虽然

在极反动的政局之下屡次遭着失败，但是工农群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大增，尤其工人同志的积极，大增长起来，提拔工人同志负指导职任的工作，虽然还很充分，可是已经使党日益健全起来，可见本党组织的健全与发展，只有在反机会主义的政策及组织原则之下更加努力，更加切实执行新的方针，战胜这些缺点和弱点，便是中国共产党现时第一等主要的任务。

二党的组织之大弱点

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主要缺点：一、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一个政治派别，形成一个政党，还在中国无产阶级没有自觉的成为一个阶级的时候，还在工农阶级运动初具雏形的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资产阶级曾占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智识界，这种情形影响到中国被压迫民众之阶级自觉，及阶级斗争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去时期之中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最主要的，最激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渗入了我们的党。这种成分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干部。工人贫农群众的加入共产党固然随着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发展而日益众多，但这已经是比较的一时期里的现象，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作用，竟留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当时这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这种组织成份，就是武汉反动以前本党政策机会主义孟什维克主义的策源地——这种机会主义一直影响到叶贺军队中党的领导机关的行动。

最近许多正确的彻底革命的党的决议案和方针，如土地问题，农民暴动的策略问题，劳动问题，国民党问题，（八七紧急会议及其后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议）往往在各地并不执行，谬解而成机会主义的实际行动，这是因为实行这些决议的分子，仍旧是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代表的旧干部。八七紧急会议就已经指出：党的下层群众是行动的革命的，党的指导干部却是机会主义的，这种情形便是党内有两种不同的社会成份，因而有两种不同的阶级政策之反映。只有小部分党的干部，团结在党的中央之下的，能够坚决的抛弃小资产阶级式的观点，抛弃机会主义的方法及犹豫动摇的政策，以及其他种种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特性，——必须全党都经过如此的改造，才能锻炼出彻底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布尔塞维克的党。

过去各省委在组织上更加犯了不集体化的毛病，各部处理各部的各务不是大专门化了，但是干预到党的整个行动，如工农部不经过党的组织系统而直接派人往各工会各县担任党的工作，军事部因有其离开组织部一贯的组织系统，致使各地党部时有工党，农党，军党之称，今后这种组织上的错误，中央必须负责纠正！务使这种各省党的各部的分裂的活动完全打消，并建立党的民主集权制，使一切工作都集体化于省委委员会及其常委中。

三党的改造之重任

因此而得的结论，自然便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一切非工农的分子完全不给工作，或者完全开除出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

议并不如此主张，这是要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及贫民的成份占大多数。支部书记、区委、县委、市委、省委的成份，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员的成份，尤其是农民中党的工作人员的成份，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工会机关的干部，则须全部换成工人。这一改造工作，当然不是一下子可以做成功，但是必须愈快愈好，应当开始建立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制度，去切实这一改造工作。同时从最低支部起，提出工农分子，使担负实际指导的工作，各省在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以前，要开各省党部代表大会，或者省委扩大会议在这个过程中，彻底新造各级党的指导机关。尤其重要的是：各地群众党部的工作，譬如组织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军事部，要由最靠得住最坚决的工人同志担负，在乡村中呢——由贫农同志担负。工会中的指导干部，也要立刻换工人分子。总之，最主要的要使党成为斗争的组织要使一切斗争都变成为党的集体指导，以消灭个人的英雄式的领袖和指导之弊病。至于一般党员的思想与行动，党的组织的责任便是要监督与训练他们，团结与融化在八七紧急会议以来中央的政策指导之下，洗刷一切旧有的机会主义的遗毒。

四党的基本组织与民主主义化

党的组织上的第二个弱点，便是许多大工厂大商店尤其是乡村和军队之中，至今几乎没有党的支部。乡村之中，严格的说起来简直没有党的组织，各地乡村中，至多只有特派员或者隘少的知识分子的党部委员会，他们之下并无支部，甚至并无党员，农民运动的经验中，已经可以看出：没有先进的贫民分子所团结而成的党的组织，本党便很难指导农民斗争，或者简直没有指导的可能，至于农民暴动便成了完全自然爆发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最近各地农民暴动军比较的抗御力很弱，农民暴动的持久性比较的少，大半就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没有能在农民之中实行“群众之组织者”的作用。而农民广泛的群众组织，完全要靠党在乡村之中有扩大的支部组织，网罗全境，结合乡村贫民及苦力中最坚决最革命分子。再则在军队之中没有支部（兵士党员），也就是军阀能够很容易的调动军队镇压屠杀工农暴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党对于拆散军阀军队的工作，如果没有在军队中的支部去团结革命的兵士和下级官长，那么，简单是不可能的。当然，主要的还有在大工厂大商店之中建立并巩固党的支部的工作。学校中的支部当然也要注意。总之，支部工作在党的组织现状之下，占极重要的位置，过去因为支部工作不好，以至本党不能在群众中起广大的作用，而党员之散漫，党的政策不能深入群众，甚至不能深入党内群众，都由此而生。今后须特别注重支部工作，经过支部起群众的作用，至于支部的经常组织工作如按期开会等要严格的执行，这些都是树立党的基本组织的工作，再则全体党员应严格的执行交纳党费的义务，党费以有收入者为标准，各级党部都要按月计算党员的实数，要做到依党费核算党员的数目。

现在很严重的秘密时期固然不能实现完完全全的党内民主主义（党部机关自下至上全属选举，重要问题由全党党员讨论等等），但是就是在这种严重条件之下，引进党的下层群众，使他们参加党的一切工作与政策的决定，仍旧是非常重要的，应当比以前更加百倍的努力去实行。并且要使尽可能的支部书记由党员群众选举的办法，尤其是产业工人的支部，此等区域更须进一步尽可能的实行区委由各支部选举的办法。

五工会的组织问题

组织广大的无党工人群众于革命的阶级的工会之中的工作，也有非常之大的缺点。革命的工会现在只有很不健全的很薄弱的革命的机关，而没有工会会员。只在很少的几个工厂之中，有些工会现在的下层组织，如半公开或秘密的工厂委员会，至于一般而论，差不多完全没有工会会员的群众。其实组织工人，尤其是无党工人，却是工会的主要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工会中工作的党员，应当认清自己的主要任务便是吸引各个工人到工会里去，组织工人群众使各厂都有工会的组织，使工会成为群众的组织，必须使极广大的先进的工人，党外的工人，各个的加入工会做会员，必需每月的统计工会会员的实数，按时收工会的会费，（宁可定到极少的会费）必须在各工会中实行发给会证，必须在下级工会机关（工厂委员会）除共产党员以外加入无党的工人，绝对要避免党代替工会的形式，因而不发展工会会员的流弊，党应当建立工会独立的组织系统，使支部在工人群众中起核心的作用，吸收广大的非党的群众加入工会。

六农民的组织问题

乡村之中党的支部应当是很秘密的，除党的支部以外，必须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于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组织之中，这些农民协会在革命的高潮时，劳动者夺得政权，就要变成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

七党与青年团的关系

党与青年团差不多完全不发生关系，这亦是组织上非常之大的缺点。必须在最近期间改正。党与团的支部，区委，县委或市委，省委……必须互相发生密切的关系，互派代表。党部的各级委员会必须定期的听团的工作报告，而给他们以指示。党应当对于团给以经常的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

八党与反动团体

从前党曾经派遣党员到我们阶级仇敌的组织之中（如黄色工会、工贼工会、国民党党部等等）去做侦探的工作，但是经验上所得的结果，大半是很坏的。因此，如今在一般的通例上决定抛弃这种政策，除非有非常之大的必要和意义，才可以偶尔使用这种方法，而且所派遣的党员必须是确实可靠而忠实于共产主义的同志。

九党的组织与纪律

严格的整饬纪律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实在是党的工作成效之最必须的条件之一，对于违背组织上政治上的纪律的分子，必定要严厉的处分。秘密组织的规律，不容任何轻忽而破坏，秘密机关的地址，绝对只准在工作上必须知道的党员知道。保存秘密文件的数量应当减到最少限度，绝对不容保存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单。通信上必须用密码的方法。各级党部的常务委员会不得超过五人至七人。五人以上及两点钟以上的集会，非极端的必需不得举行，凡是稍稍破坏党的秘密组织纪律的，立刻应当停止他的工作，或者简直开除党籍。

十发展党员的数量问题

党员的数量自从国民党反动以后有极大的减小，从五万余党员减至万余党员，这虽然一方面证明过去吸收党员与训练党员的方法错误，但欲使本党新的策略深入群众，党的组织重要责任之一便是吸收新的工农兵士革命分子入党，必须多吸收新的工农兵士革命分子扩大党的力量，然后本党才能担负新的使命。

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

(一) 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决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间召集。

(二) 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常委决定，中央常委应只通知各省被选的代表。

(三) 第六次大会的代表选举法如下：

一、各省党部得选举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应由各省党部代表大会选出，如因秘密组织的环境关系，不能开代表大会，则由各省省委全体会议派出代表，然而应当尽可能由扩大的省委全体会议选派；

二、各省党部选派代表以五百党员选出一代表为标准，五百人以下的党部，亦得选一有表决权的代表；无表决权的代表各省党部亦得选派，但必得中央的同意；

三、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如果没有被某一省党部选为代表，因而无表决权，则可以无表决权的参加大会；

四、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得派五人出席大会；

五、出席大会代表必须入党一年以上的方能当选。

(四) 第六次大会的议事程序现在大致规定如下：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国际状况与共产国际的任务及策略。

二、中央的政治与党务报告。

三、中国革命过去的分析及将来之前途与党的任务及策略。

四、土地问题党纲。

五、革命的工会之任务。

六、党的组织任务。

七、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八、选举中央委员及出席第六次共产国际大会代表团。

(五) 各省党部代表会议的日期及议事程序，由各省省委决定之，函知中央。但是各省党部会议，至迟当在第六次全党大会两星期以前。各省党部会议时，应当将大会议事程序中的议案，择要先行讨论，中央当在全党大会以前一个月将大会议决案的重要草案送到各省。

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公布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各级党部及一般同志都可以：一、参加讨论这一草案；二、搜集当地的土地问题材料；三、提出书面的增改意见；四、以及一切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或分析的意见。这些意见和材料应当临时寄来中央，在党报上公开讨论。这一草案及增改的意见，应当提出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作最终之决定。

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

(本草案为立夫同志所拟，要大家公开讨论，以待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作最后的决定。同志等如有意见，修改或增补，理论分析之改正，或者自己另提一整个草案，都可以在本报刊布。)

绪 言

中国共产党认清：中国乡村之中地主豪绅富农的成份不在少数，他们依据自己的暴力机关（民团、团防、商团、军阀的军队，以及他们所勾结收买的土匪），他们依据帝国主义的助力，对于土地制度之革命的变革，竭尽全力以抗御。

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农民最剧烈的阶级斗争能够消灭劳动民众敌人的经济政治上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用最“民众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完成土地革命，才能真正实行革命的变革土地制度，组织乡村中的农民代表会议政权，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府。

在这一斗争之中，苦力和雇农将要有很重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坚决的反对并驳斥一切蔑视雇农苦力之反革命的理论（如谓农民运动不应是“流氓地痞”的运动等等），而且要努力去组织苦力雇农于阶级的组织之中，引进他们的代表参加革命政权之指导机关。同时，中国共产党要尽力吸收乡村中的中农分子，使他们站到贫民方面来，这些中农也是要推翻旧制度的。

中国共产党认清这一斗争是非常之艰巨的，但是，同时要指出：广东湖北湖南的农民已经在本党指导之下实行许多次英勇的武装暴动，这种情形证明在好些省份之中，已经形成了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共产党要组织农民于农民协会等类的战斗的组织之中，竭尽全力以赞助农民的一切斗争，宣传以城乡劳动民众武装暴动而建立苏维埃政府之主张，并且在群众运动相当的阶段上进而组织苏维埃。中国共产党认明：农民之中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迅速的消灭，国民党欺骗民众的甚么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减低利息到年利百分之二十等的主张，无论甚么地方也不能实行，即使实行也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要坚决的反对国民党欺骗民众的政策。

各省红枪会等类农民组织的发现，以及这种组织的奋起斗争，也就证明农民了解武装斗争之必要。中国共产党要努力去肃清这些组织之中的反动分子，肃清农民意识里的反动遗毒，努力去改变这种组织，使成为真正阶级的组织，能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共产党员应当到这种组织之中去进行适当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要组织农民，实行同盟抗租罢税不还债拒用无价纸币和军用票等类的纸券，并且要竭尽全力去赞助这种斗争。

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群众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并且赞助农民自发的这种斗争，反对军阀的征发拉夫派粮等等，中国共产党在每一次这种斗争之中，宣传农民武装暴动以反抗农民之阶级仇敌的必要。

（一）

中国的农业经济与土地关系，不但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欧美不同，并且和欧洲中世纪时代（资本主义前期）的土地关系也不同。这种差异的最重要的前提，实在就是中国生产之自然界的环境与历史发展之特殊条件。中国农业生产的方法上，有许多特点，使农村经济呈特殊的状态，这些特点就是：自觉的整顿水利之重要（必须人工灌溉），多量的调剂水旱器械与建筑之必需，中国本部之主要区域没有畜牧事业，农村经济中用以耕种的牲畜比较的少，多量的肥料之需要，绝对没有停耕若干时间与地休闲之办法，必须耗费多量的徒手劳动。如此的农业生产方法，再加上商业重利资本的早期发展，防御游牧民族侵犯及水灾必须巨大的工程（如长城运河黄河河工堤工等），应付天灾又须有种种救灾组织，对于游牧民族要能征服他们，强迫他们变成农业民族：这些情形综合起来，便造成中国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就是马克思列宁所称为“亚洲式的生产方法”制度。中国如此之多的小农经济，实际上不相关连，可是中国很早便有貌似统一的国家政权，这种政权的物质基础之一，便是人工灌溉。中国官僚制度的作用向来非常之大，这个原因便在于此。中国的官僚不但是地主和商业重利资本利益之政治上的代表，他们并且就是直接实行重利盘剥和大商业的本人。诸侯制度的采邑以及军阀专土

地的制度（如贵族阡专有土地之制度）之在中国已经很早就根本崩坏了（秦始皇之后，约当基督纪元前三世纪）。此后经过很长期的无政府状态，经过非常残酷的阶级战斗，然后最终的形成所谓亚洲式的生产方法。中国的国家便从细小的许多诸侯采邑变成亚洲式的专制政权，有极发达的官僚制度。农业与农民的家庭工业（纺织等）相联结，又使亚洲式的生产方法有很大的内部稳定的状态。商业重利资本，对于资本主义前期的地方市场，互相关联很薄弱的地方市场，有极大的威权。诸侯采邑阡阅式的土地制度崩坏之后，中国的土地关系经过许多种的变更，都是由于种种历史形势而来的，或者征服其他民族，或者受外来的影响，或者经过很大的民从运动，各地市场关系之扩大或缩小等等。可是农业劳动的方法，根本是没有变更的。中国农村生活的特点是：人工灌溉有能决定一切的重要意义，官僚的作用非常之大，官僚和土地私有制及商业重利资本有密切的关联，欧洲中世纪所未有的地主与商业重利资本大规模的剥削农民，土地使用时分割得非常之琐碎细小（同时，并不妨害土地所有权的集中），资本主义前期式的地方市场对于农民经济有相当巨大的威权。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发展全国的生产力，农业技术的进于更高的阶段，在现时都阻碍于这旧社会制度的遗毒。

（二）

中国各省的土地关系并非一致相同的，本党各地党部应当细心研究各该省的土地关系，必须估计到各地的特殊情形，要收集各地的经验，适应各该区域特别的情形，而实行党纲及政治命令。南方各省农村中的中心人物，毫无疑问的是佃农及半佃农（粤桂鄂湘闽浙等）。北方有几省农村中的中心人物都是自耕农（晋直）。殖民地域的土地关系又有特殊的情形（吉林黑龙江等）。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宣言承认内蒙古民族有自决的权利，一直到分立国家，并且要极力赞助内蒙国民革命党力争自决的斗争。对于回簇地域；本党也应估计当地特殊的土地关系。中国有几省还有土著的苗黎等等。本党应当努力奋斗，消灭对于这些土著民族之一切种种方式的剥削，而赞助他们进于更高的文化程度。

（三）

农民分做三种：一、佃农，二、自耕农，三、半佃农。三种农民之中，都有贫农，小农，中农与富裕农民的区别。分辨农民中的这些种类，在农业生产方法的条件上，必须不仅以生产范围（耕地亩数之多寡）为标准。水田旱田、田地之肥瘠，每年收获次数等，都要估计到。各种农民之中，在中国本部最大多数是贫农和小农，贫农和小农都是每年收入不够维持最小限度的一家生活的（这些农民在各省之中有的占百分之五十，有的占百分之八十，以省份而不同的）。富裕的农民只是农村中的一小部分，可是重利盘剥，剥削雇佣劳动，出租耕牛及农具，强租贫民田地，或者将自耕所余田亩出租，兼营农业，商业或农村副业，与乡绅与官署有交往联络；这些事情，富裕些的农民都可以做的；因此，富农虽然少，而他们在农村之中却比较的有些势力，当然他们的势力比地主商贾重利盘剥者的势力要小得多。

中国阡阅制度（贵族）很早就消灭，族长制度有很大的影响，地主家族里的分家，使田地分割，现时更有地价高涨的情形，农村中的资本流入城市商业，变成重利盘剥的资本；这些情形使地主阶级之中的中心人物并非大地主，却是中小地主。中小地主的贪狠，他们对于佃农剥削的残酷，并不让于大地主，甚至于有过之无不及。表面上宗法社会的旧俗，不能使佃农的地位

比较好些，反而更加坏些。除地主，商贾，一部分富农，重利盘剥者之外，中国农村中的剥削者，还有土豪乡绅也有同等的重要。乡绅虽然常是有田地的，兼营商业和重利盘剥的，或者做官的，但是一般而论，他们是多余的知识分子，专靠农民的余剩产品而生存，他们用租税课捐的方法，有时简直用强迫贡献的方法，榨取农民的余剩产品。他们是官署与农民生产者的中介人。土豪和民团一样，亦是压迫农村劳动平民的寄生虫的暴力机关，这些寄生虫是反动势力在乡村中最靠得住的根基。

荒地沙田等官产，都被治者阶级所霸占。饲田族田庙田等收入，都是乡绅所榨取。地主商贾乡绅所办的公司，或者各个军阀乡绅重利盘剥者，都能以极贱的价钱收买屯垦的官地。治者阶级霸占官地，以及侵吞祠族庙宇田产的收入，更加增加他们的权力。

(四)

中国的租田制度有特殊的情形：分租大半是用谷物，并且大半的习俗是佃农有永佃权的。租佃制度，一般而论，都没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地主的对手方，极大多数并不是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租户，因投资于农业有承租地亩的；地主的对手方，都是穷饿的农民，租田耕种以求生的。只有沿海几省（粤、苏、浙）接近大都市的地方，有极少数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租户。地主对于佃农无限制的剥削，一般而论，都已经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地主不但将“绝对地租”与“收益地租”以及水田灌溉设备中所放资本的利息都拿了去，并且连佃农所耗费于田地的成本上的利息也拿了去（此处所有名词都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经济名称），不但如此，甚至于将佃农生产者及其家族所应得的工资之一部分，也拿了去；如此情形，自然使佃农的收入，往往低于他们维持生活之最小限度的数目。但是，除出这种习惯上旧式的剥削方式以外，新式的租佃关系也在发展起来，地主竭力在设法使永佃权变成定期的租佃制度，而且力求其为短期的租佃。旧式以谷物交租的方法，以及每年看收成交租的习惯，都渐渐的变成新的方法。铁租（每年不论丰歉，佃农须交一定的租额）的办法已经很广泛。押租（佃农预先交纳一定的押金方得租种田地）的办法，也在实行起来。这些新方法之外，旧时的剥削方法仍旧保存着。佃农一定要替地主做工，所得报酬非常之少，佃农一定要替地主送礼，有种种奇怪的名目，还需消地主或收租人吃喝等等。佃农欠债之后，便要替地主当奴隶（广东山东），卖男卖女还欠租，不能还租的佃农须要坐监牢（广东浙江等省），土豪民团可以任意毒刑拷打佃农，或者是因为不能交租，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如此之类的剥削方法非常之多。

尤其在中国中部各省（江苏皖赣等），租佃关系之中有所谓“共有田地”：地主有田底，佃农有田面。这种情形大半由重利盘剥而来的，或者是由于佃农代垦地主荒地而来的。中国永佃权的存在以及“共有田地”的制度，很明显的证明中国农村之中并非资产阶级式的私有制度占优势。直到最近，地主方才开始用全力夺取那种“共有田地”的所有权，要想使旧式的“共有田地”，变成完全地主所有的田地。

地主竭力要想取消有碍于剥削的旧式的永佃权及收租时的旧习惯（荒年照例减租，每年只收一次收获的租，贫民可以自由检拾稻场上遗落的稻梗等等）；地主要想变更旧式的亚洲式的土地所有制度，使成为比较现代式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然而农民的倾向，却是要使地主的土地，变成农民所有。

(五)

贫农小农甚至中农所有的土地，仅仅是形式上的所有权罢了，形式上享有这些田地的生产资料罢了；其实治者阶级用课税贸易诳骗种种方法，不但将“佃租”收去，并且收地价的利益之极大部分，甚至于将农民生产者及其家族所应得的工资之极大部分都收取了去。自耕农占多数的省份，现在也在自耕农迅速的变成佃农的过程中（山西河南）。赋税的压迫，经常不断的军用征收，根本破毁农民的经济。军阀的战争，匪乱的蔓延，商业交通的停滞，往往造成地价暂时低落局面。地主军阀官僚商贾豪绅得以大批的收买田地，使自耕农变成佃农。时常不断的灾荒（直隶、山西、山东），预征钱粮，每年勒捐数次，更使重利盘剥的现象加增。重利盘剥者强逼农民将田地零星的抵押，农村中的治者阶级用种种方法掠夺农民的所有权。自耕的农民变成佃农。

（六）

水利的使用上，也有极剧烈的阶级斗争。地主竭力抢夺灌溉水利的支配权。商人的公司或豪绅地主的公司往往掠取河流溪沼，而使农民付钱买水。农民方面，自己也知道各个小农经济没有能力改良水利，开辟水源，甚至于不能保存原有的天然水利（水利是农民生产的最重要的前提），于是他们总是想望国家政府来解决这一问题。农民可以深切的明了：只有劳动者的政府能够实行改良工人灌溉的方法，应用新发明的技术。

农村之中金钱货币的势力日益增加，于是重利盘剥者的威权也就扩大。农民之中最贫苦分子（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以各省而不同），甚至于连维持生活之最小限度的资财也没有。天灾战祸，因而不断的破产失业，还要履行种种旧习惯中糜费的礼节（婚丧赶节等等），都使农民不得不向重利盘剥者借钱。借钱的利息，从月利二分到十分。重利盘剥之中还有一种借货谷物的办法，这种办法的残酷更是无以复加，简直是公开的掠夺农民。收谷前几个月借的债，收获后即须照全年付利还本。荒年天灾的时候，重利盘剥到几个几十个的村庄，剥削到全体的农民。

军阀的统治根本破坏农民的经济：他们的重税杂捐，军事征用，派车封船，派粮拉夫，拉马匹等等，完全是破坏农民经济的。地主还要转嫁一部分赋税杂捐到佃农身上，以及一般农民身上：这种税捐一年之中收到两三次，甚至于六次。厘金杂捐式的关卡无限的增加，商人所受的榨取，也转嫁到农民身上，输出时，商人因为估计所负捐税，而更加抑低收买原料的价钱，如此转嫁税捐到生产者身上，输入时，又如此的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军阀制度之下，以前征收赋税的旧习惯与相当的限度，完全消灭了；中国贫苦农民所负租税，远过于普鲁士或美国的农民。巨商地主与官署勾结，并且有些权势，反而可以比贫民少担负些。地方税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日益增加。再则，农村的破产使匪乱日甚，匪乱的蔓延又使农村破产更甚。

帝国主义对于农民经济市场的权威，也更加厉害更加深入。外国工厂产品的输入，机器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式的手工场及家庭工业的发展，都使帝国主义侵入的地方农民旧式的家庭工业（纺织豆油等）受着非常之大的打击。同时，农业与家庭工业相联合的中国旧经济基础，根本破坏，其崩坏的速度，比工业的发展快得多，农村中多余的劳动者因此没有地方可以吸收，所以极大多数的失业群众的到城里当苦力，变成土匪，流入军阀的军队，南方各省的人便到安南暹罗南洋群岛，北方各省的人便到满洲蒙古去。

帝国主义的侵入，使农业中各种种植的分配，大有变动。例如茶的出产，

因为印度爪哇资本主义式的茶叶大农场竞争的力量很大，日本茶叶生产的组织也比较好，中国自身则厘金杂捐日多，所以中国茶叶生产大受破败的影响。种蔗的生产也是如此，爪哇台湾等处蔗业大农场之竞争，外国糖的输入，都使中国蔗业生产衰落。

欧洲化学工业的发展，破坏了中国土靛的生产。帝国主义的侵袭，以及中国本国纱厂丝厂的发达，使国内的植棉种桑的地亩大增，然而欧战之后，中国棉业受着美棉印棉的竞争，小农的棉场自然抵敌不过——中国小农还受着重利盘剥者的压迫呢。中国重利盘剥的资本家本来正在努力侵入与工商业有关的农业之中来。制油植物的种植也大大的发展；但是与植物油（豆油菜油、桐油花生油等）及豆类菜类同时输出的本来还有一种肥田用的重要物品——豆饼。满洲方面输出于日本的，就有大批豆饼，同时，种植鸦片及烟叶的地方也多起来。英国帝国主义用枪炮强迫输入鸦片于中国，完全是为着赚钱。现在军阀便强逼农民种鸦片，以便他们抽收鸦片税。福田多变成鸦片烟叶等的田。水利不整顿，灌溉的设备破坏，于是农民往往不能不将稻田改种番薯（马铃薯）。贫民的食料一天一天变得更坏了。

商业却日益扩大起来，但是尽在旧式的商业方法的范围之内。贫农和小农不得不在收获之后立刻出卖谷物，简直不暇顾及市价如何，他们只能照村中最低的价格出售，因为急于要付田租，赋税，债息。等到第二次收获以前，他们早已完全用尽了，只得出很高的价钱去买米，借米吃。商业重利资本将与工业有关系的农产品（丝，棉，茶豆，烟，靛等）完全握入自己掌握之中，他们用极低的价格向农民生产者收买这些农产品。农民中最贫苦的分子受着市场的一切痛苦，而不能得着市场的丝毫好处，至多也只能得着很少很少的好处。与工商业有关的农产品之极大部分的利益，是国外贸易的输出（外商洋行）所得的，是中国商业重利资本所得的。乡村中的货物流入城市不能得相等的代价，中国的货物流出国外，又不能得相等的代价。

这一过程，因为帝国主义霸占铁路内河及沿海的航路，造成扩大商业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提，于是更加厉害。外国财政资本引起中国的采取工业（煤铁等矿），后来又发生几种制消费用品的工业（如纱织，烟厂，榨油，食物制造，酿酒等）。农村中剥削所榨取出来的资本，投入运输业商业，亦有些投入工业。

但是，同时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协定关税，国内市场容量的有限，军阀统治，货币制度的不统一，财政机关的混乱，商业重利资本的优势等等，都阻碍工业的发展；频数的经济恐慌使资本溢出生产范围而停滞，甚至于商业之中也不周转，于是这些资本及城市中一般积蓄的钱财转而购买田地及经营重利盘剥，于是小地主的数量增多而农民之佃农化的过程更加急。

帝国主义利用银价的低落掠夺全中国。中国的银行家巨商及重利盘剥者受着了这种损失，便转嫁给农民生产者。同时，在欧战之前便开始一种过程：农村中及城市贫民中最流通的货币（铜元）之价格，日益低落，欧战之后这一过程继续的厉害起来。铜元的购买力，因为军阀政府的滥铸，而日益低落，再则，军阀政府发出许多纸币，军用票国库券等等，这种东西过不了几天便不值钱了。使农民及城市贫民受巨大的损失。银行公司及单个的商贾，也各自发出纸币剥削农民。中国经济日益成为货币经济。然而乡村城市中流行的货币，仍旧带着资本主义前期的货币之种种特质。

中国农村中绝无因[田]地的农民有极重要的意义：苦力，雇工，船夫，

渔夫等。做搬运夫的苦力有好几百万，土木作及其他农业工作的苦力也不少。这一阶级是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始祖，昂格思所称谓“前无产阶级”的。他们受着最残酷的剥削。他们往往几星期几个月找不着工作做，所以他们的境遇更加苦。

农民的失地和农民家庭工业的崩败，尤其主要的是田地的零星分割（贫农小农所耕田地非常之琐小），都使苦力农场工人的数量增加。中国条件之中，播种灌溉插秧等工作时，甚至于小农都不能不添请别人帮助。富农等便可以雇用长工。有些地方，地主给农具种籽牲畜，叫雇农替他耕种，收获之后雇农只得极小的一部分，或者很少的工资。这种农民，中国亦称谓佃农，其实已经是雇农。他们的地位很象半奴隶的农奴，却不象现代的农业无产阶级。按日计算的雇农，或者按期雇定的雇农，一到田忙过了之后，便无从找着工作。

对于农村的剥削，最近还有些新的方式发生。旧式的家庭工业，如缫丝等，现在固然已经崩败渐灭；同时，却发生新式的家庭工业，为领取资本家的原料而在家织布，制花边，绣花，制草绳，制帽，制扇，制伞，制中国旧货的估衣等……这些新式家庭工业，大概有商店定制包销，对于农民，尤其是农妇的剥削非常之厉害，他们所得工资简直不能养活。

中国卷入国际贸易的漩涡之中，帝国主义攫[攫]得中国经济的最高权，中国劳动民众受帝国主义者与中国地主官僚商业重利资本联合的统治，交通与工业之中资本主义的原素增加，旧国家的崩坏，军阀制度的发展，凡此一切对于旧式生产方法给了非常之巨大的打击，根本上使他崩毁。然而同时要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却有许多困难与阻碍：一方面帝国主义阻碍中国的发展，别方面地主及商业重利资本依靠着帝国主义及旧官僚机关与军阀军队的权力也阻碍中国的发展。帝国主义利用剥削中国劳动民众的旧方法去剥削全中国，中国的治者阶级又在竭力巩固剥削民众的旧方法，还要运用剥削民众的新方法，以稳固自己的威权和地位。

所有这些情形结合起来，更形成中国农业的一般的衰落，收获减少，旧时的水利设备破坏，天灾频数，水旱饥荒相继，农村破产，土匪蜂起已成一般的现象，重利盘剥的加重与扩大。阶级斗争便在如此的背景上急速起来。

旧社会制度崩溃下来，渐灭下来，而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便只有两条路：资本主义的与非资本主义的。

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之中造成巨大的生产机关，应用极新的技术，列强竭尽全力以互争世界市场，互争销售货物与搜取原料的场所，财政资本运用极新式极巨大的军事技术机关及海陆军以争夺市场，以征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在如此的时期之中帝国主义剥削与新旧军阀压迫之下的中国，只能够非常痛苦迟滞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而且必须外国资本输入中国的速度大大的加增。资本主义的道路对于中国，就是几千百万农民苦力之死亡，几百万女工童工在工厂之中磨折惨死，流血的掠夺的战争（如此的混战局面之下，军事上简直不用甚么技术器械相斗，而只是用几千几万人的性命为牺牲，以相搏战），极巨大的天灾水旱，极残酷的剥削工人，陆续相继的国内战争，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更加侵略，更加要攫[攫]取矿山铁路租借地，瓜分势力范围，或者简直是默契的瓜分，很快的几辈工人相继死灭，一般劳动农民的死亡，全国人口的大减少。从崩溃的旧中国社会非常迟滞痛苦的转入新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道路，便有这些不可免的结果。

第二条路——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便是劳动民众反抗中国治者阶级与帝国主义之联盟统治的极艰苦的斗争，以群众的武装斗争统一中国解放中国，推翻帝国主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除尽一切种种的剥削者，将劳动民众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从地主豪绅重利盘剥者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与全世界革命的工人运动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经过第一期艰苦的斗争之后，运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之辅助，而进于新式技术的生产方法，工业农业大大发展，造成新的习俗，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程度，行向劳动平民解放后之光明的将来，自由的劳动，一直到进于自由世界，没有一切阶级的世界——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联合农民及城市贫民，组织并准备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以推翻地主豪绅重利盘剥者及其代表之军阀官僚的政权，而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以实现第二条道路，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认为要彻底变革中国的土地制度，必须肃清一切崩溃混乱的旧社会关系。所以主张为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起见，必须实行下列的办法：

一、一切地主的土地无代价的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

二、一切没收的土地之实际使用权归之于农民。祖田制度与押田制度完全废除，耕者有其田。

三、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是乡村中的革命政权机关，他要按照土地之肥瘠水旱位置而分配土地，使旧时佃农中的富裕者不能变成富农，并使革命军队的战士及无地的农民能够分到土地耕种。同时，共产党要努力实行革命的土地改良。

四、寺院教会的土地，皇族旗地官地公产等类的土地，一概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此等土地的租田制度，亦一律取消。

五、祠产旗产的土地一律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共产党要赞助农民去根本消灭这一种陈腐恶化的土地制度。

六、官荒沙田湖田等的土地，亦一律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并且要努力设法，使实行垦殖政策时得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以及工农军的兵士。

七、一切豪绅反革命派的财产完全没收。

八、农民代表会议要措筹基金，保证无产而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寡老病废等）的生活。

九、一切森林矿产完全归苏维埃国家所有，苏维埃国家之中央及地方政府应当设法保护森林种植森林，并开采矿产。

十、整顿水利改良灌溉方法之工程，由农民代表会议执行，井泉溪沼等完全归农民使用，农民经过农民代表会议而行使这种权利。

共产党并认改良水利扩大灌溉源流，采用新式技术机器电力等，为自己的重要职任之一。共产党组织并赞助农民之改良灌溉的合作社运动。

十一、共产党要努力设法实行防止水旱的工程，建堤导河填筑淤地筑造牧场等等；并实行预防饥荒的设备。

十二、一切苛约重债一概取消。共产党要组织低息的农业借贷，设立农业银行及农业之借贷合作社。

十三、共产党组织并赞助农民之合作社运动：销售农产品及农民之家庭

手工艺产品，贩卖农民日常的必需品及家庭手工艺的原料等，共产党要发展工业而使农民得着廉价的现代新式的农具，禁止贩售肥料的私人垄断，——贩卖肥料归农民的合作社办理。共产党还要实行乡村中筑路修道的建设事业。

十四、军阀政府的一切赋税，完全废除，厘金废除，包捐包税的制度废除。革命政权重定统一的统一的货币及度量衡的制度。

十五、颁布保护雇农苦力的法律。政府当以发展工业而开办公公共事业的种种工程，修筑道路，奖励农村手工艺，以保障苦力失业者的工作。

职工运动决议案（扩大会议决议）

在初期北伐的过程中，仅只两湖的工人斗争得到短期的进展。但因为党的机会主义的领导，终于中途受了阻碍。至于河南的工人，在帮助北伐军得到胜利后，不但没有得着丝毫解放，反而更加遭受压迫和剥削（铁路工人欠饱多至十二个月少六七月，卫辉纱厂工人在经济斗争中被冯玉祥惨杀三百余人）。从蒋介石四月十二在上海向工人阶级开刀始，继而四月十五李济琛在广东的屠杀及长沙的马夜事变，江西朱培德河南冯玉祥的反叛一直到七月十五汪精卫公开反动，照理，在这些省份的工人阶级应当对反动派严重的反攻。可是因为党的机会主义的政策影响已深，不但没有反攻，反而在职工运动中表现两种极坏的事实：一是根本屈服于敌人放弃职工运动如河南湖南江西等，一是进一步投降加入国民党的黄色工会如上海安徽等。至于北方各省如直隶山东山西则自五卅高潮低落以后即无形放弃职工运动，北伐军兴而后更专一等待北伐解放，停止了一切活动。如此种种，全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经过一度国民革命的斗争，并且他们曾经参加此一斗争而受了莫大的牺牲，然而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并没有得着丝毫解放，我们的阶级意识反而一时陷在模糊的状态，他们的革命情绪，反而表现一时的消沉，“二七”“五卅”的悲壮的斗争不能复起于国民党背叛的过程中，这是什么原故？主要的是我党的机会主义整个的运用于职工运动中的结果。

“八七”会议，适当国民党左派背叛，社会阶级激剧变化的时候。会议主要的目的是改进党的政治路线，决定新的工农斗争的策略及改造党的组织。当时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的主要点是：激剧的发动工人经济斗争，发展秘密工会，反对黄色工会，提拔新的领袖。这样的决定无疑的是很正确的。但是，实际，这些决议并未能有相当的实现。本来党的组织上的改造就没有相当的完成，“八七”精神仅仅走到几个省委，没有到下面去，自然这些决定，还大部分只是白纸黑字的留着，我们只要看下面的事实就可以明白：在四省秋收暴动的期中，没有看见工人起来。尤其是在许多农暴区域中的城市常常不能成为农暴的中心指导者，事实上反而等待农暴，甚至乡村农暴已大大起来，城市一点也不能予以帮助。同时党在工人中关于农民暴动事实的宣传亦异常缺乏，广州武汉的工人斗争一直到两湖秋暴及叶贺失败以后才起来，湖南江西河南现在才开始有计划的工人运动。直隶山东农民暴动已经起来，工人斗争则依旧寂然无闻，上海一直在湘鄂粤失败了之后才开始反统运动，至今工人斗争尚不能有广大的有组织的发动。就全中国说一般的成为农民激进工人落后的现象。不仅没有激烈的斗争，就是秘密工会的组织亦没有进步。各地党部对于农民斗争虽做了不少的军事投机的错误，还算是有意的不断的在那里领导。而对于斗争则确不免有忽略的倾向，至少也是无意的或顾此失彼的忽略了。这是“八七”以后职工运动主要的现象。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发展下去，无疑的要使工人阶级在土地革命中失掉领导地位。此后在策

略上亦表现两种极严重的坏的倾向：一种是旧的机会主义的余毒，不敢领导工人向前斗争，而想与政府国民党工会妥协保存一点与工人群众的关系，最显明的如浙江工运负责同志不愿坚决的退出反动工会，上海一部分下层同志留恋“统一委员会”及最近安徽省委同志决定加入西山会议派的芜湖市总工会等等。至于“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就是在很重要的城市和工人区域也很迟的才提出，公开的反国民党运动除上海广州市外也没有什么工作。另一种倾向便是军事投机，不坚决的去发动群众，而靠一种偶然的机，强迫工人起来，工人因为不明了斗争的意义，一旦失败，则情绪消沉，不易复起，如蒋介石下野时沪西纱厂之罢工及最近沪东纱厂之罢工是，或则根本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此不深入群众做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而迷信暗杀万能（非群众的红色恐怖），不暗杀几个工贼和反动派，则不敢到群众中去（浙江省委山东省委中的一部分同志以及上海的一部分同志很明显的表示这种倾向）。上面这两种倾向，虽然表现出来的形式不同，所取的手段不同，根本上则同是机会主义的余毒的爆发。不把这两种倾向肃清，则我们党终久不能深入群众而要被群众唾弃。至于工会的组织工作亦异常缺乏，在白色恐怖严重的进攻以来到处工会组织都无形消灭，而以党的支部替代了工会，或则虽有工会，亦只是一个变相的支部组织，底下并没有非党工人群众（如上海），而事实上，党员群众又每多退缩不前不能领导群众。因此工人根本没有自己的团结，一切斗争更加难得起来。

右面所述是“八七”会议后职工运动中主观方面主要的缺点，但是，虽然我们主观上做了不少的错误，全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却在逐渐的往上发展。新旧军阀不断的战争使中国工商业愈趋衰落，中外各厂大多关厂或缩减生产，失业工人日益增多，在业工人因为工钱缩减，纸币低落，厂家欠饷，待遇苛刻，一般生活程度的增高，生活愈加陷于痛苦。南方各省屡次反革命的政变，和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不仅不能改良这些现象，反而使之变本加厉，对于工人群众的屠杀较之北方军队还要凶残。无论政府国民党部或蒋记唐记冯记阎记李记所委任的黄色工会，无不是公然帮助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工人，而不能对于工人群众维持其暂时的欺骗。全国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已逐渐开始，武汉上海广州已经有激烈的发动，特别是广州工人十月十四以来八次大的罢工示威，已经足使反动阶级骇惧万分。“国民党”三字无论在南方北方一般工人群众对之一点没有信仰，黄色工会成了工人群众眼中的锋刺，武汉上海广州的工人群众已经公开的枪杀国民党的工会改组委员和工会特派员，广州工人已在高呼“撕毁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旗举起革命的红旗”。总之全国工人阶级已经逐渐认识国民党的反动，而开始凭仗自己的力量起来与资本家豪绅军阀和一切反动势力宣战了。依这种描述，证明党的中央“八七”以来的策略完全是正确的合于实际的。

这次中央扩大会议政治任务决议更加明白指出要为争得工农政权（苏维埃）而奋斗。因此党的职工运动的基本任务便应转注于这一政治重心，使工人阶级在政治组织上真能负起为实现工农政权而战斗的领导者的任务。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央扩大会议对目前职工运动的策略和方法有以下的决议：

一、要把政治决议所指出的任务实现于职工运动方面，首先便应坚决的与有意或无意忽略职工运动的倾向奋斗，事实上使职工运动成为党在群众中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事实上使工人阶级能成为农民贫苦民众的领导者和先锋队。同时应坚决的肃清职工运动中机会主义的余毒从同志和工人群众的

脑海中洗去一切妥协，退缩和军事投机对国民党幻想等反革命思想。在组织上应当从工会指导机关和党内职工运动指导机关中彻底撤换一切投机腐化退缩消极的分子代以积极勇敢的工人分子。

二、党的职工运动主要路线是从不断的领导工人作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从斗争中严密工人的组织，加紧工人的政治训练，扩大工人的武装组织和训练，一直发展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这就是说我们在工人群众中一切组织宣传工作要经过实际斗争一直为达到这一目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而前进。现时应立即开始全国工人的经济罢工和反军阀战争的争斗，对于经济罢工，党的各级党部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形提出各业各种工人的经济要求，以这种要求组织号召工人群众爆发罢工争斗。现时无论矿工路工海员纺织工人以至种种苦力手工业工人店员都有极切迫的经济要求。现时经济罢工是开创新的职工运动的唯一道路，而且是如干柴着火一般极容易爆发的，我们党应当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站在工人群众前面勇敢的领导他们。党的中央应当以各地能否爆发经济罢工为考察各地改造职工运动之成绩的标准，同时党对于罢工的策略（尤其是在某种产业恐慌时）及罢工失败后如何继续发展争斗以及现在一部落后工人之畏缩心理如何救正，须特别加以注意求得适当的指导方法。

党在工人阶级中应作的政治工作应不仅限于宣传工作，应当利用机会实行政治的集会示威游行，以至于政治罢工，特别是当现在新旧大小军阀的混战时期，在战争的区域中应当发动反军阀战争的争斗，至少应当做到开会游行示威并在紧急的当中夺取武装的工作。在一般政治要求中应当提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和反对白色恐怖，逮捕工人及要求释放被捕者等等。同时应当知道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虽然由于其斗争的目标不同，但在事实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经济斗争必然进到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在未能最后夺取政权时每人归结于经济的斗争，在一切经济斗争中必须提出政治要求，在一切政治中必须提出经济条件。如此才能使工人明白经济争斗与政治争斗相互的关系而继续不断的奋斗直至最后的胜利。

在一切争斗中须扩大而深入的宣传“苏维埃政权”宣传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青年团，宣传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罪恶，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政府的口号，提出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及土地革命的口号，举出镰刀斧头的红色旗。

三、在宣传上必须特别注意向工人群众解释无产阶级与农民联合的意义及其重要，尤其要利用每一个农民暴动的事实详细向工人群众宣传，党必须使无产阶级与农民缔结亲密的联盟而成为农民领导者，为达到此目的，不独应当在工人群众中作口头上与纸上的宣传，并应当从组织上和斗争中求其实现，各城市乡村的联合暴动，如矿工铁路工人与附近农民的结合，如派遣失业工人到农村中去指挥暴动等等是。

四、最近重要城市所发生的罢工运动，实为“八七”会议以来新政策之下无产阶级继续不断的壮举，但是其中大部分终为资产阶级获得胜利，其原因不独在于黄色工会与官厅之掣肘及彼等与厂主联合一致向无产阶级反攻，同时更因为我们的工会组织薄弱，党的指导不力，运动之散漫无组织及罢工工人相互间缺少联系等等。因此各级党部应当坚决的做发展与巩固秘密工会的工作，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吸收广大的非党的积极工人群众加入工会，并且使他们参加秘密工会的工作，坚决的改正“党即工会”或整个的包办工会机关的积习和错误。在最短期间内，上海，广州，武汉，天津，青岛，必

须完成所有最重要的工会委员会的组织，并须在保存党的势力之下，使新的非党积极工人干部人才参加其工作。

尤其要紧的是在大产业中进行从下而上的组织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的产生必须经过群众的选举。工厂委员会的存在在原则上是公开的（在保持秘密工会正确的指导之下尽量使广大的非党工人参加这些委员会的工作）。为扩大工作范围起见必须做到组织公开的工厂委员会。因此，现在已经应当造成为将来争工会公开有所保证的一切必要条件。平时对于工人大会，工人代表大会须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的举行，要尽可能经过工人代表大会或工厂委员会解决关于工会及日常斗争的重要问题，使工人群众自觉其组织上的责任并加重对于工会的责任，一方正所以改正几个领袖包办工会的积习。

在工人运动高涨或白色恐怖稍微缓和之时，党必开始作公开选举工会机关的运动，并将国民党政府所委任的工会指导员一概驱逐撤去。中央对于全总海总铁总的工作须加以整顿使之起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于矿工，邮务，纺织亦须促成其全国组织之产生。秘密工会与党的支部必须尽量利用公开之可能性组织一切工人团体，如工人俱乐部，工人学校，公共寄宿舍，公共饭堂等等以团聚于工会之周围。

五、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与政府国民党委派的黄色工会，眼见共产党在工人群众势力很大，他们已经改变了他们自己对于罢工运动的政策而图谋于罢工工作之中把工人阶级夺为己有。他们有时也给罢工工人一点小利，如提出秘密工会所提出的要求再加上他们自己提出的欺骗工人及罢工救济等等。自然，在白色恐怖之下，他们的工会是唯一的公开工会，因此他们有把一部分工人从我们领导之下夺取之可能，但是他们的企图始终不过是暂时的，终究要归于失败，因为他们——反革命的政府绝对不能向工人稍事让步，更不愿抑制厂主们贪求无厌的欲望。党必须研究他们的政策之改变，与目前政府工人政纲之内容。党与秘密工会必须在日常斗争的事实中不断的向工人群众指出他们所以予工人以经济帮助或其他种种欺骗，其用意不过在于使工人放弃自己的要求和斗争，转而向资产阶级摇尾乞怜。

对于反对政府国民党或冯记阎记……等所委派的黄色工会，除开右面所述我们勇敢的站在工人前线领导他们作经济政治斗争，从不断的日常斗争中宣传揭破黄色工会之罪恶使工人阶级脱离他们的影响而外，在组织上我们应当提出“工人自己选举工会，反对任何机关委派工会”的口号，并实行工人选举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使各工厂工人共同议决实行反对政府国民党以工人部之职权改组工会并指派工会指导员，抵制他们的机关，拒绝缴纳会费。同时厉行红色恐怖去对付右派工会的委员也是可以的，在能有广大的工人群众参加如此种斗争的时候，更有必要（如广州工人之反工总会运动）。

六、为帮助罢工工人，必须筹备罢工救济费，我们应当提出“不要给右派工会一个铜板，大家共同筹备罢工救济费”的口号，并指导工人实现这一个口号，那怕每个工人每月只能蓄储三五铜板，也是有异常重要意义的，同时全国总工会必须向国际无产阶级不独要求政治上的帮助，并当要求他们在经济上帮助中国无产阶级。

七、因为关厂缩减生产，休业及开除工人等所引起的失业与饥饿使一部分工人起工团主义的妄想，以为夺取工厂自行生产或毁坏机器可以挽救工人失业与饥饿的危机。党与秘密工会的任务在于指出这种倾向对于工人阶级之不利，同时应当提出“工人管理生产”的要求。说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实

际冲突起来，资本家便使成千累万的工人失业之事实，只有进攻资产阶级是政治斗争最有力的武器。

八、党对于失业工人，须使之团结于下列口号之下：

- (一) 向商人与工厂主征税救济失业工人。
- (二) 政府开发社会工作给失业工人做。
- (三) 开办公共饭堂与公共寄宿舍。
- (四) 发给失业工人经常的津贴。
- (五) 失业工人津贴费由失业工人自己管理。

为使失业工人对于这些口号而奋斗，必须组织示威游行，向政府商会要求上列条件或以捣毁政府国民党工会，捣毁政府管理发给津贴费之机关相威吓。

失业工人必须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于秘密工会指导之下。党必须注意组织失业工人纠察队的工作，并设法派遣失业工人到农村中去作农民运动的工作。

九、海员铁路工人矿工为中国主要产业工人，亦即中国无产阶级的重镇，现时党在这些工人中的工作非常之微弱，党的高级指导机关应根据下列之原则规定各个的工作计划，督促各级党部执行，并尽可能直接指挥监督其工作。

(一) 海员曾经有名的斗争，至今还成为广东工人斗争的重心，可是除开广东一隅外，别的地方极少工作甚至于完全没有，党应当有计划的发展海员工作，在邮船和大轮船上发展海员工会支部和党的支部，在重要的商埠成立海员工会分会，于最短期间于已有基础的工会中发动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战争的斗争。从这样的斗争以加强他们的工会组织和政治觉悟。党应当分派一批人才去担任海员工作。

(二) 铁路工作自“二七”失败后，即渐渐消沉和腐化。除开极少的铁路如广东株萍外，党的支部和工会机关多落在工人贵族手里，成了不战斗的机关，同时因为过去铁总党团组织系统的错误，铁路党团另改一系统，不受相当的当地党部之指挥，铁总特派员亦多离开党的指导，铁总又无法给以灵敏的监督指导，于是铁路工作愈益离开群众，许多铁路的工人群众反对工会反对 C.P.，因为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原故。“八七”会议以后铁总虽努力企图改造，然因人力关系，亦仅限于京绥京津铁路有部分的改进。在此反对军阀战争和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时期，铁路工人的作用尤其异常的重要，党应当派人在几条重要的干路如京汉津浦京绥陇海京奉粤汉沪宁沪杭正大等重新开始工作，恢复并改造工会发展下层组织，改造并发展党部，恢复党的威信，发动群众的经济斗争，同时改正党团组织上的关系，上级党团绝对不直接指挥下级党团，各级党团完全受相当党部的指挥管理。铁总特派员同时受相当党部之指导监督。

(三) 五卅前后全国矿工中，我们党有相当工作的将近二十万人，五卅高潮低落后，至今一方因为产业恐慌而致部分的或全部停业，如汉冶萍三公司及枣庄之煤矿，一方则因党的自动的停止工作，如鲁晋豫各矿省，因此，此二十万的矿工工人中仍旧留有基础而尚在继续不断奋斗百折不挫的仅只有安源之数千工人（湖南秋收暴动安源二千余工人为先锋攻萍乡醴陵浏阳）北方各省不仅工作停顿，连党的组织亦形瓦解（唐山只剩二十几个同志，工人根本不信任 C.P.，下级同志要杀区委负责人）。这是何等可耻可痛的事情！现在党应当重新建立矿工运动的基础，尤其是对于直隶之开滦五矿（五万人）

门头沟（二千人）山西之阳泉（三万人）井陘（数千）山东之淄博（五万人）枣庄（一万余尚余一部分未歇业）河南之六河沟，焦作，江西之安源（尚有五千人），湖南之锡矿山（约二万）水口山（三千）炭塘子，湖北之大冶，奉天三本溪湖须派专人去进行秘密工会发动斗争，发展党的组织。

十、同时党的中央对于大的工人区域，上海武汉广州天津青岛香港等处以及其他重要城市的职工运动工作，须特别注意加以指导和监督，目前尤须注意工作上和组织上的改造，尤其是在这些城市中的市政工人运动须特别加以努力。这些工人的厂家不是帝国主义者便是当地的军阀政府，斗争一起来即是直接的与当地统治阶级的冲突，特别在工农暴动的当中，足以制统治阶级的死命。各地党部须战胜一切困难，开始并发展这种工作。

为要使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指导者，那么各级党部对于各县城市工人运动便应当加紧工作，不仅要发展工人的工会组织和经济斗争，而且要充分给以政治的训练（如反对国民党夺取政权，武装联合农民，土地革命等等），使之不断的为夺取政权追求根本解放而奋斗。一切城市的工人运动中，党须坚决的领导店员手工业者对于店东手工业主的经济斗争，必须如此我们才能取得广大的下层无产阶级的拥护，才能在各县城市造成暴动的主要力量（当然还不是中心力量）。十一、工人秘密的武装训练已成为中国工人斗争中迫切的工作。重要的工人区域须派专人担任训练工作，同时党应当尽可能帮助先进的工人得到武装尤其是在军阀混战的时候，应当有组织的领导工人夺取武装。关于工人武装训练和工军的组织，武装暴动的技术，中央须另制详细的计划和规定。

十二、根据党一般的政治任务 and 策略在工人群众中的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和运动，要更加积极的做起来。特别是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之下和外国资本家的工厂中更应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融成一气，利用每一个机会激烈的发动起来。

十三、女工工作与童工工作必须较前加紧，必须吸收女工及青年工人到工会中工作。尤其是在纺织业工厂中，资本家每每利用童工女工以抵制成年男工，在一切斗争中辄大抵开除成年男工代以女工童工，以逐渐消灭工人队伍中中心的力量，党的策略就是要使成年男工了解提高女工童工特别的经济要求之必要，如帮助童工女工改良待遇，增加工资运动，提出童工女工工资与成年男工平等等以激发动女工童工的斗争，使之与成年男工结成亲密的战线，以抵制资本家挑拨离间的阴谋。十四、训练工作在目前有很重大的意义和需要，在训练工作中，必须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罢工斗争胜利之条件及反对黄色工会等工作详为解释，使工人都能了解才算尽事，在各重要工人区域中，必须出版象《上海工人》一样的印刷品。

党必须在纸上或口头宣传上猛烈的批驳右派工会领袖高谈阔论之阶级调和政策，并尽量的批评他们在“劳工日报”及其他反动报纸上发表之文章及他们工人会议席上之演说报告等。

十五、为使本决议案能切实的实现，党的中央须注意以下几点工作：（一）派遣积极的能干的同志到重要工人区域和重要产业工人中去工作。（二）改换旧的工人领袖和工运指导者中的机会主义分子代以新的积极的分子。（三）党的职工运动经费须直接指定分配于各重要产业工人，重要工人区域和重要城市，不交由各省党部自由支配。帮助各种总工会党团及各省党部制定所属范围内工人运动总计划。

各级党部对于所属范围内各种各业的职工运动，须随时制定一个月或两个月的工作计划，以尽领导或创造的责任，不可限于零碎的应付的状态。各省委必须每月对中央作职工运动报告，尤其是单独受补助费的

区域，或产业，每月必须有一专门报告。如一个半月不作报告，中央应停止其补助费，两个月不做报告，便撤换工作人员。

注释

原文如此。

此决议案无成文时间，亦未与十一月扩大会议文件同时发表。中央通告第十六号上说，扩大会议特别组织一委员会通过专门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似应指此文。

原文如此。

湖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暴动是一种艺术，其主要规则则是：坚决、勇敢，无妥协的前进，进攻！”——机会主义派所忽视的马克思之格言。

目 次

第一章过去湖北农运概况

第二章决定策略的经过

第三章各区工作经过

第一部鄂南区

一、武汉政府反动时之鄂南

二、骚动时之鄂南

二、暴动期中之鄂南

1. 暴动计划

2. 暴动纪实

(1) 中伙铺劫车

(2) 变更攻城计划

(3) 新店事更

(4) 取汀泗桥

(5) 占马桥

(6) 攻咸宁

(7) 失马桥

(8) 失白墩及白沙桥

(9) 通山得失经过

四、结论

第二部 鄂西区

第三部 鄂东区

第四部 鄂中区

第五部 武阳夏区

第六部 京汉路区

第七部 鄂北区

第四章 总 结

第一章过去湖北的农民运动

一、要彻底了解此次湖北农民秋收暴动的经过，首先便须明了过去湖北农运的概况。

据五六两月的报告：湖北全省农会的会员共有二百八十四万二千余人。其详细的分布，及农民同志的数量，农运工作同志的数量五月分之统计，则如下列二表：

第二表

(一) 农民协会会员全省总数：2,692,117人。

(二) 乡农运有基础的：17县。

(三) 农民同志：2,106人。

(四) 农运同志：441人，占全部工作人数24%。

(五) 特派员同志：135人，占特派员全数80%。

再据六月分之报告则：

(甲) 县农协数：县农协22县，县农协筹备处32县。

(乙) 区农协数：380个(已知的)

(丙) 乡农协数：3852个(已知的)

(丁)会员总数：2,842,239人。

党员方面，全省共14000余人，散布各县者约七八千人，每县多的得八百余人，少者亦有数的，均在半公开，半政权的状况之下。武装方面各县农民之快枪，多者达二三百枝，少者亦有二三十支。全省武装的县分，共有枪约二千支。

二、有这样雄厚伟大的势力，致少可以担负完成湖北土地革命的责任而有余，即使七折八扣，甚至廉价对折，也足以负起土地革命的使命而不致坐视敌人肆意横行摧残革命势力。不知实际上大谬不然，湖北农运伟大的发展大部分完全是依赖政治军事的力量，没有经过实际斗争，并且还有许多地方是土豪劣绅在那里操纵把持。例如鄂城汉阳沔阳等县各级农协的执行委员和委员长大都是秀才老爷的盘年田户长，乡约保证等在担任，大治豪的亲戚士子弟，则混入农协，充当执委。而所谓实际斗争，又往往是领袖的斗争，并没有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如咸宁即其例证。党的组织的发展亦系凭借政治力量，故不免为土豪劣绅所侵入，如公安县四十一个同志中，竟有二十九人为豪绅资产阶级及与豪绅利害一致的分子，因之，党遂成为非斗争的党，今自六月省委扩大会议，对于湖北各县职工运动的决议案说：“工人斗争的方法，应该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罢工，我应充分利用政治及社会力量来达到工人的要求；就是工人每次的要求顶好得到县政府及各团体的承认和调解，如经过一个和平的方法，还不能达到目的。再来一个罢工，即或有点过火的行动，各方面也可以相当原谅。这种机会主义的策略，同样的又应用到农运中。农运的前途，遂碰着一个巨大的反动。

三、土豪劣绅是农民的死敌，农民不能杀死土豪劣绅，便是土豪劣绅杀死农民，但是在党的“充分利用政治及社会力量，经过各种和平办法来达到要求”的机会主义策略之下打倒土豪劣绅，完全成了儿戏的工作，捉住土豪劣绅，并不用严厉手段应付，最大多数用宣布罪状算账戴高帽子罚款写悔过书等儿戏的手段应付，党不给以切实指导使其斗争日趋剧烈以发展农村中之革命运动反而跟着一般人说农运过火，说过去的农运“只是放在无限度的做排泄工作”。农运之目的有变改旧有土地制度实现耕田农有，但是党内对这个中国革命中最紧迫的问题始终非常漠视，新阳、孝感、夏口等县农民自动地提出“耕地农有”“以原价收回农民已卖土地”“要求政府发给田亩来耕种”等要求，党亦未能予以明确的答复。对大地主的土地采取政治的方式没收的议案，亦未能领导农民即时执行。

四、农民是要革命的，打倒土豪劣绅，夺取乡村政权，实现耕田农有，都是他们迫切的要求，虽然没有人领导，他们自动的也要干起来，我们的党，不惟不能领导他们干，连跟着他们跑也办不到，反而说那是“放任的无限度的做排泄工作”，那是“越轨的行为……失掉了农村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情。”又说：“过去乡村没有政府，农民协会乃专起政来。可是这种现象并不是乐观的，因为建设农村苏维埃的时候还早，农村革命联合战线，就是破坏在这种形式之下。”更说：“农民协会侵越县政府的职权，尤为大错。”这样党就在实际上阻碍了农民的前进。

五、象这种机会主义的政党和白纸写黑字的农运，自然在反动势力一到来，马上便会完全消灭。所以号称有两三千同志的地方、会连一个人影都看着不着，号称有二三十万有组织的农民的地方，也不能有一个人起来。

第二章 决定策略的经过

武汉政府的反动，完全是中国革命进到土地革命的阶段之反映。此时保障中国革命之唯一的方法，即为发展土地革命。所以中央决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同时，决定叶挺贺龙在南昌独立，实行土地革命，以促进各省土地革命之发展。湖北为武汉反动政府之所在地，故省委决定动摇此反动统治，七月召集农运同志，派其分赴各县，作宣传（如江西的共产军打来了，湖南农民暴动起来了，汪精卫被唐生智赶走了，唐生智要解决杂色军队，唐生智把中央银行的现金拿走了等）及破坏水陆交通，破坏金融，阻止粮食出境等工作。未几接得叶贺在南昌独立的消息，同时武汉工人已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武汉反动政府。省委农民部当时决定湖北农运的策略为大举暴动，动摇武汉反动政府的统治并准备进一步常其推翻，以响应武汉工人的总罢工，拥护南昌叶贺独立，及促进土地革命加速度的发展，并起草详细计划提交省委通过执行。

（一）策略

武汉工人已经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反动的武汉政府，叶挺贺龙两部又在南昌独立宣布实行土地革命，武汉政府的政权已经动摇了，在这革命短兵相接的时候，为响应武汉工人的罢工，拥护南昌叶贺独立及促进土地革命加速度的发展，我们党应立即领导农民起来，杀戮土豪劣绅，打倒土豪劣绅复起的凶焰，引起乡村间极大的骚动，抗税抗捐以动摇武汉的政治，使其不能出兵江西及其他省分压迫革命，并进一步武装农民，抗租抗粮实行全省大暴动，没收大中地主土豪劣绅的土地及一切公地（对小地主则实行减租）准备推翻武汉的统治，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而建设农民协会的政权。

（二）办法

第一步：

一、建设各区集中指挥的机关，组织农民游击队，用造谣及流寇式的武装行动暗杀土豪劣绅，造成了乡间的大恐怖以镇压土豪劣绅复起的凶焰，恢复农民斗争的勇气及组织。

二、在鄂南鄂东一带须特别注意集中武装力量，破坏水陆交通，断绝军队运输及米粮的供给，并扰乱其后方，在鄂北襄枣一带，则联合土匪举行暴动。

三、积极地煽动农民抗税抗捐，阻止米粮燃料出境，拒绝使国库券及中央钞票，捣毁税收机关及交通机关，并没收其财产以引起广大农民群众对反对政府土豪劣绅剧烈冲突。

第二步：

一、实行抗租抗粮抗捐，健全并扩大农民武装及农协组织，发展流寇式的军事行动。普遍杀戮土豪劣绅没收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及一切土地，准备乡村间极普遍的大暴动。

二、大暴动开始即夺取敌人武装，占领财政交通警署邮电等机关，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建立农民协会政权及农民军队。

在上述斗争步骤的进程中，对于会党土匪及一切秘密组织均须设法参加，用打富救贫的口号联络他们一致猛攻土豪劣绅，反对反动政府，对国民党则联络左派的下级干部反对上层的反动领袖，暴露上层反动领袖的罪恶，反对上豪劣绅把持的下级党部，并发展左派下级党部的组织，在反动军队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无力抵抗，则须避免冲突，有力抵抗则当设法收缴他们的枪械，对于一般的欠饱甚久的士兵，则可煽动他们哗变，对于杂色军队及

二、六、八、三五、三六等军则须挑动他们的冲突，使其自起分化。

(三) 组织

一、工作区域的划分及直辖的县治如下：

区别所辖县治

武汉汉口、武昌、汉阳

鄂东黄梅、广济、蕲春、圻水、罗田、应城、黄安、阳新、大冶、鄂城、黄冈、罗田

鄂南蒲圻、通城、嘉鱼、咸宁、通山

京汉路应山、孝感、安陆、云梦、黄陂

鄂北枣阳、随县、钟祥、襄阳、宜城、光化、谷城、保康、房县、均县、南漳、郧县、郧西、竹山、竹溪

鄂中沔阳、汉川、天门、潜江、监利、石首、公安、江陵、荆门、京山、应城

鄂西宜昌、当阳、松滋、枝江、远安、宜都、长阳、五峰、秭归、

巴东、兴山、建始、鹤峰、恩施、宣恩、利川、咸丰、来凤。

二、特别委员令

(甲) 各区组织特别委员会，由省委指定党部农运及军事工作的同志各一人组织之(青年团得派人参加)主持该区工作。

(乙) 各区特别委员会之下得如下列四科，一、参谋科，二、秘书科，三、军事科，四、事务科。

(丙) 在武汉鄂东鄂南鄂北四个区域中特别委员会之下须组织下列各队：一、自卫队，二、土枪队，三、梭标队，四、手枪队，五、敢死队，六、暗杀队，七、谍报队，八、侦探队，九、交通队，十、破坏队。其他区域亦须酌量预备。

(丁) 各区特别委员会之所在地如下表：

一、武汉区——汉口

二、鄂东区——黄梅

三、鄂南区——蒲圻

四、鄂北区——枣阳

五、京汉路线——应山

六、鄂中区——沔阳

七、鄂西区——宜昌

(戊) 各区特别委员会均受省委直接指挥

(己) 各区如因地方辽阔，指挥不便，可酌量组织特别委员会分会，直接受该区特别委员会之指挥。

(四) 工作人员

(甲) 第一批由党团合并挑选二百四十个忠实勇敢的学生同志及由军委挑选军事工作同志二十四人派往各区，担任农运下级干部及军事下级干部的工作，第二批则派工人同志。

(乙) 党部农运及军事工作负责同志的姓名及下级干部的分配如下表：

| 区 别 | 党部负责同志 | 农运负责同志 | 军事负责同志 | 农运干部 | 军事干部 |
|-----|--------|--------|--------|------|------|
| 武 汉 | | × × × | | 20 人 | 5 人 |
| 鄂 东 | × × 书记 | × × × | | 80 人 | 8 人 |
| 鄂南南 | × × × | × × × | | 40 人 | 6 人 |
| 鄂 北 | × × × | × × × | | 30 人 | 6 人 |
| 京汉线 | × × × | × × × | | 20 人 | 3 人 |

| | | | | |
|-----|-------|-------|------|-----|
| 鄂 中 | × × × | × × × | 30 人 | 4 人 |
| 鄂 西 | × × × | × × × | 20 人 | 2 人 |

(五) 口号

普通用的口号如下，（各区要按照当地要求提出特别的口号（例如在鄂北可提出）一、劫富济贫，二、疏财仗义，三、红会会员同是被压迫的劳苦农民等并随时增添新的口与）

- 一、建设农民协会政府
- 二、打倒压迫农民的国民政府
- 三、杀尽土豪劣绅
- 四、抗捐抗税（第二步提出抗粮抗租）
- 五、没收大地主土地
- 六、取消高利借债
- 七、取消一切苛约
- 八、没收一切公有土地
- 九、为死难农民复仇
- 十、全体农民武装起来
- 十一、组织农军
- 十二、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中央
- 十三、打倒新旧军阀
- 十四、工农与革命士兵联合起来
- 十五、拥护叶挺贺龙的革命军
- 十六、铲除贪官污吏
- 十七、农民革命胜利万岁

(丙) 其他

(一) 武装

- 一、尽可能的预备炸弹手榴弹
- 二、尽力量预备驳壳枪
- 三、预备汉阳枪的子弹
- 四、尽可能的预备长枪手枪机关枪等

(二) 争斗中应注意事项共计

- 一、绝对服从党的指挥
- 二、不迟疑的一致行动
- 三、随时利用各部队胜利消息，提高群众革命情绪
- 四、各部分须互相切实联络，建立密切交通
- 五、行动须敏捷，在群众感情极冲动即须发动
- 六、须随时利用群众感情冲动的机会作种种斗争
- 七、对于小地主的土地须由农协组织减租委员会解决
- 八、计划及行动均须绝对秘密
- 九、严厉反对反动派不能有丝毫姑息
- 十、青年团绝对受党的指挥
- 十一、对于动摇分子须立即除名或予以军律治罪

(丁) 杂项

- 一、省农协须在汉口设一交通机关
- 二、省委农民部须在汉口设交通机关

三、每机关至少须找一人或二人作交通员

四、每区至少须找五人作交通员三人由当地找二人在武汉找

五、省农协封闭时各县须发宣言反对，总工会被闭时一如此

湖北各区原以鄂北环境为最佳，襄枣随三县可靠之农民共有数万，一般的农民均极端的反对建国军等杂色军队之就地筹响及奸淫虏掠，随县红枪会旦已与建国军正式开火，击毙该军团长一员，营长二员，而我们又有张兆丰一师，可供调遣，本可立刻造成暴动局面，所以中央及省委先后派遣陆沉等许多人前往指挥该区，不料迟之又久，查无消息，后得报告，已说可以候电令即动作，旋又因张师被免职而不能，改变计划去定几天开一次支部会，几天开一次小组会，几天开一次干事会……来训练同志，一面仍派张兆丰向建国军方面接火，欲得一名以号召旧部。鄂北既不能动，（后来陆沉在省委常委会议上的报告，该区工作，除了还能暴动四字外，简直没有一点工作可说）当时的情形，又以鄂南为最佳，而鄂南区在政治上既可以直接影响武汉，在地理上断绝武长路的交通及邮电，又可以造成湖南军队与政治的恐慌。而大有利于湖南农民的暴动，所以省委决定湖北的暴动，以鄂南区为中心，一方面援助湖南，一方面引起湖北全省普遍的暴动并决定鄂南暴动计划，（详后）。

鄂南计划通过后，中央因当时两湖社会极感不安，反动政治，非常动摇，经济情形困窘万象，以形成极好的暴动局面。为保障革命猛烈的继续发展起见，决定坚决的实行领导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以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的革命的政权，遂决定两湖暴动计划如左：

“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

（一）目前两湖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形，纯是一个暴动的局面，本党当前唯一重要责任，就是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的革命的政权，如此才能保障革命猛烈的继续发展。

（二）两湖的暴动尚未开始，在时间上已经是失败，这是犹豫不决与不相信农民的群众力量的结果，如此便要丧失革命。

（三）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实的农民群众的力量，军队与土匪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付力。坐待军队与土匪的行动或完全依靠军队的行动而忽略农民本身之组织力量与行动，这也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表现。这样领导暴动，暴动无疑的要归于失败。这不是暴动，这是一种军事的冒险，或者军事投机。

（四）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号，因为两湖的环境不同，两湖应各有其中心区域，应各创成一种独立的暴动局面以发展暴动，但总的政治目标口号与行动须一致。

（五）湖南暴动可以分（为三大区为中湘？）南各县分郴州、宜章、汝城、永兴及衡阳、丰阳、衡山两路，准备须于九月六号开始暴动，夺取衡阳，暴动成功后会合谭醒之师合取长沙。第三区为湘东各县分为安源醴陵湘潭湘乡一路，浏阳平江区宁乡益阳安化一路，湘阴岳阳长沙与其近郊一路，各路以长沙为中心作准备于九月十日开始总的暴动，各区暴动成功之后，除了一部分力量维持本区之秋暴，如应迅速调查大部力量直攻长沙。长沙于九月十二三号应有一暴动实行取得政权推翻湖南省政府。湘西分南华一路及常桃汉

一路常德为中心作准备于九月十号开始暴发，夺取常德为长沙声援。此中湘中之宝庆一带及湘西之醴陵一带亦须有准备于九月十号左右发动，外为各路主力之声援，如此全省范围的暴动，应普遍的以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为号召的中心，此革命委员会于暴动成功之后组织湖南省临时的革命政府。

(六) 湖北暴动县城下列各区：一、鄂南区及武长铁路区为通城、崇阳、通山、蒲圻、嘉鱼、咸宁、武昌(四郊不在内)七县。二、鄂中区为沔阳、潜江、汉川、天门、京山、应城、监利七县。三、鄂西区为江陵、公安、石首、荆门、当阳、宜昌、宣都、松滋七县。四、襄枣区为襄阳、枣阳、宜城、光化、谷城等县。五、京汉路区为黄陂孝感、应城、应山等县。六、鄂东区为黄冈、鄂城、大冶、蕲春、黄梅、广济、阳新等县。

(七) 武汉区为武汉三镇与四郊。这许多暴动区域应自鄂南开始(九月十号)，鄂南开始之一日鄂中鄂西即须大暴动与鄂南联络创成一独立局面，威吓武汉又或从鄂南攻岳州威吓长沙。襄枣的暴动如主客观有可能。张兆丰的军队又到，九月十号之前即开始，至迟十号与十号后一二日即须动作，如鄂中鄂西暴动胜利，张兆丰军队须速调至暴动的区域完成暴动直攻武汉，武汉此时须有一大暴动至少亦应有一大的骚乱(如主观力量暴动不可能时)，鄂西鄂中暴动可以成功，则张兆丰的军队须用各种方法调往湖南或留在襄枣。鄂中鄂西襄枣暴动开始之后鄂东区京汉路区须尽量的响应。

(八) 暴动组织在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之下。军事方面，乡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合称工农革命军。某农民暴动区域军卡的指导用某区农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工农军的数量在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成为正式的革命军队，同时仍保存地方军队性质的工军与农军，执行各境当地警卫，以之为革命的新警察之基础，在暴动尚未发动之前，应将工人纠察队改称工人革命军，农民自卫军，即应改称农民革命军。

(九) 对于土匪的政策应当要以我们的口号去宣传他们，去组织他们，像农民协会之下或革命委员会之下，使他们在暴动的时成为一部分之主要的依 付的力量，在暴动成功之后可以改编。

对于反唐的杂色军队(许克祥除外)如能对暴动取中立的态度，则可以利用其中立以便迅速发展暴动，并须设法与其兵士接近宣传他们，暴动成功对于此种部队斟酌予以解散或改编。但这决不是说牺牲我们的根本主张，以换取他们的中立。在暴动中对于有反暴动倾向的杂色军队和土匪虽然他们是反唐的，也要立刻解决他们。

(十) 暴动为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事实的结果是全部)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与没收其财产，实行乡村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民选革命政府，消灭一切非农民非工人的反动武装。

(十一) 暴动之前极端注意士兵中的宣传，鼓动他们起来，杀戮反革命的长官，一有可能。便应组织革命士兵委员会，这种应是士兵的群众的。暴动之中要吸引士兵参加。这种革命士兵的组织可以做改编新革命军的成分。

(十二) 暴动的口号为暴动打倒武汉政府，暴动杀尽土豪劣绅反革命大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暴动为死难农民复仇，暴动没收地主的土地，暴动实行耕者有其田，暴动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暴动恢复一切革命民众团体，暴动实行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暴动实行民选革命政府，暴动打倒[叛]党[叛]国的汪精卫，暴动打倒残杀湖南人民的新军阀唐生智，暴动组织革命军，农

民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平民和士兵的革命联合万岁，农民革命胜利万岁，革命委员会万岁。

（十三）各区的暴动在未发动之先离城较远一点的乡村即应杀戮土豪劣绅反动的大地主，提高农民革命的热情，举行各区的农民的群众大会，多作群众的政治宣传（按照上述口号加上实际的事实），如发传单讲演，壁报，告示等。在暴动方开始，首先即须征集所有的力量攻打某区的中心城市，杀戮政府的官吏，宣布革命委员会政权，然后才能发展普遍的暴动。

（十四）暴动方开始即须掘断铁路，破坏水陆交通，占领或破坏邮政机关，割断所有的电线，造成敌人的绝端惶恐的状态，然后才可便于暴动的发展。但因交通机关的破坏同时影响我们自己的联络，各暴动区域应当提出特别传递消息的方法，切不可因此而迟延等待某区的暴动。即令暴动发生后，各方关系断绝，亦应按照预定的未成功与成功后的地点猛烈地进攻，决不可犹豫，犹予[豫]便要破坏暴动的胜利。

（十五）暴动胜利的地方，应无情的镇压肃清反革命。对于买办及反动的资本家如果他们经济怠工或封闭工厂，则工会应当占领工厂，以至交给革命政权管理。至于反革命的豪劣则应坚决没收，严禁私人的抢掠侵吞。

（十六）长沙武汉两湖省委应有——特别的暴动计划。

（十七）各区的暴动内部的指挥为各区的特别委员会，直接归省委指挥，武长铁路如发生指挥上的不方便时，两湖省委的特别委员会则应联合组织归中央直接指挥，同时受两省指挥。

鄂南暴动将届暴发，各区工作尚无头绪，仅鄂西区之公安石首当阳远安江陵，鄂中区之潜江监利酒阳新堤一带及鄂东区之大冶阳新鄂城等地，尚有暴动之可能，省委遂决定以此数部与鄂南区联合，遂成一个暴动区域。但鄂南暴动以后，鄂西一时不能行动，鄂东鄂中仍无把握，鄂东后虽有一个勇敢同志的暴动，亦无济于事。此项计划遂亦未能实现。

及闻湖南农民暴动之瓦解，及鄂南暴动之失败，省委乃又决定各区实行游击战争之策略，遂成大小的割剧局面。但不久，宁汉双方即以发生军事冲突，客观上颇能有利于土地革命之发展，湖北农民运动，遂又进到一个新的时期。惟此新时期中，乃取游击战争之策略，并积极准备暴动。

第三章 各区工作经过

省委既决定湖北农运政策后，乃派同志分赴备乡工作。工作人员，均由省委组织部，武昌市委，省军委，中央军人部，CY省委，CY武昌市委等处，介绍到农民部，再由农民部分配各区工作。在派人时，最初最感困难者为无人可派，因之对于各方面介绍前来之工作同志，不能严格甄别，凡非患病及正式说明不愿做农运，而又坚持其不作农运工作之主张者，均一律发给川资，派其起程。因此，许多同志大概都是来借词推挡，既得旅费仍或逗留汉口，或则迳赴他方。同时，因为供不应求，省农部不得已，间或自己找得工作同志后配工作，再向省委报告。

此次派赴各区工作同志，因鄂中，鄂东，京汉路等区，最初不能接头，各方面派来的同志，又有不少是来骗钱的，所以派赴各区工作同志，共计虽有四百余人，实际上已到各区接头并能工作者，不过二分之一，这个工作的成绩，实在太坏了！

在派人时，其次发生困难者为经费问题。省委对于各区工作人员，曾决定每人旅费，平均不过二十元，但在最初有同志是不能设法者，如果差了几

元的伙食，不得动身，省农部亦不得代其垫还。后来纸币跃价。原来预算遂遭破坏，其原来需要二十元的，后来甚至于发六十元都不够。

各区工作人员，既逐渐派赴各区后，各区特委亦渐经省委指定同志负责，各区工作遂自开始，兹将各区工作的经过，分述于下：

鄂南区工作的经过

一、武汉政府公开反动时之鄂南区

(一) 党的状况

蒲圻有同志约五百人，团员七十余人，农协有会员五万人，以自耕农为多，分十区：一、二、四、六，四区工作较好，尤以一、六两区为最佳，能领导群众者为一区之沈国帧。工会有一个，会员八十余人，县委工作颇不紧张。武汉政府公开反动时，对外工作，完全停顿。

咸宁有十五个支部，一百五十余人，与党发生关系者，仅八九十人；因有二三月之久，无县委或特支之组织，故毫无工作。

通山有同志约五百人，最大多数均不认识党，无工作。

通城有同志二百四十人，书记系外县人，为本地同志所不容，与CY亦不能发生关系，并互争特派员。

嘉鱼有同志二十人，全无组织，不能行动，在武汉政府公开反动时，党的干部人材都已逃走了。

(二) 民众情形

找不着时局的真象，听得土豪劣绅说国共要分家了，遂存观望态度，群众大会不能开，成为一种停顿状态。

(三) 政治环境

各县大半是土豪劣绅联合县长向我们进攻。

二、骚动时期之鄂南区

省委自决定湖北农运策略后，即于阳历八月初派符向一赴鄂南，令其在该区特委未组织成立以前，全权指挥该区工作。同时并决定该区中心机关，应设于蒲圻，向一到蒲圻后，即召集同志开会，宣布目前行动策略及宣传要点，该附近之农民同志五十余人，当即动员出发，拟捉五个土劣仅捉获四个，附带捉获数人，杀一人，惟技术不好，杀了许久都没有杀死，又被其逃到湖里，乃号召农民三百余人，围湖呐喊，再派同志五六人脱衣持刀下湖，始将其刺伤淹毙。鄂南之骚动工作，遂于此时开始，向一同志并派人到各县工作，未几，复得比较详细之报告，述鄂南情形如下：

(一) 武装 (甲) 咸宁：快枪四十八支，驳壳四支，九子连二支，各五十粒子弹，分散乡下，有事时可以集合完全，在几小时以内，绝对受我们指挥，并勇于干事。(乙) 蒲圻：快枪三十八支，注[驻]新镇，队长为非同志，未能完全受指挥驳壳三支，在同志手中。(丙) 嘉鱼：初有快枪一百十五支，可受我们指挥的五十支，公安队一半可受指挥。手枪二支，驳壳一支，均为同志所有。(丁) 通城：农军有枪五十余支，队长非同志，未能受指挥，此外有机枪及炮弹炮筒，及汉阳造的子弹，共有满一大房，现密藏乡中。

(戊) 通山：有快枪二十五支，手枪驳壳五支，能受指挥，其余各乡土劣共有枪八十支，但对农协还好。

(二) 会匪嘉鱼新堤一带之谢村地股有驳壳五十支，快枪二十支，曾劫新堤龙口等地，我们未和他们接头，通山九宫山西山大老哥有枪五六百支，我们派人与之接洽，大老哥已允合作，大老哥尚未归山，故未得结果。

通城黄童山有枪二百余支，前曾派人与我们接洽愿合作，现因湖南要派兵剿他们，已不见动静。并传闻该山附近有平江农军六七百人，正在调查中，其余尚有十余支枪的小股匪二三股。

(三) 驻军咸宁驻警卫团。蒲圻驻十三军二十九师一百十五团，快枪仅百余支，能用者六十余支。嘉鱼驻警卫二团。通城及羊楼洞，太沙埠各驻六军一团左右，态度未甚明显。

(四) 农协情形愤激欲倒政府者少数，消沉无所动作者多数，简单一句，就是稳静未甚活动。但党未至倒台。

(五) 农民态度 (甲) 愤政府发纸币不能用，与国共分家引起变乱，致土劣反动派 (唐生智三十五、六军等) 杀人和买油盐不着，同时恨军队用国库券买米，使他们不能买米。(乙) 忆念四十一军，尤其叶挺打夏斗寅时的军队纪律好。(丙) 希望四十一军等革命军第二次来革命，保护农民。(丁) 希望县省农协继续办理并给枪农民自卫。(戊) 希望政治平稳。

(六) 最近工作 (1) 简单宣布目前行动之必要，扩大宣传；(2) 整理各地党部，健全组织。(3) 县与特委工作联络；(4) 分配农部派去同志工作。

此时该区骚动工作，虽已正式开始，然已大部分精力注意与土匪联络及勾结人民自卫军，并于八月十六日之报告中，要求省委调警卫二团同志所带之军队前往，颇有机会主义之倾向，省农部乃写一封信给他，告以：(1) 农民革命须以农民为主力军；(2) 军队及土匪仅为不大十分可靠之辅力；(3) 不相信群众即为机会主义或军事的及土匪的投机；(4) 我们作土匪运动，只是一种试验；(5) 不许将我们的策略告诉做土匪运动的同志，恐其无意之间泄漏出来；(6) 对与我们接头的土匪均须派人去看他们中间的实际情形，并能否受我们的指挥，但我们须完全相信群众的力量，积极进行骚动工作。此信去后，该区之机会主义的倾向稍形减少，蒲圻方面继续骚动起来，咸宁方面则于短期内杀死六个建国军，省委旋即派吴德峰参加该区特委工作。至八月二十二日，得其报告，未言及工作，仅请省委转中央军人部，调查蒲圻驻军之十三军第一百五十一团内之参谋长及三个连长是否同志，如是，则请介绍接头。又省警卫团四连又开一排到蒲圻，听说排长是同志，请省委速问曹振武，并写介绍信，省委未久，再派黄赤光前往参加该区特委工作，该区特委遂正式成立，由省委指定吴德峰任书记。八月二十七日该区复来报告称：(1) 各县至今尚未报告来，现在由蒲圻县处找得各县通信处一件，拟即派人赴各县索取。(2) 漆昌元已回县，人民自卫军中已有相当办法，已派一付团长加入。(3) 再请调查蒲圻驻军中之同志及省警卫团四连排长蒋彪是否同志，并请去函介绍省委即决定罗某任某赴该区召集各县负责同志会议，决定，准备十日之内，举行暴动，准备工作如下：

(1) 各县均召集代表大会，从小组以至县委或特支，改选各级机关负责人，以新的党执行新的策略。

(2) 召集活动分子及支部大会，报告政治情形及新的策略，并即发政治宣传大纲。

(3) 由各区农协或支部派员召集农协会会员大会或职员会，加紧政治煽动，一面即发短篇传单或标语。

(4) 恢复各区农协工作，用区农协会名义召集乡农协会会员大会，或组长联席会议，从事政治鼓动——尤其是关于抗租抗粮及打倒土豪劣绅等。对于

不活动的乡农协则改组其执委会，使其成为真正领导农民革命的机关。

(5) 在各区乡农协开会时，加紧农民武装的宣传，同时按照各区分区调查并集中武器，没有武器则设法赶制。

(6) 调查各地武装土匪，县政府及各税局每月的收入，土豪劣绅的行踪财产，大地主的土地财产等。

(7) 除特委直接指挥专门做破坏工作同志工作外，其余各县并须分别担任破坏该地之水陆交通邮电等。

(8) 准备旗帜，标帜，口号，交通……。

在罗某任某未赴鄂南开会以前，省委并决定派人假冒省政府名义，分三路出发：沿途大杀土劣，再往蒲圻茶庵岭集中，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行。

后得该区九月二号在报告称：1.通城因新县长到任，我们就以保留旧县长为名，拒绝其就职。现新县长号召民团围城攻打我们农军甚急。闻新县长又在向省请兵。2.蒲圻驻军中的三个连长，已明白承认是我们同志，欲知我们策略。同日之报告，又称：(1)通城已取得政权，县长表现很好。(2)据通城来人云，修水驻有二团，团长系余洒度，苏斌是同志，已与通城接洽，请查明介绍。3.羊楼司到军队二三千，自称是江西来的，住山峒洞，农民对彼怀疑，欲起而解决之，请查明是否我们的军队。4.咸宁又公开在汀泗桥杀了七个土豪，省政府有密令到县，说将以一师人前往镇压，彼处恐惧极了，已去信严斥。5.蒲圻车埠附近，秘密杀了六个劣绅，县长派人带自卫军调查，已决定自卫军在新乡集中，再不回去了。6.破坏水陆交通，请省委设法。7.山坡土地堂一带请省委设法指挥。8.咸宁警卫二团四连长自称同志，并有一指导员蒋某自称是同志，请查明见复。此信来后，省委书记乃复赴鄂南，指示暴动机宜，并定期九月九号夜开始暴动。九月九日复得该区九月八日报告如下：

1.现状 (1)通城：农军被前陈烈团刘继送营长“同志”骗调至修水与余团集中，现在开发何地未详，多半是向平江开发。因刘继送是受湘省委负托。他们离开前一日，向一就至该处，谈无把握而归，崇阳亦受此影响，未能解决一切。

(2)咸宁：曹振武分派各一连兵扎在官埠桥马神山城內四处，一面又致书柏墩农协请我们将队向汀泗桥集中，我们深知[知]此是诡计，故决定集中力量，先将马桥攻占，即刻将农民分由汀泗桥，马桥，官埠桥三路进攻咸城。惟咸县委还有胆怯未甚敢决态度，影响农民群众集中不少，咸属暴动现未能测其结果如何，多数是不能攻城。

(3)蒲圻：驻军除三连长同志极敢决能干外，第一营长文本日派人接头，愿与我们合作。他在当晚召集四个连长会议，第一个发言大意说，整个局面已在倒唐，必能成功，我们应与他们合作。次一个说，他们未向我们进攻，我们可以不必下乡打他们。第三个说，我们应探听整个的政治消息定夺后，再决定行止，现在暂与他们敷衍及相当的防备。会议结果，通过第三个意见。并决定于九日下午二时，派代表与我们面谈一切，再者他们现戒备极严，团部置机枪一架，驳壳28支，西门城外地岭顶置机关枪一架及排哨，其余部队现皆集中城外高地，本日全日皆不准农民入城，仅准农民出城，同时步哨放在城外二里远。此地农民，动是可以的，惟人数仅千余人，通不是基础农军，倘当日攻城，头一个被军队打死，以未老干军事之农民，受此打击，或将溃不成军，故攻城极困难。至于各乡召集大会，屠杀土劣，没收土地，破坏铁

路邮电，是办得到的，算来有相当成绩。再者，军队方面兵士长官都各恐慌欲有逃命之现状。惟我们要攻城是有极大危险，故决定未攻城，仅在各乡骚扰及破坏至农军则集中咸宁转通山，再由通北转崇阳通城至湖南平江与湖南军队会合攻长沙。

2. 特委随蒲诉农军走，此地接头地方仍旧。

以上各情，倘修水军队能够过来，与蒲圻军队能独立，和接受我们及他们的农民革命军鄂南军第二师长兼攻岳军中路总指挥，或蒋友谅与羊楼洞之羊中姜南两同志接洽有把握，并于九日早能与我们接头好，则此地暴动的局面，可变一新的局面即胜利的局面，十五号攻占岳州就没有问题了。倘这三件事不能办到，我们就只有滚蛋至通山候第二次暴动了。

土匪工作完全失望，就是查无消息。

我们与蒲圻十三军一百十五团接洽条件，（一）准扩大军队；（二）准委任师长职；（三）准入本校但十号午十二时宣布独立，正式通电换旗帜符号；第一杀县长；第二准我们派人作军事工作。

3. 最后——鄂南困难的中心问题是蒲圻的十三军不能解决，因为第一只给我们驳壳十支，子弹六百，同时又没有炸弹与炸药，农民暴动起来极为危险而且失败。在目前这点责任是要省委负担的。同时派来工作人员，又迟延而没有即动，尤其是不能使驳壳枪可笑，这也是要省委负责的。简单说一句，这一次的失败，省委是要负相当责任的。再者，使我们莫明其妙的，尤其是中央派蒋有谅兄与此间军事工作同志接头，结果，打死都不肯使当地军事同志与我们接头为最奇怪，这种行动，与湘省私自运动修水余洒度队伍密逃湖南动作，不照中央计划，使其集中军力，先取岳州，后取长沙一样的荒谬。

省委得到鄂南区九月八日的报告，即于九月十二日回以一信，说：偏依赖军队之一种机会主义的错误。此次两湖暴动计划根本是建筑在广大的农民群众的身上，而不是某种的军事投机或土匪运动，军队和土匪，我们只可视为一种辅助力量，而不可视为根本的势力。这一点，我们屡次说过，亦农同志与兄方负责谈话，尤时时提明。但九月八日的报告中，却又犯了这种错误。譬如说省委只给兄方盒子枪十支，子弹六百，若因而鄂南全局失败，省委应该负相当责任，其实，我们的暴动就不该建筑在几十支盒子炮身上，至于省委，并非有枪不给，第一是因为没有枪，第二是因为运输困难；又报告中显然是过于依赖蒲诉驻军的独立，仿佛若驻军不独立，则我们工作都不能进行。

因为犯了上述的错误所以八日即暴动之前一日兄方竟有这样犹豫不决的报告，似此何能领导那样广大的群众？我们不禁十分担心！咸宁县委之表现胆怯，更是这错误。而且这个报告之中，完全与亦农六日在鄂南所定之计划大相径庭，这样重大的计划随意变更，这种责任，兄方是应该担负的。

现在，当写这封写[信]时，已经是九月十二日晚，即距原定暴动之时期（九月九日晚）已有三日了。我们这里只得铁路断绝的消息，其他尚未得报告，不知暴动是否正式爆发，爆发后是否照原定计划进行，进行后情形如何……我们都不知道。但如果象兄方报告的情形看来，则大体上此暴动已经失败，因为既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自己又没有坚决的决心，如此领导暴动，自然是成功少而失败多的，我们这里甚希望兄方负责同志，不至完全如八日来信所表现的那种精神。

但有一点应该特别提出的，即许此暴动失败，你们亦不应该如来信所说

要退向湖南去，我们须知道，如果鄂南失败，湖南暴动亦是希望很少，你们应该坚决留在鄂南“落草”骚扰，到处出没无常帮助农民抗租，……切不可高飞远走，走亦必被消灭无疑。

湖南省委之任意更动两湖暴动总计划，自然是错误，已通知中央惩戒。蒋友谅（特委委员之一）之不肯联络当地军队同志与特委负责同志，自然也是错误，请兄方与之一谈。这些错误负责人，都是应该对党负责的”。

三、暴动期中之鄂南区

（一）暴动的计划鄂南因为任武长铁路之面，在政治上可以直接影响武汉，在地理上断绝武长的交通与邮电，可以造成湖南军队与政治的恐慌，而大有利于湖南农民的暴动，所以省委专定出一个鄂南农民暴动计划。其要点是：（1）鄂南的农民暴动，以蒲圻、咸宁为中心与发难地点，开始之第一日即须攻破蒲咸二成，然后在政治上可以号召湖南的农民，创成整个的湖南的暴动局面。（2）暴动一开始，即须掘断武昌与咸宁，咸宁与蒲圻，蒲圻与岳州等地的铁路，（以掘断愈多为原则）割断所有的电线，毁坏邮局机关。在暴动尚未爆发之先，在离城与铁路较远一点的乡村，须尽量做骚扰与屠杀土豪劣绅的工作，分区开农民群众大会鼓动暴动，并告以暴动鲜明的目的，创成农民热烈的革命狂潮，然后可以成为真正农民的群众暴动，才可以保证暴动之胜利。在暴动开始时，即须正式宣布革命委员会领导农民暴动的目的，杀戮政府官吏（特别是各县的知事）与劣绅。各农民协会之下，组织土地委员会，分配备乡的土地，在未有农民协会的地方，即须组织农民协会。（3）暴动先取蒲圻咸宁，在蒲咸两城取得后，一面分军向贺胜桥，山坡，土地塘进攻，一面即取嘉鱼，崇阳，通城，通山四县。如客观可能时，则须直接威吓武汉，或进攻岳州，威吓长沙，否则分路抗守山坡，贺胜桥，羊楼司各处，从嘉鱼陆溪口过江，联络新堤，汨阳，潜江，江陵，公安，石首，各区土匪与农军，创成一独立之局面，最后如万不得已时，亦须退至通山通城一带之山上。（4）暴动的日期，暂定九月一号至五号之间。（5）暴动的内部指挥为鄂南特委员会，直接受省委的指挥，鄂南各级党部均归其节制。

（二）暴动纪实

1. 中伙铺劫车。鄂南正式暴动，是自九月八号晚之中伙铺劫车始。暴动日期原是定在十月九号，鄂南特委因是晚得到一个报告，听说该车运有现洋数万到湖南作军饷，以为可劫之以资我们的军实，未顾及整个暴动日期，遂于将睡时，决定劫车。当集中二三百农民，伏于铁路之两旁，以颈上缠红带为号，由黄赤光任总指挥，率八九十人武装上车，假十三军查车为名，做缴械工作，再由两旁农民拥起以壮声威。但此上车之八九[十]人，只二人能打枪，车到时即上车，赤光上前先开一枪，大声叫缴械，护车兵士惊惶不知所措，皆不敢动，将械完全缴得。两旁农民亦畏惧不敢动，再呼始上车。计缴得快枪十六支，子弹五箱，及收得三万四千纸币，八十六块现洋。是役也，有派去作军事工作之刘镇一同志，因路上盘查甚严，身着军服，与护车兵士同坐，知系我们所为，当赤手帮助缴械二支，亦甚勇敢，后农民上车，乱杀一场，杀中误杀了一个同志，镇一亦由是而获免。特委因次日（九日）为鄂南原定正式暴动日期，知是车为由武昌到长沙最后之车，其中恐有我们寄信之同志，恐将车扣留，遗误两湖暴动，遂让车仍放在长沙，而铁路电线均未毁断，结果又无意与敌人通了暴动消息。

2. 变更攻城之计划。鄂南农民暴动计划，原定暴动开始之第一日，即须

攻破蒲咸二城，以便在政治上号召鄂南的农民，创成鄂南整个的暴动局面。在劫车之日，咸宁县委书记杨其祥到特委报告，咸宁只能集中农民八百余人，不能攻城。此时特委书记吴德峰以农民畏缩，亦不主张攻城，黄赤光虽主张攻城，但不多言，只符向一一人力主攻，但也不是相信民群的力量，是怕省委的罢，就是失败，去由省委负责。结果，决定攻咸宁，以咸宁及通山县委书记太懦弱，加派刘镇一为两县党代表。至劫车之次日，九号晚四时，遂开始尽量毁跌路割电线，破坏一切交通，同时集中农军，由市农协到区农协来，而咸宁通山两县则以尽量集中为原则。是时蒲圻县城驻军，约二百余支枪，内中还有数十支枪为同志所带领，开一支[队]长联席会，决定咸宁两县攻城。后来敌人力量增加了，有枪三百余支，及二十多支盒子，机关枪二架，没有把握，特委遂变更省委攻城计划，决定不去攻城，只在各乡村去干，抛弃县城，在蒲通交界之山地，距城东三十里之西坑地方，于十二号另组织西坑革命政府以号召。同时，将特委迁至新店，要同人民自卫军合攻嘉鱼，再转回汀泗桥同咸宁农军攻咸宁。攻下咸宁，再回攻蒲圻。若攻而不下，则和咸宁农军集中通山，解决崇阳，过通城，联络羊楼洞及羊楼司之同志所带领的军队，去攻岳州，完成湖南之暴动。但特委到新店，即有人民自卫军之叛变，而有新店事变之发生。

3. 新店事变

(1) 和人民自卫军接洽经过，人民自卫军原为土匪团长刘步一，有三十八支快枪。先只有一个队长为同志，兵士同志有十三四人。后决定要干这个团长，乃将三个队长均换成同志，继以蒲圻县委以同志漆昌元与刘团私人感情，谓刘能受其指挥，漆为蒲圻县党部常委，省党部鄂南巡视员，其时在省党部，遂电昌元回蒲圻。昌元归[，]刘步一即示以十三军一百一十五团贺团长令其密杀昌元之信，表示诚意，并商进攻蒲圻之计划。中伙铺劫车事，彼曾派一班长参加，因此特委对之不疑。

(2) 被人民自卫军缴械情形，特委于决定不攻城之后，即将所有精华，往新店与人民自卫军集合，图合嘉鱼。先派鄂南第一路指挥兼蒲圻农军总指挥，王钟同志带领十六支快枪，九支盒子前去，不意刘步一被收买叛变，出其不意，毫无防备，将所带去枪支完全缴械。漆昌元及王钟二同志亦被牺牲。特委会次日去，因不见昌元面，疑有变故，因将来人皆住在山上，只留谢一寰及符向一二人去接洽。他们坚执要见漆昌元，刘步一伪以漆同志宴后酒醉未醒对，并说：“你们来了很好！我们即刻出来欢迎。”遂派了一个队伍“笛达笛达”地吹着迎号而来。一寰忽见其前面不远有一个兵士，来即跪下作射击状，并回头口呼“班长！班长！”似要射击命令的样子。遂告向一，立刻逃走，立时枪声即发，被捕卫队交通挑夫各一人，而特委则被打得四散。

(3) 自卫军叛变之原因，可分三点：1. 同志不可靠，在人民自卫军中的同志虽有二三队长及十余兵士，但皆是势力大小为转移者，并非对于团体有若何的认识。他们见我们的武器少，恐暴动不能成功，恐惧而不愿干。2. 他们也很知道，就是他们不干，我们也是必干的，干亦必解决他们，心里又此恐惧，遂想先解决我们。3. 劫车之事，他们参加了，没有分得着，心怀怨恨，就被收买来反对我们。

(4) 新店事变之影响。新店事变后，蒲圻农民群众参加暴动的，这是一天一天地变，约在二万以上，遍杀土劣和一切反动分子，所以军队仍困守孤城，不敢下乡。故此事变对于群众方面的影响，可说很少或者无有。惟其影

响于群众的指挥机关者极大。因为新店事变一来，整个特委瓦解，皆丢掉群众跑回省委来。先是苻向一、谢一寰等五人马上回省。继是吴德峰黄赤光等得咸宁攻城失败之消息亦仅决定一个各县工作原则：军队来时，力量小则与之为敌，大则逃去，而于十八号回省委请示。省委均令他们马上回鄂南领导暴动，但先后由阳新、大冶、九江三处走了三次，均未能到鄂阳，而大冶一次，苻向一黄赤光等四人还遇险，几被完全牺牲。因此鄂南暴动失了指导机关，一般同志及群众均不知所措，大军一去，遂归失败。

4. 取汀泗桥有驻军一营，地位异常重要，得知可以威吓咸宁。九月十号晚，由吴光皓率领三百人，快枪四十余支，余为土枪，五时吃饭，六时向汀泗桥出发。并先告该地负责同志，放炮放火，烧毁铁路以助声威。故到时即将汀泗桥包围，缴得械二十余支，杀营长一人及兵士二十余人。惟土枪队只顾抢东西，未捉住禁烟局人。在此地烧了一间最大的土劣张姓的房子。弄了千余纸洋，六七百块现洋。于十二号向咸宁布防，并派交通与中伙铺取联络。

5. 占马桥，马桥有驻军一连，非常恐惧，内中也有我们的同志，有一次加派一连人来，仅住一夜就走，所以要缴械是很可能的。后县农协给他一个哀的美敦书，提出四个条件，他们即刻派一排长来愿听指挥，惟无伙食费开拔。当给以三百元作了个情面，农军遂于十三日进驻马桥。

6. 攻咸宁，咸宁有驻军二连，官埠桥亦有驻军二连。决定在十五号晚一时攻咸宁，六时出发。由二路进攻，马桥有五六百人为一路汀泗桥有二三百人为一路。一人扎五个火把，七八尺高，负于背上，将火把遍插于城附近之各山，人即刻于无火把之处。土枪队由曹振常负责打南门，快枪队是由刘镇一负责，有快枪三十余支土枪五六十支。另派百余支土枪携带火把到官埠桥，会同当地农军，以牵制官埠桥之二连驻军。下午七时，刘镇一听说小龙潭，去时见无军队，直至咸宁。遇一步哨，见面即跑，即至山上散开，枪声一响，马桥及汀泗桥开来之队伍均响应。先是派有五人各带二十七元到城内买洋油起大火以作为内应。后回一人，说被打得不能前去，由十二时攻起，至三四时，还未见城内起火，天又将雨。其时火车忽开，闻敌人援兵已到，镇一已知不能攻下咸宁，遂下令先叫土枪队退。退有十余里，天渐雨，快枪队亦退，至马埠桥，天已明，大雨即来，整整下了一天。是后，快枪队很勇敢，惟土枪队一气跑回柏墩。在马埠桥伤农军三，死一人。咸宁虽未攻下，但已给一个很大的动摇，而各机关及县公署人员，一闻攻城枪声激烈，都已在那里准备退却官埠桥了！

7. 失马桥攻城后三日失马桥。是日先令曹振常将土枪队带至汀泗桥布防，刘镇一到前线看步哨，至距城七里之地，忽闻枪声，土枪队即四散，仅存十支快枪，是时所遇敌人约一连，系分三路来攻，镇一当令散开御敌，且战且退。敌人则冲锋前进。退至马桥时，仅余镇十一人。马桥已于是时失去。占马桥之部队系官埠桥之十三军，有土豪劣绅为其响导。失马桥时，未牺牲人，仅土枪队被夺。镇一等因恐马桥之敌将攻柏墩，乃至通山开军事会议，分五路布防，即回柏墩。

8. 失柏墩及白沙桥阴历八月二十八日，敌人分两路来攻。一路由濯港进攻白沙桥，兵力约一连。一路由汀泗桥进攻柏墩，兵力约一营。当由吴光皓率枪五十支距[拒]敌，战五六时，不支退却。军需处及各办事人员则由白沙桥退。由咸宁退通山者共五百余人，由白沙桥退通山者共土枪百余支。柏墩有二十余支枪上山去了，死者三人，当即开咸通负责同志会议，计划守通山

要道，叶城退于通山县东之二十里之九宫山。敌人当日未至通山，二三日亦未攻通山，遂复由九宫山返县城，进行工作。但大中学书记及农协负责人，均已逃走一空，且卷去烟土及手枪等。

（通山书记李良材，亦卷烟及枪逃走，其原因是李良材是汉川人，被捉之县长及征收局长九人，中人八人系汉川人，李想保护他们等，（德峰亦不想杀他们，以为这些是好官，将来可用作书记等），但镇一及通山农协委员会夏桂林同志，奉特委命令，将此九人枪毙，李遂逃走。镇一已下命令赶回杀之，但未追得。此时特委既无人负责，镇一等乃组织咸通农军军事委员会，负责指挥分五路布防，设总指挥一，集中粮食到九宫山预备敌人来时退守山，又派代表到通城修水等处接洽，因为失了上级机关的指导，不能不与各方面联络。

9. 通山工作经过通山于八月尾由县委与县长以同乡关系，说明政治概况，该县长即将政权让出，同时即将该县长[监]禁，以县长名义向土豪劣绅募捐以稍安其心，同时将交通断绝，并派农军严守四境，至九日即将该县长及各官吏枪毙，同时派农军二十队分赴各乡杀戮土豪劣绅，并没收其财产，计杀土豪劣绅一百余人。第二日即派农军帮助咸宁。

此后敌人对于鄂南，完全采用封锁政策，使省委派去之同志无法入境或不能停留，因此省委对于该区消息完全隔绝，失败之详细情形，亦不能知悉。据大冶之同志报告则通山失守后鄂南农军曾有一部入阳新，因阳新方面之农民不知此部军队之目的再土豪劣绅之造谣鼓动，遂至双方冲突，共死一二十人，鄂南农军退去。

四、结论

鄂南工作，为湖北各区工作之冠，但在工作中所表现之机会主义的倾向，亦非常厉害，不过因为省委的指导密切，特委中又有比较坚决勇敢的分子，所以该区的工作才能做起来。但在暴动之前一日——九月八

日，该区所给省委的报告，又充分表现机会主义的面目，所以省委十二号的信，早已预料“此次暴动，大体已归于失败”，因为既不相信广大群众的力量，自己又迟疑犹豫等没有坚决斗争的决心，自然不能领导那样广大的群众。结果，新店事变，果然因为军事投机的失败（勾结蒲圻人民自卫团，又被人民自卫团将漆昌元打死，缴去我们枪械）影响鄂南全区（把特委完全打跑了），遂至无人负责指挥，暴动失败此为最大原因。其次为各县党部的不健全，犹豫畏怯，不敢行动，迁延复迁延，至无奈何时，然后开始攻咸宁蒲圻，既与原定之计划不合，故敌个[人]能候铁路修复后，派兵二团来解咸宁之围。分配土地，为切要[实]工作，鄂南亦未切实注意此项问题。通山在我们手中的时期很长，对于此项工作，亦未积极注意。因此，鄂南暴动遂归失败。总括说起来还是机会主义的余毒作祟[崇]，其他技术的原因，则为没有加紧政治的宣传，一般军事工作人之不得力，交通不灵敏等亦为暴动失败的辅因。

鄂西区工作的经过

一、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动时之鄂西区

鄂西党的组织颇不健全，农运工运，均甚幼稚，再经杨森东下之蹂躏，更属残酷不堪。惟在武汉政府公开反动之时，该地驻军（第二军）对于民众尚未十分压迫，放民众团体，尚能存在；本党组织，亦未解体，（石首例外）不过混入了许多土豪劣绅与土豪劣绅利害一致的分子。

二、开始工作时之鄂西区

开始工作时之鄂西区，因特委尚未组织成立，乃派宜昌书记曹壮父指挥该区工作，并由省农部派出一二十人赴该区工作，但曹壮父始终未将该区工作情形报告省委，省农部不得已乃将派去工作的同志，于离武汉时，尽可能的分配他们的工作，指示他们的工作方针，并令其与鄂西区特委发生关系，如当阳远安施南鹤峰一带之工作同志，皆系省农部所直接派往者。八月十九日，得江陵县委书记刘植五报告江陵及公安石首等县之工作情形，说江陵县之农协，以前有百分之九十五均在新旧土豪劣绅领导之下。杨森东下。土豪劣绅公开反动，许多农会职员被土豪劣绅的职员告发或直接屠杀，因此全县农协瓦解。现在仅有二个区农协仅在我们领导之下，尚在继续打土匪，杀土豪劣绅。其余农民则不明了农协，甚至怨恨农协。该县土匪极多，不下四五千，大半在土豪劣绅领导之下，被二十一军及县政府所收编，反对农协。其余散处之上匪，则大半为杨森之残部。我们的武器，计有长枪五十余支，短枪十四支。另有一部土匪，约有枪五十余支，能受我们的影响。红枪会在江陵发展甚速，其目的为打土匪，曾为土匪激烈的斗争，虽受重大牺牲，迄不稍馁。此种组织，有一大部分在我们影响之下，因为打土匪即为解除土豪劣绅的武装，匪去则土劣亦潜踪，全县农民约三十余万，自耕农占百分之七十。县政府对粮税之浮收甚大，每洋一元，收铜元四串，约合当时之国库券四元，中央票二元，该县驻军约为二军第五师计一军一小部，约三四百人，暂编十五军一小部，约四五百人，二军对民众团体的态度是：不左倾便不过问，左倾而又有有人控告即调查制裁。二十一军是土匪，白昼行动。公安石首的农民很勇敢，在民校左派同志领导之下，（因我们在该二县力量甚小）杨森东下，农民曾与之作战数次，两县农民虽受牺牲，但杨军亦不敢入境。两县枪支，共约六百支，在县民校指导之下，系人民自卫团的名义。湖南清乡队曾越境来捕该二县农协委员长，发生数次武装冲突，结果农民及人民自卫军获胜。当时该县工作的计划。第一要拿武器，用购买或收编各种方法进行。第二是恢复组织，杀土劣及其所领导之土匪。第三作抗租抗税的斗争。

省委因当时江陵公安石首一带的工作与鄂南有密切关系，而鄂中区又不能兼顾该处之工作，乃决定划出鄂中之江陵，石首，公安，荆门四县及从前鄂西区之当阳，松滋，枝江三县，成立江陵区，先于八月半间派刘植五到该区工作，继乃派张继储为该区特委委员，在该区特委未成立以前，负指挥该区工作之全责。时为阳历八月底。后又决定将江陵区合并于鄂西区，以江陵区之特委为鄂西区特委。

九月初省委因鄂南暴动已将发动，鄂西区环境可作响应，乃派任某前往。任到沙市时，因据刘植五报告，当阳在群众三四万人，江陵有农民万余人，公安有农民二三万人，及枪三百余支，在我们领导之下，能受我们指挥，乃与该区负责同志，决定在十二三号开始暴动，以影响鄂南暴动，完成湖南暴动。

并决定以一、张计储、张善孚、曹壮父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驻江陵，二、革命委员会以特委三人及李莲卿、李式文、李超然及二军同志一人组织之。三、以曹壮父任总司令，李超然任总指挥。四、先骚动解决人民自卫团，十一日早公安当阳开始暴动；十二日早或[晚]大暴动，夺取江陵宜昌沙市。其他交通问题等亦有决定。

任回汉后，计储于九月九日来报告，满纸都是悲观话不相信群众的力量，

只想依靠军事的力量，说暴动好象是梦想，沙市同志仅二十余人而异常落后，该县农运，过去又比任何区还要温和，工人和农民普遍的没有暴动兴趣，而且没有得力的指挥者，一个人中什么用。又说：“总希望儿戏变为事实”。其所拟的计划，也只是一些空理论，附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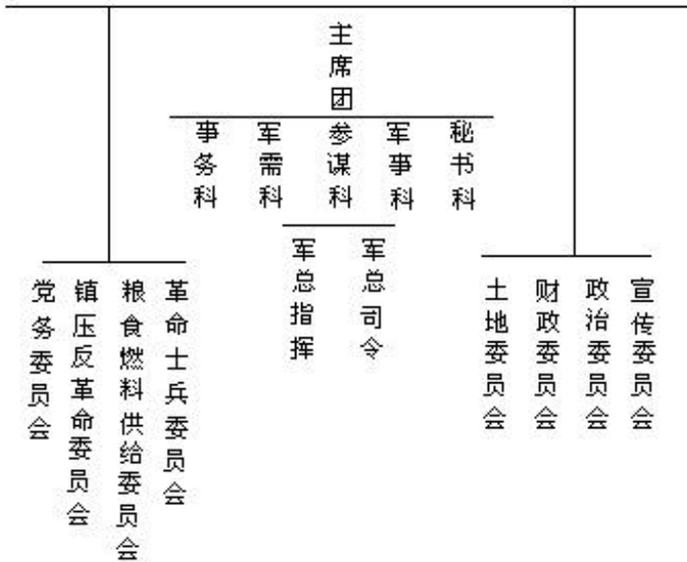
鄂西区暴动计划

1. 武装暴动不是儿戏，乃是最激烈的内战，是革命的艺术的具体表现。
2. 暴动须精确的计划我们的力量和敌人的力量，我们是以少胜人多许并乘隙袭击。
3. 暴动应丝毫不迟疑的，以最敏捷迅速的手段出之。
4. 暴动开始前即须杀戮土豪劣绅，以鼓动群众的奋勇，并没收其财产，作暴动时之经济。
5. 暴动开始，即须竭尽全力以取得第一次的胜利，以提出群众的情绪，尤宜于每次胜利后，作广大的宣传。
6. 维持暴动的胜利，尤难于暴发[动]发动，只有抓着暴动的中心，继续的发展暴动以维持群众的热情。
7. 在暴动中，应杀尽反动官吏土豪劣绅，并没收其财产。
8. 暴动胜利后，没收敌人（地主土劣等）的财产土地，土地在革命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管理之下。
9. 在暴动中，应无情的镇压一切反革命特设委员会管理之。
10. 在暴动中应无限地扩大农民革命军的数量。
11. 各县暴动胜利后，即宣布农民协会的政权解决土地问题。
12. 在暴动中应尽量破坏交通邮电税收等机关，并保守粮食燃料的供给。
13. 在暴动中绝对服从党的指挥。
14. 暴动胜利后，南北两区既分[即全]力合取荆沙。
15. 在暴动中，凡不为我们所需要的尽情的毁灭。
16. 暴动不幸而失败，凡丝毫有利于敌人者尽破坏，使反革命疲于恢复。
17. 暴动失败，集合所有武装上山，或展转集合鄂湘边界之交以完成一影响湖南之暴动。
18. 暴动指挥机关之组织（如另表图表）。

又说“希望省委能够命令张光丰派二三团人于十四日以前迫近沙市”，“不然，我们的暴动只有无疑义的失败”。……“很可怜的沙市工运，也指定了李焕青为工人革命军总司令，陈绪桂为总指挥。……做拜把运动团结群众”。又说“其次我们便是怕当阳方面的力量不足以夹击荆沙，……那两团人又不来，那我们就只有放弃荆沙在各该区活动，集全力以发展公安一方面的暴动。”

省委当即回信指责其两点错误：一、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此只计

革命委员会



算依靠在军事势力上；

二、似未有坚决领导暴动的决心，因此，在来信中满纸都是悲观话，怀疑又怀疑。并且告诉他：我们领导的农民革命纯全是群众直接的革命的。暴动必须要有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然后才有成功的希望”。……“农民并不是不要革命，亦不是害怕革命，问题在能否将他们的意识与要求总合起来，成为群众的行动。何况杀土豪劣绅是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如果我们害怕不敢坚决的领导他们起来行动，他们自然不起来了”。……“十号暴动是两湖暴动原定的计划，不能变更”。……“湖北的党如果不在行动中产生出来，依靠这旧的基础，湖北的党，就会根本没有”。对于该区之行动方向，省委再明白指示，如江南之公安石首，江北之当阳远安不能同时动作，则须集中全力发展公安石首监利一致沔阳一带的暴动，与鄂南连成一气，则势不孤。但同时须：一、不要忽视江北零星的部分的暴动；二、尚望特别注意湘西之华容，安乡澄乡一带之农民，与之联合，并领导发动其暴动，松滋枝江宜昌以至更西有力量的地方都要动作，如力不能攻城，至少须效土匪的办法，二三十人在各乡出没无常到处杀土豪劣绅，帮助农民抗租。又告以革命委员会之下不要政治委员会及镇压反革命委员会，因为革命委员会不管政治与镇压反革命还管什么？对于反革命只是一个杀无赦。

九月十一日，省委复派任某同黄鹭等前往，亲见公安第六区农民奋勇杀土豪劣绅，据当时之确切估计，江陵有农民二千人，当阳有二三千人，公安有四五千人，能够受我们的指挥，公安更有二千人可开到各县作战，同时该处土豪劣绅的同志，未得鄂南暴动失败的消息，尚能听我们的指挥，因决定该区在九月十九日开始暴动。

当时江陵各区之土劣，武装，群众之调查如下表：

弭陀市（？）第一次仅到该区之农民共有枪数支，公安方面尚未调到。最坏的是有群众的没有枪，有枪没有群众，因此不敢动作，诈称打土匪以欺该处驻军，然后才安全退回。直至九月二十三日晨，始将弭陀市攻下，惟纪律不严，农民尽将财物劫归自己，特委仅集中一万余串。任某走后，该区对于暴动又复延期。据其九月二十三日之报告，暴动延期之原因，为：一、该处虽有同志四十余人，均无暴动之决心与勇气，并有许多怀疑党的策略；二、

武装不易调动，又异常的缺乏子弹；三、经济非常困难；毫无险足以退守；四、四周多敌军，鄂南又未联络好，不敢轻进轻退，秦杜部队亦未集中；五、公安第六区之同志有以家室之累，消极宣传，使其领袖发生顾虑。因此，特委决定当时策略之两大原则为：（1）政治的鼓动，证明党的策略的正确；（2）首领人物的拉拢，逼上梁山的有步骤施行。公安的负责同志，则于前数日公开宣布下列各点：一、武装各区集中；二、四境宣布戒严；三、杀戮土劣充裕经济；四、拿住各区农运积极发展党；五、攻取弭陀市；六、缓和城内空气；七、随时准备听特委命令武装暴动。至该区准备要做的工作，则为杀戮官吏；毁灭税收机关，集中武装，授以军事训练，解决张玉龙匪军以壮声势；公开的号召群众照原定计划改编武装。得着鄂南的确讯即将大队开往鄂南；将公安全县西（退路）自申公渡，东迄壕河口（进路）藕池口成一横线，同时等候当阳方面来一致动作。以便声势更为浩大。

省委接得此信，乃又复以一函，令其即刻动作，原函如下：省委对兄工作有如下之决定，须切实遵行：

1. 信到之日公安方面即须开始动作，照两湖暴动计划及与旭兄决定之办法进行。须将县知事及一切政府机关职员杀尽，破坏税收及邮电机关没收其金钱；杀尽土豪劣绅大中地主，没收他们的财产，烧尽他们的房屋，分配土地；宣布组织革命委员会及工农革命军等，特委须勇敢坚决的领导此项斗争不能有丝毫的迟疑。

2. 暴动开始后的两三日内须号召广大群众，将乡村及城市的一切问题彻底解决，对群众宣布暴动，实行土地革命，随时随地均须尽可能召集广大的群众大会及党员大会，切实分配土地并发展有组织有训练的农军工军，普遍的成立农会工会等人民团体，加紧党的组织及宣传工作，吸收广大的贫苦的勇敢工人农民，须使整个党能领导此项斗争到底。

3. 暴动开始前即注意敌人行动，全县戒严检查来往客商邮电，派妥实同志四出侦察。暴动后尤须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派活动，分头解决各方面开来的敌军，此间得确实报告，宜都松滋枝江方面的十六军总共不过一千多枪，战斗力很薄弱；澧州虽为门师的大本营，但门师实力亦不多，亦不见得能开好多数军队来，二军驻沙者，只两营人，亦不足畏惧。兄方须放胆干去，敌人来则以逸待劳迎头痛击解除其武装。

4. 公安暴动的出路为鄂西施鹤七县暴动开始后即须向西发展，若松滋枝江的十六军不多，渔洋关并未驻重兵，我们的力量能解决他们则直接向松滋枝江两县杀去，再向西发展，各县同公安要一样解决土地问题；否则经两湖边界向西发展，超过渔洋关占据施鹤七县。究取何途请兄方斟酌决定。

5. 当阳亦须同样暴动，但暴动后要开到公安，恐路上发生问题，顶好能在远安当阳一带建设一个较小的暴动区域，暂不开向公安，系施鹤问题解决后同施鹤联络一气，或开向施鹤或逞向鄂西北发展联络鄂北一致行动。秦北问题听其自然，不能答应他们任何条件。

6. 在石首宜昌及其他各县须尽量组织农民游击队普遍骚动起来。

7. 农军组织，革命委员会组织及其他问题均照上次旭兄同特委各决定进行。

不久省委在派任兄前往，决定十月五号暴动，造成独立暴动区域及向西发展，并决定以后公安农民领袖为鄂西农民革命军总司令。因为具公安县委报告，杨云祥系一老同志，而杨又确实能够领导公安的农民，所以有此决定。

当时已有同志 143 人，决定在五号以前发展至五百人，十号发展至一千人，三号成立各区农协，六号成立县农协，召集群众大会。但自任某回汉，该区对于暴动的计划，又复加以变更。据该区十月三日之报告，则该区工作，又复发生问题：（1）计储与杨云祥谈话的结果，知他为五旬茶之正绅，勇于剿匪，热心农运，入党不久，不认识党和主义，表示愿随我们干，但不愿任总司令。自然不能胜任，后经军事工作同志会议，改任为付司令，计储拟再与之作深刻谈话，有否问题，尚未可必。（2）第六区的武装和群众，从前非常可靠，最近忽然变为最不可靠的，因该区负责同志有相当地位，觉得如果暴动，则个人牺牲太大，该区农协秘书李文良及第六大队长周怀亮遂暗地结合消极反抗。李文良更以家室之累，公开向农民宣传。周怀亮在军事工作同志会议上，表现右倾；回区后更伙同李文良找杨云祥开秘密会议，从事挑拨，他们现派人去找杨；如谈得好，则拟解决此二人。（3）军事工作同志会议于九月二十九日晚在郑公渡举行，一致表示接受党所指出之出路，其余问题，亦照党的决定通过。惟将总司令改界刘伯承，而以杨云祥为付司令；总司令之下设两路总指挥。一路为孙志豪，二路为余开勉。武装已集中了惟子弹缺乏，一般的群众大没有训练，难于打破家庭区域等封建观念。同时军事工作同志中，又发生派别之痕迹，更有同时自觉孤立，表示消极，并请调动工作，特委则在一面告诫，一面劝解，并拟派计储前往，作根本的解决。（4）农运方面，六区四十六乡均召集大会，四区仅成立三个乡农协，五区农协已成立，正积极筹备成立县农协。杀土劣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尤以七区为猛烈。第七区本无新式武装，仅由农民选出最勇敢的三十余人，组织暗杀队，每以土豪劣绅之手段回报，土劣则收买流痞为其工具，现已进行杀流痞之工作。（5）弭陀市之战，所得的只逼上梁山办法之一半的成功。该处来农民只四十余，但如果不能即刻为他们复仇，即有去而之他之势。江陵与公安两县之土劣，均互相结合，制造空气，勾结驻军向我们进攻。第二军三十六团，已由宜昌开到沙市，进驻沙湖坝与弭陀市，向公安取包围形势。湖南方面则有令门师围剿邹资生之说。（6）宜昌报告：二军反动；骚动已开始，但无所得，复因环境恶劣，已由同志将二十支驳壳，二支手枪，二支步枪带领山上。经济困难，请予帮助。宜昌市委因该部人马不能自给，有令其解散之意。特委乃为他们重新决定两太原则，四个最低限度之目的，六个具体的办法。经济援助则不能为力。当阳无报告，闻秦虽已拉入学校，但有两个最难办到的条件。远安当阳方面，新式武装可集合二百余，群众可调遣者尚不在内。已派壮父前往调动，如不能，则听其留其当阳动作。（7）约鄂中区会师藕池口，解决门师的两连人，然后一路去湘西。至于今后工作的策略，则因施鹤七县仅驻有少数的十六军，鹤峰并为前在贺龙部下任旅长之王某，带农民自卫军（有枪三百余支）驻扎。湖南龙江亦为一比较进步之团防局势力范围，此两部均可接拢。来风我们能指挥的有二百余支枪，巴东之十六军，湘西之陈渠珍部，均系反唐武力，因此特委决定贺龙参加革命委员会以资号召。又外县党部最近有直接发生关系的可能，并闻有四五百同志，因此，又拟联合起来，共同解决门师，进一步解决戴斗恒，盘据湘西，徐向鄂西发展。现已派杨礼贤到施鹤活动。特委迁往军事集中的场所。（8）定于五号召集负责同志会议。

省委得此报告，后派任某前往，当时能受指挥之农民群众，第一区尚有六百人，第三区尚有一百人，第四区尚有一千人，第五区尚有二千人，第六

区尚有四千人，第七区尚有一千人，第八区尚有一千五百人，武昌方面，第一区有枪八支，第二区有枪八十至一百支，第三区有枪一百二十支，第四区有枪五十支，第五区有枪一百支，第六区有枪十五支，第八区有枪三支，主观上仍有暴动之可能，仍决定暴动，日期已定，适值大风雨，不果行，初准备拂晓即发动攻县城，在此期中，后得报告，说樊学赐对于本党策略完全反对，省委代表任旭及特委书记张计储坚决主张仍要暴动，解决樊学赐部，继续坚决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但因须有广大群众参加，惟任旭回省后，至今未得该区报告，兼以二军最近又开一师人到沙市，该区暴动工作，恐即将因此而延未举行。

三、结论

鄂西区之工作，一再决定暴动一再延未举行，其原因为机会主义及畏缩心理之作祟。党为土豪劣绅所侵入，亦为最大原因。第一次决定暴动，虽刘植五之报告的不确，但是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该区负责同志第一号报告，充分表现不相信群众力量，只希望军队开到，实为不能行动主要原因。第二次决定暴动，客观上亦有充分的可能，无如机会主义之毒仍深，故所有计划，悉成具文。第三次决定暴动，后杨云祥之动摇，及负责同志畏惧无险可守，无路可退而停滞，其实只要能够干起来，何尝会没有出路。第四次虽已决定暴动，但因重兵压境或恐不能举行。该区机会主义的留毒甚深，同志又非常胆怯，再加以上豪劣绅之同志之叛变，本不易举行骚动工作，造成今日之局面。（虽然这个局面不算好）该区工作之能够起来的原因，实由于省委常有代表前往，指导得宜，——这即可以证明省委策略之正确。最近该区负责同志，已渐将机会主义之留毒拔除，有坚决领导农民革命之决心，如能继续坚持，该区暴动，必于最短时间实现。

鄂东区工作的经过

一、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动时之鄂东区

当叶挺贺龙两部东下，中央及鄂省委即会同决定派人将不能在鄂东保存或藏匿之武器，不能立脚之同志及工农一并带往贺叶军中。不料执行命令者，竟将所有武器及一切负责同志，勇敢工农完全带走，于是鄂东之党务工农运动，遂悉随贺叶东下！及贺叶在南昌独立，鄂东区本为当时之重要暴动区域，但省委派到鄂东各县工作同志均不能接头而返武汉。即从前有一二千人组织之县分，也连影子都找不着！省农部不碍已乃改派鄂东同志，回乡就地工作，亦因此种困难不能行能起来，后省农部又派梅电奎巡视鄂东，督促各县农委工作，但得其九月四五号送来的报告，仅在黄梅武穴二处与当地党部接头，派人指挥农运及组织暗杀队，因个人力量有限，乃要求组织鄂东农运指导委员会，分赴各县，指挥工作。省农部当即承认其请求，指定梅为书记，并附其立刻行动起来，但后未得报告。开始工作时之鄂东区，即在此种混沌状态中。

二、分区后之鄂东区

省委因鄂东区工作毫无起色，鄂南区已将开始暴动，鄂东区之工作逐趋重要，乃将鄂东区分为三区：

A、大冶区以施炳乾为书记，王觉新林育英为委员，组织特别委员会，指挥大冶阳新鄂城三县之工作。施等于九月六日到大冶，九月九日来报告，摘录如下：

（一）政治情形：鄂城阳新县长较好，大冶县长，完全倾向土豪劣绅方

面，建国军有一部分在大冶城，人有百余，枪仅十余。闻石灰窑一带，昨亦开了一部分来。在城军队，不多出城，但见工农到城，即追问从前枪支。

(二) 反动派情形：鄂城不详。阳新前因土劣在城开会想危害同志，被同志在通城活动得二十余支枪，杀了四个土劣。大冶前因前公安局袒护商人，不收钞票，工会数百人跑到黄石港打伤公安局长，捣毁公安局，商人并罢市两日，其余市县党部改组委员会闻正在活动。

(三) 工人方面情形：石灰窑一带已有四厂开工，工人约近六千余人，经过前日公安局事件后，又有一厂实行废除从前工会签约。汉口工会派特派员来冶，大摆其官僚架子，工人多不理。彼昨日返汉，闻拟再邀人来进行改组。工人同志尚有人，并能起作用。

(四) 农民方面：田主在八月间，即乘反动政府气焰勒令交租。有得吃的农民，一县不及十分之二三。

(五) 党务概况：各县组织全部倒台，惟已找得负责人地点，并已找得几个人。

(六) 工作日程：第一步建立秘密机关，分别与外来同志谈话，问他们过去工作经验对政治态度和党的意见，并分别编组。第二步开了一次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内外都有，分配了各人工作，并责成即时分途活动。第三步开全体会议，问他们活动经过并决定正式行动期间及方式。

(七) 略

(八) 困难之点：甲、武汉距此过近，而且三县都沿江，无掩蔽。乙、时期过近。丙、三县原有人一时不易找着。丁、过去工农冲突余痕伏在群众脑中。戊、过去负责人信用失尽。有上列各点，如果轻易行事，只是领袖的，外来的非群众的，而且将来反引起群众一个压迫，失尽党的信仰，并在军事上影响到鄂南；如果不快干，又不能引起鄂南工作，所以订出工作计划上的最高的与最低的目的，分别步骤进行。

(九) 顺利情形：甲、同志向外表现均好。乙、工人领袖尚能找着得力人。丙、各方均有办法，不甚束手。丁、江北一带尚有办法，如果联系得好，或者可以成鄂东主要势力。(下略)

又于九月九日得该区工作计划报告如下：

- (1) 根据地——1. 江南设大冶
2. 江北设罗田
3. 交通处设黄石港

(2) 工作目的——1. 最低限度指挥农民铲除土劣，指挥工人示威反抗取消工会及要有一切保护工人利益的签约。2. 最高限度引起农民工人组织工农政府，工农革命军，推翻现有政府及民众团体组织者。

(3) 工作原则——1. 在鄂南势力不能镇压武汉仅能保存自己的实力的，以达到最低限度目的为限，方可以掩护鄂南，并免至引起农民遭大屠杀，对本党愤怒，并引起大军压迫，影响鄂南。2. 在鄂南势力可以镇压武汉时，即实行最高限度的目的，如此，事实可以用农民本身力量，解决一切。

(4) 工作步骤——1. 江南鄂城阳新大冶三县，首先布置，以大冶为中心。2. 在江南稍有头绪时，即派人赴江北各县活动，以罗麻一带山乡为根据地。3. 江北黄冈蕲春广济黄梅因交通不便外，其余罗田麻城蕲水蕲春工作比较积极，不必以最低目的为限，即实行组织工农政府解决一切。

(5) 进展准备——如武汉受鄂南大压迫时，即是要有江南江北各县农民

工人，纷起夺取县政权，并组织大批工农军，随同所能影响军队，向武汉进攻。

(6) 失败准备——1. 失败时江南方面向鄂南退却；2. 江北方面向鄂豫边境退却。

(7) 军运策略——1. 三十三军阵垒有军一旅，驻扎英山，可以找出关系人前去接洽，授以中华革命委员会直属第×师名义，招致为我们所用，如能成功，并可以影响李乾玉一部军队。2. 如陈接受委任，即可直接调动到鄂东一带，沿途引起农民军直攻武汉，策应鄂南，或向鄂南集合，在不能取得胜利时。

(8) 农运策略——先派负责同志以革命委员会名义向各方面活动。1. 按照客观环境，如能实现最低目的时，即组织特务组于最短期间，一路杀去，并散发口号。2. 各地同志，就地在下层鼓动，以他们自己的力量，没收地主则“产，接收乡村政权。3. 客观条件成熟，即引农民力量进攻县城夺取县政权。

(9) 工运策略——1. 引起工人领袖，在象鼻山、汉冶萍、洋泥厂等处，做反抗废除签约运动，反抗改工会运动。2. 进而宣传最高目的，引起工人暴动。

(10) 党的工作——指定各县同志，恢复各县组织，同时并给以革命委员会名义，进行战时的党的策略，不论成功失败，各县秘密组织必须建立。

省委乃于九月十六日复该区一函，指出其不相信群众，坐待农民自己起来的错误，并指示其工作计划，原函摘录于后：

几次来信均收到，九日计划亦收到。我们感觉你们在大冶一带，并没有什么工作，除了天天坐在家做计划，便没有一点事情，不然，几次来信，为何一字也未提及工农群众的情形。你们这种脱离群众，不要群众的官僚知识分子的办法，使我们非常失望。你们所说的话，都是机会主义的话，绝非CP党员应说的话，因此，你们的计划也是机会主义者的计划。……你们的计划分为最高限度最低限度两部分，纯以鄂南行动为转移，换言之，即纯全依赖鄂南。此等等待而不深入群众的观念，绝对错误。试问鄂南又将等待何处先起然后行动？……农民并非不要革命，杀戮土豪劣绅，抗租抗税是农民普遍热烈的要求。不要革命的是CP的负责人（如你们这样的）。自己天天坐在这里，不与群众接近，反说农民害怕。……我们的责任在：引导农民抗租抗税。杀土豪劣绅以致暴动。并不是等待农民自动起来以后，要我们去指挥他们。农民如果自动起来了，要我们做什么用。难道他们自己不知道当领袖吗？如果存这种观念，真是大笑话，应当开除出CP。…希望你们一切行动，都从群众的要求出发，万不可从无用的知识分子的官僚式脑子里中出发。至于兄处工作，应即执行下列各项：

1. 在各乡组织游击队，十人至多十五人一组，出没无常杀土豪劣绅，烧地主的房子等。因为如此才能引起农民总的斗争的兴趣。

2. 在各处部分的总的帮助农民实行抗租抗税。

3. 在农民群众中宣传下列口号：暴动杀尽土豪劣绅，暴动实行抗租抗税，暴动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暴动实行耕者有其田，暴动实行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打倒唐生智。农民革命胜利万岁。这许多口号，在每次游击队行动的地方，尤须特别张贴。

4. 在军队的势力微弱的地方，须很迅速的的组织农民去缴械。

5. 工会运动须加紧经济斗争与秘密工会的组织。

6. 如从大冶一带派兵去打鄂南，则须尽力做骚扰工作。

7. 你们的一切费用，都要由你们自己设法——没收土豪劣绅财产（下略）。

其后来一报告，说要九月初一暴动，做挖毁铁路等工作，并要派能指挥一营人的军事工作同志去指挥。熟知事后竟动而不暴，事先无一点准备，事起仅散了些传单，贴了几张标语，及一人在东关天主堂抛了一个炸弹，割了几根电线而已。事后据该区特委书记在省委常委会上之报告，始知大冶所谓暴动不但不是群众的暴动，连 CP 党员的暴动都说不上，只是一个勇敢的同志的暴动而已。尤可怪者，据派去作军事指挥工作的王焕章的报告，说大冶在暴动之先，还由负责人陈宏周通知未负工作负责[任]的同志离开大冶！据此，则大冶之暴动，不过是一个机会主义的而[儿]戏罢了！兹再将王焕章、宋觉世、程俊三同志之报告摘录于后，以见大冶暴动之真象。

王焕章之报告：

大冶：反动势力方面：

（一）省警卫兵一连原系在大冶黄石港石灰窑三处分驻，现均调至城内。有枪，但战斗力小。

（二）县警备队约三四十人。

（三）土劣各村皆有，势力大小不同。反动的方式是利用宗族观念，号召多数无知识的贫苦农民，纠合起来，向革命的农友及以前在农协负责的同志用暴力进攻。

我们方面：

（四）工友能在指导之下负担工作，约二三十人。（没有武器）

（五）农友在当地负责的人——程俊，借名陈群芳，又陈春肪，陈宏周——尚无切实的数目，也是没有枪，武器只是手义子，枪。（土枪）（？）

（六）土匪也没有确实数，多半是城厢流氓分子，也没有枪。

（七）红枪会无。

（八）我们的同学[志]负担工作的——指最近——在十人以下有（自来得）手枪一支，子弹二十粒。

新阳反动势力方面：

（一）军队无。

（二）县警卫队八十余人，枪八十支，有二三十支不能射击。

（三）土劣情形与大冶同，势力较大冶大。最近猖獗最狠的是曹家弯的曹博哉。（事实另详）

我们方面：

（一）工友约数十人，都是城关的小手工业者成分。（没有枪）

（二）农友方面也没有切实数目，但有几个前进很觉悟的分子。武器与大冶同。

（三）土匪城内约二百（？）也多半是流氓成分。武器是小刀子。

（四）红枪会无。

（五）我们的同学[志]在乡间负责的有曹振亚，曹汝实，程俊。（我仅知这三位。）城内有两位从上海来的同学，负骚动责任，还有侯步华。（其余的我尚未见面，也未说姓名。）

此次的暴动：

我原赴大冶的时候，周茂芳，赵慕龙两兄对我说，教我负担冶、新、鄂三县的军事工作，并对我说已定于阴历九一工作那方面有土匪，红枪会，工农，并有枪一百多支（内有土枪）。及至我到那里，才知道仅有四支自来得，一支步枪，弹药都不多，并且不能集中。能负担工作的分子也不多，并且程俊兄说明此次已决定暴动。在当时根据各方事实问题，我想不会动出一个相当的成绩出来，还恐怕招一个分子上的损失或以后工作上的困难出来，但已不能再由任何人有暴动以外提案了。

程俊曹振亚两兄，因尚未通知大冶方面的暴动方式，所以写信通知阳新方面，衍期一日——九二——。关于大冶工作，是一部工友破坏电线铁路；一部散传单，标语，一人在东关天主堂医院行使炸药的破坏，在事先他们已暂离大冶。九一没有什么声响，九二上午也没接到阳新的回信。究竟昨夜——九一——暴动了没有？是不是就按照程俊的信在今夜暴动？所以非常纳闷。初二初三初四这三天又没有得到阳新大冶的消息，初五一早得到一个很不详细的大冶报告，是大冶已于初二夜里暴动了，被捉去了一二十个人（据说内中有同学及两个民校左倾分子，还有不相干的人及两个乞丐）初三初四两天，共干去了十五个。曹弯反动分子之行动，就是使了大冶省警卫队壮着胆，各村反动分子皆跃跃欲试，阳新的消息，仍在沉寂。初八听得消息阳新没有行动（下略）

宋觉世的报告（十月念一）

此次公威叫我到阳新工作，以往的情形报告如下：

（一）组织阳新同志虽称有两百余人，其实有多数不敢出头，甚至往日负责的朱伦，到现在变成反动的，能工作或服从命令的，不过十余人，所以各区组织停顿着不能恢复。

（二）反动势力：以阳新为最凶，在我们未经行动以前，当地土劣流氓已烧陈安邦同志之房屋，捕拿林少敬同志，及至行动以后，又烧施元卿农民房屋三百余家；龙山镇上劣将党员房屋封闭，并要捕杀，凡是党员，皆控为共。

（三）民众信仰：民众对于我们的信仰很坏，凡是谈起来，都大罢特罢，一方面是由于没有认识；一方面是由于受了上豪劣绅的蒙蔽，再一方面则为由于我们从前在应口的行动不受约束，不分皂白的烧房子。

（四）桃花涧运动：由刘子立同志有一族兄系一般匪中之头目，到桃花涧接洽，已有把握，惟须百串以上的开拔费，他们不能筹，所以没有开过来。本预备着刘子立到松涛那里打个领条，到沂州取洋数十元银一锭，约计百元，后因当天无人带信，至第二日晨七时，军队到了，大施捕拿，该地负责人曹振华走了，所以桃花涧的事也不成功。

（五）龙冈镇的武器：公威带去的武器，龙山镇保存一支，由宋朱两同志带三支赴龙冈，又由刘子立私人买长枪九支，共计龙冈长短枪十二支，已叫陈安邦带信给刘将该项武器暂藏，现陈来电，谓已被捕，不知结果如何。

程俊的报告（十月二十一日）

（上略）骚动情况：自鄂东指导委员会决定鄂东暴动响应鄂南后，大冶本无能力进行，不过位置最重要，交通最便利的大冶不能不有所举动，以牵制敌人，乃想尽方法，找着了十多个同志，布置各方，准备行动。大冶本有驻军一连一排驻县城，两排驻港窑。我们准备是阴历九月初二晚，在县城放炸药，并有枪数支，红门会多人，先将驻县城的一排军队解决，同时将两条

铁轨弄断，待县城发生大的变化时，港窑的两排军队，必调遣到城镇压，路径弄断的铁轨，当然消灭于出轨之下，同时各处的电报电话打毁，倘不能胜时，至少可以使他们的孤军不敢行动，余如恐吓的信件，以及传单标语多种，均位布置妥贴，准备初二夜行动。不料他于初二日上午将港窑的军队，完全集中县城反动的力量加厚了许多，如果我们不得不临时变更策略，——骚动。乃于初二夜放了炸药，散发传单标语，铁轨电报电话，均已同时弄断。县知事当晚逃走，三四日后始返县，军队则日夜戒严，大捉特捉，幸行动的同志，当晚均已离开县城，只有一姓赵的同志被捕，用洋七十元得释放，其余被枪决四人，被捕十余人，均是局外人。现在他们犹豫。在戒严中，并将大冶与阳新相接界的金明之水，不准开闸放出去，恐宁山的军队由阳新直攻大冶。

（下略）

（一）黄靳县黄靳县的工作，在该区特别委员会未组织成立以前，省委决定派梅电奎负责指挥。同时并写一长信解释土地革命之意义，并指示其工作，原函录下：

（二）中国革命，现在已进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所以本党在湖北的农运策略，一月以前，即已坚决决定：领导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到处杀土豪劣绅，断绝水陆交通，破坏金融抗租抗税，破坏一切交通机关，引起乡村间大的暴动，准备全省大暴动，推翻武汉政府及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革命平民的政权，此事兄方当已知道，现在湖北的环境依旧是很好的暴动局面……武汉政府各方面均已陷于危境，只要我们能够坚决的起来，领导农民干，湖北的工作是很有把握的。……兄到鄂东一带甚早，对于省委农运策略，想已切实执行。如尚未开始工作，即须立即开始，从斗争中发展党和农民的组织。目前尤须加紧宣传工作，随时随地用各种形式召集同志和农民开会。由党对群众宣布抗租抗税抗粮抗捐，实行政权归农协，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用暴动的方式推翻武汉政府，以完成土地革命。工作开始的区域，应在黄梅武汉一带，将忠实勇敢的同志，组织农民游击队、暗杀队大举骚动。每队由五六人至一二十人，有枪一二支即可行动，出没无常的杀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并没收其财产，抗租抗税尽量扰乱或破坏交通邮电税收等机关，没有力量时，避免同军队冲突；有力量能解决某部分军队时，则须毫不迟疑地干去，但在技术方面的准备，须十分周到。游击队暗杀队的工作，一有头绪，即须组织农民革命军（秘密或公开斟酌当地环境而定）准备大暴动。兄处的中心机关，以建立于黄梅广济间为适宜。（下略）

后不久又致电奎一长信（由志敏转致）如下：

（一）日前农运的策略，已一再函告你们，务盼很坚决很勇敢的干去，不要有丝毫的迟疑。在行动开始前，固然要进行恢复党和农会组织的工作，但不可因此而迟误行动的日期。鄂东黄梅麻城黄冈一带主要的工作为组织农民游击队，普遍杀土豪劣绅大中地主，烧他们的房屋，没收他们的财产，解除他们的武装，分配土地，破坏税收邮电等机关，可能时则占据县城，杀县知事及政府机关一切职员，解除陆军武装，组织革命委员会及农民革命军，解决城乡一切问题，前一步即有所谓骚动，后一步叫做暴动，要由上述斗争中，才能恢复并扩大民众的组织，才能做到全省大暴动。

（二）在斗争开始前及其过程中，须要加紧群众的宣传工作，尽可能召集党员及农会会员大会，党要对群众公开的宣布由普遍的骚动发展到大暴动才是土地革命，才能解决土地问题，第一步分配土地。党要领导此斗争到底，

要号召很广大的群众，做成群众的暴动。

（三）过去黄梅有三千多同志，有十余万有组织的农民，据来的同志说，土豪劣绅虽有组织，但异常涣散，力量很薄弱，只要能够普遍地发展骚动，不难将其组织扑灭。这是不错的，但尤要很快的发展骚动，才能容易将其扑灭，否则他们天天向农民进攻，农民并不反抗，结果，他们的组织日益稳固，农民则更难行动矣，这是各同志很要注意的。

（四）不久以前，黄冈有同志来报告，谓黄冈不但能骚动并且能同麻城联合为一个较小的暴动区域，麻城的党及群众都很好。县城北乡已杀尽土豪劣绅，进行分配土地。似此麻城黄冈一带比黄梅、沂水、岢春、广济等四县的工作，尤为紧要，如果各该县同志的报告，麻城黄冈、罗田、黄安四县，及河南商城，确为一暴动区域，前派志敏同志去主持，现尚未去，甚为可惜。此信到后，志敏须立即前往会同各该县委主持将黄梅一带的工作，交由梅电奎，张获百，周治诚及农民中最勇敢的同志（农民领袖）主持。获百可兼黄梅县委书记，治诚可负农运责，电奎须注意全区四县的工作。

（五）麻城黄冈四县，最好能够成立一独立局面，占据县城，发展土地革命。

（六）黄梅同麻城的工作，不管有无头绪，均须立即将实际情形，用书面报告寄来。

（七）黄梅已有几百农民作基本队伍，又有猎枪刀矛，同志的数量，据云尚有一千之众，普遍发展骚动很容易做，电奎须十分努力十分坚决的干去。至于枪支问题，因为运输不易，不能送来。行动的第一个条件是群众，不在枪支，今既有群众，又有旧式刀矛，骚动不成问题，随时又准备夺取敌人的枪械，南古角方面，土豪劣绅有十五支枪很容易夺取可斟酌进行，但要夺枪时，须要很勇敢的同志担任，技术方面更要做周到点。

但此二信去后，均未发生作用，该区负责人，仍未懂得什么是土地革命。据吴致民九月二十一日交来之报告，该区仍在机会主义的漩涡中，其详情如下：

（上略）

（一）黄梅：

党的组织：自三十五军在梅屠杀后，一般同志，多逃出境外，后由省方派回多次同志，才开始工作。同时三十五军已开往安徽，逃避及藏匿之同志，方敢稍稍出头。电奎到县即组织临时县委，及致明到县，电奎已他去了，乃决定邓步青为书记，张获百军事，石烈凡农运，并决定其工作步骤：（1）恢复组织；（2）扩大宣传；（3）设法领导农民暴动。致民乃由梅到武，于昨日又到梅，见县委工作无进步，只有计划而无行动，负责人又多胆小，轻易离开职守。四乡农民则有话无处说，要干无人领导。致民乃与获百决定将县委改组，书记石烈凡，农运张森军事程俊魁，至于在家同志尚不在少数，但仍漫无组织，乃决定三日内将城内同志组织起来，再将乡间同志组织起来。

黄梅农运情形：过去黄梅虽然经过实际斗争，能够了解而且可靠的农民固不在少数，但因负责同志工作的错误，引起农民的误会，以致于反动亦复不少。过去农协六个区协，在现在工作仍未停止为第六区。这区内一部分蔡山的农民颇可靠。其余皆停止工作，有把握可以恢复的为第五区之濯港一部分及四区三区之一部分，但另有部分农民，则受土劣指挥向我们进攻。

土劣情形：他们过去受我们的打击，多逃出境外，现均回乡大举活动。

第一步土豪绅士指挥二等绅士出来组织治安维持会，看我们无反映，第二步他们即亲自出马，他们的计划都已实现了。曾经利用一部分反动农民向我们示过一次威，不过他们的组织还不很坚固，他们很害怕我们暗干，再其次，就是他们的利益有冲突，但总是极力向我们进攻。

目前我们的工作计划的纲要：（1）健全县委；（2）整理组织；（3）扩大宣传；（4）秘密或公开的恢复农协；（5）乘上劣势力尚未稳固时即予以打击；（6）具备实力准备暴动。

（二）黄梅：

党的组织：过去党的组织完全没有基础，同志仅有十余人，且

[但]多小资产阶级的成分而带有纨绔子弟的习惯，严格上说，还够不上国民党资格。自三十五军过去后，一切工作完全停顿，致民此次到后，乃将其组织恢复，成一特支，规定他们工作原则：（1）整顿组织；（2）训练同志；（3）扩大组织（注意店员及码头工人）（4）造谣扰乱金融；（5）到附近农村活动；（6）调查来往军队的一切情形。一星期后毫无行动，致民依旧照上列计划加紧督促。但此地同志，大都入党不久，未受相当训练，很难活动。

工会情形，工人大部分为店员，多数极不革命，难活动。码头工六七百人，多为附近农民，生活不痛苦，是流动的，不十分革命，手工业工人更形涣散。现已决定该处党部注意店员和码头工人。

反动势力情形：武穴过去没有激烈斗争，所以反动势力不厉害。最近咸通方面逃来之土劣，亦仅能造谣。

（三）广济：

党的组织：自三十五军经过后，遂引起三十五军肆行反动勾结土劣，拘捕党员，负责同志事先逃避，组织几至涣散，后陈赤由省来济，乃决定王材栋，戴凯华，饶华为特支负责人，王为书记，惟因与省委消息不通，陈赤要他去，工作等于无。致民到济乃决定仍由王材栋负责，将同志加以清理，现在同志二十余人，有能力而忠实勇敢的只有杨正国一人，王材栋只能说上忠实，计划还须杨辅助，杨又因色采太浓，几不能在县立脚，故广济党的组织仍觉薄弱。

农运情形：在四五月中，因民校负责的同志与农协负责的同志发生冲突后，引起极大纠纷，农民且对民校负责人用武，因之农民起了误会，工作完全停顿。过去全县分十区，仅有八区的祝坪，六区的郑公塔两处作过打倒上劣之实际斗争，在目前还有恢复的可能。此外则均属消沉，且渐趋反动，因土劣利用宗族观念，勾结他们向我们进攻，广济农民，多于私斗，武器极劣，且多为土枪刀矛等。十八湾有快枪数十支，在大姓周氏的农民手中，过去不加入农协，用枪为祖宗或一族争面子则可，用之作政治运动则绝不可能。

上劣情形，向我们进攻不如黄梅之猛烈，军队去后更形和缓，现在在排斥县行政机关中的青年而自代之。八六两区土劣反动较甚，但不是有组织的。

目前工作纲要：（1）整顿组织；（2）扩大组织；（甲）县城注意烟业会员与烟业工人；（乙）乡村注意吸收忠实农民；（3）注意宣传（多到乡村去解释过去错误）；（4）打击土劣；（5）尽可能的恢复农协组织。

（四）蕲春未会着一个人，不知情形。（下略）

省委得此报告，乃于九月二十六日复他一函，痛指其错误，并令其立刻

进行杀土劣的工作，原函录后：

你们八月二十一日来的信，已经收到了。兹将来信上的几点错误指出。

(一) 你们的工作计划上的：第一步恢复组织，第二步扩大宣传第三步领导农民暴动，这样计划，实在太笑话了，而且并没有中心问题。纵然是要保存组织，那便必须要从奋斗中才能保存，不然便是消灭主义者。现在中国革命，已经走到农民暴动的土地革命了，并且这革命已经有了广大的发展了……你们应当从领导广大的农民斗争中来恢复我们的组织。你们应当在领导广大的农民暴动中来恢复同志。在行动的时候，你们却不要忘记政治宣传，并且还要加紧政治宣传。(口号见后)

(二) 来信上说：本来是要暴动的，但因无军队领导，恐难实现，已与三十三军某部接洽，就等一千元。这是绝对的错误。暴动是要农民干起来的。武器是要从敌人手中抢下来的。你们这样那里是暴动呢？完全是军事的投机，并且是军事投机的梦想家。暴动应当以农民群众做主力来领导，在暴动中来影响军队。利用军队是可以的，万不可以军队来做主力。

(三) 来信上，统统未有只字叙到群众二字，只见一系列的土豪劣绅的进攻，而且并没有见到你们杀了一个土豪或劣绅。你们说你们本来要暴动，真不懂你们如何的暴动。要知道暴动是要有广大的群众，是要多杀土豪劣绅的。

(四) 关于经济问题，此问题是要你们自己解决的——杀上豪劣绅没收其财产。

目前你们的工作应当执先以[行]下的几点：

(一) 领导农民抗租抗税

(二) 组织暗杀队(十人或五人)编成队去暗杀土豪劣绅，杀后没收其财产，并遍贴下列的口号：

- (1) 杀尽上豪劣绅
- (2) 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
- (3) 实行抗租抗税
- (4) 打倒武汉政府
- (5) 打倒汪清卫
- (6) 打倒唐生智
- (7) 不用一切钞票
- (8) 建立农民协会政府
- (9) 农民革命万岁
- (10) 革命委员会万岁

(三) 破坏交通金融——交通尤其是邮电。

同时来人口头报告，说黄梅工作，离不得致民，适麻城有李济堂来，省农部遂一面叫李回麻城，暂代致民工作，一面如黄梅工作的确离不得致民，则致民亦可暂不离开。后至十月八号，该区开始行动起来，初得交通口头报告，未敢相信，附其速回，带详细书面报告来，继得汪玉堂来报告，只知孔苍镇失败，未知县城方面之情形，省委遂决定派符向一为鄂东江北二区之特派员，同时交汪玉堂带回一信，指示该区之方针：1. 如孔(龙)公安局无防备，即先缴械去杀土豪劣绅引起农民群众，联合初八夜攻县城之百余支土枪进攻县城，如已有防备，即马上杀上劣，号召农民群众，进行缴得公安局(械)后，再攻县城。2. 如攻下县城，即占领骚城，到四乡一面杀土劣，一面号召

农民开会游行，并组织农军进行分配土地工作。大军来，不能抵抗时，可向麻城一带移动，但须沿途杀土劣及分配土地。3.如攻城失败，即在四乡实行游击战争，杀土劣，号召群众，能占得一乡算一乡。此信去后，得致民等详细书面报告，知黄梅近况如下：

（一）过去号称同志三千，群众十余万，但自政变后，经三十五军在孔龙镇杀同志五六人，黄梅工作，遂即消沉。近来只有群众二三百人，蔡山六十人，农民占四分之三，濯港五十人，农民占三分之二；孔龙二十人，工人三分之一；城内一百人，多为手工工人，次为知识分子，共能行动者约百人。

（二）在十八旱镇（即上乡）佃农居多；十八水镇（下乡）则自耕农及小地主者居多。

（三）反动势力，在城有新编第三军三多部队百余人，烂枪四五十支，大的土劣，依附于此。濯港亦为土劣之大本营，组织有治安会。在这次骚动前，三多部队曾捕农民及同志四人，释一人，留三人，目的在绑票。发动后，捕二人，均枪毙。缴孔龙公安局十六支械，因负责人办事不力，事泄被捕农民三人，恐一[已]将枪毙。但土劣均已闻风逃走，三多兵亦发恐慌。

（四）黄梅近日已成骚动局面，赤色恐怖压倒白色恐怖之势，最后数日曾杀土劣六个，及其家属共十余人。因政治宣传好，普通民众多对我们表同情。

（五）今后工作，分全区为六区，每区设指挥一人，组织一游击队，防止驻军来袭击，及大规模杀戮土劣。距区三十里之考田镇有土枪千支，已派人接洽，欲以此力量围缴三多部队械，闭城杀尽土豪劣绅。（六）鼓动农民反抗三十军派三千石军米，并杀经手之人。（二）麻黄区初由省委决定派吴致敏负责，同时给他一封长信，说明土地革命之意义，及该区工作之方针，原函如下：

中国革命现已进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本党在湖北的农运策略，一月以前，即已坚决要领导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到处杀戮土豪劣绅，断绝水陆交通，破坏金融，抗税捐，破坏一切交通机关，引起乡村间极大的骚扰，准备全省大暴动，推翻武汉政府及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平民的革命政权。此事兄方当已知道。现在湖北的环境，依旧是很好的暴动局面：……武汉政权各方面均已陷于绝境，只要我们坚决地领导农民起来于，湖北的工作是很有把握的。……此时兄处工作如已开始，即须尽量骚动，如未开始，即须立刻开始。目前尤须加紧宣传工作，随时随地用各种方式召集同志及农民开会，由党对群众宣布抗租抗税抗粮抗捐，实现政权归农协，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用暴动的方式推翻武汉政府，以完成土地革命，工作开始的地域，应在黄冈麻城一带，将忠实勇敢的同志，组织农民游击队、暗杀队，大举骚动，每队人数由五六人至一二十人，有枪一二支即可行动，出没无常的杀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并没收其财产，抗租抗税，尽量骚乱或破坏交通邮电税收等机关。

没有力量时避免同军队冲突，有力量解决某部军队，则须毫不迟疑的做法，惟技术方面的准备须十分周到，游击队暗杀队的工作若有头绪即须组织农民革命军（秘密或公开斟酌环境而定）准备大暴动。兄处的中心机关，以建立黄冈麻城之间为最适宜。兄处工作，并须与太阳区（大冶阳新鄂城）黄蕲区（黄梅蕲春析水广济）京汉路区（应山应城孝感黄陂安隆云梦）发生密切关系，使整个的鄂东区域，能够很顺利的做起工作来，兄处情形，并盼派

交通随时带书面报告来。

此信去后，致民仍在黄梅，未赴该区。九月十八日，适有曾任罗田县委书记之麻城同李济棠到汉口，省委当即告以土地革命的意义说及麻黄区之工作方针，令其回麻，暂代志敏之工作。志又继刘申来，报告麻城情形，有枪百余支，有群众约一万。省农部亦即令其回麻，并派一作军事工作的同志前去并告以组织游击队，杀戮土劣，以及缴械攻城的方法；又嘱其回麻后，即拟一详细工作计划来。不意他归去以后，至今渺无音讯。又有一麻城同志孙士正来，报告麻城情形，与刘之十月初旬来申所说者无异，孙士正报告之要点。

（一）麻城方面：

1.我们在城北六十里之乘北冈山上，（在麻城黄安及河南光山之间）有人民自卫军，有快枪七八十支，一说百余支，内有十二支驳壳，能号召群众二万人，行动时能听指挥者一万人，土劣已杀尽，土地分配不少。有同志徐思庶、江汉翘（高级农业），徐其虚（武汉中学），刘文蔚（农所）等在其中负责指挥工作。刘负军事责任。但在十九日下午四时，又得麻城同志口头报告，说该处工作同志都被驱逐了，不过这恐是个人的关系，群众还是同情于我们。

2.东乡距城九十里之木职河一带，有民团五百余支枪，在前夏斗寅部下郑其玉手中，郑又与孔庚有关系，是土劣的武装。

3.南乡有麻城及黄冈两县组织的董事会，收买了数百人，有旧鸟枪一百八十余支。

4.西乡土劣组织之金枪会约千余人，首领与在北乡乘北冈指挥军事的刘文蔚感情颇好。

5.城内驻军三连，闻不久即开，系警卫团只三十八人，二支步枪能打，其余十支都坏了。公安局没有枪械。

（二）黄安方面，在七里坪地方有群众二三万人，快枪四五百支。杀了很多土劣，没收土劣之财产，即用以打梭标。有同志戴季伦，戴先敏及党校学生在那里指挥。省委据此报告，乃派汪玉堂先往作军事工作，又决定派符向一巡视该区。

但在十月二十一日，复得报告，谓：

1.我们在黄安之七里坪地方，有群众万人，枪二三百支，现又缴了县城自卫军械二三十支（由此可见我们的群众还有冲突。据说，乘北乡有一区队长有区[枪]二十余支，不知缴的是否此械。）共有枪四百五十支。

2.现在已杀土豪十余人，土劣惧而来武汉者共四五十人，纷纷呈请省政府派兵前往。省政府已决定派二连人（警卫一团的）前往镇压并撤换县长，大约一二日即行起程。昨二十日，该县逃来武汉之土劣已开会决定前往屠杀，并同去作响导。

3.七里坪之同志，尚将土劣十余人送县长收押而不直接枪决，可知其不明了土地革命的意义。因此省委决定立刻派刘镇一黄赤光二人前往指挥，并决定该区特委由麻黄两县书记及镇一赤光再加入两三个真正的农民领袖组织之。同时并给一封信告以土地革命之意义及该区工作之方针如下：

中国革命已进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本党的任务就在把这个土地革命的责任担负起来，我们主要的斗争方法为游击战争，即组织许多农民游击队，在四乡普遍的杀戮土豪劣绅，政府官吏，大中地主，抗租抗税抗粮抗捐，发展

土地革命宣传与鼓动，并即时没收地主一切财产并用很简单的方法，将土豪劣绅大中地主的土地及一切公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个分配土地的工作，非常重要。应看作比杀土劣更有意义，因为土地革命的对象为土豪劣绅大中地主，而杀土劣地主的目的是，即在农民取得土地，若不分配，则杀土劣成为没有意义了。但这是初步的分配，并不是科学的分配，手续愈减愈好。分配了土地农民就会为保有所得的土地而自动地起来斗争的。至于政治宣传的口号是：暴动杀尽土豪劣绅，暴动没收一切田产，暴动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暴动实行一切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暴动推翻武汉政府，暴动拥护叶挺贺龙独立，农民革命万岁等，务须写成标语，尽量张贴，在群众中尽量喊叫，使土地革命的意义，深入群众脑中。再兄等在这个斗争中，应极力发展我们党的组织，把忠实勇敢的真正农民，加入我们的党，以党来做群众的核心，务做到这一个暴动是群众的暴动，同时在这个斗争中来训练同志，锻炼成铁一般的党员。

（三）结论

（一）太阳区大冶阳新之农民与土劣之斗争，当太阳区特别委员会到大冶时，正在积极进行，党若能立即坚决领导此种斗争，大举骚动，则农民进至暴动之正路，至为迅速，该（大）阳特委，对于此种重要工作，完全不加注意，仅欲孤注一掷以期侥幸得利，宜其只能作成一個勇敢同志的暴动。以机会主义起，以机会主义终，此区工作，完全是一幕滑稽剧。

（二）黄新区初本陷于机会主义之深潭中，毫无工作可言，后经省委一再切实指导，该区负责同志亦能改弦易辙，按照省委策略切实执行，所以该区工作，能勃然兴起，蔚为大观今后如能继续坚决执行省委之策略，则进至暴动之路，造成割据局面，均属可能。

（三）麻黄区此区工作，最初并没党在那里领导，完全是农民因影响鄂南暴动而自动起来的。现在该区工作，虽尚有种缺点，如不明了土地革命之意义，自相兼并等，但目前既派勇敢得力同志前往，又因省委指示之工作方针，只要该区特委能够坚决的做下去，最短时间必能暴动起来，造成割据局面。

鄂中区工作的经过

一、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动时鄂中区之概况

1. 京山：农民组织在农协中的共有三四千人，惟各区农协，多被土豪劣绅所把持。即如宋何二区，号称很有组织的，亦于杨森东下时混入了许多土劣。因此，县农民对各区农协不能指挥。农民武装土枪在一万以上，各区农协约三四千；又人民自卫团有快枪七支。农民的要求，以打红枪会为最迫切，因红枪会不时向农民进攻，县长态度甚坏，驻军系警卫团向党民曹（勛）对农运态度尚佳，土匪有二支均已受编。第一支受农协收编后经曹（勛）改编，第二支先受农协收编，后被向党民解散，土劣在南乡一带，与向党民勾结，声势颇大。CP有同志九人，CY无组织。特支书记郑受松离县来汉，不久即登报声明与本党脱离关系，各区农运负责人八日初即已非常恐慌，曹勛至该县后，空气稍和缓，乃已受农协收编之第二支土匪被向党民解散后，农运负责人遂大恐慌，一部分即已弃职逃走。

2. 沔阳：农民组织，号称数万，及十五军缴人民自卫团械后，大都匿迹消声，仅第四区尚有农军四队，共六百二十人，以赵图荣为领导尚可靠。暗

杀队四队，系准备与土劣相抗者，以万献武为指挥。王家湾有作农运工作的二十八人，中有我们同志因被土劣控告，遂各出资一百元，聘力士、组暗杀队，以与土劣抗。此种组织，以谭翰藻为指挥。农民意见，均觉国民政府不要他们而觉感恐慌，但对于农协复活的希望则颇为迫切，农民常说，交租课是可以的，但是农会总不会消灭，我们一定要同农会接头后，才能交租课。郑岛湖的农民则已实行罢租。另外，峰口工会会员及民校党员，则均准备杀改组员。农民武装，在十五军未到沔阳以前，除第四区及卢家墩之武装不计外，人民自卫团有长枪五十一支，驳壳枪五支，迫击炮一尊。及十五军缴去人民自卫团枪械，经赵文允竭力设法保存，尚存有驳壳四支，子弹三百四十发，长枪十八支，子弹约二十排，手枪一支。第四区存有驳壳二支，长枪二支，土炮四尊。卢家墩存有抬炮八支。农民的要求为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假革命的十五军。卢家墩农民的武装游行，并会提出打倒假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之日号，县知事及司法员言论尚好，行动上亦往往压倒土劣。驻军共一团，系十五军，一致反对农运，并会枪毙党部一人。土匪有一部已受驻军收编，一部尚未受编，未受编者有枪百余支。土劣活动甚烈，纷纷下乡，并组织暗杀队三十八队，欲乘机屠杀党部工运农运人员。但对国民政府亦不信任，叫子弟不要作官，说国民政府终归是不可靠的。党的组织从前约有二百人，重新登记后，仅余九十人，最可靠者至多不过三十人，支部有九人，只有五个能通信，自十五军缴人民自卫团械后，县委书记尚离职未归。民校党部负责人均已逃走，农会工会亦均瓦解了。

3. 新堤市：附近农民毫无组织。武装有手枪二支，驳壳一支，在我们同志手中。距新堤十五里之付家湾，有猎夫二百余人，岛枪二百余支，虽无组织，但能听熊付藻之指挥。工人以码头工人较可靠，能组织暗杀队。土劣子弟正在开会图反动。驻军一连，连长极反动。公安局内之监察长，前为同学，现亦极反同（动）。CP同志前约九十余人，现仅一二十人，CY同学前有百余人，现约二十余人。负责人均不知他往。

4. 汉川：农协为军队占住，组织完全解体。农民的武装均被驻军缴去，公安局的枪支也被缴了。农民要求为打倒土劣及国库券兑现。驻军二营，系十五军，极反动。土劣以军队为护符，除告状外并在各处捕人，打房子，封房子，土匪甚少。学校组织，完全停顿，负责人均不知去向。

5. 潜江：农民有步枪十余支，驻军约一营，土匪有三支，谢献之一支已受编，有枪三百。其余二支不愿受编。学校组织已停顿。

6. 天门：驻军约一营，正在积极收编土匪。红枪会不能活动，因驻军压迫甚烈。从前的三十三军又拿着冯玉祥的公事，在该县活动。商店相率辞退工人甚至控告工人。土劣或回家自行启封，并有请军队下乡替他捉农协负责人的。土劣势力最大的是东乡乾镇。党的组织已无形解体。

7. 监利：农民组织涣散。我们同志有驳壳一支，手枪一支。县中警备队有枪一百九十支。县长态度尚左，因之上劣尚未积极反动。同志共七人，尚能在县中活动。

8. 江陵：农民协会尚能存在。驻军持中立态度。

二、开始工作时之鄂中区

鄂中特委，本决定派刘子谷等负责，后因刘子谷赴赣未返，乃派唐九方前往先行在京山或潜江建立一中心机关，以为指挥各县工作及派人接头之用。不料他一去旬余，查无消息，农民部简直没有法同他接头。到了八月十

六号，他才派兰秀中送了一个报告来，将天门及其风闻的各县的情形，简单报告，但是都没有一点实际性。报告之末，并附一个投机的，不实际的工作计划，兹将其附录于下：

“（一）定接头处在汉川系马口。

（二）派袁传鉴到潜江土匪中去，派徐杰唐某到天门红会及土匪中去活动，同时可以找几个工作同志出来。

（三）天门的工作比较稍有头绪，所以我们在对该处积极进行。

（四）现在各处军队都是极力收编土匪，我们就极力鼓动土匪不受编。”

这个计划的最大错误，是完全没有照着省委的计划执行，而只是集中全力去做土匪运动。尤可恨者，他虽定接头处在系马口，但该处并没有负责的人，以致省农部派去工作的同志，往往不得要领而返。后来他的接头处更定得奇怪：汉川系马口找不着，就到天门恢步头，天门恢步头找不着再到京山，京山找不着就回武汉！此时省农部一面派赵文允前往助其工作，一面派邓慈中回沔阳熊传藻回新堤工作。赵文允去也因没有找着唐方九而回沔阳；邓慈中、熊传藻亦均没有报告来，并与唐方九接不到头，最后于八月二十八日派于天池归来，报告：

1. 鄂中的工作，以天门为中心，天门的上匪头有二个，与方九有接洽，准于不日缴十五军械。

2. 鄂中的障碍是十五军，十五军的军官，多半是鄂中的土劣或土劣的鹰犬，所以要打土劣，须先制服十五军，制服十五军之后，更便易于打土劣。

3. 汉川有十五军一营，已与方九接洽，准于有机会缴枪，便缴枪给我们应用。

4. 沔阳负责人为邓慈中，言红会有把握，可以利用，已派兰秀中前往查看情形。

5. 潜江有袁传鉴去当地工作。

6. 钟祥有周驿去当地工作。

7. 应城方九已去。

8. 京山无法可设，因方九到京山见曹勛，曹勛谓省城调他回省谈话，他的军队已开往应城，不能留防京山。并且他的部队中，只有他一个人是我们同志，我们要参加一二人，也须回防后再讲。京山无同志在家，不能立脚。在这个报告中，又可以看出鄂中工作，只有军事运动和土匪运动。此时鄂中特委，已由省委决定派王平章肖人鹄二同志前往负责，惟仍无报告前来，省委遂派农民部任旭前往巡视该区及江陵区。

任于九月一号起程，当日即作一报告，派人于翌日送归，兹将该报告之有关系者摘录于后：“

“关于汉川的工作，汉川现有大学同学五百余人，（原有一千多）中学同学二百余人，（原有四五百人）惟反动一来，同志尽都害怕，加以汉川党的发展，不是由于斗争而是由于政治力量，因此现有五百多而可靠的很少。据他们说有一百多勇敢的人，我恐未必有此数。全县十一区均有党的组织，惜乎城内的组织及四乡的组织大坏，现以三头一脑较好，三头即榔头、庙头、南河渡（头）以榔头为最好。一脑即邱子脑。汉川原有农协会会员十万余，现无组织，但有办法。

汉川驻十五军二团人，系马口二营，汉川城内一团，不久以前他们对我们很坏，近日稍好一点。工农团体及 KML 党部均被占据了。我们的武装本有

二百多，但久已被十五军缴去了，现只余二三支盒子炮，可组织暗杀队。土劣非常嚣叫，勾结驻军向农民进攻，但亦非无办法者。

数日后，任复来一报告，报告鄂中情形的工作计划颇详，惜已失去。

三、分区后之鄂中区

初省委因唐方九不能顾及江陵石首等县之工作，即决定成立江陵区，将鄂中区所辖之江陵区、荆门、石首、公安等四县。划归该区指挥。任巡视鄂中时，后因工作之便，将鄂中区划为南北二部，北部辖汉川、天门、京山、应城四县，令王平章负责指挥；南部辖酒阳、潜江、监利三县及一新堤市，令肖人鹄负责指挥，任回汉后，省委复派王大全巡视鄂中南北二部，并携省委函前往，指示该区两部之工作。省委致鄂中区北部函之要点有七：

（一）鄂中区由暴动区域而转为骚动区域之大原因为机会主义之流毒太深，今后急须完全拔除。

（二）土地革命之意义，为变更数千年来之土地制度，须由地主豪劣手中，将土地夺归农民，故多杀土豪劣绅地主，即系多作一分土地革命之工作。

（三）鄂南工作之能够起来，完全是因他们能够坚决执行省委的策略及信赖群众。

（四）鄂中今后工作之方针，应尽可能的召集同志及农民开会，由党对群众宣布实行土地革命，杀尽土豪劣绅，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及一切公地及一切反革命派的财产，抗粮抗租抗税抗捐，用暴动的方式推翻武汉反动政府。

（五）鄂中北部之工作区域应集中于汉川之杨林集及天门之东乡一带；其余各地均须组织暗杀队及游击队。暗杀队之组织方法，以三四个至一二十个勇敢同志或勇敢农民组织之，有枪一二支或旧式武器数件，即可行动。

（六）对于军队，如果我们力量薄弱，则避免和他们冲突；如有力解决某部军队时，则当毫不犹豫的干，惟技术方面的准备，须切实注意。

（七）在骚动时对于一切税收机关，交通机关，均应尽量破坏。致鄂中南部函辞意同上，惟第五点之工作区域，则改为应集于酒西一带，并增加组织农军向监利发展及注意破坏长江交通二点。大全于过汉川、邱子脑时与该地负责同志王恒产决定该处杀戮土劣的工作，至迟应于二日内开始，杀土劣不得则焚其房屋，没收其财产；但王恒产当时口须承认，退缩不前的态度，则已充分表示出来了。至天门后，二日半不见王平章，因留信告诉他：1.速派一负汉川农运总责人到汉川。2.天门方面及各地须立即开始行动。3.按照省委计划切实执行等。到沔阳后，知戴市已开始骚动，乃与该县代理书记刘金山决定继续骚动，尽情骚动。到新堤遇人鹄，知其方与何连长接洽，欲缴该地八军某连械，已遭失败，因与之决定立即开始骚动工作。此后，鄂中区南北二地，即分头工作，兹述其经过情形如下：

一、鄂中区北部：平章九月十二日之报告及孙洪之报告，此方尚无工作，仍在集中力量于军事运动及土匪运动。平章的报告极简单，仅说：“应城消息甚好，我拟与方九于今日起动身到应与曹（勳）面谈，如谈妥即将应城反动派所领导之人民自卫军缴械，集合盐膏洞的枪支干起来。……”并希望省委给命令与曹（勳）。孙洪之报告，则谓：（一）应城党的组织已完全解体，同志多胆小或持观望态度。九月五号，新派同志前往开干事会后，望组织五千（？）个忠实同志，再实行考查，加以淘汰。应城农军有枪六十支，现因同志胆怯，由干事会决定，如曹离应，即将枪支交给两个不勇敢而可靠之两个膏盐峒主（同志）。到曹之意见，则以为应城同志胆子大小，农民枪支，

顶好交他保存，行动以后，则须解决两个问题：（1）每月经费四千元；（2）换人问题。（二）汉川党的组织，亦完全解体，负责人早已逃走，特委虽派人前往恢复组织，但因找到的都是胆小的灰色的同志，所以组织不严密。特委再派同志前往参加。现在邱子脑、榔头、庙头、南河渡一带，均已成立小组，准备十四日在阳陵矶一带杀土劣，以王恒产为指挥。武装则有手枪木壳枪各二支。群众恨土劣如僧尼刺骨，亦因慑于反动派之淫威而不敢动。县长驻军，地痞、流氓、土豪劣绅均一致向农民进攻，惜赔菩萨还庙产的名义勒索农民。（三）天门党的组织，原以卢家口及乾滩镇为最好，（因反动势力不大）但自司法委员拘捕负责同志后，一般同志遂皆闻风逃去。现则以灰埠头之组织为最好，有同志十三人均可靠，并均跃跃欲试，惟因无武器，未进行。现由唐方九从天门带了一支手枪，及在花台柳河带一支枪来，将来天门骚动工作，当从该处开始。天门土匪，以西北乡为最多，过去来与党部发生冲突，现在愿意借枪给我们用，并有一大股土匪，有枪七十六支，愿意受我们收编。若将此股收编后，再其余三股收编，共可得枪一百六十支。红枪会以皂角市为最多，约万余人，已派鄢泽孚前往活动，有一股会手愿随我们走。土劣组织地方财产清理处，尽力控告我们同志，司法委员及县署，则向我们同志及农友诈索巨款。（四）潜江方面已派袁传鉴前往与匪首谢献之接洽。至他们的要求中，则有两点最可注意：（1）速将鄂北接头处告知，以便行动后之进退及互相声援。（2）速向曹振武或襄樊方面弄一正式军队名义，以便收编天门应城之土匪。

九月十八日，平章复来报告，谓应城计划完全失败，因曹勛已开拔。而应城同志对学校计划又群起反对，完全占在土劣资本家方面，他们要保境安民，保护峒主，不愿使家庭受危险，不愿将该城枪支交给外县人，而率领农民之盛兰英，又已投降于人民自卫军总队长黄培元。并谓他自己无法指挥，最好请学校派一个得力同志（能领导农民暴动的）来领导。最后则要求发给枪支及经费。

在这两个报告中，很充分地表现鄂中北部的工作依旧深深地陷在机会主义中，应城方面先有枪六十支而不能干，只与曹接头，最后更由该县干事会决定将枪交于盐膏峒主之手！汉川方面虽亦准备骚动，但不派得力同志指挥，适足表现没有注意杀土劣之骚动工作。天门方面大部精力集中于土匪运动，骚动之工作，只是一个“准备”！潜江方面是集全部精力于作土匪运动！九月十八日之报告，更是尽量暴露机会主义及失败主义之面目。要请学校派能够领导农民暴动的同志去领导一句话，更是表示：

1. 不知骚动工作之重要；

2. 该区负责同志不是去领导农民暴动的！因此，省委写了一推（堆）很详细的信，严厉指出该区工作之错误，并指示其工作方针。原函摘录于后：

“……兄函中，所表现者，颇有一种失败主义的倾向。兄似还未明白农民革命之实在意义。农民革命即是土地革命，占有土地者是土豪劣绅，所以土地革命唯一的是杀戮土豪劣绅。没收大中地主的田产，实行耕者有其田。军事运动和土匪运动，乃是次要的工作。应城工作，绝对不能因曹勛军队去调走而致绝法。这种军事的机会主义之观念，我们同志现刻应立刻铲除。……农民痛恨的是土豪劣绅，农民要求的是土地，我们的策略和行动，只有从这种要求出发，才能获得群众，引起群众暴动的兴趣。杀土豪劣绅，起初并不要多大的武力，甚至只有一个人，一把梭标，先把土豪劣绅常来往的路径调

查清楚，都可以乘机将他杀死！甚至一个人，只要有一根火柴，都可以把土豪劣绅的房子烧毁！何况兄方有若干新式武器，何以不能组织暗杀队游击队出没无常的到处杀土豪劣绅呢？要使此种行动不被误为土匪劫掠或私人仇杀，我们在农民游击队所到的地方，就先准备许多标语，如：暴动杀尽土豪劣绅，暴动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暴动实行一切乡村政权归农协，暴动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暴动实行耕者有其田，暴动打倒武汉政府，暴动打倒唐生智，农民革命万岁，革命委员会万岁。到处张贴，自然会将土地革命的意识印在群众脑筋中，而群众起来向着暴动的路上前进。……到力能没收地主的时候，就将土地马上分配给农民；有召集农民开会的机会，要在大会上公开宣传。……这样，杀戮土豪劣绅愈多，农民群众起来的亦愈多，土地革命的基本力量便雄厚壮实起来而莫能摧破了。……”

此信于九月二十一日发出后，复得平章十九日之报告，谓汉川方面已将大土豪王大有一家六人杀死，因杀人心切，未弄着钱。汉川土劣鉴于鄂南农民之暴动及本地之骚动，均恐惧不敢动，汉川同志之勇气遂复归消沉。汉川从前的负责人，明白表示脱离党，该处同志，因决计将其除去。现在已由天门方面借了一百元去，使工作同志有饭吃及屋住。天门方面，已于九月十八日夜将劣绅舒梅卿的房子烧了，现准备买船打大刀干起来，同时带金条三根，约三十二两重，到汉请省委代购驳壳八支，炸弹四个，及军事工作同志一人前往。再据十月九日唐方九到汉所之报告，则鄂中工作，仍无进展，汉川方面土劣非常活动，农民怯懦万分，同志的胆小更倍于农民，甚至省委派到该县工作的同志，一般同志，竟指为侦探而不使之与负责人见面。潜江方面尚无消息。应城方面，仍在派人到人民自卫军中活动，一面拟组织城洞樊桥工，夺取军队枪械。天门同志要有武装才肯干，不过西乡方面已因与土匪联络的关系，而将土劣赶得不能回家。但我们工作，已发现下列倾向：

1. 不是指挥土匪而投降土匪。

2. 脱离土匪便不能单独工作，不脱离又惧遭其吞并。至土匪之渐与上劣勾结，及上匪企图升官发财。犹其余事。红枪会之二大领袖，过去虽为我们同志，但现已反动，他们要保境安民，消灭土匪，保护土劣。最后并为该区需要枪支颇为迫切，若无枪支，不惟工作不能进行，恐反将退后。再据该区派来同志之口头报告，则天门方面，卢家口非常富庶，若能劫取，至少可得数十万元。应城方面石膏及食盐工人共约万人，以下洞的占多数，非常痛苦，与驻军（省防第二军某连）冲突甚烈，能鼓动工人，作缴械工作。土匪在南乡有枪百余支，内有我们同志作班长或连长。人民自卫军中，有两个队长，带有四五十人能接受我们主张。曹湖有二百多枪船，亦可抓住。

二、鄂中区南部：第一时期系由肖人鹄单独负责。大部分的精力完全集中于新堤驻军警卫二团之何连接洽。因当时新堤驻军共二连，一为八军之某连。何连长为同志，人鹄乃与之接洽欲缴八军某连械。费时甚久适何连中之排长及班长数人，因争风与某连冲突，乃决计借此煽动，并已定期举事，由该连缴某连械，由我们缴公安局械。不意举事之日，忽又警卫一团某连开到，何连长因平时对部下无工作，而其排长又往往是反共之言论，遂不敢动，因之该处计划，悉成昼（画）饼。仅鄂西之戴家场，曾集合同志，国民党左派，农民共二十五人，前往袭击该县著名土劣涂老五，又名涂老虎，因门撞不开，乃放火焚烧，涂氏家族，遂上房逃避，乱枪射击，当将涂老五之女及外甥当场击毙，涂老五则受重伤，旬日后因伤毙命。是夜天大雨，故房屋未烧多，

此时南部工作之成绩，即仅此而已。

后省委复派黄大金参加该区特委，大金于九月念六日起程，念七日至新堤，知人鹄已赴螺山，乃于念八日起程前往。抵螺后，与人鹄及诸同志晤，始悉该区情形如下：

组织——沔阳及新堤同志共约九十余人，全县皆有组织，但沔东沔北沔中，县城组织均颇薄弱，不能行动，仅新堤及沔南沔西之组织较健全，新堤有同志二十余人，沔西及段家场有同志二十余人，戴家场有同志十余人，余则分布于仙桃，县城，里云口，白庙，峰口等处。监利有同志七人，四人在螺山，余在朱河及县城。潜江方面之情形则不知。

群众——一般农民，均因今年丰收，不易行动，可靠之群众，段家场方面有勇敢农民七八十人，付家湾方面有猎兼业农共二百余人，新堤是码头工人一二十人。

土劣——沔阳方面则诈索农民，勒赔菩萨。监利方面，尚无多大变动，因其县城较好。

驻军——新堤五连，峰口一连，县城一营，仙桃一营，监利二连，湾一排，朱河二排，监利又另有警备队百九十人。潜江方面，闻无驻军。

武汉——沔阳有盒子炮六支，手枪三支，惟有一支勃郎林无一粒子弹。监利有盒子炮一支，手枪一支，但未取出。

当时计划——集中同志于螺山，侯与监利警备队之三个分队长（同志）接洽妥当后，即缴其余三个分队之械，夺取监利县城。

大金乃于该晚与人鹄决定该区工作计划：

1. 建立中心机关于韩家埠；
2. 韩家埠附近于第二日晚即开始骚动；
3. 派邓赤中夏道梅带手枪二支赴酒中沔北一带有农协组织的地方，会同当地农民进行骚动工作；
4. 调沔传藻到付家湾，领导该地猎夫，开始骚动工作。
5. 写信警告段家场支书胡慎之，令其按照省委策略，开始工作，不得犹豫迟延，并派赵文允于病愈后，即驰往该地指挥。
6. 令新堤方面造谣挑拨驻军与商民之情感，鼓动士兵哗变，并造谣说军队将搜剿付家湾，以捉该地猎夫之反抗。对于工运则秘密组织工会，进行经济斗争。

7. 派刘从龙赴监利与警备队之三分队和接洽，并决定抓得一分队算一分队，不要贪多。

8. 立即受一班同志以简单的军事知识。

9. 向同志解释骚动及暴动的意义，因许多同志对于骚动颇怀疑。此种工作，次日即分头进行惟韩家埠附近之骚动，因二十九日之大风雨，乃改期三十夜举行。监利方面之接头，亦因刘从龙之病而延缓。至三十日夜，遂派出同志十三人，驳壳六支，手枪一支，往邹码头杀螺山最著名之劣绅邹自珍，并劫土豪邹先汉。但因撞门不开，不过天黑泥滑，邹先汉邹自珍等开门逸出，遂群开枪射击，当夜不知结果如何，次日始探悉伤一人死一人，伤者后闻亦因病重死于岳州。此次工作，在杀土劣之技术上可以说是失败了，因为到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杀人没有；但在练习上说来，却是一个成功，因从前同志胆怯，犹豫，自经此次骚动后，均已势成骑虎，欲下不得了。

休息一日，乃派大金偕从龙赴监利，并决定五日内返韩家埠，大金临行

时，又与人鹤决定继续进行骚动工作。大全及从龙赴监利之任务，为与三分队长接头，于将至监利之十里许，忽得刘光辉报告，谓县城得省中密电，说程步云等已被捕，现在反动分子集中监利须严防。又土豪劣绅亦准备屠杀过去党部农运工运之负责人。刘从龙因县城认识他的人太多了，不敢前往，大全乃与一姓顾的同志冒险前进。是夜抵监利，次日乃召集监利同志作一政治报告，并探悉三个分队长中以庄兰香为最可靠，林柏营次之，兰曾铮登报声明与我们脱离关系，但曾与熊付藻接头，不过均不在县城，乃决定派刘光辉在监利负接洽责任，并告以接洽之方法以抓得住一分队算一分队；二、如同志可靠其部下亦能用命，则令其开往螺山一带，与我们一致行动。三、如其部下不可靠，则开往我们指定的地方，由我们缴械改编，但仍交原来的分队长指挥。四、如同志亦表现动摇，则佯与之接洽，请其中立而实则进行第三步计划。（见后）更决定监利目前的工作，为利用警备队与驻军之冲突，而造谣挑拨其感情，使其冲突加烈，同时更由华容方面调两个作军事工作的同志到公安。

此行费时计六日，回螺山后，始知此六日中，又继续骚动一次，抢劫螺山街口之店铺数家，但仅得现洋十余元，钱数十串。这两次骚动中，第一次因仓卒动作，及系尝试性质；第二次因专图劫财，均未作政治方面的宣传。

此时省委有急信调大全回汉，大全临行时，乃又会同人鹤决定，该区工作，以洪湖为中心，沿湖出没无常的杀戮土豪劣绅，破坏税收机关，交能机关，一俟付家湾方面之接洽稍有头绪，即会同该地猎夫在新堤附近大举骚动，再向沔中，沔北发展，更会同段家湾之农民向潜江及监利北部发展。（因此时以得报告：（2）付家湾之猎夫领袖四人已与付藻接头，能听我们指挥，但须设法赎回鸟枪；（2）段家湾胡慎之已集中农民百余人，候令——即候枪发动。）在骚动工作中，对于政治方面的宣传，须特别注意。

对于监于方面，如刘光辉报告接洽情形不佳，则立刻写信给该三分队长。谓将在省，县，驻军三方面宣布其为 CP，并捏造种种为陷其人罪，迫其与我们一致行动，同时并告以如他们与我们一致行动，则他们的家眷等问题，我们均可代其解决；并可承认之为扩充军队。

大全回汉后十余日，未得该区报告，后省委复派大全前往。大全出发之日，该区又派人到省委要枪要钱，省委遂致函指出其错误。

大全赴新四日，再返汉口，据其报告，则螺山方面之同志及武装均于大全前次回汉时开赴洪湖中之张家场，因人鹤没有亲自指挥，遂闹出绝大笑话，十几个人，六支驳壳，竟被一个徒手的禁烟局的调查员，吓得四散逃跑，幸枪支尚未遗失。后来召集拢来，决定在小沙口卢家庄一带骚动后，与人鹤会晤，再分两路向庙及戴家场骚动，但他们骚动后，并未与人鹤接头，就分送走了。人鹤次日前往打听，始知他们在小沙口杀了土劣二人，捣毁禁烟处，在卢家庄杀了土劣一人。因此，人鹤至今还没有同他们接着头，但两路之领导者，均系忠实同志，枪支可望不至遗失。段家场方面则因通海口新到驻军一连，不敢行动。付家湾的四个猎夫领袖，已与人鹤接头，据云有二三十个船枪及人可以靠得住。该区驻军现在很多，沔阳方面，仙桃，县城，峰口，通海口，张家湾，均有驻军。新堤有驻军三连，小港，大峰口，到小沙口沿湖一带，有驻军六连。监利方面，县城，东湾，朱河，白螺，螺山均有驻军。潜江亦新到驻军一营。对于监利方面，因欲保存该三分队长之实力，以作将来袭取监利县城之响应，迄未进行原定之第三步之计划。至大全与人鹤共同

决定该区今后之工作计划则为：立即购旧船二只，集中力量，以洪湖为中心，出没无常的杀戮沿湖之土豪劣绅。付家湾方面能抓得一部群众，即须与之会同在新堤附近作一大的骚动。更当相机通过小港向酒东骚动；或过小沙口经戴家场向沔西骚动。骚动的方式，到有农协组织的地方，即会同当地农民，大杀土豪劣绅，没收其财产，焚毁其房屋及一切租约契约。向农民宣布实行土地革命，实行乡村政权归农协，实现耕者有其田，暴动起来打倒武汉反动政府；可能时并可会同当地农协为农民分配土地。到没有农协组织的地言，则先做杀土劣之工作，再召集农民开会，宣布上列各点，可能时，并为之组织农协，分配土地。

三、结论

鄂中区原来的情形，在工作开始之初，可造成暴动区域。但因负责人唐方九专作军事运动及土匪运动，并连一个中心机关都建立不起来，该区工作，遂为机会主义及负责人之蹒跚所牺牲。但分为南北二部后，虽已变成骚动区域，然按照省委计划如积极进行骚动工作，则亦可以迅速地走上暴动的大路。不幸该区北部，因中机会主义之流毒太深，阴历九月十八日以前，均以大部精力集中子军事运动及土匪运动，遂至毫无工作成绩表现。一般同志之胆小，固为工作停滞之大原因，但负责同志不能躬自领导他们行动，实足以增加一般同志之畏怯心理。中心机关不派负责人看守，使省委派去的人及各县的人不能接头亦为工作停滞原因之一。近来该区负责同志，对土地革命之意义及省委之策略，已渐能了解，故亦逐有工作表现：汉川已杀著名土劣王大有全家六人，天门亦已烧毁土劣施梅卿房屋，但对于土匪运动，仍在以大部精力进行，机会主义之流毒，仍未拔出干净。今后该区北部负责同志若不能以全力作骚动工作，该区前途，仍难乐观。该区南部在分区之后，以大部精力作军事运动，亦为机会主义之具体表现。后虽竭力纠正。然流毒仍未完全拔除。大全在该处参加特委工作共十一日，然赴监利接洽警备队竟用去六日，螺山骚动，不作政治宣传，均为机会主义余毒未尽之表现。不过所中流毒，稍较北部为浅。及大全返汉后，机会主义之毒焰，更重复在该处燃烧起来了，至负责人不能领导群众行动，亦与北部同病。此次外如慈善家之态度违背革命的利益，护拥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及专门派人四处要钱等缺点，亦为该区工作没有好多成绩的大原因。至该区所订工作计划，尚属正确可行，但无勇敢的同志领导，则终不免纸上空谈，如有勇敢同志前往领导，按照原定计划坚决执行，则不出二旬，至低限度可以在洪湖附近及西乡造成一个割据的小局面。

武阳夏区工作的经过

一、武汉政府公开反动时之武阳夏

武阳夏三镇党的组织比较健全，惟对于农村支部未有密切关系，当武汉政府公开反动时，除汉阳尚能勉强与农村支部接头外，武昌简直不能接头，市委不知乡村究竟有无组织，及何人负责，汉口各区更不知汉口有农运工作，（汉口农委与江岸区委接头时，江岸区委竟说汉口无农运工作，何得有农委？）兼以农协闭门，武汉三镇之农运工作，遂陷于完全停顿之状态。

二、各县工作之经过

（一）武昌武昌农委书记，初由吴秉均担任，工作的二旬毫无头绪，仅找得在徐家棚、山坡、青山，三四处找得一二个同志接头。农民部派去工作的人，他则叫其暂行等候，或竟不与之接头。后经省委一再督促，并划武昌

为徐家棚、洪山、南湖、油坊岭、纸坊及五里界、土地堂、山坡、青山、京口、豹子滔等十个工作区域，并又令其立即组织暗杀队，开始骚动工作，加紧沿铁路工作，但亦无效果。后在武胜门外，召集该区工作同志开会，决定：

1. 分区骚动杀土豪劣绅大地主。

(1) 在第一二区组织两个暗杀队。

(2) 在山坡豹子滔于是日组织两个暗杀队。

(3) 第一队负土地堂以上至青山骚动责任，第二队负土地堂以下至金口骚动责任。

(4) 每一会员设置武器一件。

(5) 组织侦探队。

2. 发展党的组织。

3. 加紧宣传口号（——）见第一次决定之策略中。

4. 准备大暴动。

5. 武昌市委应注意农运。

但散会以后，依旧没有行动。省委改派邓稚声负该县农委书记责任，但稚声因须兼顾省农部之工作。负责旬余，仍无起色。后乃由农民部派其赴山坡，专负指挥沿铁道工作之责；农委书记，则交吴秉钧暂行代理。稚声于九日赴山坡，九月四日来报告，谓“此方工作尚无头绪，……现在计划，特委已组好，即可举行。毁铁道正在进行，并准备组织农军及全区动员。省农部因鄂南暴动之期已近，乃即复函令其立即聚集农民数百人，掘毁山坡之铁道，并焚其枕木，同时砍断电杆电线，破坏程度愈大愈好！黄又于九月八日亲赴山坡保福祠，决定九号晚上破坏山坡以下之铁道，砍断电杆电线，并须继续不断地作破坏工作。同时并用农协名义，召集农民大会，（因当时有此可能）杀戮土豪劣绅，并尽量作破坏铁道之工作。保福祠方面有驳壳三支，步枪十八支即可作骚动工作时之武器。次日省委又派有能作破坏铁道工作之工友数人前往，是夜即将山坡下三里之铁道掘毁，并号召农民帮同搬运枪[铁]轨，破坏程度尚不少，惟对电杆电线之破坏程度尚甚小。大全返武时，并与吴秉钧决定：一、开始屠杀土劣之工作；二、炸毁土地堂以上的铁道；三、在京口方面射击上下船只，妨害长江交通。但秉钧迄未执行，大全后赴鄂中巡视，更无人督促其工作了。稚声自九号晚破坏山坡铁道后，即返汉口，大全当与之决定：一、继续破坏铁道及电线；二、开始杀戮土豪劣绅；三、缴山坡驻军之枪械；四、号召农民暴动，并令其取得炸药后，即速回山坡指挥。但大全巡视鄂中归来时，闻稚声在汉区留五六日，山坡方面的铁道，也被敌人修复，并由铁道运兵二团，以解咸宁之围。

武昌农运之现状，据稚声九月二十八日之报告，一、武胜门外有一支部，同志三十三人，内勇敢者九人，忠实者十七，可靠者七人，负责同志不勇敢，过去仅做了一些宣传工作，有一次暗杀未成功，武汉政府遂开军一营前往镇压。农民均已种菜为业，常乏之。地主系菜园地主拥地甚多。我们尚有枪二支。二、小东门外有一特支，分三组，同志共十九人，均为农民，颇忠实，能听指挥。派去工作同志不得力，两次暗杀均未成。运动土匪，又被土匪利用。农民以佃农占最大多数，自耕农及半自耕农均甚少。土劣势力不大，枪支已被敌人骗去。三、保福祠有一特支，分三小组，同志共二十六人，干事会为知识分子所把持，持排外主义，派去工作同志，多甚至不与接头，近且反动。过去杀了一个流氓，毁了一点铁道，砍了一次电线，又暗杀一次未成。

农民完全是自耕农，佃农很少。武器有长枪十五支，短枪三支。据此则武昌方面，依旧有充分的做骚动工作之能力，惟目前农委书记是吴秉钩，殊恐不能领导此种工作。

(二) 汉口农委书记万家佛负责约月余，用款四百余元，大都为从前县协之特派员骗去。因找各区区委不得，找得时，各区委又不愿与之发生关系，不要他参加区委的会议，不告诉他接头的地址，江岸区委更谓汉口本无农运，何得有农委，因之该区工作之进行，增加不少的阻碍，经省农部一再督促，据其报告，第一区江岸，第二区桥口，第四区卢家墩，及第六区尚已组织暗杀队；并可立即行动起来；但迟之又迟，未见实行，黄大全乃于九月二号亲至卢家墩，召集该处同志十人开会，决定汉口农村目前行动大纲(十日内之工作纲)如下：

夏口农村目前行动大纲(十日内做的)

(一) 夏口农村自动的主力军以忠实勇敢的农支同学影响指挥最好的农友担任之，同村近郊工友流氓亦可联络一致行动。

(二) 目前行动的对象是杀土劣，包头，反动派爪牙(侦探……)及农协的农贼，造成赤色恐怖，去促成全县农村大暴动并响应鄂南。

(三) 夏口农村目前行动以第四区(罗家墩一带)为中心，由四区至五区再至六区并影响三区；

(四) 目前行动采用流寇形式在夜间集合分途至四五六区同时行动——杀贼，取财物——于后出散在预定的藏身所匿避；

(五) 零碎的暗杀敌人亦须斟酌客观情形随时随地继续行动；

(六) 干的时候决定在十号以前不可迟延；

(七) 干后须马上在受过“第一次干”的影响之二一三等区准备第二次的干，派人到湛家机姑嫂村一带联络流氓组织农友；

(八) 农村宣传鼓动工作应马上紧张起来——尤其对近汉口种菜者，兵士警察，最低限度要做到——1. 提起农民反对武汉政府的意识；2. 兵士警察自己内部冲突或不仇视我们。

(九) 对付改组农协的农贼，用一，消极不理他，二，干，(遇必要时)三，造谣威吓等方式，同时实际调查侦察伪县农协一切情形并设法破坏其机关；

(十) 农村行动须绝对受夏口农委统一的指挥；夏口农委受省委及省农委指挥。

同时并决定派徐汉一、罗仪三、付得胜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负责四五六区工作之责，以徐汉一为书记，并派董雅字为特委秘书。更决定送三支手枪三支驳壳前往。但返汉时，亦农决定送二支手枪，二支驳壳枪。后实际上仅送二支驳壳一支手枪去。一二两区立即组织暗杀队，开始行动，七八两区，则因无力兼顾。暂行放弃。

不幸大全于赴武昌山坡返汉时，万家佛又弃职而去，并自行找童世字代理他的工作。汉口工作，经此打击，一二两区遂始终没有行动。省农部与童世字接头后，见其尚属勇敢，汉口农运一时又无负责同志，乃派童负汉口农运之总责。大全离汉后，童不能与一般同志共甘苦，又给钱与徐汉一较其他同志为多，他与一般同志之关系，遂趋于恶化，适省农部将董雅字胡日新二人他调，中间更无缓冲。后枪支遂集中于付得胜之手，值省农裁撤夏口农委，欲收回枪支，付因生活无着，兼以童世字说省委要收枪支，是因为怀疑他们，

付遂挟枪要挟团体。赵璞不明此种情形，谓童世宇与付得胜互相勾结，因之收枪问题，愈趋严重。大全回汉后，赴卢家墩接洽二次，但因误会已深，第一次没有会着付得胜，第二日付索六人之生活费共九百元，否则须恢复工作，大全乃暂行承认恢复工作，然后徐图收回枪支。此种计划后经省委同意，并派董雅宇前往负责，同时恢复特别委员会，但无生活费，只有临时斟酌情形给津贴，以董雅宇为书记，付得胜、徐汉一为委员，一切权利集中于此会，开会时要请当地区委参加，杀何人枪支交何人去杀都由此会决定。枪支给此会保管，没收财物亦交此会处置，但最后的决定还在农民部，已于十月十九日杀了三家店个小地主李裕泰家三人，没收现洋三十元，现仍鸣他继续去干。因我们于使其多干几次，不能立脚，再由我们调他们到别处工作，以便收回枪支，现在已收回枪支一支。

(三) 汉阳汉阳农运负责为邓曜，他始终没有同省农部发生直接的密切关系，省农部要他的通讯都要不到，到的又不能接头。工作开始之初，即分派人到各区工作，但省农部他们组织暗杀队，开始骚动工作，他们总推说有驻军，农民胆小办不到。蔡甸区是从前农运工作比较好的地方，亦说有驻军不能行动。后来任旭巡视鄂中的报告则谓该处并无一兵，省农部因致函该县县委，促邓曜在蔡甸加紧工作，汉阳县县委乃将全县划为四个区域，第一区为蔡甸，第二区为鹦鹉州，第三区为城陵矶，第四区为获障口，而以邓曜为第一区特别委员会之书记。后因机关被破获，工作遂归停顿。后带去驳壳二支，子弹二百，连同原有驳壳一支，欲有缴及杀土劣之用，又因前天张贴标语，引起土劣、公安局，×××××之注意，防备甚严，无从下手，乃至十八日夜砍断电杆一根，又于二十二日夜砍断金牛山电杆四根。近日秋收，地主派人下乡收租，他们乃张贴暗杀收租走狗，杀尽土豪劣绅，佃农团结起来等标语，使收租惧而归家，嘱佃农送租到地主家里。汉阳工作，仅此而已。不过农民因恐受害，反见标语即撕。

汉阳共分十八区，邓曜负责的，只有三、四、五、七、八十六个区，十、六两区尚无组织。三区在大集场，最近发生关系的有五人，由王少田负责，四区在长兴集，发生关系的有四人，付英负责。五区在新集场同志二十人，肖彬文负责。七区在永安集，同志十八人，强尽英负责。八区在合贡集，有五人杨德林负责。十八区在蔡甸，有二组，王德清负责。鹦鹉州有六组，孙德清、陈登伍负责。

三、结论

(一) 武昌没有杀土劣工作之最大原因，为负责人不明了土地革命的意义，没有领导农民革命的勇气和决心，除破坏铁道工作失败之原因，

则

为负责同志离职不归，及大全之离汉赴鄂中，因而没有人督促该地之工作。目前情形，虽仍可进行骚动工作，但该县农委书记吴秉钧，能力薄弱，举动因循，恐难有起色。

(二) 汉口工作没有什么成绩，反而发生问题之原因，第一为万家佛之擅离职守，第二为黄大全之赴鄂中，第三为童世宇之不能与一般同志共甘苦。今后若派得力同志指挥，不急于收枪，则骚动工作，仍可进行。

(三) 汉阳工作之没有成绩，第一由于农委负责人不与省农部发生密切关系，使省农部不能给以适当之指导，第二为负责同志没有领导农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至技术工作之不好犹为余事。三镇党的不健全，更

为三镇工作没有成绩的共同原因。

京汉路区工作的经过

一、武汉政府公开反动时之京汉路区

(一) 黄陵驻军系委魏益三部，因强迫使用国库券，已全城罢市。魏军师长仍召集各团体代表会，逼迫各代表各团体负责之名单，以便清党；并宣布三日内市面若无货物出售，则该军将自由行动。因此，各团体均完全瓦解，惟农协组织，尚有基础，横店方面，虽大军云集，土劣纷纷回家，但农民尚能公开提出打倒土豪劣绅之口号。

(二) 孝感全县共有驻军三团，二团系魏益三部，勾结土豪劣绅，流氓土匪。建国军有一团，驻花园及襄花汽车道，该团枪少，乃往各区农协收缴枪支。孝感农民武装，原有二百余枪，现仅有五六支能受农协指挥，一半为土匪流氓建国军所夺，其余为从前之团防局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农会职员均已逃走，其家属均被抄抢，土劣流氓勾结军队，四处抢劫，农民恐怖已极，自动禁米入城。国库券完全不能使用。土匪尽成军队。土劣组保安党，悬白旗，结彩，高呼土豪劣绅解放万岁。

(三) 应山农民武装有长枪十八支，子弹四百二十排，应家店六支，一、二、三、四等四区，共十二支，在十八个勇敢农友手中。驳壳七支，子弹约十排、八音二支、子弹八十多发。可靠的农友一、二、三、四等四区共百余人，有作战经验，第七区约有三百人，亦勇敢可靠。二、广水工会，有长枪十二支，驳壳二支，八音八支，可靠工友四五十人。三、警备队有枪五十余支，队长为同志，有十分之七八可靠。四、司法委员为同志，县长态度尚好，五、七月十九日以后，城中无驻军。六、土匪于本年二三月间，已被农民消灭，现在与河南信阳交界处，有邹秀亭等为首领，有枪七八支，三百余人有进攻应山捣毁党部，农协之谣传到，土豪劣绅尚潜伏未动，仅宣传反共反工农者才是真正国民党。七、农民态度，北乡仇视农协负责人及党部人员；东南西乡因受土劣宣传，对农协亦不信仰。农民的要求，减租减息，打倒土劣。

(四) 云梦农协特派员均逃走，农民组织涣散，一切工作完全塌台，仅有同志五六人在县。

(五) 安陆各团体负责人逃走一空，只有个工人部长谌甫卿尚在县城，李孚民黄建章二人在县公署。

二、京汉路区工作之第一时期

省委初调刘光谟调查京汉路区之情形，再未有负责同志到该区以前，该区工作，均交吴光谟指挥，并令其立刻在应山方面，建立中心机关，以便省农部所部工作人员，前往接头，不料吴光谟只奔驰于黄陂孝感二县之间，始终不到应山，使省农部无法与之接头，以致第一时期全无工作。此时该区之情形，黄陂方面由吴光谟决定之工作计划，系：

(一) 调二三个生面孔的同学，到县农协支持一切，以便每月支洋三百元。

(二) 决定在横店组织暗杀队，进行减租抗租工作，并组织毁路队。

(三) 指派三四人到京古蔡店夏店，加紧工作，发展组织集中该地原有旧式武器，并将县协之快枪十支集中该处，作减租抗租打倒土劣之工作，并与土匪联络。

(四) 由县农协与县长磋商，出示禁止米谷出境。

孝感方面之工作计划，则系：

1. 八月十三日到花园附近召集负责同志会议分配工作；2. 指定一二同学急急将能受指挥之枪支集中入山；3. 红会一面积极发展，一面改为军事的组织，我们同志也积极参加；4. 派人到县农协支持并指挥减租工作；5. 督促暗杀队实际行动，并扩大其组织；6. 组织毁铁路队，遇必要时毁坏铁路。

并在花园方面，组织一个革命委员会，非同志作半数，尚未组织成立，即被土劣勾结驻军进攻，捕去委员五人，打死委员一人，系非同志。吴乃指定五人持器行动，但因走火，惊走土劣，遂无结果。次日土劣即带领军队，抄抢重要同志家庭九户，捕去三人，打死一人，亦系非同志。

云梦安陆二县之计划，为肖复初自阴历七月十二日与吴光谟分手以后前往所决定者，云梦方面为：1. 拉拢红枪白枪各会；2. 将过去组织较好的农民另组织之；3. 拉拢土匪；4. 保存旧有实力。但结果红白各枪会没有联络好，只有城外一千余武装农民尚有组织，可以拉住。原蒲潭人民自卫团有枪十余支，因同志计划不良，又为建国军所夺。安陆方面则决定派谌甫卿组织红绿各枪会分住山林。

应山方面系该县县委所决定，系：

1. 武器集中起来，交县警备队保存；
2. 农运专注意四郊及东乡一带；北乡派人慢慢的宣传，另行组织；
3. 组织暗杀队，杀尽那些土豪劣绅和反动派；
4. 党非常秘密的活动，极力淘汰不健全分子；
5. 在党部和农协的负责同志，要带很浓厚的灰色；
6. 各乡有忠实勇敢的同志，都替他秘密组织起来，成农民铁血军，待机动作。
7. 照中央命令减租减息，并且暗地宣传他们罢租，自行起来暗杀土豪劣绅。

三、第二期之京汉路区

吴光谟在京汉路区工作约三周，毫无成绩，省委乃派郭树勋为该区特区特别委员会委员，并决定该区特委未组织成立前，该区工作，均由郭树勋完全负责。但郭树勋到应山后，对该区工作，仍无若何办法，八月半左右之来函，尚为一个光杆委员，以后虽渐能与派去工作同志接头，然而对于整个区的工作，依旧无法指挥，只不过在应山作一点军事投机而已，九月十二日，省委虽然去了一封长信，告己[以]鄂南暴动之情形，以鄂西之准备，并指示该区工作方针，略说：“京汉路区的工作，早就应该有点头绪，但吴光谟兄派人来报告，据说尚未会着兄，未知他现究在何处。昨有安陆孝感的同志来此，说及孝感两县情形，似兄方亦未同他们接到头。安陆只有几个同志，党的组织同农民的组织虽然都没有了，但该县县长近已入校，该县人民自卫团有一百二十支枪，名义上是县长作大队长，可以设法夺取过来。（用什么方法夺取，已与安陆黄建章同志谈过，你们可斟酌从事。）孝感现有同志二十余人，长枪多支，短枪七八支，三里城明店，大兴店等处，均可组织农民游击队，袭杀土豪劣绅大地主，很普遍的骚动。大公会的农民有战斗经验，亦可暴动起来，解决小河市的建国军，应山方面党的组织同农民的组织原来都比较好，并有少许武装，广水的工人同志及他们的武装，想归还能起作用。黄坡已回去多人，想能领导该县工作，大概亦有点武装。云梦情形，想亦不见得很坏，应城工作亦很可做，现将应城划入兄方指挥。京汉路方面，可按照省委前后起草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当然是骚动），准备大暴动。现开

始骚动，须将各县的勇敢同志及武装有组织的集中出没无常杀土豪劣绅大地主，没收其财产，抗租抗税，尽情扰乱或破坏交通邮电等机关，没有力量时避免同军队冲突，有力量解决某地建国军或其他的军队，则须丝毫不犹豫的干去，不过一切技术方面的准备，须十分周到耳。对于安陆的武装顶好的设法抓住，即在安陆用原来的名义存在，否则须设法夺取过来，在安陆应城京山天门汉川云梦等县有计划的用太平天国的方法，大杀一场，能将京汉路及其水陆交通要道破坏，短时间能在京汉路及鄂中天门汉川北面，京山云梦应城等县出没无常的存在最好，否则可由潜江江陵方面转到公安，会合在鄂西农民革命军内，或到枣阳特委处接头，决定其存在地。各县农民游击队的工作没有头绪，即须开始组织农民革命军（秘密或公开请斟酌环境而定）发展农民的武装，顶好地做到每一农会会员都要有一武器。京汉路区全区马上即须行动起来，要在斗争过程中发展党与农会的组织，目前尤须加紧宣传工作，随时随地须用各种形式，召集同志及农民开会，党要对群众宣布土地革命，宣布用暴动的方式推翻武汉政府才能实现耕者有其田，务盼能完全照着省委的计划，勇敢的坚决的剧烈的有组织及计划地行动起来。……总括一句话，武汉政府在各方面（军事政治经济）都已陷入绝境，农民对他非常反对，所以我们可以说湖北的工作是很有把握的，只要我们同志能够坚决地领导农民干起来。

此信去后，依旧没有效果。

京汉路区始终不是整个的，所以此处也只得分县叙述。

（一）应山：郭树勋抵应后之第一次报告，略谓：“……应山自弟抵此之日，农协负责同志均被看守，警备队枪支，亦完全落在反动派手中，从前农协枪支，因与平靖冈之战，全部分给各乡农友，但战事失利后，农友家属受重大损失，对农协深致不满，枪支遂不能收回。目前散在北乡枪支，约计七八十支以上，加之该地红枪会甚多，前上函兄，请派能在北乡工作的同志，卒未果。现正从县警备队着手运动。……现在决定把指挥的地点移在广水……此外则称病甚，要求再派一两得力同志去共同指挥。及省委于九月十二日回信，（原信已见前）示以工作方针后，其九月二十二日之回信，表面上虽称对“学校的指示完全接受，不久作报告，那时我们要杀许多上豪劣绅。”现又说“现正准备暴动。在应山有驻军百余人，枪三四十支，我们已与县公署联络，同时号召红会及农友解决他们，因为在驻军内完全是土豪劣绅。我们准备作一次大的赤色恐怖，即依学校所指示之办法进行。”要先缴军队枪械后，再依学校指示的办法进行。依旧还是军事机会主义。

省委乃于九月二十六日去一函指示其错误，告以下列四点：

1. 应于枪杀上豪劣绅之中。解决驻军枪支，不可去等待解决驻军枪支，再杀土豪劣绅。
2. 在行动中，应尽量作政治宣传，即前函之各口号须尽量张贴，或开农民大会宣传。
3. 县知事已加入党，应立即要他协同解决驻军改换革命旗帜；如不能，即应连他一同解决，切不可受了他的影响，犹疑迟延，反误大事。
4. 马上要广水的铁路工人同志，尽量的继续破坏铁路及砍电线断绝交通。

此信去后，该区并未遵照执行，其阴历九月四日之报告遂将机会主义之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九月初四的报告：正阳历九月二十四五以后，即准备

解决县城驻军……经过了一个礼拜的准备，即可行动了，九月二十九日，忽然开到四千百余人，三十军的部队，来解决县城驻军。……我们不能在前两天发动起来，失误一个可以煽起农民热情，能够领导他们积极动作的机会，可以说是一个很利害的损失，出乎意料的损失！……以前与我们站在一块的县长，（他有七十支枪）不愿干下去了，于是我们……遵照学校的意见，开始在乡村中组织农民游击队尽量的杀土豪劣绅没收土地，向农民宣传，到处骚动起来。……我们很痛心的是失掉了一个行动的机会，使我们不能不变更方针……”投机的的工作失败了，改到基本的工作，他还觉得很痛心，真可以算得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了！。

郭树勋既病重，省委乃派邓稚声前往，指挥该区工作，据其十月十四日之报告，应山目前工作为，“建设一个很健全的党的指导机关，恢复各支部，开始杀土劣，召集农民召开，纠正同志错误观念等。”“此方工作整理稍有头绪，再到黄陂、孝感、安陆、云梦、应城等地”。但骚扰工作及号召群众工作，“此二者（明明是一件事，他却把他分为二件！）大约总有把握”。

省委乃复于十月十七日去一函，指示该区工作，原函摘录于后：

“……兄处工作应集全力于组织农民游击队，实行游击战争，三五人或一二十人为一队，出没无常的尽量杀土豪劣绅。兄处所有十五支可靠枪支，并杂以其他土枪，即专为此项工作之用。同时在实行游击战争中，须尽量作政治宣传，务使杀土劣和土地革命的意识，普遍和深入到一般农民群众脑中，引起广大的农民群众的作我们的基本力量。省委对于农民暴动的策略，并无变更，且更加明显和坚决，……现在兄处应造成一个独立的暴动局面，从实行游击战争，引起农民群众，秘密组织农军，以占据数乡渐渐达到割据数县的目的。凡在所占领之地域，须马上号召群众开会游行，公开组织农民，杀一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反革命派，宣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及赋税，实行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下略）”

（二）黄陂省委派到黄陂工作的人，到应山总接不上头，接到头之后，回黄陂又接不上头，所以他们不仅发出：“我自己回乡去工作了，你们假使愿来指挥就来，不愿来指挥就不来”的怨声。省农部无法可以应付，适赵怡人来报告他已在黄陂南乡道士店工作起来，组织了许多灰色团体，吸收了许多活动分子，第一步计划准备吸收枪支；第二步扩大力量。现在已现诸事实的，有拳术会的四五十人；有私立群化小学校，学生百人，教员均为同学，有学术研究会三十余人，均能受我们指挥。又组织了秘密农协会会员二十余人，佃农联合会，会员亦二十余人。另外还有五六个私塾教师，能受我们支配。他们准备大发展支部。省农部见京汉路区之负责人，不能指挥黄陂工作，又见赵怡人自动在县中所作之工作，策略上虽不免错误，然其人尚能工作，乃决定派他负黄城农运之总责并致函告以黄陂方面工作，须立即行动起来，杀戮土豪劣绅没收其财产，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及一切公地，破坏水陆交通机关——尤其是京汉路，及税收机关，农民抗粮抗租抗税抗捐，秘密组织农军迅速地向着暴动的道路前进。后得赵怡人之报告，则该处因同志太少，且无组织，行动工作，无从下手。乃决定召集各地活动分子会，讨论组织问题，到会者六人，决议：1.成立临时县委，吴光谟任书记，王电生任组织，赵行健任宣传，赵怡人任农运，吴恒德刘茂娥为委员，2.全县成立二区及二特支，一还有三支部，书记赵行建；二还有四支部，书记乐全中；特支书记未定。（余略）同时又德[得]赵怡人“黄陂农运简单的报告”谓：1.全县有同志数

十人能领导的群众有数百人，组织有宣传队、暗杀队、捕逮队、侦探队、毁路队，惟忠实勇敢能行动的不上三十人。2.已有的行动：在王家河打毁当铺；在碾子岗打毁商店；在横店暗杀土劣未成；在南乡院子湾毒打好商；放火烧土劣住宅，没有烧壳几多。3.准备：组织“黄陂县农民铁血团”作为暴动时用的名义，（因适应农民心理）毁京汉路因近来沿路驻军甚多，且防备极严，未能着手，但仍继续找机会。4.武器：有刀五六把，驳壳六支但无子弹。五、土劣有组织的向过去负责同志进攻，城内由国家主义派组织清党委员会。同时得申世五之报告，则谓该县已集中全力准备作破坏铁路之工作，并“拟”杀土豪劣绅。此二报告，皆系交孙思墀孙因病未返，省农部遂未给以答复。后又得该县中秋日交来之报告，约谓拟召集勇敢分子，施以一月之训练，再行举行暴动，则更以陷入机会主义之深潭。其计划尤属大而无边，纯为幻想。送信人将信送到后，即行他往，省农部遂亦未给复函。此究竟未得该县报告，应山来人亦说到黄陂数日，均未会着一人。

（三）孝感：孝感方面自郭树勋负京汉路区特县责任，全无一点消息，至九月二日，省农部始得李蒙报告如下：

孝感的情形

1.孝感目前的危机：（1）土豪劣绅力图报复，捣毁农协，捉人，杀职员，抄家无所不至，以二十五区著名劣绅周新民为最凶恶，农民来县求援的很多，徒以农协无人负责，均失望而回。（2）杂色军队，散处于县之西北，除仇视农运之外，并对于一般人绑票勒捐，抢掠。以小河市之建国军为最坏。

2.孝感的缺点：（1）农协秘密组织不健全，完全失掉了指挥的机能。本来决定有程雪门明哲等负责，他们或者不做工作，或者缺乏能力。譬如小河的建国军，本来可以鼓动大公会地方的农民（素来很勇敢，时常捉得匪军，缴获枪械）。暴动起来，将其驱逐，然而没有人去指挥。（2）学校无人负责，不惟内部组织渐形崩溃，并影响及于各团体不能活动。（附带说一句，孝感原有九十余个同志，现在不过有二十人，多系知识分子。）

省农部因该县不能与应山方面接头，乃派陈惟光前往负该县农运责任，并派张立民与之同行，且告以党的策略，而促其立即行动起来。陈本已欣然愿往，但大全自山坡返汉时，彼又忽然恋妻不走，一时遂未派出负责人前往？及九月十日得张立民报告，说该县有长枪七支，短枪七八支，还有一千七百元纸币及五百元现金，存该县同志明哲处。省农部当即派其回县工作，嘱其在三里城，二郎庙，大兴店等处组织农民游击队，袭杀土劣大地主，做普遍的骚动工作。并可鼓动有战斗经验之大公会的农民，来缴小河市建国军的机械。他们回去不但没有行动，后来派薛舍吾前去作军事工作，几乎连面都见不着了。至九月二十五日，得薛舍吾报告该县情形：

1.工作地域在孝感附近一带，及花园、陆家山、小河市，大公会一带。孝感附近有大学同学一人，中学同学三人，可靠农民十余人，花园一带有可靠同志六人。大公会之农民，很反对小河市之驻军。

2.枪支都是散的，大概可以集中十几支。

3.计划：第一步找几个可靠的同志将限家山之土劣打倒。第二步联络大公会之农民打小河市之军队。再后该县报告，则说工作不好做，同志自由活动，骗党的钱，如要顾及该县工作则请多派几个得力同志“以便将来应用”。复因土匪运动失败，及缴军队械之工作未成而表示失望。省委因于十月六日复函指正，且告以工作之方针。原函录下：

你们以军队的缴械及土匪运动失败，即认为工作无法进行，就不杀土劣，就不去做骚扰工作，以引导农民暴动，试问鄂南如此之广大又有什么军队？苏联的十月革命又有什么军队完全是暴动成的！……希望你们不要做投机的梦，马上将忠实勇敢的同志及农民，组织暗杀队，出没无常的杀戮，焚烧土劣及大中地主的房屋，破坏水陆交通及税收机关，尤以邮电及铁路等机关，非破坏不可！杀戮一切政府及税收机关人员，没收大中地主财产，实行耕者有其田，有力量单薄的军队，马上缴械切不要迟延！但不要缴械后才杀土劣，我们先要杀了土劣，引起军队的恐慌，详细的工作计划，请问舍吾同志。（下略）

四、结论

第一时期之京汉路区不能有工作的原因，完全是吴光谟不能彻底明了土地革命的意义及其本身赴京汉路区之任务，因之他对黄陂孝感两县所决定之工作计划，虽亦知注意骚扰工作，但并未集中全力于此；中心机关建立不起来，更使整个京汉路区受极严重之打击。郭树勋到应后，该区工作遂成为三个不相联络的独立县。在应山方面的工作完全是军事投机，对于省委的指示，完全置若罔闻，失败以后，乃遵照党的决定，开始作土地革命之基本工作，该区同志就觉是万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机会主义之流毒，简直可以说已经弄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最近虽派邓稚声前往负责，但他首先误认骚扰及政治宣传为土地革命中的两个独立工作，并说这二件工作，“大约”总有把握，最近该县之工作，恐仍不能做起，即能做起来，也不免有成为纯粹土匪行动之危险。在黄陂方面，开始工作之时期较短，但已略有骚扰之工作，不过该县负责同志，亦不能彻底明了土地革命的意义，所以对于骚扰工作，仍未积极进行。那种大而无当的，计划不先从骚扰工作人手，而欲直接暴动，也是机会主义之表现，不过该县工作在京汉路区范围中，比较上希望大一些，若能切实予以指导仍可行动起来。在孝感方面工作开始，较黄陂为迟，而其机会主义之倾向，则较黄陂为深，土匪运动缴械工作失败后，竟不杀戮土豪劣绅，不知他还要作什么工作！惟现在既经省委切实指导，将来或可改变方针。

鄂北区工作的经过

一、武汉政府公开反动时之鄂北区

襄阳驻军系方振武部，连南漳一带，共有十万人左右，派饷甚多，南漳派五万，襄阳派五万，军纪又坏，见好衣好鞋即夺取，民众对之非常痛恨。红枪会有十万，同志约六十人。枣阳随县一带之驻军系设建国军五师，共六千人左右，及李纪才，蒋世杰之一部，均属就地筹饷，毫无纪律，建国军之行为，更属纯粹土匪。枣阳同志有百人随具有六十人，红枪会自德安直到枣阳，无人不是，分红绿黄白四社，枣阳方面，我们同志当社长的很多，能抓住三四万，但有青年协进社和我们对抗，不过他的势力不及我们大。武装方面，随县有枪二三十支，襄阳有二百余支，及驳壳十余支，尚有机枪二架，惜无门门，不能用。红枪会对于军队，人数少则刺死之。有一次刺死了一个营长，人数则多避之，随县北乡之红枪会，则正在与建国军开火，打死建国军团长一名营长一名。当时张兆丰师已有两团抵襄阳，另有一团在南阳。

二、开始工作后之鄂北区

鄂北工作，初由省委派张学武前往负责，继李宫春及廖划平亦自南阳前往，后，中央又派陆沉前往，但迟之又久，毫无报告。后派李协一归，始知该区工作，完全集中于张兆丰接洽解决方振武，此时接洽已成熟，候省委

电令，即可发动。但不久即得学武八月二日之简单报告，谓“张师被免，策略改变”。未几得有比较详细之报告，则所谓改变策略者，不过派人改组各地党部，及定几天开一次支部会，几天开一次小组会。几天开一次干事组长联席会而已。他方面则由张兆丰向建国军方面活动，侯得一名义后，即与其旧部勾结。省委见此情形，乃又派王一飞前往指挥。但后得该区二十九日之报告，则公开说该区工作已完全没有了，兹录其报告如下：

襄枣随秋收暴动工作，因：

（一）过去党和农民的组织太坏，现在各地和民众接头的地方都很少。如随县最好的金乌店，实际上我们和当地的农民及红会，都不及土豪劣绅对我们的关系。如枣阳有万余红会中，我们号称三万人，在村土匪，我们可以领导，要作暴动，不能领导，他们都很胆小，因为他们过去没有经过斗争的训练宣传，不能领导。他们又只有西乡的四五千有把握，其他的很没有把握，尤其是南乡乌金店兴隆一带。襄阳则又不及枣阳。比较是随县好，暴动亦多希望。特委曾根据他们的报告，具体下两次动员令（在此是枣阳工作好的地方），后皆因自己实际关系，毫不行动。

（二）随襄同志非常幼稚，又加之是本地人，顾虑身家。工作方面有许多顾虑。外来同志和民众不能接头，亦是工作妨碍大原因之一。但这不是主观。

（三）各地红会，除少数的分散在我们手中外，最大多数在反动的土豪劣绅手里，和中地主的小绅地主知识阶级手中，而这中地主又接近于我们，相牵制着。我们更不能行动。因上三种原因，鄂北之秋收暴动，是无法作起。又加之今年丰收，而租亦较轻。（据我们切实调查，随枣附近之租率，只纳十分之一。）故在主佃秋收关系上，想推起暴动，较他的更难。不过此地政治方面，较直在唐下反动好些，工作还大可作。（下略）

再据陆沉十月十二号，省委常委会上之报告，则该区情形，略如下述：

1. 随县方面，同志分两派，原有百余人，政变后现在只有六十人书记亦转入派别漩涡中，红枪会有五六万，过去对于农运工作太坏，最好的乌金店地方，我们对农民及红枪会的关系，还不及土劣对他们的关系。

2. 枣阳方面，同志约百人，红会有一二十万，我们能领导的有三万，但仅能领导其打土匪，而不能领导其作暴动。因该地地租，仅纳十分之一，并不感觉地主之剥削，且此三万人中，又只有西乡的四五千人较有把握，其余仅足以资号召而已。

3. 襄阳同志约六十人，红会有十余万。

三、结论

鄂北区在工作开始之初，有群众有武装，并且群众已与驻军正式冲突，如果我们能够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工作，本来是很好暴动的局面，不意该区负责同志竟以全部精力作军事投机主义，对于农民的斗争，完全置之不理，无怪乎一点工作都做不起来！及张师免职，遂觉靠山已去，便呈失望，不但没有实行斗争，并且不敢保存斗争之观念！与省委发生关系亦很少，更使省委不能给以指导，总括说起来，鄂北正毫无工作之主要原因，为负责同志完全不了解省委的策略，不了解土地革命的意义，只以全部精力从事于军事投机，军事投机失败以后，仍不知改变方针，二十九日之报告，虽列举秋收暴动不能做起之三大理由，农民虽不感地主之剥削，农民决不会不感土豪劣绅之压迫，以此号召，何至做不起一点工作来？陆沉在常委员会会议之报告

者，内容不为没有一点工作可言，反而事事多经过，并且充分沉现出失败主义之倾向！今后若不派得力同志前往，将机会主义之毒焰铲除罄净尽，该区工作，决难起来。

第四章总 结

一、这一次湖北的斗争，开始于七月底，到现在——十月底，已有三个月的长时间了，从原定计划说来，这一次的斗争，可说已经失败了。在这一次的斗争中，各区工作的表现，均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完全不晓得党的策略，毫无一点行动。

第二期——又可分为上半期下半期两个段落。此期已渐渐了解党的策略，在准备开始工作或正进行工作。

第三期——亦可分为上半期及下半期。此期已能了解党的策略，而造成农民暴动，惟在上半期中尚未注意分配土地，下半期则已注意分配土地。

鄂南区未经第一期而直至第三期，鄂北区始终未出现第一期，太阳区之暴动，仅为一幕滑稽剧，不在此例。其余，鄂西区已至第三期初；黄肢正将至第三期；鄂中经过第一期第二期之时间均甚长；武阳夏区亦然，惟成绩则逊于鄂中区；京汉路区则初人第二期；麻黄区之农民系自动起来的，亦不在此例。

各区的表现如此：但除鄂西之曹壮父外，各区负责同志，在赴各区之前，省委已将策略原文交其阅读，又为之详细解释，事后，更将策略全文，各抄一部为各区寄去，不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各区同志均各行其事，完全不执行省委所决定的策略，甚至与此策略背道而驰！因此，这次湖北的斗争，遂不得不陷于失败。

二、我们详细检查此次暴动失败的根本原因，首先发现的就是机会主义，负责的同志们，因为过去受了“充分利用政治及社会力量，用种种的和平的办法来达到要求的目的”政策之影响，在此次斗争中依旧要想利用军事政治或土匪的力量，来达到土地革命的目的，所以都集中精力于军事运动，及土匪运动，不然便是空谈暴动，坐待农民自己起来，其次本党的组织为土豪劣绅所侵入所盘据。如公安县之四十一个同志中，仅有三十九人为上豪劣绅及同土豪劣绅利害一致的成分。又应城同志，多为盐膏峒主等，在城内秘密开会，反对本党的策略及行动，说：“如果他们（指省委派出工作同志）行动起来，便是扰乱治安，扰乱治安便是反革命，我们便要打倒。”此种反动分子，叫他们起来杀土豪劣绅领导土地革命，当然无异于骆驼去针眼。再加过去湖北农运，只是白纸写黑字的农运，基础非常薄弱，党的组织又不健全，反动势力尚未到来，早已闻风逃走。一般同志，又均胆小如鼠，或顾虑家室；皆不敢动，工作遂愈感困难。再次则为负责同志动摇没有土地革命的决心，工作不能起来，则借词推诿，即勉强工作，亦有只为怕省委之骂，而非领导革命的决心（如符向一在省委会上之报告）。他如同志之派别，互相倾轧，及地主主义之恶习等，亦为暴动工作不能起来的根本原因。在技术上农民群众不起来的原因，第一、不注意政治的宣传；第二、为负责人无法接近群众，第三、为军事人才之不得力；第四、为交通之不灵通。

三、湖北的农民运动，在原定的计划虽是失败了，然而在另一方面，也颇有相当的成功。

第一、保存了党的组织，各县的党部素来很不健全，有些地方更为土豪劣绅所把持，所以号称有二三千人之县分，如黄冈等处，反动势力一到竟自

完全解体，公安应城等县虽未解体然亦不能行动。如果不经此次斗争，湖北各县的组织，不免有一大部分完全解体，一部分完全腐化。

第二、使同志了解土地革命的意义。过去虽然大家同志都承认中国革命，已经进到土地革命的阶段了，实际上，就是许多负责同志尚不懂得土地革命究竟是什么一回事。自经此次斗争，已参加此次斗争的同志，最大多数都能了解目前土地革命的意义，在变更土地私有制度，必须农民群众暴动起来才能完成。而要引起广大农民群众的暴动，首先必须屠杀土豪劣绅大中地主，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及一切公地分配给贫农，才能引起农民热烈的斗争情绪而至暴动起来。暴动之后，更须加紧没收土地，立即分配各农民，才能保证暴动的胜利和发展暴动。

第三、铲除机会主义的流毒，湖北的党，因为在半公开半政权形式之下发展起来，所以受机会主义之流毒，最为深厚。在此斗争过程中，经省委极力纠正，最初虽未发生若何效果，到了现在，却以使同志们一至少是负责的同志们，认识机会主义之面目而起来作铲除机会主义的工作了。

第四、锻炼出能够斗争的党员。湖北的党，虽然号称有一万四千多同志，能够实际参加斗争领导斗争的实在很少。自经此次斗争，凡有工作的地方，尤其是鄂南，已经锻炼出许多能够实际参加斗争的党员了。

第五、证明了省委策略的正确。在久经机会主义浸透的湖北的党，省委忽然决定了农民暴动的策略，一时自然不能使同志们彻底了解，所以负责同志，总是用全力去作军事运动和上匪运动，或者想借政治的力量，解决驻军，共同负土地革命的工作，但是斗争的结果，证明：凡是一切想用偷安取巧的手段，希望依赖或利用现在军事、政治或土匪的力量，以达到土地革命之目的者，都必然无疑的失败。例如鄂南之新店事变，受人民自卫军之打击，使鄂南工作受致命的巨伤，为利用军事力量而失败的证明，应山县长，已经加入本党，而在积极行动中，即与本党脱离，为依耐政治势力而失败的证明。黄冈事件，我们已与某股匪约定共同解决驻军，后来该匪即乘机造谣，说共产党要打来了，使一般人大起恐慌，乃乘机缴驻军械而他去，为利用上匪势力而失败的证明。其余事例，尚难悉举。各区同志，经此种打击，明悉机会主义之政策必然失败，对于省委的策略，始有坚决执行的决心。

第六、农民认识了土地革命的意义。在这一次的斗争中，对于政治的宣传和分配土地的工作，虽然没有做得很好，但是，凡暴动的区域（如鄂南）和骚动的区域（鄂西鄂东中），农民对于土地革命，都有了相当的认识，如自己要得彻底的解放只有实行土地革命。例如鄂南，现在虽在反动势力之下，受土豪劣绅与反动军队之压迫，暂时不敢动作，但如驻军他调，或有一部驻军他调，这一部分广大的群众，依然会倾向我们。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尝过土豪劣绅的滋味了。

第七、引起农民革命的热情，凡是有工作的地方，农民因为认识了土地革命的意义，遂日趋于革命化，相率起来，杀戮土豪劣绅大中地主，以求土地问题之解决。鄂南区虽暂时屈服于反动势力之下，但农民群众革命的热情并未因此消灭；因对驻军压迫之反感，对于反动政府，更有“与汝偕亡”之势，黄麻人民自动起来，大杀上豪劣绅，更是对于鄂南暴动的响应。

第八、摧毁了乡村封建势力的基础。此次斗争中，各区杀土豪劣绅及土豪劣绅之爪牙走狗，虽无精确的统计，估计至少在一千人左右，对于乡村封建势力之打击，较过去长时期中的儿戏的农民运动为严重（过去将及一年的

长时期中，所杀土劣至多不过一百人。）所以，汉川等县之土劣，也慑于这种声威有时不敢蚕（妄）动。

第九、促进了农村的阶级斗争的剧烈的发展。鄂南暴动失败后，土豪劣绅勾引反动军队，到处屠杀农民，并向反动军队说：“宁肯错杀一千，不肯误放一人。”反动阶级之阶级的意识之明显，和进行阶级斗争的剧烈，可以概见。但他方面农民的阶级意识亦逐渐明显，斗争的进行，亦恐剧烈。在乡间，只要提起打倒土豪劣绅，绝对没有农民反对；农民对付土豪劣绅，也不似从前采取几戏手段，绳子政策，而直接处死，并没收其财产，焚毁其房屋杀戮其家人，即为阶级意识明显与阶级斗争剧烈之铁证。

第十、动摇了武汉的反动统治，武汉反动政府，到现在各方面都已陷入绝境，尤以财政方面的困难，为其致命的打击。国库券之由跌价而至不能行使，中央票中国票交通票之相继跌价，中央跌至不及二折，中国跌至二折，交通跌至二三折，皆为本党策略之初步的成功。（各种钞，均系农村最先拒绝使用。）鄂南暴动及各区的骚动，更于武汉的反动统治以军事的政治的打击，使其发生动摇。

四、现在湖北农运工作，更以开展一个新局面，主观方面，党的组织渐趋健全，机会主义之流毒铲除将尽，同志亦因认识土地革命之意义而生革命的决心，并由斗争过程锻炼出斗争的能力，又对于省委策略有坚决执行的决心。主观方面，农民革命的情绪，亦因认识土地革命的高涨，乡村的封建势力已遭严重的打击，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已进到极剧烈的关头，武汉工人亦正起来反攻资产阶级及反动政府，实行罢工及打杀改组委员及一切工贼，要求管理生产，拥护农民暴动，同时，宁汉军阀已正式发生军事冲突，刘兴何键败退于武穴，十六军的工军冲突于宜昌湖北的反动派，还在继续的混乱崩溃中。

湖北全省总暴动计划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政治议决案中指示，中国客观的革命潮流无疑的是继续高涨。党的历史的使命是要善于领导革命潮流一直要发展到工农夺取政权的总暴动。扩大会议以后，中央曾训令湖北省委于最短时间布置一个总暴动的局面。

湖北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形，纯是一个总暴动的局面，我党当前唯一的重要责任，就是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领导湖北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

省委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议决在新的斗争开始的时候，(西征军入湘)实行全省总暴动。现在在外县尽可能的立即发动暴动，发展游击战争，造成割剧[据]的局面。武汉三镇发动工人群众的经济罢工，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开始暴动的积极准备汇合各县农民暴动与三镇工人暴动联结而成为总暴动。

(一) 农村暴动

1. 全省暴动的重要区域与县分

黄济区——黄梅、广济、蕲春蕲水；

黄麻区——黄陂、麻城、罗田、黄冈；

京汉区——孝感、黄陂、应城；

鄂北区——襄阳、枣阳、随县；

鄂南区——蒲圻、咸宁、通山、崇阳；

鄂中区——沔阳、汉川、天门；

鄂西区——当阳、远安、荆门；

鄂南是战争区域农村暴动可以使交战双方军阀并倒鄂东是我们力量较大的地方，是可以造成割剧(据)的局面。省委特别注意这两区的暴动工作。

2. 各县尽可能的立即发展农民群众的暴动，先在我们较有势力的地方开始，发展扩大于全县，不要一开始就首先攻县城。

3. 暴动须己(以)贫苦的农民群众的力量做中心，不要专门估计枪械之多少，或者是依靠土匪(如鄂北)的势力，这不是暴动，这是军事投机。

4. 对于暴动与苏维埃政府的宣传，要深入到贫苦农民群众中间。我们不要怕宣传暴动与苏维埃，因为只有毫不畏缩的宣传，才能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土地革命。

5. 在乡村中取消农民协会的组织，组织农民委员会做暴动的指挥机关，是贫苦农民斗争的组织。

6. 暴动时，一切武装队伍，统称中国共产党某某县工农革命军，取消游击队、先锋队等名称，工农革命军要设立党代表制度，工农革命军是暴动的一种辅助力量，主要的还是贫苦农民群众。

7. 在乡村中杀尽豪绅地主、政府官吏，应当取斩草除根的状态，不要丝毫顾惜。宁愿误杀几个，不要少杀一个。

8. 对于小资产阶级群众(自耕农、知识分子)在暴动时应使其中立，如有通敌者，格杀勿论。

9. 暴动时要有严密的组织，如侦探队破坏队、交通队、救护队运输队等均须组织完备。

10. 暴动一开始，即须破坏敌人的交通，炸毁铁路、割断电线……。
11. 暴动后立即召集农民代表会议，由群众选举正式组织乡村苏维埃。苏维埃委员的成分要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贫苦农民（佃农雇农）。
12. 由农民乡村苏维埃没收一切豪绅地主的土地与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焚毁一切契约。
13. 乡村苏维埃进行集中粮食、枪械子弹、财政的政策，防御敌人的反攻。
14. 暴动后组织正式的工农革命军，完全是自愿兵，能随时调动，在乡组织赤卫队轮流在职政府服务。
15. 对于土匪要采取坚决的破坏政策。不要存丝毫的幻想，希望他们来参加农民暴动，拥护土地革命。
16. 暴动前须极端注意士兵中的宣传工作，鼓动他们起来要求发饷，改善待遇等，并杀戮反动军官，尽可能进行士兵委员会的组织，暴动时运动士兵哗变，破坏敌人的军队。
17. 暴动胜利的地方，要毫不客气的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如资本家行东关闭工厂，经济怠工时，应即由工人占领工厂自己管理。
18. 暴动在某县有相当的胜利保障时，应即组织工农兵苏维埃，成立县政府。
19. 暴动在某县发展或胜利保障时，应即帮助附近各县农民暴动扩大其范围。
20. 暴动后要择定有险可守的地方做大本营，集中军械、粮食于此处，以防敌人反攻。
21. 暴动时注意缴敌人的军械，从敌人守（手）中取得武器来。鼓动农民个个都武装起来。
22. 对城市手工业工人的斗争，要努力发动。否则农民暴动极容易陷于孤立无援的地步。
23. 在不能立即发动的地方，开始游击战争，但须注意群众的宣传，杀戮豪绅地主，一直到发展广大农民群众的暴动。
24. 各县暴动的目标，应当是向着武汉发展，与城市工人暴动取得联络。
25. 各区暴动的指挥归各区特别委员会，直属于省委，各特委应有一详细暴动计划，交省委核准。

（二）城市工人的暴动

1. 武汉三镇要积极的发展工人群众的斗争，发展大小的罢工，在罢工中使一般群众普遍的感觉到暴动的需要（详见目前工人行动总纲）。
2. 对工贼及反革命派开始红色恐怖，向工人群众宣布工贼及反革命派的罪状。用红色恐怖答复敌人的屠杀政策。
3. 在暴动前要造成敌人的恐怖局面，破坏电灯、电报、电话、交通，扰乱金融、市场，在重要区域放火等。
4. 组织严密的侦探机关，侦察敌人的消息与移动情形。
5. 组织破坏队，准备破坏器具。
6. 组织工人红色武装队，至少武昌 1000 人，汉口 1000 人，汉阳 500 人。
7. 准备武器，集中枪支，进行同志的军事训练。
8. 扩大反“新军阀战争”“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每天要有大小传单在街上散发。
9. 进行兵士工作，组织兵士委员会，运动兵变，破坏敌人军队。

10. 调查地形路线以及群众力量，决定暴动的行动大纲。

11. 在近郊开始游击，杀戮豪绅地主，造成四郊的农民暴动。12. 关于暴动的详细计划，由区市县党委决议，呈省委核准。（三）暴动的重要口号

1. 暴动打倒白崇禧、李宗仁、胡宗铎、程潜！
2. 暴动打倒一切大小军阀！
3. 暴动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
4. 暴动打倒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刽子手！
5. 暴动打倒豪绅资产阶级军阀的政权！
6. 暴动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7. 暴动建立工农兵政权！
8. 暴动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
9. 暴动没收一切反革命的财产！
10. 暴动杀尽豪绅地主！
11. 暴动杀尽政府官吏！
12. 暴动取得土地！
13. 暴动夺取武装！
14. 抗租抗税！
15. 取消一切借债！
16. 乡村政权归农民代表会！
17. 杀尽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
18. 恢复工人原有条件！
19. 恢复总工会及工会！
20. 实行八小时工作！
21. 反对开除工人！
22. 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
23. 工人自己组织工会！
24. 杀尽恶东！
25. 发清积欠工资！
26. 保障童工女工！
27. 救济失业工人！
28. 开办失业工人的饭堂宿舍！
29. 工人管理生产机关！
30. 没收一切政府机关！
31. 兵士与工农一致暴动杀尽长官！
32. 兵士参加农民暴动取得土地！
33. 兵士们转过枪头打人民的刽子手——军阀！
34. 兵士们一枪也不打工农！
35. 工农兵联合万岁！
36. 共产党万岁！
37. 工农兵总暴动夺取政权万岁！
38. 工农兵政权万岁！

（四）暴动中的党的问题

1. 暴动要在党的集体的领导之下，党对于暴动要有切实的准备与正确的估计。

2. 党决定暴动的政策以后，要普遍地向全体同志作详细的报告与解释，使暴动的政策深入一般党员群众中去。
3. 指导机关对于暴动要有坚决的态度，不得临时畏缩临时变更暴动计划。
4. 暴动的指挥者须站在群众的面前，不得临时退却，丧失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5. 暴动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发动的，各级党部要做宣传，注意吸收暴动的革命群众加入到本党中来。
6. 暴动时要注意党的技术组织，保留一部分同志不公开专门做党的内部工作。
7. 经过一次暴动与斗争，党部应有极大的发展，向工农群众开门发展工农党员的数量。
8. 我们的党要在斗争中建立起来，在斗争中要不断的开除投机的临阵退缩的分子，巩固党的组织。

注释

疑为黄安。

湘鄂西暴动计划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贺 龙

一、湘西情况

(一) 澧水、澧州、安乡、南县、临澧、石门、慈利、大庸、华容等县，俗称九澧，即九条小河汇集澧水而入长江。该地交通当称便利，邮电俱通，惟地处川鄂交界，土匪出没无常，一年以来，虽改称军队，不脱土匪习惯。近则有改称农民自卫军以图生存者，如现住澧州城之杨再雄，即前委任之补充团长，闻近改称团防总局。距慈利三十里地之东岳关有张怕立者，曾充营长，号召力颇大，现在该地办团。九溪、江亚（距东岳关四十里）有苏子三者，曾充炮兵营长，现任该地团防总队长。龙潭河现任团总朱菊五等均与龙有部属关系，且能听指挥，可利用之，以驱逐该地军队。闻驻慈利等县为戴斗垣部，戴与龙交好，若能与我们同走一条路则更好，否则拉其部属倒之可也，津市之贫民工厂为龙手创，其厂长聂左泉即旧日副官长，现在颇发展，工人达二千余人，聂能号召该地工人，我等一有举动，彼等必起而响应，到大庸城所驻军队，名虽属戴斗垣部，而其实际军官如团长肖善堂、吴玉林等均属龙之旧部，该地土匪甚多，可收容二千余枪枝。桑植为龙家乡之地，该地有钟零者，有枪二百余枝，邓仁山、朱子樵、刘子为等三人共有枪数百枝，均可靠。因彼等非亲即友，二十军军官多有该地之人，故易于召集。此澧水之大概情形也。

(二) 沅水：辰州为湘黔门户，该地有周凤翔、张伯恒者，现均办团，有枪百余枝，且号召力极大。辰溪则有向石宁、陈德铨、米佩钦者，各有实力。钜甫 肖芳州曾充骑兵团长，在该（地）号召力极大。芦溪县刘次伯现任该地总团长，若有人指导，此数县可完全占领。现住辰州军队为陈渠珍部，驻钜甫 为陈汉章（师长），其部下极易动摇。至芷江、晃州、黔阳、麻阳、汇通 等县俱驻杂色军队姚继虞（师长）、杨玉清（旅长）、卜石生（旅长）等均土匪出身，颇易联络。乾州、凤凰、永绥、宝靖、古藏 等县均属满清绿营老式军队，若农民组织好了，更易缴枪。

二、鄂西情况

(一) 施鹤六属：该地本李晓炎防地，但李之兵力不够分配，常有顾此失彼之虞。鹤风[峰]州有玉文轩、孙静风、罗贵富三人，可号召三县民众。该地接近公安、石首，颇易联络。来凤、咸丰、宣恩等县与湘西桑植接近，该地有张玉书、肖海山、侯静臣等，极有力量，可为我等利用。施南、巴东则有孙辅成等，可运动该地土匪。

(二) 沙宜：沙市邱华廷能号召流氓及船夫。宜昌现无基础，但可组织该地流氓协工会、农（会）共同起事。

() 十军到粤失败无所依归，闻此次同行回湘鄂西者颇多，即在此间流落者亦无办法，他们都要我们替他想办法。此时我们有了各地暴动方法，即可令他们回各处活动，大约二、三月内即可占领数县，号召数万民众与湘南、湘东相呼应。俟各地民众起来之后无法收拾之时，则一举可以取整个湖南。

三、进行步骤

第一步在汉口组织通信机关，由龙派人协同本党同志密赴各地活动。第二步将鄂湘西分若干区域实行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

注释

原文时间为一九二七年古历十月。

原文不清似为“宁”字。

疑为淑浦。

疑为晃州。

疑为会同。

疑为保靖。

疑为古文。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一

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民权革命在经济上既没有完成(土地革命及封建关系之消灭),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权斗争上也还没有完成(中国之统一及民权解放),在政权的阶级性上更没有完成(工农独裁制)。认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已经生长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之主张,是不对的。同样,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共产国际执委驻中国代表之主张)也是不对的。要想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同时并认革命为“不断革命”之倾向,其错误与托洛茨基 1905 年时的错误相类似。如此设问并且得出“不断革命”的答案,显然是将中国革命之最大特性,就是半殖民地的革命,一笔抹煞,所以这种错误大为有害。

二

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大致都在共产党的口号并且大半在共产党指导之下者,已经过去。第一个浪潮的终了,是革命运动的几个中心地域,工农受着极厉害的历史失败,一部分共产党及一般革命的工农干部,受着极残酷的屠杀摧残,社会阶级两极端极剧烈的发展,互斗的阶级各自确定自己的政治纲领,国民党军阀之指导完全暴露自己是反革命的指导,广大的劳动群众得着极大的革命经验,最后,使中国群众的革命运动,整个儿的进于新的苏维埃的阶段。自然无疑的,因为社会阶级的联合变更,而有相当的反动势力之结合:资产阶级不但进而与封建军阀结合完全的反革命联盟,而且事实上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妥协。帝国主义者不但表示攫取中国经济权利的高度的积极性,并且增高自己对于中国的政治的势力。反革命的这三个主要力量,协同的反对工农,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同时这反革命的营垒之内,也有极剧烈的内部斗争:一方面表现于中国互斗的各派之利益自相矛盾,别方面也反映着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矛盾。

三

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浪潮。但是,许多朕兆,都指示工农革命正走向这种新的高潮。不但英勇的广州工人之暴动,而且许多省区农民运动的开展(广东各县的暴动,湖南革命运动的开展,以及江西、湖北、河南,甚至山东、满洲北部诸省);再则,军阀军队中兵士群众的愤激而倒戈也日益发见,这些都指出革命是走向新的高潮,经济状况之急剧的恶化,财政的紊乱,军阀混战的破坏,空前的政治压迫,都必不可免的推动群众到革命斗争的道路去。

四

中国革命的经验证实它的一种特性,就是运动的发展在各省是不平衡的,各自有当地历史的条件。它至今的发展,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也是不平衡的。现时的形势是:一方面许多省区之中农民运动往前发展;别方面有许多工业中心,工人运动受着极大的摧残,在极厉害的白色恐怖之下,表现相当的挫折。

五

这一切形势,可以确定主要的党的政策路线,党应当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这一高潮,必须要党起来组织并实行群众的武装暴动之直接的策

略任务，因为只有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能够解决革命之种种任务。正因为如此，现时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组织他们，使他们围绕着党及党的口号（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统一中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推翻现存政权，工农独裁制，组织苏维埃）。现时形势之中的最大危险，就是工农运动的先锋因为估计现时形势的不正确，而过于轻视敌人的力量，可以脱离群众而过于前进，散乱自己的力量，而使敌人得以各个击破。如果共产党不了解组织群众与争取群众之必要，如果它不能战胜种种使它忽视准备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之企图，战胜种种使它忽视准备当前的中心任务之尝试，那么，共产党一定要被击散而散乱自己的组织。

六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因此特别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它注意加紧工农之间的群众工作。必须竭力加紧组织工会的群众工作，为此目的而利用工人所谓“兄弟会”等等，并且（反对黄色工会的警察式的国民党式的机关起见），如果黄色工会多少有些群众组织的性质，那么，也可以渗入公开的甚至黄色的工会，以夺取阶级敌人影响之下的工人。必须同时永久抛弃职工运动中的恐怖政策，这是对于党有非常之大的危险的。必须最坚决的反对以强迫方法举行罢工。只有说服群众，使他们相信党所提议的方法之正确，只有取得群众中之绝对的赞助和完全的信仰，才能指导运动。同时，必须加紧建立和扩大农民组织的工作（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等），特别注意贫农之中的工作，特别组织乡村中的无产阶级成分。有系统的日常不断的执行提高群众阶级意识的工作，指导他们的日常斗争，组织他们，这在现时对于中国共产党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七

必须坚决的反对工人阶级某种成分之中的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发动暴动，反对玩弄暴动；不做工农的群众暴动，而去玩弄暴动，这是消灭革命的“正确方法”。党指导着各省区之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因此，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这些危险在两湖等处曾经有过）。必须经常的、不动摇的去组织农民的发动，党应当预先便注意中国各省区的各种不同的特殊条件。这些不同的条件，首先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苏维埃区域之内估计到。并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苏维埃化的农民区域中，党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部队——以备这些部队渐渐联合而成全国的中国红军。

八

革命往前发展的最主要的条件，就是竭力以巩固中国共产党本身及其干部，巩固它影响之下的团体及党的中央。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八七”会议之后，大致纠正了自由的机会主义错误，这在共产国际以前的议决案就已经说过，可是它还没有完全适应现时形势的新条件，表现策略上的动摇（看轻盲动主义的危险，职工运动中之恐怖方法，沉溺于乡村中的游击主义）以及组

织上的动摇。巩固党部组织，吸收新党员，巩固中央党部与地方党部的联络，建立坚强的党的机关，正确的党与非党群众的关系，反对机会主义的余毒，反对“左倾高调”（“先锋主义”，组织“新共产党”的论调，恐怖主义，盲动主义，强迫罢工等等）——应当是党的当前任务。

九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实行严厉的斗争，反对组织新的仿佛是“真正共产主义的”党，或者所谓“劳农党”，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党。有些过去的共产党员（如谭平山等）是有组织这种新党的企图；其实这新党，将要是孟塞维克的反工农的党，做蒋介石及其他工农刽子手的走狗。反对工农运动中的右倾派与反革命派的斗争，是党当前的任务，而这种斗争，将要因为中国共产党内部愈加坚决的战胜“左倾的机会主义倾向”，同时不对机会主义余毒有任何让步，而愈有成效。

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估计中国革命运动的一般经验，而使这些经验的教训一直到党的支部。广州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英勇的尝试，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有极大的作用；可是这里也暴露指导机关的一些错误；工农之中预备的工作不充分，敌人军队之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对于黄色工会会员的态度不正确，党部及青年团本身的准备不充分。中央完全没有接到广州事件的通知，政治上的调动群众也薄弱（没有广泛的政治罢工，没有选举的广州苏维埃以为暴动之机关）。对于这些，直接指导者应负责的，就是政治上对共产国际执委负责的同志（某同志及其他）。虽然有这些指导方面的错误，但是广州暴动应当认为中国工人极大的英勇精神的模范，他们是的确有取得中国大革命之领导权的历史使命之资格的。

十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都应当实行自己的天职：严厉的反对社会民主派及托洛茨基派的造谣，他们说“中国革命已经消灭了”，这种造谣诬蔑，不过使帝国主义的在华工作更加容易，帝国主义本来只想完全镇服中国的工农运动，而中国的工农运动却正在走上新的革命高潮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各国共产党都应当竭尽全力赞助中国革命。现时这一时期，正是帝国主义反革命的干涉中国加紧的时期，所以各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赞助尤其必要。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尤其是帝国主义列强国内的，更加要力争撤回驻华海陆军，反对割据中国领土，瓜分中国领土，反对镇压中国革命的政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号召世界的工人，首先便是共产党员，要努力执行无产阶级团结之天职，实行帮助中国英勇的无产阶级。

张先梅关于鄂西情状的报告

——政治经济形势，党的组织、饥民斗争与游击战争情况，个人意见*
(一九二八年二月)

这个报告，只是以我个人所知的叙述的，不能算作确实的详细报告。因为我到鄂西不到三个月，兼之我没有参加特委工作，仅只在江陵县委担任了一部份技术工作，所以对各方情形均不能十分明了。兹特分项叙述于后：

一、经济政治方面

(一) 去年天旱，几成鄂西普遍现象，尤以荆门、松滋、枝江等处为甚。农民破产十居八九，成千上万的饥民到处讨吃。今春雨水亦复不足，是以出外讨吃的饥民，亦无回家复耕之望，河水奇干。乡村比较有粮食的地方，亦不能运出。本地面粉厂已停工数月，城市上米面价格逐日升涨，加之花票之多，真伪莫辨[辨]，而且一律不兑铜元。战争发生时，军队移防曾在沙市，勒认军需公债十七万之多，放赌抽税，拍卖鸦片，经济恐慌日趋严重。

(二) 鄂西军队原有刘和鼎一师驻宜昌，严俊一师驻荆沙，马文德一师驻施鹤。战争发生时，严俊移防鄂东，荆沙亦由刘和鼎接防。此我离沙前之军队情形(其余他县均无军队，地方由团防负责)。

(三) 保卫团遍地皆是，较大的地方则有枪枝百余之谱，次则四、五十支或二、三十支不等。其团士之成份，不尽是本地人，有邻县人亦有外省人。其本地人多属破产农民与地方流氓，邻县人与外省人，则多属逃难而来，因此内中亦曾有因白色恐怖而与团体失了联系的同志。保卫团以宜昌办得较为严密。

(四) 鄂西有清乡司令，由当地军队长官兼任，前为严俊现为刘和鼎。其清乡办法：乡村则责成各地团防举报，或就地缉捕，或者军队临时下乡。城市则由军队清查，无定期，亦无分日夜。

(五) 鄂西以沙宜为城市中心，产业工人绝少，沙市只有一家面粉公司与几家米厂而已，合计工人不到二、三百人(每厂仅有二、三十工人)。手工业工人居绝大多数，码头工人与车夫亦属工人中之绝大多数。最近沙市已有一家打包厂正在建筑，约夏季可以开工，闻可容千余工人，如此则将来沙市可成为鄂西工运中心。

二、党的组织方面

(一) 鄂西整个组织，我没有见过统计及各县的组织亦没有统计。据我所知的，有县委组织的，如公安、石首、监利、江陵、松滋、枝江、宜都、宜昌等处较为健全。其余各县，亦均有组织，有的有大学而无中学，有的有中学而无大学，有的中学、大学的组织均无而仅有几个同志线索的。

(二) 鄂中现有酒阳、潜江、天门、京山、钟祥等县已由鄂西方面找着线索，现已派人去工作。

(三) 党员成份以农民居绝对多数，占百分之九十谱，工人居绝对少数，也可以说没有什么工人同志。

(四) 党的组织完全在农村中，城市始终建立不起基础来。每个县委之下有区委，区委之下有支部。环境较好的地方，支部可以按时开会，否则很难，斗争亦甚少。

(五) 干部人材缺乏之至，而且因环境关系又不能设法训练，区委及支

书多半不能起丝毫作用。

三、饥民斗争与游击战争

(一) 在松、枝等处，曾有饥民自动发起吃大户，我们同志曾参加其领导。在特委决定，是要作抢分谷米的斗争，而下级负责同志则只做了吃大户的斗争，因此被反动派压下了，并逮捕了几个同志，到现在这种事还未终止，将来有变为游击的可能。在这个斗争当中，当地的小农中农也极力参加并且要求加入党，不愿意加入农协。

(二) 在监利、江陵已开始游击战争，闻监利方面有百余支枪，江陵有几十支枪。发动后均颇形顺利，每杀一土劣，则农民环跪叩头。

(三) 游击战争的决议，我没有看到过，所以详细计划我亦不知。据闻，一方由宜向下发展，一方由监利向上发展，使上下联系起来；另一方贺龙则出公安、石首。

(四) 农协的组织，监利、江陵在游击发动后已有了县协的组织，至于以后的工作则未闻。

四、贺龙方面

去年有马文德一团(?) 叛变过来，所以目前的力量较前充实些。湖南事件发生时，曾来信说要拖出公安一带，以后特委复信同意，但此信未送到，现正再派人送信去，目前行动如何尚不知。

五、神兵方面

神兵对我们的倾向很好，实力如何尚不知。现在特委已注意派人去做下层工作去了。

我个人的意[见]：

(一) 以目前鄂西组织发展的地方看，则沙市实为中心，再以将来打包厂开工，则沙市又成为鄂西工运中心，所以我觉得特委应迁移于沙市，以便指导工作。

(二) 干部人材缺乏，又无法开班训练，虽说有各级组织，不能起若何大的作用。我党目前应改变县委的组织，除去一切的形式主义，应当将现在县委各负责人，分配到各区与重要支部工作，一面可以切实指导工作，一面可以就近训练一批干部人材。在相当时期中，要看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有了相当的基础时，再由各支部选举组织县委。

(三) 目前党的工作只能行于农村，而城市不能发展一步，以后应拼命的加紧城市工作，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否则农民意识将影响整个鄂西组织，鄂西的组织成为农民的组织了。

(四) 过去中央的刊物，鄂西一无所睹，同志们都好象瞎子一样。以后务请中央切实注意设法为要。

(五) 过去鄂西可说完全没有做到宣传工作，当然有印刷与交通和时间性的关系，但是以后假使各县的组织照我上面说的办法，分配县委到区内与重要支部中去，那么可以增加区及支部的经费，使其能自行发印宣传品，既可避免交通的困难和较能保持秘密与能适应时间性。总之，无论如何，宣传工作是要不间断的作能发生效力的。

(六) 游击战争是要从群众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才能不会脱离群众。这次游击的组织我却不知道，不过我听说纯是由党员拿枪的，若真是如此，难免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七) 这次游击的决议怎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虽说目前的政治环

境确是可以发动，而自己的组织力量太薄弱，经不起压迫打击，这是危险的第一点。农民革命的情绪虽说高涨，但是惧怕、不敢动的心理太浓厚，并且不是从农民的日常经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农民看我们的游击，好像是他们的救星一样，这样也是经不起压迫打击的，并且将来可以影响党的信仰，使群众再不敢动了，这是危险的第二点。城市方面毫无基础，亦无斗争，既不能领导农民的游击战争，复不能牵制敌人军队下乡，这是危险的第三点。总之，我觉得这次游击战争，确实有点盲动的性质。

（八）反帝工作完全忽略了，以后应特别注意。

张先梅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年代。

原文如此。

湘西北特委施元关于特委工作、暴动经过等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三日)

湘西北特委此次因施元同志受伤来沪就医，特着他将湘西北特委情形报告中央，施同志报告，因右手受伤，不能自写，爰[受]了笔记录之。

湘西北特委，自本年一月在上海奉中央命组织，以逸群、云卿、特立、郭亮等为委员，成立以后，立即西上，于一月十五日抵汉，当就地同湖北省委开联席会议，决定一切。其时因汉口正准备暴动，先由上海派去之陈恭昇熙二同志，陈因生活困难返湘，昇熙留汉指挥暴动，郭亮因鄂省委未交代，特立亦因临时失联络，故以上应去同志均未去，离汉时只云卿，逸群，及元等十余人而已。携去驳壳三支，手枪二支，子弹数千发，手榴弹五个，均鄂省委交来。离汉时系一月十八日晚，由汉包一小火轮原定直放津市，殊廿一号船至岳州反嘴（江北岸的小市镇）即与先由沪派去之贺锦斋李明铨同志等相遇，即卸船与之会合。当时他们系新在调关缴土匪械，二十余枝，特至此找我们的。此时云卿、逸群、锦斋，因特委人数不全，组织不完备，当地一带地方情形无联络不熟习，上游一带二军正同三十五军作战，汉口尚有枪械未到，即决定暂留此地。候派人向各方面取联络，定夺一切。隔两天，沔阳、监利、石首、华容各县委均联络起来，遂决定暂时在鄂西湘北一带工作。决定工作大概情形，是乘旧历新年，各地豪绅地主，多归到乡村，催租讨债，各地都准备大骚扰——年关暴动，大杀地主豪绅，特委工作从此开始也。

一、暴动经过

1、监利：监利反动势力团防极大，我党颇难活动，因此党在该县会[无]基础，特委遂会同酒县工农革命军第五军联络进攻，但结果因（一）我党在该境内会[无]基础，少民众的援助。（二）团防势力雄厚，我军技术不精，械弹不足而失败了，计敌方损失七八人，我军亦损失六人，元即是役受伤的。当作战时，特委全体动员云卿逸群等均携带枪械同兵士同志在一线前进，卒以寡众不敌，退回石首。同时在监利境内珠河上下车湾等处，亦有骚动，计杀地主豪绅二十余人。2、石首：石首的东西乡，农民均在我党领导之下，故此县工作情形较好，在骚动的开始，缴调关团防枪械后，民众即蠢起在我们指导之下，大杀豪绅地主三十余人，焚毁田契亦很多，在此地凡我们同志均全体动员。尤其东二区的河口赖家铺及北二区完全普遗的在我党旗帜之下，已拟定即成立苏维埃政府也。惟县城因有防军屯住，未去进攻。

3、华容：华容情形更好，同志遍布全县，东西乡比较更好，该县县委自在反嘴同特委取决年关大骚扰以后，即组织同志，全体动员放二月一号开始，四人为组，均表示极勇敢，因在最短期间，能坚决的执行杀戳豪绅至七十余人之多。惟县城方面驻军很多，故全未计及准备进攻。

以上三县骚动的报告，仅在军事方面，而随军事行动发展的组织宣传及民众方面情况可於后面总括言之。

（1）宣传：在各地骚动前后，均有特委制有布告、传单、标语、讲演，名义系“中国共产党湖北沔阳工农革命军第五军”，并附设有宣传队，专司各项工作，民众表示很接受，各地同志组织各县委、支部小组等亦於宣传有同样的进行。

（2）组织：在各县骚动开始，即帮助当地农民组织农民协会，或农民自卫军，惟此种组织，公开的秘密的都有。关于组织的行动方面，如实际斗争，

——抗租、抗捐、焚毁契约、赤色恐怖等，均有详尽的指导。

在此应附带报告者，鄂西湘北方面，自监利、石首、华容之县大骚动后，所有邻近之沔阳、汉川、潜江、公安、南县等地农民均大动起来，烧杀之事，无日无有，反动方面，恐慌异常，虽各地有驻军防范，但多不敢出地区一步，即可见其一般也。不过此中又有一特别情形，在此方面我党工作，不能普遍的深入民众，有的乡村仍全在地主把持之下，反对我们。尤其各县土匪是我党在当地工作的大障碍，因有土匪的地方，我们不但不能工作，而且土匪反有残杀我们同志的事，有的土匪竟保护地主，反抗我们，如沔阳四乡均在我党手中，而土匪则踞县城反抗。

二、特委情形

(1) 组织：特委虽仅云卿逸群二人，仍以特委名义工作，并以逸群为书记。关于工作进行，除云卿逸群二人外，常加入锦斋、明铨、及元等三人共同商决。特委之下，设二支部六小组特委直率一小组。支部每二周开会一次，小组每周开会一次，开会多讨论关于特委工作方面情形。计共已有同志四十余人，但多系新介绍加入的，而且继续的加入很多是一定。以上系党的组织。至军队方面的组织情形，名义上，已设一军，以贺锦斋为军长，军之下设一大队，大队辖二区队，每区队设三分队。共有官兵三百余人，旧二十军旧部仅三十余人，余皆由各县选派工农同志。枪械方面，计已有步枪二十余支，驳壳二十余枝，子弹颇缺，余兵多用梭镖[标]马刀。(惜在汉存步枪二十余枝，机枪一挺，被敌破获)

(2) 宣传：特委因忙於对外工作和跑路，故对内训练极缺少，兼因干部同志太少，故兵士政治训练，无一定负责同志，(如党代表)仅逸群

明铨作讲演而已。惟士兵方面，虽非同志，亦极明了其所负使命及任务，故表示颇勇敢。

(3) 目前的决定，一方面就已发动各地继续进行工作，一方面特委全体，则渐向湘西移动，无动身时，二月二十四号已移到安乡县，拟打通澧州和常德的交通与湘省委取联络。

(4) 特委对外的士兵运动，驻湘西四十三军李×部，有三分之一是贺旧部，我们同志亦多，刻已派人去联络，据报告，已有可靠三四百枪。同时据说李×本人及其师长谭浩然对云卿表示很好。将来湘西的军事发展，大致在该部内士兵群众中发动是有可能的。

(5) 云卿锦斋个人方面：云卿此行备受危险，但其精神极振作，决心极坚，对党只恐不孚信用，绝无犹疑，据他常常表示，始终愿受党的指挥及服从一切决议案，此次各役，他本人均同兵士在前线，毫无畏怯。锦斋亦多与云卿相同，其一切行动，均无不听从云卿。他尝说，可惜，我们在南昌暴动以前，未向他公开表示，否则，不至有今日。

三、特委对中央的请求

- (1) 请求多派军事和农运同志去工作。
- (2) 弹械和经济的相当接济。
- (3) 请求多寄各种印刷品。
- (4) 请求健全特委的组织。

上报告中，遗漏特委经济一项前特补此，特委在各地没收财物，仅现银(为数很少)由特委军需处收作军需用，铜元及其他货物，都发给农民。军中同志，官兵月饷廿元，但收入仅够伙食及交通零用而已。

个人来沪经过

监利作战受伤不能随队跟进，特委遂决定到沪养伤益报告中央一切，到汉因找不到交通处，无从接头，故来沪，当在石首决定我走时，云卿逸群曾有亲笔函嘱，在中央发给特委千元中，以八百元在汉买枪械，二百元作我医药等费用。现来沪无钱用，请酌发若干济用。

施元（即史书元）
三月十三日

逸群给伍豪信

(一九二八年五月六日)

伍豪兄：

一、兹将监、沔、石、华各县枪枝集中洪湖，于前月二日解决峰口之敌，缴获十八枝连枪支现洋三千元。

二、因峰口之役敌人非常恐慌，18军开来一营，会合监沔团防包围洪湖，乃将队伍拖来沔西。敌人又对沔西取围攻形势，乃将队伍拖回石首，因石首又正值18军清乡时，乃分开各×做骚动工作，俟环讲[境]稍有变动那[即可集中大干。

三、鄂西特委及沔阳县委负责人均无群众信仰，尤其是特委邓赤中，错误极了，大地方观念极浓厚。所谓特委不过是沔阳县委；所谓工农革命不过是沔阳团防。因此，邓赤中的党×极多，特不能提区委之特委，枪枝也多不能集中。与××关系极为恶劣，望上级设法改组[该]特委。

四、.....
.....很大打击，大学特委书记张计储、秘书长亮×××.....同志十余人均被牺牲，甚至.....因争先亦于×被害，以召集紧急会议讨论以后工作，闻省委有代表派来参加此会议。

弟逸群于沙市

注释

伍豪即周恩来。

陈茨庵给中央的报告——组织问题与军事工作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日)

家声 兄：

弟自潮汕失败后，在沪时因无接头处，故即到鄂西。达到鄂西与当地学校发生关系，兹将鄂西宜昌的工作报告如下：

1. 宜昌县委的：

宜昌县委负责人(书记)张善罕，在今年一月鄂西特委巡视该地工作，即开一次批评会，结果认为张善罕指导之错误，后继开全县代表大会，指出张错误之点，大致如左：

- (一) 经济手续不清；
- (二) 忽视职工运动；
- (三) 乡村工作无切实指导，亦未亲身参加；
- (四) 陈本金之死，张应负全责(宜昌农领袖)。

在大会中结[决]定张之处罚是：撤书记职——撤特委委员职，留党查看半年。新县委在大会中产生出，书记郑炽昌。

新县委刚产生，宜昌白色恐怖即开始，被捕者有梅、肖、余等三人，因无证据，经保开释。

宜昌西乡骚动一次，杀土劣八人，伤数人，后保卫团开始清乡，被捕十余人，戴希康被枪毙，其余者尚在拘留中。经此一次骚动之后，宜昌驻军防[防]视甚严，而乡村各乡工作完全停顿，城市中工委支有四，街道支有五。

宜昌新县委自产生后，工作则毫无进展，而县执委中更多幼稚，如决定工作不顾环境，并有依赖性(事实待述谢的关系)少数执委对受处罚的张善孚，每一工作必告诉他，而张借此自豪，张曾向我说，现虽未负责，许多事他都知道。

张善孚自受罚后，很不满意于党，屡向我说要到外面私人活动，并且时自发痛骂党的论调，此种事实，由一女同志许璧告诉我(因许与他同住)，如果在生活问题困难时，难免不有卖党卖同志之行动，张实为宜昌的隐患，不过郑炽昌也明了此种情形，随时是慎防他的。

2. 鄂西特委的：

鄂西特委本不健全，亦因人少关系，张计储、曹壮父、张献三、张善孚，四人中只张计储能负全责，而最弱又怯懦者是张献三，以张计储一人负全鄂西之责，当然有许多地方不能顾周到。

荆、当、远三县工作已停顿，尤其是远安，因神兵的关系；公、石的工作亦停顿，因反动派军阀压迫之关系；宜都虽有人工作，但在萌芽期。

在四月二十日，特委代表大会后，闻较有健全的组织，怎样恢复鄂西工作的计划？因我来沪，所以未详细的知道。

3. 施鹤方面的消息：

整个的施鹤，确实已陷于土匪神兵的包围中，所余者施南一县城，在特委方面，完全没有得到报告，所以特委派曹壮父到施巡视，其另一任务在谢关系中述。比较尚闹得利害的，只有巴东、咸丰两县，这两县占领县城数次，但是从没有听着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口号，想必是里面的同志尚不知到八七会议以后的策略。

4. 湘西北特委方面的消息：

贺龙自到桑植后，号召的人有千余，枪六百多只[支]，但子弹甚缺，

因组织劳农总部的风声[声]太大，被四十三军派一旅人进剿，贺无抵抗力，部已散，本人在走马坪（鹤峰）。

贺曾派人到鄂西特委取联络（李良耀），据他说：贺号召×众实难听党之命令，因贺只能驾驭数个头目，并且这些头目也难有牺牲的决心，所以湘西北目前的工作，不有发展的可能，致于党的组织亦毫无。

5. 鄂西的驻军与政治：

鄂西的驻军是43A与独五师，二军有一团在沙市，可以说是在两部份人统治下。独五师的刘和鼎已就清乡司令。据他本人说：他清乡“剿共”的办法是各村镇都要驻兵，必定要使宜昌成为很安静的，他好象受桂系的命令要久驻宜昌。致于四十三军，长沙会议很秘（密）的决定以该军入川，在一月内就要动员，该军已承认了。这种表现完全是桂系要想统治西南，必先图川，川能收复，滇、黔就可以入桂的范围，他就可以与蒋东南对抗，这即是桂的大西南主义心。

鄂西的税收方面，有魏益三委的，现被刘和鼎撤换。四十三军也在委人，省政府也在委人，他们都是你抢我夺的。

6. 谢与党的关系和我认识的起源：

谢与鄂西特委发生工作关系，在今年二月，由我的介绍与张计储谈话几次，同时特委决定他的工作有四：

一 尽量挑拨军阀的斗争；

二 设法反正整个四十三军；

四 传达重要的军事政治消息。

谢与我的认识是前年，过去我被总政治部派到该军做工作，那时他是师长兼参谋长并代行析军长（因李燊赴宁），当党权运动发生时，我曾主张他通电拥护，他亦承认了，电稿拟就而李燊恰返已东，遂被阻止，同时李撤他的师长职，我也受李的压迫返汉。可似说谢的倾向党是最久，他的认识也很正确，过去喜看《响导》、《中国青年》等刊物，老早他就被这些刊物引导着。

“八一”革命后，我时常和谢通讯，及到失败而返鄂西，他很高兴的与我接近，以私人友谊的关系，我与他同住，“八一”革命的经过和失败，时常和他谈及。经四月的考查，我才公开的与他谈党的问题，并且他也自愿发生工作关系，所以宜昌党的工作，得他的掩护实多，开始白色恐怖而未杀人亦是因他的关系，宜昌县委代表大会得安全的开会，是在他的寓所弄了一天一夜；由上海赴四川的两个同志，带有印刷品及秘信、通讯接头处被检查出，他当时即把秘信，通讯接头处，这些重要的焚毁，释放一人，有一人自承认是送宜警备司令部办理，现尚寄物宜昌县公署，此人是张竞若，判决为嫌疑犯，可无性命之虞。

宜昌县委因有谢的关系，许多问题都要谢替他们解决，如经济、借枪械等事，但他们不替谢顾及环境，只以为他是应当替我们干的，好象有了倚赖的倾向。

7. 谢本身之实力及在四十三军地位：

谢原有三千多人，后经李燊屡次摧残，实力已大半损失，现只余千余人，枪数百枝，不过四十三军倾向他的人很多，因其是贵州讲武生的军官，能够发生这种倾向。主因是：四十三军内部原来就复杂，意见极不一致，里面有嫡系非嫡系的分别，又有亲近嫡系与非亲近嫡系派，谢是非嫡系者而又非亲

近者。但是他虽被李撤师长职，现又恢复了，李对谢是笼络的手段，而谢亦认得清楚，李能用谢，因谢的才能在四十三军将领中，不有及得他的。李经两次湘战，而两次湘战的作战计划，皆谢手拟，平时重要的军事问题皆取决于谢。

8. 谢部下重要人及鄂西特委决定施鹤的工作：

谢部下有吴 是旅长，此人认识很正确，我和他处过数月，对谢的私人关系极好，所以鄂西特委派曹壮父到施与吴发生工作关系，在相当期间，造成施鹤七属的苏维埃割据。曹壮父是四月赴施的，谢也派有亲信人入施，因路远的关系，我在宜昌尚未得曹的信及吴施的信，所以工作情形此时不清楚。

9. 谢目前的决心：

谢自发生关系后，读《布》报 及《中央通讯》等，他已认定土地革命的必需及“八七”会议决定之正确。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扩大会议所指出的机会主义遗毒，必须扫灭尽尽，并且他想来沪一次，根[更]深切的得到关于他所必须为党工作的范围内的指示和训练，但因环境的不许，我已阻止他暂缓，待我来沪告兄后再为决定，他现在是很决心的愿倾家破产设法购械，增加他的武装。我此次来沪也就是为打听买械，如果武装得手，他要求党多派做军事工作的人到他的部内工作，准备待时发动。

10. 我对谢发生关系后的感想和希望：

谢的许多事实表现，我已认定他是我们的同志，在起初我尚疑虑着，恐怕陷于军事投机，现在这层疑虑已完全免出。不过顾虑的是：宜昌当地学校对于谢太倚赖了，恐怕风声太大，使谢陷于牺牲，在目前失去这个同志实在可惜，因为他自身的活动能力，现在对于党尚未贡献到十分之一，要怎样慎秘使他能培养自己的实力，同时并希望党，要切实的指导谢、训练谢，使他成为好的同志，因为谢的能力和认识，实在贺龙之上，是一个很可靠的军事人才。

11. 关于其他事项：

宜昌因校费无着，用谢的力量办《彝陵日报》，借此从中可以解决经济问题。当地学校决定办的人是邓峨高，此人任经理，但是不上一月即与学校脱离关系，所有报馆余剩者入邓的私囊，当地学校直到现在把邓无可奈何。

鄂西特委有信给谢，因公、石武装不能立足，要谢给名誉收编，但是特委不有顾虑到，公、石的武装已闹得通红，如谢收编，不但谢要被扑灭，就是武装亦不能保，所以当下我主张谢不有办，而事实亦困难，公、石隔宜昌相隔千里之远。

贺龙经过公、石时，贺锦斋送二十支枪与某地的团总，当地学校向他要他不给，这种表现是补助敌人的武装，而消灭本已，实在错误极了（他们给兄的信不有叙及此事，我在沙市看过信的）。

我从宜昌起身，同郑炽昌商量过，在宜组织暗杀队，专为对付学校内反动的，如张善孚——邓峨嵩等，但是他们没有决心，依然在封建情感中踟蹰着。

12. 结论：

从上面许多事实中看来，鄂西及湘西北主持校务的一部份，仍是在一切的机会主义中过去，他们不了解经常工作的重要，他们的动作都是沉溺在主观中，这可以说，他们还是不信任群众，不懂得群众，不认识环境，不知到

[道] 时机，不分轻重缓急，倚赖军事领袖，不由日常不断的斗争中加紧组织，加紧宣传，加紧训练，而造一发不可遏的、客观的、较有胜利的暴动。鄂西的前途是很有可为的，兄对于他们请速加以纠正，免致造成一些生吞活剥的盲动，把未来的光明障蔽下去了！

还有少数的份子，为工作便利计，曾为他们在反动的局面中开出几条道路，那知他们一踏足，便把党抛买[置]脑后，大过其升官发财之瘾（为张善孚、张少材、邓峨嵩、田竹筠等。田、×系教育局长）这样的份子，在某种情况之下，他们是一定可以卖党卖同志的，弟在当地时，曾屡次计划结果他们，但以种种不便未有执行。

尚有许多事件都待后达或面告。

关于谢沛生的名，以后有所指示请用王祥光，弟名用程振家。

陈茨庵
五月十日

注释

此年代为编者所判定。

家声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号。

原文缺序号三。

《布》报即中央半月刊《布尔什维克》。

“邓峨高”，此名似有误。

原文如此。

周逸群给中央的报告
——军事情况、鄂中特委工作及鄂西特委被破坏情形*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伍豪兄：

一、兹将监、沔、石、华各县枪枝集中洪湖，于前月二日解决峰口之敌，缴获十八支连枪、现洋三千元。

二、因峰口之役敌人非常恐慌，十八军开来一营会合监、沔团防包围洪湖，乃将队伍拖来沔西；敌又对沔西取围攻形势，乃将队伍拖回石首。因石首又正值十八军清乡时，乃分开各做骚动工作，俟环境稍有变动即集中大干。

三、鄂中特委及沔阳县委负责人均无群众信仰，尤其是特委邓赤中，错误极了，大地方观念极浓厚。所谓特委不过是沔阳县委；所谓工农革命不过是沔阳团防。因此邓赤中的党×极多。特委不能提区委之款，枪枝亦多不能集中，与××关系极为恶劣，望上级设法改组该特委。

四、巨大打击，大学特委书记张计储，秘书魏亮×同志十余人均被牺牲甚至周学先亦于 被害，现正召集紧急会议讨论以后工作，闻省委有代表派来参加此会议。

弟逸群
于沙市
六月二十三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年代为编者判定。

原件系药水写已腐蚀，缺字均达二十余。

湘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第一号）
——政治经济情形、特委破坏情形、党的工作以及工作布置和请求事项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正当省委巡视湘西工作的时候，临澧机关已经破坏，澧县书记（未明）不干，桃源机关破坏，并于[株]连特委机关破坏三处，捕去十余人，其中特委委员一人（负常德县委责任刘仁光）军委秘书亦被军部看管，现已叛党的有桃源书记（曾松林）常德有熊琼仙（女的汉寿人）军队中办事员黄某拟自首，业经特委处决，无故私自逃走的，有特委秘书严××（大概逃回安化）。

军队中办事的两人不明，尚有修理的驳壳枪未交还，大概已逃来长沙陶茂卿处，其余因叛徒王达被捕供出多人，常德市逃亡甚多。

此次机关破坏，除常德工作直接受大影响外，桃源此刻尚无人派去，不能巡视的人及慈利恢复负责工作的人，原先派定的皆已逃走，此刻派定的人尚未去，特委机关尚未建立起来。

在新旧特委过渡的时期，机关又遭破坏，工作非常混乱，只汉寿澧县临澧已新派人负责，常德乡村工作尚在进行，此刻常德乡村党员增加了百余人，城市的组织不致瓦解，十四军四十九师中已成立一支部，可以抓住一连人（明日开辰州），第五师特务连中，不日可成立一支部，其余已找得少数发生关系。

附抄六月七日直接寄给中央报告请查阅

游如艺，刘榛，胡斌来此接到中央几分通告，知道中央目前政策的大概，兹将此间情形及向中央请求事项分述于下：

（一）政治经济情形

湘西政治经济以常德做中心，澧县的津市亦为湘西北货物出入的重要口岸，除有少数的海员工人电器工人外尚有些产业组织形式的手工工厂的工人，经济力量大部分操在与买办勾结的商业资产阶级手里。

由常德下至临澧澧县汉寿等处湖田较多，地主也多半在湖田里面，由常至石门慈利桃源等县，山地较多，农民可以向地主借山耕种（不缴租）过他们原始的生活，这些地方的经济状况，依然是原始的定期交易，日中为市。

湘西匪风极盛，贫农多半为匪，困守农村，从事耕种的较少，所以突然到农村中去，并看不出许多穷人来，又因会党匪首多半做了官（如唐荣阳周×武唐振择四十三军等）许多群众只要抢得几条枪，也就接头做官去了，因为做官的倾向非常利害，可[所]以他们许多是站在地主方面。

因为我们暴动的发展，地主所走的路是：（1）拿着现金跑到城市经商变为商业资产阶级，（2）将自己的财产拿出买枪，在乡村直接镇压暴动，（3）拿钱到军队中买官做，（4）直接与我们接头，愿意破产交给我们买枪。

乡村的富农怨恨土豪劣绅，同时又不赞成暴动，此刻富农的代表者，是一般新起的绅士，普通的现象是找不着出路。

湘西的驻军，在鲁涤平当了省政府主席之后，主要的是陈嘉佑的十四军和第二军，留有极少数的队伍，辰州一带依然是何健的势力范围，当然军多地小，捐税极多，特别是会匪收编的军队驻扎地点（如从前四十三军在石门慈利）只有他们军事专政，地主阶级一样不得安宁，他们因为加粮加税多，我们的反抗，于是乃立上暴徒捐的名目，实行在乡村捉肥猪。

在以上种种及各种政治经济原因之下，农村经济破产极快，小地主以下日趋贫困，土地一天一天的感觉不敷分配（有许多地主分家后变为中农贫农）失业的日见增加。

（二）党的工作

（1）特委机关，特委机关一向没有建立起来，彭公达因不好，在此立足已去长沙（听说他要到中央来）原来的组织负责的，没有交代私自逃了，此刻是工委舒玉林（工人同志）兼代书记，蔡以忱组织局兼作宣传秘书等工作，军委刘龙云特委实际负责人只有两人，且兼常德县委，向没有得到省委的指导。

（2）各县党的组织及农民的组织，党员人数常德除逃散外，有四百卅人，其中工人九十，石门二百六十人，（其中逃散八十人知识分子占半数）汉寿七十人，临澧几十人，桃源四十人，澧县四十人，慈利五十人（以前未与特委接着头，现在才派人去）特区桃石常临交界处（有长短枪 50 枝在此处）一百人淑浦四十人，源州南县尚未接到报告麻阳三十人。

党的机关桃原破坏一次，澧县破坏二次，汉寿一次，临澧一次，常德 CY 一次，其中桃源澧县临国家主义加入了党，组织的牺牲最大，现有的组织完全是新发展的。

农民的组织，除农民党员以外，会员很少（以前桃原[源]澧县常德会员很多，现在都被严厉的清乡打碎了，此刻只有石门二百余人，常德二百余人，汉寿有一些其余很少。

注：上面的数目因以前负责人没有交代新的负责人，只到了一个星期所以只有一个大概。

（3）宣传工作，特委曾制定“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工人的农民的兵士的一般的种种口号，石门县张贴比较普遍公开的宣传只有特区的石门做了一些。

（4）零碎暴动，除临澧才开始以外，其余常德澧石桃汉[源]汉寿比较做得普遍，其中比较是群众的行动的要算桃源，东路常德近郊石门南乡等处，此刻因为暴动日见开展，团防局的枪枝也日益增加，清乡队也更厉害了。

（5）我们的武装第二军开长沙后，只十四军有一营，只一连可用。周×武在慈利成立教导队，是同志负责，此间已派人去，大约这一连人可以拿到手，又特区有长短枪 50 枝，此刻正到处游击，此外则石门有两个新同志，拖有四五十枝枪，将来可以正式编入工农革命军不能在此刻执行暴动（现在尚不知在何处）

（6）工人及士兵工作工运，只常德有九十个党员，分会极少，其余除澧县的津市外，没有对象，兵士工作才开始做。

（7）关于湘西北的，湘西北的特委前经省委决定与此间合并，受此间指挥，另在工农革命军中成立前敌委员会，周逸群任书记，派去的都已打转，上面情形不甚知道，大约在施南。

（三）此刻的布置

此刻关于湘西整个暴动的布置，重要的是注重常德到临澧澧县到石门慈利到汉寿益阳到桃源，以上是各要路组织的发展，在各要路沿途各支部，直接发生亲密的关系，平时作为党的交通机关，一递步哨的形式——暴动时拟各路设指挥，游击队的布置也是一样的注意上面各路。

（四）请求事项

(1) 此刻暴动工作，不易找钱，商旅也有护送队，各乡零碎抢得少数钱不够县委本身用，尚有许多县须特委津贴，特委不能……大半是经费关系，湘西廿余县，交通费每月需百元以上，特委交通机关与CY在一处，每×四十人以上出进负责人，负责人住处已成公开的，明知其危险万分，然没有钱不能迁移，各县的机关破坏，多半是经费的原因，因少数经费，致工作受大损失，同志受大的牺牲，未免太不划算，望按月接济特委五百元。

(2) 各地工作渐起来，机关应马上健全起来，望于经费问题解决时，即派一书记来。

(3) 因为湘西的白色恐怖，非常的严厉，交通不便，(或者还有经费原因) 湘西与省委不曾发生关系，望中央经常的直接指导，此间工作一切通告文件，可用五倍子写在报上寄来。

湘西特委
六月七日

周逸群给中央的报告——政治、经济形势，党及群众的组织*
(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

一、政治：鄂西政治自然和整个的湖北情形一样，统治阶级由封建的桂系军阀转移到蒋系军系军阀，对于民众，也是由残酷的屠杀变为欺骗的改良主义。但是直接压迫工农的土劣仍然是一样，他们唯一的工具，就是民团的武装（常练队），这些武装在经过激烈的斗争区域特别厉害，他们的阶级观念比较清楚，所以在江、石、监、沔、南、华、安、公等县，常常不分区域的联合清乡。自今年三月游击战争发动以后，他知道请军队是靠不住的（军队只能暂时帮助）也就加紧训练，因此，他们比较有战斗力，他们的技术也有进步，常常学习我们的化装袭击法来袭击我们。他们近来更知道纠正他们的烧杀政策，也知道发传单向民众宣传，可是他们不能取消苛捐杂税，民众根本不受他们的欺骗。至于和平发展的区域如松、枝、宜、荆、当、远、宜昌等县，土劣的阶级观念比较模糊，他们的工具（常练队），既无战斗力，又不戒备，民众虽受经济（苛杂）的压迫，但是没有斗争的经练[验]，所以恐怖心理非常浓厚。

现在住[驻]防宜、沙的军队是第四师（张发奎部），他们的纪律较好，对于清乡完全是敷衍，民众对他们的幻想的很多（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如商人、学生，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便要开军民联欢会与群众接近，群众都说他们很好。归、兴、巴三县是刘湘的部队，他们用种种方法与神兵拉拢，处处对神兵让步，神兵都说他们很好。沙市以下石、监等县是五十师谭道源部，对于清乡比较认真。

二、经济：赤色群众包围的市镇（如朱河、郝穴等处），虽然是反动势力占领，但是因捐税的加重，团防经常的戒备，防[妨]碍商业的交通，以致市面凋敝，商民嗟怨，大有破产之象。其他各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报告。

三、党及群众组织：一般城市组织一天天缩小，宜昌、沙市各仅一个支部各十余人，而中学更小，如宜昌仅五、六人，沙市则仅一个光杆的县委委员。乡村中游击战争发动的地方颇发展，支部亦能起作用，同志工作大都很积极，党的纪律也比较好，群众则成千成万起来参加革命，不仅挂名的加入农协，且能实际参加斗争。江、监、石、沔各县的农协，或县农协筹备处（要有三个区农协才能正式成立县农协），事实上已经成为乡村中的政权机关。

四、我来沪的任务：除参加军联会外，并代表五县联席会议（江、石、监、公、沔），向中央请求组织县委以上的指导机关，并说明事实及工作上困难。

逸群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年代系编者判定。

中共鄂西特委给湖北省委的报告
——特委最近工作计划、各县组织状况及工作情形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七日)

省委：

我们这次的内容计分：

1. 鄂西最近工作计划；
2. 各县最近工作情形；
3. 对于省常委通过之对于最近鄂西工作决议案之答复；
4. 其他则请此次来省代表面呈。

关于鄂西最近工作计划业在特委会议通过请予核示。

关于各县最近工作情形，除公安、石首上次已有报告恕不赘外，此次之江陵、宜昌、宜都，当阳，系各该地负责人对特委之报告，特委一字不改原文编陈；其他各县报告，系特委尽所知者，代庖。

关于对最近鄂西工作方针决议案，特委认为省委系口头传说或系尚未完全明了鄂西之情形与案内所指事实之真相的指示，故另有函伸[申]明之必要。

、鄂西最近工作计划：

(一) 目前的政治任务：

目前鄂西的局面，很快的又由杨森一系的军阀的饕餐到了各派大小军阀的聚食，由聚食以至于竞饕，由竞饕以至于火并，这是必然的现象。同时经济的衰败，因军阀混战、土匪骚扰而剧，其程度一般中小资产阶级亦深感不安。无产阶级的工农群众尤感受压迫剥削、失业、拉夫等切身的痛苦，而急于找着出路。军阀为争地盘，杨森虽被数派军阀联合威迫退守归、巴一带(即鄂西姊[秭]归、巴东)，然怒目睁睁终不忘怀于宜等，以至于吴大帅之武汉，择肥而噬之鲁涤平，大举图湘以后，鄂西流寇之李乐正自欣可以升堂(荆沙)而入室(宜昌)。北方饿虎之魏益三却大踏步占领孙传芳军阀发祥地之宜昌。其余之第五、第八十三师等杂色军队，都以此税收之地为丰满羽毛之地。因此久经变乱之鄂西人，其痛苦已如水益深、火益热。武装暴动之环境无疑意[义]的益热。特委曾指示驱杨战争时(临时通告中所指的战争第一个序幕)，我们应发动七县的总暴动，以宜昌、当阳、远安为中心，期以两星期之党的组织与民众的组织后，即行发动，结果仅宜昌之西南两乡发展游击战争。二军大举图湘时，荆、沙及其附近各地暴动，足以使两军完全塌台，以至于鄂西、湘北之军阀齐倒。因我们在各地方力量太小无法布置暴动局面，现在积极准备后方骚动工作，并发动江陵全县以龙湾为中心的游击战争。对于公安、石首两县委亦已飞令其发动至少须夺得多少武装。党为完成春暴的使命，应坚决的在很快的再次鄂西军阀火并时发动暴动，以至于建设宜昌、荆沙市苏维埃及各县苏维埃政权。

(二) 党的工作缺点与最近应有之努力：

鄂西的党完全是秋暴的产物，宜昌、江陵、当阳以前本有党的特支，但一般的都曾塌台过一次。党的发展历史非常之短，工作的缺点便格外要多。现虽依中央决议着手自下而上的改组，但曾经表现的重要缺点有如下列：A、党的指导机关不健全，指导工作非集权的，或党的内部不健全或分工以将争。下级的干部组织同。B、没有群众的组织，因此在每次斗争中，很少有群众参加，结果总是成为同志的个人拼命。C、不注意本身(党)组织之秘密，简直

是不知道党的秘密工作，尤其是在乡村里。D、宣传工作等于零，至今还有大多数同志怀着怕宣传的心理。E、教育的工作完全没有，因此一般同志除了忠勇外，委实是非常幼稚。F、职工运动完全没有，无异乎是取消职工运动，无论是宜、沙以及其他市县，工人运动总没做，最近虽已注意到，但仍是无办法。G、农运多无计划，且老只在杀土豪劣绅的号召下，很少深刻的普遍的宣传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农村支部完全失掉秘密性。H、一般的缺乏军事训练。I、在杀戮土劣贪污及一切反革命的行动中，多少还带着不做过火……的观念。J、宜昌和沙市近郊的农运都没有尽力去做，亦是非常之大的错误。

根据上述缺点，决定以下的最近努力之方针：

1. 组织方面：

A、特委经常须有二人巡视各县，执行下列工作。

主持各县自上而下之改组。 审查各县党员之重新登记。 召集会议解释党的策略和决议。 负责对于其他重要问题之解决与指示。

B、各县党员重新登记，做到缴纳党费、计算党员并举行增加党员运动，规定七中心县最近须发展人数如下：

宜昌工人同志五百，农民同志一千；

江陵工人同志三百，农民同志一千；

荆门工人同志一百，农民同志八百；

当阳工人同志一百，农民同志一千；

远安工人同志五十，农民同志一千；

公安工人同志一百，农民同志一千；

石首工人同志一百，农民同志一千；

其他各县一月内须成立县委。

C、各县党的全权集中于常务委员会，改正以个人指导工作或各自为战各不相系[干]之办法。

D、各级负责人一律实行选举制。

E、各级负责人工农须占三分之二，至少须占二分之一以上。

F、建立健全的工农军支部（按期开会讨论问题，执行工作等。

G、注意秘密工作。

2. 宣传方面：

A、根据中央扩大会议决议案及省委所发通告，切实训练同志。

B、普遍的扩大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宣传。

C、普遍的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反国民党的宣传。

D、每次行动中必须召集广大的群众开会，张贴布告、标语，散发传单以广泛宣传。

E、普及同志的军事训练时，须加紧同志的政治训练。

F、各县通令各区委实施以口号之训练，办法——由各区委逐日制定口号两种，如普通的“暴动”、“纪律”、“土地革命”、“列宁主义”之意义，使同志相见时，首先就问当日之口号。

G、各支部应经常组织宣传队以事宣传工作。

3. 工运方面：

A、健全特委、工委及宜昌、江陵两县委之组织，其他各县亦须尽可能的成立工委。

B、进行各业工人秘密工会及宜昌工代会、荆沙工代会之组织。

C、提出宜、沙两地工人切身之要求，发展经济斗争（如增资、反对拉夫等）。

D、努力工人自己公开之奋斗。

E、努力培植工人中忠勇份子并吸收入党。

F、由失业工人之救济运动，一直到抢米、抢衣、抢钱庄的城市暴动发动。

G、开始红色武装队之组织，并实施军事训练。

4. 农运方面：

A、尽量的组织农民群众在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随各地需要而定之（佃农、雇农、失业农民及贫苦的自耕农等）。

B、在反动势力溃散的乡村，应即组织乡村苏维埃为乡村政权机关。

C、在斗争中吸收忠勇农民加入本党。

D、注意农民领袖的培植和对一般农民的训练。

E、特别注意交通线上农民运动之发展。

F、特别注意宜昌、沙市近郊农民运动之发展。

5. 军事方面：

A、以各种方式、各种关系接近军队，作广大的反军阀之宣传，尤其注意伤兵之宣传。

B、根据中央军事议决案之主要口号（如增饷、铲除肉刑及反对军官侮辱士兵等），宣传兵士引起哗变。

C、根据省委最近通告发展士兵之组织。

D、特委之下设军事科为特委之军事计划——如破坏反动军队，组织兵士、群众机关。

E、扩大城市乡村红色武装队之组织与新式武器之取得。

F、同志普遍的施以军事训练。

G、根据省委计划着手工农革命第十军之组织。

H、消灭防[妨]碍暴动之土匪、民团等，而夺取其武装。

I、消灭军阀战争在战期地 当设法截留其谍报等，并夺取溃军之武器。

J、取得变象[相]之农民群众之武装团体领导权（如符门、大刀会等）。

K、进行制造炸弹及罐子炮等。

（三）武装暴动之积极准备。

1. 鄂西应揭[竭]全力发动宜昌、江陵、当阳、远安、荆门、公安、石首七县的暴动。

2. 暴动的方向应从武汉积极的发展，因此暴动的最前线，一为荆门之沙洋，一为江陵之龙湾及郝穴，一为石首之调弦。暴动之设防，一为远安之石桥坪。

3. 鄂西各县暴动区域如次：

A、宜昌为东西 南 三乡，以南乡之花艳冲为大本营。

B、江陵为东南北三乡，以东乡龙湾为大本营。

C、荆门为东南西三乡，以东乡沈家埠为大本营。

D、当阳为东南西北城厢五乡，以北乡之瓦仓为大本营。

E、远安为南北城厢三乡，以南昌[乡]之清汗场为大本营。

F、公安为东北两乡，以北乡之白沙洲为大本营。

G、石首为东北两乡，以北乡之新厂为大本营。

H、远安北乡之石桥坪，为鄂西之总大本营，远安县委应特别注意发展该

地之工作。

5. 各县发动暴动而尽可能的攻取县城。

6. 宜昌发动暴动后，由东乡之龙泉铺与当阳之双莲区委取进攻的联络；远安暴动发动后，由厢城委与当阳瓦仓之区委取进攻的联络；当阳暴动发动后，由乡之清汗河与荆门之高家集取进攻的联络；荆门暴动发动后，一方面沈家集与钟祥、一方面沙洋的向潜江取进攻的联络；江陵暴动发动后，一方面由龙湾与监利、一方面由郝穴向公安、石首取前进的联络；公安暴动发动后由郭巷、石首之新厂取前进的联络；石首暴动发动后，由调弦与监利取前进的联络。

7. 暴动发动须普遍的发动全县的群众，并尽可能的发动邻县的群众起来共同行动，免孤军作战减少胜利的可能。

8. 各县应即开始继续的发动杀土豪及反革命之游击战争，远安尤须于最短时间内，根本铲除上北乡土劣及反动之势力，并取得大刀会的领导权，造成割驻[据]局面。

9. 在暴动前应组织健全的宣传队、交通队、运输队、引导队、破坏队等。

10. 猛力发展宜、沙工人组织及经济的政治的罢工运动。

11. 开始城市的红色恐怖。

12. 暴动发动后，绝对的破坏一切交通机关——邮政、电报、电话，并断绝长江上游之交通。

13. 暴动时应尽情的歼灭土劣的政府官吏及一切反革命派 绝对禁止假仁假慈。

14. 暴动时应尽量焚毁田契、借据，铲除田界及没收土劣，贪污资本家及一切反革命派之财产、土地、矿山、森林、粮食、金银、大工厂、商店、汽车、房、物等，以归苏维埃政府。

15. 暴动后应无限制的组织志愿兵制的工农革命军。

16. 暴动后，应即在乡村召集农民代表大会，正式组织乡村苏维埃；在城市中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组织城市苏维埃。

17. 暴动后应择定有险可守的地方做大本营（如上述），集中军械、粮食于此处，以防敌人之反攻。

18. 暴动时注意缴敌人的军械，从敌人手中取得武器，并鼓动工农群众个个武装。

19. 暴动前扩大反军阀战争、建设苏维埃政府的宣传。

20. 其他各县在暴动时应尽力发动游击战争以资响应。

、各县最近工作情形：

（一）宜昌

A、政治情形：在这半个月内，整个的宜昌陷于兵匪混战蹂躏之下。起初杨森退败，在城乡派数十万军恼，临时纵兵抢劫，加以“老二”的恐吓，宜昌全市守户，街与街之交通完全断绝，强迫拉夫，乡村无人上街。一及二、四十三、三十军以及第五、第八独立师到宜，又遍住民房，强索食物，全城市民复为之大哗。未几湘西战发，以及上追杨逆，各军各师复大索精饷，乱拉夫役，使宜昌城市经济破产，除卖零星食品外，全体倒闭。当各军各师住宜时，对于税收、财政机关各献身手，争夺为“二王”附加税收，三十军与四十三军双方戒严一夜，几到火并。现驻宜主队部，为三十军号称“王团”，

该军第三师任警备司令，其余为四十三军一团。闻二军、四十三军及各独立师，曾联名电政府，说三十军“接委私人目无政府”，乡村中经济亦到不能恢复程度。在东南二乡所有集镇住各军骚扰，不惟货物食品如水洗，家用器俱全被焚毁，到处闻“兵更甚于匪”的呼声。北乡各地住杨森败军及匪的队伍，人民全部逃散，至今多未回去。

B、党的情形：宜昌党发展的区域，为城市及东西南三乡，数量约一百、七十、八十，坚决勇敢的佃农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最近因数种事变，将陷于乡村组织之趋势。

(1) 因东乡负责同志被家庭封锁不能工作，与以前农运同志牺牲，不能接头。南乡，初因最忠实勇敢的贫苦农民同志陈金——过去公开办农协，颇得一般农民信仰，尤其是在南乡——被该农贼豪绅贿赂杨森部下于退走时枪毙，因是农民同志失所领导，与中学负农运同志傅齐安被捕失踪，工作受一打击，经党提出为陈同志复仇，发展游击战争（花堰冲等处），致全县豪绅发抖，联合起来勾结三十军，派兵一营，围攻我们的南乡大本营，当毙农友二人，捕去十数人，同志若干，尚待调查，但农运工作人员及勇敢、忠实同志，恐均不免于难，惟现正在整理，其他各处同志，也不能安于工作。西乡豪绅求救于反动军阀，虽未获得帮助，但他们自动武装。以及南乡事件，同志不能形成组织行动。缺点是县委不健全，负总责同志不坚决发展农运，在乡村中只有党的组织，农村中太无秘密工作。在城市中除几个不起作用的工人同志外，尽是知识分子，没有打入主要市政工人——车夫、码头，城市同志没有工人运动。

C、斗争经过：宜昌曾接连在西南两乡实行骚动，约共行动七、八次，烧豪绅房屋十余处，杀豪绅及家属四五十人。初次行动原决定西、南两乡同时发动，后因南乡指导人犹豫，只西乡发动，烧豪绅一家，杀七、八人，未做宣传工作。一般农民认为匪的行动，并谓过于残忍，同志均受影响，经严厉纠正才鼓动勇气，又干第二次，干豪绅两家，杀人二十余，只烧一处房屋，未做一点宣传工作，甚至行动时假借报仇及匪名，如说四川话。南乡在陈同志牺牲后才开始行动，第一次干一家，烧房屋一处，杀死数人，因无经济与同志少，以至首领漏网、以革命委员会名，宣布罪状，以农协会名义贴标语。干第二次，集合同志开一次会，然后出发，行动时呼口号，行动后又开一会，此次烧房屋几处，杀土豪家属数人，并宣布罪状，张贴标语。干第三次在近郊区距宜垭仅十余里，距市镇只数里，因事发后有军队开来消息，故此次行动秩序较差，杀豪绅及家属七人，干两家只烧了一处，因一处豪绅在镇市中与贫苦农民房屋毗连，以后数次因豪绅恐惧，都逃到宜昌，只烧了房屋。行动的缺点，只是党的行动，未号召或吸引农民参加，同志多不自备武器，仅以空手去干。这三次行动共二十七人，除快火二枝、小刀数柄外，余为竹棒，总共只有十三件武器，不注意秘密。

D、要求：1. 接济经济；2. 派工运工作同志；3. 派工作人员。

(二) 江陵

阴历正月初八日，江陵代表大会开幕，除全县目前任务决议案已报告外，特将大会开幕后，江陵工作在各方面进行的概况分述如改组后党的组织和工作：

1. 自接到特委改组后，江陵党即实行由下而上的全部改组。全县六区委及荆、沙支部绝对实行上级党部命令，以选举的方式尽量提拔新的领袖——

工农份子参加各级党的指导机关。各级党部改组后，负责同志多为工农，惟因各区党的组织过于庞大，工农幼稚太甚，以至不能负担全责，而各地指导机关内的知识份子又少注意训练工作，虽使各地支部工作无人指导，甚至支部开会时区委无人参加。在此种情形之下，所谓建立支部工作者，在目前的无进步，所谓提拔新的工农份子者，实是等于零。

2. 县委改组结果：正式执委九人（工二、知四、农三），候补三人（知、农、工各一），常委五人（工一、智三、农一），正式监委三人（工一、知二），候补监委二人（工一，智一），组织科主任黄 ，宣传科主任兼军事科主任郑 （军科暂代），职工运动委员会五人（工四、知一）。执、监联席会开两次执委全体会，因委员散在各县，虽规定时间召集会议，但仍不能到。委员之为农民同志者，且多言论幼稚，工作不加紧，并不能代表县委在各处行使其职责。常委会是无定期的随时举行，惟刘、吕住龙湾，关因忙于解决本身生活问题，不能常来到会，因此结果改组后的县委不多，仍为周 、李 、郑 三人交错式的跳舞。

3. 一月来已由[有]党的组织，已由二百五十人（代表大会时的统计），发展到三百人之谱，除荆沙岑河口、郝穴等地党的组织有较迅速的发展外，余均无进展。同志成份：农民占百分之八十，工人占百分之十，知识份子占百分之十。荆沙发展的对象全为工人群众，乡村则百分之九十九为农民，对于手工业者仍未能深入。

4. 江陵全县五汛捕汛乡 西北区向无党的组织，最近须设法深入，除杞桥已发展到，现又设法派人往梅花桥、万城一带发生组织。总期江陵全县组织多与各邻县的组织能发生极亲密的联络工作，用在总的斗争中能互相呼应。

5. 县委巡视工作，自改组以后，李 因担任工委任务坐镇荆、沙外，周 、郑 则分往各地巡视与督促各地工作并参加各支部小组会议。

B 、工农运动概况：

1. 荆沙工运在常委、工委指导之下进行略有起色，工人同志略有增加，工会组织，荆沙有一车夫工会，沙成立了一个金银工会，人数均不见多，发展斗争尚是后事。职工运动计划已由工委拟定，当另报告。

2. 现在着手于对工人生活和要求的调查及宣传工作，除已举行工人运动宣传周，如所有在荆沙同志每日须分途与一个工人以上的工人谈话。

3. 沙市码头、车夫及交通工人尚未打进，此是江陵工运最大缺点

4. 农村工作又分别如下：

a、对河——农民在秘密农协组织之下者，百余人，负责者全系同志。乡农协会议虽然按时开会，但缺乏鼓动工作，农民无斗争情绪。武装问题，虽经党屡次指出，但结果甚坏，由此证明农民组织自[是]农民组织，党自[是]党，并不能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该区工作只是少数活动份子进行，党的组织作用一点没有。

b、戴家场——自受土匪打击后，工作大半归于停顿状态，虽则三百人之农民组织与二十人左右的党的组织未能完全塌台，该地一方因土匪盘踞不走，一方因公安方面土劣、反动武装之监视，可说工作环境非常不好。后又因二、八两军在该地开火，影响党的工作尤大。总之，这里工作已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之下，旧同志到处躲避，所在的人无法立足。

c、马家寨——该区党的组织，以前有五个支部，约共同同志六十余人，后

二圣洲划归公安县委指挥，及尽量洗刷其余各支部不良份子，现只剩同志三十左右，但这般同志中间知识份子系乡村三号劣绅之流，农工同志乏人指导。指导机关太不健全，陷党于若有若无状态之下，除同志尚未与戴家场的一样的躲避外，在工作上与戴家场实无两样。

d、郝穴——郝穴方面党的发展已由十余人发展到四十余人，路线有二：沿内河向岑河口发展（熊家河已成一个支部），一向东部监利发展；一向龙湾南部（沙岗白马寺）发展。农民俱以农委会名义号召，已成立农代表会者五处。白马寺、普济观、新观、环城路、田家场是也。其中以白马寺成绩最好，农民组织有二百多人，土枪十余支、梭矛不全，农民是勇敢，有发展斗争之可能，[其]他四处刚在发育时期，每处二十余人或十余人之组织。沙岗方面闻来也有办法。

e、龙湾党的历史，在实际上非常短，原不过挂名同志数十人而已（现已大半开除），后忽如春笋怒发，不两月中间发展到五十几同志，熊口、洪家场、土地口、龙市、侯家脑、陀子口、徐李市七支部，后收回董家台支部连有组织共支部八，同志七十余人，该湾原分五区，均有党的组织，不过在工作上以南区之徐李市为最好。徐李市原有农民自动社数处，社员不过数十人，后由自动社改为劳代表会，因同志努力工作，结果农民纷纷起来站在农民委员会和本党（公开）领导之下者达八百余人，杀征收官吏五人、土劣两人，同志之活动不待言，农民的斗争情绪非常高涨，尤其可宝贵者农村七、八岁到十岁之青年农友一经号召，动辄集合数百人开会讲演，大呼“CY万岁 CP万岁，要杀“办公事”的人，要杀土豪劣绅，不甘愿在老人之后，南区农民无论为成年为青年，百八十岁老人到七、八岁的幼稚，诚有完全组织在农代会领导之下的趋势。农民勇敢，刀矛尽有。党在该区除积极扩大农民组织与鼓动斗争外，必注意于武装扩充与训练工作。一切经费，一部分由同志自己拿出，一部分是豪绅地主因为恐怖而要表示亲密，希图侥幸自愿送来的。党的计划是决定在两星期内将南村农民尽量组织起来，全体武装成立红军，大举暴动，同时加紧其他四区工作，以为声援以备而扑灭龙湾全湾一切反革命势力，建立龙湾苏维埃政府。不幸革命势力之发展，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大为恫吓，促使其豢养的龙湾保安队联合老新口保安队，共计枪支七、八十枝，于二月十四日夜三更时，乘南区不备，予以极猛烈之袭击。以一排人包围刘氏祠（我们的兵工厂），杀死农民二人，伤二人，劫去罐子炮二尊，抬枪两尊，连枪十余支，刀矛十余杆，并放火燃烧。其他两排则包围刘家台（南区大本营），枪声砰砰，势猛严重。大中县委书记周、徐、龙湾区委书记刘赤声同志及其老婆陶白之被捕。陶同志在徐家场被保安队杀死，周、徐、刘三人押往龙湾保安队部时，龙湾土劣出入队部之门不绝。刘赤声同志于次日午略加审即被绑到街头杀死。赤声同志就义时，态度从容，大呼“过二十年还是个革命青年”。事变发生后，一时白色恐怖，系保安队大出其差，到处按名逮捕同志，幸同志早为之备，除区委委员罗开贵同志被捕后经保释外，余均逃避。刘家台已全部烧毁，农民多流离转徙，不能归家。此龙湾工作概况及两区“二·一五”事变经过之大略情形，详细俟另书面报告

b、岑河口——岑河口党的组织已发展到沙市，以灵祇寺支部发展为最迅速，未及一月，同志数量达四十人左右，岑区共八个支部，灵祇寺、九甲、隔堤、街道、潘章桥、委兴场、刘家嘴、新杨场，共约十八左右，农民同志均勇敢，如杀人毙公安局长、杀川军、杀土匪、杀官吏、杀土劣，前后已达

四十人之多。该区有一乡团原系党所领导，后因符门中兴，何登任——符门余孽——等亦乘机加入篡夺其农民领导权，而同志纷纷参加乡团，冀其每日可得二、三十串之工资，遂对逐渐信仰，而对党则渐渐消沉。此种情形以九甲、隔堤两处为中毒最深，因为大半都是入过符门的，加以党未能加以训练工作，遂以致此。其他各支在南沙只有系符门后者，惟灵祇寺一带，尚不带有符门迷信。岑河口区农民自乡团被何等强奸后，群众亦大部分被其强了，又以该区同志虽半困于乡团——佛门教里，以乡团为工作地，以每月薪资若干为其目的，对党的政策听而不闻，对党的指导阳奉阴违，以至于观点动摇而怀疑到党，现正设法积极纠正此种错误，并改变对乡团之政策，因此不时加以政治指导，使其同情 CP，而在 CP 政策之下行动。

C、青年工作：

江陵团的历史不过半年，在组织不上百人，精确的同志数量如各级团部多少，因为接到团部的正式报告，还在不动之中，能大概党有组织的亦随之而有组织。团的组织比较活动者为岑河口、马赛两处。在荆沙、的团的同志多忙于“公文形式”，今日教育局长，明日那里教员，对青工运动未加注意，亦显不能抛弃文士风度到工人群众中去。农村工作除偏于发展同志外，对青农群众组织从未见过，各级指导机关不健全与党无异，CY 县委改组后，常委委员会不过多添了几位能说不行的鼓动大家外，并不见得比县委书记徐同志单人跳舞进步多少。党在日常观查[察]中所得几点之大概论定，详细工作情形还须待团正式书面报告后交来。

D、结论：

党的目前最大任务除经常依照代表大会目前任务决议案努力执行外，是：1. 发展荆沙工运；2. 加紧恢复龙湾工作。a. 整顿岑河口工作；b. 发展郝湾工作。3. 新式武装之发展与集中，旧式武器之整理与发展。4. 秘密工作之训练及一切在技术工作上之注意。5. 扩大斗争，将零碎局面转骚动，进而形成整个的暴动力量。6. 督促及指导 CY 以正确的工作方针。

（三）宜都

A、政治情形——驻军为四十三军，不足两团，对于各方采取和平政策，李燊谓“宜都既无豪绅，又无共产党”。治军较严，一般人很信仰，惟各地设烟卡大肆搜刮与强迫拉夫，农民深感痛苦。该县各乡镇多行使商票，整个宜都变成纸币世界，足证明该县经济之恐慌。

B、党的情形——宜都发展区域为近郊善七区、花三区，占全县城十一分之三。数量：大学十二人，中学十人，起先未划分，目前才划分；成份：佃农占绝对多数，有保卫团士及窑工。农民委员会组织有三处，均有九十余人。工会也有相当组织。因工作人太少及发展时期仅两月，党没有力量。缺点是未公开宣传暴动及土地革命，无能力较大的工作同志，工作人员太少。

C、斗争的经过——宜都党的发展历史很短，没有斗争经验。

D、要求——（1）派负责同志及农运工作人员。（2）补助油印机全套。

（3）多给政策上文字的指导。

（四）当阳：

1. 组织情形——当阳自傅、张两派之下工作，骅宪臣傅多劣迹，而张统治势力比较巩固，两派中多有英勇善战之士，能为我们同志，我们不拘谁，只要谁是实行革命就进来，所以两派中多有其人，但都是服从党的指挥。全县十一区，没有党的组织者，只乾巩、马山两区，除观音、脚东、半月三区

组织较小外，其余城区慈化、河沧、清溪、瓦仓、双莲六区都很好（在未受打击前），过去负责人只注意瓦仓一处的暴动工作，失败后差不多无形溃散，党的组织仍然很小。最近全县同志人数已达百三十左右，观音四人，脚东六人，半月四人，城区四十余人、慈化十九人、河沧二十余人、清溪二十五人、瓦仓二十人、双莲十余人；成份农人占大多数，知识份子次之，工人最少。现党已完全改组，县委九人、执委二，傅恒之、严金山、齐秀松、××、赵鸿远、方聘三、李禄三等，监委：鲁也亭，另一农民。

2. 党的训练欠缺。说谈党的训练工作真是说不上，除少数同志稍明了阶级斗争和党的最近决定外，余则冒焉无知。去年冬，我初回县时与杜父同志同赴城区模范村农支会议，我即与杜父兄谈及党的同志被捕的，无论如何不得供党的组织和同志，如事真与性命有关，供死，不供亦死，即供也只好供我们的敌人——豪绅、地主。杜父同志回答说：不要吓坏了同志。这种心理不但带几分投机性，而且是欺哄农民，所以党稍受打击即影响全县工作。去年腊月底为二十军准备退党之时，我们党的准备夺取武装工作十分加紧，荷指挥清溪；超然、聘之指挥城区；秀松指挥双莲；慈化文则先；河沧徐永善，而以泽英、杜父担任总指挥，但以事机不密，河沧指挥徐永善被捕，未加拷打即将全组织和负责人统统供出。河沧二十军三十七团高当派一营人扑慈化，赵子克、文则先弟被捕，如是一时反革命盛气高于云霄。河溶、慈化组织解体，负责人及同志逃走一空，其他各地同志俱有戒惧。阴历年底，中学负责同志刘承万赴×催我逃走，我以工作重大而摧[催]我者又未见端倪，终于在城工作。

3. 党的工作概况：

正月初三日晚，初四日晨（相距不过十点钟），当阳全城没有兵的踪迹。三日晚，我即赴模范村与泽英商议不着，当写一简单的信与泽英，大意是关于此次工作，希即决定执行、时交一鼓、泽英、王燮、杨枝三同志，致保卫团即派团士找超然开紧急会议，决定此次骚扰和暴动。此次骚动决成暴动。起初我按党的组织情形——各区组织将具体情形以及党员行动的程度，超然发动后之种种困难并说土劣之如何凶顽，尤其是大的行动，要二县有联络，不然失败后，走都没处走，但终于决定动以此次难得时机，同时分配工作，超然调查县公署知事、科长等行动。行动中同学调查各地土劣。王燮往模范村弄农民群众出发。时钟已响十二下矣，超然久不见我来，即取询调查结果，但终于会不着。回自卫团时，泽英兄说超然已有信来，余以为有很好的结果，超然其大谬不然，除所调查对象不县署外，余则与在会议席上所发表言论相符。天将晓，王燮调十余农民同志，不能进城工作，不能作千载一时之机，虚度诚为可惜。我们又决定第二件工作，打来关庙和尚（此工作已决定九日干），以[已]有提前），但以此三十军清晨进城又低落下去。横竖此工作已决定有日子干，瓦仓于年节又杀土豪劣绅数人。

5. (11) 豪绅地主之凶横：

当阳之豪绅地主本来已是穷凶极恶，视过去之办党会人员如寇仇，最著者城区吴花于、周宝轩、张生邦已具有庞大势力，为当阳党务进行之劲敌。当三十军进驻当阳城时，曹老老、曹展畴钻入三十军，初即捕获李超然押司令部，豪绅地主即明告并出大批金钱贿赂匪军，超然同志竟于日前被反革命派豪绅地主枪决。反革命派之于革命已充分表现势不两立之孙经武连络该区土劣二汤、二鲍，能领导万余农民作反革命工作，向革命的瓦仓农民进攻，

过去的汪疏九、洪勋等都是死于该劣绅之手，近更出门带卫队防人刺死，此劣不除终为瓦仓之患。观音区之罗文含、尚性安、傅樵臣，仍然是仇视过去办农协人员并没收其财产家俱，人亦不敢回家，流落他乡了。

6. 当阳党的批评：

当阳多数党的负责人过于顾全环境，只少带有几分孟什维克色彩。换言之就是仍然在机会主义道上徘徊，其所以有此现象不外两途：（1）没有短的武装，大多清溪枪枝不能夺取，以及大反动派如孙经武、曹老七之不能刺杀，都是没有短的武装缘故；（2）负责人尽县中人，瓦仓失败后，多畏缩不前。

7. 当阳县党都要求：

请代购二、三枝短的武装，准备作积极刺杀土劣的工作，并发展全县暴动。

荆门：

1. 政治情形，自秦汉三部开赴前线（江南之公安、石首一带）后，三十军遂进驻荆门委派知事，大行其三要主义（每保洋三十元、马料二十石、马二十匹），一般土豪遂乘机献媚，攫取县政，因之一般的政治局势乃日趋反动。

2. 党的工作同志发展的数量，由四十人最近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西乡之高家店支部十二人、烂[烟]墩集支部五人、肉[周]家集支部五人、蒋家集有一小组，南乡之胡家集亦有二十人，在沈家集、马良集、沙洋等地方，亦有党的组织。年关骚动工作无表现，原因是仅邹孟笔[华]同志一人跳舞，其余的负责同志均不起作用，同时三十军大军压境，丧失他们行动勇气和决心了。特委最近的指示指定邹梦笔[华]、刘季侯、尉是[士]均组织临委常委会，经常有组织的处理党务，特别注意中心区域农运与沙洋汽车，×沙洋工运之发展，多少取得最近组织人民自卫团一些武装，并严格指示年关未行动的错误，限期发展成立正式县委，定二月十日为成立之期。

远安：

1. 政治情形。川军退走，罗福祥因之倒台，远安县安县长（罗部下）亦出走。远安遂为三十军一团所占据后，当大刀会所割据政局非常纷乱，我们因忙于对付大刀会，致年关骚动未能举行。

2. 党的工作组织方面。全县同志达百三十左右，共十支部，城厢一、北乡一、下北乡一、等共七。年关骚动工作亦未发动，且一般都陷于停顿中，因该县的两个能指挥，县委侯尉文大病不起，杰礼痊愈又疲于应付大刀会的进攻，在此次争半中牺牲了。在下北乡的群众领袖张汉迂同志，两个忠勇同志（佟汝南、另一妄[忘]名）。亦是远安工作的一个打击，唯特委近亦派人到该处积极整顿矣。

3. 远安县委对省委特殊的要求，远安全县土劣土地主（除上北乡外），以武昌之龙神庙五号远安定会为逃遁藪鬼域为中心，将为远安的我们不利，因此请省委设法将该臭狗窝（是反革命的力量之汇集）完全歼灭。

此外，枝江、松滋两县据大江南北，夹宜、宜江中心，在暴动的连[联]系上十分重要，特委亦已派人前往巡视，就近指导。（12）

注释

“李乐”似为“李桑”。

原文如此。

“开幕”似为“闭幕”。

原文如此。

原文缺序号“A”。

此处似为“农村十七、十八岁到二十岁”之误。

“河沧”似为“河溶”（下同）。

“清溪”似为“淆溪”（下同）。

“杜父”似为“壮父”（下同）。

(11) 原文缺序号“4”。

(12) 本文原稿系药水草写，字迹不清。此系按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抄写件刊印。

中共鄂西特委及曹壮父的报告
——军事、政治形势，党的组织工作，秋收暴动问题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七日)

目前鄂西政治与党的任务：

一、在裁兵×气之下，一般非嫡系军队咸[感]人人自危。四十三A有集中宜都向施鹤行动的倾向，其目的无非不安于长久在桂系威胁下，而积极企图入川回黔的梦想之实现。独立第五师有被桂系军阀压迫而全部移防兴山、秭归通巴东形势，如是鄂西将转入更普通[遍]、更严重的白色笼罩之下。最近清乡情形的不减于从前，尤其在荆当远、松滋、石首、江陵、公安、监利几县，除军队外更普遍了法西斯蒂的组织，有计划的、很技术的向我们进攻，实行十家联保，交通殊感困难。上游神兵半月前可说是普遍的高涨，最近因受军队打击，伤亡过巨，及其多数领袖贪污不法，破坏神兵唯一不要钱的信条，引起群众×情，致×目前成为一种衰败的倾向，但神兵组织目前尚未解体，且有“共神兵”与“非共神兵”敌对形势。“共神兵”系一般之称，实际不是党的，而只是一、二英雄色彩浓厚的同志所号召。

二、党的组织在白色压迫之下，恢复不是一时，而且阻于种种客观原因，所能办到的。公安、长阳、荆当远、松滋全部坍台，其他各县局部坍台，以致×幸而未受打击的组织均被此隔绝未能连系，甚至支部同区委距离太远，连彼此行动的呼应都感困难。城市工作，沙市全局坍台，宜昌工人同志寥如晨星，以及过去没有注意其他县城及近郊，到现在还是十分困难。最近宜昌城市工作就 去，沙市幸还可设法找得几个挑力夫同志，支部工作依然未能建立。最近的总计，宜昌七、八个支部，宜都十余，枝江三、四，江陵十余，荆门二，华容因白色利害 全部又坍台形式[势]，石首在敌人包围中，监利组织最好（有同志七百人左右，闻最近亦大部份在敌人包围中），巴东在军事时期，未接到特委报告，兴山最近才有同志，施鹤音讯则有于[如]黄鹤。

目前鄂西组织已成为极端隔绝的形势，过去工作最好的部份（如荆、当、远、江、公、石、华、监），白色恐怖的愈利害。荆、当阳组织坍台后，曾屡次派人进去，结果不是被捕便是不知去向。公安同志及多数群众都到处逃难，县境无人，故公、石、江、监勉强能发生关系，但反动势力仍是很大。

沙市城市工作之坍台，由于过去工作无基础，工人罢工斗争连受两次打击外，党的机（关）几次大破坏也是很大原因。目前，城市工作非有特别方法，用很多的精力去干不成。江陵县保卫团副团总肖 尚和我们吊膀子，我们正设法责成该具县委，注意派大批同志及农民进去当兵，完全依照士兵运动的办法做。

宜昌工作可说是中毒太深，一直到现在还是一种不死不活的现象。最近有神兵到河西，因反抗团防苛捐，进攻团防，群众多至数千，甚有扑灭之势（现已被反动军队打散，群众伤亡最多），……，即此可见宜昌党的力量了，推其原因有几点：

宜昌党的小资产阶级性太深，缺少“八七”精神；

过去县委指挥不力，县委不肯下乡，对其各区未负积极指导责任；

支部工作没有，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是党的力量薄弱的最大原因；

白色恐怖利害，党不能指导群众出路，以致群众斗争性是间歇现象；
环境太好，工作同志多出路，反正这里塌台，宜昌城市还可以跑一跑，因而同志没有工作决心；

不注意全局布置和普遍的发展；

工作没有策略，只知道注意军队换防，没有注意本身切实的政治任务及对工作和策略（如神兵问题）；

党内派别作用彼此钩心斗角，一方面客观社会环境的应[影]响反映，一方面是主观力量不能镇压；

工作塌台后不注意恢复，使同志与群众灰心失望，同时工作尚未完全塌台时，豪绅准备反攻，我们到认为无办法，不引导群众再接再厉的起来干；

城市工作太招牌化，不切实。

特委均接受省委关于组织上的指导后，即决定改组各县委。宜昌是近水楼台，已经改组完毕，正式县委五人，候补二人，挨[俟]组织发展再行扩大县委，正书记指定，前荆门临委书记邹梦华、副书记李炼青，邹未到前由李代理。

监利的党的确走上引导群众的道路。全县同志约七百，农会组织约千余人，能够切实受我们指挥的群众在七、八千左右。军事方面有相当的准备。乡村的斗争除一、二两区几至将反动派肃清外，其他两区也很普遍的爆发。最近敌人的反攻非常利害，但因党的历史太短，发展过速，训练太差，同志对党多不认识，城市工作完全没有，尤其错误是地方观念太深，工作犯雇佣式的毛病，特委现正积极纠正。

施鹤七属偏处在鄂西南的丛山峻岭中，交通之困难实为我们工作上莫大之障碍。两月前，我们曾派壮父同志前去巡视一次，得到概况如下：

（一）驻军为四十三A，但系道地的黔军，只有驻施南城的一部份，号称一旅，用的枪不满二百。其他各县如施鹤、来凤、利川等驻军的旗号虽是四十三A，其实都是当地的团防所改编。宣恩、咸丰、建始等县还依旧是团防的指挥，鹤峰约有枪五百，来凤六百，利川三百，宣恩一百，咸丰三百，建始不详，总计约在二千五百以上，比所谓黔军的力量至少有五倍，所以施南表面上虽是四十三A的统治，实际上是代表豪绅的团阀的局面。

（二）经济失败之程度至少冠于鄂西其他各县，未来地脊民贫，更加历年军阀、团阀的骚扰和剥削，耕种未时，收成荒歉，农村普遍的食料都是草根。米每升一千六百文还买不到，包谷每升七百文也不易得，这种食料恐慌的现象，普遍六七属而尤以鹤峰为最。施鹤虽是山国，而耕地甚少，土地的所有权很集中，所以收凡千石稞的地主，各县都找得出几个，因此佃农很多，他们高利贷之利率之高亦为外县所罕有。宣恩每千文的利为：包谷二升，合时价买来是一千四百文，以百分表明之为百分之一百四十。捐税之繁苛亦为外间所绝无，连贫农到市场去挑卖柴火亦须“打×”，其他无一不“打×”矣，据苏农民说挑粪还不“打×”，幸阿摩尼亚之不合他们之味也。

（三）在这样政治经济环境下的工农群众，为他们本身谋利益的革命，均是他们客观的需要，尽管文化低到连二十世纪还落后几十世纪，尽管引导他们的我们自己的力量薄弱到等于零，他们还是必然的爆发起很浓厚的神权色彩的近于乌合的军事组织——神兵、同门会、大道会、群英会等，他们无意识的在反对军阀和反对苛杂之目标之下，不断的行动起来。可惜的他们阶级意识模糊，容易为狡黠的豪绅所利用（上述的几种组织中，以群英会为较

进步，我们已有同志能相当的引导）。

（四）我们在施鹤的同志的数量没有确实的统计，大约在一百左右，成百分之九十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的阶级至少是中地主以上（他们大多数是武汉学生，而施鹤人非中地主以上不能遣子弟到外面留学），在外虽受些革命理论和空气之熏陶，但回家去很少不被优裕生活所软化，因此明了与坚决的份子很少。分家以后，虽有施鹤临时特委之组织（在鄂西特委指导之下），但因负责人小资产阶级性的表现，互相争权和不负责任，有等于无。所以我们只能说在施鹤有些同志，不能说施鹤有我们的组织。

（五）特委因人才、经济、交通之困难，目前尚无具体的办法，只能派一特派员去巡视再作道理。

上述情形系两月前的情形，据报纸所传不免受了些白色的摧残，甚至是严厉的摧残，果然则更多一困难矣。宜都、枝江、松滋已派人巡视，尚未接到报告。特委对各县整顿除纠正错误外，最重要者，便是兑现主义，但各县县委规定最低限度工作计划，绝对避免大块文章式的计划。

三、目前工作与秋暴问题：目前鄂西组织之整顿与恢复及过去工作之错误（如盲动主义、地域观念、雇佣劳动，忘却土地革命工作）之严厉纠正，为准备秋暴重要工作之一。

A、秋暴条件之推测

（a）客观条件：K. M. T. 的历史性。每次全会闭幕，军阀武装冲突必然爆发，如三中全会后有党权运动，四中全会后有西征战争。这次五中全会又已包含着不少的政治冲突，裁兵问题，财政统一问题，各派军阀均欢[想]取得在政治上的最高领袖地位，而事实为不可能，将要很快的由政治冲突转变到军事冲突。K. M. T. 军阀暂时妥协为不可能，武装冲突爆发时间绝不能延长到三个月以后，更不能如 K. M. T. 军阀所标榜的五次大会以后；帝国主义为维持其在中国势力，决不能让 K. M. T. 统一中国（即便是暂时的、表面的），将要利用种种方法挑拨中国军阀混战并扩大；在肃清杂色军队之下，小军阀不满意大军阀，而爆发许多小的局部的混战有绝对可能，如四十三 A、独立第五师等杂色军队，对桂西[系]的反抗在鄂西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因各省小的混战而促成大军阀的武装冲突，将更迅速的爆发。依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秋暴的客观条件已具备。

（b）主观力量之准备与估计。党在鄂西最有力量之区域，为江陵、公安、石首、监利等县，在客观环境变化时，我们相信能够号召两万群众（监利一万、公安三千、石首三千、江陵四千），同时公安在军事上占一重要地位，上游各县组织又不如上述四县之有基础，故鄂西秋暴中心在下游。以上游及鄂南为牵制敌人力量，再由鄂西、鄂中联合暴动，向武汉多途发展。在军事方面之准备：统一鄂西、鄂中军事指挥；添购连枪十五打至二十打，鄂西、鄂中原有武器共有长枪一百枝，连枪二百二十枝，继更设法增至三百枝；
× 要制造炸弹，我们认为这种计划如能实现，以大批新式武装补助两万群众马刀、梭标，有把握的解决江、公、石、监、酒五县团防，可抵御敌人一军之进攻。

（c）即开始督促各县发展旧式武器，编制赤色武装队、少年先锋队。

为完成秋暴，鄂西目前最大任务为：迅速恢复已倒台之各县工作，严厉改组，并加强各县指导机关，否则临时党有不能发动号召群众之绝大危险；

普遍注意各地组织发展，道路为石首、松滋对公安取进攻包围形式，发展宜都向长阳、通[五]峰发展，江陵西九区向当阳发展，石、公安、监、沔组秘密作用，务使各地组织与工作互相响应连锁；加紧城市（尤其是沙市、宜昌）及近郊工作，完成秋暴中心工作；加紧日常经济斗争，使群众革命情绪高涨，不至因长期白色恐怖而趣[趋]于消沉，此为发动群众之一。游击战争与加紧宣传反捐税、反清乡，揭破军阀裁军黑幕，反帝反团工作，使一般中立阶级感觉没有出路而倾向一个新的政权之建立，亦是秋暴准备最重要工作；加紧各地士兵工作，特别是宜都、松滋、江陵的团士运动，×特委起草此种运动之具体方法，交各级讨论执行；发展施鹤及巴兴归工作，在秋暴发动期可大肆骚动，一方堵截川军东下，一方牵制宜昌驻军；特委须经常派人巡视及督促各县工作，施鹤派一特派员，归兴巴派一特派员；建立鄂西与鄂中亲密关系，力求在工作上互相联系；建立鄂西济难工作；注意妇女运动。

鄂西区壮父同志报告今年秋暴客观的情形：

1. 敌人之各种实力及布置和派别。鄂西现正在很普遍白色清乡蹂躏之下，无论大小市场[镇]都有反动军队和团防驻扎。当地革命份子既多不能返家，舶来品盘查甚严，所以对我们的行动有许大[多]的妨碍。反动军队的战略上学我们一样——游击，来则避之妨碍甚小。最讨厌的是团防，以团防认真的县份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最显明的县份，我们的工作更难恢复，如公安、石首，由此我们知道，豪绅亲手造成的法西斯蒂，是我们强有力的敌对势力。现驻鄂西的军队有三种：十八军的五十七师一师，防地为江陵、公安、石首、监利、荆门及鄂中数县；四十三军的防地为宜都、松滋、枝江、五峰、长阳及施鹤七属，名为一军，枪支实数不过一万，且多土造；独立第五师约五团之众，器械较四十三军精良，防地为当阳、远安、秭归、兴山、巴东。这三种军队除十八军为桂本系军队外，余均为桂系新的杂色军队，而三十四A军长李晓炎因鄂西清乡司令及宜昌的地盘被独立第五师夺去，故不能与五师的杂色军队名义的共同利害之下团结起来，所以鄂西这三种军队的派别可以说是每一种有两个敌人。至于各县团防的实力和派别不甚知道。大概说起来，施鹤七属的实力最大，向有团阀之称，派别也极复杂。其他当阳、公安、松、枝、宜都、荆门等县新兴的防止[团]正在扩充，至于他们的派别能在赤色恐怖之下，冲突可暂时和缓，这算是土劣的进步了。

2. 一般群众的革命情绪。他们在苛杂、抽丁、豪绅敲诈、剥削、报复种种压迫之下，群众之需要革命很迫切，革命情绪并不因白色厉害而低落。如石首农民在清乡队住到境时，尽力为我们做报信、侦探、掩护等工作；松滋有几千群众的暴动；宜昌河西的农民因抗捐而在神兵号召和鼓动之下，一万多群众，鏖战至五六日之久，这就够证明群众的革命情绪并不低落了。据我的观察，如果在一个失败之后，我们能相当的做做济难工作，那可以说群众的革命情绪更可以渐渐地继续的高涨起来（此事很值得省委及中央注意）。

3. 秋收之丰歉今昔比——鄂西去年除施鹤因兵灾失时而荒歉外，普遍的丰收。今年普遍的旱象已成，近日江水突涨，滨江各县继以水灾，恐慌情形非常迫切，加之去年许多县在我们帮助之下，做到“二五”减租，今年的地主不惟不减，而且要补回去年的二五租额（荆门、当阳、公安），更令农民走头[投]无路了。

4. 缴租时期和多少比例——缴租时期大概在一月后开始。租额的比例各

县不甚统一，大概主佃各半或主六佃四。

5. 在秋时期，当地政治、军事之特殊的临时变化——除关整个的大局变化外，鄂西在秋收时有两个变化的可能，尤以第一个的可能性更大。桂系的裁兵口号之下，四十三A与独立五师都在被裁之列，目前四十三A有退施鹤，独立五师退归兴巴的趋势；川局内部的变化或桂系要解决四川问题，政治上、军事上与鄂西都有直接的影响。

总之，鄂西的客观情形，无论政治的、经济的，都有爆发秋暴的条件。

B、今年秋暴的主观力量：

(1) 党的组织的详情及党员的不确数。鄂西的党在严重打击以后，至今只恢复一部份，所以组织的详情和党员的确数很难知道。兹分为四种略言之：

(a) 与特委关系较密切的：宜昌，十余支部约百人以上，已照复式组织改组；江陵，十余支部约二百人，正在改组中；宜都，十余支部，约百余人，已改组。

(b) 与特委已发生关系而密切的：巴东，约四五十人；秭归，初有组织；兴山，初有组织；荆门，剩下两个支部；远安，近日发生关系，将恢复到百人；监利，党员三、四百，初发生关系。

(c) 可以与特委发生关系的，但因一时的阻隔和人才的困难，而未发生关系的：石首约三百人；华容多逃亡地方；施鹤七属约百人；松滋约二百人，暴动后不易派人去；枝江百余人，机关破获后不易派人去；长阳约百余人。

(d) 白色恐怖利害不能立足和无组织的：公安；当阳；五峰尚无组织。

(2) 在党的引导下或影响下，可以参加行动的群众，种别所在及数目：据现在关系较好及在最近可以发生较好的关系，各县略统计起来，大概：宜昌农民三千，江陵农民三千，宜都二千，巴东二千，秭归、兴山各一千、远安二千，监利一千，石首五千，华容三千，松滋三千，枝江一千，长阳一千，共计三万五千，至宜、沙的城市工人，现在还很渺茫的。

(3) (6) 缺。

(7) 现有快枪长短总共约百五十支，军事科计划再购连枪十打至十五打，约快枪三百支，配以梭标三万，至少可敌一军人，能用枪的人数至少五百人。

(8) 士兵运动尚未开始，可以叛变的反革命军队多少殊无把握，但松、枝、宜.....一带，团防的士兵运动已有可观，同时从各地开小差之多，与石首驻军之下级干部授意被捕同志取得开释等情，观察起来，我们反战之后，敌能够叛变的数目很少。

C、4项更是需要讨论的，不能由我胡乱报告可以了事。

壮父

八月十六日

接鄂西报告：

、青年工作。凡有党与团的地方，由党尽量设法指派同志去中学工作；党对团经济上的援助；党政治的决定工作，决定宣传大纲等须交团一份；中学特委每月须向大学特委作书面报告一次；通告各级党部切实注意团的工作。

v、对省委请求。政治指导密切；特委目前经济困难万分，请省委暂

设法相当供给； 依鄂西计划，秋暴最危险的厥为孤立，请省委加紧鄂南、鄂中以资策应； 迅速建立省委与鄂西交通及技术，再力求省委与特委关系之亲密； 即传达中央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 供给鄂西军事人才及迅速派职工运动人员来鄂西； 鄂西 CY 特委经改组仍不健全，CY 省委不宜又调多人他去，影响鄂西工作，请转 CY 省

委 于指定调往之三人中，只调一人至省委； 请省委垫印抄[钞]票一万，将来由鄂西偿还（详情由壮父面达）； 湖北济难会组织恢复否？

鄂西特委
八月一日

注释

原文如此。

周逸群给中央的报告
——对鄂西特委组织问题的意见*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中央：

鄂西特委所属地方太宽，但据实际情形，又不能分为两个特委，因为各县的工作必须有一个统一指导机关，才好联系。过去因为忽然取消特委而分为两个指导机关(中心县委)，实际上所谓中心县委的工作又还没有做起来，以致各县失了中心指导。现在据鄂西来的报告，工作已经一天一天缩小，而且陷于僵局，这是只要到鄂西实际工作的同志便可以看见。现在特委的组织已经由中央从新指定，但是据现在的情形看来，又不能不稍有变通之处，若照从前所决定做又恐怕办不通，不能不说出我的意见：

一、江陵工作，斗争的历史不如监、石，若特委兼江陵县委则对于本身工作有妨碍，且江陵地方党部的工作或因此不能健全。

二、长阳游击战争已经发动，川军又退回川省，归、兴、巴三县的游击战争，亦有可能，宜昌亦正在准备，似乎特委机关应在城市(最好是宜或沙市)，不应移至乡村，不过特委印刷机关应移至乡下。

三、目前工作又入于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斗争更加激烈(军阀加紧清乡，长阳一带已发动游击战争)，这样我转回鄂西马上要在宜昌计划并指挥全部的工作，所以不能从新指定特委负责人，还是恢复原来的组织比较顺利。[原来特委名单：逸群(书记)、万涛(副书记)、屈阳春、钱定生(已因病回鄂南)、邹资生(已死)、徐国元、段德昌、杨锦堂、郑炽昌]。

为工作方便起见，故特函陈详细情形。请伍豪兄面谈一次。

逸群

八月二十一日

注释

原文无年月，此系编者判定，本文在第一页左上角有眉批“提常委八月二十四日”。

周逸群给中央的信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中央：

我看了中央对鄂西党政治任务及其工作决议案以后，有以下的意见补充：

1、鄂西党员成份大部分是农民，所以地域观念特别浓厚，地方主义的确可以影响工作。其结果有分家的危险，这一错误观念，在特委虽然已经指出，仍觉不够，请中央指出那些危险性比较更有力量。

2、一般同志甚至负责的同志，一方面迷信武力，一方面又不能切实执行党员军事化的决议，这就是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不从斗争中去锻炼群众、武装群众，只幻想特委由赤色区域调武装同志(他们说当地同志没有斗争经验)去帮他们打倒团防，或是希望贺龙早到。这些不正确的观念，应请中央严厉的纠正。

3、毁灭城市及无目的烧杀政策，在同志中仍然有一部分保存着。他们最大的理由就是烧，市镇以后不会再驻军队了。这点错误也要请求加入。

4、据目前形势，特委决不能兼江陵县委。

逸群

周逸群给中央的信

——组织、军事问题、群众斗争情况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中央：

(一) 来函并贰百元已收到。(二) 鄂西组织以江、公、石、华、监数县为最好，确实在领导群众斗争，清乡虽然厉害，而组织仍然保存。不过三个月来牺牲干部极多，如军阀发生战事，在鄂西还可大干一下，至少上述几县，可以号召广大群众暴动，目前小的斗争仍是继续不断。(三) 因白色恐怖太严重，交通非常不便，如容易最近除施鹤外，都接到头了。决定九月一日在宜昌开扩大会专门讨论秋暴问题，一月前曾请省委派人参加，但回信除调人外更不说及。(四) 四十三军有一部份，我们运动拖出约枪六、七十支，在五峰行动来有报告，已与老贺代表接到头，且报上又载有贺被刺消息(刺客滕久云确有其人，曾充锦斋马弁)。(五) 省委对我们除调人外，政治上很少指导，且技术不好，派去的人不易接头，非常危险。(六) 省委接二连三来调我赴汉，担任省委军事科，我拟先到沪一行。(七) 我因要搬家请暂不寄来。

逸群

八月二十四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年代。

中央通告（第三号）

——目前革命形势与党的战术和策略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

（一）广州暴动使反动势力受着莫大的威吓而团结一致的向革命势力进攻

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兵士群众为创立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英勇的广州暴动，震惊了全世界帝国主义，威吓了国内一切反动势力团结一致向革命势力进攻，企图完全扑灭革命，英国帝国主义与广东的勾结，日本在北方的积极政策，固然是互相谅解的条件之下进行，即根本政策完全冲突的美国亦有一种默契。同时国民党的四全中会议，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汪精卫派的投降，代表封建阶级的桂系的妥协，而重行拥戴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登台，可见当时反动势力的各派都为要镇压革命起见，暂时放弃内部根本不能调和的矛盾而谋得相当的妥协。遂使当时组织尚未强大，队伍尚未整齐的革命势力遇上了这样敌人进攻，而遭受莫大的失败，尤其是城市因为残酷的白色恐怖而有暂时崩溃的现象。

（二）济南事变后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又开始爆发

最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遂利用此机会而采取更急进的政策，来实现他们独占北方的企图。因此积极出兵山东故意造成济南事变，以为他的侵略政策的借口。这种积极政策当然与在中国无甚势力范围的基础的美国利益根本冲突，同时对于英国在长江的利益也有莫大的威吓，于是三大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因利害的冲突又开始分道扬镳互相暗斗了，恰好不久，所谓北伐军打到北京与南方“共匪”亦被他们残酷的白色恐怖暂时压迫下去了。豪绅资产阶级所认为共同的敌人已经消失，当然他们内部不能妥协矛盾又爆发出来互相攻击，于是各个帝国主义各自我到他的工具，各派军阀也各自找到他的主人，开始他们新的火并的准备，所以“济南事变”与“打到北京”是反革命势力高涨的极峰，同时就是他们火并与崩溃的开始。

（三）济南事变激动革命运动的复兴

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政策，当然使中国群众无可忍受。因此，消沉很久的反帝运动，又开始复兴起来，当时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采取可耻的投降政策，更激起群众的愤怒，不单是工人阶级，就是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亦开始对反动的统治不满，因此，短期休息了的工人群众，又重行跑到街上来示威了（如上海五卅与六三），一般小资产阶级，也恢复了他们“和平救国”的排货运动，同时工人的经济斗争重复活跃起来，上海从五卅纪念起到现在，已经爆发不止百次的经济斗争。学生群众因对现状不满，亦复活了他们的活动，批评或反抗现在统治的出版物，不断的发行。农民斗争始终继续不断的起来，兵士群众的革命化，所以济南事变以后，革命运动又表现开始复兴起来。

（四）豪绅资产阶级的各派对革命运动复兴的不同的政策

革命运动复兴，当然豪绅资产阶级任何一派，都认为是根本的危险，而企图消灭他，不过因为他们相互的利害的冲突和根据于他们阶级的观点不同，而对于消灭革命的政策，也就互异，地主豪绅阶级，主张以更反动的政策完全扑灭。

一、地主阶级主张更反动的政策

所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坚决反对恢复民众运动，蔡元培并主张停止青年运动，反对统一主张分治合作（如政分会问题）。至于提出国民会议，不过是嫌国民党中央还不能纯粹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借国民会议更造成十足的地主阶级政权。

二、资产阶级主张改良政策其实同样的为要消灭革命

而资产阶级，则认得清楚，知道这一更反动的政策不单是不能消灭革命，并且要逼起更广大的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造成革命势力更广大的基础，促起革命更大更快的爆发，并且这一革命必然要直接走到危害他的存在的，所以主张以改良主义的面目来欺骗群众，恢复国民党在群众中已失的信任，缓和革命运动，分裂革命势力，要实现这些目的，必须有比较统一和集中的政权。所以打到北京后，马上召集裁兵，裁厘，财政三大会议。同时对外进行修约运动，在五中全会中更主张恢复民众运动，取消政治分会等，在群众中更故意宣传反帝国主义，实行排货运动，反对封建势力等口号（革命评论派与第三党便是实行他的政策的最好工具），这一政策，当然与地主豪绅阶级的政策相冲突，然而根本上同样的为要消灭革命。其实他的反帝运动，就是要防止彻底的群众的反帝运动，延长帝国主义的统治，反对封建势力，就是防止彻底的破坏封建势力，完全是一种反革命的作用，但是他们这种奸滑的无耻的革命政策，的确使一部分群众中——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受了他们的欺骗，又对国民党发生一些新的幻想。

三、改良政策只是有反革命的作用，并且对于革命进展的危险还更利害甚至影响到我们党内也以为“资产阶级又重行左倾起来”，“重行起革命的作用”，所以这种奸滑的欺骗的改良政策，对于革命进展的危险，比之明显的残暴的反动政策，还要利害千万倍。

（五）豪绅资产阶级各派既互相冲突遂

各自勾结一个帝国主义

豪绅资产阶级的各派既相冲突，当然马上要找到一个帝国主义做他的靠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既无势力范围，而他侵略的方式更复杂而狡猾，所以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对于他有利而无害，尤其是为要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利用中国资产阶级，所以首先与南京政府订约，取得最惠国的待遇。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策，首要的就是要保护他已得的特权，就是些少改良的修约运动，所以帮助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桂系来打击资产阶级，同时于他在长江的利益有危险的日本，在北方的积极政策，他必须防止，因此桂系一方面在南方排斥蒋介石，另一方面在北方又进攻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张宗昌。日本帝国主义，当然是继续他的独占北方的政策，又利用北方的残余军阀，作种种的挑衅来做他的侵略的借口。反动势力内部这样复杂的矛盾关系，自然造成纵横排[捭]合明争暗斗的局势。

（六）现在的局势，很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

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到来

现在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派，因各方面的准备尚未充分不能不暂时屈服于桂系，因此南京政府必然显露他的更反动凶恶的面目，更增加对群众的剥削与压迫，因此必然激起群众的不满而更革命化。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必然在群众中更提高他们的虚伪宣传，以扩大他在群众中的影响，防止群众的革命化，同时准备对桂系的战争，因此反动势力的内部的冲突必然更加激烈，

反动的政权，更趋于动摇崩溃的道路。所以现在的局势很明显的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新的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到来。

（七）党的目前主要的任务在争取广大的

群众促进革命的高潮更快的到来

就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的分析，新的革命高潮，固然不可避免的到来，但是要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保证在新的革命高潮中革命彻底胜利，这就要靠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广大群众斗争的力量来定的。以现在群众的斗争与组织力量，还不能够发动一个革命的高潮。所以争取广大群众——坚决群众革命的意识，动员群众的斗争，以促进革命的高潮更快的到来，以保证将来革命高潮中革命彻底的胜利，成为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

（八）实现目前任务的战术，是要肃清群众对国民党

幻想残余肃清资产阶级改良口号的影响而使

阶级对抗的形势更加尖锐

为要实现目前的任务，党必须有针对现在客观形势明显的战术的规划，第一要发动群众坚决的革命的意志，必须肃清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

的残余，使阶级对立的形势，更明显更激烈，同时给群众以将来政治上的出路。所以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为目前主要的宣传口号。第二现在妨害革命势力的团结，阻碍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最主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改良的口号的影响，所以党必须坚决的指出资产阶级改良口号的欺骗与反动性，必须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的任何一派，揭破他们的假面具肃清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才能使阶级对抗的影响更加尖锐。

（九）目前战术上主要的宣传的口号是准备武装暴动推翻

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

如果这一资产阶级的影响不肃清，必然会使部分群众从革命的战线当中分裂出来，动摇起来，甚至影响广大群众。这是革命发展中的最大的危险，所以现在党内对资产阶级错误的认识与估量（如认资产阶级左倾或估量资产阶级还需要一个革命的高潮），必须纠正过来，因为这一错误的认识与估量，可以走向与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某派联合的结论，而发生战术上莫大危机，更要影响到不正确的策略的决定，因此完成这一阶级的战术的目前的战略应该如下：

（一）对于复兴民众运动问题：应当反对革命评论派的“要求复兴民众运动”的口号，而提出“反对国民党禁止民众运动”和争取集会结社言论罢工的自由的口号。因为“要求恢复”，便是引导群众离开革命的斗争，而重新恢复对国民党的幻想。所以我们党必须坚决指出国民党只会禁止压迫或干涉革命的群众运动，革命评论派主张恢复群众运动，不过是要防止群众运动的革命化，所以群众应该自己起来实行革命的斗争，反对国民党禁止群众运动。同时加紧领导群众的部分的经济斗争（工人的加资减时的斗争，农民的减租抗税斗争，城市贫民的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以斗争的力量来争取一切的自由。同时在每一个斗争中，都必须宣传党的总的口号（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使发动斗争的口号与总的口号联系起来，使群众的斗争愈发展，而愈在党的总的口号之下团结起来。

（二）对于工人运动，必须在群众中，坚决的煽动，反对官僚包办工会，反对国民党委派工会职员的办法，提出“工会应该由工人自己来组织”的口

号。同时利用种种部分的经济的群众迫切要求的问题来发动群众的斗争，同时必须宣传八小时工作制等口号。坚决反对在工人运动中开始抬头的改良主义（如上海七大工会），反对阶级调和，劳资合作，强迫仲裁，以及分配红利等一切改良主义的和宣传，使工人渐次明白国民党任何一派，以及改良主义都是豪绅资产阶级的工具，而坚决的走到我们的革命的口号影响之下来，我们不应采取“统一战线”的口号，因为这些口号可以引起工人群众对于国民党工会的幻想，应普遍的发展工厂委员会（另有通告说明其作用），把在国民党及改良主义影响之下的工人群众完全夺取到我们方面来。

（三）对于农民运动，必须在群众中，指出所谓“佃租交纳条例”“东四佃六交租”等的办法，实际上是延长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治疗。必须坚决的宣传“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与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工农代表会议的政权等的口号，必须引导群众的斗争一直趋向这总的口号之下（详细的战略详一秋收工作方针——通告）。

（四）对反帝国主义运动：必须指出国民党的修约办法，实际上是延长帝国主义的统治，宁案解决与放弃济案的交涉，完全是无耻的卖国政策，必须坚决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没收帝国主义的工厂银行”等口号，在群众中宣传，并且要不断的宣传“只有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才能根本驱逐帝国主义”。同时要使群众由和平的排货运动走向反抗帝国主义与反动政府的群众示威运动等。

（五）对战争问题：必须明白指出，将来的蒋桂的战争，不过是争反革命领导的战争，必须揭破资产阶级想利用群众的阴谋，必须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变军阀战争为阶级战争”的口号。必须使群众从现在起就渐次团结在二个口号之下，然后到了军阀战争爆发的时候，才能使这二个口号变为群众的直接行动的口号。

（六）对裁厘问题：必须主张即刻废除厘金，同时反对一切变相的厘金捐税，必须号召群众实行来抵制一切捐税，坚决的反对一切变相的厘金。

（七）对裁兵问题：必须提出现在军阀的裁兵，不过是各自整理自己的实力，必须提出“彻底废除军阀制度，实行民众武装”的口号，同时要在兵士斗争中宣传“要求发清欠饷”“要解散费”“要土地”等引起兵士群众的斗争，同时要宣传“只有推翻军阀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兵士群众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八）对国民会议问题：必须提出这一国民会议，完全是军阀的“分赃会议”，在反动阶级统治的时候，决不会有真正民众的会议，真正的民众政权；要争得真正民众的政权，只有群众的武装暴动，推翻反动的统治以后，真正的民众的政权，只有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

这些问题的战略，都是实现目前战斗的目的的具体战斗方法。必须按照这些战略的方针去调动群众，组织群众，鼓动群众的斗争，然后才能肃清一切资产阶级改良政策的影响，提高群众的阶级的意识，团结在我们党的口号的周围，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实现将来领导群众，力争革命彻底胜利的任务。

（十）几个战略上的错误的偏向

现在战略上有严重的错误的偏向，都可以妨害党的总的战术的任务，必须充分注意的：

第一、认为现在部分群众的政治意识非常落后，现在党的战略上的口号

太高，群众暂时不能接受，所以党应该把政治的口号降低（如主张党的口号可以与第三党大略相同或主张“要求恢复民众运动”的口号，对国民会议不根本反对，只反“善后会议”式的国民会议，而要求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又如对反国民党的动摇等），所以党的政治口号应该看群众接受的程度来决定这一偏向，实在含有莫大的危险，很可恢复到过去的机会主义。

党的战略上的职任，是要提高群众的阶级的意识，使他渐次与自己有同样的程度。党决不能把自己的程度降低，去迁就群众的意识，党是先锋队，党是自己阶级中最觉悟的一部分，假如党的正确的战略的口号，暂时不能为多数群众所接受，这仅是党的政治宣传和斗争还未深入的暂时现象。党固然要极力去接近群众，但是要取得群众，而不是跟着群众跑，如果跟着群众跑，结果是帮助敌人，断送群众给敌人。所以接近群众的方法，是在多注意群众实际的迫切的要求，而领导他们的斗争，向革命的路上走。部分的要求应隶属在总的政治口号之下，决不能降低政治的口号去俯就部分的要求，党应坚持自己政治的策略的方针，利用种种的机会去说服群众。使群众的意识渐次提高起来，渐次团结到党的口号之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争取广大群众的任务”。

第二、认为现在客观的形势，马上可以发动反帝运动的高潮，所以党应该马上号召群众起来激烈行动，推动这一高潮更快的到来，党的一切的任务，便可以在这一高潮当中实现，或者主张要用反帝运动来拥护阶级斗争的复兴，这一偏向也是很危险的。

反帝运动要成为广大的潮流，必须是要有广大群众的组织力量，如果群众的革命意识尚未坚决，决不能造成一个革命高潮，所以我们只能说反帝运动可以帮助阶级斗争的发展，同时必须有阶级斗争广大的发动，才能促进反帝运动的高涨。所以新的革命高潮必是各种斗争的总的汇合（工人的经济斗争，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城市小资产阶级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反帝斗争，反军阀战争的斗争，兵士反军官斗争……等），所以我们目前战略上的任务，是要同时促进各种斗争的发展，尤其要注意各种斗争相互的联系，相互的促进而汇合成为一个总的高潮，所以目前的反帝运动必须与工人经济斗争，乡村的秋收斗争，兵士斗争，城市的反苛捐杂税斗争极力的联系起来，使成为一个总的反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决不能偏于反帝运动单方面发展，因为不单是客观不能，并且是一种冒险投机的倾向，结果将要使这一新的革命高潮流产。

第三、等待军阀战争，或者以军阀战争来做兴奋同志工作的吗啡针的错误。每一次军阀的大混战，都必然是反动统治动摇到极点的时候，已经不是发动工作的时期，而是号召群众起来推翻军阀统治的时期，尤其是将来的蒋桂两系的战争，以他们现在准备的形势，必将要形成长期混战的局面。蒋桂二系异常的奸滑，准备不充分决不轻于发动，所以党的任务要从现在加紧群众的工作领导各种的斗争，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在军阀战争爆发时来实现领导群众推翻统治的任务。如果怀一种等待的观念，或者军阀战争为发动工作时期的观念，那么我们将要丧失革命爆发时期，而成为一种等待的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假如平时不发动各种斗争，群众势力没有充分的强大的基础，军阀战争到临，也要陷于盲动主义的错误。

第四、忽视日常斗争的偏向必须肃清，目前党的总路线不立即布置一省或几省总暴动的局面，而是夺取积聚广大群众，准备将来胜利的暴动之基本

条件。必须坚决的恢复城市工作，必须坚决的发动与扩大日常争斗，才能完成这一总任务。

第五、和平发展的偏向亦须预防，因为现在不是总暴动的时期，因为现在是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由此便可发生和平发展的倾向，甚至取消主义的偏向，以为农民的游击战争也不要了，农民自发的暴动也不必去领导了，农军或红军也要解散了，一切都要走上“和平”“合法”的道路。这种偏向不但与党的目前总任务不两立，而且与党的生命不两立。

最后占决定意义的问题，便是党的组织问题，在革命严重的失败后，党的组织受了莫大的损失和削弱。现在必须坚决的恢复曾破坏之各大城市的组织，反对将各级指导机关避开城市而移于乡村。只有城市工作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才能迅速恢复与提高党的战斗力。

中央

注释

年代为编者判定。

贺龙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湘西北湘西特委的合并，红军的成立，石门暴动的经过及今后的任务

（一九二八年九月）

中央：

灵同志来接读中央的来信，欣喜之至！惟药信历时过久，故有很多的字句，没有洗出来以致中央给予我们的指示，不能完全知道，殊为恨事！龙因部队无人负责，暂时不能来沪参加全国军事讨论会；但俟部队改造完竣，在咸宜有相当基础时龙决定来沪一次。兹将此间过去工作情况及今后工作计划与向中央之请示，分别报告于下：

（1）特委的合并和红军的成立

此间自闰二月洪家关和苦竹坪之役以后因受四十三军的严重压迫和逸群同志等的失散，党的工作即陷于停顿状态。除三月省委始决定湘西北特委与湘西特委合并，以统一工作的指挥，湘西特委并决定此间成立湘西前敌委员会，管辖红军所在地的县委或特支；但派来之陈叶平同志，因中途阻隔，消息断绝，至阴五月中始到洪家关与我们相会，故前委于第二次洪市之役以后，方告成立。前委系锦斋叶平一鸣良耀与龙五人负责，龙为书记。

四十三军退于桑植时，我们在小埠头截其后队夺获枪支及辎重不少，并击毙其参谋长张策一名；当时的环境，本可进而夺取桑植县政权；但因部队分散各处，不能迅速汇合，与党和民众的组织没有丝毫基础，又适在洪市与敌陈策动姜文周等团作第二次战争，李团长云卿阵亡，故只得退守内半县，以便休息与整理，在这个期间之中，反动派的压迫，虽然比较小些，但我们部队的内部，非常复杂，一切行动多与党的政策违背，尤其锦斋同志的动摇，使龙对于部队的改造，无从着手进行，如阴五月末，前委决定实施士兵训练和对外宣传，锦斋坚不赞同对士兵高呼

口号，表示反对。不过前敌的障碍无论如何的多，我们的工作仍是依然进行着。在××革命×念的大会中正式将部队改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并委锦斋为师长，炳南文炎各为大队长。形式上已是焕然一新了！

红军成立时，前委即决定：（一）原有的部队必须渐进的予以彻底的改造，故加紧下级干部和士兵训练工作，同时吸收进步的士兵为党的中坚分子；（二）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掀起广大的农民起来斗争；（三）红军停滞在桑植，于政治的作用太小，俟子弹的补充稍足时，我们必须开到石门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同时须向常德取包围形势，我们在此种工作原则之下，通告各级同志全体动员均有相当结果，如士兵同志发展至四十人以上，一般的士兵对于土地革命的意义，亦有相当的了解农民方面虽然没有做过组织工作，但各种标语布告，已遍布内半县，宣传上颇收成效。

不过党的工作，虽渐有起色，内部的冲突和动摇，较前更要厉害了；事实是：（1）宣传队在×子湾张贴标语和布告，锦斋同志竟公开的撕毁，并发表了很多违反党的政策的意见。（2）一部分军官只愿拖队捉肥猪称土大王，不愿下去暴动，遂蓄意拖枪潜进。前委对锦斋如此举动本决定开除其党籍继因他表示忏悔，请求处分，并愿随红军下去暴动，故仅予以留党察看并撤销其前委委员的职权。同时为防止带兵官的携枪潜逃和提高党的威权，大队以上均设有党代表，以帮助并监督军官的工作与行动。

在这尚有一事须报告中央者：桑植的农民较湘西各县为最××但因民族观念非常浓厚过去没有一点组织与训练，而受豪绅土匪的压迫又最厉害，一点不敢反抗，所以不容易起来，尤其党的组织一点没有基础，要外来的同志宣传农民，实不能发生重大的信仰与作用。因此，桑植的农运竟没有做好，这是我们认为最不满意的。

（二）石门暴动的经过：

本来我们决定阴六月初就要到石门来的（当时湘西特委亦有通告要我们下来牵制十四军向湘东红军的包围）但因种种困难以致延至阴七月六日始将红军开动，唯在红军开动时，有一事值得报告，即红军移动前李高脚膝久远等拖枪潜逃，前委为严申铁的纪律计将游移不定且蓄意拖枪之谷新阶（区队长）执行枪决，自后一般军官，始知党纪之不可违抗。阴七月十一日红军进驻石门西北乡之中心区域——磨市面暴动工作又有一番新的开展了！在红军到达石境时，前委即与石门西北委负责同志开一联席会议议决：（1）以磨市区为石门西北乡暴动的中心，在磨市的四周如泥沙锁街子良坪×阳皂角市石黄厂石门坯等处于最短期间必须恢复并发展党的组织，同时公开的号召农民起来暴动；（2）暴动起来之后，即须在磨市建立农村苏维埃，实行割据西北乡并没收豪劣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3）石门南×××××之新安合之等暴动区域联合，向石门县取包围形势，进而夺取石门县政权，向桃常发展。但我们对于这种工作因西北乡同志的畏缩和群众的没有起来；只做到一最小部分，即在磨市杀了几个豪劣及清乡委员，没收其财产和做了几天广大的宣传工作，除讲演外标语布告和小小传单可说已普遍西北乡了。石门西北乡暴动工作，既不能实现，于是改变计划以较有农民组织的谍阳区为红军根据地，并决定夺取澧县的大堰瑯王家厂两处的反动武装。阴七月二十二日红军从磨市前进，一昼夜行百八十里而抵王家厂只因侦探工作不好和士兵疲倦太甚，没有完全得到大堰瑯的武装。惟在王家的暴动，引起了广大的市民起来，在群众大会中表决枪毙五个征收员，锦斋以自动的带领士兵将反动团防局长的契约房屋烧毁，反而红军的军纪亦为一般群众所称赞；这是那次暴动的较好的一点成绩。二十四日晚红军转回谍阳，以师部及大队驻新开市龙及经委会驻曾庆干同志家（与师部相距七八里）是夜即得到敌人包围我们的消息。我们本已决定先去解决官铺之敌，只因侦探员去不归，而官兵之疲倦又到万分，致使敌先来攻我，结果，军部及经委会完全冲散，龙与诸同志几遭不测（当时前委委员叶平良耀等均分散后始集合××××稍获胜利，以众寡不敌，卒归退却。是役闻黄鳌同志阵亡，谍阳既败，一切工作又成泡影，乃退至泥沙，准备再起；除已解决泥沙团防武装及斩杀大豪劣陈唐诸逆外，翌晨即被叛党之罗致英打击，因锦斋在开始接触时阵亡，致使兵无斗志，溃败不可收合。

此次石门失败之原因是：（1）湘东红军已受打击，广大而普遍的石门南乡农民暴动及桃源东乡和临澧之县等处的斗争，均遭失败，以致敌人得以专力对付我们，我们当然不能战胜敌人；（2）湘西特委给此间报告，太不确实，他们说西北乡的党务较有基础，但我们到达磨市后，西北乡的同一——知识分子简直没有一点表现，甚至连派一个侦探或向导都找不出来；（3）自今春石门惨案发生后，石门党务和群众××组织均受重大的打击××××××××××暴动，竟成了一个单

纯的军事行动，没有××××××××××诸人的武装又

中共鄂西特委逸群的报告

——组织情况、城市工作、土地革命、军事行动、秋收暴动与省委的关系及经济问题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九日于上海)

(一) 组织情形：鄂西合计二十三县（最近由湖南省委新拨南、华、安三县不计在内），县委组织健全者为江陵、石首、监利、荆门、远安、宜昌、宜都等七县。公安、当阳以及秭归、巴东、兴山等县过去曾经号召很广大的群众参加斗争，现因白色恐怖利害，组织坍合，惟群众影响很深，恢复自然容易。松滋、枝江、长阳三县均只能成立特支。其他施鹤七属因交通阻塞，合共亦仅六七十个同志，仅有同志而无组织，尤其是大、中两校划分更不能开会（此划分问题大、中两校特委争论很久，大学主张暂不化[划]分，中学主张化[划]分，结果中学主张是根据中央通告《中学组织独立》只好由他划分，但事实大、中都不能开会了），既不能开会如何能发展组织？民众方面凡有党的组织之处，均有民众组织。宜昌以下各县均有农民委员会之组织，宜昌以上则有神兵之组织，惟神兵乃鄂西有历史之组织，不过党派同志去领导他们做经济斗争而已，合计党员约二千人（南华安在外，CY在外）。农民成份占百分之八十，其余为智识或半智识份子，城市工人则微乎又微不过十余人耳。

(二) 城市工作：过去特委对于城市完全放弃，实是错误，鄂西之宜昌为川鄂主要道，政治上非常重要，而交通亦极便利，工人数量亦有三四万人，沙市为鄂西重要商场，工人亦有万余，藕池为湘鄂要道，商业亦发达。乃过去特委在宜昌无机关，所有归兴巴、松滋、枝江、宜都的工作均交宜昌县委管理，而宜昌县委本身又不健全，且同志派别分歧，故宜昌城市工作完全没有，原来本城同志亦纷纷退出或反动。阴四月初旬特委大半负责人牺牲。逸群由石首赶至沙市组织临委，并决定迁至宜昌。五月下旬省委才到宜昌正式改特委，才正式决定注意城市工作。沙市工运最近才稍有线索（老同志才找到）。藕池虽亦注意但无力顾及。最大原因是为经济困难，因为工作非有相当的经济不能进行。

(三) 土地革命：在鄂西仅仅做到没收大劣绅地主之土地，而未能分配，巴东虽然拿到两个多月的政权，亦未能实[行]土地革命，此是鄂西过去工作之严重错误。现特委已通告各县，无论一乡、一村亦实行分配土地，不过这问题不是容易解决的，过去因为上上[下]脱离，实在不知如何分配法，如说耕者有其田，则已办到，因为大土地主已逃跑或被杀死，其土地自然为耕者所有（原来就由地主分配给农民耕种），不必再经过没收而又分配之。此层请中央详细指示。

(四) 军事行动及军事力量：当湘鄂战争时，鄂西军事在公安有枪四五百支，成立四师，参加军事行动的农民亦有数千，随后因清乡军严重压迫，仅拖出五十余支到石首，敌人继续又到石首清乡，适逸群正抵石首，乃率之拖到监利，与鄂中武装会合于洪湖，解决峰口之敌，缴得枪十余支，又继续与团防作战，缴得枪十余支。逸群赴沙市时，乃分为三起，共编为一大队，一特务队，大队下分三中队，第一中队到华容；第二中队到监利；第三中队到石首。特务队（以拨[驳]壳枪组织之），最近拖到江陵上游，仅宜昌有连

枪四支，编为特务第二队，现在宜都行动。最近宜都又拖出四十三军一部分，有七、八十支，现在长阳、五峰一带，逸群来时，曾几次派人去联络，未得回信，亦未接到他们正式报告，仅派一小×来说他们拟解决五峰团防，现在不知如何？

（五）秋收工作：省委通告要我们准备秋暴，特委对此问题曾详细讨论，认为如军阀起了混战，鄂西下游各县可以号召很广大的群众起一个大暴动，如照现在这样，敌人正在有计划的清乡，我们的组织尚难保存，遑论其他，故目前鄂西工作，只能引导群众做小的经济斗争而已。（六）要求：

（1）与中央切取联络，鄂省委随时在被破坏，自然对于特委的指示随时间断，以后如能与中央切取联络，则可由中央找省委，由省委又可找特委。方不致如以前有半年不能接头之危险。并要求中央，以后无论何项通告，均直接寄一份到鄂西，俾得早睹为快，又可减少省委许多危险。

（2）津贴：过去鄂西不得省委津贴，并送万余元给省委，此时如特委仍照以前一样，不要城市，不顾全部工作，则亦可以不要津贴，如军阀军队稍有行动，交通可以恢复，下游各县存款可以送到沙、宜，则亦可以不要津贴。但此时上级命令又要加紧城市，顾及全部，而又当白色恐怖严重，交通不便，则特委势必要省委津贴，我们最低限度的预算，每月三百元（交通费、办公费一百五十元，生活费房租在内一百五十元），宜昌机关四个，沙市两个，郝穴一个，共七个机关，如少了则万万办不到。而省委只允许二百元，假如是做生意，我要三百元，他还二百元早已成功。无奈我们不是生意，二百元实在办不到，也是无法啊！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

——目前政治形势、特委和各县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形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中央：

来信及送来党费三百六十元均收到，现鄂西工作概况报告于下：

1、鄂西政治情形

目前鄂西政局已到了不安定的时期，虽然桂系军代[阙]，还没有积极向独五师取军事上的行动，但独五师方面已感觉到本身势力的危险，地盘的丧失，经济税收机关一大半被桂系占去，无日不在困难中过日，随时想谋本身势力的存在，不得不另找出路。近来独五师进兵宜都及长阳一带，又虽去打老贺，其实他们的用意是，想集中兵力前赴宜、鹤去解决穷无所归的四十三军，并可借“剿共”、“剿匪”之名，避免桂系冲突，以谋暂时生存。宜昌现驻独五师，只有炮兵一营，他如从鄂西来宜之康师，名虽三旅，实则一旅人尚不足，驻在西坝及西南之一带。康师之来鄂西，决负有桂系使命，对于独五师有所进攻，不过在康师初来宜昌之时，尚须时日整理，此独五师之所以感觉不安而另辟生路也。

鄂西各县豪绅冲突，益形显著。据一般而论，在各县内俱分成派别，彼此设法陷害，无法不用其极，如宜都“四大王”派首领刘培之，把持县政三十余年，而县内各机关非“四大王”派不能插足。又有豪绅卞立生等另组一派，也想夺取县政，他如回宜都，陈光炳一派学生，更号召宜都较进步的士绅，来推翻前两派，结果前两派勾结驻军加陈以“共匪”罪名将陈枪决。嗣后陈派又联络在省同学，及被害家属给“四大王”派以反攻，将刘培之押解到省。松滋豪绅亦分为两派，一是王小卿派，一是蹇鼎臣派，两派斗争最剧烈，县政系蹇派已揽，各派抓有枪械数百枝。在豪绅明争暗斗当中，除显之派别互相攻击外，更有一般豪绅肆行无忌的任意诬蔑前国民党党员及小商人等之事实。

豪绅的法西斯蒂组织——保卫团各县俱已普遍，而且正在积极扩充中，如松滋县团防有枪千余支，枝江之江口、董市团防有枪二、三百支，宜都、安福寺、横溪河、红花套等处至少也有四、五十支，远安等县的团防现正建立起来，并且购买大批器械，实行保障他们豪绅的势力。向我们进攻得利害的团防，要算江口商团及松滋蹇派的一部分势力为最有力量。

乡村农民佃农占过半数，有些县分今年简直没有收成，多半自耕农的生活亦形困难。如松滋西斋、街河市、刘家场、施家场、磨盘洲、老嘴及县城附近一带农民，枝江南水[北]两岸农民苦不堪言，他如在三界场、石子岭及山谷一带地方连吃水都不易得，在各县工业区域的工人生活，如宜都善溪窑七百余工人，枝江萍溪及乡槐树湾八百余产煤工人，生活都是非常困难的，每日所得的工资最多不过五百文。

、各县工作概况

(1) 荆门县委负责同志六人，已成立两个区委，另外三个支部合计同志二百余人。县委出有“仁利”宣传品，已发行三星期，因经济困难，负责人生活及住所均成问题，而一切技术工作，更无法改良。县委前派数同志参加类似第三党组织之齐心会，曾领导齐心会会员向土劣作一次斗争，结果获得胜利，一般土劣纷纷逃避沙市（未接详细报告）。

(2) 监、沔最近情形：自该县于八月十五日骚动，及至朱河后县委书记熊传藻失踪，武器现分散各处（沙市交通处转来简单报告）。

(3) 宜都党部虽受四十三军之一次打击，在江南工作尚未恢复，但在江北福山区方面组织仍然能照常工作，该区计有同志百余人，支部十余个，佃农、雇农占过多数，知识分子顶少，现正从事江南工作布置，俾使派同志前去恢复。

(4) 枝江三界场、江口、百里州三处，已有党的组织，同志计三十余人，而工友、雇农同志占大多数，少数知识分子颇消极，并有愿意脱离组织倾向。到江口、董市及县城士兵运动，现正着手进行。全县所有布置，拟在董市及县城建立机关两处，特委酌量津贴布置费三十元，该县临时县委负责人，除特派王天洪同志负书记外，并挑选江口工友同志及三界场雇农同志一人组织，不日当可就绪。

(5) 松滋组织恢复为时甚短，现仅组织一特支，大中同志尚未划分清楚，最近特委调津诚同志到松滋负责，切实划分党团组织。对于九岭岗一带支部，责成迅予恢复。

(6) 远安前已恢复十余支部，继因军队清乡，负责人少，同志多鸟兽散，特委已给远安县委信，严厉纠正同志之无端恐怖，及负责人之任意离开职守，并派有同志赴远工作。

(7) 当阳、长阳工作已派同志去恢复，尚未得着信息，鹤峰已成立一特支，同志约十余人，因路程过远，交通不便，特委指导有鞭长莫及之势，而该县实施工作情形，亦难得知大概。

(8) 宜昌及江陵详细工作情形与前次报告无大出入。除宜昌县委派同志到乡村巡视及恢复组织，尚未得报告外，在城市方面已散发传单数次——十月革命的，反国民党苛杂的，小商人联合会及工代会反苛杂的——在一般民众不无影响，尤其是小商人联合会的传单，一般中小商人敢怒而不敢言的痛苦，谈得痛快淋漓。他们——中小商人以如真有小商人联合会之组织，发出无限的羡慕，并且有破产的小商人要求加入的事实。

(9) 最近各县被捕的同志计有前去监、沔五同志被捕，中校所派张人琪同志、江陵县委书记田泽洲被捕，监利县委书记熊传藻失踪，宜昌负责同志也被捕一个。

、特委本身工作情形

(一) 特委组织情形。特委组织久已丧失无余，壮父、家勋同志已调省委工作，万涛同志在华容被捕尚未出狱，霞峰已弃职潜逃，人镜在监利负县委书记职，自八月十五骚动后已失踪，目前特委负责人，事实上只有逸群一人负责。特委秘书处已拟定郑、贺两同志负责，秘书处机关亦未建立好，而技术人才亦缺乏，特委本身欲求秘书处之健全，亦有不可能之势。

(二) 特委工作概况

特委既无多人负责，对于各县巡视，颇难积极进行，在松、枝、宜三县，仅派有××前去巡视一次，其他各县，特委只得尽本身力量，予以文字上之指导，并且调各县负责同志来宜详细谈话。计最近所发各县信件：江陵县委两件、远安县委两件、石首县委两件、沙市交通处信五件、省委信五件，特务第一大队信二件、中央信三件，松、枝、宜各一件，总计信二十四件。关于宣传方面，特委已翻印“秋收斗争”及“十月革命宣传大纲”两种，交给各县委及特支切实执行。对于过去宣传工作上之错误，特委并详细分析清楚，

通告各级党部讨论，予以严厉之纠正，而且指明出今后宣传工作应利用组织灰色团体——民权社、民权大同盟、反帝国主义联合会、反苛杂委员会、贫农会等，作广大的宣传。特委计发下通告两次，一是纠正过去机会主义及盲动主义的；一是纠正过去宣传错误的。至中央前给鄂西特委信，鄂西×同志俱已普遍传到。

(三) 对于中央的请示

a、特委负责同志，非被捕即失踪，或者弃职潜逃，事实上特委只有一人负责，颇感困难，要在各县调同志健全特委组织，实办不到，因各县负责人与特委同受损失。希中央转告省委对于鄂西特委组织之健全，应积极设法补救实为切实。

b、如县负责人有书记被捕，如有负责同志被捕的二人，[各]级党部负责人颇感缺乏，荆门、长阳、宜都、石首恢复工作，特委须派人负责，因此对于下级干部，倘中央能派同志到鄂西工作，希予尽量派来。到特委机关之建立尚无女同志作家眷，若有女同志，希派两位同志来。

c、石首、监利负指挥军事工作同志几完全牺牲，请中央派五、六[位]指挥军事工作同志来鄂西指挥农民武装。

d、鄂西济难情形，前湖北省济总会派来同志已到宜昌、江陵一带，救济一般同志颇为兴奋。但他县被难同志尚未得救济者，颇不乏人。各县党部已纷纷来缄请求特委救济，特委因经济困难无法解决，同志颇多责言。中央转饬湖北省济总会，速派同志携款来鄂西救济。

e、鄂西多半同志感觉工作困难，苦闷异常，有些消极的都想脱离组织，虽不反动，亦不积极工作，忠实勉强争[挣]扎。特委对于苦闷的、感觉工作困难的同志，除平日谈话解释予以兴奋外，尚希中央有所补助，最低限度须办到以下两事：鄂西被难同志都能普遍的得着救济；中央通告必须设法达到鄂西，以便特委传达得[给]各同志，予以无限的兴奋。

f、前蜀和轮船所带一切刊物及文件，抵宜时已完全损失去，船上同志亦被捕。

g、兑来党费已取到，希中央以后照此办法寄来，以免迟延。

h、南华安特委希中央转饬湖南省委予以介绍。

鄂西特委

九月二十六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央关于军事策略问题给贺龙的指示信

(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

此时限下午一时 处并即转可交去 人 去可

小平 四日

龙兄：

中央对于你们在那方孤军奋斗与牺牲的精神，首先表示十分的敬意，不过你们现在的实力并不很强而龙兄在那里的目标太大走引起敌人联合猛力的向你们进攻，若龙兄仍不脱开，减少目标，这部分实力，恐终久不能保存而要被敌人消减。中央现在很希望龙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务望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相当信仰能作指挥工作的，代替你的工作，同时中央可即派一军事工作同志来任参谋帮助他计划及一切，龙兄即刻起程前来中央是为主要。

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现时的形式及本党总的政治路线，均有很明确的新的估计与规定。大会明白指出，中国革命高潮已经过去，现时革命高潮没有到来，不过这高潮是快要到来的，因此党在

目前总的路线是争取群众，宣传武装暴动的口号，准备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时，实行武装暴动任务，党的军事工作，自然亦不能离开这个路线，

目前军事工人的任务，除在军阀军队中积极的作破坏工作在政治上夺取整千整万的士兵群众到革命方面外，另一方面应积极准备我们本身力量，如党员军事化，工人群众的军事组织和准备，农民群众游击运动的准备

以及建立红军，都是本党目前严重的任务。

你们那方面的工作，自然亦是军事工作之一部分，更具体的说，是一种农民的游击战争，在目前农民群众生活日益痛苦所受压迫日益厉害

的时候，乡村游击战争自然很有向前发展的可能。但是游击战争最重要的，必须出于群众的要求，必须在群众的组织与领导之下，必须与群众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必须有计划的有组织而集中的指导。过去游击战争有散漫缺乏与群众的联系毁灭城市和乡村无目的的烧杀的倾向，这些错误的倾向，必须严重的加以纠正。

六次大会指出游击战争主要的任务第一位即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

(没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杀戮土豪劣绅地主等，建立农民代表会议及农村苏维埃政权)发展农民更广大的群众到革命斗争的战线上来，第二建立红军游击战争勇敢的青年尤其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分子参加到游击的队伍中来，使其渐次扩大成为工农革命的红军，第三削弱反动派的力量，如收藏民团、警察的武装等。

由游击战争发展到地方暴动，必须注意到客观的条件与主客观的力量，用适当的策略去领导，即是要在斗争的过程中，真正发动了级[极]广大的农民群众，在群众中要建立真正自己政权的要求，在当地反动势力确在动摇崩溃的时候，然后游击战争才能发展到地方暴动，同时必须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以县市工人群众的领导与联系去进行。必须立即实现一切群众斗争的口号，肃清一切反动势力以发展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尤其是要注意扩大暴动的范围到邻近的区域中去。

至于民团土匪，他们的社会成分，多与贫苦农民有联系，我们在民团土匪中应宣土地政纲，建立干部吸收他们的群众，从豪绅地主领导之下分化过

来。

以上这些问题，均是六次大会所明白指出的，因为这些与你们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特此慎重的提出，使你们特别注意，并想办法要使群众了解。

你们目前在大的敌人包围之下，欲图大规模的发展恐甚困难，此时宜竭力避免与敌人的主要力量直接冲突，以免被敌人消灭，同时你们到某地应极力帮助发展群众，使群众起来成为斗争的主力，你们的武装只有在广大群众当中才能生存而发展这是你们主要的任务。

关于政治路线及工作路线已详前信，六次大会决议案可向鄂西特委案阅，接到时请在全体同志中讨论执行，同时龙兄来时关于所部工作的种种实际问题可与鄂西特委商决。

谨致

G 的敬礼

中央

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的信

——恢复鄂中特委与通讯处问题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 中央：

鄂中沔阳派谭 来宜，报告沔阳县委情形，组织尚存在，只有同志四百余人， 则为农民、知识分子。鄂中特委邓 死，现已没有他们，因为天门、汉川、京山、潜江等县塌台。事实上潜江还有组织，并无人负责去恢复，脱离上级指导已久，其错误极多，现经逸群同志与之作两次长时间之谈话，特委令其马上回沔阳，规定其工作有：

(1) 从速恢复新堤市委工作。

(2) 与潜江、汉川、天门各县同志讨论恢复鄂中特委组织，并提出名单，宜昌转呈省委批准。

(3) 将中央致鄂西特委信带回传达到每个同志。

(4) 队伍中比较灰色同志，一律派到群众中去工作。

(5) 提出对鄂中工作之具体意见，供省委讨论材料。

鄂西特委认为有迅速恢复鄂中工作之必要，省委应即派人前往负责。

宜昌与上游交通便利，四川省委交通中央既要鄂西特委负责，则鄂西与上海交通应力求完善，现特规定注意之点有：

(1) 来信写“宜昌收”

(2) 由轮船.....

前交四川省委通信处，现不适用，改为“宜昌商会.....” 但此处只能通信，万不可接头。

鄂西特委十月份党费三百元、工费六十元，请由上海聚兴诚银行汇来至要！

鄂西特委

十月十日

注释

原件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系原件省略。

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

——宜昌工委改组、各县工作情形及贺龙部队情况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四日)

中央：

兹将鄂西最近工作情形略述梗概于后：

一、宜沙职工运动：本月九日，宜昌工委从[重]新改组就绪，系挑选大、中工友比较进步同志所组而成，委员计五人，书记王玉山（车工）、秘书范时新（校工）、工委邓（印业工人）、吴远孝（钟表工人）、逸群等五同志。在第一次工委会决议，暂以有线索可寻的羊皮业、车夫、木工为目前工作三大对象，并分别支配各同志工作。在第一次开会时，拟将从报告中所取得的成绩，从[重]新决定新的工作方针和策略。至沙市职工运动情形，特委已派罗正品同志到沙，尚未接报告，详后函。他如各县城市工作，特委亦已通告各县委及特支加紧工运并组织工委，而于各乡村、大市镇工人亦要注意到。

二、松、枝、宜三县工作情形：本月十日，枝江负责同志王天洪来宜报告松、枝、宜最近工作情形。在宜都方面虽然曾经四十三军之摧残，而负责同志多被捕入狱和牺牲，然而在宜都江北区组织，仍能保持旧有形势，并有时开会。现该区同志要求特委派人前去指导，特委已详细给该县委信及指示，最近工作具体方法及应注意之策略问题外，并调高同志来宜有所询问，以便切实指导一切。在枝江，最近工作于白帝州张宗尾一带，已有党的组织，计同志二十二人（中籍 四人，工友八人，知识、农友各四五人），至，现正在积极进行发展中，而士兵运动亦有线索可寻，惟因经济困难，特委除纠正枝江工作已详细信外，并津贴党费十五元，军运交通费五元，济难在监狱两同志四元至。松滋情形自该县组织坍台后，特委过去因与该县工作 生关系。现该县同志有与枝江负责人接着头者，要求特委派人前去指导，现已调枝江负责人携带特委信件前去恢复组织，在信中并严厉的指出过去松滋工作上错误（一部份工友因未得参加指导甚至怀疑本党）和鼓励他们的勇气，赶快的组织起来，俟该县组织恢复后并要派负责人来宜谈话（别县工作详后函）。

三、鄂西农民武装：贺龙部队现派邹海涛同志来宜报告最近该部情形。该部自前次在宜沙、磨盘州（石门地界）动员向石门县城进攻后，殊遇反动部队四面截击，曾受一次之损失，计损失长枪百余枝，连枪二十余枝，现尚保存者仍有长枪百余枝，连枪二十余枝，敬斋中弹身亡。现海涛同志来宜请求特委接济子弹，并请示游击区域，特委除（派）人代购子弹外，并给该部信一件，说明该部半年来奋斗之错误和缺点（与广大群众之拥护，没有发动群众及提高政治宣传），并述及鄂西相毗连该部 民武装——大峰口（宜都与五峰交界处）、子良坪（五峰）武装有长枪三、四百枝，因宜都党 残，特委尚未同该部接着头。长阳贺家坪更有特务队枪枝十余枝，该部可向五峰进（因贺部现到鹤峰），以便连成一气。至中央给贺同志信已转达。

四、经济情形：鄂西特委经济现已到绝境。因各县党部要求津贴，惟在此恢复及整理党务期内，势有津贴之必要，然在特委本身久已断绝经济来源，除请求上级津贴外，旁路不通。最近在宜逗留养病同志亦多，而医药费所需款项，在需款 给，他如各县往来接头同志较多，而交通费亦较巨，至

江陵县委及沙市交通处津贴又耗费五十元上下。在特委本身之布置及救济，×同志宜昌负责 出狱之运动费及当 、长阳、松滋、石首恢复组织之过程当中，尚急待经济源源接济。希中央接 对于鄂西特委前决定每月津贴之党费，全数早予发下至要！

五、其他：（1）前逸群同志所带《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因途中遇事投入江中，希另口关于《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在中央因士兵运[动]重要，另出有对兵运决议之解释书，亦希将此书发给一份。（3）

汉口有很忠实的工人同志，至今尚未发生组织关系，请派程邦模同志到 珊、熊栋臣等，即有办法，倘彼等不能在汉工作，并又未派定旁的任务，可来鄂西 沙 宜沙 机关，有川鄂籍女同志未指定工作者，希派一、二同志（据云臻同志说，新由粤到沪有川籍女同志，逸群走时匆忙，未请求）。（5）石首、监利武装军事同志牺牲过多，武装无人主持，请派二、三军事同志来。（6）上海派来同志之技术馆。（7）石首、南华安、监利等县，均有急待救济必要，到已救济 须得 具体报告。

鄂西特委

注释

原文如此。

原文缺序号（2）、（4）。

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

——各县工作概况、对鄂中工作的意见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中央：

一、沔阳方面

A、政治：在十月以前，沔阳的政治权在豪绅和土匪手里。各地小的豪绅办理团防，烧杀革命群众房屋及家属，而向一切革命群众进攻，有时连中立的小资产阶级也要受其影响。自经过九月二十八日，全县革命群众大的总骚动以后，当局之豪绅土匪见其势力不足以消灭革命势力，遂不得不求力量较大的十八军援助。当时十八军即开两团人分驻各市镇，观各地情形，此时所谓反革命的十八军，因受欺骗民众的国民党指导委员之指示，欲拉拢民众，见沔阳政治权确实在太显明的豪绅和土匪手里，恐使民众有所借口，他方面分赃冲突及排除异己，消灭杂色队伍等原因，还先将土匪团防缴械，并将其首领李伯岩、陈厚堂等枪决，然后大举清乡、办十家连，民团自此政权遂落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豪绅资产阶级手里。

B、党务：

(一) 组织方面：全县分东南西北四区，以东南区工作较好，区委因继续牺牲太多，不十分健全，西北两区组织不普遍，工作亦欠。区委及各支部都不健全。全县共计支部二十八，小组七十，同志数量因各区尚无统计，大概在五百人以上。成分以雇农占百分之五十、佃农占百分之三十五、自耕农占百分之三十、手工业占百分之十，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县委不健全。

(二) 宣传方面：a、对外经常作反国民党新军阀、反苛捐杂税，反豪绅资产阶级宣传。b、县委办有赤色恐怖小册，每月出刊一次，已出五次，并翻印有各种小册子。在县委及各区还办有党员训练班，不过才举行一次。

(三) 群众方面：工运：自市镇组织破坏后，其他负责人皆不能在市镇中活动。遂未恢复。农运：全县共有农委三十二个，会员计二千人左右，雇农十分之二，佃农占十分之五，自耕农占十分之三。全县已成立一县农委会筹备处。兵运：关于兵运前在团防还派过同志作侦探，并无成绩。

二、天门、潜江、京山、汉川方面

A、天门：天门恢复工作已成立临时县委会，系五人组织之，同志约在一百五十人以上，农民、知识分子占多数，群众运动无成绩。不过在北区团防内有枪十八支，内有同志多人，同时，该县同志质量多小资产阶级，因此亦多机会主义的心理。

B、潜江：同志不满一百人，未正式成立县委。

C、京山：京山原属鄂中，但自特委成立后，始终未接着头，但该县民众因天旱多未有粮食，豪绅地主家存谷甚多，很望党去领导他们斗争。最近天门西北有一支部，发展到京山，正在扩大中。

D、汉川自失败后，现尚未恢复。前该县负责人有到沔阳县者，已与沔阳县县委发生关系，拟即要他们回去工作。

三、特委对于鄂中工作的意见

鄂中原有特委组织，前已报告省委要求恢复特委机关。最近省委机关破坏，无法解决。在未接上级指示以前，鄂西特委已供给鄂中各县意见，由鄂中沔阳同志谭汉早转达，就是：

(一) 由沔阳县委负责召集鄂中五县联席会，讨论一切问题，并组织临时指导机关呈报省委。

(二) 关于党的最近通告及政治消息，由鄂西特委尽量供给。

(三) 在本地不能深入群众<的>同志，可与鄂西对调。

(四) 每月互派交通一次。

以上意见如得鄂中各县同意，自当照办。有无错误及以后根本解决，仍望中央指示。再者过去鄂中工作，完全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必须中央或省委派一得力同志前往负责指导，方不致一误再误。

鄂西特委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年代。

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

——湘西红军情况，特委今后工作意见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中央：

甲：听了冬生同志的口头报告及湘西前委的书面报告，有几点可以注意：

(一) 湘西红军没有民众拥护，施鹤党即没有民众组织。(二) 指导者完全是知识分子，都是很机械的做政治工作，结果引起士兵反感。(三) 施鹤党的组织薄弱，同志成份几乎完全是知识分子，甚至堕落。(四) 施鹤经济困难，湘西红军给养完全由民众负担。(五) 湘西红军内部腐化，不易改造，除贺龙同志外，没有人能指挥。(六) 贺龙虽坚决，无法打破环境。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贡献以下几个意见：

(一) 冬生同志应再赴鹤峰并携带中央各种秘写通告。(二) 挑选精锐，由鹤峰经公安入石首与鄂西武装联络一致行动。(三) 无论宣恩、来凤神兵如何，湘西红军决不可往里面走。(四) 中央坚决调贺赴沪，其部队由贺指定同志负责，受鄂西特委指挥。

乙、沙市工作已[以]后(由) 焯昌同志去恢复。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陵开扩大会，焯昌同志代表特委参加。

丙、特委本身太不健全，省委既不能指定同志负责。拟于明年阴历正月内召集鄂西代表大会，经费至少要一百五十元，请求中央承认，以便(筹)备。

丁、请通知省委以后与鄂西通信用新式药水，辜(故)不再用米汤写来。

戊、中央允派之女同志尚来到。

鄂西特委

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信

——徐保元（梦麟）叛变问题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日）

中央：

协兴店拟于十日后迁移，中央如有信及汇兑请交宜 收，接头处仍旧。

鄂西中学同志徐保元（又名梦麟）在武汉被捕。现已反动。中学在宜昌机关大多数破坏。弟闻徐即来宜，替反动派工作。此人认识同志颇多，逸群同志亦不便公开活动，请速派一同志来宜，代替逸群接头。逸群仍可暂时暗中活动。

鄂西特委

十二月二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年代。

原文空缺五字以上。

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信

——特委组织及委员名单、经费问题、特委通信处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

中央：

特委常委万涛同志前在华容巡视被捕，现已出狱来宜，特委昨日开会关于本身问题有以下之决定：

一、特委委员应即补充并提出名单

常委：逸群、王玉山（车工，现在宜昌县常委）、万涛、中央委派一人、中学特委一人；候补常委：人镜（监利县委书记）、资生（鄂西红军第六队长）、炽昌（前宜昌书记现江陵书记）；候补执委：邓仲阶（补锅工人，现荆门市委）、刘继汉（前荆门书记）、屈阳春（现石首书记，农民）、李盛文（前公安书记）、刘霞峰（前石首书记），以逸群为书记，王玉山为副书记，以上名单虽大半是知识份子，但都是经过斗争，由实际工作中提拔出来，必须城市工作有了相当成绩，然后才能多提拔几个工人，如中央同意这个决议，请即批准，并望派一人任常委兼宣传。

二、十一月份工运费尚未收到，请补发，望以后按月寄来。各县津贴费至少须洋一百五十元。兹提预算如下：（一）宜昌五十元；（二）江陵四十元；（三）长阳八元；（四）宜都十五元；（五）枝江十元；（六）松滋八元；（七）荆门十五元；（八）远安十元，共计一百五十六元。此款在恢复工作时期是必不可少的，万恳批准发给。

三、寄来手巾名人书画均收到已在翻印中。

四、特委通信处：注意（一）此处专为汇款寄包裹等物；（二）此处只有中央及四川省委负责人知道（并请转知四川省委）。（三）此处即协兴所迁移。（四）信件还可交廖家台……。（五）按头处已详前函。

五、已派之女同志尚未到宜，不知何故？请速派来工作。

六、省委消息请随时见示，以便发生关系。

鄂西特委

十二月五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年代。

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

——各县工作情形、与湘西特委关系问题*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央：

兹将鄂西最近工作情形分别报告于次：

一、江陵

A. 政治情形

目前江陵一般政治纯为贪污所笼罩，反动驻军分布水陆各处，侦探计五、六十人，随时敲榨，利诱、欺骗更无所不用其极。驻军数量计三营人上下，风闻最近有移防鄂东消息。

市面经济已是颓败现象，而一般小资产阶级大都破产，生活更表现得非常动摇，兼之近来钞票不兑现，尚有奸商运出铜元，希图多得利金，因此经济恐慌，市面更形成不安定现象，虽有多数铺家共同设立兑换处，但所兑钞票只能兑得旁家所出钞票，仍不能兑得铜元。

一般豪绅地主阶级在目前白色恐怖中，对于他们平时所御用的保卫团的武装，均已纷纷准备积极扩充器械。如龙湾区团防计分布九处，有枪一百八十枝上下；白马寺、胡家场、岑河口、普济观、观音寺等处团防，各约十余枝左右；郝镇团防有枪二、三十枝。至熊家河一带现尚在准备购买枪支。不过在豪绅地主阶级方面尚未全体一致，有与本党表示好感的，有通敌人消息求幸免于生命危险的，但在郝镇绅士方面，有一、二绅士表现得非常反动，积极想联络一切反本党的势力，作有计划的进攻。

在民众方面，岑河口民众有加入佛门受摧残的，有加入本党受摧残的，因此多半民众都感觉不知走哪条路好。此时民众十分沉闷。马家寨方面，大多数豪绅地主阶级都歼灭殆尽，革命情绪颇高涨。龙湾有一部分民众自本党组织在该处受摧残后，尚能自动的组织团体作反豪绅地主阶级的小的行动。西北区及虎×民众每×保守。

B. 党务

1. 郝分区——新观支部一，同志十余人；模才副支部一，同志十余人；公汉场支部一，同志五、六人；伍家湾支部一，同志三十余人；沙岗支部二，同志三十余人。计支部六，同志七、八十人。在伍家湾支部尚有群众的组织，农委员会计五、六十人，妇女会员计十余人。

2. 郝正区——现已恢复田家场、熊家河等六支部同志二十余人，农委员会计三十人上下。

3. 沙东区——现已恢复文村、甲耀、星场等三支部，同志计三十人上下，最近详细情形尚未接报告。

4. 岑河口区——现有线索可寻的，能找着二、三同志。农会恢复详情后陈。

5. 龙西区——现已恢复肖家场等二支部，尚有恢复可能的地方，约三、四处，已在进行中。

6. 西水区——在雷家港附近已成立一支部，同志计二十人左右、现正从事向荆门方面发展。

7. 虎×——虎×计找着被难同志五、六十人，组织还未划分清楚，不久支部当能分别建立，在弥陀寺约有二、三同志。

8. 城市工运——在沙市方面现已建立两小组，同志计七人，工人占大半数。荆州及近郊工作尚在计划中。

9. 妇运——城市妇女同志只一人，在郝分区伍家湾支部有女同志十余人，他如模才剅、新观、沙岗等处各有女同志一、二人。

10. 军运——现正在积极活动及参加同志当兵尚未有成绩。

C. 县委扩大会议的经过和决议案。

十月十六日，县委扩大会议开幕，十八日闭幕，继续着并开了一次县委会及常（委）会。在当时开会的情形，虽不见得十分圆满，不过对于以后的工作，对于指导上、布置上及巡视上略有计划可遵循。以当日的情形而论，因过去县委指导机关不健全，负责人不多，以致在未开扩大会议前，并没有充分的准备，及到会议开幕时，自然会表现得忙碌不堪，同时因开会地点多为一般反动派所注目，因此在扩大会议应讨论的具体的工作计划亦付缺如。至于扩大会议决议案略述其梗概如后：

1. 目前工作环境：计分政治的、经济的及民众要求三项分析，各计十余条。

2. 过去工作的错误：a. 组织特别松懈，县委下没有区委，甚至支部委员会亦不健全，在组织上更未划分清楚；b. 工作多半是半公开的；c. 技术方面全不注意改良；d. 城市工运及沿江各大市镇中心工作，没有注意去恢复；e. 没有讨论过政治问题及明显的工作路线与策略；f. 没有支部工作；g. 没有经常的教育、宣传工作；h. 忽视了日常经济斗争；i. 不注意士兵及团土运动。

3. 新的工作方针：

a. 严密党的组织，从新建立地方党部，各区尤应切实划分清楚；

b. 建立巡视工作制，县委每次派乡巡视，至少须有三人轮流到各处检阅工作；

c. 加强城市工运及士兵、团土运动，并切实讨论进行方式及指定负责专人；

d. 各大市镇中心工作亦不得忽视，如马家寨、郝穴、弥陀口寺等处，分派同志到码头上充当码头工人。在长湖、白鹭湖一带更应求普遍的组织的发展；

e. 加紧教育训练工作，并须有计划的有系统的训练；

f. 江陵政治情形每月须讨论一次；

g. 最近全县工作须制定具体实施的工作计划大纲；

h. 对于一切反动派的群众，无论其表示好感与否，均应从事破坏其组织，与夺取其群众于党的周围；

i. 一切技术工作随时均应注意改良。

D. 年关斗争

最近县常（委）会决议，组织一年关斗争委员会，由三人组织之。俊开会时即讨论江南一大部分被难同志，怎样去领导群众实行此一工作，最低限度在弥陀寺一带的斗争是能发动的，至于能否普遍的发动斗争，在该会开会时应有详细的讨论。他×在斗争中的宣传工作，与民众利益的切实口号，现均有相当的准备。

E. 县委本身情形。

a. 县委负责人，现改选钱定生（工人），由泽州、彭之玉、刘××及中校一人组织之。常委定生任书记，王爱民、周保之两同志任候补常委，他如

军委、工委、农委均已指定专人负责，不久当能组织就绪。

b. 全县组织已划分为六区，各区指导上均无不灵便之虞。

c. 教育训练工作现正准备训练大纲、宣传大纲，并最近期内拟出《江陵通讯》及告兵士、团士传单。

二、石首

A. 政治情形

十八军驻石首计有三营人上下：驻县城一连、藕池两连、调关一营、新码头一连。最近在东二、北二两区所驻军队胁迫农民，经常组织梭标队大举清乡，冯家坝清乡计捕去二百余人，现尚有二十余人未脱险。

团防有新式武装者如新 处，北二有土豪黄某勾结有土匪、枪八十支调回，现正筹款购枪，准备向我们进攻，其余各区团防不过敷衍上级而已。北二、东 。

石首最近米价已涨，一般农民生活非常困难。小市镇因沙市票流行，均各小票以为抵制纸币充斥到处，找不到铜元。此外如十八军田赋、购枪捐、堤费、米捐、 非常繁多。

B. 党务

a. 农运：

1. 西二区计有支部八，同志四十余人；
2. 西一区支部一，同志五人；
3. 东一区支部五，同志五十余人；
4. 东二区支部二，同志十余人；
5. 北一区支部一，同志二十余人；
6. 北二区支部二，同志十余人；
7. 安乡（湖南）支部？ 同志二十余人；
8. 中区支部？ 同志二十余人。

群众的组织在西一、北二两区，总计有农委会会员三百人上下。

b. 工运：在藕池工运决派五、六同志参加码头工支中去工作。

c. 军运：在北一区有被难同志一人，已参加到军队中去，到西一区团士亦有五、六同志。

d. 县委本身情形

1. 县委负责人由屈阳春（农民）、冯世华、田其昌（工人）三同志组织常委，阳春任书记，邓祖凯（农民）、张继阶两同志任候补常委，戴绍霖任县委秘书。

2. 过去石首党部所发生的严重错误力求纠正，如前县委会专讨论经济问题，不讨论工作的指导，整个的县委无异是特务队。至宣传工作，平时无一标语及传单，更谈不上教育训练工作等等。

三、宜都

A. 政治情形

宜都驻军独立第五师计三连人。目前清乡空气虽较浓厚，实际上亦无多大举动，不过清查门牌认真，徒增加其门牌捐耳。到县长朱某对于积极清乡意见类[颇]多故意延迟以缓其清乡空气。

豪绅刘培之等自被捕解省后，而一般较次豪绅大都闻风远逃，因此豪绅所有在宜都有势力（的）现已损失无余。比如商会最近已改组，此其一例。

最近，宜都各处团防枪支突然增加，因前湖北警备军马文德部前赴施鹤，

多半士兵均纷纷退回宜都，致被团防缴械，各团防增加数量，x约有一二十枝不等。

B. 党务

农运——在安福寺、陈家院子、徐家嘴、杜家坡、潘家冲各支部已恢复，计有同志三十人上下，紫金山组织正在发展中。

工运——城市组织稍有活动，可能拟即在城市建立机关切实进行，至善溪窑煤矿工人决参加同志工作。

兵运——在安福寺团防已有同志一、二人。

年关斗争的准备，决定组织年关斗争指导委员会，由五人组织之，以便讨论一切进行。

C. 县委本身情形

1. 县委系徐国元（农民）、黄正志、陈 三同志组织常委，国元同志任书记，张奋任候补常委， 任县委书记。

2. 在工作中现正积极建立地方党部之健全，城市工作的恢复及参加善溪窑工人的工作。

四、湘西特委

湘西特委兼南华安沅特委，最近派来代表徐 同志，来鄂西同特委接洽，及到石首后，曾介绍与江陵县委负责人谈话。兹据江陵县委转来报告陈述于次：

湘西特委南华安沅特委，自前次受打击后，迄今数月与湘省委关系尚未接头，在湘西特委乃南华安沅特委，曾派数次代表到省同省委接洽，始终未能寻出线索。及今派来代表到石首询问鄂西特委情形，希望鄂西特委转陈省委与以介绍。

目前湘西特委与南华安沅特委负责人多半牺牲，两特委的组织因各剩负责人一人，故合并为一。最近两特委要想谋本身的健全，事实上颇形困难。在各县工作要想很迅速的恢复过来，一时尚非易事，因各县负责人不是牺牲便是逃跑，甚而自首者甚多。以后湘西特委为要同鄂西特委发生亲密关系，在工作上并要相辅而行，所以有以下两种意见：

1. 鄂西特委与湘西特委最近须开联席会议，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

2. 在两方面工作上随时互相派人参加。

湘西特委曾纠正过盲动主义的错误，最近已恢复三分之二县份的工作，在指导上，工作上颇觉不便，而特委本身的布置丝毫没有特委对于各县的关系，尚没有接头的所在。

上述湘西特委情形，陈[除]鄂西特委再函湘西特委磋商，相辅而行工作外，自应陈请中央，转知湘省委，俾得早日接洽。

五、对中央来信的答复

1. 之后交来通告及信件均收到。2. 邮汇二百六十元，聚兴诚三百元均收到。以后转四川之款可寄来代交。3. 先后交来秘件均写出另抄，原稿完全毁去。

鄂西特委

十二月二十六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年代。

原文如此。

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的信

——与湖北省委的关系问题、一般工作情况 (一九二九年一月六日)

中央：

中央给鄂西特委十八号信收到。兹答复如下：

A. 自五月以来鄂西特委即与省委未发生关系，鄂西特委前已报告过中央。不过，在最近省委与特委失联络后，给省委（的）工作报告无法投递，此时有许多困难问题发生。我们知道请求中央解决和指示，有时固然不可，不过在万难当中报告给中央知道，也许能解决一部分。这是我们报告给中央的一点意见。现在，我们十二万分盼望、很恳切的要求中央通知我们，告诉湖北省委的通信处及接头处和通信与接头方式，万一省委最近不能派人来鄂西时，我们也好派人同省委接头。

B. 最近，鄂西党务所谓纠正过去的一切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倾向，但已深入一般同志的脑筋中，不过有一部分同志还带有机会主义的色彩，认定纠正盲动即是不干而要去作组织工作，忽视了日常的经济斗争，特委已严厉的纠正过。在鄂西一班[般]党务情形，除了犯得盲动主义最利害的地方如公安、当阳、监利等处，组织还没切实纠正过来与恢复外，其余各县组织，的确有创造新的基础之可能。不过在宜昌工运自提拔工人充任书记后，现在又走入此途。此次宜昌开扩大会议曾经指示出许多错误，要他们切实纠正，因为一班[般]工人同志变成小资产阶级性，敷衍工作，不能深入群众中去，而且会有均产主义的色彩。

C. 鄂西特委经济开支报告及最详细的工作报告因太多，每次为中央交通代转。

D. 目前鄂西经济已走入万分困难之点，希即寄十一月和十二月份党费来为要！

鄂西特委

一月六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

——政治经济情形、反帝、工运、农运及组织与宣传工作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

中央：

目前鄂西一般的工作情形，兹分别报告如下：

A. 关于一般的政治经济：

鄂西反动的统治阶级的财政收入，宜昌税收机关所收入税款实居大半，计税收机关有十五、六处，而每月收入合计共二百余万元，湖北财政专员提款尚不足一百万元。其次如江陵籍地税入比其余各地较好。

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的鄂西，目前苛税繁兴，更为出奇，各地均有月捐、田亩捐、团防之枪捐、冬防捐、清乡捐、门牌捐等。而宜昌最近更有什么统捐——田亩房屋新登记照数完税，至征收一切苛税时更多逼迫与剥削，否则即派出武力到处捕人，甚至科以罚金，民恐[怨]载道时有所闻。各地税收机关多为十八军占据，独二旅之不满足于十八军，有时更明显的毕露出来。平时十八军、独二旅之各税收机夫人员，有因检查而发生冲突的，有因口角而发生械斗的，更有因用人关系意见不合，互相隔阂，政令分歧，莫之可解的。如目前县长之不满意保卫团队长，此其最明显的冲突实事表现之一。

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方面的冲突，亦日趋于显著，彼此更好多立派别，互相倾轧，并带有涉及政治地位的色彩。宜都有五大天王派下之派陈光炳他为有一部分的新式土豪，更有绅结合的倾向，以期把持地方政权。

含有政治性质的民众组织，除一般的普通的保卫团外，如东门之齐心会，现已无形中消灭，宜昌之抗业工会稍带有涉及政治地位，他如清乡委员会从事情乡之运动，自带有十分浓厚的政治性质。

反动派改良政策之实施，多用软化手段，以愚弄一般城市无产阶级民众。宜昌车业公司股东，当车夫群众情绪愤激时，尚允不加租价，表示退让，而更想达到其增加车租之欲望，暗派密查调查工人行动，出其不意的添加收租价。在地主阶级方面，有些地方因为天旱缘故，一般佃农收获减少，同时因为本党过去所采取的烧杀主义，地方们闻之丧胆而发抖，自以为收租若少，或可免掉杀身倾家之祸，因此，有些地主甘愿减少稞谷，以表示好感于农民的，各处俱有所闻。

鄂西一般民众对于反动派的认识和感想大都表示不满，并且对于国民党所暴露出来的假革命的实事，亦有相当的认识，不过因民众的政治观念还没有充分的、彻底的了解，而观念的动摇尚有风飘摇之中，因此要想民众积极的参加革命斗争，实在他们还没有一般的勇气。

目前鄂西下游民众革命情形比较浓厚，而上游民众对于反动统治居于反抗地位，系散乱自动的，并毫无政治目标的动，如长阳、巴东、宜昌西乡一带之神兵组织

曾经过长期的奋斗，屡与军队接触，曾获得多次的胜利，嗣后便无形的停止其行动。

鄂西驻防军队有十八军、独立二旅与马文德部队分驻上、下游一带，合计军队有二旅人上下，团防武装约二千枝左右，对我们的行动较注意的，除十八军外尚有江商松滋武装及江陵龙湾市团防。

B. 关于反帝运动的：

帝国主义者把持宜昌、江陵等处之海关收入，每月总计约一百余万元，而宜昌海关收入数量尽超过其余的税收机关计两倍有余——收入税收比例成为五与二之比。

各地教会学校之林立，在偏僻的地市初级小学起码也有三所，宜昌更有两三处中级学校，其内容与性质均与一般同。

鄂西有些地方虽有反帝的组织——只是反日的，从来没有激烈的反帝示威运动或飞行集会，民众反帝情绪亦不十分高涨，甚而恐怕反帝的。在反动统治阶级方面看来，亦不大注意这一运动，我们从前更有同样的有这一损失，自然更谈不到争取反帝运动的领导权，有些民众恐恨反帝国运动的情绪，怎样呢？因为在反日的组织特殊的更定有许多繁细的征收“劣货捐”“救国捐”手续，非常繁杂[烦]，一般商人大部分不满意，并且认定这是国民党另辟生面的征收荷捐杂税的办法。本地货物运出东洋去的值百抽五，其日货舶来品值百抽十，沙市普通的一律征收千分之

C. 工人运动：

鄂西宜、沙车夫工人计四千人上下，码头工人计五千人左右，秭归、巴东、兴山、宜都、五峰煤矿工人计一万余人，工人每日工资最高不过五百文，生活困难特别紧迫，较之城市工人生活大相 殊。最近宜昌码头工人，每担货物由四百文降到二百八十文，更有卷烟厂之提出减价口号与无故开除工人。

失业工人计三千人上下，多半属店员工人。海员占十分之二、三的成份。

宜昌车业公司对于工人的压迫，可谓无微不至也，时均派有密查在工人群众中调查，取缔他们工人的 ，万一工友有反抗的举动，他们便利用军警弹压，并且时 是 办法来增加车租。

鄂西职工运动现在可说是正在萌芽的时候，还没有达到深入群众去。宜、沙所有工友同志不过二、三十，质量亦不甚好。在宜昌最近职工运动的进展中据特委的分析更有许多错误，兹将特委指示宜昌县委的工作照录重要者于后：

“……A. 宜昌历次县工作以城而论，到现在还没有走到正确的工作路线上来，何以呢？我们只要分析最近一般工人同志的心理与态度，就可知道以前的工作，实在谈不上真正的无产阶级党的工作，而是带有小资产阶级性的应付工作，更明了说，在工人中即或找着几个工人同志，他是代[带]有小资产阶级性的，他不是真正的穷苦的工人同志，因此，我们更肯切认定过去所谓工人运动，不过是穿长衫的、穿西装的工人运动，结果一般工人同志也只认识穿长衫的、穿西装的，而不认识党。要是穿长衫和穿西装的对工人同志，工人同志非常为只 则在工人同志中，便不发生任何影响，并且还有不时的表现。这一错误之来，我们很可以知道以前的工作完全是这 影响工作，向没有真正的打入群众中，并且要想这一工作打入广大的群众中去，亦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党内的同志——尤其工人同志，最近在工作中处处敷衍，而且常有欺骗的行为，依这样情形看来，宜昌的城市工作，我们说要想改造旧有的基础，那真是比登天还难，所以我们只有下决心来从新创造新的基础，从新建立无产阶级党的基础于城市中。

B. 过去工作之所以如此糟糕，我们更须明了完全没有丝毫无产阶级的意思，比如工作的同志没有积极的精神，而一切关于工人之决议多成为空洞的，只知道要活动费，万一有一次活动费没有开支，或者是应当开支，或者是没

有开，支部就会板起面说出许多非难的话与故意责备负责人，甚至乱骂。工作的表现在哪里呢？恐怕他自己也说不出来，象这样是不是脱离了无产阶级忍苦耐劳的意识吧[呢]？……”

宜昌的职工运动，除特委严厉的纠正错误外，在县委扩大会中，并讨论各新的工作方针，切实执行。江陵工运在目前质量较好，不过也免不了有畸形发展的现象。旁处重要工人区域，特委现正在积极指示各县工作，还没有工作的表现，各县、市、镇中手工业工人运动，而各手工业工人成分尚嫌十分薄弱。

D. 农民运动：

各地中小地主成份较多，雇农尚占少数，而中小地主每年收入亦只能敷衍生活，本年因天旱无收成缘故，失业农民计有五千人左右，更有一般失业农人流为土匪，如荆门五家草场、彭家场、九店子一带，土匪是四五月间以前，鄂西各地的封建的、神权的大刀会或称佛门的组织，几无处没有，最后因受军队的压迫和痛剿，现已销声匿迹。不过在上游一带如今尚有神兵的组织，时而进攻乡村团防，夺取其武装，军队亦莫可如何。在神兵的一般群众尚相信神权的，实占少数，不过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尤其是保卫团豪绅的作为[威]作福，而代[带]有报复主义的尚占多数，也有带有地方主义与主义的色彩的。

各处民团的组织，除江陵龙湾市与枝江江口、董市保卫团力量比较雄厚外，其余旁处武装亦非常薄弱，并时有倒塌现象，而内部一般团士群众尚多麻木不知什么的。

各地农协组织尚未普遍，合计鄂西农协会员尚不足三百人，同时农协与党的关系，党尚不能切实领导农协群众，而农协会员更难于普遍的（在）一般的群众中起核心作用。

E. 组织报告：

各级指导机关多不健全，尤其是地方党部的工作，更未有系统的、有计划推动，而上级通告要传达到同志中去，更感觉得困难。

党员的政治水平线高低不一，目前党的纠正盲动主义有些同志更认识不清之倾向，以为盲动即是不动，不知道不动又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

鄂西党员数量计有一千人上下，农民占四分之三，雇农、工人、知识分子占四分之一，质量，群众组织有二百三、四十人，无有职业的占五分之二、三比，大部负责（人）专靠党生活。

支部生活过去实在谈不上，现各县支部讨论多积极工作，扩大党的讨论，务期每个同志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

最近工人同志参加讨论，指导机关的，吸收工农同志计五、六十人。

巡视工作各级指导机关现在积极进行，宜昌、监利、长阳等县委最近已从新改组。

G. 教育宣传工作：

教育训练从没有具体的实际的计划，特委现正拟制就训练纲领，切实训练同志，加强各县区委及支部宣传工作。

最近翻印《告同志书》《民众宣言》等印刷物，散发在江陵，并发有告团士传单，荆门每半个月出有红刊，最近宜昌及江陵更决定出《江陵通讯》与《宜昌通讯》。

鄂西特委

十五日

注释

原文约缺六、七个字。

原文缺序号“F”。

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建始、鹤峰暴动经过，党及红军发展情形，开除杨维藩党籍等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七日)

中央：

冬月十一日给你们信由卢冬生转上，想已收到。因此间红军游击的地点没有一定和交能的阻碍，所以这久没有写信给你们，兹将两月来工作情形及今后出路述如下：

1. 红军到施南以后的情形

此间于十月初得到施鹤部委杨维藩来信，知道黑洞神兵对杨颇有接近，与红军不致发生冲突。冬月初，清乡军马文德上来，红军在鹤峰不能立足，遂决定到黑狗洞去。此中情形和理由，已详上次报告。冬月十三日红军由梅坪出发，冲过沙道沟、高×，于十八日到小关。本拟在龙潭司、草坝场等处为红军根据地，因该地群众毫无组织，与宣成[恩]同志报告全不相孚[符]。同时，维藩以黑洞神兵名义，东抚利川，故遵维藩之请，属都抵利川境内，经草坝场、黑洞、毛坝等等抵老屋基，遂与维藩相见，是时，对施鹤神兵情形始悉其内幕。概述于下：

A. 神兵本是农民为反对苛税杂捐及贪官污吏而形成的组织，后因受新式土劣的利用，其领导权遂握于豪绅阶级之手。此种群众当然不能为党所用。

B. 黑洞神兵领袖王锡九完全是帝制余孽，维藩以私人活动后，与彼发生关系，但一切工作均离开了党而谋个人的生存和领袖地位的斗争。

C. 维藩以为安抚利用系以“督办利用清剿宣抚使”名义及“×灵官神兵第一军第一路司令”名义，号召神兵领袖，因信仰未著，竟只有神兵群众五十人之攻取利用，事实上当然不能。尤其维藩，一切工作都充分表现机会主义色彩，是使施鹤工作不能发展的最大原因。不实行党的暴动政策，只听王锡九的话，以谋个人之生存。

2. 施鹤部委只是维藩个人之部委，没有一个县委的组织，过去的组织都与部委脱离了关系了。施鹤群众最痛苦的，而部委一点也没有替群众工作……但维藩为了个人的领袖关系……即可证明其机会主义的表现。维藩对安抚利川的目的，因团防力量较大和到了一营清乡军队不能达到。同时，此间的观察，如果红军还在利川境内逗留，必受反动神兵领袖之包围和解决，于是而有另图发展的讨论。维藩是时参加了前卫[委]，主张由四川柱石而入黔江，当然没有一点政治作用。我们主张解[改]往下游，向有群众的地方发展，卒以多数同志的同意，遂决定率带红军下来，冬月初三日，我们在汪家营将豪绅神兵领袖李长青解决了，并得了步枪二十余枝，连枪二枝。初[第]二日即从汪家营起程，经南平而入四川之北洋坝及川鄂交界之板桥，小路崎岖，风雪交加，兵士痛苦异常，在板桥休息一日，即行开拔。十二日晚抵建始之 垭。由商人口中得悉，施南马文清部张团倒戈，建始县城无驻军，只有团防枪枝数十，遂决定放弃恩施北洋坪之暴动而袭取建始县政权。

2. 建始暴动之经过

十二日晚由梭步垭起程向建始县进攻，因没有向导和侦探的关系，于十三日八时许始与敌接触，以团防战斗力非常薄弱（只有枪五十余支），是建始县政权在三十分钟作战时间遂被红军占领了。是役杀死反动县长陆祖质，并夺得步枪、手枪数支。战事告竣，我们去开始做宣传及惩办土劣等工作，

以事之前无具体的计划，对于暴动的意义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如对反动政府的校对冉某采取优容手段（准黄埔同志之请，把冉某放了），同志没收的财产没有缴上及士兵骚扰贫农等事，都是我们工作上的缺点。下午斩决了几个贪官污吏，群众观者甚众。

十四日早，红军以暂系游（击）的性质及建始无党的群众组织的原故，离开了建始县。开拔时将县公署及一切文件、税契都烧焚了，并发了告别工农贫农的书，宣传党的暴动政策和烧焚县署、没收地主财产的意义，贫苦群众都表示热烈的同情。

十四日下午抵城南之崔家场（恩鹤著名市场），相机解决当地团防，以贸易群众太多不便作战，仅夺得枪一支、马数匹，反动豪绅财产收没数百元，惟无意中拿获施获十属禁烟副主任及利川禁烟局长张杰三，即于翌日处以枪决。十六日红军经过五花寨，该地形势最险要，团丁纷起堵卡，但卒冒险通过，并获枪数支。十七日抵官店口。二十日上午达施[鹤]峰之乌鸦关，得遇陈宰[宗]瑜同志，在该地杀清乡委员王升铭等二名，并在刘家场杀死五区团董李松亭。

3. 施[鹤]峰暴动之经过

在乌鸦关休息数日，聚集武装群众九十余人于二十七日开向施峰进攻。二十八日拂晓，在关卡极险之观音坡与田少孟的常练队接触，以我军的勇敢，田部退却。早晨的红军先头部队×敌于施[鹤]峰城边之威风台大图 我军向敌三面包围，约战一时，敌即退却。是役我军夺获汉阳好枪十余支，敌百余人，一败不可收拾，反动唐县长舍命逃走。鹤峰既得，红军乃进驻河畔之书院一带，努力从事党的工作：（a）扩大没收土地与建设苏维埃的宣传。（b）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并捉拿反动分子。（c）焚烧县公署及豪绅地主之契约房屋。（d）筹备县苏维埃的建立。

我们本拟从早离开鹤峰，夺取他的团防武装，适徐锡予同志归来报告，风闻桂蒋已经冲突，武汉亦有战事及马文德部已向宜昌开拔，遂决定再在鹤峰驻扎。同时探悉唐耀庭及团防退守太平镇，及[即]议决根本消灭之。腊月一日，红军一部分开抵太平镇，敌已退至冻洞湾了。上午七时半，我军进达冻洞湾与敌接触，敌亦顽强抵抗，卒以红军及神兵的勇敢，冲上五里高山，团防遂被我军解决，杀死唐县长及典狱官闵某，活捉第四练队队长田少孟及县署贪污（官）数名，战事完全胜利，惟以火线猛烈，红军亦伤区队长二及阵亡士兵一名。

团防暂告肃清，红军乃回鹤城驻防，乃开始建设县苏维埃政权。腊月初三日，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并开庆祝大会，参加会的贫苦民众约六百人，革命空气异常高涨。在大会中宣布县苏维埃的政纲，并由群众表决杀反动派，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

但鹤峰一孤州，群众亦无组织，政治上的作用较小，同时此间红军尚不是割据的时期（没有长久割据县城的力量），而是游击发展、武装掩护群众起来的时期，所以于初四日便离开施[鹤]峰县城了。

4. 党及红军组织发展情形

前委由五人增至七人，前委之下成立支部，管理红军之党务。现此间共有同志六十三人，士兵同志过半，数量较前增加，但质量并未增加，甚至有士兵同志抱枪潜逃之事，这是此间组织的最大缺点。前委对党的纪律甚重视，在工作紧张中，并通告各级同志严守纪律，违者警告、察看或开除。前委组

织除秘书处及组织宣传科外，并设农运特派员、士兵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及经济委员会等，惟以工作同志太少，故各部均不健全。

红军方面：云青同志名义暂不公开。红军第四军之下设第一路指挥部及党代表办公厅。现步兵第一中队、第二中队及神兵联合会，编为第一特科大队，大道会、双刀会编第二特科大队，杨维藩编为第三特科大队。各部共有官兵四百余人，步枪、连枪共二百枪[枝]，战斗力较强（较在梅坪时，兵力约大一倍）。

5. 杨维藩的党籍问题

杨维藩同志以一人包办施鹤部委，既无党的工作，又无群众的组织，反是竟争领袖地位，藉以图谋自卫，保障危险。维藩来函所述，且一切行动充分表现机会主义的倾向，其在板桥及乌鸦关时，并毁谤暨声称CY、CP有极大冲突，更表示不好。且维藩自与我们接头后，从不提及党的工作，下来时亦不努力党务，只听杨在田（非同志）的话，阻碍前委工作进行。前委以维藩系前委部委书记及前委委员，而发生此种绝大错误，故议决短期开除其党籍六个月，并撤消其军职。不料维藩在受处分之后，竟于昨晨在长坪煽动部属劫了列车，并带走了群众九十余人及枪支三十支潜逃。此种行为，应请上级永远开除，并予以党内通缉。

6. 红军今后的出路

我们在受清乡军包围的现在，赖武装同志的奋勇和忍饥耐寒，发展不少的群众和武装，是比较愉快的事。如冯桂或蒋桂系的冲突，确已正式作战，我们相信此间领导群众暴动的时期已到。现红军驻扎堰垭、走马坪一带，俟子弹购买稍足时，即向下游发展。桑植、澧县、石门、公安、石首等县，可说是此间红军游击的总路线。我们相信把这几县的团防基础破坏了，即可向湘西之常德或鄂西之宜昌发展。

7. 我们的请求

（1）此间对全国政治消息一点不知，请你们把《中央通讯》、政治通告及布告设法寄来为盼。

（2）湘西鄂西暴动工作以何县为最好，群众以何县为有组织，请速告诉我们，以便发生关系。

（3）各县游击队的发展情形如何，请告知他们速向此间接头，如有军事同志，请速派来至要。

注释

原文时间为“十二月初七日”，此为阴历日期。

原文无第一点。

原文如此。

共产国际执委关于中国革命现势、前途和目前任务给中共中央的信

(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看过了你们政治局底报告、新中央自六十三号至七十七号通告以及关于地方党部工作情形的各种材料之后，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与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决定（根据中国底新环境决定的）、并为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所批准的新的策略方针，在基本上已为新的中央所领会清楚，但是，整个党实行这个方针的程度，还是很薄弱。从你们的报告和你们的通告中，显然可以看出，在党底队伍里，还有相当的惊惶失措和秩序紊乱的现象，这些现象，大大妨碍党的工作底发展。因此必须很清楚地解释党的路线，来克服这些现象，并极其彻底地和坚决地号召党员群众来解决迫不容缓的基本任务。

首先必须用深刻的布尔塞维克的解释工作，来反对以下一种危险，即是，有一部分党员，以及一部分在革命高涨时曾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斗争的同情工人，也许会灰心失望和看不见革命前途。在现时对工人革命运动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这种危险是十分实在的。革命失败以后的惊惶失措现象和意志颓唐思想，在高压的白色恐怖环境里，只能很缓慢地消灭下去。因为共产党组织、赤色工会和革命农民团体受到狂暴反革命势力底严重打击，于是有一些意志薄弱的人们，便很容易夸大革命运动失败底实在程度，甚至于认为革命运动已经毫无希望地被扑灭了。在另一方面，自国内战争停止以后，国内经济生活底局部复兴，便造成一些散布这样一种幻想的根据：以为在中国，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健全”底纪元，已经开辟政治经济和平发展底道路，新的革命高潮，永远不会发生，至少是要在遥遥无期的将来才能发生。

这些人完全不肯拿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现时的状况，而如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现时的状况，就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产生上次中国革命浪潮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而且用统治的剥削者阶级底方法是不能解决这些基本矛盾的。

这个结论，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关于这个结论，你们党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共产国际底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已经坚决指出；这个结论，不仅是从理论的见解中得出来的，而且已在许多关系上，被过去一年的事件和目前的情况所具体证实了；只要更加细心研究过去一年的事件和仔细分析目前的情况，就可相信这一点。

一、现在政治状况中的基本矛盾

国民党与南京政府企图在民众里面造成幻想，以为中国可以和平地渐渐地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底压迫。可是，帝国主义列强，虽然在表面上承认给中国以几种形式上的权利（如关税自主），而在实际上，却不但不从中国滚开，反而加紧其对中国的束缚。尤其在最近，英国在中国南部，日本在中国北部，大加扩充其“势力范围”，巩固其统治地位。根据这些事实，只能说帝国主义正在瓜分中国，而且会要因此而发生帝国主义的战争及军阀的内战，而决不能幻想中国可以“用外交手腕”来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

自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一战线是不稳固的，而且也不能是稳固的。美国与英日联盟中之竞争即是证明。假若没有这种竞争，那末日本在中国北部的军事行动就不会半途动摇，而英国（其他的几个国家亦然）也永远不会

允诺给中国关税自主与取消不平等条约。这是事实。但是也用不着夸大这件事事实底意义。

在你们中央的第六十五号（即第三号——译者）通告里，说美国底“基本政策”是与英日底政策“恰巧相反”；——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美国在中国的政策，与英日政策一样，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彼此的分别是，实行政策的方法不同。美国口头上所宣布的“门户开放”并不是非殖民地化的政策的趋势，乃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假面具，用以蒙蔽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因为现在的客观条件要求美国采用与英日不同的侵略方法。美国握有强大的经济势力，可是，它在中国还没有领土的势力范围，而不像英日一样，所以它现在把占取中国经济命脉，屈服中央政府的财政与外交，作为政策底重心，以便弥补领土的势力范围之缺乏，以便在将来采用强力时，能以此为后盾。

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来对帝国主义实行独立的民族政策，它只是希望利用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竞争，尤其希望依靠美国的帮助，来获得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底成效。但是这是幻想。在实际上，它除了得到那些能够附合某强国——如美国——的现有目的的“权利”以外，是连什么也得不到的。一九二九年二月一号发生效力的南京政府的新税则可以表示，承认关税自主，实际上不过是承认表面上的一种权利而已。就实质讲来，这乃是以提高政府收入为目的的税则，而并不如保适应民族工业发展之需要。在这个税则内也就可以看出中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面前的懦弱无能了。在现在这个时候，使中国政府稍微一致和稍微巩固，这和美国帝国主义政策底利益，并没有什么矛盾。反之，这对于保障新旧债务方面，还是有利益的。但每一次关于这些债务的担保条约，更是加紧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制度的束缚。

去年在中国所开始的经济复兴，直到现在，主要的还只要使帝国主义的工商业得到了恢复的利益，而在中国的企业中，只有轻工业略为恢复（丝业仍在衰落的状态中）。此外，有些地方还继续发生着中国工业外国化的过程（有些企业从中国人手里转入日本人手里去了）。当然，在最近的将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包括在内）底稍许发展，虽然是非常困难，但不是不可能的。但中国内部生产力发展到民族独立的轨道上去的趋势永远将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的趋势发生冲突，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些冲突下将进一步地出卖民族独立的利益。假若说，中国资产阶级跑到反革命营垒去了以后，已经一齐“买办化了”完全接受了中国旧地主军阀政府的政策，那是不对的。因为现在中国本国工业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利益与帝国主义利益，是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完全抛弃其民族改良主义的立场。但是这个立场本身，就是主张同帝国主义经常妥协，实际上只是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投降罢了。再加上，中国各派资产阶级底直接经济利益，日益与各个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底资本利益混合起来，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对帝国主义采取共同一致的政策。与其个帝国主义国家有关系的某一派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按照这个国家底利益来鼓动一部分民众去反对与这个国家竞争的国家（例如现在汉口反日运动）。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资产阶级运动中，当广大民众加入反帝运动时，资产阶级就会惊惶退出。

共产党底任务是要揭破这种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底反革命性，并且要在动员广大劳动群众及小资产阶级群众起来作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之中，使他们摆脱民族资产阶级底影响，同时在他们面前来尽量暴露国民党政府反革命作用，使他们都认识国民党政府是用表面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遮

盖着它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孝顺，替帝国主义开辟道路，来使中国遭受殖民地地位的束缚。

无论是使中国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底羁轭，无论是成立真正统一的国家，不论这两个任务中之那一个，都是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所绝对不能实现，而且也是于它们没有利益的。国民党的中央政权（南京政府）名义上虽是全国中央政府，实际上是没有达到，并且也不能达到中国真正的统一。不必说东三省，就是讲西部和南部各省的地方政权，也是不受南京政府底节制而完全独立的。国民党营垒里的军阀们都独立统治其所属省分，大致与已往的督军无甚差别。这些军阀之所以能够发生和维持其自己的地位，不单是因为中国至今尚存在有半封建关系与全国经济底不统一。我们还要注意到，在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阀集团底背后，是藏着帝国主义列强，这些列强各思利用这些军阀以巩固其自己的地位，把他们作为彼此内部斗争的现成工具，这样就使国民党和它的政府变成各帝国主义国家手中的玩具，归根到底，就是把它们变成帝国主义者意志底奉行着。

中国统治阶层内部的这些矛盾中，不但反映出历来各派军阀及其背后的各派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相互斗争，并且还反映着封建地主豪绅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经过国民党以参加此统治的联盟，而在此统治联盟之中，则进行着争夺阶级领导地位的斗争。但是如果因此而夸大中国资产阶级底斗争意志及战斗力，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中有一处就显然暴露出这种夸大的估计，说，资产阶级现在企图“给豪绅地主阶级以致命的打击”。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中亦有同样的估计，说，资产阶级（包涵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团集力量“以待推翻地主政权”。不，现在中国的资产阶级决没有力量，而且也不愿意这样做。一九二七年工农运动底鼓荡与高涨，并不是没有发生影响的。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浪潮曾使工农与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紧张到最高地步，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从此转入反革命的营垒，投降在帝国主义面前，而且再不肯为消灭封建残余而斗争了。统一中国与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任务，是和土地革命及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密切联系着，分割不开的。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第三个大问题，但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却只有革命高潮中涌出来的工农专政政府，因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彻底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至于说到中国底目前形势，那末，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农业危机一天天地更加剧烈，农民生活一天天更加贫困。中国许多区域都没有收成（从山东向北，从直隶到山西甘肃），根据约略的估计，饥民数目已达二千万人。这种饥荒绝不是偶然的灾祸，而是与中国农业底普遍崩坏有关系。凡属农业所必需的灌溉设备与河道疏浚工程皆已荒废。地主、高利贷者、军阀等无限制地掠夺农民，使农民失去最低限度的生产工具，以至于不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中国土地占有的形式是地主占主要地位（小地主因其本身性质，连减租都不能实行的）并且中国政府没有一批可以暂时挪用的空余土地，因此甚至一般的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法，局部的用向富农及佃农让步的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都是不可能的。甚至于，小小的改良办法，也不实行。去年在革命势力逼迫之下所实行的减租办法，到反动势力获得胜利的时候，就取消了，并且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与土地占有权发生着密切关系的，资产阶级之中的大部分，或者直接以地租形式取得进款，或者间接以高利贷及商业资本剥削的形式取得进款，单把这件事实来看一看，已可知道任何比较认真的资产阶级的地

制改良都是不可能的了。至于代表军阀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政府的政权之不能实行任何地制改良更是显而易见。

所以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说，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解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基本问题，并且也不能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一切关于中国有基玛尔式的发展之可能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空谈。中国现在的情形，丝毫不是消灭现有的矛盾，反而使这些矛盾日益激烈，这种情形心然要推动新的革命危机成熟底过程，这个革命危机将比以前的革命危机更加宽广，更加深入。

根据对每时每刻的实际情形的精确分析，来经常把这种过程与这种前途向党员群众和一切革命工人宣传解释，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应当时时根据具体的观察来清醒地和仔细地估量新革命高潮成熟底速度。

关于这个问题，中央第六次代表大会，已给了很详细的指示；现在，关于这个问题，除第六次代表大会底指示以外，我们所能补充的新的指示，是很少很少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曾断定说中国已有“最早的，还非常薄弱的”新高潮的征象，然同时立刻警戒同志们，叫同志们不要夸大这些征象，因为这些征象，“即使都凑在一起也是不能使运动真正高涨起来”。这个估计至今还是适用的，虽然最近各区中所发生的自发的群众罢工证明工人群众的情绪方面已经稍稍消除了消沉的现象。

有一部分中国同志认为立刻就会有革命高潮（这是由于没有革命忍耐心的缘故）。这种倾向，就是中国中央政治局亦所不免。因此就有人夸大反革命营垒腐化底程度及其矛盾底深度。例如，在中央第六十五号通告里面，肯定地说，资产阶级想准备反广西派的战争，所以“反动政权已很快走上完全分散与崩溃的道路了”。这种结论，未免做得太早了。不能说国民党政府底情形在过去半年中“动摇多了”。新高潮底成熟，至今还是进行很慢的。

同样，另外有一些同志，却表现另外一种倾向，以为中国将来新的革命高潮要延搁得很久，这亦是不对的。一般地讲来，在理论上不能否认直接革命形势延缓多年的可能（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即可以实行武装起义的形势）。然而就在此种情形之下，若以为有长期“安静的”、“和平的”发展的可能，而不至有全国经济机体的最深刻的振动（农村危机底加剧、饥荒、民族工业部门底危机），而不至有帝国主义者相互矛盾底加紧，不至有军阀相互武装冲突底爆发，而不至有无产阶级底伟大斗争，而不至有乡村农民底日新月异的武装起义等等，那真是大错而特错了。在中国现时实际条件之下，资产阶级封建政权内部的许多此类的危机，也许会由他们相互斗争着的势力，用可耻的妥协方法，暂时拖延下去，然而因为每次妥协的结果，都会加重劳动群众底负担，于是就不能不引起劳动群众底反抗，而为新的革命高潮造成客观的条件。

共产党在其政治的实际行动中，不能以此种或那种极端的“可能性”为标准，而应当时时刻刻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正确明白地估计具体的情形。

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认定中国现时为“准备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的时期。这是中共现时所最应注意的一点。必须要准备共产党本身，准备广大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群众，去作最近将来的斗争，以推翻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底联盟，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底政权，如果共产党不能及时团结自己的队伍，巩固自己在工业无产阶级群众里的影响，提高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斗争的领导，那末，在中国革命危机到来的时候，它就会不

能尽量利用客观革命形势而保证革命底胜利。

二、党底策略路线和最近的基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这一年来，没有能够充分使自己的革命工作适应于已经变化的客观条件；而这种情形，直到现在还是中国共产党底最大的弱点。

中国共产党是在群众实行革命进攻的条件之下产生和长大的，它的斗争经验，是在群众革命运动大大高涨和公开工作底环境里得到的。对于在残酷的白色恐怖制度之下进行秘密工作，它还没有准备就绪。因此，反革命势力底打击，就把它弄得张惶失措，秩序紊乱；现在，它要克服极大的困难，才能消灭这些现象。知识分子在党底活动分子干部间占非常大的比重，这并不有利于克服这些困难，有些同志，甚至于是很不坏的同志，因为没有充分的布尔塞维克的经验，不会干日常的革命工作，就几乎完全成为消极分子，正好像中央委员会底一个通告里所说的“他们像等待什么似的”；有些同志是等待军阀战争（例如蒋桂战争），以为这个战争会成为全部工作高涨底出发点；另外有些同志则等待国民党统治下的民主制度合法机会等等。以前右派和“左”派倾向与情绪底残余，是与这种现象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往往企图用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党应该明白认识由此而生的危险。

中共中央在自己的第六十九号通告里，很正确地指出在现时这种情形下特别危险的右倾；这个右倾就是偏重到目前一个本来完全正当的任务：这任务就是要利用在群众间进行革命工作的一切公开机会。骤然看起来，这种偏重，好像是没有多大害处的策略上的偏见。但是在实际上，这会使人因借口于使自己的工作适应新的客观条件，而放弃革命运动底旧有的基本任务。使革命工作适应已经变化的客观条件，这绝不应该是说放弃和缩小革命运动底旧有任务。这可以说只是按照新条件而改变工作方式，以便实现旧有的任务和口号。只应该这样来解释利用公开机会的口号。可是，公开主义者所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反。为要不致失去工作底公开机会起见，他们就坚决主张降低党底政治口号。为要不激怒政府当局起见，他们就不用革命的态度来批评现有政体。这样一来，他们之所谓参加公开的群众团体，在实质上就是进行改良主义的工作，暗地里采取合法公开主义和完全投降合法公开主义。他们已经不相信共产党底秘密工作会有成效，在他们看来，共产党底秘密工作与这种公开工作比较起来，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而且，凡是秘密共产党给他们的原则的批评，他们都当作不符实际条件的教条；而凡是秘密共产党发给他们的训令，他们都看作是不合实际的，没有理由的干涉，对于实际工作的障碍。因此，这种合法公开主义底倾向，听其完全形成起来，就会变成取消主义的反党派别：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派别。巩固秘密共产党，加强它的组织、威信及领导作用，这是中共目前的第一个基本任务；而合法公开主义的倾向，起初是轻视这个任务，然后是阻碍这个任务底实行，而最后，竟公然否认和反抗这个任务。

右倾危险，对于中国革命运动之所以更加严重，是因为当权的国民党现时正在采取一切的方法，来把大部分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工人阶级群众抓到自己的影响之下。为了这个目的，所以除继续残酷地压迫共产党员以外，还想出一些社会改良草案（局部地缩减工作时间、要工人参加分红等等），例如南京政府劳动部底法案和上海公安局社会问题部底命令。他们企图用民主的和民族改良主义的空谈，来造成一种幻想，以为有些人，好像国民党“左派”首领，是想反对反动的封建军阀势力，是想反对帝国主义而拥护民族自

由底事业等等。

这种骗局，是不能在群众里面获得长久的影响的，因为言行不符，未免太明显了。但是在某个时间内，它是能够相当当地影响群众的，因此我们决不应该轻视这种危险。因为现时共产党的组织薄弱，又因为它的工作环境极其困难，所以国民党员利用国家机关底一切工具，并在所有剥削阶级底帮助之下，而能暂时把一部分劳动群众引上圈套。如果甚至在共产党员中间还发生出个别的呼声（无论这种呼声怎样少）主张对国民党采取投降的尾巴主义的政策（“不要捣乱国民党底口号”），那末，很明显的，在共产党队伍以外，在一部分劳动者中间，是还千万没有消灭对国民党政策的幻想。

消灭这些幻想，揭露国民党底政策，动员劳动群众反对这个政策，准备群众推翻国民党底统治——这就是中共目前的第二个重要任务，而右倾分子则轻视和抹煞这个任务，并进行直接的斗争来反对这个任务。

我们并不肯定说右倾在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一个完成的潮流或危险的派别。它现时在党内，还表现在个别右倾错误和个别右倾动摇中，但如果中国共产党不用警觉的激烈的自我批评态度来批评这一切右倾的错误和动摇，来加以预防，则右倾是会变成可怕的危险的。在过去一年内，退出党的事实不少（甚至有人自愿地向国民党当局投诚），这就是表明，党内右倾危险是多么严重。在党以外，例如在职工运动里，这个危险还要厉害些。绝对必须非常坚决地、一贯到底地反对党内和群众间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无论这种动摇是在那里和在何种形式内表现出来的。这里应该特别注意到揭露像谭平山派所谓“第三党”这类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谭平山派，暂时还假装从左面来批评国民党，但事实上他们反共产党的斗争，就是替国民党出力。在我们所看过的中央训令里，完全没有专门说到自己反对这些反共派别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底第六次代表大会，坚定地号召党纠正党内的“左派”倾向（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个人恐怖主义），和纠正所谓“国民党式的”群众工作方法（“命令主义”）。最近这一年来，由于客观的条件，盲动主义的实际，和军事冒险主义，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基础。但如果认为党内“左倾”病底残余已被克服，那还是错误的。在中央去年夏天发出的第六十一号通告内，还包含有十足的盲动主义的计划：把国内分成几个军区，以准备武装起义，而首先就是（如像通告内所说的）击溃最反动的桂系。从第六十一号及第六十三号通告中，往往拿“左派”空谈来掩饰不愿做革命行动的消极态度（例如，“痛打地主豪绅吧！消灭一切封建势力吧！”）。甚至在中央最近几个月里（由十二月到正月）关于地方党部工作的第七十一号通告中，也有这样一种不正确的对农村的号召：“大家都到地主豪绅家里去过新年吧！”在目前的环境内这样的高调不过是一种空洞的牛皮，决不能引起任何的群众运动，这些高调绝对不能帮助巩固共产党领导底威信，而恰恰相反，只能在劳动群众面前破坏共产党领导底威信，使它脱离群众。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估计“左”倾时，曾着重指出，“左”倾“不愿意进行日常的准备性质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不承认为局部口号的斗争是适宜的”。这种“左”倾病，在党的队伍里还没有消灭。连在现在，也还有人不知道：工会工作，正确利用公开机会，正确配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有伟大的革命意义。正是因为他们不会本着革命精神去采用公开的斗争方式，所以他们害怕，以为采用这种斗争方式就必然会做出右倾

的丑事和加强公开主义的幻想。他们不愿意在实际工作中来研究说服不觉悟的或半觉悟的及动摇的群众并给以革命教育的困难艺术，反而轻视这种艺术底意义和必要。因此，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第三个基本任务，就是要消灭自己与广大劳动群众隔离的现象，要使群众革命化和争取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而“左”倾分子却轻视这个任务，而且实际上阻碍这个任务底实行，而彻底的“左”倾，则甚至公开表示怠工。

中国同志固然在口头上接受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关于争取群众的训令，但还不是全体同志都决心认真地在事实上执行这个训令。“左”倾底危险，主要就在这里，党应该无条件地和彻底地消灭这个危险。

在劳动群众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应当注意到中国革命底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因此，首先必须完全注意到民族斗争成分底特殊意义（特别是反帝斗争）。例如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说：“轻视反帝运动和不肯为夺取这个运动底领导作用而斗争，便是非常大的错误。”但是在这里应该明白认识，我们之参加这个运动，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赞助国民党底假冒的反对派把戏。我们之所以必须参加的，是为的要把资产阶级某些阶层底反帝运动，变成劳动群众底群众反帝斗争，这个斗争同时也要反对国民党。

近来，中共中央拟了许多正确的局部要求，这些要求可以作为中共行动纲领底基础。替工农谋政治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等）的要求，对于揭露国民党底冒牌民主政策，对于动员劳动群众去反对国民党，是比从前更有意义。

可是，中共中央底训令，并不时常都是正确地配合现时迫切的局部要求与党底基本口号。有时候，不是忽略了群众底日常要求，就是忽略了革命运动底基本目标，这都是损害党底利益的。而有时候，则机械地把党底主要宣传口号拿来与直接行动口号放在一块。例如，不加上任何解释，就把“没收地主土地”或“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这一类口号，来与各种行动口号放在一块提出来，是只能产生糊涂观念的。在目前时期内，在进行任何一个局部斗争的时候，都必须抱定这样一个实际的目标：尽可能好好地准备共产党本身以及广大劳动群众，去执行最近将来的革命高潮中的任务，去进行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从这个观点看来，这类的局部要求，如要求撤退帝国主义驻华的军队，或加紧在铁路工人和南京政府兵士中间进行工作，在目前时期内，就已经具有深刻的意义；对于这些局部要求，必须特别加以注意。

在一切群众发动中，在罢工中，在农民发动中，在群众反帝运动中，共产党员都应当极努力地参加，在参加这些运动时，共产党员底目标应当是为着实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展开工人阶级底革命主动性，动员城乡成千百万劳动群众到工人阶级底周围，以保证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领导权）。因此，中国同志应当特别注意到细心准备，认真组织，而在相当的革命环境内则具体举行无产阶级底这样一种革命斗争，如总同盟的革命罢工和总同盟的铁路工人罢工；因为，这种斗争形式，可以把国内一切革命分子都动员到无产阶级底周围，这样就能够而且应该在中国革命中尽极大的作用。

三、工会问题

全体的党员应该觉悟，假若在工人阶级群众中没有坚固深刻的根基，在各企业中的和职工运动中缺乏广大的有组织的基础，党在中国革命中是不能

够起领导作用的。他们应该知道，党在各企业中、职工运动中以及罢工运动中所占的地位愈是坚固，将来在阶级战争中就愈能拥有坚实的力量。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要开幕的时候，中央曾经指出，所有在中共领导之下的革命职工会底数量，从武汉时期以后已由七百三十四个减少到八十一个了，同时根据中央底计算，有群众的黄色职工会共有十四个，没有群众的共有六十四个。自此以后，革命的职工运动底情形，因为受到变本加厉的摧残，更加变坏了，而国民党的职工会却继续向前发展。这是一件最危险的事实。固然中国的条件，绝不会替一般改良主义的职工运动造成广大坚固的基础，可是，轻视许多黄色职工会（如上海的七大工会）在中国工人中有阻碍革命运动发展的作用，就是大错而特错了。统治的反革命的党，企图用这些职工会来在工人阶级队伍里替自己的政权和政策造成坚固而有组织的基础，使自己御用的走狗垄断一切职工会的领导，对于所有带阶级性的职工运动加以恐怖和破坏。所有共产党员应该用尽力量随时随地在黄色职工会内外，在工人阶级中，实行有系统而坚强的斗争，反对这种国民党的工会法西（斯）主义。

在环境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必须竭力恢复和巩固有阶级性的革命职工会。自然秘密的状况使工会很难挂出自己的招牌，所以必须或是替秘密的职工会找一个公开的护身符，或是这样来发展职工会底组织及活动，使他们在事实上不至于失去半公开的性质。在一切企业中应该举行反对摧残职工会和限制职工会组织自由的运动。每个职工会的坚固的基础应该建筑在各企业上，直接受共产党支部底领导。不过共产党的党团（甚至于在红色职工会中），如若不愿意帮助国民党走狗底“工作”，就不应该公开以党团名义出来活动。凡是在大的企业中，革命职工会已经种下深根的地方，在几种顺利的条件之下，可以不客气地获得实际的公开机会。例如受革命分子领导的胜利的罢工运动，就是达到此种目的的良好机会，至于现有的各种接近工人的兄弟会、同乡会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为赤色工会公开的幌子（或用其他名称建立此种类似的团体亦可）。其次，更重要的公开机会，可以发展革命的职工工作的，便是工厂作坊委员会和定期的工人代表会议。

但是如果以为共产党员的职工工作仅仅就是在于巩固秘密的和半公开的革命工会，那又大错了。不要忘记，在这些革命工会以外，还有许多群众的公开的国民党的黄色工会。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打进一切有群众的国民党工会，把群众从黄色工会领袖下夺过来。共产党员及其他觉悟的革命工人应该毫不迟缓地走进一切黄色工会的队伍中，实行反对国民党走狗的斗争。必须竭力在这些组织中取得大多数的工人，把他们团结到秘密的共产党党团底周围。在一切工人冲突和罢工的时候，应该揭破黄色领袖底妥协叛卖的作用。必须动员工人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党指定的工会办事员，反对他的一切命令和干涉。必须要求工会底民主化，要求由大多数人来选举自己的全权代表、办事人和指导机关的自由选举权。要坚决地反对被群众团体选出的办事人必须属于国民党的条件。要根据工人自己的经验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国民党的统治是压迫者的统治。

只有用这些方法才能破坏国民党的工会法西（斯）主义制度，甚至于在黄色工会里建立革命职工运动底坚固基础。同时应该宣传反对国际联盟下面的劳动委员会，反对亚姆斯丹黄色职工国际，反对日本改良派铃木文治等在加尔各答所召集的亚细亚职工代表大会。

在为着工人群众底本身利益和巩固革命职工运动而反对工会法西（斯）

主义的斗争中，在这个时期里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便是罢工斗争。在准备罢工和选择罢工日期时，应该尽量地正确地估计到罢工胜利底客观条件。与黄色工会毫无关系的指导斗争的罢工委员会，一开始便须由

本企业底工人群众选出，同时必须预先在本企业里作充分的鼓动工作，以便保证选出的罢工委员会委员，是可靠的。应该与本地（或附近的）党的指导机关发生经常的秘密的联系。在每次罢工工人全体会议或代表会议以前，共产党员应该与尽量多数的可靠的同情者发生关系，与他们商议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和提议。必须在罢工工人中，努力进行鼓动工作，以破坏仲裁法底信仰以及国民党底妥协调和政策，揭破黄色工会底领袖，使大家知道，他们是厂主和政府底走狗。必须设法说服罢工工人，使他们在经济要求以外，更提出许多局部的政治要求，这些要求要带有这样一种性质，使得罢工工人认为这是他们本身的直接的重要要求。在罢工的时候，要用全力斗争，使得不但是罢工委员会，就是由工人选出的经常的代表机关也由厂主和政府承认是同工人商议劳动条件的全权代表。如果某个工厂里的工厂委员会是受国民党所指挥的，那末就应当鼓动改选。

一般说来，应该采取所有的方法，使得罢工委员会不致于在罢工一完结的时候便立刻解散了，应该尽可能地（在必要时，也可以稍微改变成分）把它变成实际的工厂委员会。四、在组织上及思想上巩固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底文件中，可以看得出来，党在自前的组织情形，是完全不能满意的。中央通告第六十九号说：“城市里的支部，大部分解体了”，“很多工人积极分子，因为找不到党的组织，于是就自动地离开我们的组织了”。“党内大多数积极分子失去工作，脱离了群众而靠党的费用生活”……。据政治局底报告，党内工人同志底“总数最多不过四（其中是上海一、三 人，香港六 人，在其他大城市中非常之少）。在大多数城市里，甚至于如武汉、天津、广州等这样大的工人中心城市里，什么工作也没有”。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央在其组织通告（六九号）上提出许多具体的、正确的指示：关于首先集中注意力到工业区去，到大城市和最主要的工会小组去；关于吸引工人来积极参加党底工作，同时尽可能地使失业的与没有职业的党员到企业里去工作；关于建设生产支部及其工作方法；关于提高党员底政治程度；关于建设和巩固地方委员会及健全它们的工作；关于改善指导机关等等。现在的任务即在于使中央这些指示真正实行。

在中央所指示出的任务之中，有两个任务对于中共有根本意义；我们现在就要特别指出这两个任务底重要意义。

第一个任务——建设生产支部和使它们正确进行工作。党还没有能够在周围的工人群众中实现有领导中心作用的生产支部。现在，生产支部底数量非常之少，并且渐渐减少，而在主要的大企业中，却完全没有或差不多没有任何支部。“例如，就上海而论，手工业及店员支部占大多数，而生产支部却有名无实”（见中央通告六九号）。支部底内部生活也是非常薄弱，在大多数支部中，缺乏对于政治问题及实际任务的集体讨论，缺乏分工等等。在这些条件之下，支部一方面就与群众隔离，另一方面就不能向自己党员施以政治的教育（有时候，甚至于还说：“勇敢的工人一加入党后，就变坏了”）。在这方面的任务，是竭力进行坚忍的日常工作，以恢复那生气勃勃的生产支部。否则党便不能向前进步，否则党便要衰弱和解体，因为党就会失去自己存在的组织基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中国同志应当

学习，应当正确地把它应用到中国特殊条件中去，以便到处造成广大的、生气勃勃的、积极的（秘密的、小规模的生产支部，这样来建立起党组织底可靠基础。

第二个任务，就是在思想上武装自己的党，为达到此目的，第一，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底理论。必须记着，不仅党的领导干部，就是宣传员与鼓动员，如果没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党就会遇到没有必需的思想基础的危险；只有这种思想基础，共产党才能够明白认识时时变更的环境，才能够明白认识摆在共产党及革命运动前面的带有极重要意义的复杂政治问题。第二，必须向党员群众施行政治教育。必须在党员群众及革命青年中施行特别的教育工作以提高全党底政治水平线（党校、政治训练班、自习组、出版和发行通俗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等等）。现在，我们特别要你们注意的，就是一定要使全体党员都认识共产国际纲领，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以及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底最重要的决议案。

现在，在反对党内右倾“左”倾的斗争中，也应当把忍耐的原则的解释工作与同志态度的批评，当作主要的方法；只有在非常的情形之下，在对于真正不能救药的同志，才可以开除党籍，以作为政治清洗的办法，现时，在中共党内，大规模地采用这种办法，是没有根据的。

中央委员会和一般工作人员应当把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尽可能地在必要的严守秘密的条件之下实行党内民主制的指示，切实执行（例如选举的原则，当然不能在各级党部都完全实行）。当然不容许假借党内民主的名义来违反纪律和进行派别意志斗争。为要消灭这些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共党内，可惜还可常见）党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方法，首先就是说服的办法。一切党部组织底责任是坚持党的统一、确守纪律及巩固指导机关底威信，反对个别同志底一切破坏组织的行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希望中共党员努力巩固自己的党，切不要忘记：如果没有团结坚固的、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武装的共产党，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不能实现的。

附注：（一）共产国际执委以为如把此信不仅给中央委员看，并且给各省及各地方工作人员看，是很有益处的。

（二）关于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农民问题，我们在这封信里没有提到，因为我们预备给你们写一封专门信来说明这个问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注释

基玛尔——土尔其共和国第一位总统，领导民族商业资产阶级革命对外取得列强对土的基本权利的承认。

原文如此。

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

(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

李立三

一、中国资产阶级历史的发展

中国资产阶级在最近十余年来。尤其是在五卅运动以后，在政治上的作用与比重日益增大，到现在已成为一切政治变迁主要动力之一。现在南京政府与以前北京政府，固然同是反动的政权，但是有一很大的不同点，就是以前北京政府中几乎完全是官僚贵族（代表封建大地主阶级）买办地主阶级的政权，资产阶级的影响异常微弱；而现在南京政府中资产阶级已成为主要势力之一，把一部分代表封建大地主阶级的官僚贵族排斥出去了，资产阶级其所以在政治上能有这样大的发展，完全不是偶然的，的确在这十余年中，中国民族工业有很多的发展，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看下面的几个主要工业发展的数目字便可知道：

(第一表) 华商棉织工厂历年发展表

| 年 份 | 纱厂数 | 锭子数 | 布机数 |
|--------------|-----|------------|-------|
| 光绪廿三年 (1897) | 七 | 259,000 | 1,750 |
| 民国四年 (1915) | 二二 | 544,010 | 2,254 |
| 民国八年 (1919) | 二九 | 659,721 | 2,650 |
| 民国十年 (1921) | 五一 | 1,238,902 | 6,650 |
| 民国十二年 (1923) | 五四 | 1,943,672 | 8,581 |
| 民国十四年 (1925) | 六九 | 1,881,8221 | 6,381 |
| 民国十六年 (1927) | 六四 | 1.878,0231 | 2,283 |

(第二表) 华商面粉工厂发展表

| 年 份 | 厂 数 | 年 份 | 厂 数 |
|--------------|-----|--------------|-----|
| 光绪廿六年 (1900) | 2 | 民国十五年 (1926) | 116 |
| 民国八年 (1919) | 67 | 国民十七年 (1928) | 114 |

(第三表) 华商水泥厂 (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 成立的年份

| 厂 名 | 地 点 | 成立年份 | 资 本 |
|--------|-----|--------------|-----------|
| 启新洋灰公司 | 唐 山 | 光绪廿三年 (1897) | 4,850,000 |
| 士敏土厂 | 广 州 | 光绪卅四年 (1908) | 1,500,000 |
| 华记水泥公司 | 大 冶 | 宣统二年 (1910) | 1,000,000 |
| 上海水泥厂 | 龙 华 | 民国七年 (1918) | 2,000,000 |
| 太湖水泥公司 | 无 锡 | 民国十年 (1921) | 1,000,000 |
| 中国水泥公司 | 龙 潭 | 民国十一年 (1922) | 1,000,000 |

此外还有很多的小公司，遍设各地，大半都是民国八年以后成立的。

(第四表) 中国地毯历年输出比较表

| 年 份 | 条 数 | 价 值 |
|-----|-----|-----|
|-----|-----|-----|

| | | |
|-------------|--------|-----------|
| 民国二年（1913） | 12,396 | 99,863 |
| 民国八年（1919） | 51,205 | 460,550 |
| 民国十年（1921） | 90,459 | 975,327 |
| 民国十二年（1923） | — | 4,691,052 |
| 民国十四年（1925） | — | 6,362,633 |

从上面几个重要的工业统计看来，中国民族资本的确是一年一年向前发展的，所以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作用与比重自然也一年一年增大。民族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便是欧战期中和战后几年，到民国八年以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又渐次回复到东方来了，所以发展的速度便渐次停滞缓慢下来。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就在欧战期中，也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很大的阻力，所以当时资产阶级感觉到要使自己发展，非排斥帝国主义不可，因此资产阶级渐次走向革命的道路。这种思想的反映，便造成空前的五四反帝运动，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影响，因这一运动而得到莫大的进展。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已渐次形成“自觉的阶级”，极力参加革命的战线，因此而爆发二七运动，五卅运动，资产阶级在这两个运动中，虽然表现很多动摇妥协的情形，但的确是竭力参加的。这两次运动，最后都因为北洋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共同压迫而失败，因此激起广大群众更加走上坚决革命的道路，当时资产阶级也认清楚，“要使自己发展，非排斥帝国主义不可，要反对帝国主义，非打倒帝国主义的工具封建贵族阶级的北洋军阀不可”，所以也更积极的来参加革命，因此而促成国民党改组成为工农和城市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但是当时工农劳苦群众，虽然与资产阶级站在同一的革命战线之内，反对同一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各自要求达到的目的，并不一致。在工农劳苦群众的阶级利益上，企图根本驱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客观上即是要与西方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根本消灭帝国主义，而资产阶级尚很幼稚，在经济上并不能完全离开帝国主义而独立，尤其是他的各个分子大部分带有很深的买办性，因此仅仅要求相当的削弱一些帝国主义的压力，得到帝国主义的让步。不过当时要得到帝国主义这一点点的改良，也非用革命的手段不可。

工农劳苦群众企图根本消灭封建势力，因此直接走向土地革命，没收和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中国资产阶级的分子大部分与封建阶级有密切的关系，或者兼有封建的剥削，因此仅仅要求相当的缓慢的削弱封建势力，来渐次改善自己发展的条件。既然在这一革命联盟的内部对于这一革命行动的目的，有这样大的差别，当然不可避免的发展到某一限度的时候，便要分裂起来。所以在北伐以后，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突飞的发展，汉口九江工人群众都以直接行动的方法收回英租界，两湖的农民群众都自动手抢夺地主的土地，尤其是工人阶级在经济上积极的要求改善，在政治上的影响更一天一天的扩大，客观上几乎夺到了这一革命的领导权，这样革命的发展，很明显的超越了资产阶级要求的范围，触犯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以前资产阶级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参加革命，现在不得不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实行反革命了。因为当时革命发展的结果，已经使他认为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对于他的利益的触犯，比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于他的妨害还要更大，不得不坚决的反革命起来，以镇压这一妨害他的革命势力了。所以中国资产阶级以前参加革命，和后来的反革命，都完全是站在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的观点上，这是他为他的经济基础和中国历史的条件所规定的。可是这里有一点值得我

们特别注意的，就是中国资产阶级起初利用革命，后来又反革命的结果，都得到了一些成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作用与比重，已得到突飞的进展，而造成现在资产阶级占主要势力之一的南京政府。

二、现在反动势力内部的斗争

在中国的土地关系，封建势力的内部，有很多派别层次的冲突，尤其是中小地主阶级与代表大地主的官僚贵族的斗争，并且这一斗争，在客观上很容易使中小地主阶级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的影响。所以革命初发展的时期，一部分中小地主阶级还可以留在革命战线的内部。到了资产阶级感觉革命对他的危害，同时受到帝国主义的引诱而坚决的反革命，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来压迫革命的时候，自然这一部分半封建势力的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表，必然随着资产阶级反革命，而联合一块向工农劳苦群众进攻，因此造成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联盟。现在国民党便是这一反革命联盟的组织，现在南京政府，便是买办，地主，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

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目的，仍然是自己阶级发展的利益，为着工农势力的发展侵犯了他的利益，而要联合买办地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镇压工农，所以他的反革命，虽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妥协，但并不是根本放弃了他自己阶级发展的利益，而且正是为着他自己阶级发展的利益。资产阶级发展的利益，根本上是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相矛盾的。资产阶级要使他自己的工厂赚钱发展，便不得不与帝国主义的商品在市场上竞争，便不得不要求相当的渐次削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资产阶级要使自己的商品的流通日益加速，便要要求国内市场的扩大，便要设法使广大农民的购买力增加，因此不得不渐次削弱封建的剥削。

他革命的时候，自然是为着这样的利益而斗争，他反革命以后仍然是要为了这样的利益而斗争。但是帝国主义（美国是不同一点）和买办阶级的利益，是要扩大在中国的商品侵略的范围，地主阶级的利益是要延长自己对农民的剥削，所以根本上都是与资产阶级发展相矛盾的。固然在客观上买办地主阶级受着社会进化力（生产力）的推动，仍然只有把自己蜕化到资产阶级的前途去，但是在目前还不能变成资本家的时候，自然还要极力加紧对农民的剥削；并且他还觉得只有加紧对农民的剥削，才能得到更多的资本，加速自己的蜕化过程；所以他自然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要求，并且还要极力反抗这一要求。同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首先买办化的便是地主阶级（代表地主阶级的官僚），因此买办阶级与地主阶级有密切的联系，直到现丰代表帝国主义在乡村中剥削农民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大多数都是地主豪绅和半地主的富农兼营。

并且帝国主义要维持他在中国的统治，只有极力维持中国的封建势力，因此更加撮合了买办地主阶级的亲密的关系。现在反革命统治内部的冲突，完全是这两个阶级利益的矛盾的反映。代表买办地主阶级的桂系，和代表资产阶级的蒋系（当然他自己还是带有美帝国主义的买办性），各自为着自己阶级利益，各自为着自己阶级发展的前途而争斗。都希望着这一反动的统治，完全合着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发展，因此极力抢夺这一反革命的领导权。

既然这两个反革命阶级的利益和发展的前途都有这样大的矛盾，因此在一切现实的政治问题上都要发生不同的见解和政策。资产阶级为着工业的发展，商品的流通，便要运输便利，交通统一，便要减轻厘金和苛捐杂税的剥削，便要实行裁兵统一等；对于农民，便主张二五减租，而不赞成完全镇压

和维持一切封建剥削的政策。地主阶级完全靠剥削农民而生存，所以对农民的反抗运动，自然不愿接受资产阶级二五减租等的改良办法，而要极力实行镇压的政策。要镇压农民便要军队，因此不愿意裁兵；同时便要把军队分散到各个区域，成为一种分区割据的局面（所谓分治合作），而不愿意统一、军队多了，分区割据的局面既然存在，就要筹款来维持军费，厘金便是主要军费来源之一，自然不愿意裁厘。所以这些现实的政治问题，裁兵，裁厘，统一，二五减租……等等，没有一个不是在两个阶级中都存有很大的矛盾的。现在蒋系与桂系的争斗，最主要的便是在这些问题上面。蒋介石在北伐以后，便高唱裁兵，统一，裁厘，和关税自主，二五减租等，桂系在表面上似乎对于这些问题都不反对（这不过是受全国资产阶级政治倾向的压迫而不敢公开反对），实际上没有一点不是根本反对的。四中会议，五中会议，直到编遣会议，都是在这些问题当中表现两派的冲突。蒋系主张取消政治分会，而桂系西山会议派坚决反对取消政治分会；甚至陈铭枢在广东主张取消善后区域，而李济琛坚决反对取消善后区域，蒋系主张裁厘，并召集五省裁厘会议决定即刻执行，而桂系公开的通令缓行裁厘（广东财政厅）；蒋系极力主张二五减租，而桂系公开的宣布取消二五减租和佃农保护条例：没有一个问题中不表现两个阶级根本的矛盾，这就是反革命内部各派冲突的根本原因。

三、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利益的矛盾与对中国不同的策略

反动统治势力内部各派的冲突，都与帝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各派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要战胜自己的反对派，都必须勾结一个帝国主义。尤其是各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都有很多的冲突，不得不勾结一派反动的势力来做自己的工具，因此反动内部的冲突，受各国帝国主义的操纵而更加激烈起来。

各国帝国主义中，压榨中国最利害，中国问题对他的利益有莫大关系的，主要的就是英日美三个帝国主义，其他法意葡西……等都比较次要些。但是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都含有极大的矛盾，尤其是英日美三国。日美的冲突，更是这些帝国主义相互冲突中的中心。美国帝国主义已是世界资本主义之王，他的对外的侵略主要在移殖资本，企图发展他的财政资本的侵略来统治全世界。他在中国没有甚么特殊的势力范围，他对中国的输出主要是机器和精制品。所以他如果要扩大在中国的势力，必须渐次排斥英日的势力，他要扩大他在中国的资本的市场，扩大他在中国的机器的市场（在经济的意义上，输出机器仍然是移殖资本），他要实现他对中国的经济的统治，更要使中国幼稚的工业渐次脱离英日商品的压迫向前发展，然后才能把他的大批的资本投到中国来。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便是他的很好的主顾，便是他在中国政治上活跃的很好的工具。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要相当的排斥英日商品的侵略，正是因为自己资本的力量太弱而希望得到帮助，于是中国资产阶级与美国帝国主义自然相互默契，相互勾结起来。美国帝国主义在欧战以后，对中国一贯的策略，都是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在巴黎会议受了英日联合的打击以后，美帝国主义便召集华盛顿会议，提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来打击日本，并帮助中国关税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等的要求。在五四运动后一切反日反英的运动，都有美帝国主义的暗助，这当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革命，而是为着他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排斥英日。所以起初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固然有美帝国主义的引诱，以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也是有美帝国主义的威吓（在南京首先开炮的便是美帝国

主义)。因为当时革命势力的发展，不但危害英日帝国主义的特权，而且要根本消灭一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这当然是美帝国主义者所极不愿意，要极力压迫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以后，当然还要帮助资产阶级势力的发展，使他渐次得到中国的统治，使中国渐次走向资本主义的前途，因此在蒋介石北伐以后，美帝国主义首先承认南京政府，首先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更加使中国资产阶级死心塌地与美帝国主义相勾结，做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弱小的资产阶级，只有在美帝国主义财政资本扶植之下才能发展，只有在美帝国主义伟大的财政资本剥削中国劳苦群众的过程中偷到一点剩余的资格，决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现在中国资产阶级的蒋系固已与美帝国主义勾结，而他的正统派（汪陈派）更公开的无耻的宣传联美的主张了。中国资产阶级历史的发展，的确得到了美帝国主义不少的帮助；如果中国资产阶级能够渐次稳定他的统治，那便要使中国变成美帝国主义“经济的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当然要比美帝国主义幼稚得多，他现在还是要极力输出商品，并且主要还是轻工业品，来使他的资本主义向上发展。他的商品侵掠最好的地方是中国，这里有四万万人口的消费力，这里有广大的原料供给，所以日本对中国一贯的政策便是要使中国变成他的纯粹的殖民地。欧战中的二十一条，以后对满蒙的积极政策，直到去年出兵山东，及现在的外交态度，都是从这个政策出发。现在满洲固然差不多成为他的纯粹殖民地了，就整个中国来说，也就与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生死的关系。他对中国的输出，占他全部的输出百分之二十，而对中国的纱布的输出又占对中国整个的输出百分之四十六，所以要保障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固然非继续向中国进攻不可，就是要避免他的资本主义的恐慌，也非维持他对中国的侵掠不可。因此他极不利于中国工业的发展，极不利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他在中国都是极力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打击中国的资产阶级的倾向，这是与美帝国主义采取极端相反的政策。美帝国主义要帮助中国的关税自主，修改不平等条约；而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极力反对中国的关税自主，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运动。美帝国主义要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而日本帝国主义要极力压迫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这是日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不可调协的根本的矛盾。

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自然没有日本这样关系重大。他对中国的输出，仅占全部输出的百分之六，同时他输入中国的商品，精制品（如毛织物等）占了很大的部分，并且他的输出资本的侵掠与他的输出商品的侵掠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他除中国外还有极广大的殖民地，所以他不像日本一样，中国问题关系他的帝国主义的存亡，所以他可采取与日本帝国主义比较和缓的策略。但是他与美帝国主义仍是根本不同的。第一，他的殖民地多在东方，如果中国完全独立，马上可以影响到印度南洋一带。第二，他在欧战以后，因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已陷于日渐衰落的趋势，对外贸易，每年的入超很多，输出资本所取得的利润，已经不能弥补入超的损失，因此自然还要求扩大国外的市场，来恢复他的工业。所以当然不能放弃中国这一广大的市场，当然不愿意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而要不利于中国工业的发展。所以在蒋介石北伐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有向上发展的趋势，他便极力帮助代表买办地主阶级的桂系来抢夺南京政府的领导权。孙科胡汉民等的返国都是受了英帝国主义的软命（只要看孙胡在伦敦时与英国外交家实业家等的谈话便可知道）；以及现在桂系西山会议派的政策，莫不有英国在背后操纵（当蒋系主张取消政治分会时，英港督金文泰首先表示赞成中国的分区合作，便是明证）。所以

英国对中国的政策，还是极力维持他的特权，并且要恢复他的已失的市场，来维持他国内的资本主义的恐慌，来维持他帝国主义的统治。

日美在中国的利益，和对中国的政策，固然是绝对的矛盾，就是英美在中国的利益和对中国的政策，也是根本不相容的，所以日美与英美之间都是有不可调和的冲突。不过英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如日本这样重大利害的关系，不愿意如日本这样执行积极的政策，而不可避免的激动中国第二次的革命高潮，更加影响他在东方殖民地的统治。同时他要恢复他在中国的市场，又与日本的商品在市场发生很大的竞争，而不得不设法排斥日本的商品（最近一年来在桂系统治之下，一切群众运动都被禁止，但对反日运动却很放任甚至与以便利，这便是英帝国主义的暗示），最近中国反日运动发展，日本的商品因抵制日货的关系而大受打击，英国的商品又极形活跃起来，英国兰夏开联合几十家公司，吸收二百万以上的纱锭，组织东方织物公司，想到中国市场上来与日本商品竞争，便可证明英日对中国市场的竞争，还极利害，英日之间也有很利害的冲突，英国还不能与日本采取一致的行动。因为这些原因，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在中国还保存一种三角冲突的形势。但是如果中国资产阶级的势力更向前发展，就是美国的势力更在中国发展，那就不只是日本决不能容，并且也是英国所不能接受，必得促起英日同盟的复活共同对付美国的形势。因为英日对中国的利益，根本上还是相同的，都是要维持中国固有的特权，都是要扩大在中国的市场，都是不利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都是要使中国成为纯粹的殖民地；至于美国政策的发展，便要动摇他们在中国的统治。他们相互间虽然有竞争市场扩大势力范围的冲突，但是如果美国势力发展的时候，他们可以设法调协起来，或者划清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统治北方，英国统治南方，两不相犯的来共同对付美国。所以现在英日美还是三角冲突的形势，但英日联合共同对美的前途是有极大的可能。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几乎是逐年增加，再往前去，必然要逼成英日的联合，美帝国主义久已看到这一着了，最近添造军舰案，共和党已公开的在议会申言要对付日本或英国，非添造军舰不可，所以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已一天一天的激烈化了，如果到了英日同盟复活的时候，便将是太平洋大战爆发的前夜。帝国主义要抢夺中国的地盘，不一定开始就直接冲突起来，首先还是要操纵他各自在中国的工具混战起来，来抢夺最高的统治权。同时中国反动势力各派之间又有根本不能调协的矛盾，虽然在目前因种种的关系，不能不设法谋到暂时的调协，最后还是非战争不能解决，再加以帝国主义的操纵，战争的爆发自然更是不可避免，而且要加快爆发的时间。

现在有些同志以为中国军阀战争的爆发，一定要等到世界大战的前夜，这一观点是不甚正确的，因为他第一只看帝国主义的矛盾，而没有看见中国各派间相互的矛盾，第二还没有看见帝国主义不愿意马上直接冲突，而要先操纵中国军阀的混战以抢夺中央政权。所以如果说中国军阀的战争与帝国主义有莫大的关系，当然是对的；如果便推论说中国军阀的战争一定要到世界大战的前夜，那就不正确了。

四、编遣会议以后的政治形势

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历史条件的规定，在他的发展的途中，遇着了三个最大的阻力：第一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主要是与英日的矛盾），第二是与中国的封建势力的矛盾，第三是与工农劳苦群众革命势力的矛盾。起初他参加革命，就是要想改善第一，第二两个矛盾；后来的反革命就是要克服第三个

矛盾。他这几年来利用一切革命的与反革命的策略的结果，的确得到了一些成功，对于他的发展条件有些少的改善；但是这三个矛盾并未消灭，而且又是日益加紧起来。所以资产阶级极力想运用一个妥善的策略，来缓和这三个矛盾，以改善自己发展的条件。这个妥善的方法便是他的“改良主义”。这个改良主义的“法宝”，第一可以欺骗广大的群众，使他们不走到革命的道路，到他的改良主义影响之下，同时可以利用群众的力量来威吓帝国主义，压迫买办地主阶级；第二可以希望得帝国主义相当的让步；第三可以使封建势力在无可奈何中来接受他的改良政策。这一法宝开放起来，便同时把三个敌人都打退下去，这便是资产阶级现在努力的企图。

他在实行反革命的开始便进行这一企图，尤其是北伐以后，马上召集裁兵会议，经济会议，财政会议，裁厘会议，同时在野的汪陈派极力宣传，以扩大他的政治影响，以骗取广大的群众，后来五中会议受了买办地主阶级势力的包围和英日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得不暂时妥协，以保障他已在政治上得的地位，以取得帝国主义的承认。但是这一企图并未停止，而且正是他以退为进的策略，所以在五院成立后，又马上召集五省裁厘会议，五省民政会议，极力进行修改不平等条约和关税自主等。这一企图首先得到美帝国主义帮助，使英国也不得不承认南京政府，其他各国除日本外，也都与南京政府订立条约了。同时又极力在军事上准备，联合冯阎两大军阀，勾结桂系肘腋下的湘鄂系（当然冯阎湘鄂系等与蒋系的联合，都是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影响的原因），以威吓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不敢不相当的让步，于是编遣会议就在资产阶级这样企图之下产生了。

编遣会议以前，蒋桂两系的冲突，在表面上已到极激烈的形势，如川黔战争的爆发，如蒋冯联合消灭樊钟秀，如两李在鄂粤开军事会议，一般人都以为蒋桂系的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其实这样的观察只看见表面的形势，只看见几个军阀地盘财政军事等的冲突，而没有深刻去分析两个阶级的形势。资产阶级在当时固然要得到他自己发展的比较便利的条件，如裁兵，裁厘，统一等些微的实现。但是第一他还是利用“和平转变”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因为他在军事上，政治上，群众中的影响，都没有完全压倒买办地主阶级的可能，如果马上以战争来解决，不只是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就是现在表面的统一，也将要完全破坏，而成为分裂割据的局面，那么便要使交通更加阻碍，运输更加困难，市场更加缩小，这是于他没有利益的。如果用“和平转变”的方法，那就只要有一些儿的胜利，都可以利用这一机会，来力图发展，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与实力，准备将来胜利的条件。第二当时还有几个帝国主义没有承认南京政府，尤其是日本，正在找觅机会来设法进攻，若是马上爆发战争，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更可以借口停止一切交涉，甚至实行武力的干涉，那就多年企求的关税改良，都要完全成为泡影，这就是资产阶级所极端不愿意的。第三工农劳苦群众的革命势力，不但没有消灭，而且有重行活跃的形势，这也是资产阶级所引为莫大的威吓。因此在当时，资产阶级并不愿意爆发战争，不过一方面极力扩大宣传，以骗取一般群众的拥护，另一方面在军事上也加紧准备以威吓桂系，来达到会议中的胜利，这就是资产阶级进行改良主义的一贯的政策。在买办地主方面，当时政治上因资产阶级影响的扩大，已处不利的地位；军事上在北京武汉都有受包围的危险，所以当时实在不能战争，也只好采取到会议中来战争的策略，因此编遣会议并没有爆发战争，而在根本不能调协的当中，谋到一个暂时妥协方法。

中国的封建阶级，因帝国主义的侵掠，市场的发展，货币关系的扩大，资产阶级的形成，尤其是几年来革命势力的进攻，已走入一天崩溃的过程。其所以还没有被革命所摧毁的原因，第一是帝国主义的维持，第二是资产阶级的叛变革命，帮助了封建剥削关系的延长。到现在固然一方面还要极力维持固有的封建的剥削，另一方面的确受了资产阶级影响的压迫，而企图渐次把自己蜕化到资产阶级去，使中国在自己领导之下向资本主义的前途发展，以维持自己的寿命。虽然这一企图，受客观经济条件的限制，是极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的历史的条件与德国日本有极大的不同（读者可以参阅本报第二期《中国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性》一文），但是已经不能不相当的接受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甚至也还要利用一些资产阶级改良的口号，来欺骗群众。因此一些弱小的军阀（如湘鄂系等）便更容易跑到资产阶级影响之下去。这并不是说封建势力已经不能抵抗资产阶级了，在资产阶级改良的要求超过了他的可能的范围时，自然还是要极力起来反抗，并且正因为他自己也企图蜕化到资产阶级的过程，因此更要与资产阶级斗争，来争取自己的前途，何况再加以帝国主义在背后的操纵？所以蒋桂系的战争，无论如何是不能避免的。不过在此次编遣会议时，桂系在军事上，政治上……都不能战争，并且在他的策略也不好因反抗“裁兵”来爆发战争，使资产阶级得到更广大的群众，使自己立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在编遣会议中，谋到暂时的妥协，来准备自己最后的实力。

编遣会议的结果是在两派互让之下，而造成一种“暂时的妥协”与“虚伪的和平”，使目前两派相持的局面，更加延长。资产阶级在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希望得到统一，和平，裁兵，裁厘的更多的可能，以改善自己发展的条件，这次会议的结果的确是得到了相当的胜利，虽然这一胜利是极微弱的。如暂时不打仗，军政比较统一（如取消集团军总司令改成编遣办事处），财政比较统一（各省财政都要受总经理处支配），交通比较统一，裁兵有多一点的办法（决定裁减到六十七师），裁厘有多一点的可能（就是两粤也承认裁撤常关，预备裁厘改特税了），固然这些在会议的结果看来，都只是表面的（不一定能执行的），但的确这一点表面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所要求的。但是这一些微的胜利，并不是屈服了买办地主阶级，而是向买办地主阶级有相当的让步换取来的，如取消总司令组织编遣会议常务委员会，集合全国各大军事巨头来指挥全国军队，支配全国的财政，甚至中央军事学校都取消校长制改成委员制；如三市指委（北平，天津，长沙）的撤换，也是排斥资产阶级的汪陈派。所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一方面对资产阶级的要求有相当的让步，同时取得了更多一点的中央军事财政等的支配权，好借此来准备自己的实力，在这样两派互让之下，而延长了两派相持的局面。

不过两派在这次会议中得到的妥协是暂时的，造成的和平仅仅是表面的虚伪的，因为会议中所解决的仅仅是一些表面上的政治的问题，两派根本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调协。如农民问题如果不能实行资产阶级二五减租……等的改良政策，那么裁兵固然无办法，统一也是空谈，但这类的问题不只是在会议中没有谈到，并且是中国地主阶级始终不能接受的。两派根本的矛盾，既没有谋到一点调协，那么“妥协”，“和平”自然都是表面的虚伪的文章。但是这次会议的结果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资产阶级的确得到了些微的胜利，又可以利用这一机会来力图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他的改良主义的影响，更可以在群众中极力扩大，就这一点说，的确是增加了一点革命发

展的障碍。

五、资产阶级的政权是否有渐次稳定的可能？

这里已经牵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资产阶级既然是一天一天向前发展，而在编遣会议的结果，又得到了更多一点的发展的机会，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缓慢的，渐次的削弱买办地主阶级的势力，取得反革命的领导，便反动的统治走向稳定呢？我们要判断这一问题，决不能单从政治上来分析，而是要从根本的经济上来分析。如果经济上民族工业可以渐次向前发展，渐次减少他的阻力，那么在政治上资产阶级也可以渐次走向稳定。如果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自然反映到政治上也是不可能。

有些同志以为中国的经济——尤其是民族工业这几年来始终是破产崩溃的，因此反动的统治无法稳定，革命高潮马上就要到来；又有些同志以为一九二八年的经济——尤其是民族工业的确是比前恢复了，因此经济状况是向前发展的，反映到政治上必然要走向稳定，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我们先考察一九二八年的经济到底是继续崩溃还是恢复了，只要看一看下面几个重要的统计，便可知道继续崩溃的说法是不合事实的。

(第五表) 一九二八与一九二七年上半期

上海纱花进口比较表——以担为单位 (根据银行月刊编制)

| 类别 | 棉 花 | | | | 棉 纱 | | | |
|------|-----------|-----------|---------|---------|--------|--------|---|--------|
| | 进 口 | | 增 | 减 | 进 口 | | 增 | 减 |
| | 一九二八 | 一九二七 | | | 一九二八 | 一九二七 | | |
| 国内统计 | 1,596,642 | 850,877 | 745,785 | | 46,973 | 69,399 | | 22,426 |
| 国外统计 | 714,821 | 1,271,688 | | 556,867 | 4,222 | 18,181 | | 13,959 |
| 合计 | 2,331,463 | 2,128,562 | 209,901 | | 51,195 | 87,580 | | 36,385 |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见棉花进口增加二十余万担，棉纱进口减少了三万六千余担，就可见去年上海的纱厂营业要比前年恢复了一些。再就纱花的价格来看：

(第六表) 顺手十六支纱一九二八与一九二七年价格的比较表

(根据银行周报及商业月报编制)

| | 一九二七年 | | | 一九二八年 | |
|-----|--------|--------|-----|--------|--------|
| | 最高价 | 最低价 | | 最高价 | 最低价 |
| 一月 | 127.50 | — | 一月 | 154.50 | 154.00 |
| 二月 | 13.00 | — | 二月 | 156.70 | 146.30 |
| 三月 | 139.75 | 136.50 | 三月 | 162.80 | 153.80 |
| 四月 | 140.00 | 137.50 | 四月 | 161.70 | 156.20 |
| 五月 | 138.25 | 136.75 | 五月 | 166.90 | 157.00 |
| 六月 | 142.00 | 139.75 | 六月 | 162.40 | 157.60 |
| 七月 | 156.50 | 147.50 | 七月 | 165.40 | 158.90 |
| 八月 | — | — | 八月 | 160.60 | 146.90 |
| 九月 | 160.00 | — | 九月 | 161.40 | 147.20 |
| 十月 | 155.00 | 149.29 | 十月 | 166.90 | 155.20 |
| 十一月 | 154.00 | 151.00 | 十一月 | 161.00 | 158.50 |

十二月

154.00

150.20

十二月

175.00

172.00

从上表看出去年的纱价比前年高十两至二十两，而棉花的价格又相差不远（表从略），所以去年上海纱厂获利必多。英国资本的瑞记纱厂与去年十月卖与中国的申新公司，亦可见中国纱厂去年是比较兴旺的。天津纱业在去年十月以前因战事的关系，比较疲滞，十月以后战事停止，交易又极其活跃起来。汉口的第一纱厂，原已停闭，在去年底重新开工，九江纱厂新添工人七百余，可见去年全国各地的纱业，都是恢复的形势。

再看丝业：

（第七表）丝货最近三年一月至九月上海出口比较表——以担为单位

（根据一九二八年一月至九月的沪海关册）

| 类别 | 一九二六年 | 一九二七年 | 一九二八年 |
|-----|--------|--------|--------|
| 白厂丝 | 二五·六九五 | 二七·七五三 | 三九·三一九 |
| 同功丝 | 一·二二三 | 一·五二一 | 二·六二三 |
| 绸缎 | 一六·五一 | 一四·四四七 | 一五·三九一 |

几种主要的丝的出口都比去年增多，尤其是白厂丝增加一万二千担，将近增加了二分之一，并且在去年江苏一省就加盖了二十二家丝厂，可见丝业实在是恢复的形势。虽然去年丝厂联合会借口美国抵制华纱极力诉苦，其实不过是借此来欺骗工人进攻工人（参看丝厂工会的宣言便可知），实际上仍旧是获利的。

再看面粉业：

（第八表）一九二八与一九二七年一月至九月上海面粉进出口比较表——以担为单位

（根据一九二八年一月至九月沪海关清册编制）

| 年 月 | 一九二八 | 一九二七 | 比 较 |
|-----|-----------|-----------|-----------|
| 进 口 | 63,880 | 24,842 | 增 41,038 |
| 出 口 | 4,596,741 | 4,280,686 | 增 316,055 |
| 出 超 | 4,530,861 | 4,235,844 | 395,015 |

从上表看出去年上海面粉的输出比前年增加了三十万担（比一九二六年却还减少了五十万担），也的确是恢复的形势。去年天津的面粉业是衰落的形势，但第一因为河北等省大灾荒，小麦的来源大减，各面粉公司甚至跑到上海安徽购买麦子；第二是战争的影响，都是偶然的原因，今年战争停止后，必然要比较恢复些。

其他如交通工业，铁路，轮船，都很明显的是要比前年恢复些，并且在桂粤闽浙各省都加筑了许多汽车道。

总括上面这些情形，去年中国的民族工业，的确是恢复的形势，虽然除纱业外都是很小的恢复。已足证明中国经济继续破产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是并不能根据去年比较前年恢复的形势，就断定中国的民族资本便是继续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只考察了崩溃或者恢复的形势是不够的，而是要进一步观察他的崩溃或者恢复的条件，才能断定他的趋势。

去年经济比较前年恢复的条件是甚么？先就纱业来说：

第一，是因为反日运动的复兴，各地抵制日货，以至日本纱布交易都停滞起来，而中国的纱布因之畅销。据大阪朝日新闻的记载：

“自济案发生后，中国对日经济绝交扩大，以去年七月到十二月之间，日商所受影响最大，虽在贸易统计上，日本对华贸易仍为人超，然较之平时，

实相差倍蓰，倘以发展之度数计之，则无形损失，更不知几许，仅就几种主要商品计之，其减退之象，已非常显著，兹分述如下：

(一) 布匹日本输入上海之布匹，共一千零十五捆，较之前年同期约减百分之十五。

(二) 棉纱日本输入上海共四千二百六十七担，比较前年减少百分之五十五。

(三) 砂糖日本输入仅一万五千九百担，不过前年总额百分之三。

(四) 海产物日本输入共八万三千二百担，竟减少百分之七十。

(五) 五金品日本输入五万八千担，仅增加百分之八，而英国货则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美国增加百分之二十八，德国增加百分之三十五。

(六) 染料日本输入约值一万五千海关两，较之前年减少约二分之

因全国抵制的结果，使日本纱价大跌，平时三品二十支纱，比十六支人标常高至三十两左右，但是到九月中竟跌至比十六支人标还廉二两，可见去年中国纱厂的获利，抵制日货是有莫大的关系的。

第二，因为战争停止的关系，各地交通比较恢复，运输比较便利，客帮办货者比较增多。如四川帮，汉口帮，陕西帮，进货都超过前年很多。

第三，去年本棉与美棉都算丰收，花价不贵，纱价却是很昂，去年年底人标一百七十五两，比之前年年初一百二十六两，已贵了五十两，而花价的比较仅是三十一两五钱与三十四两八钱，不过贵了三两几钱，自然比较要获得极厚利润。

第四，是孟买罢工，去年印度孟买罢工十一个月之久，出纱减少很多，因此印度帮进纱比较多。整个对印度的贸易是输入减少，输出增多，也是有相当的关系的。

第五，罢工减少，对工人的剥削加重。去年工人的罢工事件，比之前年要减少得多，资本因之极力进攻，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增加，也是去年工业获得利润，比较恢复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余各项工业比较恢复，都不外上面举出来的几个条件，而“抵制日货”，“战争停止”和“对工人进攻”，是三个最主要的条件。现在详细的来分析这些条件：

第一，“战争停止”是一个消极的条件，仅能使交通比较恢复，运输比较便利，换一句话说，仅能使市场比较恢复，而不能使市场更加兴旺。因为中国市场衰疲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广大劳苦群众，因压迫阶级的种种剥削，都陷于空前的破产与贫困，困之购买力薄弱，所以要振兴市场，主要在减轻对一般劳苦群众——尤其是对农民的剥削，仅仅战争的停止是异常之不够的。

第二，“抵制日货”，这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原因，决不能有长期的作用。因为专靠一般人的“爱国心理”来不用贱价的商品，这完全不可靠的，印度甘地主义的失败，以及中国历次抵制日货的失败，便是极好的证明。

第三，“增加对工人的剥削”，这又是一个异常之消极的条件，因为在中国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已经是无以复加了，如纺织工人，每日工作时间十二小时，每日工资平均不过五角，仅够一人的生活费，所以再无法继续增加对工人的剥削了。何况现在工人运动的形势，又在开始活跃，必然要给资本的进攻以莫大的打击。其余如“孟买罢工”，“棉花价廉”，更是偶然的条件。所以去年工业比较恢复的原因，完全是消极的偶然的条件，并没有一个

积极的条件。因此决不能依据这一比较恢复的现象，便断定民族资本是能继续向前发展的。

甚么才是可以帮助民族资本发展的积极条件？第一，民族资本发展的第一障碍，便是帝国主义商品的竞争。所以必须减少帝国主义商品的侵掠，然后才能使本国商品的销路扩大。第二，广大劳苦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过于贫困，购买力大弱，所以要使市场的兴旺，必须相当的改善农民的生活，就是要相当改良土地关系，渐次削弱半封建的剥削。第三，是因为厘金和一切苛捐杂税的剥削大利害，使本国商品的生产费太高，不能与外国商品竞争，因此必须废除一切厘金苛捐杂税的抽剥。必须这三个条件有些微的实现，然后民族工业才有向前发展的可能。在去年比较恢复的条件上看来，是一个积极的条件也没有，所以决不能因此断定民族工业是能继续向前发展的。

有些同志说：“去年固然没有这些积极的条件，可是今年已经相当的有了一些，不是关税已经自主吗？不是各省都在进行裁厘吗？不是对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如二五减租等也在开始实行吗？那么民族工业因为这些条件有些微的改善，当然可以继续向前发展。好的！我们现在就来检查这些条件：

第一，所谓关税自主，依据中英条约附带的照会有如下的申明：

“……国民政府采用之国定海关税则中，所有按值征收，或根据于该税则之特定税率，与一九二六年关税会议所讨论暂时议定之税率，系属相同，而为对于英国货物所课之最高税率……”

所以国民政府实行关税自主后，所采取的还是段政府时代，关税会议时所议定的七级等差税率。再依据国民政府颁布税率之内容：

“附加税系采等差税率，即于现在输入正税百分之五外，凡输入货物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七种，其课税率如下：

甲、百分之二二·五。乙、百分之一七·五。丙、百分之一二·五。丁、百分之十。戊、百分之七·五。己、百分之五。庚、百分之二·五。”

棉织工业居中国工业的第一位，而棉纱棉布等竟因容纳日本之要求，列在庚类，享受百分之二·五的附加轻税。再按国民政府公布之实在税率，十六支纱每担仅抽三两，二十支每担抽三两三钱，但十六支纱每担价已超过一百五十两，而二十支纱价将近一百八十两，可见实际的税率，还不过百分之四，等于全未加税，其他棉布等从量抽税的差不多都是如此，面粉为中国的第二大工业，在新税率上竟完全免税。其他如洋灰，火柴，肥皂等轻工业品，中国可以自制的工业品，就是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品，税率都要极轻微。可见现在的税则，完全谈不上保护税率，对于削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掠，帮助中国工业的发展的意义上，实在是异常之轻微。

第二，所谓裁厘，在五省裁厘会议中决定裁厘后，举办消费特捐。银行周刊第十三卷第四号《裁厘后举办消费特捐之商榷》一文中有如下之论断：

“就所发表之厘税年额约计表而观，以所定之特税品目相比较，即厘税中课税物品之有大宗收入者，无不包罗之特税之中，仅将厘金简化而已，世人疑特税为厘金之变相者非无故也”。“五省裁厘会议所定之特种消费税查验细则，列查验办法三种：（一）派员查验，（二）置查验所，（三）设巡船，其中所谓查验所者，虽与厘卡迥然不同，而流弊所届，或有甚于厘卡。目前之特税查验局，已为商民所垢病，盖查验所仍有碍于商货之通行。且以我国厘卡积弊之深，由来已久，查验所或为变相之厘卡耳。”可见特种消费税完全是厘金之变相。

再就特种消费税的税率来看：“（一）奢侈品自值百抽十二·五至值百抽十七·五，（二）半奢侈品自值百抽七·五到值百抽十，（三）日用品自值百抽二·五至值百抽五。”而以前厘金税率普通多半一律值百抽三，固然厘金要过卡还税，而现定的消费税是销产并征，但是税率增高很多，结果亦相差不远。再就五省裁厘会议预定的厘定及特税收入的比较来看：

（第九表）五省厘税年额约计比较表

| 省份 | 厘金旧额 | 特税总额 | 特税比厘金短少数 |
|----|------------|------------|------------|
| 江苏 | 9,000,000 | 3,357,159 | 5,624,000 |
| 浙江 | 7,000,000 | 4,966,000 | 2,034,000 |
| 安徽 | 3,160,000 | 1,160,000 | 2,000,000 |
| 福建 | 5,130,000 | 3,302,640 | 1,827,400 |
| 江西 | 3,600,000 | 3,200,000 | 400,000 |
| 合计 | 27,890,000 | 15,980,000 | 11,900,000 |

五省共计特税每年收入仅比厘金短少一千一百九十万，可见对于厘额的减轻，仍是极少。何况各省并不切实执行，如江西福建，举行特种消费税，任意扩充项目，增加税率，比以前厘金还要烦重苛细，同时又举行甚么营业税，内地货捐等，引起商人罢市反抗（九江，厦门，福州都罢市几日）；如湖南取消厘金改征统税，但是税率有加重至百分之三十者，引起商人激烈反抗游行示威，并且要求恢复旧日厘金制度，最后税率还是减低极少。如两广至今没有取消厘金的办法，北方各省更毫无所闻。可见各省对裁厘很少切实执行，有些执行的还是“借裁厘之名，行加税之实”（总商会反对特税的通电）。又如面粉，洋货人口既完全免税，而本国工厂出品，每包征收出厂税一角。棉纱在出厂时要征收出厂税，到各省时还要征收统税或消费税。这样与厘金制度一点区别也没有了。所以这样裁厘的结果，实际上对于本国工业的发展，一点帮助也没有的。

第三，改善农民生活问题，在南方是佃农占极大多数，所以主要在实行二五减租和减轻田赋及一切苛捐杂税。但是现在各省所谓二五减租，除开浙东几县的确实行了之外，其余各省是一点没有实行的。如在桂系统治下的两湖两粤，已经由武汉政治分会和广州政治分会公开的宣布废除二五减租及佃农保护条例。同时对于农民的苛捐杂税的剥削，加增不已，如江西各县甚至抽收墙壁捐桌子捐（按每家墙壁桌子的数目抽捐），广东有些县份实行抽收人头捐，牛捐，猪捐，甚而旧报纸捐；四川田赋已预征到民国三十一年；山西田赋在民国十四年还是每亩抽银一两，到民国十六年每亩改征四元，十七年又加至每亩征收六元。至于军阀勒种鸦片如云贵川闽陕甘等省都是极普遍之事，如四川种鸦片抽鸦片捐，不种者加倍征收懒惰捐。南方各省农村中经过激烈斗争的地方，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更是加倍的利害，加租，加归，勒索欠租，欠债，赔屋，赔物等，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这样。有些地方还勒逼加倍的还租，加倍的赔偿，甚至农民暴动时捣毁了一个神象要赔十元至五百元者。其办民团，挨户团，勒收民团捐，门牌捐，烟灶捐，枪枝捐（买枪枝用），修公路，勒缴公路捐（闽南每人要缴公路捐五元），尤其是非常普遍，这样农民的生活，有一点改良的余地吗？再加以各种日用品捐税间接对农民的剥削，如去年国民政府整理盐务，加增盐税，各省也照例举行，今年举行验票，抽收验票费，又括去约一千五百万元，这不是取之于广大劳苦

群众——尤其是农民的吗？何况还有军阀“加工制造”出来的灾荒，已普及千西北九省，三千五百余万人口，快要饿死，这些事实都只看见农民的日趋流离贫困，看不出些少的改良。

从上面事实的分析，证明今年的几个积极的条件，表面上似乎做了一些，实际上的确是极少改善。就令这些条件有些微的改善，但是因为还有下面几个严重的困难，中国民族资本并不因此就能够与帝国主义的商品竞争，就能够继续向前发展。

第一，各国帝国主义可以自由在中国开设工厂，而在新与各国订立的条约上，都是“最惠国”的待遇，都载明“这一订约国，对于彼一订约国，不得有何借口抽收异于或重于他国或本国人民所纳的税捐”，那么就是关税相当的提高了，可以相当的抵制外货的输入，各帝国主义马上可以用大批的资本到中国来，利用中国贱价的劳力和丰富的原料来开设工厂，民族资本还是无法可以抵制（以前美国对付加拿大的保护关税就是采用这样的政策）。

第二，中国资本太弱小，抵不住帝国主义资本的雄厚，帝国主义很可以用“屯并主义”（中国商人用的名词，就是一方面在国内市场极力提高价格取得利润，另一方面在国外市场极力降低价格，以打倒外国的工业），来打倒中国的工业。现在英国兰开夏的纺织业组织的东方织物公司，就是准备用这样的策略来打击日本和中国的纺织业。

第三，中国生产技术非常之低劣，机器都极陈旧，生产费很高；各帝国主义的工业，生产技术都很高，最近生产合理化的实施，更加提高了生产率，减少了生产费，这也是中国民族工业无法抵御的。

第四，日本帝国主义在他势力范围内的满洲山东，甚至河北等处，可以用商业垄断的政策来排斥中国货。

第五，就是中国民族工业能得到相当的资本的积累，但因为政府财政困难，强迫购买内国公债或借款等，也就很难有余款来扩大营业。国民政府成立到现在仅一年多，而发行的内国公债，已有二万三千余万了，统计如下：

（第十表）国民政府发行之公债统计表

（根据财政部的财政报告及最近国府公布的命令编制）

| 种 类 | 发行日期 | 数 目 | 用 途 |
|-----------|-------------|---------------|--------|
| 江海关二五库券 | 1927.5.1. | 30,000,000 | 军政费 |
| 继发江海关二五库券 | 1927.10.1. | 40,000,000 | —— |
| 卷烟库券 | 1928.4.1. | 16,000,000 | 军 费 |
| 军需公债 | 1928.5.1. | 第一次 6,000,000 | 军 费 |
| 军需公债 | 1928.6.1. | 第二次 4,000,000 | 军 费 |
| 善后短期公债 | 1928.6.1. | 40,000,000 | 善后事宜 |
| 二五库券 | 1928.7.1. | 9,000,000 | 弥补国府短款 |
| 金融公债 | 1928.10.25. | 30,000,000 | 整理金融 |
| 赈灾公债 | 1929.1.1. | 10,000,000 | 赈 灾 |
| 裁兵公债 | 1929.1.30. | 50,000,000 | 裁 兵 |
| 共 计 | | 235,000,000 | |

这样大的巨款，落叶归根还是取之于一般劳苦群众，但是起先出款的还

是所谓工商业家，一债未缴，一债又来，各工厂就是赚钱，也只能供给这些债款了。至于内地的工厂更是要遭受无穷的强迫借款，据说河南郑州豫丰纱厂在去年一年，就被冯玉祥借去八十万，那么，还有甚么余资来扩大营业？日本帝国主义力争关税增收必须拿来整理无担保的外债，就是要借此来穷窘中国的财政，间接就是压迫中国的资产阶级。

上面这些情形若是不能改变，就是几个积极的条件有些微的改善，民族工业还是无法向前进展的。所以要使中国工业继续向前发展，除了要继续改善几个积极的条件外，对于上面几个困难，也要有解决的方法。但是这几个困难，如“收回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的工厂”，“强大本国资本的力量”，“提高生产技术……”等，都是极困难做到的。因此可以断定中国民族工业极少向前发展的可能。

今年因为去年这些消极条件的帮助，又因为历年市场久经衰歇，必然有一时的畅销的原因，或许还可以继续些微恢复的现象，但是如果这些积极的条件，不能继续改善，那就要很快的遇到严重的恐慌。所以我们现在还要考查这几个积极的条件，是否有继续改善的可能。

第一、帝国主义是否有继续向中国资产阶级让步的可能？现在表面上似乎与各国协定七级过渡税，仅通用一年，从一九三一年起，便可完全关税自主，但是在客观上是绝不可能。首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承认，此次日本国会通过的都叫做“关税协定条约”，毫无自主的字样，并且说“协定的内容，依中国政府之嘱托，除税则外暂不宣布”，可见这一协定中包含了不能公开的秘密。总之日本帝国主义差不多依赖剥削中国而生存，不是经过“革命”“战争”，帝国主义的倒台等，决不轻易放弃这一衣食来源的中国。就是英国也正在极力进行恢复中国的市场，甚至因此不惜与日本发生齟齬，那么他会愿意轻易的对中国资产阶级施与恩惠吗？照现在颁布的关税税率，对于英国的商业还没有甚么妨碍，如果进一步的自主，自然要触犯英国的利益了，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得到美国的后援而大胆的干去，那么，不只是英日要帮助他在中国的工具——桂系和奉系来推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努力，并且要因此加紧英日对美的冲突，加紧太平洋战争的危机。既然进一步的关税自主是不可能，那么，要收回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的工厂，更是绝对的不可能了。

第二、封建地主阶级是否可以进一步的接受资产阶级的土地改良政策？那就是说在佃农占优势的地方，是否可以实行二五减租等的政策，在自耕农占优势的地方是否可以减轻田赋的剥削？第一，因为中国地主阶级中，中小地主占优势，已经无法可以对农民让步，再加以近年来，帝国主义的侵掠，货币关系的发展，物价日益昂贵，自己已陷于破产崩溃的境域，更只有加紧对农民的剥削，才能相当延长自己的命运。所以如果没有广大的农民暴动，将要消灭封建剥削的时候，决不能接受些微的改良政策的。第二，在自耕农比较占优势的地方，多半是工商业不甚发展，没有别的税收，因此军阀剥削的来源大部分都靠对土地上的剥削，因此造成了国家封建制度残余的复活。只要看各省每年收支的统计便可知道：

(第十一表)几个重要省份十七年岁收统计比较表

(根据各省财政报告编制)

| 省 别 | 国家收入(多半是 工商业的捐税) | 地方收入总计 | 田 赋 |
|-----|---------------------|--------|-----|
|-----|---------------------|--------|-----|

| | | | |
|-----|------------|-----------|-------------|
| 江 苏 | 9,238,583 | 9,258,996 | 7,721,875 |
| 安 徽 | 2,808,969 | 7,454,272 | 5,727,134 |
| 福 建 | 11,047,597 | 8,974,351 | 约 4,000,000 |

(包括鸦片税)

从上面的比较表看来，江苏从田赋的收入仅占全部收入百分之四十，福建田赋的收入仅占百分之二十五，而安徽田赋的收入差不多占百分之六十。这就是由于江苏福建是工商业比较发展的地方，可以多从工商业上来取得收入，无须加重土地上的抽剥；而安徽工商业比较落后，因此不得不加重对土地的剥削了。安徽在全国看来，还是工业比较发展的地方，如果拿山西，陕西，河南，甘肃，四川……等省来与江苏，广东比较，更可以看出很大的差别。所以在工商业比较落后的地方（大半即是自耕农比较多的地方），军阀没有办法，不得不加重对土地的剥削，而自然造成国家封建的残余形势。所以，要减轻这些地方对农民剥削，非工商业已有相当的发展，而军阀制度已有相当的削弱不可，这实在是客观的条件上很困难办到的。所以资产阶级企图的土地改良政策，也是极少实现的可能。

第三、裁厘是不是有进一步实现的可能？我们要问裁厘有没有进一步的实现的可能，必须先看军阀制度是不是能有削弱或消灭的可能。如果军阀制度依然存在，那么，厘金是各省军费主要的来源，决没有办法可以裁减的。就是表面上裁撤了，必然是要用一种别的捐税来代替它，如现在各省以特税来代替厘金一样。我们要问军阀制度是否有消灭或削弱的可能，必须先看中国的土地关系是否可以改革或改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是否可以削弱。因为军阀制度的存在，根本是由于封建阶级要维持对农民剥削，要镇压农民的反抗；同时帝国主义要维持在中国的特权，要保障对中国的侵掠，都需要这一工具。所以半封建的土地关系若不消灭或改良，帝国主义的势力若不推翻或减轻，那么，军阀制度是不会削弱或消灭的。从第一，第二两项的分析，要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接受资产阶级更多一点的改良政策，都是极少可能的事，所以要削弱军阀制度也是极少可能的事，所以要实现裁厘也是极少可能的事。

总括上面的分析，资产阶级发展的三个积极条件，要得到进一步的改善，都是极少可能；所以民族工业走向发展的前途，也是极少可能。虽然今年或许还要表现一点恢复的形势，但是很快的就要遇到严重的恐慌。如果资产阶级要继续进行改良自己发展的条件，那么，不可避免的要爆发与买办地主阶级的矛盾，与英日帝国主义的矛盾，同时就要加紧英日和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最后便是战争——国内战争甚至世界战争的不可免。所以资产阶级要使反动的统治走向稳定，要稳定自己在反动统治中的领导都是极少可能。

但是有一点要使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力量，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的确是比以前增进了。而且资产阶级是极力企图以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善自己发展的条件，所以必然要在群众中极力扩大改良主义的宣传，美帝国主义也是极力企图使中国成为他的经济的殖民地，所以必然要继续帮助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发展。同时大革命失败之后，新的革命高涨尚未到来的时期，一般群众——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很易为接受改良主义的欺骗，这的确是革命发展前途莫大的障碍。重复一句，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势力的增长，美帝国主义势力的增长，尤其是他的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的扩

大，必须予以严重的注意！

六、群众斗争开始复兴的形势

资产阶级不能解决他自己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帝国主义无法调协自己相互间的矛盾，仅是证明反动统治稳定的不可能，并不就是反动统治的必然崩溃，更不就是革命的必然胜利。因为反动统治的崩溃和革命的胜利，更主要的动力还是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资产阶级，一切反动的势力，都在极力斗争，企图以自己斗争的力量，来战胜自己发展前途中的矛盾，来延长自己的寿命。如果不是广大群众革命斗争的力量，已经比敌人强大，已经能克服敌人，那么统治阶级还可以运用自己的主观力量来渡过重重的难关，或者这一派倾覆，那一派上台，这一军阀倒，那一军阀起而代之，而形成一种长期动摇，既不稳定，也不崩溃的局面。过去十余年来的历史就是这样，欧战恐慌时代，资产阶级统治并未完全倾覆，也就是这一原因。因此我们在分析反动统治极难稳定以后，还要特别注意去分析革命的主观力量——群众革命斗争的形势。

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势力，所以我们要首先分析工人斗争的情形。工人运动自“五三”事变以后，尤其是自上海邮务罢工以后，的确是开始活跃的形势。先看上海这几个月工人斗争的统计：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斗争的次数是逐月增加的，在八月仅有二十四次，而十二月已经有一百三次。第二，罢工的次数也是逐渐增加的，八月仅有九次而十二月已经有十六次。可见工人运动是逐渐向前发展，虽然是很缓慢的发展。第三，在斗争原因起初是资本进攻的次数多，十一和十二月是工人进攻的次数多，可见工人运动已从防御的形势渐次转向进攻的形势。第四，四个月参加罢工的人数仅四万一千多人，以上海八十万工人计算，二十个工人才有一人参加过罢工，所以只能说仅仅是开始活跃的形势，并不能过分的估量以为群众斗争已经高涨起来。

全国的形势都是与上海的形势同样的开始活跃的状态。如北方，自上海邮务罢工，引起了天津北京的邮务斗争。从天津北京的邮务工人斗争的胜利又引起了京奉铁路工人的斗争，唐山矿工反对包工的运动，北京电车工人的加薪运动，天津英美烟厂的罢工，地毯工厂，北洋纱厂的斗争，直到现在还是继续兴起的形势。如香港，这几个月中各重要产业工人如邮务，铁路，造船厂，码头工人都经过斗争，虽然每一个斗争是极小的问题，但已经不是以前不敢斗争的形势。其余如武汉，及各铁路，海员等工人群众，斗争的情绪都是相当的增高。甚至如产业落后的江西，最近九江的纱厂，码头工人，景德镇的磁器工人，都发生罢工或斗争。所以全国工人阶级的情形，的确是在大失败之后相当恢复了他的疲劳，又开始站起来向敌人反攻的形势。

这几个月农民斗争的情形，的确遭受了更大的打击，如海陆丰区域之失败，闽南苏维埃区域的消灭，朱毛的失败，影响到湘赣边境各县都遇到了严重的摧残，琼崖几县的苏维埃区域，也是同样的被消灭，所以农民斗争是比以前低落的形势。但是这些失败的原因：第一，是由于敌人已将城市的革命斗争给了莫大的打击，同时内部冲突又得到了暂时的妥协，所以能比较集中力量来镇压农民的斗争。第二，这样的广大的农民斗争完全得不到城市的领导，最后自然要遇到严重的失败。所以这些失败大部分都是客观原因所造成，并不是农民群众不要斗争，不愿斗争。而且适得其反，广大的农民群众还是

一样的极热烈的要求斗争，极力斗争。如湖南平江，济阳苏维埃区经过一年之久，与敌人残酷的斗争不下百余次，遭受若干次的失败，直到现在，还是继续艰苦奋斗，苏维埃区域还存十余处，群众的组织还有十万人以上，其他各县如华容，常德，湘西各县虽然在极困难的环境当中，仍是在不断的斗争。湘南一带，农民常常自己树立红旗，反抗军队民团的压迫。如广东海陆丰三次失败以后，已经备受摧残，但是农民并不因此而消沉，到现在又恢复了三分之一以上的苏维埃区域。琼崖亦有很小的苏维埃区域的存在。其他在中路南路各县，农民群众的组织，又是发展的形势，斗争也在继续。如江西赣西一带苏维埃区域虽因朱毛之失败而受打击，但赣东北一带的苏维埃区域，仍然继续存在，并且近来受景德镇工人斗争的影响，农民的情绪更加勇敢起来，如江苏、浙江，虽然资产阶级一方面用武力镇压，另一方面又极尽改良的欺骗，但是农民斗争（如大刀会，红枪会反军阀苛捐杂税等），继续不断的起来，虽然冯玉祥，阎锡山等在农村中改变新的策略，实行村庄制度，扶植中小地主与富农的势力，但并未能因此停止农民的斗争。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影响，共产党政治的影响，的确是更普遍的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了。总之，现在农民斗争比较低落的原因，完全是因为白色恐怖的镇压，并不是因为农民的生活已有相当的改良而不要斗争，所以这一形势很明显的，只要工人斗争是向前发展的，（只）要军阀镇压的力量减弱，农民斗争必易为继续扩大。重新在广大的范围内爆发起来。尤其在今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斗争将又有一时的兴起，因为在北方历年军阀的战争和榨取，制造出空前的灾荒，到现在没有饭吃的将近三千万人；在南方因为去年广大农民斗争的失败，地主阶级加倍的剥削摧残，许多地方的农民牛粮种子，空粒无余，这样广大群众没有饭吃的情形，能安宁下去，不发生许多的变乱吗？

现在不管是资产阶级或者是买办地主阶级，保障他的统治地位的就是靠广大的士兵群众，所以极力榨取经费来养兵，去年一年，国民政府中央财政项下支出军费达四万万以上，若合各省总计起来还要超过若干倍。这一笔数目实在惊人。但是军费虽然用了这样多，而大兵的生活，并没有怎么改善，大部分的钱，都到了军阀的腰包里面。直到现在，除蒋桂两系认为是自己的主力军以外，差不多没有那一部分军队不是欠饷屡月，士兵群众的生活苦到万分。尤其是裁兵的结果，更引起了广大士兵群众的愤慨，因为欠饷不发，只给几元路费滚蛋，一切残废伤亡的抚恤费也都整个的被吞没，“替军阀拼命的结果，还是回到老家去挨饿”（士兵语）。因此兵变，逃走的事，时时发生，士兵运动的几个主要的省份都有进展的形势。反帝运动更是新的活跃的形势，自“五三”济案发生，反日运动遍于全国，都有很多的群众参加。此后如奉天的保路运动，汉口的水案，更加掀起群众斗争的情绪，汉口日租界工人已罢工数月之久，到现在尚未停止。固然这些运动，几乎都被资产阶级改良口号领导去了，或者是被买办地主阶级所利用，用以来欺骗群众，掩盖自己勾结帝国主义的罪恶，甚至被帝国主义利用做打击自己敌对的帝国主义的工具。但是我们绝对不应抹煞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一回实事，因为从此可以看见广大群众的反帝情绪还是非常之热烈，还是要爆发成为各种的斗争。总之，反帝运动重新活跃的原因，广大群众对反帝斗争的要求，还是最主要的动力。此外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斗争，更是极普遍的发展，如各省商人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在九江厦门福州及广东几个县份的市镇都实行罢市，在上海，长沙，武汉，北方各城市，都有很激烈的反抗，甚至游行示威的运动。如学

生和一般自由职业者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运动，也不断的在各地发生。这就是表现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对现在统治的不满，开始离开国民党，离开资产阶级的影响。固然这些小资产阶级的运动，都易为接受资产阶级的改良政策，如资产阶级的改良政策无法实现的时候，便要很快的转到革命的方面来。所以只要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还是可以吸引一般贫苦的小资产阶级走向革命斗争。

我们分析各种群众的情形，很明显的是广大群众的斗争又已开始复兴的形势，虽然这一复兴的形势是很缓慢的，但的确是很稳着的向前进展。有些同志以为“现在群众的斗争是革命失败的余波，而不是革命复兴的象征。”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说“以后群众斗争的情形，是继续的下降，而不是向前开展。”这一观点的错误，是很易证明的。第一，我们看广大群众的生活是不是向改善的路上走？帝国主义的侵掠已是渐次减轻吗？地主阶级能接受对农民的改良吗？这些我们上面都分析过了，是极少可能的。资产阶级能渐次改善工人的生活吗？他既不能减轻帝国主义的压迫，又极困难实行土地改良政策，使农民的生活比较优裕来扩大市场，那么，他自然只有更利害的剥削工人群众，才能与帝国主义的商品竞争。这样，很明显的广大群众的生活些微的改良都极困难，那么群众的斗争能够一天一天的减少吗？第二，白色恐怖的镇压，只能有短期的效用，而不能长久支持下去的，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加紧，固然对我们的进攻仍然是一致，但终是不能不比较松懈。第三，群众经过许多大失败以后，固然有一时的休息，然而决不是长期的，因为生活痛苦的压迫，除斗争外别无出路。第四，这几个月来的客观的实际情形，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的错误，因为很明显的群众斗争是一天一天增多，而不是一天一天减少的。第五，资产阶级改良的宣传在群众中扩大，的确是可以缓和群众革命的情绪，的确是革命的严重的敌人；但是改良主义如果很少实现的可能，那么这一改良宣传的欺骗是可以揭破的，所以只要我们能正确的策略和艰苦的工作，是可以战胜这一改良的影响。总之，现在群众斗争，不是统治阶级改良政策渐次实施而渐次缓和的形势，而是因为生活痛苦昔的压迫，不能不走上斗争的道路。所以很明显的群众的斗争不会渐次的减少，而是要渐次的向前开展。所以现在群众的斗争，决不是革命失败的余波，而是开始复兴的形势。

固然，认为现在群众斗争是革命失败的余波，是一种革命失败反映在过来的悲观思想；同时如果认为现在群众斗争已经复兴了，将要很快的走向革命高潮，这也是极不正确的观点，同一样的有害我们正确的路线。因为这一无聊的乐观主义要使我们认不清敌人的策略，尤其是使我们认不清革命的主观的弱点。现在群众斗争虽然是开始复兴的形势，但是的确有不少的弱点，需要我们有极正确的策略和极艰苦耐心的工作，才能战胜这些弱点的。

第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的确在群众中渐次增长了，尤其是黄色工会的组织的确是普遍的发展，在上海，天津一带都是同样的形势，就是在桂系下面的区域，除开桂系所御用各种官僚工会以外，也有黄色工会的活动。并且他们不是象以前空招牌的组织，而且的确有相当的群众了。因此群众中又发生了一些对国民党的幻想，希望国民党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解除他们的痛苦的幻想。还有许多经过极激烈的斗争，亲身受过国民党屠杀的群众，虽然对国民党没有幻想，但是对改良主义的宣传还是接受了不少。这些情形决不容许我们忽视！因为第一，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不仅是空口的欺骗，而

是的确可能——虽然这一可能是极少的——给些极小的恩惠来麻醉群众；

第二，群众在历次的大失败以后，在生活万分痛苦的当中，只要有一些的改善，都容易模糊阶级意识，而接受改良的思想。并且这种改良影响的增长，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民中也是一样，如浙东几县的农民因二五减租有些微的实现，便有很多的农民加入国民党，广东东江农民听到张发奎回粤的谣言，都很高兴起来，以为总比李济深要好些，这都是很明显的事实。虽然现在改良影响还没有极普遍的深入农村，虽然客观上土地改良的政策，极少实现的可能，但是农民接受改良的影响，根本上比工人阶级还要易为得多，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所以现在群众中改良主义影响的增长，黄色工会的发展，的确增加了革命不少的障碍，是革命主观上第一个严重的弱点。

第二，是革命失败的情绪，在群众中还是极普遍的存在。许多群众——在工人农民中都是一样——都表现一些恐惧怀疑，妥协，不敢斗争，不愿斗争的倾向。这一倾向已经造成一种极不正确的观念，如合法运动的观念，和平发展的观念，不只是在群众中有这样的观念，而且反映到我们党里来了。这是给与改良主义发展的更多的机会。

第三，过去党的机会主义给与群众许多不好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如不愿自己斗争，希望红军来打平天下，这不仅在农民中是如是，就是在比较进步的上海工人群众中甚至还有很少的人对朱毛发生幻想。如“组织斗争现在不必做，到了暴动的时候，群众都会要来的”，这差不多在上海广东等地工人群众都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些机会主义残余的观念，不是很容易克服的，并且极妨碍群众斗争的进展。

第四，党在过去继续发生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尤其是农村中的无目的烧杀政策，的确使广大的群众离开党，不信任党，这是要更增加团聚广大群众到革命口号之下来的困难。

第五，群众的组织异常的薄弱，过去赤色工会的组织，农民协会的组差不多破碎无余，就是现在黄色工会的组织也仅在小部分的群众中发展。这样群众组织的弱小是要使群众斗争只能缓慢的进展，而且这一组织群众的任务是异常之艰苦的。

这些革命主观上的主要的弱点，的确可以妨碍群众斗争不能很快的进展。所以我们对于这一开始复兴的形势决不能作过分的估量，认为革命高涨必然很快的到来。固然这些弱点，因为客观形势便利于革命发展的原因，而使我们主观上的努力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是这一工作是异常之艰苦的，重复一句，这一工作是异常之艰苦的！

七、我们的中心任务

总合各方面的分析，帝国主义极难调协相互间的矛盾，资产阶级极难解决自己前途的障碍，经济上极少发展的可能，政治上极少稳定的可能，目前虽在两派相持之下而造成一种暂时妥协，虚伪和平的局面，但是根本的矛盾并未减轻，战争终不可避免的爆发，群众斗争又在开始复兴，所以很明显的革命是在生长，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到来。这一总的形势现在的确是更加明显了。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必须严重注意的，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比重——同时就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比重又加大了一些，改良主义的影响又扩大了一些，群众对改良主义的幻想又增长了一些，这的确是增加了一些革命的困难。并且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快慢，完全看我们能否很快的克服这个改良主义的影响来决定，如果我们不能有正确的策略，艰苦的工作，那么这个改

良主义的影响，将会要继续的扩大，而更延长革命的高潮到来的时期，所以我们目前策略上的中心任务，就是怎样与改良主义斗争，怎样来克服这个改良主义的危险，争取极广大的群众都走向革命的道路上来。

现在有两个极端的观念，客观上都足以帮助改良主义影响的增加，妨害革命的进展。

第一，以为改良主义没有一毫实现的可能，或者以为经过艰苦斗争的群众，不会接受改良主义的影响。这一观念的错误，客观的事实已经充分的答复了。我们只要睁开眼睛看一下，为什么黄色工会能够普遍的发生？为什么已经能够得到部分的群众？为什么群众当中合法运动的观念这样普遍——何以有很多群众的斗争都到社会局去请求调解，或者到市党部去请愿？何以有很多群众自己组织的工会，都愿意到国民党去立案？这不是改良主义的影响生长的表现吗？如果国民党已经召集到了一部分群众的会议，我们还说国民党是没有办法的，这真是一种“盲目的夸大狂”。在上海法电斗争中，我们差不多集中了很大的力量来发展群众中的工作，将近一月的艰苦斗争，仅仅相当的揭破了国民党的欺骗，整个的罢工还是失败的，这还不充分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欺骗的利害吗？过去许多的事实已经教训我们了，将来的事实还要教训我们，不过从现在起还不认识这个危险，将来的工作更要加倍的困难。并且这一观念是要减弱我们对改良主义的注意，减弱对改良主义斗争的力量，客观上就是帮助改良主义的发展来危害革命。

第二，以为改良主义有很大的现实的可能，这在客观的事实上——帝国主义不愿有更多的让步，二五减租的不能实行，资本的剥削更加残酷，也已经证明这一观念的错误。但是这一观念的确是有帮助改良主义宣传的嫌疑，如果这一观念在群众中发展，将使群众都渐次离开革命，而走向改良主义的路上去。同时要使党的策略走到极右倾的机会主义方面，更加增长合法运动，和平发展的观念，这无异是帮助资产阶级阻碍革命的进展。这个观念的危险，比第一种还要严重得多。第一种观念将要因客观事实的发展而渐次肃清，第二种观念或许因资产阶级更努力宣传的结果，而更要扩大。所以我们要同样的认识这两种观念的危险，但特别对于第二种要给以严厉的批评。

注释

此为该文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的时间。

倍蓰，即五倍。

原文如此。

此文表格中有些数字不准确，没有一一订正。

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

——特委第一次扩大会简要情况及新特委名单和分工*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六日)

中央：

鄂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于旧历正月二十五日在江陵沙岗举行。宜昌、江陵、公安、石首、监利、荆门、远安、长阳等重要县均有代表出席。代表成份：工农占二分之一，知识分子占二分之一。经两昼夜方始闭幕。关于各项工作的决定，悉本六次大会的决议，各种决议案事先分组讨论，故成绩尚好，俟修正后设法带来。调将重要部分摘要报告于左[下]：

1. 加紧城市工作尤其是工运，以宜昌、沙市、沙洋、监利、新堤、藕池、江口等工人区域为中心工作。

2. 发展群众组织，团聚广大工农群众在党的周围。纠正过去仅有党的组织，没有群众组织的错误。3. 健全地方党部各部各委员会的组织，实行集体分工，并引进积极的工农同志参加指导机关。

4. 纠正过去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防止各县新的和平发展的错误。

5. 加紧领导群众的经济斗争（吃大户、分豪绅的谷米等）。6. 开始发动游击战争（正确的运用六次大会的决议），划江、公、石、监、沔、潜、南、华、安等县为第一区，施鹤为第二区，归、兴、巴等县为第三区，松、枝、宜、荆、当、远等县一时不能发动，应加紧群众的经济斗争，以便互相呼应，各区发动后，即向该等县扩大。7. 特委本身组织，旧有的仅逸、涛两人，大会决定补充七人，钱定生（工人、江陵县委书记）、屈阳春（农人、石首县委书记）、郑炽昌（前宜昌县委书记）、徐国源（农人、宜都县委书记）、邹资生（第一大队长）、段德昌（前公安县委书记，现任第二大队长）、杨景堂（农人，监利第三区委书记）。以周、万、钱、屈、郑为常委，周为书记，万为副书记，徐、邹为候补常委，段、杨为候补委员，并决定郑秘书兼组织，万兼宣传、钱为工委，屈为农委，邹为军委、段为妇委。

鄂西特委

三月十六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鄂西特委被破坏的原因和经过*

(一九二九年四月九日)

特委机关破获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太不注意技术

1. 接头机关太久，同时担任交通的同志也太久了。再就是接头的同志（有）些不技术，所以引起一般人注意。

2. 机关也不技术，如廖家台三十五号那个机关，差不多有长期的一年光景，还不更换地点。并且机关重要，进出的人复杂，可以说是宜昌本地的接头机关，又可以说是印刷机关，更可以说办工[公]处，又是保存文件的机关。因为出入的人过多，所以引人注意，仍是不掉（换）地点，硬是得着要来抄的消息才搬家。搬家就三个机关合并为两处，一处是铺子，一处就住家，凡是特委的工作人员通通都住在这两处。铺内住同志六人，老杨（特委书记），老钱（楼上先生），向育民（交通），戴少卿（技术工作人才），许主香（女同志），万陶。家里住同志五人，非同学三人，秘书郑，特支干事胡营本，秘书的爱人周（中学同志）、育民的长女（中学同志），我各[个]人。

铺内应服[付]环境最重要的就是老钱和许蓝香，但是老钱是一个只知吃饭而不注意环境的人。在机关未破的前几天，有好些人来铺内调查，非同志许先生（柜上先生）都察觉来式[势]不好，告诉他，他还骂别人糊[胡]说。在机关未破的头一天，有人来铺内送信告诉钱说，你们同师部里有什么仇恨？此说明早上要抄你们的家，他答应没有此事，他各[个]人不注意更不同负责人讲。

许主香各[个]人的事很多，又担任特委交通，常常在外面，其他的同志因各人的工作不同，未坐过柜台。

家里应服[付]环境就是同秘书的爱人，秘书的爱人除做饭吃饭而外，整天都在楼上，好像绣楼小姐样，连大门口站都不站一下，有时我有事去了，看大门的就是我这个满月娃娃。

二、同志不同意见

1. 书记同秘书。秘书较书记要注意技术点，秘书主张这样建筑而书记又主张那样建筑，所以事到了时秘书埋怨不技术。

2. 同志（有）些忽略，如平常我说文件应当时收捡，带文件出街要细心，恐被旁人偷去，同学便批评没有作党员的胆量，胆子太小，似乎是说怕牺牲。

三、特委的人款少而开支大，工作同志不单莫得衣穿，有时吃饭都成问题，连买印刷纸的钱都没得，所以没钱建筑机关。

四、同学间闹意气（我不敢武断的说是闹意气）

甲、书记和秘书。书记在外巡视回来，批评工作未做，更说什么技术不好，秘书就说工作过多，各[个]人担任不了，更向书记提出要回川，书记又声明不是说秘（书）一个人。后来谈判的结论我不知道。

乙、秘书的爱人同育民的长女就闹，那个吃菜多，那个又吃得少，简直闹得比旧家庭的小话还多。

（二）破获的当时

第一次来查门牌的时候，负责同志不注意来人的态度，还说我×。

第二次来，将胡营本与向育同捉去后，才拿人回来烧文件，烧文件又不关门，更不在房内烧，在对着大门的通道口烧，所以第三次来，拿去了未烧

完的文件，第四次又来过细检查。

（三）破获后

我与老戴由师部说脱出来，老戴当天就走了，我无处可走，现还回到破了的机关待着，向秘书要求掉换机关，他说无机关可住，向他要介绍信，他说没药水。一至[直]待了五天，才求他用米汤写个信把我，这也是负责同志不注意的地方。他知道我认识[识]我们同志很多，他更知道我晓得现存的机关不少，就是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同志，也应将我掉开，他不留必[心]，怕把我弄去，说出我们的机（关）和秘密。

此次特委机关被破，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机关随时迁移，工作同志常常掉换，就是叛变了同志报告，他也无从调查起，也莫奈我们何。

淑宁

注释

此年代为原丈戳记上填写的年代。

序码缺（一）。

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综合工作情形及今后发展路线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

中央：

中央一月六日的来信已到了。此间对于中央的指导，完全接受并努力执行。兹将三月来的工作分别报告如下：

(一) 党务

(1) 关于前委本身者：前委曾于去冬改组一次，以云卿、良耀、一鸣、毅夫、统一、叶平等组织前委会，云卿任书记，良耀任组织，一鸣任宣传，叶平任秘书，并以书记、组织、宣传三人组织常委会。公开的并有农运特派员、宣传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等组织，系以毅夫、叶平、良耀等负责。

(2) 关于施鹤党务者：施鹤党务过去仅CY稍有组织，但均系知识分子，非常畏缩，少有行动，自杨维藩叛党后，施鹤工作完全倒塌。现宣、来、咸、利、恩各县均无党的组织，仅鹤峰一县因前委的指导，党务很有发展，现已成立县委，有陈 刘 徐均予等负责，各支部工作亦在积极进行。党员已由七人增至十余人，并且党员的成分过去全系知识分子和有嗜好者，现在已有进步的农民加入。

(3) 关于红军党务者：红军党的组织，为四军特支，系叶平负责，特支干事如吴天钧、贺文连等均系努力的士兵同志。特支之下成立四个支部，蹇先为、汪毅夫、吴锡中、谭正业为支部书记。现同志发展已至八十余人，虽系士兵成分，但因缺乏阶级的觉悟及幼稚浪漫等行动，所以质量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发展。惟此问对于同志的训练比较注意，经常的举行各种会议，以启发各级同志。对于党的主义的政治的认识，这是还望上级时时与以训练材料的供给为盼。

(4) 党的宣传的工作：在鹤峰及党的力量所及之处，宣传工作都收了很大的效果。关于口头宣传的，有很多的宣传队下乡宣传，土地问题和苏维埃政权的意义，都比较深入群众中去了。关于文字宣传的，有前委的宣言，布告、传单、标语和红军的布告等，凡我们能够到的地方，都做文字的宣传的工作。除此以外，我们并在鹤峰城及走马坪等地作化装的宣传，群众观者数千人，有很大的影响，现在鹤峰最大多数群众因宣传的深入，可以 认识

(二) 群众运动

(1) 农运的 红军于去年冬月二十四日夺获鹤城，因军事不定和下雪多大的关系，所以去腊完全没有做群众工作。今年正月及二月红军再入鹤城，肃清了团防武装，党及群众工作也(有)充分的时间从事宣传与组织及领导群众斗争，因此空前的有鹤峰农民运动将有 的成绩。

(2) 农民的斗争 没有党的基础，更没有群众的组织，这次要做农民运动自然是很困难的，但因党的政治力量能压倒豪绅地主和一般保守的和平的 工农阶级，因为农(运)得有很顺利的进行。鹤峰各处农民协会开始组织的时候，是一种和平的现象，渐渐的农民多了，党的宣传和获得实(际)利益，于是乡村的斗争普遍的爆发起来，如农民召集大会，自动的杀戮土劣及地主，(以)及没收其财产等事时有所闻，而党的一切主张，的确已获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

(3) 农协的群众：鹤峰农民运动做得很[好]的是西路，田子为同志负责的第三区农协。其次为近郊第一区及北路第四区农协，麻水第五区农协及堰垭第六区农协。最弱仍是南关及五里坪之农运。现在已经成立农协的有七处，可以号召的群众（编入小组的）达四千余人，在鄂阳关方面并有千余神兵在党的影响之下而与反动派斗争着。

(4) 农民警卫之组织：各区家协并有警卫团之组织，第一区有百余农支，第二区有三百农支，第四区有数百神兵。第三、四、五各区均有数千农支，日常的轮流堵卡巩固后方，虽四百保卫团企图夺取鹤峰都不敢举动，所以红军虽间到前方，赖农民的力量，鹤峰的政权仍是保存着的。

(5) 工人运动：鹤峰城内外，仅有手工业工人数十，虽已成立总工会，但斗争很少（其实也没有斗争的对象），同时工人食鸦片者颇多，均 加入党。

（三）县苏级埃政府的工作

(1) 鹤峰县政府之组织：我们接到六次大会决议案是在县政府成立之后，同时红军割据鹤峰之后，不能不要一个政权机关来管理政治，所以犯了命令主义的倾向。鹤峰县苏维埃政府的委员为吴先锡、汪景云、徐锡予、汪毅夫、陈宗瑜、范秋之、吴秉奎等，都是由前委指定的。及到广大群众起来以后，又因县政权才开始有点力量，如果马上改组，于工作进行上又有很多阻碍之处，故县政府的组织只得暂时依旧，这是要请上级批准的。

(2) 惩办豪绅地主的工作：红军初入鹤城时，经济方面极困难。县有著名豪绅兼县长徐生咳，因云卿同志的声威关系，投机 给养，故全军军需尚能维持。我们要徐生咳出来绝对不是妥协，不过是要他暂维现状而已，所以对他的行动是监视着的，及到群众起来之后，红军的给养有了办法，除殷实商户各捐以外，并查出和没收了一些土劣地主的财产、器物、衣服等，于是我们遂把鹤峰豪绅之首领徐生咳处决了。同时为根本珍灭豪绅地主计，被拿之徐美斋、田少孟、肖寿田等反动分子一律处以死刑。现在除已逃走之李秀峰、张左臣、李奎元、徐良臣、罗金山、李泮林等外，关内没有豪绅地主的存

(3) 巩固后方的工作：红军于古二月初离开鹤城，鹤城的驴守工作完全是农民警卫团和一部分神兵负责的。当红军进驻走马坪时，关于军事报告，一日数呈，如百加坪陆明卿的团防，麻水边界朱卓然的余孽罗金山、李泮林的残部，以及宣恩沙道沟、建始店口等处的团防和施南的驻军等，大有联合侵入鹤城阻扰革命之企图。但均以群众的力量，敌众虽曾至距城二十里之观音坡而终退却了。古二月二十九日县政府并有报告送来前方，准备进击陆明卿、朱卓然等团防，如果敌力不大，是能取得胜利的。

(4) 准备分配土地的工作：鹤峰的钱粮税契业已一律焚烧，此间第一步准备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实行耕地归农，现在由县政府、农民协会众事调查工作了。如果鹤峰政权有较长时间的巩固，分配土地是能办到的。

(5) 教育工作：县政府教育部现已准备创办初级中校及半日学校，提高工农贫民之教育程度。

(6) 对人民经济问题：因县城商业凋零不堪，人民生计正感困难，除由政府劝告乡村农民运米来县售卖以济民食外，并由经济部拟定经济办法，如办协作社等，亦在进行中。

(7) 对土匪问题：因县政权已在我们手里，故对危害边境农民之利益的

土匪予以痛剿，藉免反动派死灰复燃。

(8) 对神兵问题：鄂阳关方面，设有神兵的佛堂，与农协时有冲突，农民受佛堂的压迫颇深。县政府除已决定农协并得指挥佛堂外，同时此间并要我们同志加紧农协工作，深入广大群众中去，领导农民减少佛堂的信仰，提高农协的作用，即是要夺取神兵的群众成为农协的群众。

(四) 军事

(1) 提缴田少孟的团防武装：红军于去腊开抵堰垭、杜家村一带休息，在杜家村缴得田部汉阳枪十余枝，今正二次进城后，又提得长枪二十余枝。

(2) 黄埔 部队行动：去腊杨维藩拖枪潜逃(维藩系中学施鹤部委书记，并曾参加前委)，全队到达雪落寨时，其中队长黄啄同志与王德斌同志会商，遂将杨维藩、杨在田处以死刑。群众八十余人，枪枝三十二，遂归黄埔带领。因德斌与此间接头太迟，以致失了联系，现黄埔同志已回咸丰，此间曾写信去调他，但至今还不见他下来。

(3) 收缴鹤城的武装：红军割据鹤峰后，鹤城溃退之团防武装，于一个月当中缴得长支[枪]八、九十支，其中多系汉阳步枪，火力甚强。

(4) 唐区队长之被害：正月间此间派唐占顿同志带枪二十余支及坏枪二十一支到阳河修整，因占顿不理队务及遇事不慎，致被其新收之分队长刘家瑞刺死，全队枪枝均被拖走，而受伤之唐占丰同志亦被害。

(5) 张家坪之役：在二月八日鹤峰著名土豪王文轩以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名义联合五峰孙竣峰、桑植向凤祥、刘子维等向我们进攻，下午四时红军于离城二十里之张家坪接触，我军正面退却，左右包抄之部队幸获利，并将敌魁王文轩击毙。是夜云卿同志等，以大敌未灭，故又率队夜击正面之敌，因王文轩已死，遂全部退却，左翼孙团亦闻风而逃，是役我等大捷，鹤峰政权等巩固。

(6) 追击刘子维部之经过：红军于二月十一日乘胜追击桑植团防向凤祥、刘子维等，我部抵桑植龙潭坪时，向已早逃，刘亦远走，遂决定向东育进发，于土地垭于[与]敌刘子维部稍有接触，敌部即溃退。我军夺获步枪七枝，连夜追至东育刘子维家，将其房屋焚烧。在东育休息一日，于十六日并抵坯城休息，现在因有意解决五峰团防及消灭罗逆口之，红军已进驻走马坪来了。

(7) 红军之现在：从去冬到现在，红军已发展至千人，枪枝亦增至三百余，基本部队为吴辅臣所带之特务队，贺炳南所带之第一中队，贺沛卿同志所带之第二中队，陈宗瑜同志所带之第三、第二特科大队等。李至以 所带之第一特科大队人数甚少，第三特科大队则已归黄埔带 去了。(游击司令)伍 (第二大队长)，向百胜(第二游击队长)，其中以正龙力量为大。此间派陈石、一青同志为参谋兼做党的工作(现在在收编中的

龙廖明 等部)。此间部队暂时尚难训练为彻底的红军，但各队均能有同志工作(如中队部有毅夫 工作，各区队长如唐卓然、 、 、王湘泉、范杜之等均系我们的军士同志)，所以只要加紧政治军事训练是很有办法的。至红军负责(人)云卿同志暂不公开而任秘密指挥，名义上在红军第四军之下设第一路指挥部，以王炳南同志负责，并决定以张一鸣同志为指挥，党代表协助其工作。

(五) 我们今后的工作路线

(1) 我们的环境：中央及特委指示我们的一切，我们当然要努力实行。

惟此间的环境，依然是很险恶的，如五峰、建始、宣恩、桑植、石门各县的团防，和逐出鹤境之李淬林、罗金山、陆明卿、李卓然、刘家瑞等反动分子无时无地不在准备着向我们进攻。如加以反动军队之援助，此间红军之将受打击，当在意料之中。

(2) 我们的准备：因此我们为应付这个险恶的环境起见，决定红军以全力解决某一方面之敌人，或下石门消灭罗效之部，或攻五峰解决孙峻峰团，此间总要打开一条出路。此×的准备俟侦探回来，即先解决五峰孙团再约田少卿部全剿罗逆效之。我们判断，只要没有大部敌人，是定能取胜的。至对后方，现毅夫、昌厚等已率农民警卫队进击陆明卿等，邹阳关神兵亦已堵击官店口之敌，胜则仍当以群众力量割据鹤城，一方面加紧农民运动，一方面加紧武装准备，以巩固后方政权；即不胜亦当局部的割据鹤峰，即以东海深之神兵割据邹阳关，贺善臣等割据西路，以为红军之归路。现在后方军事，业已动员，战事结果不日就可以知道的。

(3) 在上述情况之下，同时因为九澧反动军队防务空虚，此地决定率带红军开向下游等县游击，这一可以发动群众起来，一可以解决经济问题，另一点可以增加红军的武装力量。现在关于此一工作的布置，石门西北乡已派曾藩支同志恢复党的组织，并要准备暴动去了。鄂西方面亦已早派人到长阳县委接头，想几天就有回音到来的。

(六) 对上级的答复

(1) 关于中央的：A、中央要我们把红军分散成为数千人一队之队伍，因此间环境关系及同志缺乏，单独带队的经验暂难办到。惟此间红军已与农民警卫分开，警卫队担负后方防守，红军担任前哨作战，这样分法，就是有敌人进攻我们，也决不×受大的损失，是可以断定的。B、云卿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阻隔之故，暂难来中央工作。这并不是云卿不愿意来沪，实在是事实的困难。C、冬生同志因云卿同志身边找不着可靠的人，而他在沪的工作又不很重要，所以我们一致的留卢[冬生]同志在此工作，请中央照准。

(2) 关于特委的：(略)

(七) 请求

(1) 能单独一面作军运的下级干部之军事同志中央想必有人，务请多派人来。

(2) 各种通告及《政治通讯》请多多寄来，并请将湘鄂西党务情形见告为盼。

(3) 云卿同志之家属差不多没有饭吃，请中央就近与以接济。

前委

三月一日于走马坪

附：

鹤峰后方于古二月抄与北路陆明卿作战，适陆部援军傅为凤团防至故我后方农民警卫队虽追敌十余里而卒退却。北路军事既不顺利，而沙道沟方面大股敌人(马文德旧部及团防)又到了西路茅芭，成包围之势。故为保全实力计，决计采取避战方式，而于古三月三日离开鹤境了。我们这次率部向下方来游击，不仅军事上的关系，且因在上面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及武装力量难以发展，觉得也只有暂离鹤峰为好。这并不是我们不要鹤峰县政权和广大的农民群众，而鹤峰仍然在局部的割据着的，如北路之邹阳关，鹤边界之四门岩，南路之西之保等处均在我们手里。

现红军千余人（鹤峰农民警卫队亦已编入），已于昨日达到石门子良坪，休息并筹款。今后是向石、慈、澧发展，或是向五峰、长阳发展？虽未肯定，但总以避免大的敌人、夺取团防武装为军事的原则。因此我们要求特委速将两湖军事情形及我们的暴动工作详细见告为盼！

长阳方面，已有长阳县委代表黄 同志与鹤峰县委委员刘植吴同志接头，军事上并有具体的计划（以长阳梅孝达同志任我第四军第二路指挥，立即夺取长阳及资邱的反动武装，再与此间汇合）。如此问向哪方发展，请通知长阳县委做准备工作为要！

注释

原文时间为阴历“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

原文缺五字以上。

原文如此。

中共鄂西特委致中央信*

——政治经济形势，群运工作、组织情况及对中央的答复和请求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

中央：

目前鄂西的工作情形因特委机关的破坏，各地没有具体报告来，只得将各方所得到的情形略述于次。逸群同志来时当有更详细的报告来。

一、政治经济情形：

桂系退守鄂西后，宜、沙戒备异常谨严，沙市捕张敬芳余部人员甚厉，宜昌方巧[面]更有刘湘部队长驱袭击，现已激战四、五日未分胜负。此次刘部东下，先头部队不过三团人，其运兵方式系五轮直航秭归登陆，登时即到宜昌西北近郊十五里左右袭击，此时双方依然在激战中。刘湘准备两师人东下，在宜昌方巧[面]更想加强四川内部的反刘的战争，如宜昌成立援川司令部。目前杨、李、罗各方巧[面]接头甚形活跃。桂系退到鄂西部队计四师(陶、胡各二师)。综计鄂西原有部队亦不过五师人，此时独二旅(一百六十六旅)已全数调到宜昌火(线)上巧[面]作战。宜昌驻军纯系集团随营军官学校学生，其余陶、胡各师多驻江陵下游一带。江陵下游一带尚未正式作战，双方正在积极准备。鄂西上游交通，因已入于军事戒严期内，已难于通行，往来船舶绝少。城市到乡村中去亦受严厉的检查，虽老史小孩亦不能幸免，有时竟不准通过，至晚八小时街上即不许通行。城乡交通阻碍，因而商业停闭者甚多，货价高涨，尤其是宜地谷米的缺乏，累得贫民痛苦连天，他八小时的戒严和早晚拉夫，一般平民都非常痛恨。各地豪绅各部有因抢地住发生冲突的，互相倾轧的，有用群众反抗某一豪绅而酿出暗斗的。乡村中的日常经济斗争的发动——吃大户，豪绅们认定有我们从中领导，因此一般豪绅不安定于其已得之乡村政权或畏惧我们的形式，已成为一般的普遍的现象。因为农村日常经济斗争的发动，影响城市工人甚大，有些工人说：“他们农人吃大户到好，我们工人又怎样呢？”自然一般工人是有觉悟的倾向，在事实上也有一部分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的表现。各地豪绅武装除最小部分外(如松滋、枝江)，其余保卫团都成为倒霉的现象，有些被我们把械缴了，有些因我们工作的结果，已为豪绅的武装，也有豪绅们自己倒[捣]乱或者是群众促×的。

二、职工运动：

各地工人生活日益困难，以宜昌车夫工人生活而论，因正班拉时间较长出卖，从副班仍然要公租车钱，以致副班接车拉车租钱还没有拉着的都有，即或多拉几十钱生活顾不着亦常事，此时更加物价高涨痛苦呻吟的工人真不知多少。一般工人的情绪此时听×××农民成千成万的吃大户，他们更是羡慕的了不得。各地工人旧有的封建组织以外，在宜沙方面依最近深入群众职业化的同志报告，工人内部更有其特×组织，如宜昌大部分车夫工人已长期的形成有秘密的汉流的组织，另外人不易知道，这是过去工作唯一的障碍。此时因为汉流的衰败，有渐次退出而加入我们工会的，其详细情形尚在继续调查中。目前鄂西工运因缺乏作工运干部关系，除宜昌稍有起色外，其余各地均不过有线索进行，更因经济困难多不能照计划实施，很难得到蓬勃的发展。宜昌工运自定出新的计划后，工人同志不过数人，最近已成立车夫工会，人数三十余人，并指定各负责人(群众)分途成立四分会，二马路已成立，他如码头工会亦在进行中，其分沙洋工运较有办法，荆沙又次之。

三、农民运动：

农村中一般的情形其出入之点，详见政治、经济情形项内，无多述。监利、江陵、石首农村中游击战争已正式游击，夺获敌人武装甚多。下游农村工作大有发展，而农民协会已公开组织。松枝宜方丐[面]饥民的经济斗争范围较大，曾有群众两万人的行动，妇女小孩参加者亦多，虽受驻军一次摧残，捕去同志十余人，在群众方丐[面]仍然有继续不断的在作吃大户的行动，甚至有群众提议扑灭县城，并有慰劳被捕同志家属的（详情未得报告）。贺部前队已到长阳县城不远，我们决定要他向松枝宜游击，因为此时关系断绝，连派交通走不通，不过听说他与长阳党部已发生关系。归兴巴游击战争本派人前去指导发动，因交通阻碍走不到。农村及保卫团枪款及门牌捐等运动俱有大多数群众的行动，在豪绅统治阶级方丐[面]莫可如何。农协会会员总计有四千一百人左右，在江陵西北区有一雇农工会组织。

四、组织报告：

各级指导机关干部不易提拔，依然不健全，因工作的紧张更难得聚集一块开会。积极的工农分子参加到党里来，农人的数量较多、工人数少，目前多半是参加下级指导机关，因为十个有九个骤然提拔到上层指导机关，他们都会自骄，而且会发生不良的倾向。总计鄂西同志有四千人上下，工农会员有四万二千多人。农村组织虽然散漫，在斗争激烈而不易恢复的地方，表丐[面]看来党的组织已经踏塌，因为没有正式成立县委或健全，除在内部住的同志也有依然维持其组织的，也有改换名称而团结的。因此如公石、当阳组织大部分地方组织仍是保存着。

五、对于中央的请求和答复：

特委机关破获后，在宜同志生活都不易维持，特委一切工作此时更难有集体的讨论，许多没有接着上级的津贴，接报告后从邮兑校费以维持现状。兑款及通信处：宜昌怀远路乾计报关行钱绍柏先生转张子源先生收。（技术钱绍柏是张子源同学×的师兄，张子源曾×湖北省立十四中校毕业，他现在是在宜闲住着，来函可直与张子源通信）。下面游击战争的发动甚缺乏有经验的指挥军事同志，××中央务选派二、三同志来。（三）前与赵瑞卿同志到×调谈话的结果，他愿意作党内工作才派到枝江去，不意在半途折回，×更要求去城市中工作，当又改调在宜昌作特委技术工作（城市工运怎样好支配他）。为什么我们不派他作军事工作呢？因为前派来的两位作军事工作的同志（姓名忘了），党直接支配他们作军事工作，在半途中他们就去了。要罗同志直的原因是先提出作技术工作非常困难，他要党津贴路费，到武昌熟人交谈×。（四）四川刘同志来宜，因彼时特委各机关破坏无法接头，此时我们已函四川省委磋商一切。（五）游击战争行动需用盐酸钾十余磅（造炸弹药），此地不好买到手，希中央代购，交下次交通带来切要。（六）逸群同志已通知，中央调他到沪谈话，交[通]恢复时当即来。（七）特委接头处尚无着，下次通知。（八）写中央信，药水我们无多，只找了一点，希代购。（九）已派张文华同志来中央接头。（十）前通知沙市两处通讯处，再申明无效。

鄂西特委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

注释

中共鄂西特委关于鄂西组织状况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

一、全部组织人数及成份

鄂西组织自受敌人长期清乡，白色恐怖严厉的打击，几全部被碎，经数月来恢复整理的结果，有以下的××：

宜昌：二百二十人，工人占十分之一强，农民占十分之七，知识分子占十分之一弱，妇女占十分之一强；

宜都：一百二十人，工人占十分之一弱，其他同上；

枝江：七十人，工人占十分之一，知识分子、士兵各占十分之一，农民占十分之七；

远安：八十人，几全系农民，工人占十分之一；

当阳：五十人，士兵占十分之二，余概农民；

荆门：一百五十人，工人占十分之一，余概农民；

巴东：二十人，知识分子占十分之三，余概农民；

兴山：五十人，知识分子占十分之二，同上；

归州：二十人，同上；

长阳：一百二十人，同上；

江陵：六百人，工人占百分之五，知识分子及妇女各占十分之一，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

公安：七十人，几全系农民；

石首：三百人，工人占十分[之]一，知识分子占十分之一弱，余为农民；

监利：五百六十人，知识分子占十分之一，余几概系农民；

沔阳：四十人，多系农民；

潜江：三十人，同上；

天门：三十人，同上；

钟祥：五十人，同上；

京山：十二人，同上；

施鹤七县未得报告，五峰还没有组织，松滋正在恢复中。

共计：二千六百人，工人占百分之五，此外多系农民。

二、地方党部的组织

1. 宜昌已成立县委，辖三区，共有支部十六个。宜都、松滋、枝江三县共设一县委，现分四区，支部十二个。长阳已成立县委。荆门已成立县委。兴山、巴东、归州、远安、当阳、公安均系特支。江陵已成立县委，分八区，共支部二十九个。石首、监利均成立县委，各分四区。沔阳、潜江、天门、京山、钟祥均临时县委。

2. 宜昌县委五人（知四人，农一人），较健全，常委会五天一次，全委会半月一次，能按期开会。松枝宜县委五人，知三人，农二人；江陵县委七人，知五人，工农各一人；石首县委五人，工人一，农人二，知二人；监利县委七人，农民三人，知四人，均较健全，常会十天一次，全委会一月一次，可按期开会。荆门县委五人，农民二人，知三人；长阳五人，知三人，农民二人，均不健全。归、兴、巴、当、远、公各特支[支]均三人，均不健全。沔、潜、天、钟、京，各临委仅有形式。

3. 宜昌县委能按期参加下级各种会议，每月巡视各地各级党部一周，少

有经常和临时的宣传工作以及特别的和普遍的教育训练工作。松枝宜县委、江陵县委、石首县委、监利县委经常工作少有，但监利县委巡视和教育工作的欠缺。其他各县县委、特支、临委均少工作表现，尤以远安最坏。

三、支部的组织

1. 各支部均有干事会，以书记、组织、宣传三人组织之，大的支部下分若干小组，以便开会便利。

2. 支部会十天一次，小组会五天一次，活动份子会不定；宜昌可按时开会，桦枝宜、江、石、监亦可按期开会，少数支部能讨论问题，发表意见，但普遍的毛病，除城市支都外很难到齐。荆门、公安，还可按期开会，其他各县支部按期开会都难实现。

3. 各地支部都少工作表现，好的支部也不过是做了一点介绍同志、讨论问题、散发宣传品、缴费，游击战争发动的地方作侦探、交通工作。普遍的都是仅可到会，甚至有的连会都不能到。能够真正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的更完全说不上。

四、群众的组织

1. 群众组织的名称、人数及成份：宜昌有农会二，共三百五十人（党员在内）；北乡称工农会（因过去农协受过打击，当地群众除种田外，多以背柴为业，是他们自己取的名称），佃农占十分之六，西乡称农民委员会，佃农占二分之一；人力车夫工会一，共四十人，分三个分会。宜都、枝江有贫民会的组织，人数目前尚未统计。江陵县农协已成立，辖两区农协，有群众千余人（数目尚不精确）；石首已成立县农协，辖三区农协，有群众八百人；监利已成立县农协，辖两区农协，有群众三千人；三县群众的成份，佃农占十分之二，余多系自耕农，雇农更少。其他各县目前都还没有群众组织。统计共有组织的群众五千二百人。此外各地尚有少数我们领导的灰色团体（如兄弟团、姊妹团、……），但数量甚小。

2. 群众组织与党的关系：各地群众组织与党的组织均皆分开，但党员均加入群众的组织，群众组织的指导机关有非党群众参加，但仅占少数，区农协和县农协的指导机关有党团组织，但不能十分正确的运用。

3. 游击战争的组织：游击队的编制采用三三制，即三分队为一中队，三中队为一大队。队中以党员占大多数，非党群众仅占三分之一。成份：佃农占五分之二，雇农及工人占少数，自耕农占五分之一。但大部份脱离了生产，成为雇佣式的。队中有党和士兵委员会的组织，游击队的行动，受当地农协的指挥。

4. 士兵群众中的组织：士兵群众中仅有兄弟团一个，共五人，此外团丁中有兄弟团二个。

5. 纯粹[粹]济难会的组织还没有开始。

五、干部分子

一年以来，干部的牺牲，数量甚大，虽然有新的培养，但这个数量不及牺牲的大，所以目前极感缺乏。目前的情形，以宜昌最少，计县委五人中有四人系由外县调来，江陵干部较多，石首、监利、荆门还不缺乏。大概凡有斗争历史的县份，造出的干部较多，反之更为缺乏。普遍的还是极为缺乏，所以各级党部多不健全。培养的办法：在监利办过训练班，其他各地因环境关系无法举办，只能特别注意活动分子个别的训练，尤其是县委的巡视员特别注意这个责任。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从健全支部生活入手。

六、教育工作

1. 经常的教育：支部会、小组会。

2. 特殊的教育：活动分子会，个别谈话，个别训练，训练班，诵读小组，军事训练……。

七、秘密工作问题

过去秘密工作极不注意，尤其是农村中在我们组织较好的地方，差不多完全成为公开的形势。在特委第一次沙市机关破坏，系地点太久，且不注意自己的行动，被敌人侦悉，致破获两处，牺牲省委关学生[参]，特委张计储、魏亮生，CY 特委张光杰，江陵县委彭之任、李兆龙、邓振青及工人同志七八人；沙市特委机关第二次破坏，系在公安抄出通讯处，捕去接头处三人。最近宜昌机关破坏，系受汉口牵连。在农村中全无秘密工作可言，现虽极力纠正，城市上较有进步，但乡村中还是很不容易纠正过来。

自首叛变的坏现象，在鄂西的党还少发生，间有一、二自首的，均未做反动工作。如远安朱子明的自首，系图保全家产，宜昌刘一鸣和沙市王允尚的自首，系被捕后自首的，而所有举发的人尽是反动派，并未牵连组织。惟监利受华容、酒阳自首的影响，一时情形颇严重，继续蔓延，目前已经消弭。

八、党内不正确的倾向

1. 因纠正盲动，各县负责人普遍都有不动的倾向（多系知识分子，一般党员群众没有这个倾向），现已纠正过来；

2. 枝江、监利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向），忽视布尔什维克党的民主集中原则（仅是少数负责人），已纠正过来；

3. 江陵有反知识分子的倾向，少数农民同志，因党内提拔工农同志便轻视知识分子，再则因纠正他他[们]知识分子化的错误（服装等），更有所误会，动辄说：“只有你们知识分子才该这样”，“我们是农民”，“你们是知识分子”；

4. 普遍的有崇拜快枪的倾向，尤其是石首（过去石首北二区的支部、小组各种会议。参加人必须随带手枪，不然一般同志便叹气，开会便没有精神，由此可见一般）；

5. 监利因过去经费开支太滥，一切工作均要经费，无钱便不能工作，整个党有雇佣革命的倾向，现已少[稍]好；

6. 农民同志有地方主义的倾向；

7. 普遍的有避难就易的倾向（如不做城市工作和士兵运动）。

九、特委本身的组织及日常工作

1. 特委的人数及分工：特委共九人，工人一，农民三，知识分子五，经常负责的三人，经常指挥军事的二人，其他四人在地方党部工作；特委分宣传、组织两科，成立工、农、妇女、兵运四委员会，设秘书处，但多系形式；

2. 经常的会议：常委会五天一次，全委会两月一次，临时会不定，会议中讨论政治策略等问题，各地工作问题，CY 的问题等；

3. 机关：秘书处、印刷处、接头处、通讯处（多利用灰色地点），机关甚小，非职业化即社会化；

4. 巡视工作：经常两人在外巡视，多到主要县份，因地域太辽阔，许多远县难普遍顾及[及]，巡视时执行巡视条例：

5. 与各县的关系：关系较密切，经常每月至少有一次报告，重要各县经常有交通往来；

6.经济的支配：机关费八十元，宣传费三十元，办公费十元，经[津]贴CY特委三十元，经[津]贴各县千五百元（各县CY由各县党部经[津]贴），巡视费四十元，交通费五十元，招待费不定，临时开支不定。

十、中心区域工作

鄂西的中心区域，以地而言：首为宜昌、沙市，次为宜都、江口、藕池、监利、沙洋（丐、潜各县列入，则新堤、岳口、仙桃等亦中心地点），以县而言：则为宜昌、宜都、枝江、恩施、当阳、荆门、江陵、公安、石首、监利（鄂中各县列入，则沔阳、潜江亦重要县份）。对中心区域的工作，现以大部力量注意，人力、财力都相当的集中在这些地方。

十一、发行工作

1.特委本身对外宣传的小册子（歌谣等），各种传单，对内教育的小册子，小报及《鄂西通讯》正在筹备期中，因机关破坏中止。各县：宜昌对外的小册子《路灯》出了两期，江陵对内的《轨道》（全系搜集上级的通告、决议案等）；宜昌、江陵、石首、监利均有各种歌谣、传单。其他各县宣传品甚少。

2.在群众中发生的影响，以特委年关散发的拜名片及各地的歌谣较发生效力，我们的政纲群众至少是赞同的

3.分发的方法，以支部的作用分散出去。

十二、过去组织上的错误和缺点

鄂西的党，过去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组织路线上，虽经数月来极力的纠正，但进步仍是很迟缓，最重要的有以下的现象：

1.无产阶级的基础没有建立起来：拿全部组织的统计来看，工人同志仅占百分之五，整个的党全系农民；

2.没有城市工作：宜昌虽有一点工作仍非常薄弱，沙市、藕池、沙洋、宜都、江口的工作，更是微乎其微，一般的城市几乎完全没有工作，形成敌人的城市，我们的乡村的现象；

3.地方党部不健全：地方党部不能独立工作，很多县委和特支，都是有名无实的空架子的指导机关；

4.没有支部生活：各地支部完全不能起核心作用，日常工作更毫无表现，能自动按时开会的都不可多得，每次会议的内容，更是可怜，多是参加人传教式的讲说包办，很少工作上的讨论，政治和策略的讨论当然更是没有；

5.缺乏教育训练工作：一般党员的政治水平线太低，农民同志多是封建式的感情结合，对党没有深刻认识，较好的同志也不过知痛恨豪绅，机械的服从党的命令；

6.党与群众组织关系不正确：一般的没有群众组织，或则以党包办一切；

7.忽视党的秘密条件：特别是农村中的组织，许多成为公开的形势[式]；

8.大批党员脱离了生产：大批雇佣革命的党员，尽脱离了生产。

十三、今后组织上应怎样的改变

检阅过支组织状况，无疑的是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自然造成种种现象有客观的原因，而一般同志缺乏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不能战胜这种客观上的困难，在主观上无形中有避难就易，听其自然的倾向，须把这种倾向根本改正过来，正确的组织路线才能在工作上实现，今后应当改变的：

1.从新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宜昌的码头、车夫、海员、邮政工人；沙市的码头、车夫、邮政、汽车工人（襄沙长途汽车），是最重要而带产业性

的，他如各重要城市的码头工人，手工业及店员工人，沿江的木船工人、香溪及各地的煤矿工人等，必须集中人力、财力、用最大的力量去建立党的支部，特别注意领导他们大小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在斗争中吸收最积极的分子入党。

2. 加紧中心区域的工作：特别注重几个中心区域的工作，拿目前的情形来看，只要几个中心区域的工作做好，一定可以影响各处。

3. 健全地方党部：地方党部不健全，一切工作均无从实现，所有空架子的指导机关，力求缩减，甚至于不必要，必须很实际的深入群众去切实指挥工作。

4. 建立支部生活：在创造新的基础中，在组织路线的改变中，从新建立支部生活，这一工作务须做到；在健全支部生活工作中去加紧教育训练，培养干部人才，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和错误。

5. 切实指导同志打入生产，除少数革命职业家外，务须做到人人职业化。

6. 组织广大的群众在党的周围，抓住工人与资方的矛盾，农民与豪绅地主的矛盾，士兵与长官的矛盾，虽极微小的也要注意，领导群众各种斗争，在我们的影响下团结起来，纠正过去“光杆”的党的严重错误。

注释

*原文缺序码（一）、（二）。

鄂西工作报告

——政治经济形势、群众斗争、军事问题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六日)

一、政治经济状况：

自代表豪绅地主买办阶级的桂系军阀统治了湖北以后，历年杂色军队盘据的鄂西渐转入于暂时稳定局面，白色恐怖也就由此一天一天的严厉。在桂系部队未到鄂西以前，大小军阀只顾争夺地盘，势不能为豪绅地主出全力屠杀民众，在豪绅地主的本身，也没有什么强有力的组织可以对付我们。这一时期，只是我们向着豪绅地主进攻，他们多是逃命躲避——自然有时也有猛烈的反攻。当时把持地主政权的，通通是比较开明的新的豪绅地主，间也有一部份灰色政权落在我们手中。及全省清乡的屠杀政策实施以后，鄂西方面沙市以下划入鄂中清乡区，以十八军的严敬部驻防。沙市以上划为鄂西清乡区，以独立五师刘和鼎全部驻防。另以马文德旅为施鹤清乡司令。这么一来，一般豪绅地主既有专门屠杀民众的刽子手——清乡军可供驱策，本身复积极的普遍组织保卫团，城市乡村均实行“十家连”制，互相监视，大举清乡，因此群众斗争，受了极严重的打击，各地组织相继破坏，革命群众先后被屠杀的，至少在五百以上，相率逃亡的两千左右，我们的工作的确走到一个最严重的时期。各地神兵土匪，也同样遭此厄运。各县政治上概是清一色的极封建的旧的豪绅地主当道，连同那些新的豪绅地主都被他们诬指为 CP 而受重大的打击。

因为把持政权的是极旧式的豪绅地主，所以他们的策略，只是很野蛮的一味的屠杀。改良欺骗的宣传，都没有在那里发现。

豪绅地主的武装约分两种：第一，是保安队（即保商队），在各重要市镇上均有，则商人豢养的，他的目的只在保卫他的市镇，多抱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第二，是保卫团，是在清乡期中才普遍组织起来的，多成为某几个豪绅地主私人的工具，而彼此不相联系的。现监利已将全县保安队、保卫团完全集中，编为几个清乡队，统一指挥，江陵、石首也正在仿照这样办。大概每县至少百余，多者一千左右。

反革命的驻军，在蒋桂战争中，全鄂西仅留刘和鼎全旅约四团，驻守宜昌、沙市一带。马文德部一团留守施鹤。桂系在武汉失败，胡、陶全部及夏威之一部完全集中荆沙，现经蒋系收编，重新指定，以谭道源之五十师驻宜昌，程汝怀之五十五师驻沙市，尹承纲之新编第九师驻荆州，石毓灵之十七师驻钟祥，李宜渲之新编第十师驻施鹤，夏斗寅之十三师驻荆门，较以前增加了数倍。

经济方面，在全国范围内本来是活跃的现象，但鄂西却日趋于破产的形势，特别是农村中。造成这样的主要原因，就是去岁的旱灾。荆门、当阳、枝江、宜都、宜昌等县收获不及十分之三。公安、石首、监利一带虽然较好，平均也不过十分之七八。上游各县的农民，普遍都没有饭吃，相率逃荒出外，真是哀鸿遍野。棉花的收入，也不如往岁，农村的经济的确是急剧的崩溃。城市上呢，因农村中的购买力减少，影响到商业的萧条，进出大不如前，普遍都叫咸“折本”。许多小商店闭门停业，金融异常紊乱。除宜昌外，各地的纸票已不能兑现，低落到八折。沙市一带最近虽已较好，但还是没有恢复原状。宜昌市面另外还受一个影响，就是烟土的贸易额减少，因宜昌最大的

贸易是烟土，现以税征得太重，土商多裹足不前，而这一贸易又为当地军阀官僚所垄断，组织汉宜银行成托辣斯化的形势。其他业烟土者，更没有方法与他们竞争。所以烟土税虽由每担三百元加到五百元，近又加到七百元，而总收入还较以前减少。

反动政府的收入，唯一的是靠苛捐杂税，如二五税、禁烟税、烟酒税、牙帖税、印花税、警捐、团捐、门牌捐、灯捐、花捐、屠宰税、筵席捐……，真是“有名皆捐”，“无物不税”。农村中此外还有枪捐、田亩捐、清乡捐等。目前防军增多，民众担负还要加重。

在反动政府、豪绅地主、店东层层严厉的剥削压榨之下，工农的生活当然是日益痛苦，目前的生活程度，较一年前又增加一倍以上（宜昌米价六百，去岁只三百）。各业工人的工资，不惟未随着物价增加，大部份反为减少，如宜沙的码头工人，每件货工价减少一倍（因生意淡泊没货可抬，各洋行乘之减价），黄包租车去秋又加二百（共一千二百四），因市面萧条，常不起房租。各商店缩小范围或停业，失业工人陡加。农村中天旱的结果，豪绅地主并没有受损失，租课勒逼收足，许多农民不够缴租，反倒欠帐。荆门、枝江、宜都一带的农民十之八九都逃荒出外。在这次蒋桂战争当中交通的断绝，拉夫的骚扰，更给工农不少的痛苦。

二、群众的斗争情形：

一年以来，因白色恐怖过于严厉，群众的斗争不免有暂时吓退的现象，但群众生活的痛苦，沿着直线一天一天的增加。记得年关的时候，与一个没有帮口的码头工人谈话，他说：“他们汉阳帮×有人接济，我们真没有法子”（因汉阳帮年关时由帮中等两千元发给本帮）。罗田溪的农民有县委扩大会上说：“目前我们不斗争，真是没有办法”。可知工农生活痛苦到了极点，很迫切需要斗争的。所以各地的斗争，又渐次抬起头来。

工农所感痛苦最难忍受的，在工人方面：第一，是工资太低，无法维持生活；第二，是大批失业找不着工做。农民方面：第一是天旱歉收没有饭吃；第二苛捐杂税的繁多；第三，是豪绅地方严厉的压迫和刻骨的剥削（藉故摘×，大加一的高利贷等）；第四是清乡的骚扰（农民喊的‘清箱军’清乡时见人便捉去，就是他们认为是好人也要拿钱方能购[赎]回，无异绑票）；第五是战时的拉夫，尤其是桂系最近拉农民去当兵（每县五百名）；第六是豪绅地主强迫农民放哨守夜。

工农生活的痛苦已如上说，客观条件十分具备，但各地党部，多残破之余，没有力量去领导。有的地方，同志们因纠正盲动，有走入不动的倾向，甚至抑制群众的斗争，群众自发的斗争，得不着我们领导而被豪绅地主资本家所欺骗或镇压下去，或因领导力量太弱，走不上斗争的正确路线，而成为零碎起伏的现象。

A. 宜昌罗田溪农民的两次年关斗争：

罗田溪是山岭重叠的地方，农民的成份，佃农居多。大部份以背柴为业，经济要求比别地特别迫切，我们的组织也有相当基础，所以斗争易于发动。

第一次：当地地主（仅有两家较大）以宜昌谷价较高，准备将自己的谷（约四十石）运往宜昌卖，区委会决定领导群众去阻拦，到群众男女五六十人，结果地主承认谷不运宜昌，并给群众每人五升谷。

每二次：阴历腊月二十八日，区委决定领导群众去分豪绅地主的谷米过年，但有的群众以为这是办不到，所以只到百余人，每人得两斗米。这个胜

利的消息传出，一般未去的群众非常悔憾。这次斗争中的缺点：第一，口号微低；有的群众认为不满意；第二，没有再领导未去的群众再去。现在当地群众因得了两次小的胜利，斗争情绪非常高涨，几次要求要解决保卫团的武装（目前才成立的）。

B. 枝江、宜都的饥民斗争：

去岁天旱要算枝、宜两县最利害，农民普遍无饭吃。我们原来的策略，是领导饥民去分豪绅地主的谷米，在初次取得小的胜利，再作二次、三次、四次……的斗争。拿在群众讨论时，他们谓恐怕豪绅地主报抢案，坚持“大家到豪绅地主家中去吃的办法”，遂使这一斗争成为乞丐式的“吃大户”，发动时仅有群众百余人，以后每天逐渐增加，参加的群众达三万左右，纵横蔓延五六十里。两县豪绅地主大起恐慌，第一次勾结团防来镇压，被群众将六支团枪夺了；第二次又勾结团防乘群众不备，捕去首领五人。当开群众大会，提出条件：1. 应即释放被捕农友；2. 勾结团防的地主交群众惩办；3. 豪绅地主担保以后没有此等事件发生。遂将勾结团防的地主住宅包围，地主没有办法，央人向群众调停，暗中又勾结团防来解散群众，被群众冲出，把团防赶跑；第四次勾结宜都警卫队来镇压，没有结果，参加群众愈多；第五次勾结马文德经过的军队两连来解散群众，未发生冲突，地主百[白]花费了六百块现洋；第六次又以金钱把马部勾结来，把群众驱散，捕去二十余人。

这次斗争中所发生错误：第一，没有说服群众的精神，成为乞丐式的“吃大户”；第二，估量不正确，受豪绅地主调停的欺骗，以为地主不敢反攻。但在斗争中还有相当的宣传工作，所以在群众中影响很好，现在还是零碎的一二百人，一批一批的没有停止。不过我们的领导力量更薄弱了。

C. 其他各地零碎的斗争：

甲、沙市的面馆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因我们的领导力量太弱，被资方欺骗，谓“目前生意不旺，待秋收后加薪”，遂复工。因此，准备接着罢工的厨业工人和酱园工人，见面馆工人无结果也中止。

乙、宜昌人力车工人，要求减去去岁增加的车租二百，每日仍缴一串，正在进行中。被桂系溃军拉把领袖拉去了，因之这一斗争遂停止，现又在酝酿中。

丙、江陵西北区雇农四十余人，自动组织起来，保障工资和工作，我们领导成立雇农工会，提出的条件，地主完全承认。

丁、石首东二区大地主刘代富被我们枪毙，把三千亩田分给原来佃农，秋收后刘代富逃脱的儿子勾结团防把农民捉去勒逼缴租。所有佃农因分给的土地没有保障，耕种后恐又勾结团防收租，一致罢耕。最近江陵、石首、监利已发动游击战争，待后面再详述。

三、宣传工作：

过去各地都忽视宣传工作，就有一点，也作得不好，没有找住群众迫切的要求，所提的口号，不是群众所需要的，只是“杀尽”、“暴动”，偏于政治，忽略经济，所以不能深入群众，现虽有相当的改进，但还是没有做好。

有工农群众中最容易发生效力的是歌谣及一切有韵的文字，因为最适合他们的心理，并且容易记忆。所以关于文字方面的宣传，多有仿用十二月、十二杯酒、闹五更、孟姜女等调或用十字六字句等有韵文。在许多环境比较好的地方，都可以听见农民把这些歌调提起喉咙高唱。

其次是标语，城市中多张贴在小便处和敌人的布告上，便于群众容易见

着。乡村中多张贴在大道旁的土地祠、指路碑、电杆上，但很容易被敌人撕掉，所以有时采用粉笔写，比较可以保持长久。涂改敌人的标语（如拥护中国国民党，便另写“打倒”两字贴在拥护上面），也是常用的一个简便办法。

游击战争发展到的地方，常常作公开的宣传，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开群众大会。但在极秘密的条件下面，有时不能作文字宣传，反将群众吓退。飞行演讲和飞行集会的方式，各地少有能利用机会正确的运用。

四、职工运动：

鄂西因工业不发达，少有产业工人，我们工运的对象是：A. 宜沙及沿江各重要市镇的码头工人——宜昌约两万，沙市万余，宜都、藕池、沙洋、监利各千余。江口、董市、弥陀寺、陡湖堤、郝穴、调弦各数百。

B. 宜沙的人力车工人——宜昌约三千，沙市千余。

C. 沿江一带的木船工人——人数没有统计。

D. 宜沙的邮务工人，海员工人，挑水工人。店员工人，各种作坊工人。

E. 沙市的机器米厂工人，织布工人，汽车工人（襄沙长途汽车）。F. 巴东和当阳的煤矿工人及宜昌的纸厂工人——多者数百，少者百余。

过去沙市的工运，本来还有相当的基础，去岁三月的大打击（特委机关全部破获）遂全部坍台，至今仍没有恢复。宜昌过去的工职[运]，是收买工头的工头运动，因此我们没有抓住群众，工头不干了，群众也一个没有了；其他各地党部，多躲在乡村，当然更说不上工运，所以鄂西的工运，是现在才从新开始。

宜昌的人力车夫工人已有基础，秘密工会也建立起来。他们群众中所发生的错误观念，是正班与副班的冲突（正班是有名字可领车的，副班只能在正班手中出钱买来拉），当我们的组织在副班中发生时，他们就提出说压迫他们的是正班，他们想组织起来去打倒正班。这个错误观念经长期的解释方才纠正过来。码头工作比较困难，第一，有帮口的界限；第二，有哥老会的组织。帮口的界限一时没有方法把他打破。哥老会在群众中很有势力，一时也难于破除。所以，很久就有了基础，到现在还是没有什么进步。其他的工人群众中自然有的也有了同志，但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最适宜而最有效的，第一步组织灰色团体，抓住他们最迫切的要求，去发动大小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在斗争中去生长赤色工会，去建立党的支部。

沙市的工运在一个严重打击之后，很难恢复起来。现有的工人同志，多是未在重要的工人群众中，码头、车夫等都没有打进去，最近才开始从新布置，或者有个转机。县委负责人，因专贪乡村工作的热闹，城市工作不免有忽视的倾向，以为做工运须找有经验的工运家，不然就没有办法，这也是沙市工运没有起色的一个主要原因。

江口、董市、宜都、弥陀寺、陡湖堤、郝穴、藕池、沙洋都有了线索了，但发展却是非常之慢，基础薄弱，难于领导斗争。

目前因客观条件的俱备，工运已有转机，只要能很细心的、很忍耐的深入群众中去活动，去领导他们的斗争，工运是可以向前推动的。

五、农民运动：

全部的工作差不多完全是农民运动的工作，但各地的农运，都是没有计划的去进行，只听其自然的蔓延，所以许多大的农村，基础非常薄弱，甚至完全没有，多发展集中在穷乡僻壤的边境，无形中成了回避斗争的形式，农民运动的中心没有建立起来。

经过数月来恢复整理，各地均先后将恢复原状，有的还有新的发展，各地的斗争也渐次活跃。这些斗争并不是旧的革命浪潮的余波，而是新的革命浪潮的象征。所以，农民运动目前是向前发展的形势。

农民协会的工作，在监利、石首、江陵各县已建立起来，由党的包办中渐次走上比较正确的路线。日常的斗争，大都是反捐税、反豪绅。监利、洪湖附近一带，纵横约五六十里，完全成为割据的形势，很能得着当地群众热烈的拥护。不过成份上十之八九多是自耕农，很少地主。上游各县这工作才开始，还没有多大成绩。大最近的饥民斗争中，一定可以发展广大群众的组织，特别是在荆门、枝江、宜都更容易推动群众的斗争。

农村雇农组织问题，在目前还没有开始，因各地雇农很少，须待农协发展到相当时期才能单独组织。

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各地都很明显，反豪绅地主的斗争，很容易动员群众。各地富农的态度，目前多是倾向革命的，因苛捐杂税的担负以他们为最重，他们也是同样受豪绅的压迫。在目前的过程中富农是有革命性的，并且在数量上要占重要的地位，建立反豪绅地主的统一战线，确很重要。自然我们在反豪绅地主的斗争中，同时要准备进行反富农的斗争。不过目前我们只能积（极）加强贫农的力量，把农运的重心建立在贫农上，事实上不应故意作反富农的斗争，使富农反走向豪绅地主方面去。

六、士兵运动：

士兵运动的工作，在各地都没有建立起来，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城市基础的薄弱，仅在十八军严敬部队中发展一支部。近因战争<爆>发，移驻他处，把这个组织失掉。此外宜昌有灰色团体的组织。

目前各部的士兵，因生活痛苦，都很动摇。现准备趁招兵的机会派一批农民进去，同时指定几个当过兵的干部专门做这一工作，并多注意中坚部队。

除驻军外，团防中的团士运动，也是兵运工作中的一部分，现当阳、枝江、宜都、长阳都有了相当基础。在同一团防中同志比较多的，决定他们抽一部份，自动请假转入没有组织的团防中或军队中去，以便容易蔓延。

七、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是最近因工作上的需要才发动的。原来的计划是三处同时开始。1. 监利、石首、江陵；2. 施鹤（贺龙）；3. 巴东、兴山、归州。发动后向没有的地方扩大，现因川军东下，巴兴归的交通阻绝，目前才派人去；施鹤贺龙的行动是没有停止的，不过最近也因交通断绝未得着报告；所报告的是监利、石首、江陵三县农协指挥下的游击战争的情形。

游击队中以党员占大多数，非党群众只有小部份。各地调来的志愿兵及党部或农会派来服务的，不致脱离生产，不过在参加游击战争时，因为行动是流动的，不能同时参加生产。但另有一部份是很久便脱离生产长期参加这一工作的，及各地被迫来的成为雇佣的形势，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

游击战争目前的工作：1. 消灭豪绅地主的武装（保卫团）；2. 帮助农民进攻豪绅地主，反抗苛捐杂税。所用的战术，完全是袭击。指挥集中，分散游击。

三县共编为一大队，监利驻一中队，辖四分队，有步枪七十支，连枪五十支；江陵、石首驻一中队，辖四分队有步枪百二十支，连枪二十余支；沔阳中队正在编制中。

游击队所到之处，极注意宣传工作，当地群众并没有反感。每次解决团

防之后即开群众大会，参加者常常数千[百]人。在有几处没有组织的地方的农民说：“万不料你们这样好”。因他们过去受豪绅地主宣传的欺骗，现亲眼见着，才认识清楚。

游击战争发动的地方，群众情绪格外高涨，组织也一天一天的扩大，农协的权威渐次增高，工作有长足进展的形势。

八、过去工作的批评：

鄂西的工作是在破碎后恢复起来，由极端的盲动的路线上回转来走向新的道路，比较数月前是进步一些，但是还有许多极严重的错误和弱点：

点：

- A. 政治上许多不正确的倾向还没有肃清；
- B. 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不平衡，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基础没有建立起来。
- C. 地主党部不健全，支部生活没有，干部份子缺乏；
- D. 经常的教育宣传工作没有建立起来，党员的政治水平线太低，
- E. 大批的党员脱离了生产；
- F. 不能抓住群众迫切的要求，领导群众日常大小的斗争；
- G. 没有反帝运动；
- H. 没有士兵中的工作；
- I. 忽视群众的组织；
- J. 没有济难会的组织。

九、今后工作的意见：

- A. 彻底肃清政治上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 B. 集中人力、财力，发展中心区域的工作，尤其是职工运动；
- C. 组织强健的地方党部，建立支部生活；
- D. 加紧教育训练工作，培养干部人材；
- E. 领导群众大小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在斗争中去组织广大的群众在党的周围；
- F. 指导党员打入生产，实生职业化的口号；
- G. 扩大经常的宣传工作，特别注意国民党在群众的幻想，和改良主义在群众中散布的影响；
- H. 领导反帝运动；
- I. 加紧士兵运动；
- J. 扩大济难会的组织；
- K. 加紧对CY工作的指导。

注释

原件未署作者，据内容似为中共鄂西特委。

中央给贺龙并前委的信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

云卿并转前委诸同志：

三月一日的报告

下列的指示

目前全国 的时期了。自蒋桂战争爆发之后，继之以蒋 证明他是不可能的，军阀割据的形势，从此愈明显愈 战将愈无止境，因而他们对于工农群众的压迫和剥削必然要加倍的严重 的欺骗反动以至没有方法统一中国，已经从许许多多的事实认识得非常清楚。我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比以前要扩大，所以最近南方各省两广两湖江西福建以至江浙皖各地的农民斗争很都有些的发展，游击战争亦比前扩大，城市的工作虽然因白色恐怖的高压尚难完全恢复，但是近来有活跃的现象，北方天津唐山工人有不断的斗争，武汉工会亦自动的恢复，上海工人亦有经常的斗争，尤其“五卅”四周年纪念，虽然在国民党高压之下，但是还有广大的勇敢群众跑出来示威游行捣毁反动的民国日报及申报馆自动的喊出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政府的口号，革命空气浓厚，从上面的情形看来，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和矛盾一天一天的加剧，一方面是群众斗争复兴的现象，这一客观环境是很有利于工作发展的，不过我们的组织，自国民党反动之后，受着空前未有的摧残，一时尚未能完全恢复，这一革命开展的形势，党的主观力量的领导还很薄弱，目前加强主观的力量，亦是××××，同时发展群众日常斗争从一切斗争中夺取群众，更须把反国民党反军阀战争与日常斗争联系起来，使广大群众团聚于我们政治口号之下。

在军阀混战中，各军阀的形势，蒋系军阀因为据有南京政府及中央党部易于得到帝国主义的援助，所以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要占优势，当蒋桂战争爆发时，蒋一方面用大力进攻武汉，一方面用收买政策收买白崇禧在北方所指挥的几师及在湖北及在湖北的李明杨杨腾辉两部，同时勾结湖南之何键，所以很迅速的即将桂系在两湖势力肃清（自然鄂西的胡陶残部虽然经过了二次改编，将来仍是反蒋势力），在两广则利用三陈（陈铭枢陈济棠陈策）以反桂，何键之湘军亦乘机入桂，桂系李黄白在广西部队虽曾几次用全力取广东，但是经是胜而 他们的 等十余县，蒋现又利用李杨（李明瑞杨腾辉）两部开回广东 （能指挥李杨两部的）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桂系在广西的残部现 有徐景棠一部可以为之声援，但基础动摇很难 通之后，蒋冯两方都是积极备战，冯之布置现在似是退 军队集中陕甘宁夏，待机而动，最近有所谓韩复榘石友三在河南 中央，但一般人对此都很怀疑，都认为是冯之一种策略作用，使河南暂时变为一缓冲地，蒋之对冯原拟利用阎锡山从北进攻，方振武唐生智等从安徽向河南进攻，再用一部主力（刘峙部）从京汉北进，但是老阎并不积极接受老蒋命令而借劝冯一同出洋以息事为名似乎是消极抵抗，虽蒋抓唐生智何成浚等与阎会商但仍无结果，唐方等非蒋嫡系，若非于自己利害有关，决不会替蒋卖力，鄂西胡陶残部及张发奎部队均不是反冯的，所以冯虽早已有所谓褫职查办通缉，但是讨伐令则迟迟未下，另一方面冯系桂改组派正在企图联合冯桂张发奎唐生智朱培德俞作柏等以及其他一切反蒋势力，形成[统]一反蒋的战线，在政治上以拥汪护党为口号，这样酝酿，虽还很散漫，未能完成真的倒蒋的力量，但在整个趋势看来，都极利来扩张个人地盘和势力，和南京政府新标榜的统一裁兵等背道而驰，所

以蒋已入一很困难的境地，因此蒋更不能不谋一切办法以对付冯玉祥，最近开全中会议，讨冯空气非常浓厚，调兵遣将大有一触则发之势，关外的张王，近亦跃跃欲试想乘[趁]火打劫，近已在会议及调兵遣将拟乘机入关。

以上是一般政治军事的大抵情形，以下系对你们的指示。

一、目前你们的任务是用游击战争方法发动群众斗争，每到一区域，有地方党部的地方则帮助地方党部，没有地方党部的地方设法秘密建立党的基础，肃清反动势力，深入土地革命，发部我们的土地政纲，扩大我们的政治宣传。

二、我们的革命力量应建筑在群众力量上面，军事势力只是帮助群众力量发展的，军事工作过长久的同志，每每有意或无意的把军事势力看作革命的中心力量而以为一切其他的群众力量虽是帮助军事势力发展，军事势力离开时，群众工作即没有了，这是一错误观念，随时应

三、你们目前地方长久的巩固的政权，割据某一区域而死守之，因为死第一是给养受敌人的封锁及包围，豪绅地主肃清以后，要征发给养势必与农民及小商人的利益冲突，所以一个地方群众已经起来秘密组织的基础已建立，一切工作即可交与地方党部秘密地进行，你们即可向外发展，比如你们在鹤峰已不能保守即放弃向别一方面发展，这是对的。

四、你们每到一地除一般的工作外，应特别注意帮助群众建立党的秘密组织，这些组织均应保存秘密，固然为扩大宣传及使群众认识不能不有部分的公开，但是秘密基础无论如何应当保存，不然你们一去，这些组织将随之而倒台，这样游击是没有结果的。

五、关于分散与集中问题，中央上次要你们将部队分散，这并不是机械的，不过我们游击队的原则，应该是随时可以分散，随时又可能集中，指挥自如，才能以少数部队应付强大的敌人，你们的客观条件既不许你们分散，自然亦不必分散，在目前这个环境中，是应集中力量，以应付敌人。

六、游击战争的战术，你们应从每一欢战争中吸取经验，以作以后战争的指南，同时应收集材料随时报告中央，以便输送其他游击部队，以好取法，据朱毛几年战争所得战术的经验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追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一区域以作一时根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期很好的方法发展群众”，据他们说，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这些经验很可以作你们的参考。

七、现在革命既是日益开展，你们的责任亦将随之加重，你们的部队应设法整理及扩充，加强政治及军事的训练，使将来能造一部分比较有组织有训练的革命武装力量。

八、现在南京政府讨冯令虽然尚未发表，但是蒋冯火并是终不能避免的，在他们的斗争中，你们们冲突地，这一环境很可以与你们一发展的机会，你们应准备你们的工作。

九、对土匪及（神兵）脱离生产的无产阶级的成份，是带着危险性的他们此时都是被反动统治阶级压迫的。神兵是农民在军阀苛捐杂税压迫之下而发生的一种反抗组织，这一组织在客观上是带有革命性的群众组织，不过他有两个主要的缺点，一是常常在豪绅中小地主领导之下是迷信，我们对他的策略是打入进

去领导他们作反军阀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努力作土地革命的宣传，领导这些群众反对这些豪绅地主的领袖，领导群众转到革命方面来，深入土地革命的工作，绝不应对神兵群众采取关门的政策。自然在某一情形之下，对于这类的武装，亦可设法利用他们或收编他们好的群众，但这不是主要的路线。

十、云卿冬生同志既事实上不能脱离部队，现在都可不必来上海了，刊物通告以后当尽量由鄂西转交你们。……

十一、……（通信方法从略）

中央

注释

一 均缺字十个左右。

湖北省委致鄂西特委信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 (1) 目前政治形势与鄂西党的总任务
- (2) 建立城市工作与职工运动
- (3) 组织地方暴动
- (4) 兵士运动
- (5) 红军的扩大集中与进攻
- (6) 苏维埃区域的任務
- (7) 土地问题
- (8) 加紧反帝反军阀战争反改组派
- (9) 加紧反对取消派与肃清取消思想
- (10) 青年运动与CY工作
- (11) 妇女运动
- (12) 强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建立支部生活

鄂西特委：全省代表大会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已经完成省委会给鄂西工作委员会（有易穷得畅同志参加）本着大会路线对鄂西工作有一个新的讨论和布置除指定易穷同志向你们见意外，兹连以前讨论及目前形势和工作复有以下的主要指示：

一、目前政治形势与鄂西党的总任务

现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猛烈发展这两种恰恰相反的事实使世界资本主义战争第三时期的一切根本矛盾急剧尖锐化世界大战尤其反苏联战争日益紧迫同时世界革命有剧烈的发展而日益接近革命高潮中国是世界是各种矛盾荟萃的一个焦点在这种国际局面中国革命运动是日益接近直接革命形势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告诉我们在新的革命高潮中革命在一省或数省有首先胜利的或能代表大会给与湖北党总的任务就是争取革命首先在湖北胜利。

鄂西是湖北主要的一部分它在争取全省暴动的胜利上占着重要的地位现在鄂西的反动统治日趋奔贵[崩溃]革命势力不断的壮大鄂西特委辖区中的各县几无一县没有农民斗争许多县分全部在苏维埃政府手中红军的发展与威力日益激增他已成为争取全省革命暴动胜利主要的一翼。

代表大会以来全国与湖北革命斗争又有了显著的进展在全国说自从上海电车公共汽车同盟罢工之后全国重要城市（如上海青岛天津香港厦门武汉等等）工人斗争的内容更加表现得尖锐化各地红军斗争和农民暴动都有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在江西湘东一带）兵变与兵士暴动的潮流日益扩大这些情形证明大会估量的非常正确革命发展是更加迫近高潮整个形势——尤其是在江西湖南（浏阳又被红军占领）的发展是非常便利于湖北争取一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尤其是湖北各种革命势力表现有更迅速的发展在代表大会后的一个半月湖北工农红军斗争都有新的进展红军与农民斗争的扩大表现更为明显代表大会后鄂东黄梅广济掀动了广大农民斗争广济已有全县一半的红色产生并集中了三百以上的武装在党的领导之下编成了红军现在第五军与第八军已经会合于六月十二日占领了大冶县城现正进取黄石港（日本水兵得国民党许可已登陆）以现在的形势（五八军合计近六千枪）鄂东区域的地方暴动有于最短期内完成的可能。

鄂东北的第一军现在确能采取向交通要道及武汉发展的路线最近在孝感黄陂游击两次阻断了京汉路（占领王家店破坏铁路及电线）引起统治阶级极大恐慌据东北同志报告马上可以集中的武装有五千以上在这次进攻行动中掀动东北更广泛的东民斗争土地革命斗争也在日益深入只要党能继续运用正确路线这一区域也很快可以完成地方暴动此外就是在全省配合上比较落后的鄂北鄂南（都是因党在策略上错误和不能坚决发动斗争的结果）现在也都有了游击战争（鄂北党能领导的武装在三百以上）。

至于鄂西在这两个月内也同样是有迅速发展六军在沔阳汉川近逼武汉游击以及最近占领郝穴沔阳确实引起敌人严重恐慌尤其是在二六军已取得联系之后必然造成鄂西更大的发展。

武汉及两条铁路工作最近也有相当进步武汉经过红色五月工作党的政治影响扩大在目前白色恐怖镇压之下（工作要重新找保或五人连环保等等）不独没有停止并且益增斗争的决心武汉工人斗争确有一触即发暴发斗争高潮的形势。

省委详细写出以上情形更是要使你们了解革命的发展是日益接近高潮的形势使你们在工作上有更进一步的布置庶能有配合的加紧准备全省暴动的斗争。

目前军阀战争日益扩大延长了自从张佳运由桂入湘进占长沙后引起武汉动摇使蒋系军阀处于非常不利的形势如果京汉及武长路再有失败势必退出武汉因此湖北现在成了军阀战争的中心经济上政治上的恐慌更加扩大统治阶级更为动摇对民众的压迫与剥削也愈益加厉同时表现统治阶级因忙于战争没有充分力量来镇压红军与农民暴动（将来革命高潮到来他们必会一致向我们进攻）这更便利于红军及农民斗争的发展在军阀战争愈扩大统治阶级更动摇时武汉三镇工人有暴发扩大斗争冲破白色恐怖形成革命高潮的形势这形势的到来与各地红军及农民斗争配合即成为实现全省总暴动的时机省委在一切工作布置上就是力争这一形势的到来因此湖北的党是日益迫近直接组织全省暴动的时期了（详见省委第六号通告）。

鄂西的党应组织目前形势的严重意义应根据这一形势来与各地配合起来加紧布置自己的工作。

第一、在全省配合上鄂西党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与红军配合起来迅速完成鄂西区域的地方暴动加紧向武汉发展准备在武汉斗争高潮到来时汇合全省革命势力来完成总暴动的任务。

第二、鄂西区地方暴动以沙市为中心沙市的占领（不是袭击）即是鄂西暴动的完全也就是全省暴动的开始在目前准备占领沙市时必须加紧宜昌及沙市邻近县区地方暴动的完成在已成赤色区域的县区（如监利沔阳石首等）应即坚决领导群众占领县城以斩断反动统治的根基。

第三、红军及一切农民武装应准备在这一斗争中消灭这一区域的反动军队（如公秉藩彭启彪李云龙）的主力 and 地方反动武装（如荆州的民团）迅速向武汉推进。

第四、党应加紧全省总暴动的宣传肃清一切保守观念的残余号召广大群众准备夺取武汉庶在进攻武汉时不致因部份利益又“阻碍整个斗争的发展（我闪一定要知道在武汉暴动红军进攻武汉时有些赤色区域是不免受反动势力的摧残我们现在若不能使群众了解整个前途这将成为阻碍红军进攻的力量）争夺革命首先在湖北胜利鄂西是湖北主要的一部份它在争取全省革命暴动的胜

利上占着重要地位现在鄂西的反动统治日趋崩溃革命势力不断的壮大鄂西特委辖区中的各县几无一县没有农民的斗争许多县分全部在苏维埃手中红军的发展与威力日益激增他已成为争取全省革命暴动胜利主要的一翼。

在争取革命首先在湖北胜利的任务之下鄂西党的任务就组织罢工武装工人扩大无产阶级的领导组织地方暴动猛力的扩大红军组织兵变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反帝反军阀战争反国民党斗争在最短期间完成鄂西的地方暴动造成赤色的鄂西在革命高潮中动员成千成万的红军与全省全国革命势力汇合起来在武汉工人暴动的领导之下夺取全省政权争取全国革命暴动的胜利来推动世界革命高潮。

二、建立城市工作职工运动

鄂西党的主要弱点是职工运动与城市工作的缺乏尤其宜沙长江海员工会没有建立起来值得鄂西全体同志的注意全省大会关于城市工作政治罢工及职工运动的一般策略在鄂西都可运用这里要指出第一你们要取消党内不积极到城市去做工作的残余尤其目前严重任务之下坚决的动员全党建立城市工作尤其是沙市宜昌监利石首新提仙桃镇长沙海员划夫农村雇农工作第二城市工作以职工运动为第一位同时学生贫民群众亦须注意第三坚决的建立赤色工会领导工人斗争组织政治罢工尤其是海员码头工人车夫.....雇农工会须独立组织不能合手工业者混合若某处雇农人数过少一县可成立一个雇农工会各区各乡可成立分会为支部第四要注意产业工会的建立并要进行组织。

县总工会尤其是沙市宜昌应迅速成立总工会来公开号召领导斗争这是组织政治罢工与地方暴动上有十分重大意义的。

第五、你们须特别注意武装工作问题省委决定八一前鄂西须建立八百的工人纠察队沙市三百宜昌二百别的地方共三百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数量你们要超定此数才好。

第六、国民党工会在宜昌有广泛的活动我们不要因别的地方他们活动不力而忽视所以反对国民党工会消灭国民党工会在工会运动中尤其在宜昌要十分的加紧。

三、组织地方暴动

地方暴动是加紧组织全省武装暴动的主要战术现在鄂西各县都有了地方暴动的客观条件就等你们努力红军也曾打下过许多城市但到现在几乎全部城市尚在敌人手中这仍表现过去执行进攻策略的不坚决。

地方暴动的组织第一就是加紧农民的土地斗争普遍的发动游击战争第二加紧城市工作第三加紧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作第四普遍武装农民第五地方暴动发动起来要消灭敌人的最后统治消灭敌人的最后武力执行政纲建立政权分配土地大批的扩大红军扩大暴动范围。

四、士兵运动

士兵是中国革命主力之一组织兵变是党目前一个战术鄂西在反动武装组织中尚有广大的士兵群众他们因受军阀战祸与革命红军的影响日益革命化兵变及零星的拖枪到红军中不断的发生可是鄂西党对于士兵运动终是听其自然发展每天红军有枪的收入（士兵自动拖出）尚未引起你们严重的注意士兵运动现在更剧烈的残酷的决战到了面前兵变运动更为重要第一你们要唤起全党CY及工农红军注意士兵运动纠正尤其赤色区域漠视士兵运动的倾向第二扩大对士兵的政治宣传尤其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到反动军队中去吸引士兵哗变或暴动投入红军不要被狭隘的组织观念所限制（如某部无组织）而不能作兵

变运动第三在反动军队中民团中发展党的支部组织兵士委员会领导士兵斗争进而发动兵变打入士兵中去方法之一便是选派一部份（有计划的）同志即工农红军中的兵士到反动军队中去作兵变运动在打入之前自开士兵运动训练班秘密的告诉兵变的意

义与方法在八月底以前鄂西各县应派 550 人这项工作要作到需要与不愿到白色军队中去的恶习奋斗第四目前的士兵运动即是组织兵变与暴动士兵工作一开始即计划士兵暴动只要条件成熟就要坚决的发动不要错过时机新一师兵变的经验极值得运用第五设法开始帝国主义军队中的工作此项工作在夺取宜沙夺取武汉的斗争中占着十分主要的地位第六鄂西土匪很多对于土匪工作亦要注意土匪工作的根本路线是夺取群众消灭其领袖与组织体系。

五、红军的扩大与集中进攻

扩大经军的策略你们确在执行的过程中但仍不够在加紧全省的革命暴动当前红军的扩大必须猛烈的进行坚决执行集中进攻的策略以后红军直接归中央军委指挥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对二六两军尚有单独的指示，我们只指出鄂西党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鄂西红军以六军为中心在八一前必须发展至三万人鄂西现在有六十万赤色群众二十万赤卫五万少年先锋队的基础发展三万红军的数目是很少的。第二红军的扩大不是招兵买马的办法就是斗争的扩大普遍的发动游击战争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目前即须集中赤卫队游击队少年先锋队的人枪编成红军和一切不愿意扩大红军的保守观念地方主义.....的倾向奋斗。第三这个侵略非简单的通知命令可以办到必须从政治上动员群众的工作我们要在群众中广泛的宣传扩大红军的意义经过苏维埃工会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红军的各种会议将“到军中去”“扩大红军”“拥护红军”的口号深入广大群众心坎引导群众自觉自动的加入红军扩大红军为了工作的具体化你们可以举行一个红军扩大运动周第四在现在的政局下红军的需要集中统一的指挥组织与行动因此红军的指挥以后全归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但 x x x 减少鄂西党扩大红军的任务且要加紧你们和六军党部的关系必要时可用联席会议第五鄂西当前任务是坚决采取集中进攻的策略总的目标是向武汉发展在这发展过程中要进攻重要城市尤其沿长江各城市与工农工人斗争联系起来占领沙市完成地方暴动向南打通和五八两军取联络向北和九军进攻武汉。

六、苏维埃区域的任务

鄂西十余县都有了苏维埃区域这就是指示出苏维埃区域扩大是构成中国革命高涨的支流这些苏维埃区域目前主要的危险仍是保守观念和不坚决解决土地问题的富农路线目前政局下苏维埃区域便是要大踏步扩大特别注意城市与白色区域的工作坚决的执行地方暴动的策略夺取城市扩大苏维埃范围第二所有苏维埃区域内一律坚决的分配土地不露遍刻迟延第三努力扩充红军工作苏维埃政府要号召成千成万的群众参加红军供给红军给养看护红军伤兵.....第四苏维埃在党领导之下一定要群众选举出来充实工作内容肃清党包办的和官僚化的恶习第五在苏维埃区域不但肃清富农路线同时要肃清一切革命组织中富农的领导成分加紧雇农工会工作第六鄂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要加紧增高它在群众中的威信使之成为鄂西暴动的公开机关。

七、土地问题

江监石等县因已开始分配土地但鄂西全党内对土地革命的执行仍有很多的动摇与迟延这是决不能允许的特委首先要注意的不仅苏维埃区域要刻不容

缓的解决土地问题要普遍的深入土地斗争游击战争发动起来即要执行土地革命政纲不能有什么等待第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不但没有例外（孤寡革命家属）且会走到平分土地全省代表大会告诉我们党对于平分土地要坚决的领导第三土地国有（土地归苏维埃）现在不仅要宣传且要在苏维埃区域坚决执行土地分配后由苏维埃发土地使用卷禁止买卖第四分配的具体方法由乡苏维埃处理区县鄂西苏维埃负领导的责任第五土地不论怎样分配是不能真正平等的党要有系统的告诉群众要得到真正平等只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六孤寡红军家属只要他们家属有生产能力可以分给土地如无生产能力苏维埃可以设法救济。

八、加紧反帝反军阀战争反改组派

不但夺取武汉即夺取沙市就要遇着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你们要严重的注意反帝运动第一要抓住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进攻苏联的一切事实发动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拥护苏联的群众运动组织政治示威快要到来的六二三及八一要坚决的组织政治示威武装示威第二马上建立反帝大同盟的组织尤其是宜昌沙市一带第三将反帝斗争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纠正同志中认为农村无帝国主义可反的错误倾向。第四特别加紧海员划夫帝国主义驻沙市海军中的工作目前党最中心的政治任务便是动员群众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第一要党在这一口号之下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士兵暴动扩大红军第二将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口号通俗化和实际事实联系起来在群众中作系统的宣传改组派在鄂西的活动不可忽视他们甚至于混到红军中来在苏维埃区域红军中除要坚决以严厉处治外还需要肃清政治方面的一切残余影响尤其是宜昌因为乡里不但以发癸留有相当影响他们还有许多黄色组织与欺骗活动。

九、加紧反对取消派与肃清取消思想

取消派在鄂西组织的活动不大显著但党内有右倾即取消派的客观基础所以党内对于取消派的斗争须严重的注意第一取消派已被党开除出去

已变成党外的斗争在群众中要公开的提出反对取消派的口号和反对改组派第三党一样第二要在实际斗争中抓住很紧的暴露取消派破坏革命帮助国民党的罪恶第三须特别注意党内的一切右倾倾向否忽视反右倾的斗争事实上就是帮助了取消派。

十、青年运动与CY

一般的说来鄂西青年运动较有成绩五万少年先锋队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积极伟大的作用但因党与CY指导机关对CY工作认识不清楚不但影响到党团关系的不正确且影响到许多地方少年先锋队和农协对立这一方面表现CY先锋主义的倾向一方面就表现党对CY领导工作的薄弱就是说党没有严重的注意到青年运动要你们坚决改正第一党要认青年工作是主要工作之一CY是党争取青年群众的武器党对CY工作必须经常的加以考核和指导仅仅一般的指导是不够的第二CY特委在是须要的不承认置之不理特委工作不好若一个不得在党要指导和纠正第三少年先锋队必须在农协（苏维埃区域）指挥之下在作战时受红军的调遣在扩大红军的策略下你们必须征调大批的少年先锋队加入红军关于少年先锋队加入红军关于少年先锋队的年龄十四岁到十六。

十一、妇女运动

土地革命的浪潮中鄂西的妇女的确发动起来但党在妇女群众中缺乏系统的工作甚至于因一部份妇女的流氓化党认有考察妇女流氓化的原因与决定工作方针竟放任在“打倒流氓妇女”口号下让封建思想的残余重新来

压迫妇女特委应纠正此种帮助封建势力的恶倾向加强对妇女运动的领导第一在斗争中应领导劳动妇女参加在斗争中提出妇女特殊要求第二要纠正妇女的流氓化根本办法是领导妇女参加革命工作有了革命工作当

然便不流氓化第三你们要注意到城市的妇女运动尤其是沙市第四农村妇女并不要独立如妇协一类的组织而是各种组织领导妇女参加。

十二、强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建立支部生活

在代表大会后省委重新划分特委管辖区域并且决定在鄂西施鹤七县及湘西桑植大庸慈利等县另组特委归湖北省委指导在重新划分后鄂西特

委应管辖县分是江陵监利石首公安沔潜江天门应城京山荆门当阳远安宜昌归兴巴松枝宜长阳及湘边之华安等县但在湘鄂边特委成立之前施鹤县仍须继续旧的关系。

这一区域党的工作虽然都有发展与进步，但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异党脆弱同时支部生活一点也不健全如若不能坚决补救这些缺点将成为执行上级任务的极大阻力因此省委特别提出引起你们的注意必须努力在斗争中去补救第一须注意吸引城市工人乡村雇农成分入党以强健无产阶级的基础第二实行斗争中排除动摇和富农的成分以肃清组织上的右倾基础第三在赤色区域实行发展组织除雇农外应有较严的限制第四建立支部生活须养成支部在党的路线下独立工作的能力强固干事会组织（但须取消干事甚至支书都须生活费的方式）第五注意健全地方党部（县区委）的组织与工作须坚决提拔工人雇农干部参加指导机关代替动摇的旧干部第六须加强特委对于各级党部的政治指导。

省委决定你们在七月初六召集鄂西代表大会在鄂大会路线下讨论鄂西工作望努力筹备但在代替会以前特委必须将鄂代表大会精神传达下去引起各县区委及支部书记合同目前工作详细讨论关于鄂西最近情形望作一详细报告来（前云有详细报告寄来但省委并未收到）以便省委有进一步的指示。

湖北省委

六月二十七日

万涛给中央的报告

——各县政治经济、组织情形，敌人清乡及特委组织问题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中央：

我自宜昌寄一报告后，即到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各县巡视，因为各县组织的重心都在乡村，所以没有作报告的机会（没有邮局），同时

因清乡的阻碍，以致在这些县久延时日。今天方由枪林弹雨的恐怖中回到沙市，但因杂事太多，明天又有许多问题要去解决，所以只能简单报告，拟于后日到松枝宜返宜昌即来沪向中央作详细报告。

江、石、监、沔几县的工作情形大致相同，都是在武装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最近因目标过大，使豪绅非常恐怖，现各县一致清乡，各县都受了极严重的打击，以江陵损失为最利害。

1. 各县的政治经济状况：

各县的政治完全是豪绅地主的势力，农村的武装斗争，便是与民团敌对，即此次大举清乡，也是国民党担任烧杀，军队不过为之助声势而

已。因此各地群众都只痛恨清乡狗子，不恨大队（群众叫国民党为清乡狗子，叫军队为大队），群众的斗争情绪，虽在极端压迫下面，还是非常高涨，所以各县都造成了一部分的割据。现在江陵驻军为四师，石首、监利为五十师，沔阳为彭启彪旅，近四、五十两师分调各县，由彭旅驻防，因彭系鄂省第三绥靖区，五任，此后鄂西驻军减少，压迫或可减轻，不过民团势力日益澎湃，江、监、两县民团在一千以上，以监利为×战斗力，石首×在只一百以上，沔阳被[×]军缴械，不知内幕究竟怎样？

江、石、监、沔各县都是自耕农占绝大多数，在各县割据的区域，凡分不出地主佃农，土地问题无从解决。祠田虽不少，但宗族的势力一时不能消灭，祠田也不能违反群众的意识去没收。割据的区域内一切税收都没有了，这确是统治阶级一个大的打击，如石首、监利，因一大部份被我们割据了，不能不把全县的负担都加增到现未割据的地方的民众身上去，民众的负担较前加重四倍，于是反苛杂的斗争，便自发的开始，监、石两县的统治却是非常动摇的。

2. 组织情形：

江陵——党员六百人，群众组织一万五千人；

石首——党员五百人，农协会员六千人；

监利——党员三百五十人，会员二万五千人；

沔阳——党员（？）二百五十人，会员五千人；

各县的组织差不多完全是农民、工人，几乎难找出一个知识分子。现在沙市工作稍有起色。

组织上的弱点：

（一）一般党员都公开了。

（二）党与农协的关系不正确，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包办了群众的组织。

（三）以武力为发动群众的唯一途径。

（四）党在群众中成了特殊阶级，其他一般的错误都有的。

红军已成立了六个纵队，计长枪、步枪各四百以上，手机关十一支，水机关一挺，但武装同志都脱离了生产。最大的缺点：

(1) 不能分散游击，集中指导的原则。

(2) 保守，不向外扩大。

3. 最近清乡的情形：

江陵、石首、监利同时举行清乡，沔阳尚未开始。他们主要的政策是：

(1) 无情烧杀；

(2) 引诱农民反水。最严重的就是反水问题，现江陵割据的地方几乎完全反水，监利也反了一部份，不过现在制止住了；石首情形最近不知，但反水的主动者，多是从前的户长，富农。广大的群众是因怕烧屋而不得不附和它们，反水后即缴很重的枪款及一切捐款，所以一般群众还是想我们。我们对付的办法：

扩大宣传。

以武力或群众的力量杀反水的首领。

现在江陵已打得粉碎，一时很难恢复。监利三、四区坍台，一区去了一部份，二区未受打击，组织可以支持。

4. 沔阳的自首问题：

沔阳党去年组织完全在南区，清乡时全党自首（但大多数同志是找不着上级，自动开会决定假降，以图保存组织，仍与党通讯工作）。我前次来沪时，沔阳因受监利群众斗争的影响，自动恢复，经逸群同志承认了他们。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但自首的都不要，西区只有放弃，事实上又不能这样办，只好对他们全党作察看看待。他们县委对目前组织问题不大注意，专门想用武力学监利割据一块，我曾对他们的组织问题给他们的一详细的书面指示沔阳因工作的关系还是要属鄂西才好，中南巡视员也为这个问题到沔阳（我亦会着），他也没有办法解决。

5. 特委的组织问题：

最近各县的斗争都发动了，并且有很多割据区域，没有特委，实在没有方法指挥。近因我一人唱独脚戏，工作受的损失真不小，所以这个组织非要不可。详细理由逸群同志想已口头报告了。

事忙，环境又不便做技术工作，所以简单乱写了一个报告，以后再详述，完！

鄂西巡视员 万涛

七月初七

注释

原文年代为阴历一九二九年七月初七日。

原文如此。

鄂西李勋臣给周逸群的报告

——鄂西工作被破坏情况、原因及今后的方针*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易穹兄：

1. 江、公、石、监的工作，最近颇受打击。公、石、监未知确信，江陵的郝分[穴]龙溪已完全倒台，沙东郝正尚有小部分的存在。所有队伍完全解散，枪支密藏了，负责人多半失踪。

2. 江陵经济完全损失，现时困难已极，在[再]有被难同志，无法救济。

3. 万涛兄同世为兄都无音信。

4. 朱良辰兄同绍鼎兄依然回宜。现因松滋缺乏人，我已有信给他，叫他马上到该地土[上]工作。

5. 江陵CY负责人除玉奇染病在沙市外，早已逃跑一空。

6. 现在同我接头的——徐开之、陈兴万、刘寿贵、陈桂芳。现桂芳夫妇已介绍往松宜去了。

失败的大概原因——(1) 队伍同组织未能分开，深有地域观念，无游击的意识，无论本地若何险恶，还是只想在本地苟延残喘，至万不得已时，只有把枪械秘藏起。(2) 各县队伍不能集中，计划不统一，至于敌人一齐进攻，使我们遭无形解散。(3) 李化龙战亡，队伍无人领导，士兵胆却[怯]。(4) 红军村农民因受不起白色压迫，多半的叛变，所以内部同志一个都不能立足。

最近的应付：

1. 良臣兄到松枝宜，将下面的兵士同志组织游击队。

2. 下面枪枝尽量设法往上面拖。

3. 下面被迫的同志须经个别谈话，能找职业、很坚决吃苦者介绍到上各县分配工作。

希你接信后马上回来，不但下面须你回来整理，上面各县也发生许多问题，都是不能单纯解决的。不知你现在同中央接洽若何？特委组织是否存在？若还就万同志的指示，此时更难走通。至于宜沙最近政治情形，可问逸山兄便知详细。

李勋臣报告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周逸群给中央的信

——对中央《鄂西党政治任务及其工作决议案》的意见*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中央：

我看了中央对鄂西党政治任务及其工作决议案以后，有以下的意见补充：

一、鄂西党员的成份大部份是农民，所以地域观念特别浓厚，地方主义的确可以影响工作，其结果有分家的危险，这一错误观念在特委虽然已经指出，仍觉不够，请中央指出那些危险可能性，比较更有力量。

二、一般同志甚至负责的同志，一方面迷信武力，一方面又不能切实执行党员军事化的决议。质言之，就是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不从斗争中去锻炼群众，武装群众，只幻想特委由赤色区域调武装同志（他们说当地同志没有斗争经练[验]去帮他们打倒团防），或是希望贺龙早到。这些不正确的观念，应请中央严厉的纠正。

三、毁灭城市及无目的的烧杀政策，在同志中仍然有一部份保存着，他们最大的理由就是烧了市镇，以后不会再驻军队了，这点错误也要请求加入。

四、据目前形势，特委决不能兼江陵县委。

逸群

八月二十二日

注释

周逸群关于鄂西农村工作报告

——群众斗争、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及经济政策等问题*

(一九二九年八月)

一、群众斗争写实

鄂西在去年盲动主义的时代，党根本没有注意群众日常的斗争，以致农民自发的在封建的组织之下（神兵）的斗争，日有所闻，而且在鄂西上游各县，如施鹤七属、归兴巴等县，已有普遍发展的形式[势]。党均不能领导这些群众的斗争，党是站在群众以外，提出很多上级党部规定的农村斗争的口号，利用几个在农村中有地位的同志——所谓“先生”们去勇敢的号召群众。但是遇着没有经过斗争的群众，是不敢来参加斗争的，这时候为要执行上级党部的命令及表示自己不是机会主义起见，只好命令群众去干，命令不动，只好造谣欺骗群众去干，但是没有经过斗争的路线，始终不能勇敢的去干，这样惟有把最后的办法用出来。什么是最后的办法呢？就是几个负责同志代替群众去干。如一九二七年以三枝驳壳枪攻百余枝的新堤，并没有一个群众参加，其结果不惟送了三枝枪与敌人，而且牺牲了三个负责同志（内中有一个是CY省委的巡视员）。又如有群众参加的斗争，如去年瓦仓（属当阳县）的暴动，但是这些群众都不是由斗争中发展的，而是忽然之间在党的政治口号之下号召起来的，所以失败以后，群众有怨党的事实，他们说：“你们共党没有这样的本领就不要干这样大的事”。这可见以前鄂西农村中的暴动、骚动工作，大部份不是出于群众的要求。六次大会以后，开始纠正盲动主义的错误，各县组织逐渐恢复，但有些县份多走到平和发展的歧途。在去年阴历年关斗争，各县只有工作的计划而没有斗争经过的报告，足以证明。有些地方如监利、石首等县，待委指示他们的工作，叫他们发动群众斗争，他们便马上联想到军事行动，经过几次解释以后，在石首才有反对巡更（替土豪劣绅守夜）的斗争，并且也晓得首先要土劣发消[宵]夜费，不发消[宵]夜费，就以不巡更为抵制。但在今年春天，松滋、枝江、宜都三县联合的饥民斗争，群众斗争的情绪很高，而党不能领导群众由经济斗争走上政治斗争，而且故意的避免政治斗争。有一次被团防压迫，群众非常愤怒，徒手缴了四枝枪，结果反将缴来的枪退还，表示他们没有政治的臭味，这是松、枝、宜都县委非常大的错误，结果群众斗争的情绪低落而归于失败。宜都北乡群众反对印花税，党去领导他们，本想由小的斗争得到胜利后再来领导大的斗争，于是采用群众请愿的方式，但是乡村不比城市，印花局的征书员见群众去请愿以为是杀他们，竟至先逃跳（跑）了，于是就把请愿变为示威。群众方面又恐怕印花局请兵来，表示害怕的心理，这可说（是）初次斗争必经的阶段。至于赤色区域及赤色区域附近（如监利、石首、江陵、沔阳等县）的群众斗争，在现在看来有很多红军的组织，以为是完全由武装发动的，其实这些武装不是天上飞来，而是由群众斗争中生长出来的。起初发动的时候，自然一样不顾事实提出政治的要求，空喊许多不切实群众本身要求的口号，所以没有群众参加，甚至于怀疑我们，但是，因为桂系军阀和当地土劣蠢笨，完全不和我们争群众，只一味用清乡的办法来区域的党部差不多不容易推动工作，只有组织的形式，而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说不上什么支部生活，因此干部亦非常缺乏，经过斗争的区域，党确实能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支部能够应付该区域的政治环境，最明显的是能担任肃清该区域的反动派。比较强

健的支部，同志至少有四五十人以上，都按期开会，开会虽然不免听报告的形式。因为环境的关系，发展群众组织问题常列在支部议程的第一位。支部的组织，是由五人组织支部委员会，委员的分工是书记、组织、宣传各一人，军事兼青运一人，妇运兼济难一人。放哨、侦探是每个赤色区域的支部的经常工作，就是宣传工作也常列在支部会议的议程中。但是对于缴纳党费一层，多未履行，这是支部生活的最大缺点。

鄂西各地方党部，很少有帮助支部加强支部工作，不知由支部日常工作训练同志，所以一役同志政治水平线太低。农民同志的观念多不正确，最明显的就是狭隘性的地方主义、报复主义等思想，最足以防[妨]碍工作。

在游击战争已发动的区域，好象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样子，不惟群众革命化，而且以前认为没作用的同志，到那时也能按时开会，工作也积极起来了。在这些区域若不注意质量去发展同志，很容易做成滥收党员的错误（听说平江有七万党员）。鄂西农村组织要以监利比较有力量，割据有两年的历史，经过反动军队长期的清乡没有坍台，而且沔阳全县党员的自首有半年之久不能影响到监利的组织。推原其故，自然有许多客观的条件，如监利土劣只知剥削民众、烧杀民众、而不知运用改良主义。又如洪湖地势之好可以实行“跑兵”政策，而主要原因还是组织有力量，监利党员都是经过支部通过及地方党部的批准发展的，所以监利党到现有尚只有四百人之谱，数量虽不多而质量要比较他县好得多。今年监、沔两县合办的训练班，据我的观察，沔阳同志比较监利同志政治水平线更低，就可以知道沔阳党犯了滥收党员的错误。

四、游击战争经过

1. 鄂西的游击战争，经过去年桂系军阀的严重压迫，公安、石首、当阳等县的军事组织完全瓦解，惟有监利尚保存着一部份的武装，虽然有个时期亦曾将队伍解散了，枪枝埋藏了，但不久又存主[组织]队伍与敌人奋斗。

2. 鄂西的游击队是由特务性质生长的，不如朱毛、彭德怀等先有一部份军队做基础。兵士的成份完全是农民的自愿军，干部多半是由实际工作中训练出来的，所以颇能接近群众。但是到今年以来，士兵渐渐脱离生产而变为军队生活。

3. 鄂西游击战争到今年蒋桂冲突时，得了一个发展的机会，武器虽然增加不少，但是游击的区域只江陵、石首、监利、华容、沔阳五县。因为公安、松滋的游击战争还未发动，故在军事上没有与贺龙同志所部的红军切取联络。

4. 鄂西游击队的区域，没有高山掩护，而且交通便利，敌军调遣进攻非常容易，若无群众掩护则非常危险。当我们初发动的时候，实在没有好多把握，以为武装发展多了，目标必大，易被敌人包围。其实只要有好的群众组织，武装虽多，敌人在军事上亦不易包围。最怕是内部的奸细，所以对于肃清赤色区域的反动份子，在军事上亦非常必要。

5. 今年鄂西游击战争发动，正值蒋桂军事冲突，故游击对象为团防。五个月以来与团防作战大小数十次，从未打过败战，只有一次进攻藕池，因侦探工作做得不好，被谭道源师包围，结果受了打击，但不久谭道源又被我们缴了一连的枪，士气大振。

6. 鄂西游击战争一开始便采取分散游击、集中指导的原则。数月以来只有一次集中于江陵，但不久又分散以减少目标。各中队分散于各县后，县委

负责人得参加军事会议，而县委会议军事负责人亦得参加，但同时须报告大队部及总部，并随时听大队部及总队部之调遣。

7. 每次作战之后，照例应开批评会，其方式先由负担任务之官长报告经过，再互相批评，最后由一人做结论，此法颇能增进官兵作战的技术。

8. 鄂西游击队每中队（约一连）有巡查队的组织，队员三人，每日更换，由士兵轮流充当，无论官兵犯了纪律，巡查队得干设[涉]之，并于必要时送回队部处罚，此法能维持军纪于无形之中。

9. 鄂西游击队队员多属农民，帮农民意识颇浓厚，过去地方主义无目的烧杀政策很难纠正。比如在监利有一次将团总杀了，连他骑的马也要枪毙，用的箱子也要破坏。但在负责人方面，对此问题颇为注意，大市场如监利的毛家口，江陵之普济观，石首之调弦及县城，游击队到了之后，只杀反动派及捣毁其房子，绝对不准无目的的烧杀，而且红军的纪律秩序非常之好，差不多如“王者之师”。这样一来，群众恐怖我们的心理渐次打破，渐次与我们接近而接受我们的宣传。从前敌人最得意的宣传是说我们杀人放火，现在由事实证明，“清乡狗子”才是真正杀人放火的匪军。广大群众对我们有相当认识，政治影响非常之好。至于地方主义在同志的口头上都说不好，都说有妨碍游击战争，但在行动上则充分表现。有一次进攻沔阳的峰口，中途因为时间关系，由大队长召集军官会议变更计划，于是沔阳的士兵大起反对，大骂大队长怕死，并且说他不是沔阳人所以忽视沔阳的工作。此事经过很多次的解释，幸而没有分裂。其他如枪支的分配，工作的分配在有意无意中表现很多的地主主义。

10. 鄂西的游击队，现在可说是不大不小，将由游击队进步到红军的时期，若遇敌人内部发生冲突，红军的发展是有可能的。不过在目前军阀战争停顿，军阀帮助民团清乡的时候，游击战争要想怎样的发展是少有可能的。此时自应采保存实力的原则，避免与敌人正面的冲突，埋伏在群众之中，看清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袭击敌人的后方，使敌人疲于奔命，士兵发生动摇，甚至引起兵变。如谭道源部在监利汪家桥之哗变，杀其官长逃到潜江为匪，是其一例。不过在原则上是这样而运用起来颇不容易。

11. 目前鄂西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一方面游击队的武装日益发展，而另一方面团防枪枝亦日见扩充，但这只是更加重民众的负担，必能激起民众反对，所以这种现象根本埋伏极大的矛盾，是有利于游击战争之发展。

12. 游击战争在原则上是越游击得宽越好，越能发动广大群众，游击队也才能扩大。但运用起来，不必这样机械，主要的还是将各地方的农村斗争发展为游击战争，只能尽可能帮助邻县发动游击战争，决不可专以游击队去代替邻县的群众斗争，而且在事实上假如以游击队去发动邻县的斗争，没有经过斗争的群众也不会怎样欢迎，群众将要怀疑我们害了他们，结果必然要演成群众与游击队隔离，甚至失败以后群众还要怨恨。但这决不是说游击队要死守一个地方，假如死守一个地方，除了地势很好之外，必然要被敌人消灭。如鄂中游击战争死守沔阳，结果归于失败，这是我们不可忘记的教训。

13. 游击战争已经发动了，便应在群众中公开起来，农民协会便要在群众中起作用，领导广大群众实现农村中斗争的口号，决不可“取巧”、“怕红”无故的秘密起来。今年宜昌北乡收缴民团枪枝，事实上是由同志领导群众去干的，但又恐怕失败不敢公开，结果使群众莫明其妙，不知是土匪干的抑或是共产党干的，更不知道这样的干与群众有什么关系。因此宜昌农村中的游

击战争，事实上已发动了，但是群众的组织没有扩大，同志中反增加不少的恐怖心理。

14. 鄂西游击队在事实上、名义上都是受党的指挥，因为没有几县联合的政权机关，只好用特委的名义来指挥。现在，应当建立几县联合的政权机关来指挥游击战争，必须如此，才能打破农民的地方主义。

15. 游击队官长的生活是平等，军需处的帐目是公开的，士兵委员会得推出工表审查军需处的帐目。士兵的伙食由士兵推出代表负责，特务长只负领款发款之责。

五、土地革命与政权

鄂西对于土地革命，到现在还没有切实做到，并不是环境不许可，而是主观上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赤色区域内，过去完全是党代替群众组织，所谓“党权高于一切”，国共合作时代遗留下的思想很普遍。今年以来，党虽然逐渐纠正这种思想，但是做群众工作的同志，事事依赖党，没有建立他的独立工作，农民协会不过是政权机关的形式，表面上是由农协来解决，实际上还是由党来决定交送农协去执行，甚至群众大会多是由党来包办。因此土地问题从没有经过群众代表会议详细的讨论，只是在党内讨论，所以没有具体的办法。有些同志以为土地革命就是“耕者有其田”，于是认为赤色区域土地革命已经实现了，因为赤色区域内实行抗租已经办到了。在地主方面也只是想有一天把共产党肃清了，一切都不成问题，从没有与农民争土地的事实发生。因此土地问题在鄂西一般同志的心目中，好象不成问题，其实是非常大的危机。群众方面虽得到抗租的实利，没有经过农民协会没收及发给土地使用证的手续，充其量不过说这是侥幸之幸，叨共产党的恩惠而已。

六、赤色区域的经济政策

事实告诉我们，海陆丰苏维埃区域食盐堆积如山，萍浏苏维埃区域又没有盐吃，由这些地方就可以知道敌人对于我们，除以军队包围外，并用经济封锁政策。鄂西初发动游击战争的时候，远近商家都纷纷迁移到大城市去了，当时我们就感觉到若长此下去，敌人用经济来封锁我们，商品的方面固然不容易断绝，如像萍浏那样没有盐吃（因为鄂西赤色区域位于长江及襄河之间，而小河道很多，四通八达交通不易断绝），但是假使商人都裹足不前，农村出产如何能销运出来，那末江、石、监、沔的棉花，将要比海陆丰的食盐更高，这样农民将不拥护甚至反对苏维埃。的确在那时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又不能因为这个问题，便停止我们的游击战争，所谓“骑虎不能下背”，只好往前干，或许干下去有出路亦未可知。但是不久由实际经验中也就发现了解的途径，自然这与整个的策略有关系。今年发动游击战争，一开始便下很大的决心纠正过去盲动主义的错误，一般小商人见我们的态度变了，才敢与我们接近。记得有一次，汪家桥的商人见我们既不筹饷又不没收他的钱，反而不安的举出代表来会我，愿乐捐五百元以作军饷，并说出很多为难的话，恐怕我嫌少了，但结果还是被我们拒绝了，并很诚恳的向他们解释，共产党只没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只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财产，对于小商人只要不反动，不惟不摧残而且决对的保护，又举出苏俄现在对于小商人也是保护，以作证例。小商人经过这次谈话之后，表示非常满意，对我们的认识自然与以前不同了，而且替我们宣传各处有关系的商人。须知他们的宣传比我们自己去宣传有效得多，于是附近各地的商人都不怕我们，不仅政治影响扩大，而且农村的经济不易被敌人封锁。此外我们又对往来的货

船，只要有人保证他不是反动派，便准通过，因此农村经济得以流通。但是，以前小商人对农民过分的剥削，如“买×货”“高利贷”等办法，是绝对禁止。到现在我们仔细思率[索]，过去各地苏维埃之遭经济封锁，或许不是敌人故意封锁，而是我们受农民意识的反映，过分的摧残由城市来的小商人，这样自然使商人裹足不前，农村经济不能活动。正所谓“作茧自缚”的政策。

七、农村工作与城市工作联系的实际要求与运用

盲动主义的时代。因为城市中没有盲动的基础，一切忠勇的同志都到农村中去做杀人放火的工作，无形中不要城市工作，鄂西除了宜昌、沙市之外，其他城市几乎完全没有工作，去年六次大会以后，中央纠正过去的错误，加紧城市工作，但在盲动利害的地方党部，城市工作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城市工作，就是农村工作怎样好，在工作上也要受很大的损失。比如石首攻下县城之后，明知有许多土劣及反动派在城里，但是因为城市中没有组织，又因时间的关系不能护[挨]户搜查，结果只杀了几个贪官污吏，本地的土劣一个也没有捉着。又如石首县城警备队之哗变，我们不能领导，这些事实真使我们举不胜举。但是现在又有一部份的同志，无意中表现放弃农村中的工作，比如宜昌北乡虽有很好的基础，而党不去好好的领导他们的斗争，结果造成极庸俗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不用名文去收缴民团枪枝，使群众莫名其妙）。总之，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要能互相呼应，假如宜昌县农村工作有了进展，必然可以帮助宜昌的城市工作；又如石首、监利的城市工作有相当的基础，石、监的农民运动必更进步。因为指导机关不善于运用，虽有很好的原则亦不能实现，结果城市与农村的工作不能得到配合的发展。

八、农村党的秘密工作

农村党不是完全没有秘密工作，在非赤色区域假使没有秘密工作，便要影响组织，不过农村的社会非常简单，不容易做秘密工作，他们往来的人，彼此都知道，外面去一个人声音不合，便很引人注意，常时因一个同志的关系，影响到一村或一姓的群众，这是农民喜作过甚之辞的原故。至于赤色区域比较公开，但也只限于负责人，至于说党员群众，连我们自己也不容易分出谁是党员谁是会员。清乡军捉去的农民大部不是党员，但他们总是把作共产党员杀了。要使农村党的秘密工作建立起来，唯一方法是使群众组织公开，同时绝对纠正过去以党代替群众的错误，至文件的保存及开会的机会，则农村党比城市党要便利多了。

九、农村中的妇运及青运

从前农村工作对于妇运及青运非常忽视，许多地方已成遍地开花的形势，可是农妇没有组织。团的工作，也只有光杆的团员而没有团的群众，如少年队、童子团的组织，这是农村党极大的损失。今年游击战争发动，鄂西才开始加紧妇运及青运的工作，时间虽然不久，而成绩很有可观。统计加入农协的妇女，江陵有一千余人，监利，石首各五六百人。加入党的，三县合计虽只有二十余人，但前途的发展未可限量。童子团及少年先锋队，各县赤色区域均有组织。

在非赤色区域，据我的经验，妇运更为重要、假使农村中的妇运有成绩，虽在白色严重压迫之下，亦可以保存组织。过去在农村中工作，吃饭、睡觉所以发生问题，就是由于农妇没有参加革命，他们不但不能掩护我们，而且足以妨碍工作。

十、结论

鄂西农村工作是由盲动而坍台，去年秋收斗争，所以没有什么工作表现。六次大会以后才得着正确的指示，各县组织逐渐恢复，今年因军阀混战，江、石、监、沔发动了游击战争，松、枝、宜发动了饥民斗争，群众组织有突飞的发展。但是整个的鄂西说来，还是没有平衡的发展，尤其城市工作落后，得不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是最大的危机。今后应根据中央的指示及过去工作的经验，以谋普遍的发展，树立党的基础，促进革命高潮很快的到来。

巡视员周易穷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根据中央《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及其工作决议案》一文的年代确定的。

原件缺第二页，故缺序号二、三。

即周逸群。

鄂西巡视员万涛给中央的报告

——政治经济及各县工作情形，巡视工作教训及经验，鄂西工作的缺点 (一九二九年九月四日)

中央：

我此次到鄂西巡视，本来是预定两月内就回来的，但因各县先后清乡，交通阻滞，一直延缓到今，而且还有好多地方未能前去。不过重要的各县均曾亲自到过，就是未到的各县，也找当地负责人详细谈过话，对他们的情形差不多也完全知道，现在分别的逐一报告于下：一、鄂西最近政治经济情形

1. 豪绅地主阶级没有因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发展而受着打击湖北政权自桂系手中移于蒋系以后，形势上虽起一新的转变，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随着蒋系势力的发展而扩大到了湖北。但鄂西方面，豪绅地主阶级并没有因此而受着打击，根本上鄂西完全是豪绅地主阶级势力笼罩着的地方，一切地方政权都握在他们手里。在这军阀混战的局面之下，如所谓维持地方治安等任务，无论任何系别的军队往来，当然不暇一意顾计，所以掌握地方政权的豪绅地主阶级，确实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桂系治鄂时的主要政策是积极的帮助豪绅地主武装自卫，普遍建立保卫团来镇压群众的斗争。现在湖北政治舞台上的主人翁虽然更换了，但他们仍然是袭用这一贯的政策。最近三月内各县团防的武装均扩充到一倍以上，宜沙的军警联合稽查处改为警团联合稽查处，都足证明豪绅地主阶级的权力日形扩大。

2. 改良主义在鄂西还未见着好多具体的表现

改良主义目前还未见着积极的活动，各种黄色团体事实上尚未着手组织，对工农的小恩惠当然更谈不到。所见着的，如宜沙以及各地举行的军民联欢大会，不过是每一军队到防时照例的一套把戏。清乡当中农民虽有大队比清乡狗子好些的感觉（农民呼军队为大队，呼团防为清乡狗子）是军队对农民的烧杀不及团防残酷，并不是军队博得农民的同情。江陵、监利一部份农民被诱胁反水（当地谓反动了为反水）仍是自首政策的故智[技]；信阳丸撞坏荆江堤岸[堤岸]和宜昌的反包农运动，被他们拿着呐喊，实际上并没有引起群众参加。自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事实完全没有包含改良主义的成份，也不能否认其在群众中没有相当影响，但鄂西的经济条件，改良主义极少活跃的可能，到多只能做一点宣传和欺骗的作用。

本来一般小资产阶级苦于长期的混乱和桂系军阀的骚扰，对蒋氏和平统一的宣传，怀着不少的幻想，可是桂系驱走后的结果，所得到的只是担负加重，混乱益甚，这种幻想便很迅速的消灭下去。

3. 阶级间的冲突更激剧

各地群众斗争的结果，阶级间的分化已成绝对的鸿沟，彼此互相仇视，一天一天的加甚，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各县，时时都是在白刃肉搏的当中，监利招团丁完全不要本县的农民，枝江、宜都毗连的豪绅，认为每个农民都是猫子会（呼 CP 为猫子会），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各地豪绅地主为要镇压群众的斗争，唯一手段是残酷的烧杀。监利的一区，数十里之内已找不出屋子，唐港一带被焚烧的在一千以上，江陵的沙岗和石首的小河口等地，也被焚毁成白地，至于各地被屠杀的群众更是不在少数，因此各地群众要求解决团防和干反动派的报告，日必数起，尤其是主张毁灭城市的报复观念，几无法纠

正。江陵的普济观、汪家桥、陈家矶，石首的调弦，监利的朱家河、尺八口、上车湾，沔阳的峰口、明剝沟，党内也曾有焚烧的决定。

此外另一现象，一部份的豪绅地主，受群众斗争的威吓，不敢与 CP 为难，或到于屈服，监利毛家口、柳家集不愿再办团防，江陵黄家场的团防，捉了我们的同志却暗地纵放，枝江仙女庙的团防把我捉去了，马马虎虎便了事，一方面足见他们对付我们的态度，不完全一致，另一方面是群众的斗争的确可以把他们镇压下去。

4. 最近清乡的布置及其采取的策略

统治阶级在这群众斗争浪潮汹涌当中的反噬唯一的办法是清乡。鄂西的清乡，在各绥靖区未成立以前即开始，当时不过仅限于江陵、石首、监利几县，五十师谭道源全部集中监利，分一部担任，石首、江陵则由四师张发奎之一部担任。他们清乡的策略，当然是很残酷的烧杀，但最毒辣的手段是诱胁农民反水，勾结少数农贼和封建余孽的户长们与他们接头，引着军队威逼农民附和，更进一步的清乡时强迫农民组织梭标队，在前面促人烧屋，这未一来，江陵的郝分[穴]、龙西、龙南三区两区内两万有组织的群众完全塌台，监利的三四两区及一区围绕着朱家河的几乡，也瓦解了一万以上的群众，石首所受的损失，比较小，但这种现象，的确是少数人的真正背叛革命，一般农民都是暂时不得已的屈服，还有许多地方，却暗中与我们通消息，保存着秘密的组织，最近已有一部份的恢复，在“会剿”洪湖的声中。沔阳方面系以独立十四旅彭启彪部担任，但因当时八师朱绍良全部驻防峰口、新堤一带，据说他们有冲突，所以清乡未曾动作。

最近绥靖区已经成立，江陵以下各县，列入第三绥靖区，以独立第十四旅彭启彪部负责；宜昌一带则为第四绥靖区，以四师张发奎全部担任；施鹤则为第五绥靖区，以万伊吾旅为主力。现各县均已开始动作，除长阳外，别地还没有受着好多损失。

5. 士兵哗变和逃跑是军心动摇的表征

士兵的行动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监利鲟鱼洲江防队的士兵，因闹饷激起暴动，把所有长官全行杀死（中队长一，分队长二，司务长一），自动举一班班长（张誉珍）为队长，全部拖到洪湖加入红军。在他们写给我们的信当中说：“我们是为革命来的，不是为金钱来的。”可知他们觉悟的程度和革命的情绪。最近石首县城的警备队士兵，也有同样的行动，把长官杀了，全部拖到安乡。驻宜都的四师士兵不久也哗变了一连。

至于少数士兵开小差或拖枪跑的，更是常有的事。别的杂色部队饷项无着的，军心动摇尚不足奇，四师的士兵待遇较好，薪饷按月发，现据他们内部的人自己说，由江西到鄂西沿途逃跑的每连至少在二十名以上，最近他们枪毙逃兵和捉拿逃兵的事件，总是每天都有的事

6. 其他党派的活动不能妨碍我们争取群众的工作

鄂西因地位不十分重要，其他党派的视线，都少有集注在这些地方。各县的国民党都是有名无实的，仅只有一空架机关，其作用到多不过出几张欢迎某公打倒某派的传单标语，在群众中根本早已失掉效力。四师全部集中宜昌一带，改组派的势力，当然是比较雄厚，但仅限于军队中或某几个机关内，在群众中还没有发现他们好多活动。石首、当阳、远安各县旧有少许无政府党的数组织，宜都据报告有类似第三党的团体。但势力均非常微弱，并没有群众。

较有群众和力量的是归、兴、巴、施、鹤、长阳各地的神兵组织，但对我们没有多大的妨害，并且有一部份还可受我们的鞭策。至于各地的汉流（哥老会）他们是不过问政治的。

7. 天旱水灾商业萧条群众的生活日益困苦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今岁的收获还不及去岁，江陵、石首、监利、潜江、沔阳各县，低下的湖田均被大水淹没，农民都呼天叫苦。荆门、当阳、松滋、枝江、宜都、宜昌各县，收获更完全无望，农民多是吃的草头野菜。城市商业，也是颓败的现象，以宜昌来说，停业的小商人和失业的店员非常之多，就中烟土一项每担加征到九百四十一元，但收入还远不及往时，可见其贸易额减少的厉害。聚兴成银行及各银号挤兑，更使金融发生恐慌。沙市方面因水大可与湖南直接流通，商情比较活跃，打包厂已将开工，纺纱厂亦在建筑中，但棉花的收获不及往时，和农村购买力的减少，见商业上很大的危机，最近各纸票纷纷倒闭，也使商业受重大的影响。总之农村经济是在很迅速的破产当中，城市商业也是衰败的形势。

8. 苛捐杂税无限制的增加，群众的担负重了几倍

最近的捐税是一天一天的加重，两月前宜昌为增加肉税曾激起全体屠户的罢市，尤其是保卫团的购枪款项和月捐，增高得特别厉害，田亩捐每亩加收到四元，其他各种捐税，均有高度的增加，在江陵、石首、监利各县，割据区域间的各种捐税收不到了，于是把全县负担的总额，统统加到非割据区域内拿来补偿。据监利窑南北区的报告调查，捐税比以前重了四倍。驻军的加多，团防的扩大，一切消耗和给养，当然是专靠剥削群众，苛捐杂税的繁重是必然不可避免的事。

9. 群众的斗争是开展的形势

最近群众的斗争，确已日形扩大和深入，但主观的力量太薄弱，不能领导群众，放弃许多发动斗争的机会。各地群众在这极端压迫下面，几乎每一行动都有引起武装冲突的可能，而群众的斗争，并不因白色恐怖的严厉而沉寂下去，都是日益走向开展的形势。宜昌方面：城内屠户为反抗争[增]加肉税，举行全体罢市。罗田溪农民，夺缴当地保卫团的武装，鸦雀岭的农民，大家集合搬地主的包谷（玉蜀黍）。枝江、宜都一带的农民，自动聚集割地主田中的稻，并武装自卫，捕杀团防的侦探。江陵郝分[穴]、龙西两区数千农民围攻龚伯钧的团防，郝分[穴]农民聚集挑地主仓中的谷。监利唐港的农民自动集合两千余群众，与尺八口的团防血战三次。至于各地有组织的群众打团防、杀豪绅的要求，更是普遍一致的现象。

10. 各方面的趋势

鄂西全部是小农经济自给的社会，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所以统治权力，差不多是完全属于豪绅地主阶级。在目前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民族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买办阶级的冲突当中，根本上没有谁能消灭谁的可能，鄂西的统治形势，更不会随这两部份彼此势力的消长而变化到某种程度，蒋桂冲突后的结果，便是一个证据。

这样的经济条件，改良主义决少活跃的可能，政治前途，仍是一种极端野蛮的屠杀和刻骨的无情压榨，并且统治阶级为要拼命的扩充武力，镇压群众的斗争，这种现象，势必更要愈加厉害。但农产品的减少，商情的冷淡，军心的摇动，农村的割据，已成他们无法解决的矛盾。

在这种情形之下，群众的生活，当然是一天一天的困苦，日常大小经济

和政治的斗争，更新增加了许多发动的可能性，事实上群众的斗争已是普遍勃兴的现象，势将愈趋于扩大和剧烈的前途。

军阀内部冲突积极的酝酿，分区清乡的计划，决不会长期的实现，各地土匪的遍起，归兴巴、施鹤、长阳等县的神兵，仍公开存在，都足以使统治阶级究于应付。

鄂西的客观条件，确是极有利于革命的条件，只要主观力量加强，城市工作做起来了，爆发各地群众的大小斗争，不难把这一新的革命浪花向前推动。

二、各县工作的状况

1. 宜昌——附远安

宜昌县委自六月改组后，比较健全，对各地工作，能集体的去指导，党的正确策略也还能相当的执行，但县委五人中知识份子占四人，而且都是由外面调来的舶来品，所以不能深入群众，这是一个最大的缺陷[陷]

城市工作，在三个月前，本来已有相当的成绩，尤其人力车夫的工作比较的好，党的支部能相当的领导群众，在车夫工会未成立之先，是准备组织灰色团体，但一般工人都一致主张正式成立工会，很短的时间，一马路、二马路、小东门、大东门四处的分会，均先后建立起来了。其他如码头、挑水夫、划夫也有办法，后以负责同志误解中央力求公开的原则，不顾客观事实，工会的执委竟把工会的简章，拿在茶馆内公开的发给工人，要他们加入，因此被公司的调查侦悉，公司勾结稽查处把工会解散，并捕去同志及会员多人，余均被通缉，县委书记余巨之同志亲身拖车，亦被捉去。这一打击的影响，致城市的全部工作完全坍台。

最近两月来惨淡的经营，城市工作的嫩苗，又已由发芽而渐次生长起来了。组织一支部，为便利训练起见，下分三个小组，另外组织有两个由县委直辖的小组，城市上共有同志二十余人，支部干事会比较健全，能讨论党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印刷工会正在组织当中，青果工会亦有眉目，各种工作，尚有线索可寻，目前注意考查各种工人的生活状况，以便决定策略。

农民运动，最近有很大的发展，农运的中心，在北乡的罗田溪一带，当地土地非常瘦薄，群众十分之八是佃农和以背柴为生的贫民，现已成立区委三处，三区内的农民协会亦已组织起来，自上月群众把罗田溪保卫团武装夺得八枝以后，保卫团遂行瓦解，因此群众更形兴奋，发展也很迅速，在与来加入农协的会员的谈话当中，故意反诘他：“农民协会是共产党领导的，你们不怕？”他们说：“不管他是共产党也好，农民协会也好，都是打倒土豪劣绅的，我们要干”。罗田溪保卫团坍台的影响，附近两团防也无形瓦解。

当地豪绅近来非常恐慌，曾到县城控告三次，但没有方法知道谁是谁非，只得笼统的控“共党猖獗”，结果未能批准，于是他们更为恐慌，有的搬到城内，有的搬入高山的洞内躲避。在“八一”纪念的标语贴出后，一般豪绅地主惶失措，他们误解为八月初一共产党要起事，他们说“共产党只注意有钱人”，他们把财产全行搬寄在他们的佃户家中，殊不知即是寄在农协的会员家中，现已调查着很多，并调查着团防失散的速枪数枝，近将领导群众举行没收。

当地游击战争，群众要求非常迫切，现已决定发动。为防止重蹈下游各县割据区域内的错误，议决：A、建立党与群众组织的正确关系；B、绝对制止党的公开；C、避免经济滥支，造成大批雇拥革命者，并消失群众艰苦奋斗

的革命性；D、游击队的组织，以短枪三支枪至五支枪为一队，设队长一人，政治指导员一人（即党代表），给养干事一人（他们必须是专门人材），但不发生生活费，一切由给养干事负责，并尽可能的参加生产（其余武装，分散在群众当中，必要时才召集，当然不致妨碍他们的生产），县委经常派人轮流去巡视指导当地工作。

鸦雀岭方面，有党的支部三个，因干部缺乏，未成立区委，最近曾领导当地群众搬地主的包谷，结果完全胜利，工作颇形兴奋。

南乡和西乡是过去组织较好的地方，但因去岁受打击以后，失败情绪的反映，工作不紧张，并过度的恐慌。西乡现有新的发展，情形较好，旧的组织虽还保存着一百以上的数量，实际作用很少。

远安特支直接由宜昌县委指挥，过去基础在南乡，去岁失败后，到今还没有恢复，现在的组织移在北乡与宜昌毗连一带。据当地负责人的报告，现有区委二，另支部三，共有同志两百人，事实上多是有名无实，不能积极工作。因地势偏僻能力上顾计不到，一年以来没有派人去巡视过，实际情形还不十分详细。

2. 江陵

江陵县委因贪图农民运动的热闹，负责人大部份集中在割据区域内，做日常的零碎应付工作，对于城市工作，不免有忽视的偏向。半年以来虽曾派人专门做这一工作，但因不能入群众，始终没有起色；另一错误，就是偏于去找旧的线索，尤其是外面避难来的同志，他们在荆沙既没有深固的社会关系，失败情绪的反映，工作亦不积极，这也是使工作不能打入群众的一个原因。

最近经多方的设法，派人打入生产，并由乡村调一部份同志到城市来工作，工作上已有新的转机。工人支部比较能做少许工作，另一杂色支部，事实上是有名无实的几个党员，没有多大作用。在人力车夫中领导一灰色团体，约十余人，情形上好。建筑工人中，亦组织有十余人的灰色团体，将要开工的打包厂中也找得路线，可以派人进去做工。其他的工人中，都可以想着办法，不过现在才是工作正式开始做的时期，不能马上就奢望其做到某种程度。目前的计划，一方面再加派人参加各种生产，在在业的工人中去找对象；一方面由乡村来帮助荆沙的工作，沙市与四乡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一办法是极有可能的。

江陵的农村工作向来就很普遍，近几月来因忙于割据区域内的应付，对其他地方没有十分注意到，所以未能把工作推动，而致割据区域陷于孤立的形势。西北区的组织，现已划归当阳，作为他们恢复工作的基础，弥陀寺、戴家场一带的组织，为指挥便利起见，划归公安管辖。现全部有郝分[穴]、郝正、龙西、龙南、沙南五区委，另沙东一支部，人数约六百左右。

郝分[穴]龙西两区是割据的中心区域，龙南区内亦造成割据的形势，所领导有组织的群众在两万上下，但都是在最近四个月内游击战争发动后才汹涌起来的，当然在这当中包含有许多弱点：第[一]是完全号召来的，仅有形势[式]上的组织，没有强固的基础。我在割据区域的外边，一个农民对我说：“他们是这样的，如你能约得三四十人，他们就封一个排长，约得百多人，他们就封一个连长”。我与县农协的负责人谈话，他们也说是大概都是他们自己把名册填好了，来与县农协接头，派人去与他们开成立会，就是这样来

的一些组织。忽然而天也的一个爆发起来，干部缺乏，当然谈不到基本组织的严密和训练工作。第二，是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不正确。党的组织比群众的组织还先公开，党完全包办了群众的组织，甚至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后经多方的纠正，农协在群众中的威信虽建立起来了，但党团作用还是没有正确的办到。第三，是经济的滥开支，因为日常工作的忙碌，无论在党内或在群众中做工作的，都大半脱离了生产，造成大批雇佣革命者。沙岗、黄才剅、新观三个中心支部中，每支部的干事会五人都有生活费，其他普通党员，也要求要津贴生活，做侦探或交通，在五里路以外，便必须要钱，很明显的无论党员或群众都不是为工作而做工作，简直是拿钱而雇他们做工作了。

割据区域内的群众斗争，唯一的是与豪绅地主阶级的武装团防相肉搏，先后在易家口、高家口、徐李场、青阳宫、新观、资福寺等处，大小十余次冲突都多占优势。易家口之役，有五六千群众参加，其余因战略关系，没有召集群众（但他们是愿意参加的），就中以青阳宫之战最为激烈，我方集中江石监三县四个中队红军，敌人是监利全县的团防外加军队一连，是役牺牲徐守玉等同志二十人，带花三十一个，敌人死伤在八十人以上。经济斗争只在郝分[穴]区挑地主谷子一次。割据区域内，一切捐税当然是没有了，但土地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因普遍都是自耕农，很少真正的地主，虽有不少的祠田，但家族关系一时不能打破，不能违反群众的意识去执行。

目前割据已经失败了，就是敌人不断的烧杀并诱胁农民反水。这一现象是从张家场起（张知本的家族），张姓几个豪绅，不许他们的族人加入农协，因此县农协派赤卫队去杀他们，在这次行动中一、二同志不明了，在当地大呼“姓张的是反动派，见姓张的都要杀”。张姓五百余人，遂全行返[反]动，勾结普济观的军队，时时到赤色范围内烧杀，及后江石监三县的“会剿”，敌军进驻根据地的新观，于是投机加入的王姓群众全体反水，影响所及，彭姓群众也反水，沙岗和龙西的群众，因为不见某几大姓，并且较经过斗争，最后不得已才与敌人接头，但他们还是表示是假降，心总不变。当敌人进驻新观后，红军第四中队向他们猛扑，忠勇明了的李华龙同志（中队长）因之牺牲，于是军事不能维持，也是使群众瓦解的一个大原因。

现农村中保存着的，还有郝正、沙南两区比较有力量，沙东是不久以前才整理就绪的。但郝分[穴]区的工作又恢复了一部份，若政局稍有变动，全部组织立即可以恢复，并还有大的发展的可能。

3. 石首

石首比较重要的城市是藕池，近来商务繁盛，有很多的码头工人及其他的工人。当地已有党的基础，鄂西特委前曾派江陵一个比较好的农民同志前去负责，并参加石首县委，在当地抬码头，殊他第一天抬得十余串钱，待坐吃完了，便跑回江陵（这种现象宜沙曾发生很多），一直到现在工作仍是没有什么起色，仅只有一点传通消息的作用，县城方面，也是只有几个光杆党员，没有多大作用。

农村工作东北两区是割据的形势，领导的群众在五千以上，均是经党的作用去发展起来的，已有很久的历史，经过长期的斗争，比较有基础。最近江陵、监利两县群众的反水，但石首并未受这种影响，割据形势至今还保持着。

割据区域内的情形及江陵大概相似，主要的也是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不正确。群众组织简直是党的一种附属品，农协的指导机关实际上没有开始工

作，一切问题都是来找着党解决，而且要找某几个人[东区群众只认识屈阳春（农民同志），北区群众信仰冯世华，有阳、冯两皇帝之称]；在六月县委扩大会上，才决定把县农协正式建立起来。再负责人，甚至一部份党员的生活不能群众化，无形中形成与群众间的隔阂，在一般农民的唱歌当中表现出来“努力奋斗，最后胜利，定是先生们的”。土地问题也未得着解决，原因是土地并未集中在地主手里。记得县委扩大会议起草的决议案，社会分析里说：“石首完全是小农经济自给的社会，阶级分化不明显，经济上没有好多冲突，所以革命斗争不是明显的阶级行动，而是复仇的反应的扩大”，经我很严厉的纠正，他们还要坚持他们的理由，这虽是他们偏见的错误，的确一般的没有地主与农民的明显分别。

很早就宣布没收刘代夫的土地，因去岁收获时，被刘代夫之子勾结军队把农民捉去，强迫他们缴租，因此现在没有农民敢种，大家主张暂时把两千多亩田完全荒了。

割据区域内，敌人的清乡烧杀是常常都有的事，尤其自五月红军第一中队在藕池战败后更为厉害。近三个月内，曾先后给他们几个重大打击，小河口一战，敌人全部消灭，没有漏网一个。沙子口一战，消灭五十师一连兵力，因此他们也非常害怕，不收造次深入重地。石首统治阶级的力量并不大，始终把我们没有办法。

西区一大部份的群众，差不多清一色的加入农民协会，不过还是在秘密状态中，没有公开起来。起初有两种滑稽的现象：第一，农协的会员怕共产党，他们说，“北区的共产党很利害，要不到我们这里来才好”，不知领导他们的就是共产党。第二，他们加入农协的条件，与资产阶级的选举的限制相同，要有若干财产以上，不然，他们以为靠不住，现在已经纠正过来了。

中区的组织，虽早已建立区委，工作的发展非常迟缓。南区方面曾多方设法，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打入进去。

我感觉得石首县委的能力太小，能够干的人到有，缺少一个能支配工作的同志，若县委健全了，石首的工作一定可以推动。

4. 监利——附沔阳

监利的工作，完全是在武装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成为目前农村割据的局面，城市工作完全谈不上。县城方面，虽曾派过几次人去，始终没有结果，其次的重要市镇是朱家河，当地距市镇不上两里路，就普遍是我们的组织，但市镇上一点没有，最近才在团防的士兵当中找得线索。

最近农村的割据，几有全县完成的形势。一、二两区是我们的根据地，有一年以上的历史，有二万五千以上的群众。同样的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不正确，以前是只有党没有群众组织，后才把党员完全变为群众组织，并重新吸收一部份比较好的份子，成立党的基础，所以党还比农协先公开。但农协的工作并未独立起来，一切事情都还是找县委，最近才把农协建立好。经济开支，每月有惊人的数目，工作人员的大批脱离了生产，红军组织的扩大，至少在一万元以上。

仇视城市的观念，监利群众特别厉害。当红军攻克下车湾时，群众自动来了两三千参加，他们举火焚屋，负责人鸣枪都制止不住，他们说：“待我们把屋烧了以后，听你们把我们执行纪律”。群众回家后，因还有二三十间屋未烧完，他们夜间睡不着，于是又聚集前去烧个净光大吉。最近群众对于焚烧朱家河、尺八口、上车弯的要求非常激烈，听说尺八口已经被他们攻下

后烧了。一般同志对我们说：“你们不准焚烧市镇是怕连累贫民，我们把市镇上的财产没收后，以一部份分给贫民，帮他们在乡村中谋职业”，可见他们对于焚烧市镇主张的坚决。

监利的工作因为是在斗争作起来的，下曾[层]群众都非常兴奋，一个个都摩拳擦掌的，但因训练缺乏，工作上有时偏于英雄式的去蛮干。我常说：监利有一部份干部，都是梁山泊上的好汉。因为历史较久，尚造成很多的农民干部，县委虽不很健全，不能有计划的去指导各地的工作，由区委以致支部，均能本着他们的经验独立去工作，这是监利的一个特点，在会议上每提出一个问题讨论，他们都有许多好的意见，二区区委扩大会上，对于土地问题，辨[辩]论得非常热烈，有的主张把没收的土地组织农村合作社去耕种（因分给农民他们不敢要），有的主张强迫没有职业的贫民去种，有的主张由农协耕种，收入作农协的经费，并有许多实际办法。

全县党员经一次大的洗刷过后，现共只有三百左右，许多有群众组织的地方没有同志，全党同志尽是活动份子，不是在党内负得有责，就是在农协中负有责任，简直没有几个普通同志。近两三月来，只去心于群众工作，连党的组织都停顿着未发展。在有次支部会上，我提出发展组织的问题，他们都认为是应要发展，另一同志马上提出要防止像招兵式的乱挪[拉]，当时介绍了三个，只通过一个，其余两个都承认是忠实勇敢，做工作也好，但还没有经验，留待以后再说，入党的条件比别地都严格得多。

三、四两区的群众，最近也有普遍起来的形势。一方面因一、二两区的割据，统治阶级把全县的负担统统加到三、四两区，使他们担负的捐税加重了四倍，一方面一、二两区群众的斗争的影响，激动了他们。三区事先没党的基础，近 来 群众组织的发展，都是他们自动的把原有的十家连蜕变过来，准备了酒席，来接朱先生（三区负责人）去开成立会，这样杂七杂八的组织，数量上虽有好几千，实际上没有什么作用。四区把严李场一带则交江陵，堤头义公堤等地则交石首，尚存余家埠到黄歇口一带的组织。区委和区农协均不健全，工作不能有什么计划的推动。

最近因目标显著，惹起敌人注意，五十师谭道源全部集中监利清乡。三、四两区新发展的组织因没有经过斗争，全部瓦解。敌人最注意的是一区洪湖，第一次，曾八路会攻，没有结果，接着每天烧杀，不稍停止，更一方面勾结少数户长和农贼与他们接头，同江陵一样，诱胁农民反水，围绕着朱家河的附近一带及上车湾一带的组织，遂反水了五千以上的群众。我们当时应付的办法，一方面积极的扩大宣传，揭穿敌人的欺骗；一方面组织红色恐怖队，歼杀主动反水的头目。同时反了水的群众，统治阶级要他们出各种捐税和购枪款，担负很重，他们十分失悔，又暗中与我们接头，这一危险，遂因此制止下去了。二区方面，完全没有清乡。所以监利一、二两区的割据，到今仍然保持未坍台。

沔阳因与监利接连，同围绕着洪湖，工作上的关系，他们请求属于鄂西，过去党的组织重心在南区，去岁清乡坍台，全部自首。今春因受监利群众斗争的影响，工作又恢复起来，成为割据的形势。组织上的根本问题他们并未注意到，一意只计划用武力去峰口和明剅沟，以为不如此，沔阳工作便没有出路，其实沔阳的根本问题是党的组织问题，全体自首的又恢复党籍，已是很严重的错误，不过事实上凡是自首的都不要，只有放弃南区的工作，但应

当对这旧的组织很严格的洗刷和整理，积极的向新堤、仙桃两城市及其他区域发展新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有一封很详细的信给他们。

现西区、北区、东区都有了组织，但整个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尤其是部落观念表现得特别厉害，专门耍外交手腕。关于日常工作也不十分注意。在县委所在地，满贴着署名“工农革命军沔阳县委会”的标语，他们也不予以纠正；党员谓“单身汉抢寡妇是无条件的”，发生了许多抢婚的事，这是他们训练工作缺乏的原故；东区区委谓“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是戴起颜色镜子说话，是理想的，不可能的，足见其对党的策略根本不了解，他们要红军打峰口，因主观力量不可能，他们便说：“你们只帮监利和江陵打，不肯帮沔阳打”，遂与军事负责人起意见，要闹军事分家。

总之，沔阳党的问题非常严重，不根本从新改造，建立无产阶级党的基础，工作决不会做好的。

5. 公安

公安自去岁清乡坍台后，经一年以[已]恢复，各地的组织都先后建立起来了，并有[且]还有普遍的发展，党员在两百以上，群众组织也有百多人。目前环境仍极险恶，团防林立，特别是十家连组织的严密，生人完全不能进内，因此工作上发生不少阻碍。

他们工作上的主要目的，是积极准备发动游击战争，解决团防，想造成像江石监的割据形势。最近县委书记周宝之同志被敌人侦悉捕去枪决，并失去步枪八支，工作上受了很大的损失。目前干部缺乏，还没派人去负责。

6. 荆门——附钟祥、潜江

荆门过去工作较好，群众亦有斗争经验，去岁失败后，一般干部均逃避到外县，因此县委不健全，不能推动各地的工作。去岁的天旱，荆门最为厉害，草头野菜都吃完了，大部份群众逃荒出外，这样好的客观环境，党始终没有把群众的经济斗争发动起来。

荆门的城市，重要的是县城和沙洋，县城始终没有办法，沙洋虽有几个同志，起不起多大作用。

农村方面，城北城南的工作比较好，烟墩集亦在恢复当中。最近已派王雨山同志去负责，并把当地刘季汉同志找着。县委已较健全，各项工作亦开始整理，工作上有一新的转机。

目前的计划：第一是加紧沙洋的工运；第二，向十里铺、后港一带发展，以便与江陵取联系；第三，发动饥民斗争，在斗争中把群众组织在党的领导之下。

钟祥、潜江均建立特支，由荆门县委指挥。潜江党的组织尽是小资产阶级，他们目前概是在团防中做的一些灰色工作，党的政治影响不能深入群众，钟祥组织仅有三四十人，也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工作不积极。

7. 松滋、枝江、宜都——附当阳

松、枝、宜三县因区域狭小，纵横共仅百里，政治经济情形完全相同，而且工作都在三县的连接一带，因此把三县共合组织一县委，指导三县的工作。

今年三月内曾领导一饥民斗争，十数日之内引起三万以上的群众参加，后虽被政府以武力解散，并捕去多人，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确很好，工作上遂有新的起色，群众也非常兴奋。现组织中心在安福寺、[梅]十区一带，造成清一色的形势，江南沙道观一带，近已恢复一区委，但旧

的组织失败情绪的反映表现不好，目前积极注意新的发展，当地群众组织有农协一区，成衣工会一个，工会会员约四百人，宜都县城、江口、董市三处，比较是重要的市镇，仅有几个同志，工作未做起来。

因为三县的天旱很厉害，群众的经济要求异常迫切，最近群众的斗争自动的爆发，党的同志因前次受着打击不敢领导，经县委严厉督促，方动员参加，但群众的情绪很高涨，普遍的发动起来，割地主田中的稻并随带武装自卫，把团防的侦探捕杀三个，更积极主张要解决安福寺一带的团防，后经豪绅勾结县城警备队把群众驱散，捕去四人，接着四师会台宜、枝两县的团防前往“会剿”，虽没有受着大的损失，但负责同志因太红不能住足，组织无形停顿，群众也很恐怖。目前的形势，准备用武装扶助群众的斗争，并领导团防中的组织起来响应，实行没收豪绅地主的谷米和财产，纵环境的很险恶，也将要这样的孤注一掷，不然就敌人不压迫，而整个贫民都没有饭吃，势将四散逃荒出外，组织也难维系，不过这仅是安福寺一区的现象，别地组织没有什么变动。

三县两点最不好的现象：第一，县委闹私人意气，互相攻击；第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些小的零碎问题，党员群众不同意便不能执行。这两点是工作上不能进展的一个大原因，现已严厉的纠正。

当阳的豪绅地主对我们的防范非常严密，技术也很进步，在三月前各地组织本已先后恢复，后因制造兵变失败，组织也随着瓦解，原因是当时五十师驻防当阳，某营四个连长都是同志（秦汉三的部队所改编）他们与党接着头，计划兵变，他们行动非常幼稚，公开的去与营长商量，营长不同意，被他们杀了，又去与团长商量，结果被团部把他们扣留枪毙，并牺牲特支书记王仁同志、CY书记罗庆光同志，各地恢复的组织也随着坍台。现仅存在雷家港一区，工作更形困难。

8. 长阳

长阳的工作，向来没有作好，最近因军事失败，组织同行停顿，李勋同志在县保卫团当副团总，团防武装原系数起集中编成。适值团局各负责人都因事离开，交李勋一人指挥，长阳党认为机会已到，时不可失，事先并没有充分准备，遂举行兵变，把县长杀了。全部拖到资坵。对内组织前敌委员会指挥党务军事，对外用工农革命军第六军名义，实际上仅有枪百五六十支，工作毫不切实。卒以没有军事常识，受第四师包围，损失武装七八十支，当场捉出五六十人，被四师用机关枪扫射，李勋带得残余部队四五十人逃脱。经此次打击后，四师更受豪绅的勾结，普遍清乡，但在清乡当中，豪绅还是害怕 CP 势力复活，所以并未怎样摧残，可是长阳党的组织，未曾经过斗争，在这风声鹤唳当中便闻风披靡，负责人多离开工作，全部无形瓦解。

最近由宜昌派交通去找他们，仅会着北区区委，他们主张要待这一波浪平静下去，才能恢复工作，现又派人去找县委负责同志开会讨论长阳今后的工作。

本来长阳群众非常精悍，神兵的组织遍于西北一带，长阳党不能在工作上积极的去取得群众，神兵也可受我们的影响，他们也没有注意到其下层中去建立组织，所以工作未能深入群众，力量也很薄弱，虽有两百以上的党员，内面包含许多小资产阶级，事实上毫无工作表现。五峰与长阳毗连，曾要长阳负责发展五峰的组织，但始终没有结果。

9. 兴山、秭归、巴东

兴归巴三县是神兵势力笼罩着的区域，兴归两县现在仍公开存在，握有地方政权，县长不得他们的同意，便不能发号施令。巴东因去春我们领导的人民委员会政权失败后，神兵遂行垮台，但现还保存着秘密的势力，目前工作在兴山和巴东两县较好，秭归仅有少许组织，因干部缺乏，合并组织一县委。最近因工作的便利起见，改为巴东成立一县委，兴归两县成立一县委。

三县的工作就是神兵的工作，党员的脑经[筋]内都还刻得有一个“神”字，如是从正面上去反对迷信不会发生效力的，他们也觉得他们的组织不好，并且没有政治意义，所以我们策略，是从侧面用我们的组织上和政治上的优点去夺取群[众]。最近三阳神兵的开山祖师（万老师）加入了我们的组织，他四处向他的徒子徒孙公开宣传，不过他没有受着训练，非常幼稚，但神兵是崇拜偶像的，的确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兴归有长足的进展。

兴归方面，决定他们目前的主要工作是香溪的煤矿工人运动，虽还是用旧式的方法开采，但工人不下千数，现已组织了灰色团体，大概工作可以做起来。巴东的组织，原仅只有后六乡有（江北），现前六乡（江南）也找得很多线索。

三县的形势，还是进展的形势，能够干的同志也还不少，只要随时有人去巡视，指导他们的工作，有大的发展的可能。

10. 施鹤

施鹤七县因地势偏僻，与外面隔绝，过去鄂西特委因能力上顾计不到，对施鹤工作未积极去做，原来各县都有少许的组织，自今春施鹤负责人金裕汉自首，杨维藩叛变，关系遂全行断绝。最近几月贺老板在鹤峰一带，大概有一部份工作，不过好久没有着[看]他的报告，对施鹤的实际情形无法知悉。

11. 各地 CY 的情形

CY 的工作，因干部缺乏，最近更形落后。宜昌方面，城市仅有团员八人（连四个负责人在内）并还有消沉脱离的形势。城市上可说没有工作，乡村中仅罗田溪有四五十人，实际上也是由党在指挥。江陵工作失败后，CY 完全一个都没有了。最好的是石首，有三个区委，另三个特支，团员在三百左右，少年先锋队有六七百人，工作上尚有头绪。监利最近才重新整理，工作上将有新的起色。其他各县没有建立指导机关，完全由党员负责指挥，但各县党对 CY 工作并没有忽视，不过事实上没有干部，不能组织指导机关。

各地 CY 工作都是党作起来的，党的工作好的地方，CY 工作自然不成问题，最近党团的关系还是没有闹好，一方面是团的力量薄弱，不能担负本身的任务，再一方面，是 CY 中央巡视员的分家主义所到之处，使党团发生许多纠纷。

我与他先后到监利，他认为农协是党领导的，对少年先锋队和童子团应当是团的群众，主张他们可以不到农协的会（大部份青年农民都是会员）不参加农协的一切工作，农协也不能直接叫青农做工作，以为不如此，党的群众便与党团的群众分不开（他的主张就是要分开），因为妇女都是加入农协的，他又认为党有妇女群众，团没有了，主张把青年女子化[划]出，成立青妇委员会。因此割据区域内放哨、侦探、交通等工作青年都不去做，党和农协不能指挥他们，团又不负这些政治任务，所以与党起了许多纠纷。他总觉得党有什末[么]群众组织，团也同样的要组织这样的青年群众，而且这两个群众组织的关系，要像党与团的关系一样，成为独立的组织。那末苏维

埃政府是党领导的了，不是又组织少年政府吗？这是党团不好的主要原因，其实他未到的地方，如石首等处，党团并没有什么问题。

三、其他

1. 巡视中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

A、没有斗争便没有工作——上游各县没有经过斗争，群众非常沉闷，毫无工作表现，就是这有名无实的组织，也经不起一点波折马上就会坍台。

B、农村群众确是易得易失的——江陵在三月之内，发展群众两万以上，尤其是攻下徐李场之后，五天之内就发展四千以上，但失败时，三礼拜全部坍台，来时似潮涌一般，坍台也是一样。

C、工运唯一的是参加生产——宜昌车夫工作，完全是两个同志亲身拉车作起来的，最近沙市几个月没有办法的车工工作，也因一个同志拉车作起来了。站在外面去影响，生活上不发生密切关系，总不会取得他们的同情，他们也不会跟着你走。

D、分散游击，是目前的唯一战术——监利把武装集中，发现很多毛病：1. 与群众关系不亲密；2. 有工作时，群众没有力量去做，待武装调到，机会又过了；3. 集中作战时，使群众力量表现不出来，并且红军怕被群众的梭标凿伤；4. 根本我们都多是小的行动，用不着集中；5. 集中目标太大，易令敌人发现，而且动作很迟缓。

E、保守就是失败——江陵、石首、监利的赤色区域不能很迅速的扩大，就是偏于保守，不注意积极去扩大，事实上目前割据是很少可能性的。

F、党员生活不能群众化的危险——党员生活不能群众化，使党有与群众脱离的危险，江陵最近牺牲了两个同志，也是因他们身上带自来水的原故，致被敌人认出。

G、脱离组织很久的党员多不可靠——思想落了伍，观点不正确，沙市曾遇着几次，都几乎发生危险。

H、发展新的基础，是改造组织的主要条件——旧的组织多消沉腐化，尤其是失败后恢复的组织，失败情绪的反映，表现更不好，但新发展的都比较兴奋，未沾着许多恶劣习染[气]。

1、割据区域内的两大危机——第一，党与群众的关系总不易弄正确，第二，因日常事务繁琐，造成大批雇佣劳动者。

J、革命的武装是必要的组织——启然我们不是偏重武力，但完全不用武力，农村工作是不易推动的，就是说：群众的斗争，要以武装扶助。

K、支部公开的严重——割据区域内，支部差不多完全是公开的，因此群[众]一经反水，党员便完全立不住脚，党也随之坍台。

2. 鄂西工作的缺点

A、组织上的弱点很多，一般的农村支部没有支部生活，各地的地方党部不健全，不能独立工作，干部份子非常缺乏教育训练工作，党员的政治水平线太低。

B、城市工作完全说不上，宜昌、沙市虽有少许组织，力量非常薄弱；监利、新堤更等于零；藕池、沙洋各地，实际上只有几个挂名的同志。

C、士兵工作，未打入主要部队，仅限于各地的团防。

D、济难工作没有建立起来，在江陵、石首、监利的区域，虽有济难会的组织，但成为农协的一部份，监利更是一个慈善救济机关，做的施药、修路等工作。

E、上游各县根本没有什未[么]工作，江、石、监三县虽有一点工作，但错误很多。主要的如，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不正确，经济的滥开支，党的公开，以武装斗争为唯一工作路线等。

F、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等旧的工作方法仍然没有改正过来，极端民主化、知识分子化，地域观念等不正确的倾向，还在明滋暗长。

G、反帝运动，农村的党未曾作过，宜昌亦不过只呆板的发过几张传单，反帝浪潮无从推动。

H、宣传工作，割据区域内虽比较作得普遍，但方式不好，影响不能深入群众，他如荆、当、远、松、枝、宜、归、兴、巴各县，根本谈不上宣传工作。宜昌比较注意这一问题，效力还是很小，红军所到之处群众说：“不晓得你们这样的好”，可见平时没有宣传工作，群众受反动派的欺骗。

1、交通困难，地域辽阔，上级指示一时传达不到，就到了也多失时效，甚至三月前的关于组织路线转变的通告，到今还有几县没有得到。

3.对鄂西工作的意见

A、特委有必须恢复的必要：（1）鄂西区域太大，须要一指导机关；（2）江石监沔已成一部份的割据形势，须要统一的指挥；（3）军事上的指挥必须统一；（4）各处地方都不健全，须要指导机关去帮助他；（5）各县要与上级发生关系的，是要求调人、要钱等一切实际问题，并不是政治上工作上有好多问题提到上级，因此没有指导机关便应付不了；（6）各县的地方主义尚未除净，没有指导机关，有时会拉分裂。

B、特委须设沙市，以宜昌为中心，管理远安、长阳、五峰、兴山、秭归、巴东、施鹤；以荆门为中心（沙洋），管理钟祥、京山、天门、潜江；以监利为中心（荆门），管理沔阳、石首、公安、松枝宜，当阳直接与特委发生关系（所谓管理，指传达往来文件而言）。交通网的布置，须特别周密，联络上方能敏捷（参看图）。

C、组织上根本问题，如支部生活与地方党部的健全，干部份子的培养，城市工作和教育训练的加紧，目前虽稍有进步，但还是很迟缓，尤其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要继续的纠正。

D、军事问题，分散游击的原则是绝对正确，目前积极向外扩大，纠正过去保守的观念。行动务须避免正面冲突，如青阳宫的孤注一掷，非常危险，再遇着两次，会自然消灭。

E、目前CY的工作情形，用不着特委等组织，根本上各地谈不上工作，CY也不能单独工作，主要的是要党加紧CY的工作。各县CY指导机关，一时还是无法建立（没有干部），红军内CY的组织不要（据CY巡视员说，团的五次大会决议要成立CY支部），指挥才不致有牵制。

贺龙给中央的报告

——游击战争的经过和影响、党务工作及群众运动、红军的实力及今后的任务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日)

中央：

董朗同志于阴八月初到桑植，接到中央六月十六日的来信，敬悉一切。此间于“八一”纪念后，曾送上万言的报告，系由向宜恒同志送交宜昌县委转上的，不卜中央已收到否？兹将月余以来工作报告如下：

一、游击战争的经过和影响

自此报告发出后，湘西军事又形紧张，吴尚部开来常德，对我红军有一大布置，饬令湘西队伍和陈渠珍所部向桑植苏维埃区域取包围的形势，不过吴尚部开来湘西其任务不仅是要打击红军，对湘西队伍也要予以剿灭或收编。我们见到这点遂决定率红军向庸、慈发展，以动摇敌人的战线，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争取湘西劳苦群众于党的周围。这一游击战争的经过和影响，是值得报告的。

(一)西教乡的战斗。大庸熊相熙等共有枪三百支，是西教乡最大的土酋，握全乡政治的、经济的特权，其本人是个最大的地主，与陈逆策勋和徐小桐等都有相当的结合。我们要向下游发展，若不将他们扑灭，可为桑植苏维埃之患。因此，我们游击战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扑灭熊族团防，以除后患。

除派二旅五团留于桑城外，大部红军均随云卿出发前方，阴七月初二由桑开动，初三与熊部接触，围攻敌寨至七日，大小十余战，始将敌人击退。此次战争的经过有如下述：

1.敌人的布置。熊部在桥头飞塔坡、教字垭、坛子山、鸡爪岩、白马山等处，均筑有很坚固的寨子，尤以教字垭石寨为最难攻，在这个要塞地方，敌人均驻有团兵把守，以为抵御，所以敌人的兵力虽不很厚，战斗力虽不很强，但“强兵难打弱寨”，如没有飞机大炮，随便如何英勇的将士，都不容易把这样的寨子攻破的。

2.进击的情形。我军西路，一面由云卿亲率大队由桥头向教字垭攻击前进，一由王炳南同志率二团由中湖飞塔坡前进，以作佯攻。初三日上午攻下桥头，同日围攻教字垭石寨。初四日指晓占领飞塔坡，即以全力攻取敌之主寨(教字垭)，率因石寨太坚、防守太严未能攻下。

3.双方之悍战。我们初因不知西教乡有这样多的寨子，而且这样难攻，既到双方接触，又不便中途停战以损军威，遂下最大决心，誓将敌寨攻下而后已。我因为占领了都字垭寨子对面的狮子岭，在地形上颇占优势，故用兵自如，既可以围敌寨，复可以拒援兵，进战退守莫不顺利。同时得吴玉霖团(与云卿有旧好，且系云卿旧部)之声援，使敌人更加胆寒。在围寨时，我军爬寨三次，均被石块、枪弹击下不得入，敌之援队如熊海清、陈策勋等亦死力救援数次，均被我军击溃，战争之烈确系红军成立以来所未有者。

4.敌人之逃走，围寨五日，敌人粮尽援绝，恐慌异常，表示投降改编，但不愿缴枪。这自然我们不能同意，并饬各部严防敌人逃走。但事出意外，在初八日晚上下大雨，举目不能见人，而我士兵因连日疲倦太甚，防范时有疏忽，致使敌人乘机潜逃，及到深夜攻寨时，寨内已无敌人踪迹了，真是可

惜。

5. 战争之影响。是役我军牺牲官兵十八名，伤二十名，消耗子弹四千发，且未得敌人的枪弹，但在军事上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教乡的寨子从来没有人攻下过一次（吴玉霖、吴 等以全力攻寨数次都遭失败），而我红军不过是一个刚满十二个月的婴儿，竟能克敌制胜，当然可使湘西一般队伍胆寒。

敌人的主寨既经击破，其他小寨莫不迎刃而解，于是熊族各部遂被我军击散了。为要补充子弹，恢复士兵疲劳，我们约在西教乡休息了一个星期，同时敌人又渐渐地集中起来，然而我们正要他们集中，才好一鼓击破，因为以我们的力量可以解除陈策勋、熊抱琴等部。

（二）慈利的游击。要使敌人大大的恐怖，要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要掀起湘西劳苦群众的革命情绪，只在大庸西教乡骚动一下是不够的，还要在九澧的重要区域——慈利，去作广大的游击战争，才能完成我们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我们红军休息的时候，陈、熊各部均退据慈、庸、桑交界之处（康三谷、池峪、芳花界一带），与慈利江垭团防徐小桐部均取联络（徐小桐和邢葺子两部只有枪八十支，均驻江垭），我们若不先发制人，

他们必为吴尚之前卫挺而来进击我们。因此，我们即于阴七月十九日分兵猛进，敌人闻风披靡，沿途均无战事，仅在江垭小有接触，徐、熊、邢、陈遂即纷纷退却，而占重要位置的江垭商埠遂于阴历七月二十一入于红军之手了。

但是我们不是来割据江垭的，而是来骚动以骇退敌人的，当然我们不能久驻江垭，坐待敌人的包围，故红军只在江垭休息一天，于二十三日即进驻杉木桥。在这个时期中，一方面写信给周笃方（神兵），一方面写信给田少卿，表示合作，共同奋斗。他们都有比较圆满的答复，惟不愿在这个风浪紧急的时候高树红旗，致受敌人打击。虽然周、田两部都是十二分对于土地革命毫无认识的，但他们俱为伪湖南省政府所不容，无论如何不致与红军为敌。如田少卿回信说“若红军入石门，愿让出防地”即可证明。惟当时退却了徐、邢诸部尚未肃清。张晋武部盘据慈利县城，态度暧昧，距杉木桥仅五十里。吴尚部已抵桃源之盘塘桥，仅距慈利仅九十里。此外还有澧县李抱冰、石门之罗孝之对我们的防堵，均十分严密。在这种情况下，若红军深入敌境，势必遭敌人的解（鄂西西藕池游击的失败，就是忽略了这一重要的战术）。因此，我们决定把红军开回桑植来，使敌人对我们用兵莫明其妙，而我们得以乘此时期加紧军事政治训练。总之，此间游击的方法，云卿以二十年拖队的经验，随机应变，今后绝不至上敌人的大当。

（三）游击期间的留守工作。在桑植县已有广大的群众起来拥护苏维埃政权，已有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之可能，当然我们对于留守桑植的工作要十分重视。

我们对留守的决定，是组织一留守委员会，以县委之李良耀、政府之汪毅夫、红军之谷海云三人负责。继因谷海云部与农民协会时有冲突，又调二团文南浦回防桑城，把谷海云部之五团调到前方来，参加慈利的游击战争。从此，桑植方面得以无障碍的惩治豪绅，进行没收地主的新谷等工作。虽然后方仅有长枪八、九十支，而革命的政权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仍在稳固着。

惟有一点，在红军到达慈境之后，桑方队伍、团防乘机骚动，尤以内四

乡为最凶横。当时，后方兵力单薄，保×外四乡尚不够，自然无法顾及内四乡。长此下去，这一般队伍、团防，势必逼近桑城，来危害革命的政权。故巩固桑植的政权，保障已得的胜利，也是红军围桑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游击战争中，我们虽未得着什么，而动摇了敌人的战线，使敌人暂时不敢打击我们，扩大了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吸收了一些农民分子加入红军，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到于在游击战争期内的宣传工作，无不尽力去做。文字的有各种标语、各种布告及告湘西工农群众书、告湘西军人书等；口头的有各部的宣传队分途演讲，尤其是士兵委员会的宣传队较有成绩。惟在这次游击战争中，因军事发展太快，纪律多不森严，在西教乡及江垭两处，竟有骚扰平民的地方，这是大大的缺恨，也是我们要加紧兵士训练的大教训。

二、红军回桑后之党务及群众运动

关于桑植的党务和群众运动等。桑植临时县委已有很详细的报告，特为转上，恕不赘。现在有组织的工人已达千余，农民且近四万，这是很可乐观的事，但在群众运动的急速发展中，有不少的错误是应很忠实的报告中央的。

这些错误是什么呢？第一是党的组织没有一个大的发展。虽说有个小小的组织，然而质量上还差得很，以致本党在群众中不能起核心作用，不能使广大群众团结于党的周围。一般工农群众，只在军事努力影响之下，起来粉饰革命，全没有阶级的觉悟，这是一个极大的危险。第二是过去做农运和工运的同志过于幼稚和浪漫，没有工作的经验，把农协和工会弄成了一个空洞的团防式的机关，并用以掩护豪绅的家属。各特派员在[及]执行委员均高高在上，不深入群众，与下层群众脱离了密切关系，甚至一味浪漫，拍卖了广大群众，违反了本党目前争取群众的重大任务，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第三是一般同志不注意党的活动，仅仅机械的做他党外的工作，不留意党的组织上的发展，大家都好象有事不关己的样子，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不去加紧党的活动，这是多大的缺恨。第四各处的农协和工会都没有使群众认识清楚，简直把农协和工会都当着党部，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混淆不清，因之各处农协、各工会的错误多半影响于党，使广大的群众不但对于农协或工会没有正确的认识，使他们的革命情绪低落下去，并且对于本党增加了许多怀疑心理，这是多么痛心的事。第五是对暴动的误解，以为捉了人家一只鸡，烧了一所房子，或没收了豪绅的财产，都是暴动。因为不了解暴动的真义，故在工

作的策略上发生了绝大的错误，如第三区农协执委，视富农为土豪，专去寻私报仇，任意捉人。各区没收地主的财产，只是几个执委和警兵去做，没有号召广大群众参加，而所得的财产亦没有给予农民。又如第二区农协执委事事敷衍，毫不彻底，都是不明白暴动意义所致。第六工会中执委最大部分不是同志，他们的错误尤多，如不加紧工会的组织，只顾捉拿上豪以谋得款等是。

关于以上所指的错误幸经前委一一考察出来，并由桑植县委拟定了新的工作计划，发下了最严重的通告，要求此间同志一致努力完成三大任务，纠正过去一切的错误，急速地发展党的组织，加紧群众运动。我们对于这三大任务的努力，是用铁的纪律处分违反党的纪律的同志（如开除区农协特派员李复初、田益生等的党籍），用教育的方式训练新的同志，此其一。分派县委委员及党的特派员下乡活动，在农村中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并限期成立各区委或支部（如第二区已有新同志二十人），此其二。决定陈叶平为

农运特派员计划一切，并加派较有经验之彭伟、郭天民、刘质吾、郭藩诸同志下乡工作，领导各区农运之发展，此其三。这样的去做，我们敢于自信，错误一定要少些，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一定较有成绩，这是在旬日以来已经观察得到的。

现在说到前委本身和红军中的党务：

前委本身最大的缺点是组织不健全，和对全盘工作没有很好的计划，尤其红军中党的组织非常涣散，党在士兵群众中不能起核心作用，最是一个严重的危机。

关于此间党的组织，我们和董朗同志和鄂西派来之罗正品同志，曾有长时间之讨论，有的主张成立军党部，另设特派员管理地方党务，有的主张如设了军党部，须另设暴动委员会，指挥暴动区域党的工作。这个意见我们认为都是对的，但因工作人员的缺乏，如只建立几个机关，而没有人去指导，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因此，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的组织我们决定暂不取消，军党部暂不建立，而只设团委和特支，直属前委指挥。

前委原只有云卿（书记）、良耀（组织）、一鸣（宣传）、叶平（秘书）、毅夫、统一六人负责，因各人都负有党外工作，以致前委的组织十分散漫，失了指导的作用，对于开会训练及整理纪律等工作，都没有经常的注意，这确是一个大缺点，但目前此间对于前委本身的组织，已有一个新的决议，除云卿等六人外，并决定以董朗同志参加前委，切实的加紧工作，我们的分工是：

- （1）前委书记（云卿）；
- （2）组织兼秘书（良耀因经济委员会已取消，得以专力作党的工作）；
- （3）宣传科（叶平因还有些党外工作要做，无暇担任前委的秘书）；
- （4）兵士科（一鸣因系指挥部党代表，与兵士接近的机会多）；
- （5）外如毅夫在苏维埃区域工作，统一负有军务。董朗亦办军事训练班，故均不能兼顾党务。

到红军党的组织，现仅一团团委（廖卓然负责），四团团委（谭甦负责）及特别支部（不属于团委之各部同志均编入特别支部，以叶平负责）。经前委彻底洗刷之后，组织上较以前要健强多了。

关于党的，我们同罗正品同志谈得十分详细，最好中央巡视员到宜昌时找罗同志谈一次，即能得到此间一切情形，同时我们十二万分的希望中央多多给我们正确的指示。

三、红军的实力及其出路

自入桑后，红军的实力增加数倍，因我们尚在游击的时期中，其部队的编制。当然带有拖队性，故名目繁多，难成建制。兹将各部的组织分述于下：

（一）军部名义仍未公开，仅在军部之下成立一特务营，以贺沛卿同志为营长，王湘泉、刘书田为该营一、二连连长，连军部的马弁，共有长短枪一百余支。

（二）第一路指挥部：

1. 第一团团贺桂如。该团第一营营长罗统一，第一、二连连长涂耀南、田子为。第二营营长廖卓然，第五、六连连长田名贵、唐彬卿。第三营营长向北辰，第九、十连连长周嘉鹏、陈嘉柳。该营、连长均系同志。经此次改编后，组织比较健强，共有长短枪三百七十八支。

2. 第二团团文南浦、党代表吴协仲。该团第一、三营营长李家灼、刘

子青，共有长枪九十支。

3. 第四团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谭甦。该团第一营营长陈栋川、第二营营长戴庆元、特务连连长范松之、先锋队队长沈祝三。该团军事工作人员亦均系同志，因尚欠军事训练，故颇形泛散，共有长短枪八十支，

其兵士群众多系神兵。

4. 第五团团团长伍琴谱、党代表汪毅夫。第一、二、三营营长为谷清轩、唐茂林、王连城。该团第一营系谷海云之基本部队，战斗力颇强。其二、三营系入桑后收编的，组织十分复杂。谷旅之特务连，共有长短枪二百六十支。

5. 补充团团团长胡海云，有枪三十支，胡本人对云卿信仰很好，亦能作战。

6. 补充营营长王慎吾，系王东海之旧部，近与王炳南同志关系亦深，共有枪三十支。

7. 独立营营长刘岸翹，原系大庸康老[屯]乡之团防，共有长枪五十支，红军向庸、慈游击时，他曾参加战争，所以现在他虽未与红军汇合，他的帽子已经红了。

8. 此外尚有很多特动队的组织，如谷梅吾、吴辅臣、姚怡斋等，均有一部分群众。谷梅吾部并有长枪二十支。

(三) 第二路指挥部

该部指挥覃奏章(即辅亟)与云卿关系最深，近来对本党的信仰亦尚深切，他可以号召一部份队伍，现有枪一百支，尚在继续发展中。

(四) 工农赤卫队

该队系由农民警卫队和工人赤卫队合编而成，共有群众约二百人，长枪二、三十支，因近来军事形势日趋严重，故将各区的武装集中起来。

合计以上各部共有武装群众(除长短枪外，每兵均荷有梭标)达四千人，声势之大，确能使湘西敌人发抖。

惟红军亦有以下的缺点，可如下述：

1. 政治的、军事的训练均未加紧，这一方面是工作人员的缺乏，一方面是游击战争的影响。因红军军人缺乏政治、军事教育，故纪律不严，敌友不分，有些行动不能完全照党的策略去做。

2. 军事工作的同志，不懂得客观的环境，往往发生无谓的冲突，致影响其工作不能深入群众，甚至离开了兵士群众。

3. 军队中下级同志与上级同志关系不密切，有时还发生隔阂，因而消极犹豫，甚至还要开小差，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4. 军队中党的教育没有经常的注意，很多新同志还不知道党究竟是什么？

5. 官兵成分非常复杂，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很多，拖队的习气十分浓厚，差不多要做政治工作都十分困难。

以上这些缺点前委久已感觉着，为补救这些缺点，前委有以下的努力：

1. 在农、工会执行委员会中及红军军人中挑选学生一百二十名，开办军事政治训练班，定期三月毕业，适董朗同志来桑，训练班有了专人负责，故成绩尚好，现开学已有两星期了。

2. 改造红军中党的组织，并加紧党内教育工作(已如上述)。

3. 设兵士科，很正确的指导士兵委员会工作(已如上述)。

4. 设法健强党代表、办公厅组织，提高党的威权。

5.在军事有相当稳定时，军队组织还有一个很大的整顿，此间已同罗同志详谈，亦不赘述。

红军此次回桑，于党的组织、群众运动及同志错误之纠正，均有重大的意义，从此努力下去，或不至有负中央的重托吧！

现在说到红军的出路了：

目前的环境是很险恶的，湘西杂色队伍及吴尚部，从慈、庸、永、鹤各路来包围我们，大有立即接触之势。因我们的声威很大，虽敌人的兵力数倍于我，而卒不敢冒然攻城，同时他们的内部裂痕很大，彼此“多心”，指挥既不统一，进击红军亦多非他所愿（其士兵有此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虽大敌当前，我们是不会害怕的。

自然我们的战术也同朱、毛方面红军所指示的军事原则一样，我们对于此一重大的军事，决不冒险，当视敌我力量斟酌，处于或进或退，自当随机应变，请中央勿念！

正报告间又得各方侦探报称：

慈境之马河口，桑境之空壳树、东旺坪，大庸之沿溪坡，均发现大股敌人，前锋系湘西之杂色部队（徐小桐、邢聋子、陈策、朱发生等），跟进者为吴尚所部。同时，永顺亦有陈斗南、顾家齐两团向桑方增兵，以作佯攻。我们为避开敌锋起见，决即抛弃桑城藏兵于洪家关一带之高山，俟探明敌部确实情形时，即择敌之一股而痛击之，如此虽不得全胜，亦不致受敌人的打击。

到红军日前的出路，须待这次战争解决之后始能决定，不过军事的原则是胜则巩固桑植政权，并向慈、庸发展，不胜则在内××或鄂西方面游击，这是一定的。

董朗同志的介绍信，此地无法洗出来，究竟中央对于董同志的工作分配曾有决定否？

中央所指示我们的一切，此间自当遵照进行，同时，我们还希望中央多派工作同志上来，帮助我们，实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 贺龙

注释

原文时间为阴历一九二九年八月八日。

鄂西特委（逸群）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于上海）

（一）组织情形 鄂西合计二十三县（最近由湖南省委新拨南华安三县，不计在内）县委组织健全者为江陵、石首、监利、荆门、远安、宜昌、宜都等七县，公安、当阳以及秭归、巴东、兴山等县过去曾经号召很广大的群众参加斗争现因白色恐怖利害，组织坍台的群众影响根深，恢复自然容易。松滋、枝江、长阳三县均只能成立特支，其他施鹤七县因交通阻塞合共亦仅六七十个同志，仅有同志而无组织，尤其是大中两校划分更不能开会（此划分问题大中两校特委争论很久，大学主张暂不化分，中学主张划分，结果中学主张根据中央通告“中学组织独立”只好由他划分，但事实大中都不能开会了），既不能开会如何能发展组织，民群方面凡有党的组织之处均有民群组织，宜昌以下各县均有农民委员会之组织，宜昌以上则有神兵组织，惟神兵乃鄂西有历史之组织不过党派同志去领导他们做经济斗争而已，合计党员约二千人（CY在外，南华安在外），农民成分占百分之八十，其余为知识或半知识分子，城市工人则微乎又微不过十余人耳。

（二）城市工作 过去特委对于城市完全放弃实是求是错误，鄂西之宜昌为川鄂之要道，政治上非常重要而交通亦极便利，工人数量亦有三四万人。沙市为鄂西重要商场，工人亦有万余，藕池为湘鄂要道，商业亦发达乃过去特委在宜昌无机关所有归兴巴松滋枝江宜都的工作，均交宜昌县委管理，而宜昌县委本身又不健全，且同志派别分歧故宜昌城市工作完全没有原来本城同志亦纷纷的退出或反动。阴四月初旬，特委大半负责人牺牲，逸群由石首赶至沙市组织临委，并决定迁至宜昌，五月下旬省委才到宜昌正式改组，特委才正式决定注意城市工作，沙市工运最近才稍有线索（老同志才找到）。藕池虽亦注意但无力顾及最大原因是经济困难因为工作非有相当的经济不能进行。

（三）土地革命 在鄂西仅仅做到没收大劣绅地主之土地，而未能分配，巴东虽然拿到两个多月的政权，亦未能实现土地革命，此是鄂西过去工作之严重错误，现特委已通告各县无论一乡一村亦实行分配土地，不过这问题不是容易解决的。过去因为与上脱离实在不知如何分配法，如说耕者有其田，则包办到因为大土地主已逃跑或被杀死，其上地自然为耕者有（原来就山地主分配给农民耕种）不必在经过没收而又分配之，此会请中央详细指示

（四）军事行动及军事力量 当湘鄂战争时，鄂西军事在公安有枪四五百枝成立四师，参加军事行动的农民亦有数千随后，因清乡军严重压迫仅拖出五十余枝到石首。敌人继续又到石首清乡，适逸群正抵石首。乃率之拖到监利与鄂中武装会合于洪湖，解决峰口之敌，缴得枪十余枝。又继续与团防作战，缴得枪十余枝。逸群赴沙市时乃分为三起共编为一大队一特务队，大队下分三中队第一中队到华容，第二中队到监利，第三中队到石首，特务队（以驳壳枪组织之）最近拖到江陵上游，仅宜昌有连枪四枝编为特务第二队，现在宜都行动，最近宜都又拖出四十三军一部份有七八十枝，现在长阳五峰一带，逸群来时，曾几次派人去联络未得回信，亦未接到他们正式报告仅派一小孩来说他们拟解决五峰团防现在不知如何。

（五）秋收工作 省委通告要我们准备秋暴，特委对此问题曾详细讨论。如各军阀起了混战鄂西下游各县，可以号召很广大的群众起一个大暴动，

如照现在这样敌人正在有计划的清乡，我们的组织尚难保存逞得其他。故目前鄂西工作只能引导群众做小的经济斗争而已。

(六) 要求

(1) 与中央切取联络 鄂省委随时在被破坏，自然对于特委的指示随时间断，以后如能与中央切取联络则可由中央找省委由省委又可找特委，方不致如以前有半年不能接头之危险，并要求中央以后无论何项通告均直接寄一份到鄂西俾得早睹为快，又可减少省委许多危险。

(2) 津贴 过去鄂西不得省委津贴并送万余元给省委，此时如特委仍照以前一样不要城市不愿全部工作则亦可以不要津贴，如军阀军队稍有行动交通，可以恢复下游各县存款，可以送到沙市亦可以不要津贴，但此时上级命令又要加紧城市顾及全部，而又当白色恐怖严重交通不便，则特委势必要省委津贴。我们最低限度的预算每月三百元(交通费办公费一百五十元，生活费房租在内一百五十元)，宜昌机关四个，沙市两个，郝穴一个，共七个机关，如少了则万万办不到，而省委只允许二百元，假如是做生意我要三百元他还二百元早已成功元奈我们不是生意，二百元实在办不到，也是无法啊。董朗关于湘鄂西一般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中央：

我奉你们的命令后，约经三月到达湘贺同志处，但是我的工作和任务都未向我说明，你的介绍信也未向我说明，现信无药水洗出来。兹将沿途经过列后：

一、在宜昌因交通不便，故暂留宜，因住宿地点困难。

二、逸群同志来宜，托以监工作，到沙市已失败了，被谭道源全师包围，交通[更]不通，故未达目的，但所[印]象如下：

1. 退守分散政策与广东东江失败情形相似，洽合敌人封锁，使内部分划[化]，最后施以白色恐怖，尤其是埋枪主义为更不可靠。

2. 无军事中心人才，军纪党纪分别不清，形成一种散涣无政府状态。

3. CP 与 CY 工作不清，并有 CY 在军队中可以把他的群众带去另树一帜。农会也可以在军中也有带去他的队伍。这些自由行动我看在暴动的指挥上成了一重要问题。

4. 指挥官和党代表的工作权限不清，已[以]后[有]随时冲突之象。

5. 他们是像割据固守的形势，没多大游击[的]性。

以上问题都有于失败上大有关系。

三、长阳因在组织上有许多问题未解决，宜委派我去参加工作，中途又得失败消息，因他们在军事上很忽略，故受损失很大。

四、湘西是拖滩在割据的局面，我们部队中的组织和对外的工作，尤其是工作很成问题。

关于湘西和鄂西工作详情，自有党负责的详细报告，不须我详述。

中央，如果你们有党的工作人才或军事工作人才，请多派人，湘西是很需要的。

董朗

中国共产党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工人、农民、士兵及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群众们：

强盗式的帝国主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爆发了！帝国主义军阀积极进攻苏联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祸摆在目前了！国民党的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指示之下，又爆发军阀战争了！鄂西民众的灾祸，又压到头上来了！中国共产党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个时候开幕，自然更加重其意义！

本党早已明白的宣言，国民党已经代表豪绅资产阶级走上反革命道路，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现在我们看国民党之下，把由工人群众所收回的汉口、九江租界，奉还帝国主义：出卖济案、宁案、汉案，出卖航空权于英；极残酷的剥削工农，造出整千整万的饥民；剥夺民众一切自由，两年来，屠杀和监禁的革命群众达三四十万人，等等，这都是国民党所做出的功绩；成其是在帝国主义指示之下，借中东问题进攻苏联！

鄂西更是在国民党杂色军阀统治之下，各地豪绅地主、资本家、军阀总是在互相勾结，对我们工农劳苦群众作极残酷的剥削，月捐、门牌捐、枪烟捐、百货捐、地捐、房捐、灶捐、印花捐、屠杀捐、军用电话捐、军事招待捐、情[清]乡捐、警捐、被火捐、亩捐、庚帖捐、钱粮附捐、夫捐、寒衣捐、被窝捐、办党捐、小菜捐、路灯捐、牌照捐、丁口捐、木捐以及各种库券，几千万不兑现的纸票等等都是要在我们身上括[刮]出。年来收成不好，而豪绅地主更加倍的收租加庄，结果，使得城市商人歇业，工人失业，农村经济更加速度的破产，造成一片赤地，饥民载道，这是我们所最不能忍受的痛苦！

今年上[半]年，国民党的蒋桂军阀战争，所给予我们的灾祸尚未了结，而现在又爆发了蒋冯军阀战争，鄂西地方已经又做了军阀战争的战场。拉夫、筹饷、封船、封马[码]，军警戒严、逃兵验据，交通断绝，运输阻隔，金融益加恐慌，物价益加昂贵，甚至工厂停工，商店关门，使工人失业，贫民苦上加苦，在农村中更是普遍的遭受军队的蹂躏，遭受枪炮的危险，房屋被焚烧，财物被抢劫，弄到妻离子散，家散人亡。这些一件一件的灾祸，都已压到我们的头上来了啊！

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群众们！国民党的一切欺骗宣传，在年日的压迫剥削当中，在几次的军阀战争当中，已经在我们面前打碎[碎]无余了。国民党的任何一派，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都是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压迫者，都是毫无人道的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都是民族解放的障碍。最后国民党之受帝国主义的指使，借中东路问题，向工农专政的苏联进攻，更证明其无耻的反动。我们一定深切的认识，要得到解放，必须以革命斗争的力量，举行总的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根本消灭军阀战争，建立自己直接管理的苏维埃政权。本会依照本党所决定的革命政纲，号召全鄂西工农兵士贫民群众一致联合起来，向统治阶级作坚决的奋斗！

农民们，统治阶级已经驱逐我们走入鬼门关，我们要一致转掉过来，团结起来，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拉夫筹饷，反对加租加庄，反对军阀战争的骚扰，反对不兑现的纸票，反对复验红契，举行饥民斗争，在各种斗争中聚集的力量，准备武装暴动，推翻豪绅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没有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达到最后的胜利。

兵士团士群众们！我们以前不都是工人、农民吗？怎样受地主、资本家

的剥削压迫和欺侮，怎样受军阀、民团的屠杀，怎样的破产失业，不得已而来当兵士、当团士，这些惨痛的事，决不要忘记。进了军队以后，又变成军阀豪绅的奴隶，做了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官长的压迫虐待不算，还要克扣军饷，自己零用没有，父母妻子只有在家里挨饥，受家乡豪绅地主的压迫，这些都是我们忍不住的事实，现在又要开到前线上去当炮火了！战争的结果，官长升了官，发了财，或是跑到外国享福，只剩有在战场上几堆兵士尸骨，××存在的，不过还是一根长枪。兵士团士们！我们要醒悟过来，反对克扣军饷，反对打骂兵士，反对进攻苏联！反对打红军，反对军阀战争，不替军阀当炮火，打死自己的反动长官，跑回农村去，参加革命暴动，打倒压迫我们的豪绅，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推翻反动政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永久的幸福！

一切贫苦小贩、学生和一切手工业者！这样万恶的统治阶级，加重苛捐杂税的搜括，剥夺一切自由，要实行争权夺利的军阀战争，就要清乡戒严，霸占学校，强提学款使得市面萧条，全无生意，现在的世界，士兵是比吴佩孚的时代还不如了，我们不要希望别人来解放自己，还要大

家团结起来，领导坚决的斗争，反抗苛捐杂税，反对库券，争取一切自由，实行罢市罢工的示威运动，参加工农兵的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工农兵士贫民自己管理的苏维埃政权，然后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

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群众们！我们决不要希望别人来替我们解除痛苦，蒋系、冯系是一样的军阀，国民党的改组派是一样的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我们不要受任何敌人的欺骗麻醉，我们的利益，只有我们自己的力量才能把得，我们的痛苦，也决不要幻想别人来替我们解除！

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群众们！英、日、美、德、法各帝国主义都是制造军阀战争的后台老板，然而苏联是工农专政的国家，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帝国主义认苏联为死敌，我们要打倒各帝国主义，必须要拥护帮助中国民族解放的苏联！

本会明白的告诉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们！在强资式的帝国主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爆发当中，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积极进攻苏联当中，在军阀战争已经爆发，瓜分中国之祸迫在目前的时候，大家还不起来作坚决的斗争，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消灭军阀战争，那末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了！工农兵以及劳苦群众们！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斗争才是解放的出路。

本会提出下面的口号，号召全鄂西工农兵以及劳苦群众，为这些口号的实现作坚决的斗争！

反对减少工资，增加工作时间！反对加租加庄！

实行土地归农民！反对拉夫、筹饷、封船、封马[码]！

反对官长的压迫虐待！要求发清欠饷，军需公开！

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

废除一切税捐，实行统计表一累进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

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阶级战争！以工农兵武装暴动消灭军阀战争！反对军阀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工农兵贫民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鄂西第二次代表会万岁！

中国共产党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

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

*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一、党的政治任务

(一) 革命运动的现象形势：

1. 全国革命的形势：

(1) 国际形势日益紧张起来：六次大会即指出世界革命日益紧张。一年以来，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更加稳定，西欧工人阶级的左倾，殖民地民族运动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统治根本发生动摇，因此，帝国主义列强进攻苏联的危机便日益紧张起来。如指使波兰进攻俄境，拉德加入反俄战线，以及嗾使中国国民党籍[藉]中东路问题，而向苏联挑战，都是很明显的事实。虽然帝国主义相互间包含着许多矛盾，未能马上向苏联宣战，但他们在积极准备进攻苏联当中，同时拿着准备进攻苏联的旗帜，来掩护他们彼此间准备世界大战和瓜分中国的阴谋。这些危机却是一天天的加深，必不免于爆发起来。

(2) 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的冲突，造成国民党军阀不断的战争——各帝国主义，尤其是英、日、美三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国市场扩张势力范围，各自找着一军阀做他们的工具。中国近来历次军阀的战争，都是他们在后面主持，蒋桂、蒋冯战争以后暴露军阀的根本矛盾。这次反蒋的战争，就是其中的一幕，而且这些矛盾，国民党永远没有办法解决。军阀战争只有更加扩大和延长。

(3) 国民党任何一派及谭平三第三党都是一样的反革命：蒋系桂系固然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反动阶级的代表、屠杀群众的刽子手，改组派和第三党也是一样的反动，没有丝毫革命的作用，他们虽然在群众中散布一些改良主义的影响，但中国的经济基础根本没有实行改良主义的可能，仅只是一种欺骗作用，群众的革命斗争，决不是[能]因此而和缓下去。

(4) 群众斗争的发展，是新的革命高潮的重要成份：各地工人阶级的斗争，已不仅限于经济要求，而是向着大的政治的方面发展，农村斗争普遍都是活跃的形势，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亦有相当的发展，这些现象，都是这一新的革命高潮的重要成份，固然还不能夸大这些现象，断定马上就有革命高潮，但的确是革命高潮的形势。

2. 鄂西政治经济状况与革命形势：

(1) 帝国主义在鄂西的势力的增长，军阀战争的扩大延长成为促进经济破产的速度日益加剧的主要成份：湖北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中心之一，尤其是沿长江流域的各县，帝国主义势力日益增长，更是一个严重的现象。鄂西为川鄂两省交通上、政治上、商业上重要地位，便成为帝国主义在鄂西发展势力的主要部分之一。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冲突，便只成为制造军阀战争主要条件之一。所以帝国主义的矛盾，同时反映着军阀战争的特别利害，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军阀战争的惨祸，更加上天旱水灾、捐税、土匪等，都成为造成鄂西经济破产的主要成份，尤其的军阀战争的扩大和延长，继续不断的爆发，使帝国主义者势力在鄂西日益增长，商船增多，货物直装出口，将转运性质的市场，变成为单纯的停泊码头。在沙市方面，虽有打包厂的建设，以及还在建筑的榨厂、纱厂，使沙市市面表示一种活跃的现象，实际上完全

是帝国主义的投资，利用当地廉价劳力，将原料品在当地加以制造，以增高其剩余价值，同时农村中的家庭手工业者，便因此大批甚至整个的破产，跑到市场去做工，沙市之整个倒台，市场萧条，商业停滞，捐税繁重，税收减少，这些都是证明帝国主义在鄂西势力增长与军阀混战的影响，更使鄂西经济破产的速度日益加剧。

(2) 改良主义在鄂西绝少继续发展的可能，豪绅地主阶级仍然是占着优势：帝国主义又在鄂西的增长，以及军阀战争在鄂西不断的爆发。城市农村经济破产的速度日益加剧，劳苦群众的痛苦，受压迫剥削日益加深，同时革命的要求只<有>日益迫切，反动的统治阶级在蒋桂战争时，刘和鼎第三师去鄂西当中，鄂西统治完全掌握在豪绅地主阶级手里<如宜昌水陆检查处和治安委员会的组织>。张发奎第四师来鄂西后，改良主义的宣传，便表现着活跃形势，改良主义的宣传机夫，商报的出版，宜昌黄色工会的组织以及各县县长的更换与市政委员的组织，在各地均有改组派的活跃、虽说没有群众，而欺骗民众的宣传，多少在群众中发生不少的影响，虽说他们不能解答劳苦群众革命的要求，然而小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幼想，仍然有相当的笼罩，同时群众的斗争渐趋活跃，改良主义的欺骗政策，更会葬死在群众一切斗争中。加以反蒋战争发生，张发奎的离开，鄂西统治阶级的形势又从新恢复到蒋桂战争时代，并且形成各县统治阶级更走到了联合一致的行动，如包围清乡政策，正是鄂西豪绅地主阶级在统治阶级内部仍然占着优势的强有力的证据，但在这里我们绝对不是说改良主义在鄂西政治没有相当的作用了，而是说他在鄂西绝少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同时我们也绝对不能说，统治阶级中调和一切完全没有矛盾存在，而只是说反动势力对革命势力始终是联合一致的，其内部的矛盾仍然存在而且日益尖锐。

(3) 屠杀政策是统治阶级镇压革命势力的主要方法：鄂西的经济、政治状况，既如上述，民众革命的客观条件，无疑义的更形尖锐和统治阶级的崩溃恐慌，同样成正比例的严重，统治阶级在张发奎改组派在鄂西掌握政权时代，虽曾做了许多改良主义的工作，如党自首和不杀农协会员，只杀共党等欺骗民众的政策，到现在已经件件的群众斗争中完全暴露其假面具了。尤其是对赤色区域的包围清乡，与清乡的残暴烧杀，这都证明了屠杀政策仍然成为镇压革命势力的主要工具。

(4) 革命高潮，仍然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革命的根本矛盾，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日益加深。石首、监利、沔阳的赤色区域至今犹能保存，各地群众斗争，近又极为活跃，如沙市工人的经济斗争，日益爆发，松枝宜<都>的饥民斗争成千成万，归兴巴[东]的神兵，抗捐、抗税、反对驻兵，鹤峰农民反抗保卫团武装冲突，长阳民众进攻县城，杀戮县长，此外因军饷积欠，待遇不良，军心发生摇动，造成不断的兵变，宜昌北乡的秋收斗争，以及其他各地的各种自发斗争的不断，这些根本矛盾，不但不能解决，而且日益加深，革命的高潮必然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

(5) 但还不能作过分的估量，要靠我们斗争的力量来推进：大会认为还不能作过分的估量，因为这些现象汇合起来，还不能成为真正的高潮。同时豪绅地主的力量还很强大，可以镇压革命，主要的要看我们艰难困苦的斗争，坚决运用正确的策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来推动这一高潮的迅速到来。

二、过去工作的检阅

(一) 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及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大会认为过去

工作的失败，固然在客观上有许多困难，但主要的是党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瓦仓和公安、长阳的军事投机，瓦仓第二次暴动和龙湾之盲动主义，松、枝、宜都的等待主义、尾巴主义和命令主义，……宜昌北乡忽略群众力量不坚决领导斗争，兴山对兵变策略的错误，这些斗争的失败，不是断送于机会主义，便是断送于盲动主义，或是断送于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中和用的策略不正确所致。这些错误和倾向，的确使革命受了极严重的损失。

（二）城市和乡村的工作，不能配合的发展：鄂西过去工作只有农村工作，根本说不上城市工作。始终是农民孤军奋斗，得不到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更不能与兵士运动相适应，敌人得以握住城市，把我们各个击破，因此胜利不能扩大和持久。以乡村包围城市的办法，无疑义的是错误的。

（三）忽视日常斗争：盲动主义的残余没有肃清，以为不动则已，一动则暴，看不起小的日常斗争。甚至说日常小的斗争没有意义，或不（？）可说是理想的，这是造成单纯的军事行动，个人英雄式的领导，盒子炮主义的根本来源，也就是脱离群众不能发动广大群众的主要原因。这一倾向，到今尚包含在党内。

（四）忽视反帝运动：反帝是党的任务之一，但在各地已成一般的忽视，认为反帝没有具体的表现，而不知反帝是可以联系当地许多事实，这是错误的。

（五）农民运动策略的错误：对过去农民运动策略上的主要错误，就是对付富农的问题，鄂西各地的富农，多带着半地主性剥削雇农和贫农，虽然在反捐税、反豪绅的斗争中，他们也曾参加，但随时随地表现出他们的妥协和动摇，最后便跑入反革命的营垒中去了，过去党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没有坚决的领导雇农、贫农对富农的斗争，往往还有迁就富农的错误观念。

（六）没有实行土地革命政纲：土地革命是目前革命阶段上主要任务之一，是彻底推翻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的主要工作。但各地的党，尤其是赤色区域的党，没有实行这一任务之一，甚至完全忽视这一任务。在各地的斗争当中，关于焚烧豪绅地主的田契、约据、债券等类的工作，都没有充分的做。

（七）地方主义的束缚，使赤色区域和红军不能扩大：农村的党，保守观念非常浓厚，狭隘的地方主义，使赤色区域停顿在保持的状态当中，不能向外扩大。由斗争中生长出来的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各县的红军，也因受农民意识的反映，不正确的运用游击战术，无限制的扩大起来。

（八）党与群众组织的不正确：上游各县普遍没有群众组织，间有一点群众组织的范围，反退缩在党的范围以内来了。因此各地的党实际也就是群众组织，包括的分子，多不是最积极、最勇敢、最觉悟的>真正无产阶级的战士。下游各县，虽然有广大的群众组织，却又形成以党包办群众组织或以党代替群众的组织的错误。

（九）对青年运动的忽视：在鄂西青年运动是很消沉的，这固然有许多客观上的困难，然而党与团的关系不好，形成一般的忽视青年运动。

（十）三月扩大会议的决议没有普遍的传达到各地，实际运用到工作上去：特委三月扩大会议，是为推行六次大会的决议而召集的，会议上虽有一些好的决定，但未能普遍传达到各地实际运用工作上去。

三、目前党的总路线

1. 争取广大群众与加紧武装暴动的准备：大会认为目前党的总路线，仍

是发动日常斗争争取广大群众。党应利用一切阶级的冲突，去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斗争，争取在自己的周围。同时在目前革命形势的转变当中，“以群众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和“武装拥护苏联”现在虽还是宣传口号，到了群众革命斗争高潮，便直接转变为直接行动口号。所以我们今天就必须认识这一可能的前途，在积极的发动日常斗争，争取广大群众，与坚苦的作武装暴动，各方面的准备，向着这一前途汹涌的发展。

2. 工农兵的配合发展与联系：由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农村斗争必须与城市工人相呼应，游击队与各地的兵士运动，必须与工农斗争有切实的联系。只有工农兵运动的汇合，武装暴动才有实现的可能，党应尽可能的加紧配合发展，以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同时要防止无计划的盲动。

3. 反对党内一切政治错误倾向：

(1) 是革命失败情绪的反映，消极、失望、恐惧斗争，结果走入取消观念或和平发展：

(2) 是不顾群众，不顾敌人的力量，盲动瞎干，结果有盲动的危险。

(3) 是农民意识的保守观念，大会认定这三种倾向，都是足以妨害党争取群众的正确路线，并认定反对这三种倾向，是反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继续，鄂西党必须坚决执行。

四、党的任务

1. 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是党在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党应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反对军阀战争，这不仅只做一些宣传工作，要从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中，向着武装拥护苏联，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的前途，积极准备。

2. 强健党的组织——目前党组织上最严重的问题，是建立无产阶级基础的问题，党应集中力量向着重要城市和工人区域发展。农村工作则应向穷乡僻壤渐次转移到近郊大道、重要村落。组织的发展须特别注意质量，支部生活要从工作中、斗争中建立起来，这是一经常的工作，党应继续不断的坚决去执行。

3. 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加强城市工作：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的中心，可以支配乡村的一切，虽然这是比较长期的艰苦工作，党必认识城市工作不起来，乡村决难得到胜利。目前党应调集大批得力同志到城市中去工作，首先便从强健宜昌、沙市的工人着手，同时要积极领导城市贫民反苛捐的斗争，学生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作反帝、反军阀的争取自由斗争，只有中心区域工作起来了，才可以影响别地。

4. 建立赤色区域的工农政府，实行土地革命政纲：大会完全同意中央的决定，建立石首、监利、沔阳几县赤色区域的工农政权，号召广大群众起来管理和拥护这一政权，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政纲，同时用各种方式向赤色区域以外的群众广大的宣传，使这一政权的影响，更加向外扩大。

5. 发展群众武装，扩大红军组织：目前革命形势的转变，更加重了党的军事任务，党必须有计划的发展群众武装，扩大红军组织，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加入红军，并经常在群众中作加入红军的扩大宣传，这是扩大赤色区域，保障革命胜利必然条件，并要逐渐向中心城市进展，极力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6. 建立反帝工作：反帝工作在各地尤其是在宜、沙，应即建立起来，斟量当地情形，联系许多事实号召广大群众，加紧反帝运动。

7. 巩固雇农在农村斗争中的领导权：农民协会的组织应该尽量扩大，雇农、贫农是农协的基础，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在原则上拒绝富农加入农协，雇农必须单独组织雇农工会，党应极力发展其对富农的斗争，提高雇农的阶级觉悟，使之成为反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的最积极的战士。同时雇农应加入农协，在农协中起领导作用。

8. 建立经常的宣传鼓动工作：宣传鼓动工作是党争取群众的武器，各级党部应有健全的宣传机关，经常有计划的执行这一工作，依据六大会议的十大政纲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反对军阀战争，并联系到当地实际口号，用各种方式在群众中作经常鼓动宣传，在赤色区域内，应召集群众大会，示威游行，更是必要。

9. 动员全党努力兵士运动：兵士运动不是军委或少数人的工作，是每个党员的任务。各地党部要找出接近兵士的方法，设法打入敌人部队中去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兵士群众的斗争，争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这一工作特别要注意打入敌人主要部队的主要部门。

10. 在工农运动中去扩大妇女工作：在革命斗争中，妇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各地农村的斗争，妇女会表现出很大的力量。党要在工农运动中去扩大妇女运动，争取广大的女工农妇群众参加革命。

11. 党要认识青年团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加紧对团各方面的帮助：青年团是党在青年工农群众中的组织，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是党最得力的一个助手。党应加紧对团各方面的指导和帮助，争取广大青年群众在团的周围。

12. 建立济难会的工作：济难会是表同情于革命群众的阶级组织，他是普遍革命斗争影响到群众中去的最好的群众组织方式。他可用群众的同情鼓励参加革命的群众的情绪。党应指导其用各种方式、各种名义，在各种斗争中，发展济难会的组织，扩大党活动的范围，帮助党争取更广大的群众。

13. 接受中央对鄂西目前工作的决议。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对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及其工作的决议，认为这一决议完全正确，而且是本决议案的基础。这两项决议案，应同时为这一时期一切工作的方针。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原文如此。

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鄂西党的组织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一、过去党的组织状况

没有健全的组织，便不能执行正确的策略和政治路线，也就不能征[争]取和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这一问题是鄂西党目前最迫切、最严重的问题。过去党在组织上，其主要的现象是：

1. 无产阶级的基础薄弱：宜昌、沙市的工作，非常薄弱，其他的城市更等于零。乡村党的基础没有建立在雇农身上。总括起来说，工人成份不到十分之一，整个的党完全是农民，而且非无产阶级意识充满党内。

2. 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不正确：上游各县很少群众的组织，群众组织的范围，反退缩到党内。下游各县非[以]党包办或以党代替群众组织。

3. 没有支部生活：一般的支部都没有经常的工作，甚至连开会、缴费都办不到，自然不能起核心领导作用。

4. 没有抓住中心区域的工作：党的发展多系听其自然。在主观上，并没有抓住中心，集中人力、财力的做，因之一般的组织都退避到穷乡僻壤，专门去找深山和大湖。

5. 不注意教育训练工作，以致党员的政治水平低落：教育训练工作，成为一般的缺点和忽视，所以大部的党员对政治认识和党的策略，都是莫名其妙。下层许多的积极份子，也无从培养成为好的干部。

6. 地方党部都不健全：各地地方党部不能独立工作，组织日渐松懈，对工作不能推动，各级组织都不健全。

7. 各级指导机关都不集体化：一般指导机关，很多是不了解集体化的原则，对于工作分配到下级党部，指导没有集体化。

8. 旧的工作方式仍有少数保留：许多地方，革命条件非常之好，但因为命令主义与委派制度遗毒，发现了不少的工作困难，这些旧的方式仍然保留在党内。

9. 党员对党的观念不正确：很多党员以为入党是解决生活问题的，或者以为马上就有特别权利可享，完全不了解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份子，是为全阶级利益而斗争的一种结合。

10. 形式主义的提拔工农：提拔工农参加指导机关，多是形式上的点缀，不能引导其发表意见，帮助其实际做指导工作，结果是徒挂一块招牌。

11. 不注意建立巡视工作：过去特委与各县委都未注意巡视工作，党的策略不能正确的传达到下级党部，运用到实际工作上去，下层党员意识也不能正确的反映到上层来。

12. 没有发行分配工作：各级党部以为发行分配工作，是很简单的技术工作。我认为是宣传工作的一部份，没有把党征[争]取群众的刊物，经过组织路线散布到群众中去。

13. 忽视秘密工作：农村的党，尤其是赤色区域的党，不注意秘密工作，一般组织差不多完全公开了，指导机关开会，非党群众都可旁听。

14. 党与CY的关系不好：没有在工作上建立正确的关系，彼此对立，互相取消，或仅发生外交与经济的关系。

二、党内一般不正确的倾向

照以上十四点看来，鄂西的党还未成布尔什维克的党，自然反映出许多

不正确的倾向：

1. 极端民主化：一方面党内部的民主生活并未发展；而另一方面却发生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如一律平等、自由，选举不信仰上级等，这完全是了解布尔什维克民主集中的原则，不知目前白色恐怖的严厉和党内无产阶级基础的削弱。民主的限度应当缩小。

2. 惩办主义：执行铁的纪律，完全不带教育性，也没有说服的精神，变成呆板的惩办主义

3. 雇拥革命观念和不了解职业化的意义，党员很多脱离生产，要党维持生活，变成雇拥革命的观念。谈到职业化便是要做生意，或以为职业化就是专门解决生活问题。

4. 右倾的取消观念和不动主义：革命失败情绪的反映，消极失望，畏惧斗争。形成取消观念，取消组织，取消斗争。主张和平发展，保存组织。

5. 党内和平观念与闹个人意气：为要求党内和平，免内部发生意见，连自己的批评，都不能公开举行，大家马马虎虎的混下去。另一方面是不站在工作的观点上，互相攻击，闹个人意气，造出许多无原则的纠纷。

6. 工农份子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各地工农工作，尤其是赤色区域的工农同志，有些变更本来面目，处处讲求漂亮，并且在工作上、行动上表现出不积极、犹疑畏缩，以及表现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是很危险的。

7. 腐化倾向的危险：无论赤色、非赤色区域的同志，都有些腐化倾向的危险，如浪漫、怠工、爱漂亮等。

8. 忽视城市工人对农民的领导作用：一般的忽视了城市工人对农民的领导作用，以为只要乡村割据了，城市便不成好多问题。

9. 地方主义：牢不可破的地方主义，尤其在农村组织上表现得更厉害，各县与各县自不消说，就是各区与各区，也要分彼此界限。

以上这些不正确的倾向，在党内还在日益猛进伸张。很足以妨害党的正确策略和组织路线。大会号召全党同志起来予以坚决的奋斗。

三、旧的基础的改造与新的基础的创造

1. 积极方面的，从教育方面克服组织上的弱点：各地原有组织毫无疑问的是不健全，但我们不能完全归咎于党员成份的不好，乃是由于过去组织路线的错误，与教育训练的缺乏。要知在下层组织中，当然有些不少的积极份子，党应绝对不要走入取消观念，要积极的去教育他们，训练他们，发展党内讨论，提高他们理论和政治水平线。来克服党的组织上弱点，纠正党员不正确的倾向。

2. 在工作中，斗争中，洗刷消极、动摇的份子：一部份消极、动摇的份子保留在党内，反使党的组织松懈，没有别的好处，但我们不应该主观的去大批洗刷或整个不理，必须在工作中、斗争中，把不接受训练、不努力工作的份子洗刷出去，这是一经常的工作，要继续不断的去执行，决不是如江陵、监利的幻想一劳永逸的办法。

3. 党员职业化：只有深入群众，才能接近群众，站在群众外面，总是望着没有办法的。党应指导脱离生产的党员打入群众中去，尤其是打入主要工人群众中去，取得社会职业，了解群众的生活，领导群众的斗争，同时可以消灭靠党生活、脱离群众的现象。

4. 创立新的基础，特别注意质量的发展：要创造布尔什维克的党，单是

靠党整理旧的基础还不够，主要的是要以很大的力量创立新的基础。特别注意在宜昌的海员、码头、车夫、邮政，沙市的码头、打包厂、车夫以及各重要城市的手工工人群众中，建立党的组织。农村的党，注意向雇农群众中发展，不只是在数量上凑热闹，要求质量的增加。

5. 在斗争中去发展组织：党的发展，一定要注意在斗争中最积极、最勇敢的份子，增加党的斗争力量。但不要把所有革命的群众都拉进党来，同时须注意群众组织的建立，并要注意培养新的干部，以充实各级党部。

6.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涵义：一部份当然是指无产阶级的份子，如城市的工人，乡村的雇农；一部份是指无产阶级的意识，即所谓无产阶级化，并不是除了发展工人同志外，便谈不到党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自然主要的是要积极发展工人同志。

四、中心工作与各区工作的布置

1. 确定组织的中心：所谓中心，是指在政治上、经济上、交通上、军事上占重要的地位，和工人比较集中或主观力量较强的区域。因为这些工作起来了，可以影响别地。党应集中力量去谋发展，最主要是宜昌、沙市，其次为藕池、监利、新堤、沙洋、仙桃、岳口。以县来说，则为宜昌、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沔阳、荆门各县，当阳的观音寺，秭归的香溪，长阳的沧（？）水、清江河的划夫，通施南大道的脚夫很多，党也应加以特别注意。

2. 建立中心县委：鄂西区域辽阔，应建立几个心县委，帮助特委指导和联系各县工作：

- (一) 宜昌联系远、归、巴、兴、长五县；
- (二) 荆门联系：钟祥、天门、潜江、京山各县；
- (三) 南县联系：南、华、安各县；
- (四) 监利联系：沔阳、石首、公安、江陵、松、枝、宜、当阳各县。

则与特别发生关系（？）特委特别注意健强这几个县的县委，并要经常派巡视员指导各地的工作。

五、建立支部生活

支部是党的基础，是党在群众中的核心，没有健全的支部生活，便没有健全的党。这一工作的建立，首先要从中心支部入手。

1. 党员最低限度的工作：支部内的党员要认为自觉为党工作，到会、缴费、介绍同志、讨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同志和接受批评、宣传和组织群众、参加和领导群众的斗争。

2. 健全支部干事会：支部干事会，要以支部内最积极而有威信的同志担任，尽可能的实行选举权。干事会的同志顶好不兼组长，以便训练其他同志。干事会对上级的策略和决议，须要事先详细讨论，分途参加各组会议。每周应有工作计划，分配和督促各同志的工作。

3. 改善支部会的内容：

- (一) 会议上要引导每个同志尽量发言，防止参加人、主席包办；
- (二) 参加人不应作长篇不关痛痒教育式的报告；
- (三) 支部应当个别谈话，考察每个同志的错误和缺点，提出具体问题来讨论；
- (四) 参加人报告后，应在他报告当中，提出问题来讨论；
- (五) 讨论问题，要把发地实际问题，应用政治路线和总的策略与党的策略联系起来；

- (六) 多注意实际工作的方法和运用的讨论；
- (七) 会议的时间不要过长，最好是不超过两点钟；
- (八) 发言要集中，讨论要抓住中心；
- (九) 批评要侧重在工作的方法上；
- (十) 每个工作要做工作报告。

4. 支部的教育训练工作：

- (一) 训练同志应当是启发式的，反对注入式的办法；
- (二) 多讨论党的策略；
- (三) 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 (四) 由实际问题上去了解；
- (五) 特别注意中坚份子的训练，多与谈话，多召集活动份子会或办短期训练班；
- (六) 在每人工作中、斗争中去训练同志；
- (七) 特别注意个别谈话；
- (八) 特别注意技术工作的训练。

5. 一切工作归支部：

- (一) 宣传工作的基础；要建立在支部上；
- (二) 支部要建立发行、分配工作，传达党的通告、文件、刊物等到同志中去和传达党的政治影响到群众中去；
- (三) 有计划的去领导群众的斗争，建立新的组织；
- (四) 重要的工作，支部要定出具体的方法，指定同志专门去工作；
- (五) 要在当地的群众组织当中，起核心作用；
- (六) 要经常向上级党部作工作报告。

六、健全地方党部及其工作

1. 建立强健的指导：地方党部要有中心支部最积极而有威信同志参加，坚决从下层组织中，提拔新的积极的工农同志加入指导机关，并领导其实际做指导工作。经常要有工[三]人负责，建立集体的指导。
2. 改变旧的工作方式：委派制度、命令主义、恐怖政策、惩办主义等，都是国民党的工作方式，必须坚决的改正过来。各级指导机关，应

尽可能的实行民主选举，各种决议，须在下级党部引起热烈的讨论。使之彻底了解，易于执行，但须防止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各种问题，要注意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当采取单纯的恐怖政策。铁的纪律，绝对不能忽视，但要注意说服精神，执行纪律一定要带有教育性。

3. 特别注意中心工作的建立：地方党部要集中力量，去建立中心工作，直接帮助中心支部的工作，指导党员职业化，打入主要的群众中去。

4. 对上级的策略和指示要有充分的讨论：对上级的策略和指示，地方党部要在会议上详细讨论，针对着当地的实际情形运用到工作上去。

5. 对全部工作要有全盘计划：地方党部对于全部的工作，应有全盘的计划和决议，集中全体党员的力量，到几个中心问题上，并经常考察和督促下级党部的工作。

7. 发展党的讨论，注意党的教育训练：党的策略，要领导全党热烈的讨论，提高党员政治认识和理论水平线。党内的教育训练工作，要十分注意经常搜集训练材料，供给下级党部，特别注意由实际问题中联系

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

8. 注意日常秘密工作，秘密工作，是保护党的主要武器。在目前白色恐怖严厉的环境之下，非常重要。所谓秘密工作，决不是脱离群众的躲避主义；而是要深入群众去职业化和社会化，取得群众的掩护，生活

要合环境，打破浪漫的恶习惯。

9. 干部人材的培养：目前各级党部，非常缺乏干部，各级党部又专门去向上级要人，不坚决的在下层组织中去培养，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地方党部要特别注意这一工作，一定要相信“有党员就有干部”，挑选最积极的份子，尤其是工农份子，加以特别训练，于可能时，可办短期训练班，指定理论上、工作上有经验的同志，担任训练。多注意讨论，继续不断的造[选]出新的干部，以充实各级党部。

10. 建立发行分配工作：地方党部要出版争取群众的有期刊物，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内容要带鼓动性（绝不造谣欺骗），文字要力求通俗简短，深刻动人。同时，要建立发行工作，经过组织路线散发到群众中去。

11. 注意各种工作的配合与联系：工农兵的运动，要力求配合发展，孤立一定会失败，并且要互相适应与联系。

12. 建立巡视工作：过去巡视工作的忽视，使上级的一切正确指导，不能传达到下级，同时，下级的一切意志亦不能反映到上级来。上下级的关系不密切，的确增加了工作上的很大困难。以后的地方党部应特别注意，经常的要有巡视工作的建立，纠正过去的忽视观念。

13. 注意全县交通网的布置：在目前白色恐怖严厉情况下面，各地的交通的布置自属重要。以后各地党部，对全县交通网的布置，应予以特别的注意。

七、党团的组织与作用

1. 党要改变包办群众组织的方式：党与群众组织一定要分清。直接命令群众是国民党的“党权高于一切”的方式，共产党只是群众的领导者，绝对不能包办或代替群众的组织。

2. 党的策略只能经过党团的作用去实现：党的策略不是直接命令群众组织执行，只能经过党团的作用，拿到群众组织中去实现。

3. 党团的组织：各种群众组织的指导机关，或群众的代表大会等，党部应当把参加进去的党员，挑选三至七人组织党团。下层的基础组织中（如乡农协、工会，支部等）不另组织党团；即以支部起党团作用。上级党团不能直接指挥下级党团，各级党团只能受各级党部的指挥。但下级党团，不能违反上级群众组织的决议。

八、党与青年团的关系

1. 政治上，团是受党的指挥，但组织上，团是独立的，团是整个党的工作的一部份，在政治上，团应受党的指导，行动是一致的。但在组织上团是独立的，除掉征得同级或上级团部的同意，党不能直接命令团的同志或调动团的同志。

2. 党要积极的去指导团的工作，并加紧发展团的政治讨论：党要认识团是自己的工作的一部份，要积极支指导团的工作，帮助团的发展。同时，团要发展关于政治的讨论，以提高团的政治水平线。党要经过兼团员的作用加强对团的政治指导。

3. 党与团要在工作上建立正确的关系：有党无团的地方，党要注意对青

年中发展成立团的组织；同样，有团无党的地方，团也应向成年中发展，并介绍得力团员入党，成立党的支部。同级党部与团部的会议，要互相参加。党的会议，更要把团的工作列入讨论。

九、组织会议与组织报告

1.组织会议：各级党部应设立组织会议，以组织部长为书记，巡视员与群众组织负责人为经常出席委员。必要时党可指定重要支部派人出席旁听，并提出实际问题。

2.会议的内容：会议中，多注意着重讨论组织的路线、工作方式、组织的缺点与错误、观念的纠正、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等。

3.组织报告：各级党部向上级作报告，应有单纯的组织报告；

（一）组织的状况（包括数量、成份、增加的比例及组织上的现象等）；

（二）党内有些什么不正确的倾向与纠正的方法（如极端民主化，雇佣革命化、腐化等）；

（三）支部工作；

（四）地方党部的工作；

（五）党在群众中的领导力量；

（六）团的工作等。

（以上各个是略举的例，要力求详细与实际。）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原文如此。

原文缺序号 6。

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一、鄂西农村中的土地关系和剥削方式

1. 唯其是小地主剥削得更厉害：鄂西大地主很少，尤其是下游一带，大多数是少有土地者。但是小地主的收入有限，对于有限的收入，决不<肯>有丝毫的放松，甚至额外剥削。

2. 所谓公田，即是豪绅的私产：一个村庄中，多有以豪绅充当族长、户长，他们以自己的地位，借公事名义来聚集许多公田，又借公事名义来收租，所以所谓公田即是豪绅的私产，成为实际上的地位。

3. 军阀课税，实际等于收租：军阀政府虽然没有土地所有权，但他[以]收(?)课税名义，按期或不按期的搜括，不过只是假手于豪绅地主罢了。所谓军阀课税，实际等于收租。

4. 豪绅地主往往是兼商业资本与放高利贷以剥削农民。豪绅地主在土地关系所搜括的课谷租毫不愿意用在整顿水利上面，因为商业资本与放高利贷认为有利可图，而造成旱灾水灾，农村经济更加速度的破产，同时农村因货币经济的关系发展，在天灾当中，也要金钱渡过困难，形成豪绅地主与富农<放>高利贷的条件。商业资本对农民的剥削是买贱卖贵，操纵农村金融，并且付货物，要农民以土地作抵，加上极重的利息等。

5. 在封建的土地关系上，是帝国主义剥削农民的顺利条件：农村中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是封建土地关系所造成的，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一制度，先限<期>借给许多资本与货物于商业资本家及放高利贷者，可购极贱的原料，并出卖商品。

二、农民要求土地的斗争

1. 鄂西农村的阶级斗争已经深入：鄂西自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豪绅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已到了极残酷的程度，于是农民对压迫阶级的斗争非常之多，除掉我们所领导的以外，还有许多自发的斗争。

2. 各种斗争都是走向土地革命：我们决不能将抗租减租，反对加庄，反捐税等斗争看成单纯的意义，这都是走向土地革命的必经过程，也只有根本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三、土地革命的意义

1. 肃清一切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完全建筑在旧的土地关系上，必须肃清，实行土地革命，才能根本肃清。

2. 是消灭军阀的经济基础：各种压迫、束缚、饥荒、灾害等等，亚洲式的屠杀，以及其他的封建余毒、军阀的产生，固然还有其他条件，但大半还是在旧的土地关系上，实行土地革命就消灭了军阀的基础。

3. 部份的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力量：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还是以经济做基础。如利用豪绅地主、高利贷青、商人、军阀做剥削的工具，如果是我们实行土地革命，就是扫除农村封建经济，部份的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力量。

4. 并且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步：土地革命实行以后，在工农政府有大工业生产机关，而在有的城市大工业领导之下，去举行集体的农村×路发展合作社，经过合作社而使数千百万农民经济与城市的社会主义工业经济相

联合，就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步。

四、实行的方法

1. 苏维埃区域的执行：苏维埃区域应一面宣传，一面采取以下的方针：

（一）扩大苏维埃区域，无顾忌的、尽量可能的解除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

（二）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财产、土地，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

（三）祠堂、庙宇、教堂的地产及其他的公产、官产或无主的荒地，都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农民使用。

（四）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借款概作无效。

（五）销毁豪绅政府的一切田契及其他剥削农民的契约（书面的、口头的，完全在内）

（六）取消一切军阀及地方衙门所颁布的捐税，设单一的农业经济累进税。

（七）政府积极创造新的农业经济，如改良扩充水利、防御天灾等等。但是土地革命的进行中，必须准备与富农的斗争，以防止其反革命性。

2. 各地的准备

（一）加紧土地政纲的宣传。

（二）发动各种日常的斗争，在斗争中，加紧雇农的组织。

（三）领导雇农、贫农对富农的斗争。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原文如此。

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一、宣传鼓动工作的实施：

1. 建立各级的宣传鼓动机关：特委建立宣传部，各县市建立宣传科和区委设立宣传委员会，支部设宣传干事。依据党的政治主张，配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全部的宣传鼓动工作。上级党部须直接帮助下级党部宣传鼓动工作的建立，我们领导的群众团体，应扩大与加紧这一工作。

2. 宣传鼓动是经常的，要建立在支部基础上：过去关于宣传鼓动工作，都是临时偶一为之，而且多是上级机关照例作一点传单标语，因此这一工作未能扩大和深入。宣传鼓动工作应经常继续不断的在群众中进行，而且要建立在支部基础上，因此[为]支部是群众的核心，支部要把宣传鼓动工作，用作争取群众的武器。

二、改良工作的内容与方式：

1. 宣传与鼓动的方式：

(一) 宣传与鼓动要互相联系，从日常实际问题中，引导群众认识我们的政策。

(二) 每一问题到来，须先提出鼓动口号去发动起来斗争，在此时如完全混合起来，便使群众认不清斗争的目标。

(三) 要随着群众的转变，而转变我们的口号，应能使群众易于接受。

2. 宣传鼓动最主要的方法，是要适合当地环境和群众的迫切要求：口号太高群众不易接受，太低不能使群众感动。并且斗争初起的地方，群众表示畏缩，不能随意散发传单，反将群众吓退。主要的是要研究群众的情绪，抓住群众的要求，所提高[出]的口号，是群众欲说未说的话，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

3. 宣传要与组织和斗争并进：先宣传后组织然后斗争，故意要把他划成几个阶段，完全是错误的。自然先有了普遍的宣传，更容易进行组织和斗争，但有了组织和斗争，更容易扩大我们的宣传。宣传、组织、斗争是互相联系的，互相推动、不可分离的。并且特别要在斗争中去扩大宣传。

4. 要利用群众聚集的时间，作广大宣传鼓动：城市中要利用上工、下工、休息以及各种聚集的时机，采用“飞行”集会的方法；乡村中如神会节日等，去群众中宣传；赤色区域在各种纪念日等召集群众大会作广大的宣传鼓动，也很重要。

5. 宣传刊物的改良：特委发行对外的宣传刊物和党内讨论的各种刊物，以作各地刊物的模范。各县、市委应出版群众中的鼓动刊物和报纸，支部……尤其是主要支部，也应当办小报和壁报，文字却要力求通俗、短简，深刻切实，尤其是多注意歌谣、韵语，反对抄袭和敷衍的文字。印刷、绘画的技术都要十分精美。

6. 提高党员的理论程度和政治水平线：宣传鼓动工作的薄弱是由于党员的理论 and 政治水平线太低，特委的流动训练班须继续举办，并把所得的经济指导各地，尽可能的举办，平常关于讨论和活动份子会等须要多开。

三、目前宣传鼓动工作的方针：

1. 关于党内的：

(一) 发展理论和政治的讨论；

(二) 支部日常工作的讨论和政策的讨论联系起来；
(三) 特委的《鄂西通讯》继续出版，作为各极党部工作的参考；
(四) 特委应有计划的编辑各种小册子，以供给下级党部工作上、训练上的材料。

2. 关于政治的：

(一) 宣传党的十大政纲；
(二) 特别阐明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统治的必要。
(三) 加紧地上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宣传；
(四) 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进攻苏联、出卖民族利益，联系到只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才能打倒帝国主义；

(五) 向广大群众说明国民党各派军阀的战争永远不会解决，只有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变军阀战争为阶级战争，才能根本消灭战祸。

3. 关于工运的：

(一) 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与政治认识；
(二) 扩大党和工人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肃清改良主义和国民党的残余幻想；

(三) 加紧日常部份斗争的鼓动；

(四) 加紧八小时工作制的宣传。

4. 关于农村的：

(一) 宣传土地国有口号，批评小资产阶级的平产主义（虽然在行动上帮助他们）的幻想，解释只有将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农民才得到最后解放；

(二) 扩大红军是自己的军队的宣传；

(三) 肃清一切封建反动思想；

(四) 巩固农民对于工农联合和城市无产阶级领导的观念；

(五) 苏维埃区域，多做群众的政治训练工作（如大会政治演讲、训练班、宁校等）；

(六) 把党的政策口号编成韵语、歌谣。

5. 关于士兵的：

(一) 反对军阀战争；

(二) 宣传发清欠饷，反抗阶级服从，军事纪律及不打仗，不开差等。

(三) 解释只有工农兵联合起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兵士才能得到解放。

(四) 宣传红军官兵平等，拖（枪）到红军中去。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原文如此。

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一、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和作用：

1. 什么是苏维埃政权？简单的回答，就是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政府，凡是参加革命的工农兵贫民都可以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政府，所以是广大劳苦群众自己起来管理政权的最好方式。

2. 苏维埃政府是以无产阶级作领导：虽然是工农兵民主独裁的形式，但是以无产阶级作领导，要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

3. 苏维埃政权的优点：资产阶级所谓“德谟克拉西”政权（民主共和国）实际是不数人政权，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真正的“德谟克拉西政权”，它是建立在广大工农兵贫民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真正是广大群众的权力，这个权力是资产阶级政权所没有的。

4. 是劳动群众的工具：谁也承认政权是某一阶级的工具。英、美、德、日各国的政权，是资产阶级的工具，中国政权，是豪绅、资产阶级的工具。同样苏维埃政权，是广大劳苦群众的工具，保卫自己，拿来对付豪绅地主、资产阶级。

5. 是社会主义的推进机：中国革命的最后目的，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苏维埃的作用，不仅是保卫工农的武器，而是要保证社会主义的完成。

二、苏维埃的组织问题：

1. 要建立在广大劳苦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苏维埃政权，一定要是广大工人、农民、兵士、贫民等直接选举代表来组织，绝对不允许委派和少数人包办。

2. 选举代表产业工人应有特权。鄂西虽然很少真正产业工人，但城市的手工业工人和农村的雇农是苏维埃政权的中心基础，选举代表应有特权，以保证其在苏维埃的领导作用。

3. 要有经常的代表会。苏维埃政权，不是群众大会，也不是上层几个领袖，是由群众直接选举出来代表组织的，同时有立法及行政的权。

4. 要实行真正直接撤回权。苏维埃的代表，如遇选举他的群众对他不满，认为不能代表他们的时候，应由群众直接撤回去，另选代表来代替。

5. 常委会内应包纳有威信的代表。执行委员会的人数由十一人到二十七人，其中选出常务委员五人至七人，执行日常事务，但一定要包纳该区有威信的代表在内，以巩固苏维埃的威信和权力。

6. 要分置各委员会。苏维埃应分置军事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等等。

7. 行政的中心地点，应在工农运动最发展的地方。苏维埃行政的中心地点不一定要在得×的政治中心，应当设在工农运动最发展的地方，以取得广大群众的直接监督和拥护。

8. 与党的关系。党是苏维埃思想上的领导者，这是六次大会明白指出来的，就是说党只应经过党团的形式，在苏维埃中起领导作用，不能直接命令苏维埃或代表苏维埃，但党的负责同志，不应比苏维埃负责人弱，才能保证其领导。

9. 与职工会的关系。职工会的作用，要领导苏维埃走向社会主义的实现，

但在苏维埃成立以后，失掉经济斗争的意义，因为苏维埃是代表工人的政权，可以强制资本家执行，用不着职工会再来领导斗争。

10. 与农协的关系。苏维埃成立以后，农民协会便应取消，但万一农民还感着农协的需要，我们不应去机械的执行，应当加强苏维埃的作用，使农协渐次失掉作用，逐渐达到取消的目的。

三、事先的准备工作：

1. 预先要有广大的宣传。这一工作非常必要，使广大群众都感觉有政权的必要，然后才能获得他们实际来参加与拥护。

2. 组织上的准备。目前在石首、监利、沔阳等县，事实上已经早就有了政权，当然用不着暴动中各方面的准备。但关于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各地苏维埃的建立等，事先都要有很好的准备。

3. 动员群众的准备。苏维埃是工农自己的政权，一定要动员广大群众自己起来管理和过问这一工作，事先必要有充分的准备，主要的是要党能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召集各种群众大会，作广大的宣传鼓动。

4. 规定各种工作计划和法令。这一准备工作是在政权建立的第一天，马上就要执行的，应当事先就要准备好。

5. 革命委员会的作用。革命委员会是临时政权机关，是苏维埃筹备会性质。在石首、监利、沔阳各县，当然没关于暴动的各方面的作用，一切法令的颁布和一切工作的执行，都是委之苏维埃，所以革命委员会主要的任务是执行成立苏维埃的一切准备工作。

四、政权成立后的任务：

1. 立即颁布各种法令。政权建立的第一天，立即应颁布土地法令和其他关于实际改良工农生活的法令，并须召集群众大会宣布。

2. 执行土地政纲，没收银行及反革命的财产。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是政权成立后最严重的问题，分配土地的方法，完全交由苏维埃解决，不能由党主观的规定作分配土地的标准。关于银行及军阀、地主、豪绅、反革命的财产必须一律没收。

3. 实行劳工监督，对于资本家所经营的企业，除了操纵社会的应没收以外，根本的策略是用苏维埃和职工会的力量来监督，防止他们违法作弊，以消灭其在经济上积极或消极破坏革命的行动。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没收，结果虽然增加经济上的困难与纷乱，还不是于革命有利益的了。当然为了经济上的需要，和弥补劳苦群众在革命势力中所受的损伤，可以征发资本家的粮食、衣物等等，或分配其房屋，使适应于我们的目的。

4. 有计划的制裁反革命。政权成克舌，应特别注意肃清反革命的势力，但绝不是无系统的大烧大杀，而是要歼灭其领袖，主要的是有计划的拘捕该区的资产阶级地主豪绅、流氓头目，要他们做维持地方的抵押品。

5. 成立保卫政权的红军。该区的游击队、暴动队等等工农武装，应改编为正式红军和一部份赤卫队，并须尽量扩大，这是保卫政权的主要力量，对于投降的军队民团和联合的土匪，必须尽可能的改编，并调换其军官，加派政治委员。

6. 组织全区的集中的军需机关。军事扩大了，给养问题确是很严重的问题，必须全区集中的军需机关，以便统筹征发和支配。

7. 不断的向外扩大。政权成立以后，应须积极向外扩大，必须如此，才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扩大政权的范围，更可以鼓动群众为拥护这一政权而斗

争的勇气与根本动摇敌人的统治，使其不能破坏我们已得的胜利。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汉流土匪运动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目 录：

- 1.过去对于汉流土匪认识上错误
- 2.根本的认识
- 3.正确的路线

一、过去对于汉流上匪认识上错误

1.过去相信汉流土匪，以为他们是流氓无产阶级，无条件的与他们联合，甚至把党的秘密组织使他们知道，武器不发与工农而发与汉流土匪，结果上了他们的大当。

2.相反的，以为流[汉]流土匪概不可靠的，认为是我们的敌人，把他们与反动派一律看待，拿来与共产党对立起来。

3.机械<地>把汉流土匪分为城市及乡村的，而肯定他那一部份是革命的，那一部份为反革命的，这都不是原则上的了解。

二、根本的认识

1.汉流上匪的群众大部份是受了经济的、政治的压迫，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的。他们只知道在经济上找出路，而不知道还应该在政治上找出路。

2.“反清复明”的政治口号在目前已失了作用，而“打富济贫”的口号又不能切实执行，所以汉[流]土匪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

3.汉流土匪的领袖，大部份都变为富有阶级，常被豪绅地主所利用，甚至本身亦成为豪绅地主阶级。

三、正确的路线

1.无论城市、乡村，只要有汉流土匪的群众的组织，我们都应当打入进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争取其群众。

2.很谨慎的防制[止]汉流土匪的投机心理，及其反水的习惯。

3.不惟严厉纠正专门联合领袖的危险方式，而且要坚决打击其领袖。

4.特别注意打入观音煤矿工人，宜昌、沙市及各大市镇工人群众中的汉流运动。

5.对于城市工人中的汉流组织，我们不要机械的采取打入进去的方式，主要的是应积极发动其斗争，由斗争中取得其群众。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经济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目 录：

1. 过去经济支配的错误

2. 今后经济支配的规定

3. 经济自给的重大意义

一、过去经济支配的错误

鄂西各县党的经济，大部份没有用在工作上，开支既不得当，也没有预算、决算，以致耗费的钱很多，而工作还没有起色，尤其是赤色区域的党，因为地方主义把经济不解交特委，保留在本县党内滥行消费，造成一般同志腐化的危险。同时，红军经费也不是群众政权机关担任，完全是由县委供给。这些错误，的确是一般的现象。

二、今后经济支配的规定

1. 各县应实行党员职业化的口号，党把大部份的经济要用在工作上。

2. 特委组织经济委员会，各县取得的经济，都解交特委集中，分用到全鄂西党的工作必须上面。

3. 各县党的经济，应以自给为原则，在万一不可能时，可由特委酌量津贴。

4. 各县的经济，无论是自给或由特委津贴的，要有经常的预算和决算，交特委审查和批准。

5. 红军的经费由苏维埃政府发给，在未成立苏维埃的地方，则由农民协会担任。

三、经济自给的重大意义

1. 可以实现党员职业化的口号——经济要自给，党员就非职业化不可，只有党员的职业化，才能达到经济自给的目的。所以经济自给，可以实现党员职业化的口号。

2. 可以打破党员雇佣革命的观念——党员雇佣观念是由于党员经济不能自给，若是各县的党经济自给，一般党员自然不来靠党生活。就可以打破过去有钱便有工作，无钱便无工作的雇佣革命性。

3. 可以防止党员的腐化——党员的腐化也是由于党员经济不能自给，而且是党内经济浪漫的原因。若是党的经济自给，生活力求阔绰和爱漂亮的腐化危险，自然不能产生于党内了。

4. 可以加强党员对党的认识——经济自给的办法，就是征取党员的党费和募集党员的所得捐。若是某一党员能按月的、经常的交纳党费或出所得捐，就是党员对党的好表示。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军事工作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1、兵士运动

一、目前党的策略

(1) 兵士一般的阶级性：

兵士不是流氓无产阶级，中国的兵士，虽多系失业的工农和一部份流氓无产阶级，但他们是以当兵为职业，生活是有组织的、有秩序的，经济上有反军阀的要求，政治上有参加苏维埃的要求，当然与社会一般流氓无职业的人不同。

兵士是属于农民阶级，兵士大多数是因为没有土地而当兵，他们还是希望得着土地返到农村去。

(2) 总的路线是争取兵士群众：目前党的总任务是准备群众武装暴动的力量，因此党在兵运中的总路线，是争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党不仅在组织上，特别是在政治宣传上，争取广大兵士群众到自己的影响之下，以走到工农兵配合的总暴动。

(3) 反对和平发展：要取得兵士群众，首先要注意领导兵士的日常斗争，反对长官打骂，要求发给欠饷，军需公开来，都是兵士最为迫切的要求，党要在这些斗争中，才能提高兵士群众的阶级意义[识]。和平发展决不容易扩大我们的影响，不能取得更多的群众。

(4) 反对无条件的兵变主义：无条件的兵变只是自己消灭自己蕴蓄在敌人军队中的力量，没有别的好处。这一错误党应坚决的反对，但在下列的条件之下，必须举行兵变：

当地工、农斗争，有激烈的发展，快要来到暴动时候；

攻击红军或镇压工农的斗争；

敌人作战对方都有我们的组织；

兵士内部斗争发展，已经引起广大兵士的同情与参加；

组织被敌人发觉了。

二、兵士运动的工作

(1) 要全党来做这一工作：兵士运动决不是军委的工作，要全党来做的，各地的党，尤其是城市的党，要找出接近兵士群众的机会，有计划去发展秘密组织。同时要派遣得力的同志到敌人军队中去当兵或入军事学校以便从中工作。至于把失业的革命工农加以相当训练，投入军队中去尤其必要。总之全党都要随时随地注意这一工作，用各种方式，建立军队中的工作，下级干部多同情革命，也要附带去工作。

(2) 要特别注意打入敌人的主要部队：主要部队是敌人命脉所关，党要特别注意集中力量去做主要部队中的工作，尤其是要注意打入主要部队的主要部门，因为主要部队（尤其是主要部门）工作起来了，才可以影响其他部队，这当然不是说便可放弃非主要部队中的工作。

(3) 要有经常的宣传鼓动工作

宣传方面的口号：

- a. 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
- b. 改良兵士生活，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
- c. 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 d.工农兵联合起来！
- e.到红军中去！
- f.反对军阀战争！
- 鼓动方面的口号：
- a.发清欠饷！
- b.反对长官克扣军饷！
- c.反对打骂兵士！
- d.增加月饷（每月至少二十元）！
- e.改良伙食、减少操课时间！
- g.不替军阀打仗！
- h.反对清乡！
- i.发给残废士兵的抚恤！
- j.优待伤兵……！

三、兵士的组织问题

（1）党的组织与秘密工作的重要：军队中的组织要特别注意秘密工作，数量上不希望很大，质量上要特别健全。军队以连为单位组织支部，连以上成立团委、师委，每排成立小组，至多不能超过五人。各组同志只知道本组组长，各组长只知道本支部书记，各支部书记只知道团委一个负责人，并且非必要时不必与各地地方党部发生关系，团员与党同一组织。

（2）在士兵中活动的方式：凡同情于反对长官的压迫和剥削及争得本身利益的兵士，可用感情联络，使他在我们影响之下，一致行动，但也要注意秘密工作。

四、兵士的斗争问题

（1）抓住一切实际问题去发动斗争：关于欠饷、伙食不好，借钱不到，被长官处罚等问题，却很容易发动士兵斗争，党要在群众中无事造出有事来，用各种方法去领导斗争。斗争愈多，宣传才愈深入。

（2）斗争策略要以政治的形势为转移：如还未到进行兵变的时候，斗争不宜过于扩大，因为斗争扩大多便走上暴动和兵变，不然会被敌人解决，所以只能经常继续不断的……。

、游击战争与红军

一、目前的任务

（1）发动群众的斗争，肃清反动势力：目前党的任务是争取群众，游击战争的任务，也是要以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起来斗争为原则，一切反动势力（民团、保安队、十家连等）足以妨碍斗争的发展，红军必须以很好的计划，把他们一一肃清。

（2）实现群众斗争的口号，尤其是土地政纲：红军要在行动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党的政治主张在红军所到的地方坚决办到，尤其是土地政纲，要彻底解决，才能发动广大群众，当然在各种问题的执行，最好是经过群众组织的路线。

（3）扩大红军的组织：红军是目前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党必须以各种可能，在游击当中夺取敌人的武装，以扩大自己的实力，渐渐生长成为正式的红军，并要在群众中吸收积极忠勇的工农参加红军，以加强红军质量。

二、红军的组织和训练

（1）党只能取[起]领导作用，士兵成份应以工人、贫农为中心基础：

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党不应完全包办。红军中的党要特别健全，每一问题，党都要起领导作用，团不另组织支部，可在支部下成立CY小组。目前仍适用志愿兵制度，但必须以工人和贫农为中心基础。

(2) 兵士委员会的组织及作用：兵士委员会须马上健全起来，因为军队中的主要工作是兵士工作，一切工作都要注意建立在广大的兵士群众基础上，使他们自动的过问纪律、生活、给养这些问题，但要防止极端民主化的现象。

(3) 政治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党代表应改为政治委员，作对内的一切政治教育，对外的一切政治宣传工作。特别要能在正确的关系上来发展兵士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并帮助军官来表示正确的作用。

(4) 兵士生活要纪律化有机化：红军的每一兵士，不仅是革命的战斗员，而且是群众的组织者、宣传者，一切工作和纪律，要能使他们自动的来拥护，同时政治部应注意兵士的政治训练，多做开娱乐会等文化工作。

三、目前的战略与策略

(1) 随时是进攻的，不是保守的：游击战争只有不断的向着敌人弱点进攻，不断的发动群众向外扩大，才能得到胜利。保守就是坐以待毙的策略，因此要坚决反对上山主义和下湖主义，自然不是跑，因为军事的策略，而不可暂时如此，主要的是要经常和群众中游击，提高群众的勇气，扩大四周的影响。

(2) 不攻坚、不打硬仗，但决不是逃跑主义：敌人所设的坚固防守工事，我们不应冒险去攻，徒损失自己。敌人大部队向着我们进攻；他们是有计划的，我们不应当去冲突，应绕道其侧面或后方去袭击，敌情不明，我们也要慎重作战。总之没有胜利把握的，我们不应冒险去打，但绝不是无目的逃跑主义。有解决可能的反动武装，一定要解决，来扩大自己的实力。

(3) 要求得群众的拥护，要以政治宣传战胜敌人：作战一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和帮助才有胜利把握，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去袭击敌人，同时要加紧我们的政治宣传，使敌人兵士同情革命或倾向红军中来。

(4) 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与集中在策略上，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完全要以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来决定，就是要在集中指导下分途游击去发动群众，集中力量去打击敌人。

四、党员军事化与武装工农

(1) 由各地的斗争和日常工作中证明这一工作的重要；各地斗争给我们工作的教训是每个党员都要有军事的知识和技术，才能领导游击战争和指挥作战。并且军事是科学的结晶，我们平日工作中、行动中也要完全军事化。

(2) 军事化的实施：

党应有计划的秘密与公开的给每个党员以短期训练。

党应派党员入敌人的军校或教导队，来学得军事技能。

每个同志入军队或团防当兵。

(二) 、武装工农

(1) 目前的革命形势和斗争的尖锐都加重我们武装的任务：目前的形势逐渐走向革命高潮，我们加紧武装暴动的准备，同时斗争的尖锐很易走向武装冲突，工农更有武装的必要。

(2) 工人纠察队的组织与训练：工人纠察队的工作，只能在秘密路线下

去进行。关于使用武器方面，党要派有军事知识的同志去秘密训练，至于巷战及一切动作，要在群众的斗争中去演习，平日也可训练，到草地集中、解散、进攻、防守、放哨等形势[式]，并可借体育会等名义练习。

(3) 农民的武装，可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势[式]下进行：赤色区域亦要注意使一般青年农民普遍受相当的军事训练，并要在游击中把农民武装起来，编成赤卫队；非赤色区域内，也要进行这种组织和训练。注意民团中的工作，夺取民团武装。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原件缺序码“ f ”。

原件第四个问题中缺序码（一）。

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兵变问题决议（草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一、兵变问题的严重意义

中国军阀制度的存在，造成了世界上第一等多兵国家，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看见广大的武装兵士群众。兵士群众的生活痛苦特别厉害，加以军阀混战不断的爆发，工农革命斗争的日益发展，以及红军的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这些都成为造成兵变主要原因。兵变的不断爆发，已成为促进反动统治阶级更快的动摇崩溃的动力之一，同时帮助了工农革命斗争的发展和推动新的革命高潮的更快到来。根据党的总的路线，争夺广大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原则下面，所以兵变问题的意义，特别严重起来。

二、纠正过去对兵变问题的错误观念和应有的正确认识

1. 兵变是兵士群众的暴动：兵变的爆动[发]不是偶然的，而是许多客观环境造成的，不是几个下级官长鼓动得下来的，而是兵士的群众行动，所以无论任何种的兵变，都是一种兵士群众反抗压迫剥削，要求解放的暴动，充分的含着革命的意义。

2. 以为兵变就是土匪的错误观念：兵变既是兵士群众的暴动，当然兵变的目的，不是以土匪为唯一的出路。过去一般的以为兵变是没有口口的队伍，就是土匪，在行动上便是无形的跑到豪绅打土匪口号之下，去消灭变兵，更加使变兵找不着出路，只得去当土匪。这个责任，便不是变兵本身应负的，所以把变兵当作土匪，在客观上便是帮助豪绅地主阶级摧残充分含着革命性的兵士群众暴动，在主观上的确是革命势力的一种损失。

3. 兵变是动摇统治阶级的统治的强有力的动力：兵变的直接影响便是促进军阀统治的崩溃，间接的便是更帮助了革命斗争的发展，推动新的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认为兵变仅仅是军阀本身的问题，或者仅是兵士群众对军阀的一种经济斗争，这种观念显著是不正确的。

4. 不能说某一党派所领导的兵变，这一部份兵士群众也是如某一党派一样不能革命或反革命的：兵变既是兵士群众的暴动，纵然是在某党派所领导之下，而某党派绝对不能解决变兵的问题，满足变兵的要求，兵士群众的革命性不会消灭或减少，如若认为某党派所领导的兵变，其兵士也是属于某党派的，这便是驱逐革命的变兵群众于革命战线之外，客观上更帮助了某党派巩固了对变兵的领导。在党的总路线夺取广大群众的原则上，是绝对说不通的。

三、对变兵问题的正确策略

1. 主要的是夺取广大的变兵群众：兵变是兵士群众反抗压迫剥削的暴动，是群众的，是革命的，我们必须要用很大的力量，从积极方面去领导其斗争，在斗争中夺取其广大变兵群众，走向帮助工农革命，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道路上去。忽视兵变问题，便是忘记了党夺取广大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主要任务。

2. 要以工农革命斗争来影响变兵群众：兵变虽然是兵士群众的暴动，若是得不列工农群众的援助，一定很容易的被反革命镇压下去，或者兵变是某党派所领导的，我们反跟着豪绅地主阶级的口号，跑去消灭变兵，使变兵更加找不着出路而变成土匪。形成防[妨]碍革命的障碍物，或者变成反革命的

工具。所以我们为要夺取广大的变兵群众，必须发动工农的一切革命斗争来影响变兵。应广大欢迎变兵参加工农革命，欢迎变兵帮助工农杀豪绅地主，收缴反动的武装，欢迎变兵投奔红军中来，以及兵士群众有参加苏维埃政权和享受分配土地的权利等宣传，使变兵群众在工农斗争援助之下，更快的转变到革命方面来。

3. 变兵可以帮助工农的革命斗争：兵变足以使统治阶级更加动摇、恐慌，工农的革命斗争可以利用此时机爆发起来，如若得到变兵的直接参加和援助，更能使工农斗争更顺利的发展前进。各种斗争的总汇合，便是新的革命高潮。

4. 要积极的领导自发的兵变和其他党派所领导的兵变：自发的兵变，虽然在行动上革命的，假使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不一定保存原有的革命性，党应用很大的力量，设法接近变兵，加强对变兵宣传鼓动工作，给变兵以思想上强有力的领导，尤其是某党派所领导的兵变，党更应竭力指出某党派绝对不能解决变兵的问题，只有参加工农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同时扩大欢迎变兵参加革命的宣传，以提高变兵斗争的热血情绪，使其脱离某党派的影响，转变到革命方面来。并应使对变兵的一切宣传鼓动工作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以巩固变兵倾向革命思想上的强有力的保证。

5. 要在一切斗争中与变兵发生联系：在兵变以前，如有组织上的联系，当然是很好的，可是军队的开驻常常不能与党和群众组织发生很密切的联系，每每兵变的时期，又是异常迫促的，更是来不及取得联系。变兵找组织，固然是很困难的，而组织去找变兵同样也是难事，只有使工农的斗争与变兵斗争联系起来，这才是发生联系的最好办法。派人去接头等办法，无疑义的是很拙的办法。

6. 为要促进新的革命高潮，实行武装暴动，必须使工农兵的运动联系起来：军阀混战的扩大、延长，兵变的发生必不可避免的日益增加。兵士群众的革命化，是促进新的革命高潮主要动力之一。兵运与工农斗争联系起来，这些革命斗争的总汇合，便是新的革命高潮，实行武装暴动，完成工农革命的时机。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一、过去工作的教训：

1.不注意发动群众起来斗争，以武力进攻为唯一途径：各地的党不注意发动群众的各种斗争，以为只有用武力把当地的团体或反动的豪绅解决了，便可以把群众号召起来，这是偏重军事的观念，轻视群众的力量，结果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2.乡村包围城市的办法：不积极的发动城市工作，企图先把乡村割据起来了，然后用军事力量进攻城市，这是根本忽视城市工作的重要。

3.恐怖政策的错误：恐怖政策是脱离群众的行动，只有加深党员群众和非党群众对党的仇视，造成恐怖空气。

4.统一战线的误解：以为农村中的反动势力只有豪绅地主，未认清富农是半地主半封建性的剥削者，往往容易走入反革命的营垒。在工作<上>常常迁就富农，为顾全统一战线，不坚决领导雇农对富农的斗争。

5.忽视群众的阶级的教育训练工作：对阶级的教育训练工作，在过去成为一般的忽视，使群众对阶级的认识不甚深刻，这是工作中的最大缺点。

6.保守观念足以妨碍农民运动的发展：不知只有在不断的斗争当中不断的向外发展，才能得到胜利，幻想造成长久的割据，这一倾向的发展，就是上山主义、下湖主义的来源，结果走到脱离群众，自己消灭自己的道路。

7.脱离群众的尾巴主义：有些地方限制经济（斗争）向前的发展，避免政治斗争的武装冲突，结果落在群众的后面，形成尾巴主义。

8.忽视土地革命政纲的执行：专门只做杀土豪劣绅，打民团、反苛税这些工作，根本的土地革命政纲成为一般的忽视，尤其是赤色区域，有实行的可能也未有做。

9.党与农协的关系不正确：上游各县，只有光杆的党，没有群众组织，间有一点，反退缩到党的范围以内；下游各县，虽有广大的群众组织，但不是以党代替群众组织，便是以党包办群众组织。

二、农民运动的路线：

1.加紧群众的日常斗争，同时要作武装冲突的准备：日常经济斗争是最能动员广大群众的，党要利用反对捐税、反对拉车、反对民团等，发展群众的斗争，但目前农村阶级斗争的激烈，几乎每一时[次]的斗争，都有走到武装冲突的可能。因此，党要注意农民的武装组织，由日常斗争中发展到游击战争，以至地方暴动。

2.农村中革命战线从雇农起至中农止：贫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雇农是党在农村中基础，这一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战线，应当是从雇农起至中农止。

3.对富农的策略：鄂西富农多是半地主性的剥削者，虽然有暂时参加革命的，但要认清其反革命的不可免，不会完全同意中央最近的决议，不应当企图联合富农在反封建势力的战线之内，而应当坚决的领导雇农对富农的斗争。在原则上，拒绝富农加入农协，已加入的要防止其侵占农协的领导权，从斗争中开除出农民协[会]之外。

4.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纲并赞成农民所提出的部分要求：土地革命是目前

革命阶级中主要任务之一，赤色区域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其他各地也要注意这一工作的宣传和实行，同时农民所提出的部分要求如减租减息、抗捐税等，党也要帮助他们实现。

5. 平分土地问题与开始土地国有的宣传：平分土地如果是大多数人的要求，党应当赞助他们，但必须加以批评，指出平产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幻想。只有将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农民才能根本得着解放。土地国有的宣传就要开始做，以打破农民私有的观念。

6. 加强对于游击的领导，游击战争是目前农村斗争的主要方式，党必须坚决的去领导，使其更有组织性，与群众的联系更能密切，在斗争中扩大武装组织，建立红军的基础，对于农民自发的暴动，也必须积极去领导，并使其达到最高的组织性。

7. 农村工作的配合：

(1) 加紧重要城市的职工运动，领导农村的斗争；

(2) 农村工作，必须与工运、兵运同时进行，使彼此的斗争可以互相推动；

(3) 农村要<尽>可能的平衡发展，尤其要渐次把组织由穷乡僻壤转移到近郊大道、重要村落。

三、农民的组织问题：

1. 扩大农民协会的组织：农民协会是农民主要的组织方式，党要以雇农、贫农为农民协会中心，吸收广大中农加入，建立反封建势力的革命路线，使之成为真正广大农民群众的组织。农协要尽量民主化，特别注意下层的基本组织，党只能在农协中起党团作用。

2. 农民委员会运用：农民委员会是农民群众代表的性质（工厂委员会性质相同）是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但名义不一定要叫农民委员会，如反苛捐杂税的大同盟、反军阀同盟、抗捐会等都可以。总要以取得广大群众为原则，要注意建立经济的各级代表会议，使之逐渐成为苏维埃的形式。

3. 妇女与青年的组织：农村妇女应加入农民协会，于必要时，可编妇女小组。农协中要设立妇女委员会，专门讨论妇女的问题，讨论的结果交农协执行。农协要尽量吸收青年加入。农协之下可组织少年先锋队、童子团，但必须受农协指导，同时要设立青年委员会讨论青年的特殊问题。

4. 雇农的独立组织及其与农协的关系：雇农应独立组织自己的工会，同时应加入农协，形成雇农小组在农协中起领导作用，将来苏维埃代替了农协，雇农工会也永久存在。农村手工业工人也可与雇农共同组织在一个工会，以至于加入总工会。

四、对神兵的工作与策略：

1. 总的原则是夺取其群众：目前长阳、兴山、秭归、巴东各地的神兵，仍然公开或半公开存在，的确是广大农民群众的组织，但内多系地主和富农的领导，致使这一革命性（反捐税、反军阀等）的组织多为团防式的组织，反被豪绅地主利用来作反对革命的工具（如宜昌、长阳等）。党的主要任务是，要用各种方式打入群众中去，把这些群众争取在自己的政治影响之下，转变其原有性质，成为反封建势力的革命组织。

2. 用教育方法破除其迷信，用革命组织代替其组织：神兵的团结是建筑在迷信上，党要在群众中加紧政治宣传，领导他们的日常斗争，提高他们自己信仰自己的力量的观念，所以我们不是从正面去反对迷信，而是用教育方

法从侧面来逐渐除其迷信。同时要用各种的形式进行下层基本组织，并建立经常的代表会议，把权力由神兵代表一人的手中转变到群众手中来，使原有组织渐次失掉作用，而以革命的组织代替，必要时名义可不必改变。

五、农村的斗争：

1. 日常生活斗争：

(1) 发动日常生活斗争的重要：暴动必须要有广大群众参加才能得到胜利，但许[须] 经过许多群众的日常斗争，群众才会了解与拥护暴动主张，所以群众的日常生活斗争，应该看得非常重要。目前松滋、枝江、宜都、荆门的饥民斗争，其余各地的反捐税、反团防、反豪绅、反对市票以及抗租、抗债等斗争，都是非常迫切，很容易发动的。若说农村只有武装暴动，没有日常生活斗争，很明显的是一种极错误的左倾思想。

(2) 农村的斗争应有主观的发动计划，但必须利用进机鼓动群众起来：党应根据各地实际问题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有计划的去发动，使各地的斗争能够相适应，但一定要根据群众的热情，要善于利用时机鼓动群众起来，斗争才容易发动。所以绝不是不管群众情绪如何，专以主观的计划来决定斗争，这有犯命令主义的危险；也不是听从群众自己起来了，我们然后去领导，这又是尾巴主义的错误。

(3) 斗争一定要是群众的直接行动，一定要显明阶级的意义：一切斗争都是要群众直接的行动，一切胜利，都能证明是群众的力量，必须如此，才能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才能扩大斗争的影响，如围闹、游行示威，捣毁公署、税卡等方式，都应鼓动群众起来行动，在游行开会、群

众聚集的当中爆发起来。反对抛弃群众，专门用少数人去行动的英雄主义的办法；反对抑制群众自己起来，而采用谈判或以诉讼解决等的机会主义的办法，同时斗争一定显明阶级的意义，绝不是对某一姓、某一地方的斗争，而是对于地主、军阀、豪绅的斗争，尤其是赤色区域中要纠正仇视所谓反动乡村的农民群众的错误观念。

(4) 斗争应与宣传组织并进：斗争须要群众接受了正确的宣传而且能形成比较好的组织，才能容易胜利，但不一定要经济长期的宣传组织工作，然后才能发动斗争。因为群众的日常斗争，现在各地往往只随时自发起来，如在某一问题发生时，我们能积极去领导，便有很快转入斗争的可能。一切宣传组织工作，并不是能在斗争之前做得很好，反转是在斗争中容易发展这些工作，所以机械的以为必须经过宣传组织才能说得上斗争是错误的。如果在斗争中不加紧注意宣传组织工作，也是很大的错误。

2. 游击战争：

(1) 游击战争与群众工作的联系：

游击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必须要加紧城市和主要乡村的工作，与敌人军队中和民团中的工作，在广大群众保障之下，才能获得胜利，但绝不是一定要等待整个工作都起来了，然后才可以发动。

目前日常斗争很容易走到武装冲突，只要群众起来要武装冲突或走到非武装冲突不能进行斗争了，党应坚决的以游击战争去参加或发动这一斗争，一直到杀戮豪绅地主，没收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游击战争必须尽量向外扩大，推动周围的群众斗争，更可以促进整个工作的布置。

(2) 游击战争的战术是永远自动的向敌人弱点进攻，游击战争要永远保持自动的进攻方式，时时向着敌人的弱点或群众已经起来的地方进攻，坚决的在群众中游击，以发动更广大的范围的群众起来斗争。保守防卫是失败的道路，但不可冒险攻坚与敌人大部队正式冲突（当然不是跳[逃]走主义）。

3. 地方暴动

(1) 地方暴动的条件：

工农群众普遍有暴动夺取政权的要求。

工农斗争已普遍起来（这每每是游击战争的结果）。

敌人军事中心动摇，兵士群众革命化。

(2) 革命委员会与暴动参谋部的工作：决定暴动之时，即由参加暴动的群众团体各举代表成立革命委员会，为临时政权机关，同时在革命委员会之下组织暴动参谋部，为暴动的军事指挥机关。暴动以后，革命委员会马上颁布土地法令和其他实际改良工农生活的法令。没收军阀、地主、反革命的财产；监督资本家，防其捣乱；无情的有系统的打击反革命的领导，解除反动武装。革命委员会应筹备召集代表大会，产生正式苏维埃政权。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一、过去妇女运动的状况

1. 赤色区域的妇运已有相当的发展，不过党的领导力量还是很薄弱：下游各县赤色区域均有广大妇女群众的组织，如江陵、监利、石首等县各有千余妇女参加农协，但是党的基础非常薄弱，没有领导力量。

2. 在斗争中已经表现了妇女的力量：松、枝、宜的妇女在饥民斗争中组织团防武装。江陵的妇女参加骚动工作，看护伤兵、担任后防一切工作，这足以证明妇女在革命斗争中表现了很伟大的力量。

3. 上游各县只有党的组织没有群众组织：宜昌北乡及长阳等地也只有光杆的党员，没有群众的组织，甚至于连松、枝、宜妇女实际参加斗争的，都没有妇女群众的组织。

4. 城市的妇运还是停顿状况：宜昌、沙市几个中心区域没有妇女的组织，其他各县更连线索都找不着。

5. 目前女运有向前发展的趋势：目前客观的条件，妇女的痛苦一天加紧一天，因此妇女对革命的要求也更迫切。下游各县均有蓬蓬勃勃的发展，沙市打包厂的女工有一人以上，现在已有相当线索。

二、过去对于妇女工作观点上的错误

1. 党过去在妇运中不注意去建立党的基础，以为有了几个小资阶<级>的女同志就算完事。

2. 把妇女工作看成是几个女同志的工作，没有动员全党去进行这一工作。

3. 不积极的去把妇女运动的基础建立在广大的女工和乡村劳动妇女身上，甚至忽视妇女工作，以为妇<女>群众对于革命工作没有多大的帮助。

4. 忽视妇女的教育训练工作，尤其对下级干部缺乏训练。

5. 对农协的关系不正确，演成对抗的形势，甚至于一般妇女同志也认为是反抗男子而革命的。

6. 忽视对妇女宣传的工作。以致引起一般群众不了解妇运的意义而发生许多误会和反对。

三、今后工作的方针

1. 运动全体党员加紧妇女工作。为了要把整个的劳苦妇女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必须是每个同志担任这一任务。

2. 妇运基础要建立在广大劳苦妇女群众上面。城市女工及乡村贫农、佃农的农妇是我们工作的对象。

3. 加紧妇女训练教育工作，同时要注意干部人材的培养，过去对妇女的教育训练工作在许多实际情形之下简直是没有做过，所以在工作上发生许多困难。妇女中干部在鄂西找不出几个来。

4. 妇女不能有单独的组织。妇女没有单独的阶级性，所以妇女没有单独的组织，只能在工会、农协领导之下参加整个阶级斗争。在农协或工会之下可成立妇女运动委员会，专门讨论妇女问题，交农协或工会执行。但这二方式不可机械的运用，如果某一城市没有工会时，也可组织妇女运动委员会，领导妇女的一切斗争。

5.应提出妇女部份的特殊的要求，但不能超回阶级范围以外。工会和农协中应当提出妇女的部份要求领导其斗争，以便更能争取广大的劳苦妇女群众。同时妇女群众提出的要求，不能操[超]过阶级利益范围以外，因为只要如此，才能巩固阶级的战线和整过[个]革命的力量。妇女痛苦的彻底解放，也只有整个阶级获得解放时才能得着彻底的解放。

6.加紧城市女工的日常斗争。女工斗争内容是反对工头调笑女工，男女工资要一律平等，以及一切改良待遇的要求等，党应坚决的不断的领导这些斗争，在斗争中更要扩大我们的宣传和组织，以及完成争取广大劳苦妇女群众的任务。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原文如此。

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济难会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一、目前总的路线是争取群众。党在目前总的路线是争取广大群众围系在党的周围，济难会是党争取群众的最好的阶级组织，建立党在最广大的群众当中的强固基础。

二、纠正过去济难会的错误倾向

1. 过去以为济难会是党的救济机关。一般党员多不了解济难会是团聚广大同情革命的群众组织，而认为是专门救济被难同志的救济所。

2. 党包办的济难会的工作。济难会的机关附属于党的机关里面，济难会的负责人也就是党的负责人，济难会的会员也就是党的党员，济难会的工作范围完全退在党的范围之内，根本没有打入在群众中去。

3. 派捐式的募捐。募捐的方式多半没有宣传性质的写派形式，不但不能引起群众对革命表同情而自动的捐助，反使群众发生反感和误会。

三、济难会之作用与运用

1. 主要的作用是领导革命群众的互助互救，对革命被难战士及其家属的鼓励安慰与物质[资]救济等等。

2. 尽量搜集和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欺骗群众的事实，以及革命群众被难的情形，提高群众的阶级仇视。

3. 凡属同情革命愿意为济<难>会工作者，不问他的社会成份与出身如何，都可加入济难会的组织，发动最广泛的群众对革命的同情，以扩大革命的影响。

4. 济难会的工作应该组织化、宣传化。

四、济难会的组织：鄂西成立鄂西济难总会，各县成立县总会。至于下层组织可依各县实际情形组织之，总以争取广泛群众为组织原则。

五、济难会与党的关系，党只能经过党团的活动以实现党在济难会中的领导作用，应吸收广泛的革命群众，以参加济难会的一切工作，要绝的[对]防止包办的错误。

六、济难会的工作方式：(1) 利用互助会、人道会及一切慈善机关等名义号召广泛群众参加济难事业；(2) 打入旧社会中的各种慈善团体中去起领导作用，传达党的政治影响，渐渐转变其性质，使之成为纯粹的革命救济机关。

七、济难会的经济来源：

1. 主要的由群众自觉的捐助。

2. 没收反革命的财产充当。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一、过去的错误与经验

1. 一般的错误观念：

(一)根本忽视工运,以为工运不重要(十个工人还当不得一个盒子炮),这完全(是)农民意识的反映,结果便是以乡村包围城市,甚至还有以“农民解放工人”的笑话。

(二)是畏难的成见,以为城市是敌人势力最雄厚的地方,揣测这一工作必定困难,不敢尝试这一工(作)。

(三)畏惧斗争,不了解组织是在斗争中发展,犯了和平发展的错误。

2. 工作方法的错误：

(一)是急性病,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明白这是比较长期的艰苦工作,幻想“忽然而来也”的爆发起来。

(二)是不深入群众,没有深入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生活,领导他们的斗争,只是站在外面着急或收买少数工人去工作。

(三)是没有抓住工作中心,没有积极从中心工作入手,发动重要的工人群众中的工作,偏于贪图便宜,寻搜旧的线索。

二、目前的工作路线

1. 抓住中心工作：鄂西的中心区域是宜昌、沙市两处,其次如藕池、九都、监利、新堤、仙桃、岳口、沙洋也是重要地点。宜昌须以海员、码头、车夫、邮政为主要工作,划夫、挑水夫为应注意对象,其他各地则应以码头、划夫、手工业工人为主要工作,香溪、资邱[丘]和观音寺的煤矿工人,也是主要工作对象。

2. 由日常小的斗争,做到大的斗争：鄂西工人的经济要求虽然迫切,但因白色恐怖的严厉和失业的恐慌,恐惧心理很浓厚,不敢起来斗争。目前应当找出工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发动各种形式的日常小的斗争(如怠工、噪骂、包围、示威、打工头等),逐渐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发展到大的罢工斗争,这当然不是说现在绝对不能做大斗争。

3. 与改良主义奋斗：鄂西经济条件,虽然没有实行改良主义的可能,但对群众的欺骗作用还是很大。最近国民党组织民众团体的把戏,已开始传达到鄂西来了,并且无论国民党任何一派得势,这种欺骗方法,他们决不肯抛弃。因此要在群众中加深党的政治宣传,特别是八小时工作制的宣传,反对阶级调和的理论和思想。

4. 尽量利用公开的权会减少工作上的困难：在目前极端秘密环境之下,工作上加了许多困难,应根据当地情形,利用许多合法、半合法的名义,取得公开活动的机会,以减少工作上的困难,但要坚决的反对合法主义,因为合法主义是把群众送到敌人影响下面去的自杀办法。

5. 反对国民党的工作方式：命令主义,委派制度,个人恐怖主义或强迫罢工,这些都是国民党的工作方式,都是脱离群众的危险办法,都是足以妨害党的正确路线,必须坚决的肃清。只有说服群众,才能领导群众,才能取得群众。

三、群众的组织和运用

1. 工会的组织：职工会是党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组织方式，党要在各种工人群众中，利用一切可能建立革命工会，吸收广大群众加入，使之成为真正工人群众的组织。工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度，特别注意下层基本组织（工会支部，十人团）。目前白色恐怖虽严厉，但我们必须力争公开，名种[称]不一定叫工会（如俱乐部、同乐会），总要以取得广大工人群众为组织原则。

2. 工人委员会的作用与运用：工厂委员会是工人群众的代表性质的组织（没有下层组织），党要利用群众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反对扣工钱、反对封闭工会），鼓动群众起来斗争，使可以组织工厂委员会（代表团、索钱薪饱团）这个组织便成全体工人的代表，并要注意把这临时变成永久的组织。再经过几次斗争，在群众中有了相当信仰以后，逐渐进行下层组织，使之转变为革命工会。

3. 灰色团体的作用及其转变：在严厉的环境下面，不易发展工会组织的时候，用各种灰色名义（兄弟团、姊妹团、互助会、储金会、同心会）去组织群众，作用也很伟大，必须积极领导他们的斗争，使之逐渐转变成为工会。总之党必须用各种方法，不拘任何形式，任何名称，专门组织工人群众，以扩大工会实力，争取工人群众为目标。

四、对反动团体及原始团体的工作方法

1. 对黄色工会的工作方法：黄色工会在鄂西已开始发现，如果是真正有群众的，我们必须加入进去活动，领导群众，做本身利益的斗争，反对领导的欺骗，力争工会的民主化，要求财政公开。在日常各种斗争中，去揭破领袖的欺骗，以便打倒其领袖，与选群众中积极份子，使之转变为革命工会，但不应当专门做争夺工会机关的工作，主要的是注意争取下层群众，同时不应当在内另组织工会做少数分裂运动，但用纠察队名义去团结中心份子，是必要的；没有群众的，我们不应加入，另自进行各种组织，但必须派人进反动工会中去，揭破其领袖欺骗，使群众来参加我们的组织。

2. 对工会原始团体中的工作方法：鄂西工人群众有许多原始的团体，如兄弟团等，我们也应派人加入进去，领导他们的斗争，逐渐改变其性质，转变到工会。

五、目前的斗争策略

1. 日常斗争的策略：在目前工人生活日益痛苦的情势下面，群众的日常斗争机会一定很多。党要事先找出工人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扣工钱、打骂工人、罚款等来做中心宣传），一遇这些事件发生，马上鼓动群众起来斗争（怠工、吵骂、包围示威、打工头等）。开始斗争，须力求小的胜利，斗争胜利了，群众情绪增高，再准备作二次、三次的斗争。

2. 日常斗争应注意的问题：第一，要尽量发动群众都来参加，才能更容易得到胜利；第二，斗争要迅速解决，否则容易被敌人和缓下去；第三，在小的斗争中，要注意大的问题的宣传，才容易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并要在斗争中提出青年的特殊的口号，以便更容易吸收更广大的青年群众来参加斗争；第四，斗争的口号，要看敌人的形势和情绪来决定增高或降低；第五，斗争结束后，要注意把斗争的胜利和失败原因作普遍的宣传，以提高群众的认识和勇气。

3. 罢工战术的运用：罢工是工人最后武器，事先须要看主观的力量和敌人的形势，还要看资本家营业是否旺期，然后来决定罢工的一切，宣布罢工的日期，事前不能十分固定，借临时日常问题发生马上举行罢工，便能增高

群众情绪。罢工的要求条件，要经过工人群众热烈的讨论，对罢工的指挥命令的宣布条件的订定，都须经过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形式来领导。罢工了一定要注意工人群众的组织，如纠察、宣传队、侦探队、交通队等，使每个工人都参加一项工作，以免敌人破坏和调动群众不灵敏，同时要派代表向别的工人群众接洽，取得同情和援助，条件要迅速，否则容易溃败。条件的进攻或让步，又要看主观和客观的形势来决定，万一没有胜利的可能，要自动宣传复工，准备下次再来，事先的宣传，罢工中的宣传，结果[束]后的宣传都非常重要。

4.对请愿和仲裁的问题：请愿的办法，我们必须反对，但万一群众要去请愿，我们也要同去，在群众中作宣传鼓动工作，故意提高口号，答复不圆满，便指出政府坏处和鼓动群众吵闹，以示威动武，即所谓变请愿运动为示威运动。仲裁我们当然不接受，坚决直接说话，如万一没有办法也可相当接受，但一定要在群众中宣传仲裁是对工人的压迫和欺骗。

5.对于失业工人的问题：在失业工人群众中，普遍的宣传失业的原因、今后的出路，尽可能的组织起来，向资本家要工做，同时号召在业工人群众起来，表示同情和声援，但须防止收买或仇视在业工人。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原文如此。

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各县工作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一、宜昌

宜昌工作在主观上确实尽了不少的力量，然而到现在还是很少的成绩，其原因是在我们对反动的欺骗工作没有迅速的反驳，更没有发动小的日常斗争，以揭破其欺骗。至于没有坚（艰）苦耐劳的工作精神，害了急性病，也是严重的错误。以后应当征调同志，想尽方法，打入马[码]头、海员、车夫……主要工人群众中去，鼓动和领导小的周常斗争，以兴奋群众革命情绪，争取广大群众。贫民的反苛杂、争自由的斗争，亦不能放松，更要将一切斗争联系到反帝反军伐[阀]战争与拥护苏联。同时，党应加重指示团对学生运动的注意，因为学生是反帝反军伐[阀]的主要动力之一，在农村中，文化固然比较落后，但群众革命要求日益迫切。对自发斗争的神兵组织，要正确运用大会所决定的策略，加紧工作，认为加紧神兵运动是恢复北乡组织的主要条件之一。农村斗争，要以反苛杂、反对加庄为目前发动斗争的主要口号，使农村斗争发动起来，造成农村工作的活跃现象。近郊工作，兵士团丁运动，更加以特别注意。

二、沙市

近来沙市工作，已有逐渐向前发展的形势，但是在主观上，还是犯了不少的错误。如没有计划的发动和领导斗争，没有经常的宣传鼓动工作，忽视纸票兑现的斗争，误解职业化的意义，忽视近效工作等等。现在自然要针对着过去一切错误，改正工作路线。码头、打包厂、海员、车夫是中心工作，丐[面]业工人、灰丐[面]厂、米厂、土工、煤球工人、划夫也要设法建立，纱厂、榨油厂虽然尚未开工，亦应准备将来打入。根据大会工运决议，有计划的发动和领导斗争，在斗争中生长党和群众的组织，同时也要领导贫民反苛杂、争自由的斗争，总之，我们不是失掉任何斗争的机会，并要与反帝反军伐[阀]战争和拥护苏联联系起来。对兵士的宣传亦须注意，以使兵士对斗争的同情和帮助。同时要时时刻刻将下游赤色区域的革命政治影响，在群众中普遍的散布。对近郊工作，亦须特别加以注意。

三、江陵

江陵党过去曾经作了长期的斗争，而终久[究]还是失败。其原因固然是一切工作上的错误，但在客观上，如阶级分化不显明，反动势力的强大，封建集团的巩固和干部人材的缺乏等，的确予革命一些困难。大会认为，江陵党在今后除努力执行二次大会的决议外，应特别加紧下面几点特殊任务的工作：

1.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在江陵表现得很清楚，应建立经常反帝工作。
2. 在建立鄂西联合政权的政治任务之下，应特别加紧反苛杂的斗争，发动广大群众，恢复赤色区域。
3. 抓住封建阶级剥削群众、欺骗群众的事实，尽量向群众宣传，以促进群众阶级觉悟，引导群众起来作反豪绅族长的斗争。
4. 有计划征调大批同志打入团土中去建立秘密组织，扩大政治影响，夺取其下层群众，以破坏敌人的基本营垒。
5. 改变和平发展的工作路线，应时刻加紧日常斗争，从斗争中吸收积极忠实份子，特别是新的干部的培养。

6. 江陵是鄂西的中心区域，在工作上的确可以影响邻近各县，应与石首、公安、监利发生横的亲密的联系。

7. 对富农的策略运用得不正确，应马上纠正这一错误，引导雇农、贫农加紧对富农斗争。

8. 江陵是鄂西红军游击的中心，应马上发动群众各种斗争，扩大拥护红军的宣传，使群众的斗争与红军的游击配合起来。

四、石首

石首的党，斗争的历史比较长久，事实上不仅割据东北两区，而且发展了华容的文、连两区的组织。最近更因军事上的几次胜利，使全县豪绅地主阶级的统治发生动摇。但因过去偏重军事，组织上的缺点极多，

同时没有土地政纲。大会认为，目前马上应召集全县代表大会，根据鄂西二次大会的精神，从新决定工作路线及党的任务，尤其是要加紧训练工作，培养新的干部，提拔新的积极工农份子，参加指导机关。对于同志腐化的危险、依赖军事的心理以及农民落后的保守观念，应当予以极严重的纠正。城市工作应以藕池、县城为中心，不可有丝毫的放松。赤色区域应当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交农民耕种。加紧雇农对富农的斗争，逐渐将党与群众组织的基础转移到雇农贫农的身上，并且积极扩大苏维埃区域。

五、荆门

整个荆门的政局紊乱，经济枯竭，目前已是走到严重的阶段。而党在此情形之下，还是和平发展的工作路线，这当然是严重的错误。大会认为荆门党[应]马上根据大会精神，发动日常斗争，在斗争中扩大政治宣传，争取广大群众。但须认识客观环境，有由经济斗争迅速的发展到政治斗争，形成游击战争的极大可能。不过对汉流土匪的策略的运用有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加紧对汉流土匪的政治宣传，夺取其下层群众，打击其领袖，影响到革命方面来，但绝对不要践[重]踏过去的机会主义而失败。

六、当阳

大会认为，当阳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各自抓住部份群众做工具，以及改组派、第三党、无政府党的活动，都是加重了当阳党的政治任务。以后应当抓住中心工作，尤其是观音窑工、玉泉佃农，严密党的组织，加紧教育训练，肃清“左”倾、右倾的危险，正确运用大会的总路线，对于一切欺骗宣传工作无情的反驳。更要发动日常斗争，在斗争中揭破欺骗的宣传，夺取广大群众到党的周围，并注意将组织基础建筑在雇农、贫农身上。同时帮助团建立工作，以争取青年群众和领导青年群众，也是非常重要。

七、松、枝、宜

目前三县的政治经济情形，具备了革命的件[条]件，但因饥民斗争失败，经过白色恐怖的摧残，群众已为失败情绪所笼罩。现在我们应当充分研究过去斗争失败的经验，有耐心的、有计划的发动小的日常斗争，取得小的胜利，以冲破严厉的白色恐怖，渐次肃清群众失败的情绪，走向高潮的前途。在斗争中，要扩大政治宣传，争取广大群众，更要继续不断的创造党与群众的组织，产生下级干部。主要的是保证雇农、贫农的领导作用，一直到革命的彻底胜利。对于团土运动亦不容忽视，一定认识工农斗争要取得团土的同情和响应，才能有更大胜利的把握，才能使经济斗争很快的走到游击战争。

八、公安

公安边近长江流域，在鄂西范围内，政治上的确非常重要。但从去年斗争失败后，机会主义的残余还保留在党内，固然是白色恐怖的严厉，其主要的还是由于未能运用六次大会正确[路线]之所致。大会认为，公安党在今后应有耐心的、有计划的发动群众反苛杂、减租、抗租的斗争，以恢复群众斗争的勇气，肃清群众的失败情绪。在斗争中，要加强雇农、贫农的领导作用。加强团士运动，应征调大批同志打入团士中去，建立秘密组织，扩大政治影响，以破坏敌人的基本营垒。同时要严厉纠正和平发展的错误，从斗争中建立和改造党的群众组织，注意提拔新的积极的工农份子参加指导机关，并要帮助青年团发展组织，以建立青年团在公安的基础。

九、南华安

南华（安）虽有斗争的历史，但是犯了极严重的盲动主义，群众组织没有基础，党根本脱离了群众。最近虽有文、连两区的恢复，亦不是由群众斗争中间恢复的，而是由于石首赤区的扩大，红军游击所致。大会决定文、连两区仍归石首县委指挥。三县组织南华安县委，县委机关应设立三县适中之地，以便于指挥三县工作。三县群众目前失败的情绪仍然浓厚，加以豪绅地主统治阶级的软化政策与屠杀政策同时并进，党不能运用正确的路线，反而走到和平发展的右倾危险。大会指出，三县党的任务是特别注意发动日常斗争，只有斗争才能逐渐消灭群众失败的情绪，克服右倾的危险。

十、长阳

过去，长阳的党忽视工人运动，组织散漫，没有发动日常斗争，结果因机关主义而失败。近来受红军游击的影响，群众革命情绪又行高涨起来，所以我们应立即发动各种斗争，在斗争中建立农村无产阶级基础，整理和严密组织，同时扩大政治宣传、尤其是拥护红军的宣传，并号召广大群众加入红军，但须尽可能的自己由斗争中生产[长]红军出来，这在长阳环境有很大的可能。关于神兵运动也是主要工作之一，应根据大会对神兵工作的决议，正确的去执行。

十一、监利

监利的党，现在完全被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所笼罩，对于组织观念又不明了，以致发生许多无原则的意气纠纷，互相攻击，互相排挤而防[妨]碍工作。同时保守观念太深，赤色区域的割据，终不越洪湖范围以外，不领导雇农、贫农对富农的斗争，不实行土地革命。这自然不能改造组织，党的基础不能转移到农村无产阶级上，并且充分犯了恐怖政策、惩办主义与盒子炮发展组织的错误，这是监利党的前途极大危险。大会严重的指出，此时应即改造党的指导机关，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发动雇农、贫农对富农的斗争，在斗争中建筑农村无产阶级的基础，加紧无产阶级的教育训练。坚（艰）苦的做城市工作，注意发动非赤色区域的斗争，加紧三、四区的工作，以扩大苏维埃区域。坚决与盒子炮主义、保守观念、恐怖政策、惩办主义斗争。建立党、团的正确关系，建立党与红军的正确关系，肃清国民党式的办党观念。对于一般同志积极纠正腐化危险、官僚倾向。这些都是目前紧迫的任务，决不能有丝毫的放松。

十二、钟祥

钟祥的党是由和平发展当中产生出来，又脱离上级的指示，忽视许多斗争的机会，发生许多错误。如做脱离群众的经济运动，到现在当然形成不生不死的状态，大会要以后特委与钟祥党建立亲密的关系，只要能够根据大会

精神，改变工作路线，抓住城区、石牌、岳口以及佃农区域为中心工作，加紧党员的政治训练，扩大政治宣传，尤其要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发动日常斗争，在开始须取得小的胜利，以兴奋群众。在斗争中就要产生许多积极的干部，同时正确运用对汉流土匪的策略，保证雇农、佃农的领导权。这样才能扩大斗争，并保障彻底胜利。

十三、归兴巴

目前归兴工作，因应付变兵策略的错误，而使工作失败。巴东尚在与统治阶级作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大会认为，以后三县在组织上应发生亲密关系，以沿江为中心工作区域，坚决纠正和平发展的错误。根据大会对神兵运动的策略，以“反对苛捐杂税”为鼓动斗争的主要口号，取得广大群众，尤其是神兵群众的踊跃参加，并领导这斗争走向政治斗争，而形成游击战争，更扩大政治影响。这在军伐[阙]战争与三县政治影响环境中，非党[常]的必要。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

——政治经济概况、鄂西大会经过、组织问题、群众斗争情形及军事情况*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目 录

- (一) 鄂西政治经济的概况
- (二) 鄂西大会的经过
- (三) 一特全会的重要决议
- (四) 党务概况
- (五) 一般群众斗争的情绪
- (六) 军事概况及其计划
- (七) 贺方红军的行动
- (八) 过去大的错误及其纠正

中央：

在最近由宜昌寄来两信，收到否？是由四川省委的通信处寄来的。现在对你们作以下的报告，因时间的仓促只能写一个大概，同时对省委已有详细的报告，我们的报告如下：

(一) 鄂西政治经济的概况

1. 鄂西在彭旅范师以及一些杂色军队统治之下，他们都在蒋系实行拥护蒋。本月初旬施南万旅反蒋，首先在红花套一带与彭旅不敌，又退至宜昌之河西，不多时范师与川军之郭师赶到，才将万旅击退到当阳、远安，彭旅又回转追到当阳、远安将万旅击破并俘掳士兵，获得枪枝不少。此次反革命的战争，两方死伤不少（约五六百人），保卫团助万旅也死了一些，并误伤群众数十人。现在还是彭旅统治宜昌，川军也有一部分，不过军部不在宜昌。沙市依还在范师统治之下。

2. 经过此次反革命战争之后，反革命的真面目完全揭破，同时对群众的压迫剥削，也只有日益加紧，如军阀对编遣军券催促，苛捐杂税的加重，封船封马[码]，拉夫筹饷，并军事戒严，使市面萧条，贫民已是苦不堪言，所以一般群众对于我们的革命宣传较前容易接受，群众对我们的表示同情亦较前加重。

3. 群众所受的压迫，政治与经济是同时加深。今年年成不好，但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反而加重，在乡村中豪绅地主的加庄，在宜昌、长阳、宜都、板江、松滋是非常紧迫，如果群众反抗即以共产党的名义加在头上，使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此次沙市市票的塌台，更是使群众群起反抗，事实是因沙市市票大多，约有五十余种，因经济困难与恐慌，于是完全不用，不过后来范硬抢捕市票老板，强迫兑现，将群众情绪镇压下去。到了现在还是有一部分在市面使用，所以票慌还是继续不断的发生，不过不及以前的厉害。

4. 在政治经济的紊乱当中，豪绅地主异常恐慌，有的跑到沙市、宜昌，有的跑到武汉，这也是贺龙的红军出发鄂西游击，鄂西石首的红军攻下郝穴复而游击普济、沙岗一带的原故，便得豪绅大起恐慌，中方逃亡。在政局较稳定的地方，豪绅不愿过问政治，让一般不识时务的青年来于，如荆门是。

5. 鄂西经济已是枯竭状况，因党的组织力量的薄弱，党的组织又不普遍，

同时又不能正确的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而扩大成为红军的游击，并且已有红军的政治影响不大，一般的政治宣传不普遍，我们的宣传始终被敌人所压倒。所以一般群众在压迫剥削当中，以致生活困难，群众真是吃了早餐无晚餐，只有挺[挺]而走险，或经统神兵（如归、兴、巴、长、宜等县），或做土匪（荆、钟、潜、京、天等县），不过多半为豪绅地主所利用，成为保护豪绅地主的工具。在党以前甚至以他们作成死敌，不设法争夺其群众，在其中扩大革命的影响，这当是严重的错误。反之在江、石、监、沔、公、南、华、安等县，党的力量较好，所以×没有土匪神兵。

6. 统治阶级的军事力量除了军队以外，就是团防，但是到了现在，团防很明显的已起动摇，尤其是下游一带。石首一次胜利，我们俘虏团丁百余人，后来对他们特别优待，放回去一部分，将我们的政治影响带到一般群众中去，更其促进团防的动摇。上游一带，因团丁的生活困难，群众又反对团防，所以我们的团丁运动很易推进，同时也就证明团防的动摇与革命化。在反革命的军队中的兵士也是动摇与革命化，如守牢的兵士对共产党特别表示好感。

（二）鄂西大会的经过

此次大会在赤色区域举行，到会代表三十五人，代表十二县，工农分子占半数，旁听四五十人，有鄂委代表参加，共九天之久，先是有决（议）案草案根据讨论，除根据决议案草案讨论以外，还有讨论纪律问题、经济问题、汉流土匪问题、变兵问题以及各县工作决议等。因为此次大会是带有教育性，主席团颇注意工农分子的发言，在工农分子也很踊跃的发言。在其他项下省委代表提出举行宣传周，于是大会决定于一月一

日至七日举行拥护苏联反对军阀战争宣传周，并在宣传周特别加紧各种工作，尤其是发动斗争，以与宣传工作联系起来，在批评与纪律问题项下，代表也有热烈的批评与争执，所以省委代表大会闭幕时的结论，认为大会的精神是不错的，特委的选举是由省委代表提出通过。人数是正式特委七人，候补两人，书记由省委代表决定逸群同志担任。在大会中，要石首党召集二次大会，动员全体代表以群众资格参加，并要代表担任群众大会中的宣传员，使代表接受革命群众的意识。所以到会代表都非常兴愤[奋]，现在代表已安然到各县，对鄂西全部工作，一定有大的推动。在大会的决议，也快整理完善，不久即可发到各县。但是在大会中的决议草案，都是油印出来，所以草案已是转各县了。

（三）一特全会的重要决议

1. 以逸群、鸣、文化组织常委会，逸群担任书记，鸣任组织，文化任秘书兼宣传。四个委员，初成切实指示沙市市委工作，翁任宜昌工人（运）动，德昌担任下游红军工作，小康担任石、监、安巡视工作。两个候补委员，正品担任荆、钟、潜、天、京、当的巡视工作。

2. 特委机关决定设立在沙市（但在最近因环境的变迁，恐有变更）。

3. 特委出版《鄂西通讯》（由秘书处负责）、《党的生活》（兼有组织材料，由组织部负责）以及对群众宣传等等。

4. 划石、监、沔为第一巡视区域，荆、钟、潜、京、天、当为第二巡视区域，巴、兴、归、长、五、远为第三巡视区域，松、枝、宜为第四巡视区域，由特委直接巡视，公安、宜、沙。江陵为特别区域，亦由特委直接巡视。还有南华安为第五巡视区域，尚无人去巡视，俟整理后再派人去巡视。

5. 建立三个交通处：一直昌，二沙市，三岗 亦设法建立。现在巡视

员已出发，交通处也建立就绪。

6. 鄂西经济统一，每日开支约一千三百元。

（四）党务概况

鄂西党员约四千人，成份工农分子占十分八九，尤农民最多，女同志约五十人（以后组织部建立当有详细统计）。组织上的缺点，就是城市工作不能建立起来，农村尚未建立在雇农上，没有支部生活。农村工作尚未抓住中心工作，尚未动员党员担任宣传工作。好的方面是地方党部日渐健全，一般党员逐渐肃清失败情绪，支部生活较以前进步，党也能渐次领导群众斗争，党与群众关系也较前改善一些。

（五）一般群众斗争的情绪

1. 因对群众的压迫剥削加剧，一般群众斗争的情绪，在上游一带的群众反苛杂，尤其是在乡村中的反对月捐[团捐]，反对加庄斗争的要求非常迫切。因为群众生活已经到了早晚莫继，然而交庄及月捐反而特别厉害。但是因为党员群众的失败情绪尚未完全肃清，大都是不动则已，一动就要成功，所以不敢领导日常斗争，一直到造成赤色区域。这一错误已在大会严厉的纠正过。下游一带的群众的要求红军去打反动军队非常迫切，因为是统治阶级将赤色区域的苛税收入加到非赤色区域群众的身上。如石首的调关（石首的大城市）的群众几次写信来红军方面要求去打反动派，此次红军打到沙岗。普济观、黄×畈，那里群众对红军痛哭流涕，这都证明群众革命情绪。

（六）军事概况及其计划

鄂西完全没有兵士运动，只有一些团丁运动。虽然听说范师川军中有党的组织，但无法接头，请中央从速设法将襄的组织交到鄂西的党，我们以后也应当特别注意加紧兵士工作。在红军的组织是称红军中国中央独立师，师长<由>段德昌担任。监利沔阳的红军，为第一纵队，纵队司令由张一民担任，其下分为两大队，共六个中队，有步枪四百余支，连枪二百余支，花机关<枪>三十二支，水机关两架。石首的红军为第二纵队，纵队司令由段雨林担任，其下有四个中队（因无人负大队长之责，无大队之组织），有步枪三八十支，连枪八十支，花机关三架。现在第二纵队已出发游击，向江陵发展，本月十五日将江陵之郝穴（较下[小]城市）攻下，政治影响颇好。后又向普济观、黄×畈、沙岗一带发展，准备建立数县联合政权，在江陵之西北区有步枪二十余支，准备树立起来成立一个中队，荆河之城南有步枪十余支也是同样准备，钟祥也有步枪二十余支，亦是同样准备。长阳有长短二十余支，罐子炮数十架，旧式武器更多，准备编成第三纵队，长阳还有失掉联络的武装一些。此外江陵有特务队一队，有连枪八支，石首有特务队一连枪五枝，石、监、沔三县都有赤卫队，有枪枝百余支，鄂西军事力量大致如此。只要军阀战争延长；不难尽行拖出，加紧游击，而向中心城市发展。不过监利的党与红军前委，好久没有与特委发生关系，现在已指示其向外发展，于最近集中江陵，响应监方红军，造成极大的政治影响。后方即以赤卫队担任维持赤色政权。在军事上还感三个困难：（1）第二纵队缺乏子弹，尤其连枪子弹，第一纵队的枪线索尚存在，（2）缺乏军事干部人才，因为在行动中牺牲太大。（3）将来如不向外发展，经济一定感觉非常大的困难，因为人数太多的原故。（4）伤兵大多，缺乏得力军医。（5）没有修枪的，虽有坏枪百枝，无人修理。以上第一、四、五三个困难请中央设法解决。

（七）贺方红军的行动

1.他们现在尚在五峰、鹤峰两县布置电话，似乎是为长久之计，但在我们已经几次写信要他发出游击向鄂西下游发展，以与下游红军取联系。

2.他们的行动已由土匪式的行动，变成国民革命军出师广东时的行动，不拉夫，不爱钱，打富济贫。所以还是可以拨[博]得群众的拥护。

3.五峰、鹤峰的团防与贺有接洽。有贺氏天下之概。因为群众只认识贺一人，甚至以贺龙为真命天子。

4.有第三项的原因，是因为没党与群众的工作，因此他们之打击豪绅地主，完全是取侦探方法，当然会闹出许多错误的地方，如将穷苦的贫民认作愷吝的土豪。

5.万同志前去找组织未着，转宜又被捕坐牢，十四日(与宜昌破获同时)，现又由沙市那里去了。他说他的任务是要去发展党和群众的组织，与他们信上所<说>差不多。

(八) 过去大的错误及其纠正

1.过去没有执行土地革命，现在已到非执行不能维持赤色农村的经济，更难保持群众革命情绪。并且如不执行这一二作，在赤色区域的党简直是没有工作可做了。

2.到了现在还是以农协代替政权，现在已尽量建立苏维埃政权，石首已开始。

3.过去没有号召广大的群众大会，使群众拥护革命，现在公、石、江已是尽量召集，努力扩大政治影响，只要红军到达的地方，即召集群众大会。

4.过去党与群众的关系不好，完全是国民党的办党方式，现在加紧纠正这一错误。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原文如此，枪数似有误。

鄂西政治经济状况与革命形势的发展

(一九三一年一月)

一、帝国主义在鄂西势力的增长，军阀战争的扩大延长，豪绅地主阶级的剥削日益残酷，促成经济破产的速度日益加剧。

湖北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心之一，尤其沿长江流域各县，帝国主义势力日益增长，更是一个严重的现象，鄂西为川、鄂两省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交通上的重要地位，便成为帝国主义在湖北发展势力主要部分之一，同时因为军事上的重要，又成为军阀战争所必争之地。豪绅地主阶级在鄂西有坚固的基础，尤其是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统治维护之下，更巩固其农村中的统治。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冲突，为造成军阀战争主要条件之一，所以帝国主义的矛盾，同时反映着军阀战争特别利害，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与军阀战争的扩大×长，更加使豪绅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更加残酷。帝国主义的商船在鄂西日见增多，使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更发深入农村，再加以帝国主义在鄂西企业的投资（如打包厂的开办以及正在建筑的榨厂、纱厂）日见增加，逐渐打破了农村的半自然经济，广大的农民群众日益破产。又因为劳动后备军（破产农民）的增加，城市工人亦日益失业，军阀战争不断的爆发，苛捐杂税的繁重，公债库券数额的无限增加，豪绅地主无情的加庄、加租，并且可以自由抽收捐税，滥发市票、乡票，以及放高利贷，再加上天旱水荒，遂造成市场萧条，商业停滞，金融紊乱，物价高昂，捐税繁重，税收减少，农村破产，工人失业，饥民载道，土匪猖獗的现象。

二、豪绅地主的统治在鄂西仍占着优势，改良主义在鄂西绝少有继续发展的可能。

豪绅是地主阶级政治上的代表，同时又是帝国主义在农村中的买办，军阀的爪牙，并且兼为高利贷者，他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羽翼之下，更加巩固了他在政治上的统治，尤其是在鄂西帝国主义势力的增长与封建势力的强大，豪绅地主的统治在鄂西仍然占着优势，他有镇压农民的武装——民团、保卫团、清乡队、常练队、编练队等，极力镇压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他可自由屠杀农民，自由抽收捐税。最近的数县联防，包围清乡，这样更证明了豪绅地主在鄂西政治上的统治力量。只说鄂西政治上曾经过张发奎在鄂西时改良主义的相当活动，有他宣传机关的《宜昌周报》之出版，有他的黄色工会的宜昌市总工会整理委员会之出现。又如在宜昌有市政委员会的组织，及在各县改组派的活动与欺骗民众的宣传，在群众中多少发生了不少的影响，尤其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有相当的笼罩。整个改良主义的政纲（二五减租、减轻田赋等）在中国已经作了最后一次的撕破，同样在鄂西一点也不能解答群众的革命要求（如宜昌码头工人要求加价，而宜昌市党部则说“不准苛求”、“依照原例”、“否则是捣乱”；码头上挑、抬两帮发生冲突，则谓：“此系刑事，到县衙门地方法院起诉去”等欺骗群众压迫群众的事实），在群众斗争中已经完全揭穿了改良主义的假面具，群众在一切斗争中已经认识清楚了改良主义，逐渐的脱离了改良主义影响，当然不是说改良主义在鄂西的影响完全肃清了，在政治上完全一点作用没有了，不过在鄂西的政治经济环境上绝少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加剧，如互争团总、城市团防不愿意下乡，乡下团防不受城市团防调遣等，这些矛盾他们本身始终没有方法解决的，加以群众斗争的发展，使统治阶级更加恐慌，

一天天走向崩溃的道路，这个矛盾更加是统治阶级没有方法来解决的。

三、革命的危机日益加深，群众斗争日益发展，革命的高潮必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但不可作过分的估量，还要靠斗争力量来推动。

鄂西经济破产日益加剧，使广大农民破产，必然要激起广大农民反军阀豪绅地主的斗争，加以统治阶级镇压革命的主要方法——屠杀政策和极残酷的完全土匪式的清乡。松枝宜的饥民斗争成千累万；归兴巴的神兵抗策税，反对驻兵；鹤峰的农民反保卫团的武装冲突；长阳农民进攻县城，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宜昌北乡的秋收斗争与西乡抗苛杂的斗争；荆门、当阳的反苛杂。反豪绅的斗争，以及各地各种自发的斗争，经常的不断的爆发。同时石首、监利、沔阳、江陵的赤色区域至今仍然保存和恢复与扩大，红军蓬勃的生长与发展，改良主义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日见消灭，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日益扩大，这样都证明了革命危机的加深，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但是我们不能作过分的估量，因为即使这些现象汇合起来，还不能成为真正的高潮，同时统治阶级虽说日益走向崩溃的道路，但封建势力还有很顽固的基础存在，主要的要看我们艰苦困难的斗争，正确的策略坚决的运用，和争取广大群众的力量，来推动这一革命新的高潮迅速的到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原文刊登在《新鄂西》刊物一九三二年第二期。

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中央：

1. 沙市机关破获的原因及其经过情形。此次沙市机关的破获虽出意外，亦可以看出统治阶级的动摇。“三一八”纪念日，我们因为宜昌组织兵变要加紧宣传工作，始发出许多传单、宣言，特别对于鼓动兵士的宣传品非常之多。敌人因为红军逼近沙市，郝穴、藕池、石城等重要市镇均被红军攻陷，沙市就非常戒严。当夜在车夫工人周德兴手中检查出传单，便问他是那里来的，他说在香街完全是的。于是将桂香街挨户检查，捕去群众百余人，而市委的机关因之破获。市委书记傅如常（假名田宜之）、特委交通李伯武（假名董守贵）均被捕，并抄出传单、油印机等证据。傅如常受刑不过，又供出秘书处，于是严丹同志又被捕。其他有李鸣高（车夫）、赵某、贾某等同志均于十九日被捕。属于市委管辖的同志都闻风逃跑。特委另一接头处亦在监视之中。二十一日，和成同志（特委之一）因到接头处问信又被捕去，无证据，同时他身上有洋三十元，稽查贪财不报告上去，又有一个稽[查]认识他，用去二百余元，只将他放出，但他不能在沙市公开工作了。二十七日，由李蕴市出布告把严丹、如常、伯武、安高、德兴（系群众）五人刀杀了。他们就义时非常慷慨，沿途高呼口号，视者莫不叹惜。他们五人虽然牺牲了，可是在沙市的政治影响极好。比如在狱中时，国民党的市党部及郑孝堂（剿共团指挥）等均给严丹去谈话，[他]详细解释本党的策略和主义，统治阶级除佩服之外，并感觉自身的危险。统治阶级又因为如常是工人，找他去谈话，如常又能发挥许多意见，统治阶级均佩服本党的训练工作。他们在狱中共有八天，每天大演其说，大唱其歌，尤其《士兵革命歌》，士兵闻之莫不感动，甚至有下泪的。

2. 目前沙市的组织情形。此次破获，如常同志的表现不甚好，因为他受刑不过，就把沙市一切组织公开了，使一切同志不能在沙工作。虽然他过后向党悔过，但是他这种错误非常严重。现在沙市一个支部也没有了，只有几个同志与特委发生关系。特委只有易容[穷]一人在沙，每日忙于应付工作。关于沙市的组织问题俟到三特全会时解决。

3. 工作上的影响。此次破获对于整个工作都有莫大的影响。比如我们决定四月十号成立鄂西苏维埃政府，各县均应派代表参加；又决定各县组织赤区参观团及扩大教导队，由各县派同志来受三个月的军事训练，这些工作都因沙市机关破获而致停顿。中央交通不能接头，一月多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这些都是工作上的影响。

4. 赤色区域的扩大与土地革命的深入。江陵、监利、石首三县除了重要城市驻有反动军队外，其余乡村几乎完全被我们占据。这三县均成立苏维埃政府。地主豪绅、祠堂、庙宇的土地均已没收，并由政府分配。农协已取消。各县均有总工会。雇农工会属于县总工会。

5. 红军的扩大。最近两月来红军发展极顺利，这虽是军阀战争的结果，但是游击策略的正确，还是主要原因。两月来红军集中向外发展，向中心区域进攻，沿长江大河游击、不惟枪枝发展，而且政治影响亦非常扩大。宜昌、沙市的报纸无日不载红军的消息，统治阶级极为恐慌，最近由汉购来子弹甚多，大有所向披靡之势，所以最近攻下郝穴、藕池、石城，调弦等大市镇，

发展枪支在六百支以上。独立十四旅开了一团一营，五十三师一营、团防数百人下去“围剿”，并派兵舰一只在江中游击，我们又决定由石到江进逼沙市，使他又扑一个空。

6.关于新一师兵变的问题。此次组织兵变，因为没有下层基础而误信一、二同志的意见，对于该部的估量（组织上的估量）不正确，以致里面负责人不接受党的指示而踏入机会主义的泥坑中，现在简直是失败了。比较坚决的同志不能立足了。详细情形由继勋报告。不过我们要声明的，此次组织兵变不是我们立于旁观态度，而是军中的同志欺骗党，口是心非，如冯阎说出洋下野一样的把戏。他们所谓树红旗都是欺人之谈。

7.此次报告简单的原因。因为机关破获，以致我们写好了的报告（秘密写的）被抄，遗失了。现在这些底稿均送到赤区去写，我手边没有材料，以致不能做有系统的报告。但此次俟交通来，最主要的任务是要与中央发生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得不到省委的指示，中央若再不理我们，是无异放弃这一部份的工作。我们决定要王同志到上海建立交通处，并要他带中央文件来鄂西。

8.对省委的批评。省委半年来没有一号通告来鄂西，足见其工作不紧张、官僚化，而且不依组织路线，因酒阳供给他的款子，便忽视自首问[题]，因监利多金而直接到洪湖提款。最近又要监委在汉建立机关，又闻到划荆、钟、潜、京、天五县直接指挥，弄得我们莫明其妙。这样的省委我们实在不需要，但在工作上我们非常需要一个健全而正大光明的省委。我们绝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我们站在工作立场上很诚恳的请求中央纠正省委的错误，以得力同志健全省委，加强省委的工作。

9.我们的意见。目前湖北革命形势的开展，真有一日千里之势，六次大会所指示的中国革命有割据一省或几省的前途，在湖北真有这个前途。但是因为省[委]不健全没有全省的工作布置，以致不能推进各地工作，这也是莫大的损失。我们请求中央召集湖北全省代表大会，讨论今后的工作，选举新的省委。

10.我们的请求。请派鄂西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一人，红军前委书记一人，红军军部政治委员一人，特委委员二人，其他军事组织凡有一技之长的同志，请多派来鄂西。还有鄂西及南华安三县流落上海的同志都请派来为禱！

中共鄂西特委鄂西党各级干部名单

（一九三 年）

| 姓名 | 出身 | 现在担任的工作 | 鄂西干工作 |
|--------|--------|--------------------|---------|
| 万涛 | 学生 | 巡视员 | |
| 段德昌 | 黄埔四期 | 特委兼总队部参谋长 | |
| 屈扬春 | 农民 | 特委常委 | |
| 戴绍鼎 | 二十军教导团 | 江陵县委 | （前宜昌书记） |
| 郑炽昌 | 学[生] | 宜昌书记 | |
| 崔琪 | 农民 | 监利书记 | |
| 杨锦堂 | 农民 | 特委兼监利县农协委员长 | |
| 彭之煜 | 学生 | 江陵书记 | |
| 陈香波 | 学生 | 江陵县农协委员长 | |
| 徐国元 | 农民 | 特委 | |
| 李勋成 | 学[生] | 江陵县委 | |
| 董达山 | 学[生] | 监利县委 | |
| 李盛文 | 学[生] | 松枝宜书记 | |
| 赵德昌 | 农民 | 宜昌县委 | |
| 张吉阶 | 学[生] | 石首书记 | |
| 刘受[革]非 | 农[民] | 江陵县委 | |
| 卢铁血 | 学[生] | 沔监书记（此人有工作能力但不易驾御） | |
| 刘荣生 | 学[生] | 江陵县委 | |
| 李彦青 | 学[生] | 宜昌书记 | |
| 胡慎之 | 学[生] | 潜江县委 | |

注释

此年代为编者判定。

中央通知（第一 三号）

——关于全日红军指挥问题（一九三 年四月三日）

现在全国红军的发展指挥统一问题，已非常严重而必要，过去因为没有严格的规定，对各地红军，除中央指挥外，各省省委以至特委都可以指挥，于是指挥的系统既紊乱而决定又常不免有抵触，比如中央决定江西之二、三、四团及二游击大队为第三军，而现在前委又决定为第六军。阳新大冶红军中央决定为第八军，而广西又自己组织第八军。又如中央根据全国的政治形势，决定某部红军向何方发展，而省委或特委又有与中央的不同的方向的决定，若如此紊乱下去，将来难免不发生更严重的问题。因此中央决定关于红军的指挥问题，以后各地已组织的正式红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中央与各地红军距离太远指挥不灵便，中央军委将在各地设立办事处（如最近拟在南方及武汉设办事处）代表中央军委工作，如距办事处还远的地方，中央军委当委托各省军委指挥，但这种指挥的统一，绝对的不是不要各省委与各地红军发生关系，相反的各省省委以至特委必须更密切的与当地的红军发生很密切的经常的横的关系相互帮助，供给他们政治消息文件刊物，建立交通以及一切物质上精神上一切可能的帮助，来扩大与发展红军的组织。

至于地方的赤卫队、游击队及一切地方性的武装，均应渐次集中组织为红军，但在未成立红军之前，仍归地方指挥，一至成立红军后则指挥权应移交中央军委。

注释

原件无时间，此系文件戳记上填写的。

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

(一九三 年五月)

一、绪 言

鄂西的游击战争发动到现在，经过两年多的历史，其中因为不能正确的运用游击战争的策略，而遭了几次的挫折，甚至于严重之下犯了埋枪主义的错误，有一个时期的消沉。在这次大会以后，确定了游击战争的策略，又才重整旗鼓，不上一年，创造沿长江一带四百里路之赤色区域，在三万赤色群众拥护之下，正式的成立红军第六军。最近接连攻下好几处的城市，建立了儿县的苏维埃政权，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政纲，红军与政治影响的奏效，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我们至少可以预言，鄂西由群众斗争中生长出来的红军，在不久的将来，便要成为群众暴动主力之一。因此，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现状，有值得详细叙述的必要。

二、鄂西游击战争的历史

我们要明了鄂西红军生长的来历，必须要分几个时期来说明。

1. 第一时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以后，湖南首先实行打“暴徒”的口号，澧州周[邹]资生同志所领导的农民，自农军拖到公安与公安南帮农民（公安多湖南的农民）领导杨永祥合作。在打“棒老二”的口号之下，发动了公安的群众做反苛捐杂税、反豪绅的运动，武装亦有相当的发展，割据了公安的六、七两区，公安县城亦在赤色盛[威]力之下。鲁涤平的第二军驻防沙市，不敢向我们进攻。湘鄂战争结束以后，桂军到了湖北，才向公安进攻。当时的公安的游击队，决定拖到石首（但结果只拖到了四十九枝枪）与石首的武装（约二十枝枪）会合，进攻调弦，未得胜利，而环境更加险恶（十八年厉行清乡），反决定拖到监、酒两县交界之洪湖。

一九二八年三月，鄂西游击大队到了洪湖以后，又与鄂中的游击队（拨壳枪三十枝）及华容的队伍（步枪十枝）集中进攻沔阳之峰[口]，只缴得连枪二枝，步枪三十余枝（但峰口是处在戴家场、府场附近，所以几点钟后我们退出峰口时，敌人反攻的步[部]队已住到了），这次我们没有损失，安全迟回洪湖。游击队因为要冲破敌人的包围，乃决定拖到沔西。由杨园到沔西之拖船埠，路上就与团防打了三仗[仗]，当时潜江、沔阳、监利、江陵的团防都注西[意]沔西，有联合包围的计划，如要打败敌人的包围，只有向外游击，而游击的方向，以由江陵出荆当远为适宜。可是当时党的负责同志，地方主义太深（当时沔阳属鄂中特委指挥），鄂中的同志不愿离开沔阳。石首、公安的同志要求回家乡去革命，当时没有办法解决，只好决定分为两起，一部留守沔阳，一部拖回石首。殊不知留在沔阳之一部份，因死守拖船埠而失败，拖回石首的则因石首清乡厉害而又分为两起，一部留在石首把长枪埋在地下；一部出华容到监利洪湖，连枪与马枪编为特务大队，仍以周资生同志充大队长，专任个人恐怖的工作。鄂西游击战争至此时可算告一段落。

此外还有两件事值得说明：

（一）当阳[农]民的暴动，一连三次均归失败，失败的原因，主要的是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始则勾结军事的领袖（川军秦汉三），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不知领导他们去解决敌人的武装，反而下令退缩，勾结好了的军队

(即秦汉三部)来赤色区域内部来清乡以致失败。随后群众斗争情绪已经低落,而党又命令群众暴动,结果仍旧失败,而群众组织因之塌台,至今未能完全恢复。

(二)是巴东的暴动,已经占领了县城,夺取了政权,组织人民委员会,可是拿到政权两三月之久,不坚决的执行土地政纲,豪绅地主的经济基础仍然保存,群众组织如农会、工会完全没有,封建的神兵组织日益扩大,以致后来军事失败。

在这一时期,鄂西的一切军事发动,大部份党受了盲动主义的支配,同志们真是像发狂似的口里天天喊暴动,其实并不知什么叫暴动。一般农民仇视街上人的心里[理]非常浓厚,在每次军事行动之后,无目的的烧杀,简直是照理的文章,假使有人不主张烧杀,同志们便骂是机会主义者。因为这×干了半年之久,在群众中反给了不好的影响,加之反革命派的宣传作用,军事行动得不到群众中的拥护,与每次行动之后,党的组织塌台,如公安、当阳、巴东、石首、江陵等县在军事失败之后,组织几乎完全塌台,结果成为破坏组织的一个东西。大多数的同志都动摇起来,主张埋枪,主张停止游击战争。所以鄂西游击战争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到一九二九年三月,完全陷于停顿状态。在这停顿期中,同志们更觉到没有出路,群众组织不消说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亦日见缩小,甚至有好多县分与特委失了联络,特委又与省委失了联络有半年多之久。

2. 第二时期(一九二九年二月到一九二九年七月)

六次大会的决议案到了鄂西以后,特委决定二月初召集扩大会议于江陵。在扩大会议中,讨论问题以游击战争的行动问题为最热烈,结果决定江、石、监三县为基本武装的地方首先发动。共编为游击第一大队,以石首所埋的枪及特务队编为第一中队,以监利之枪编为第二中队。于三月初自江、石、监三县同时发动。十七天之内,两个中队打了二十一仗。虽然其中牺牲了不少的同志,尤以沙岗一战周资生同志阵亡损失极大,但是卒能建立了三县的赤色政权,发动了广大的群众。第一中队由江陵拖到石首,发展更为迅速,于三月攻取了石首,就杀了贫[贫]官龚县长家属及国民党指导委员。此时合计步枪百六十余枝,连枪二十余支,子弹亦非常充足。又在监狱里放出同志七十余人,士气为之一振,乃继续进攻藕池,因为攸探没有报告,遂与五十师谭道源部逆遇阮家铺子,敌人以两团之众,向我方层层包围,几乎全军覆灭,所逃回的只有连枪、步枪各十一支。这次鄂西游击战争,第一次最大的损失。

藕池失败以后,军队与团防更加紧的同[向]我进攻,乃将剩余的武装编为两个中队。在石首流动的,为第一中队。在江陵流动的,为第二中队。随由二、四中队(各[在]监酒流动的,第二中队,此时已扩充为两个中队),提来拨[驳]壳枪十余支,又购买十余支,一、三中队的战斗力量又恢复了,继续[与]团防作战,征[缴]得步枪不少!渐渐形成队伍的形势了。

沙岗是江陵赤色政权的中心,敌人非常注意,在端午节的前几天,敌人的军事布置就是准备包围沙岗的形势。江陵的常练队(×如协同一部份军队驻扎郝穴,距沙岗四十余里),监利的常练队留如[住]汪家桥(距沙岗十余里)。我方军事布置是集中一、二、三、四队方法阳宫因为交通关系,集中迟缓,敌人于端午节的上午进攻沙岗,街市的房子烧了十分之八,沙岗附近的村庄都被烧了。第一天敌人又以全力进攻青阳宫,值适我军业已集中,遂

大战于青阳宫附近。是时敌人阵亡约八十余人，我军阵亡亦四十余人。但我方阵亡的多系得力干部。此役虽然打了胜仗，而实力则损失不少。战事结束以后，开负责人会议，因为干部缺乏的原故，乃决议在洪湖设立教导队，并将步枪集中于洪湖训练，编为第一大队，分一、二、三中队。而以连枪二十支游击石首，以连枪三十枝游击江陵，编

为二大队。以江陵游击队为第四中队，石首游击队为第五中队，总队部直属部为特务队（以手机关十二支，连枪二十支，马枪十支组织的）与教导队。

编制就绪之后，江陵环境更加险恶，四、五中队均集中石首，适遇谭道源派一连人来清乡，当开至赤色区域中心地点，即被我四、五中队迎头痛击，遂将其全部缴械。兵士与群众莫不高兴，都说：“谭道源替我换了好枪”。因为前次藕池损失的枪枝与这次所得的枪枝，差不多可以相抵，但此次所得的枪枝，一律为新出厂的汉阳枪。

3. 第三时期（一九二九年八月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在蒋桂战争结束以后，张发奎反蒋战争又已爆发。以前鄂西的军阀谭[道]源、彭[启]彪、范石生等联合常练队一致的向革命势力进攻。

因此江、石、监、沔各县的环境不算险恶，最险恶的就是过去对农民策略的错误（联合富农），以致富农常常有领导汉[反]水帮助敌人屠杀共产党员（他们称为剥团鱼）。江陵的第四中队起来可与敌人……头一天进攻徐……还得枪二十余支，第二天进攻新观，则为汉[反]水的的农民告密，而致于失败。中队长李化龙同志阵亡，没有人主持。兵士将枪埋了，连枪埋至石首与第五中队集中，后因石首环境险恶，乃拖到华容文远两区游击（该地有二人），不惟没有被敌人消灭，反而日见发展，并且扩大了红色区域。十一月二十四日，石首常练队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进攻赤区，用洋船载兵过江，将小河口的房子完全烧了。因此激动了兵士与群众，马上向他袭击。

敌人仓卒之间退出洋船，吓得手忙脚乱将船陷于泥潭中，至被全部缴械。计得步枪百余支，连枪六支，手机关三支。自此以后，石首的常练队没有单独向我们进攻的能力了。这时候，江陵的常练队，以为将江陵的共产党铲清了，毫无戒备。不意我们由石首调来的三十枝连枪，一夜工夫袭击熊家河、马家寨（张[长]江北岸距沙市六十里）、观音寺（长江距沙市三十里）三处，共缴得枪三十余枝。现江陵的豪绅又起恐慌，群众又渐渐的兴奋起来，渴望红军非常迫切。洪湖方面我第一大队见环境险恶，起初决定向华容游击，队伍已经游击到二区，党的负责同志用激将法要他们打调八月，因为得了胜利，又想苟安洪湖，于是又无理的回到洪湖，但久[见]四面的包围来了，此时又想用[由]沔阳到潜江。

江陵各县游击，与敌人大战于沙市，损失极大，更没有向外游击的可能了，又复退归洪湖，与敌人的张聊队相周旋，一直到军阀战争并起，敌军退去之后，才得重新整理。不久就与特委发生不密切的关系。

还有须要补述的两点：第一就是当监酒环境险恶的时候，新的江防大队六十几个兵士自动的把官长完全杀了，拖归到洪湖参加红军，这对于我们的战斗力量，确实增加不少。

第二就是当江陵没有失败以前，曾经提了一笔款到松枝宜购枪（因军阀混战有一部份枪散在民间），枪枝购买到手而江陵。军事失败，于是就不能运到江陵，留在宜都发动游击战争，因为负责人没有经验，特委又被中央取

消了，没有上级去指导他们工作。他们曾经缴了团防的枪枝，不知建立农村政权与发动群众斗争，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没有得到群众的拥护。听说有清乡的风声，自己吓自己把步枪埋了，把连枪拖到江陵的西北区，又不敢发动群众，只是躲在房子里，以致被常练队缴械，真是莫大的耻辱。

4. 第四时期（一九三一年到现在）

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委决定将下游各县游击队编为红军中央独立师（杨英同志向逸群说，鄂西可成立一师，师的名号由他们自订（定）。监酒的游击部队编为第一纵队；江右的游击部队编为第二纵队，并决定集中于江陵。同时又听说贺龙部队到达枝江单溪，乃令限一、二纵队于十二月底集中江陵，又令第三纵队于十五日进攻郝穴，以与贺龙呼应扩大政治影响。殊不知第一纵队与省委发生关系，省委又指令他们向江阳汉川推进。他们（一纵队）竟机械的去执行省委的指示，写信来通知二纵队到洪湖集中，以便进攻武汉。二纵队因为省委指示他们向江陵进展，恢复江陵的组织，以打通江监石的赤色交通线，也就不到洪湖去集中（事实上不能由石首直接到监利），这样往返耽延了一个月，一点结果也没有。及至中央军部巡视员刘克明同志到了鄂西之后，才写信去坚决的要他们来江陵与二纵队会师，一直到了二月五号，两纵队才会师于监利汪家桥。在会师之先，第一纵队在城院、头子口等处打了两仗，得枪四十余枝。第二纵队由石首出发时，即有江陵熊家河的常练队一分队拖来（是党在里面的变），有枪二十余枝。又进攻普济观与沙岗，缴得枪五十余枝。会师之后，将中央独立队编为第六军，县[且]军长在汪家桥就职，并开军事会议，决定进攻龙湾司，乃即日移师新观，召集群众大会，到万余人（二七纪念大会）。次日即向江陵之计西区移动，正值敌人来清乡，被先头部队击散，因隔河未缴得枪支。次日拂晓我军冒雨前进，敌人不支，向潜江退却，我军遂得占领龙湾司、熊口、老新口、张金河等处市镇。龙湾司、熊口、老新口都有当铺，二十洋以下无本取当，二十元以上的无利取当。于是一般贫苦群众，莫不称道红军之好，他们都说：“我们做梦都想不到有这回事”。红军到达龙湾司后，敌人兵士来司令部报告说，常练队的枪枝埋在距淋湾二十里地之龙湾背附近，要我们去取来。当即派一分队前去，果然得步枪二十五枝，次日又来兵士说，他们有两支连枪埋在某处要我们去取来。当又派一徒手前往，果然见取来两枝连枪。第二纵队住[驻]扎熊口两天，也同样的得了敌人的枪支，可见敌人兵心的动摇。

在此必须顺便将红军对于敌人士兵及拖枪来的待遇说一下，以前我们打战多半有农民参加，同时我们的兵士也大半出身农民。他们恨常练队深入骨髓，捉到一个杀一个，是没有话说的。可是这样一来，常练队与我们打战死也不肯缴枪。自后我们觉得这个方式不对，乃决定优待士兵的方法：

（一）自动拖枪来归的奖洋十元，如不愿[干]事，酌量路途远近发给路费。

（二）在火线上俘虏来的，每人发洋五元，如下愿干事的只给洋三元。

这样一来，敌人兵士非常动摇，江、公、石各县常练队有瓦解之势。

当红军进攻龙湾之先一日，我们又决定抽调一个中队进攻沙南区之观音寺（因为要使沙市的军队首尾不能相顾）于二月九日拂晓进攻。适遇帝国主义的兵舰停泊江中，他们用机关枪扫射打红旗的群众。敌人本来被我们打败，此时见洋兵舰向我们扫射，竟至停止不退。当时我红军只牺牲一个兵士，而农民群众死在帝国主义炮舰之下的竟达三十余人。乃决定退回赤色区域，敌

人也不敢追击的，红军即开回龙湾与大队会合。

二月十四日我第一、二纵队集中于老新口。十五日拂晓进攻新沟咀，襄河南岸监利三大市镇之一。适敌人分两路向我进攻，我[致]约半小时即溃退，此役共得枪三十余枝。十七日下午五时由新沟咀出发，开驻干沔西之渔阳镇。根据各方报告情形，郝只驻有军队二团，刘峙电令清乡，且已清了一次。江监交界之新观寺，由监利开来夏斗寅说，普济观常练队已回防，江陵县长傅盐梅亲率队伍到龙湾司清乡。监利县城亦驻有军队，目前环境，敌人有向我取包围的形势。此时敌人力量，仅潜江比较薄弱，同时第三大队尚在沔西即须集中，所以决定向潜江方面移动。二十日第一纵队之第三大队到渔阳镇集中，即召集全体官兵训话，并枪决副官、班长各一名，因为他们两个强奸妇女有确实证据，又经全体官兵一致主张，所以非办不可，下午六时潜江县委（是农民同志）、沔西区委均到。前委召集联席会议解决军事行动问题，据当地组织报告目前潜江情形，统治阶级非常动摇，县城反动武装仅三百余枝枪，所以决定进攻县城，以扩大政治影响。兹将前委二十六日关于进攻潜城军事计划的报告抄一段。

（1）由拖船埠出发到黄中陀、土耳其子分三路，右翼由郭杂院杨峰至三江口、埋沙渡两处埋伏，堵截敌人退走岳口及沔[张]截港归路。南翼毛棚子向潜江之西南角进攻。

（2）兵力之分配。右翼派第一纵队，由一、二大队担任，由第一纵队伏[副]队长王一鸣指挥；左翼命第二纵队之第一大队与特务队担任，

由第二纵队段玉林指挥；正面命第二纵队第二大队及第一纵队担任，由第二纵队长严×指挥；教导队及机关枪队的预备队全军行李停止当中院之上耳子，由第一纵队之特务队看押。

（3）进攻时间，我军全部于今日下午八时半出发至黄中院×土耳其子分途，大[右]翼至三江口排沙渡埋伏外，正面与左翼至目林约三里之地即行停止，待天明能看清人物时开始攻击。八时出发，因沿途遇雨，所以没有按照计划时间达到。二十二日早，雾气非常浓厚，故未达到完全消灭之任务。战斗结果得步枪六十余枝，手枪三枝，马枪两枝，连枪三枝，子弹四千余发。拿副队长一名，著名劣绅甚多，公安局长、教育局长、堤工局长等，经过群众大会的路线一律枪决。

红军在潜江县城休息了两天，仍然开回沔西，因得报告，沙市非常恐慌，乃决定先攻郝穴，因为郝穴是江陵比较大的市镇，而且空虚（只常练队四百余）。遂于三月八日拂晓分二路进攻，结果缴得枪一百六十余枝（但敌人确已损失二百余支，多半丢到大江里），俘虏八十余人，内有分队长三名。经过了群众路线，没收了几家反动的财产，枪决豪绅及反动派八名。现在红军仍开回沙岗休息。

红军到达沙岗以后，即由段德昌率领二纵队二大队全部到沙南区（长江北岸郝穴上沙市），准备进攻观音寺。十二日上午进攻观音寺，有沙南区赤色群众三十人参加，分四路进攻观音寺。该地常练队闻风溃退，因我埋伏部队看见敌人退走不沉着的喊缴枪，反给一个猛烈的冲锋，结果敌人迫得无路可走，一部分冲走了，一部分被缴械，一部分投江了。此役得枪二十余枝。现敌人退至×卞（距沙市仅十五里），而沙市驻防军队不敢开出去，因为他没好多军队驻沙市，而又要维持市面秩序，所以只好让红军驻扎观音寺，而在那里大开群众大会，沙市的豪绅资产阶级急得没有法子，只好一面打电到

南京与武汉请求派兵，一面大骂军队无用。

三、第六军的编制

1. 军部的组织目前非常简单，只有参谋处与副官处再如传令兵而已。因为人的缺乏没有政治的组织，政治工作由各纵队独立出[去]干。不过一、二纵队政治部经常开联席会议，所以一切的工作都是一致的动作。军部的直属部队，只有一个教导队是训练作为下级干部的人才，目前是随营训练的性质。

2. 纵队司令部均有政治委员及政治部的组织，有参谋处、副官处、卫生处、经理处及经理委员会的组织。第一纵队司令部的直属部队有一机关枪队（水机关枪两架）及特务队。第二纵队司令部只有一个特务队。3. 第一纵队共有四个大队，每大队有三中队，每中队有二分队，每分队有三班，第二纵队只有三大队，每大队只有两中队，但每个中队有三分队，这是因为缺乏大队长的关系，所以与第一中[纵]队稍有不同。第三纵队现在长阳游击，因是神兵改变的，故旧式武器颇多，而且极有战斗力量。因为交通不便，最近没有报告来，所以内部的编制尚不知道。此外尚有一个游击大队在巴东游击，最近特军委才派人去收编，详细情形尚不知道。

四、第六军的军事训练

第六军完全是由农民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几乎没有时间做操场上的训练工作，所以一切军队中的繁文第六军几乎没有，只是休息时间学习散兵、装退子弹、射击以及步兵哨、尖兵等工作，有许多官长还不会喊口令，但第六军的官兵都长于冲锋追击，所以每次作战，都是冲锋取胜，同时因为每次作战后都有批评会，在兵士中间公开批评之后，然后由最高级指挥官做结论，这个方式实际帮助军事训练上不少。这是由斗争中实际工作中训练红军的办法。

但是我们仍感觉到有加紧军事训练的的必要，所以最近办了一个教导队，可是因人才缺乏，教导本身就不大健全。若要想办到好的结果，必须加紧教导队的工作，这是我们本身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看得到的一件困难事实。

这还是第一、二纵队，比较上是有军事训练的。至于第三纵队，只有一个纵队司令是特委派去的，但是他没有一个帮手，那么如何能指挥三千多人的大部队？他内部的军事训练我们可不言而喻[喻]。

五、第六军的党的组织

1. 以前的组织：

第一纵队在未有前委会以前，由特委的指示成立军特支。小河口一战后，负责人牺牲甚多，工作无形停顿。去年冬月仍成立军特支，洗刷同志甚多。最近同志有六十余人，成立三个支部，二十个小组。在过去亦有组长训练班，因军事行动又停止。同志中的成份以自耕农、富农的多，雇农尤多。

第二纵队首先成立特支，自藕池失败后，工作无形中停顿，后又开会组织，结果非常糟糕。自李楷同志（政治委员）到部以后，重新登记，现在同志七十余人，成立三个支部九个小组。因军事行动未能常时开会。同志成份以雇农为多，这点是与第一纵队不同的。

2. 现在的组织：今年二月五日一、二纵队会师以后，因过去前委会的不健全，由特委及中央的巡视员的指示，将前委改组。决定委员为七人，后[候]补委员三人。委员的产生由最高长官孙德清（长[军]长）同志，一、二纵队司令段德昌、段玉林，一、二纵队的兵士徐昌贤、张传贤，其余二人由特委

指定王鹤及中央派来负军队中党务工作的一位同志担任。后[候]补委员推定许光达、李子扬、王一鸣三人担任。第一次前委会议，决定以三人组织常委，以王一鸣为书记。孙德清为宣传，中央派来的任组织，在未到以前由许光达同志代理。

各纵队成立纵委，纵委以下为支部及小组。

3. 前委成立后的工作决议：

一、组织：

重新登记。 加紧训练。 各纵队设办组长训练班。 各级党部按期开会，日期由常委会决定通知。 注意同志工作的分配。 按期缴纳党费，规定每月五十文。 发展组织要注意成份，以雇农、贫农、手工业者为对象。

二、宣传：

内办《红军通讯》。 对外出小册子，如《红军生活》。 宣传品在行军时散发、邮寄，或由特委分发各物[地]。

但是现在已有一个月了，因为没有人专门负责，这些决议至今没有一样实现。

六、第六军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

我们天天说到没有军事人才，其实军事人才之缺乏，还可想出办法，万一没有可以从斗争中提拔。至于政治人才那真是想不出办法，因为一般党员政治水平线之低落，比较好的又要担任其他组织工作，又不是短时间可以训练得出来的。因为如此，所以第六军的政治工作成了难问题，比如现在还没有成立军政部，不是不成立，而是[因]为没有人，现在表面上各纵队有政治工作，其实因为人缺乏做得非常不充分。各中队现没有政治人员，仅靠一个政治部（不健全的），如何能够深入群众呢？兵委会的小组会议，是最好训练的机会，但是没有参加，所以也没有好多意义，充其量只能做到一点演讲式的政治训练，然而这还是一、二纵队，至于第三纵队连此讲演式的政治训练也没有咧！

至于群众工作，红军到远的地方宣传比较还普通，布告、传单、标语、开群众大会，这些照例要办到的，并且也有宣传中的组织。所以到远的一个地方，兵士都打起红旗向群众宣传。

红军本来是要替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才能发动群众的斗争，我们过去也想这样干，但是无从着手。最近实行无本取当，这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这样也颇得群众欢迎。

有时也进行组织的工作，但是[因]为调查工作做得不好，不能提出适当的口号，因此不能发动群众。群众不起来热烈的参加，这个组织是没有用的。比如红军到龙清司，由群众产生的革命委员会，不上两天，选的委员都跑光了。

虽然我们在主观上群众工作做得不充分，但是由客观上看来，红军的政治影响都是非常扩大，在下游各县的群众几乎无有一处不是欢迎红军的。这是因为（1）统治阶级过去对民众完全是用严厉的白色恐怖来压迫，所谓常练队清乡，真是无目的烧杀，而且实行奸淫，以致民众恨清乡队入骨。同时红军又纠正了无目的烧杀政策，所以群众欢迎红军。（2）红军的游击区域扩大而且向着中心城市发展。红军的行动，尽人皆知，以致反动派的宣传失了效力。（3）红军到达的一处，便实行没收反革命的财产分给贫民，并实行无本取当，所以群众常常跟着红军跑（红军攻下新沟咀以后，该地贫民、店员等

随着红军走的有八百余人)。照目前这些形势看来，第六军确成为红军的军队了！

七、第六军的纪律

前委没有成立之前，第六军的纪律与国民革命军一样，仍然是用肉型为维持纪律的唯一方法，自前委成立之后，一切纪律由兵委会通过然后执行，并且废止肉刑而代之以各种勤务。现在每条纪律差不多每个兵士都知道，第一，不许吸鸦片及纸烟；第二，不许赌博；第三，不许贪污。各纵队均有巡查队的组织，是由兵士轮流充当。纪律的执行不属于兵委会而属各级长官及政治委员。

八、第六军的经济来源

首先已经说过，第六军是由群众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当党代替群众的时候，红军一切开支是由党支出。鄂西党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才由农协管理经济。最近红军扩大部分，是由土豪劣绅负担。在赤区以内并没实行统一累进税，而且土豪没有了，所以红军不向外发展，经济就没有办法。

因为官兵经济平等，经委会有兵士参加，而且帐目向兵委会报告的，所以有时候生活不好，兵士也没有怨言。在此要将兵士实际生活谈谈，每天每人只有一千四百文的伙食费，十天发一元零用费，服装、草鞋等完全由公家负责不折不扣，而且民众团体常常有酒肉洋钱慰劳，所以他们不感觉十分痛苦。

九、第六军的缺点和优点

1. 缺点：

- (一) 调查工作不能独立，几乎完全依赖各地方的组织。
- (二) 政治训练不充分。
- (三) 军事技术不好，只凭一鼓作气的冲锋。
- (四) 党的组织薄弱，党员的成份不好。
- (五) 军部不健全，没有统一指挥的力量。
- (六) 地方观念很浓厚。

2. 优点：

- (一) 是由群众斗争中生长出来的，没有旧式军队中旧习惯。
- (二) 有阶级的党[觉悟]，很能自动的与民众接近。
- (三) 能坚[艰]苦耐劳，长于夜行军。

十、鄂西最近的游击计划

鄂西的主观力量确已不少，第六军与贺龙合计有万余人。红军游击区域已达十七县(江、石、监、沔、潜、华、当、长、五、巴及施鹤七属)，公安已处赤色区域的包围之中，马上可以发动(石首赤卫队已达到公安区境)。统治阶级力量——团防势力日见削弱，下游各县团防，完全依赖军队而图生存，上游如松、枝、宜、长、五、归、兴、巴各县团防则又无战斗力量，驻防军兵心亦动摇。这两部分的兵士生活极为痛苦，尤其郭部为甚，此外有独立十四旅彭启彪，而困住宜昌，一团驻沙市，五十二师李范衍之一部分住沙市，本有一团但分一营，驻都郝穴，李虎城与郭如栋部均有我们的组织，我已派人前往组织兵变。李、郭可以有把握的，可以影响过来，加以原来红军的力量汇合起来，解决彭启彪、李范衍是不成问题的。那时鄂三十县均可割据，而且集中力量可以进攻武汉。根据以上的形势及我们的企图，决定以下的具体计划。

1. 第六次[军]大部份力量由石首进攻藕他与县城得手后，即向公安进展（公安全县无防军，只有团防约枪八百枝）。

2. 第六军以一小部分游击沙南区进观音寺（现已实现）。沙南及沙市沿北岸一带，由去年十月到现在都是赤色政权，由沙南过江（公安地界），与大部队进攻公安团防。

3. 通知贺龙会改[攻]荆沙（我们已派交通去了）。

4. 宜昌兵变发动后即以主要力量向松枝宜发展过荆沙。

5. 江陵赤卫队应到沙南游击，相机过江进攻公安。

6. 第六军教导队暂留江陵之沙岗训练。

7. 监利赤卫队应到该县三、四区游击，保持江、监、石三县的交通路线。

8. 石首赤卫队应向公安方向进攻。

附说明：

（1）此计划只限于军事，至于怎样发动工农斗争与兵变的联，在第五次常会已有详细讨论。

（2）占领宜沙以后马上便要帝国主义冲突。关于外交问题在第五次常会亦有讨论和决议。

（3）第五次常会有中央军委巡视员刘同志参加。

十一、扩大教导队的计划

红军目前最感困难的就是干部问题。在目前便利环境之下，不能不注意军事的准备工作，训练下级干部，便是鄂西党在准备武装暴动过程中，及党员军事化与武装训练群众的任务面前最主要的工作。所以特委第六次常委会决定扩大教导队的组织，其具体办法如下：

1. 改教导队为教导大队，设大队长、大队副、教育长、政治部主任各一，军事、政治教官各数人。

2. 教导大队的编制：大队下分四队，每队分三区队，每区队分三分队（或班）。

3. 队员以五百人为标准。征调入伍的规定：荆、钟、潜、天、京五十人（每县十人）。南、华、安六十人（每县二十人）。江、石、监二百四十人（每县八十人）。公、当、松、枝、宜五十人（每县十人）。沙市十人。

4. 年龄二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期间江、石、监与南、华、安限四月十号以前送到，其他各地可陆续送来，但至迟不得超过“五一”以后。

5. 大队长、李楷、刘约营三人组织筹委会，以大队长为主席。6. 地点——江陵

十二、鄂西下游各县赤卫队的编制与实力

江、石、监均有政权机关，在苏维埃政府之下有军委会，赤卫队直接受军委会指导。江、石、监三县均成立赤卫大队，大队之下有中队，中队之下有分队。

江——有连枪十六枝，步枪六十余枝。

石——有连枪、二十余枝，步枪百余支。

监——有连枪二十余枝，步枪五十余枝。

沔阳由省委直接指挥，没有报告来。潜江、荆门、钟祥共有步枪百余支。各县赤卫队必须有一指挥机关以便调遣。特委认为有成立总队部之必要，但一时找不到相当的总队长。若如指挥便利是以易穷同志担任比较相当，但易穷负特别责任不便再兼总队长，所以决定各县赤卫队受特军委指挥。中央致

各级党部公函，本来说得有集中赤卫队、游击队及一部分少先队编为红军，我们如何不集中各县的赤卫队呢？其理由：

1. 赤卫队是保护政权的武装力量，红军到外县游击，赤[卫]队是必要的。
2. 赤卫队有时比红军还发展得快，因为部队不便当袭击，赤[卫]队强大起来便可编为红军，再留一小部分武装编为赤卫队去发展。

十三、我们的教训

1. 无论怎样恶劣环境之下，埋枪主义是最愚不过的办法，由经验中证明凡是主张埋枪的，都是不了解游击战争的。因为他带有地方主义与保守观念，而没有游击的决心。

2. 无目的烧杀，尤其是毁灭市镇，是最无意义的一回事。若不切实纠正过来，便要妨碍游击战争，因为群众就是根本讨厌这回事，当然得不到群众的拥护。

3. 农民运动发展到武装冲突的时候，就应设法转变与我们合作的封建势力的组织，如红枪会、土匪等，不然反动势力一来，这些封建团体便马上被土劣利用过去，做打击我们的工具（巴县与神兵合作，当阳与土匪合作，因为不知转变组织，上了大当）。

4. 游击队的胜利常常可以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所以经常的胜利是必要的。

5. 实行土地革命，否则便使群众怀疑我们的行动了。

6. 红军应当时时刻刻准备进攻中心城市，才能扩大政治影响。

7. 对中小商人应当采取保护政策，才不致受敌人的经济的封锁。

十四、鄂西少先队的情形

鄂西的团是与党对立的，简直是倾向团的组织独立，少先队亦要独立。

监利、沙少先队CY书记匡月亮指挥出去任意杀一无罪的农协[会]

员闹了莫大的纠纷，但结果省委代表要指定匡月亮。现在石首少先队非常跋绝[扈]，过年禁止拜年，抢大家拜年的茶食。随后农人将狗粪放在

点心里头，他们也抢去吃了，真是一塌糊涂。他们还要说，我们还算不利害，监利少先队还要杀人吃，鄂西少先队完全成了CY直接指挥的群众（真实只有赤色区才有少先队组织，非赤区域连CY组织也没有），当然

很

少的参加红军，所以江陵的赤卫队有三十岁以上的农民会员，而无十三岁以下的少先队，又不能作战（因为没有军事训练）。专做打菩萨，打

烟

馆，扯妇女的裹脚布等工作，以致惹起一般民众的厌恶心理，而模糊了阶级斗争的观念。以目前少先队的组织对红军不惟没有帮助，而且事实上防[妨]碍了军事发展，中央来信说，少先队编一部分到红军，这我们拿来实在做不通，因为我们不知道红军与少先队的关系怎样，请上级指示。

注释

据内容分析，本文作者当为中共鄂西特委。

原件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

——鄂西政治形势、六军内部情况及前委组织问题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

省委转中央：

我们曾于五月三十一日派孙同志德清前来报告接洽一切，并带有一个简单的报告。可是最近消[息]说他在途[中]被捕，我们除[设]法营救外，特再补这个报告：

一、目前鄂西政治形势：因为军阀战争的关系，敌军部队均相继开往前线，现在存在鄂西的部队只有独立十四旅彭启彪以及陕西讨逆军一部分（大部分已开往均州）和新编五师（现又移防他处）。豪绅武装在赤色区域内，石化约百，华容约千余，监利约千余，江陵约千余。最近因红军游击的关系，曾消灭（在新口咀）新五师一连主力部队，并毙敌副团长一名，独立十四旅两营（在普市、郝穴），因此敌人受了很大的打击，几至不可支持的形势。沙市团防务空虚，驻在宜昌的十四旅一团人现已移到郝穴驻防，而新五师又调了。目前在鄂西的部队，主要的是独立十四旅的残部一团之谱。群众在红军游击之下斗争尤形激烈，在石华群众赤手空拳与清乡队和反水群众拚死命，江陵群众以数支连枪与百余敌人作战，尤其是反水群众自动的起来杀反水领袖，中小商人日益左倾了。张家港、峰口……反对清乡队与驻军，郝穴中小商人，在这次红军进攻柳关跑走的较少，这都证明鄂西赤色群众虽经二月来敌人的残酷和屠杀，而群众还能冲破了敌人的重围和极端的白色恐怖。在非赤区方面：如沙市、公安在红军占领郝穴后，沙市敌人及公安敌人均已打好包裹准备好跑，有一部分准备换旗帜，拖出枪。在贺军游击之下，群众耳争有经的发展，自动到米店分粮，到豪绅地主田里割谷。宜昌、归兴、巴东、长阳从×东新游击战争发动后，上方群众都兴奋起来，宜昌准备发动游击战争，以至给群众。至于荆钟宜、潜京天等处，因巡视员尚无报告来，群众斗争无疑意的是在开展。潜江、沔阳在红军游击之下更有长足的进步。总之，目前鄂西政治形势毫无疑问的是日益向前开展，完成地方暴动，成了鄂西最主要的中心任务，但是城市工作没有起来，甚至连基础在最近期间内也完全破坏了，这的确是鄂西党的执行中心任务上唯一严重的问题。

二、德兄转来，我们才知道鄂全会的梗概以及对鄂西组织问题的意见，特委决定于七月上旬（至迟）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传达鄂大会的精神和改组特委。关于鄂大会各种决议，希望火速送来，以便起草各种草案，迫切之至，同时请省委预期派代表前来（于七月一号）出席指示一切。

三、关于贺军消息，曾一度到达松滋米积台一带游击，然因与特委没有接到头、同时因敌人的压迫又折回到澧州去了。最近除派人去找外，并嘱南华安及松滋，公安县委赶紧追踪去找，并调六军火速再向江石等处游击以影响二军。

四、六军问题，六军过去情形已由××、××两同志面告，现已洞悉，但六军最近又有一个发展，而同时又发现了些问题必须报告，请中央、省委解决。

1. 游击路线尽量扩大，红军向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游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六军尽以攻武汉便为向中心区域发展，忘却了完成地方暴动的任务，因此他的行动只想打到武汉过夜（实际上游击汉沔躲避强硬敌人要超过敌人两倍

以上才进攻），如与二军会师，他们都不坚决执行（以进攻武汉中心城市为名）。

2. 六军党的情形：指导机关尤其是前委不健全，不能起领导作用，下级组织非常涣散的狭小（近正在注意发展组织）。整个六军大约三百党员左右。前委方面：一方面被旷继勋同志笼罩一切（如开会时都以旷继勋同志意见为左右，如是否响应二军问题上，前委书记发表两个绝对相反的意见），一方面闹小资产阶级的意气。如前委委员、纵队长周容光鼓动士兵委员会挽留被前委调动纵队长（因闹意气调动），前委查他的来源不当的百多元抄[钞]票而发生意气，同时前委向特委也闹意气（将他写我们的信抄后），缴敌枪枝不照实报告（恐特委将他们的枪枝提交地方组织）。最令我们注意者，六军中发现了改组派组织，已枪毙了几个分队长、兵士，据探的消息，里面已有三十余人的组织。

3. 六军与地方组织好象分成了界线，以为警备师（因那时红军向下游击，[正值]鄂西苏维埃代表大会，敌人在加紧清乡，故将各路游击[队]集合来游击，保护大会安全，暂编为警备师）是鄂西红军，如江陵需枪枝游击，六军将缴的敌人枪枝用马驮[驮]着而不准拨发，要拨警备师烂枪，警备师全部无子弹，六军无论如何不发子弹补充。据说红军存上海抄[钞]票三万（六军二部经济委员会说的），但我们不知究竟怎样？总之存款是有点，储蓄也是所必要的，而前委总不说及，问道也不承认，向我和苏维埃区域要钱（苏维埃当然要负责任），但这似乎是秘密而分界限。同时最近因获几次胜利，小的敌人不下决心去消灭，似乎有骄傲倾向。

4. 继勋同志表现——继勋同志个性非常强，前委被他笼罩，不接受自己的错误，欢喜闹意气。继勋同志来到六军后，可说前委会议他一个人可以支配。如讨论响应二军，继勋同志不同意，大家就不同意，讨论许久，继勋同志说不成问题，我们打一转听二军消息，大家也就可以，连前委书记也发表一个极端相反的意见。继勋同志说，二军我们可以不管他，听他去干，叫他去干出来后还要受六军影响坏以后，他（二军）自然要找出路，借此转变贺龙同志。省委决定六军要完成江、公、石、监……等县地方暴动，继勋同志说这是不正确的，这是克明同志个人的指示，因为这次一群下去摆了龙门阵，[是]克明站在感情方面来决定的，提在会议批评不接受，坚决承认是感情用事。如苏维埃办的军政学校，继勋同志说（对德清），这学校名同不好，如果是这样，那你就帮助鄂西特委作工具。六军同江陵组织为拨枪问题，继勋同志说：“鄂西特委意见是不发生效力的（前委尚未脱离特委指导时），他们对我们用手段，我们也要用手段的。”继勋同志来到洪湖时便说：“鄂西特委没有一人能够说付[服]我的”。

5. 我们的意见——中央、省委要派一部分干部来作政治工作，前委本身绝需派几个有工作经验、观念正确的同志来工作，整理内面的常（尤其是改组派潜入了）。继勋同志一定要调动，中央给以训练，不然前委以后会被不正确观念笼罩下去（就是逸群同志来前工作，他的个性太强亦无法来纠正），尤其是二、六军会师后，更会发生问题。（附：因前委未向我们作整个报告，里面很多话我们报告不出来）。

6. 逸群同志尚未到特委及六军工作，现在沙市方面。

滋（兹）将前委给我们的信如后：

“特委：据后方来的消息，谓中央现又介绍两位及前委来六军工作人员，

现在已到了你们那里好几天了（说是一个负军事工作的，一个负技术工作的），此刻六军中各方面都积极需要人才，为什么你们现在还是不送他们来六军工作呢！

关于警备师枪枝在未归六军指挥之先，你们都有步枪百把多枝×百余枝连枪（那次在柳关开会议时也曾如此说的），为什么在该步（部）队归六军指挥决议之后，编入六军时，只有步枪百余枝、连枪十余枝呢？这其余的枪枝究竟到那里去了？像这样的外交手腕，有名无实的扩大红军，尤失你们特委及下级的信仰，怕是不好吧！”

另有一信中段说……

“至于占据中心城市几小时，在湖北政治决议案上指出，是儿戏把戏”。

并注明（这是石均同志参加看最近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我们觉得有些怀疑了。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说，目前政治的形势是有夺取一省与数省的可能。又根据中央所示红军的任务是要向中心城市发展，武汉尤其是中国最重心城市，红军的任务是要向这些地方发展是无疑意[义]了。谓目前政治形势有夺取一省与数省的可能，而武汉是湖北的都市，是在夺取范围之内，为什么又说占据中心城市几点钟是儿戏把戏？试问占据一个中心城市是否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何德[得]谓之儿戏？且在占据的时间上事先从何肯定来决定呢？若不能肯定而决定则在何时何以占据中心城市，则在遥遥无期的将来吗？占据中心城市只好放弃或等待将来……”。

五、经济问题……各县自给已生问题，梅[每]县都在裁员减费，并加以红军每日在两千以上的需要，以及军校、医院修械购货等问题均需款异常迫切，皆甚至有断炊之虑。累进税尚未实行，富农捐正在开始举办，以及经济来源均仍停顿在捉豪绅资本家的路线上来维持，的确目前经济问题成了很大的问题，中央要五万元真是无法筹办。除了进攻沙市，造成江南赤色区域外，没有别的办法可解决。滋[兹]特介绍来现洋四千三百元，又赤金首饰共计十二两二钱，合计共五千元，请转交中央，其余正设法筹集。

六、特委因××与××同志到特后，一切工作均失了集体的指导。某某同志曾到江石指挥红军行动和巡视江石工作了二十余天，特委机关只剩下某某同志一人应付。某某同志在宜昌工作，某某同志参加监委工作某某同志在荆门工作，特委人员是根本分配不来，内部工作间[简]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初××德×两兄都×头不够。现在某某同志又调到红军工作，某某兄又调到武汉，似此，特委工作真是没有办法来推动了。加[之]宜昌又破获，沙市组织尚未恢复，城市工作不能建立起来，更是目前最严重问题。所以我们的意见无论如何要请中央、省委，至少要调几个得力来帮助特委工作，同时我们觉得还是要成立三个特委才好，否则应上不能顾下，真是难解决的问题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原文如此。

原文缺页。

鄂西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大纲

(一九三 年六月)

这大纲是根据目前党的任务争取湖北首先胜利，故一切工作先是依据在总的任务而定。

(一) 城市工作

鄂西沙市、宜昌在全国范围说是次要的工业重要区域，故它的工作是全国的重中[点]之一。现在鄂西党经过两次的破获，但政治影响都能普遍×不这种情形，同时受赤区的政治影响，而一般贫民及工农都倾向于革命，所以在地方暴动的路线之下占领城市，如荆沙及宜昌附近的红区，都有可能占据的城。

1. 应建立沙市市委工作。打包厂、码头、车夫的工作应从速建立起来。
2. 在城市扩大拥护红军的及建立鄂西工农兵政府的宣传。
3. 建立职工委员会指导职工工作。
4. 发动斗争不仅是经济上而且要领导并扩大政治斗争。
5. “八一”前建立至少五百人纠察队组织。
6. 仙桃镇、藕池、新堤、沙洋、岳口加紧工作。

(二) 扩大红军

在总的路线之下扩大红军，在鄂西有二万人。发展的策略：

1. 在斗争中去发展，并夺取敌人的武装。
2. 深入土地革命。
3. 扩大苏维埃区域。
4. 发展游击战争。

实现这些策略：

第一、夺取公安。

- a. 夺取公安建立赤色政权。
- b. 公安的群众有很多斗争的经验，而且对于共产党有深刻的认识，公安的同志有三百多，都能勇敢的发动斗争。
- c. 二、六军的联系也必须要占领公安。公安占后马上就可以影响公安[滋]，但此地是反动的模范县。
- d. 雇农最多，发展农村无产的组织。

第二、进攻荆沙。

建立鄂西的政权，应加强荆沙工人的工作，并给以实际的利益，荆沙工人起来领导扩大红区，失业工作编入红军。

红三、上游游击队应编入红军，这些红军应以宜昌为中心来发展，第六军应在工作上在物质[上]帮助他们，以达到占领宜昌。

第四、转变二军的一切流氓无产阶级意识。

第五、成立二军、十军、六军总指挥机关。

第六、三军会合后即进攻武汉。不要××的与全鄂配合进攻武汉，以达到争取湖北的首先胜利。

(三) 建立苏维埃

- a. 苏维埃政权应该是进攻式的，发动并指导非赤色区的斗争。
- b. 鄂西苏维埃应建立在县城。
- c. 加强苏维埃无产阶级的成分，凡建立苏维埃应加强鄂西苏维埃成分：

农民三千人选举一个代表；
兵士三百人选举一个代表；
工人三十人选举一个代表。

d. 鄂西苏维埃必要夺取武汉来保证鄂西苏维埃的胜利。

(四) 党的组织

a. 在“五一”前要发[展]一万党员，限定是雇农、工人及手工业者、贫农为对象。拒绝富农入党。

b. 加紧训练教育工作：召集京山、荆门、天门、钟祥、潜江五县联度会议来训练，时间延长，解答一切问题。

c. 特委开办高级训练班，拣选县委、区委而有工作经验者，加以理论上的教育，以半日授课，以半日自己看书并加强训练班工作，而且不要间断。

d. 加紧各县的训练班工作不要间断。

e. 苏维埃应开办训练班。

关于党内的斗争问题：特委会讨论过，但县委讨论很少，以后应讨论，并将反右倾与反取消派意识联系起[来]。加强无产阶级意识，应取斗争的方法来肃清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等认识。

特委本身的组织问题，现在负责同志是九人，工作很努力的，不过因为地域广阔不够分配，又不易聚会，因此应加强特委本身力量，加增二人，一人担任宣传或组织——常委；一人担任职工运——常委。增加秘书一人，由九人中的一人担任。

建立中心县委，以荆门的沙洋为中心县委，特委派人去参加，并加强荆县委工作。

(五) 组织兵变

1. 扩大敌人兵士中宣传。用信封内放置传单，或纸烟合内置传单，投到敌人方面去，释放俘虏。

2. 加紧团的任务。

3. 组织兵变对象。公兵凡 。

4. 组织兵委。要 CY 与 CP 合组。

以下有几个问题要提出讨论的：

1. 自首过的同志是否可以恢复党籍？有的在工作上表现得 x

2. 派人的问题。

3. 鄂西流落在上海的同志，应要求派回去工作。

4. 关到 CY 的关系究竟怎样才是正确？

5. 交通问题，应迅速[解决]。

注释

原文未署名，据内容分析作者似力周逸群。

原文无年代，此年代为编者判定。

原文如此。

关于鄂西工作总任务（附结论）

（一九三 年六月）

完成地方暴动，会师荆沙（只定会师荆沙一任务）。

1. 建立城市工作，夺取各重要或次要城市。（1）组织工纠及贫民，打破保守倾向，建立乡村工作；（2）夺取城市向接近沙市方向进攻，工农兵各种工作均应如此。

2. 红军问题：（1）扩大问题，单在斗争中扩大不够；（2）应将迅速变成红军，集中武装统一组织；（3）扩大红军运动，使影响深入各种组织；

（4）扩大方法，会师以后……（听不清记不来）；（5）扩大红军预备队，集

中武装发展少年先锋至十五万与赤卫队有了枪枝变成红军；（6）发展路线：夺取赤区县城，完成地方暴动，消灭反动武装，六军应如此，十军亦应如此，帮助游击队发展游[击]战；六军夺取石首县城，其次取公安影响松子子坭，夺取荆沙，十军则向宜昌发展，二军亦向宜沙会师。（7）集中问题：集中发展；组织军团；指挥要集中。

3. 士兵运动，是扩大红军一方法，与打反动武装一样重要。

（1）政治工作：动员各种赤卫、先锋队组织做，举行士兵运动周；

（2）组织兵变，有计划的做。松子坭兵变应加紧做；（3）入伍白军……；

（4）注意俘虏问题；（5）成立军队士兵委员会；（6）红军内应组织士兵运动工作等。

4. 白区发展：（1）发展提高条件；（2）办党干校，派人至白区工作；

（3）右倾问题，地方有的不愿至白军城市、保守等应实际的坚决的与反对改良派等一样做。

5. 青年团工作：鄂西过去有成绩，缺点（1）是未做一般的斗争；（2）与成年关系未弄清，残留不正错[确]观念。现应 ，党应负责任，领导青团工作。

刘：石首土地问题较做得好，沙即亦然。其余均有富农意识。沔阳专做单纯军事行动，未作土地革命。

游击路线。赞成成立第十军，否则二、六两军中不能联系。十军主要成份是长阳一部分、巴东一部分，宜昌北乡、西南乡斗争失败的群众或党员，加紧训练，严格的收党员，训练的材料应带去六十、七十通告等。召集三次代会，将整个全国及省决议讨论。

巡视过去如走马看花，未解决问题，此次代会宜扩充巡视。

沔阳：去春仅一支部，在洪湖中心。至同志才找得线索，决定枪毙投诚同志，成立监时县委，投诚同志皆回党工作。鄂北有二、三人投诚的，无具体方法解决此问题。过去无巡视员来沔阳，纠正沔错误。去年有人去，始考察谁没有投诚，便在县委负责，其他开除党籍，危险性少的做群众工作。

过去党包办农协，农协无最高机关。县苏筹备会已稍有头绪，同志不能去起作用，各支干均有首同志，办两期训练班，颇有结果。

各区北、南、东南有区委，登记快结束。

沔阳党同志有极端民主化倾化。

群众南区不大好，而群众影响比党的政治影响大；东南成份佃农占大数，惟未多种斗争，群众情绪积极。区苏与土匪斗争，因武装太少（十八支枪），群众死四、五十人，而仍不动摇。

团的工作，现只有一知识分[子]（黄），余为农民，均已分配至城市工作，而办公处在农村，与党的县委关系不好。

南区：少年先锋队有千余人。

乡农协多富农。

西区无群众组织，仅数个党员。

东北区土匪多，现有区农协。

没收的土地多为反革命的。

鄂西特委宜注意沔工作，加紧沔工作，纠正错误。过去赤队（百余人）有二十二连枪，可用的只十八枝。

五军：沔阳过去仅南区一支部。×是因无出路，未自首。党对自首问题无办法。沔阳党过去受少数知识分子支配。群众南区与东南区好，因工作同志不好，影响不好，故沔阳群众工作，要先从整顿党起。

赤卫队、游南队多由团防拖出，非常危险。政治委员威信不大，军官（非同志）威信反大。

苏筹备会，黄鼎楚、黄宗元参加，此二人均经自首的，宜调开。

团的工作，负责同志不好为少先锋工作不好原因，游×已调出了，成问题。

有数要求于鄂西特委者：

1. 坚决的巡视，改变基础；
2. 健全县委本身；
3. 赤卫队，青年团。

一群：自首与××：

××以感情与政治手腕拿[拉]拢自首分子，表示党对自首分子处理太严，使自首者在他的周围，故决定调开。调开后，自首的无所依附了。腐化与流氓化在沔表现厉害，县委有公馆样子的机关。智[识]分子耍手段，此应用组织的力量纠正，加强无级基础。

我主张成立第十军，可更快的发展。集中潜江、公安、荆门等处武装，可得千余枪枝，横成一纵队，最好分两纵队，只要有人，此比拿巴东容易。德昌×任纵队训练×调来中央训练。八月总检阅时，特可带纵队游击。第二期由总指挥带队出游击。

鄂西工作，一群计划经讨论。现汇合讨论意见结论：

三月内总任务，完成地暴与各处地暴汇合完成一省胜利。

一、完成总任务工作的布置：

1. 占领荆沙，向武汉发展，荆沙占则鄂西暴完成，与各处汇合向武汉进攻。张提出会师荆沙，不如提出夺取荆沙会师武汉，给群更远前途。

2. 据一群报告，其计划中整个精神主要倚红军力量，而不是将工农兵各种工作配合完成暴动。过去工作，实是红军所到处，不能深入土地革[命]，党亦未加紧发动群众斗争。鄂西暴动完成，是不能单靠红军，必加紧城市工作，工运、士兵工作，若不能经过士兵工作路线是难完成。

3. 加紧红军组织区域，鄂西地暴在潜江、巴东等处亦宜促成地暴。沙与宜昌应同样加紧地暴，组织工农及士兵运动，若宜昌无好配合会师武汉，必

多顾虑。并要加紧沔阳工作，因接近武汉，便利会师。

在此总布置之下，计划中应指出，不仅占荆沙，在其（荆沙）周围完成暴[动]，应加紧宜昌、沔阳工作。

对沙市只应有一个前途，即占领沙市，会师武汉。但亦不是在三月不采取游击方式，此宜看是否可行，是否有利而决定，今天不必规定。

二、红军：

1. 红军任务：六军配合各方工作完成鄂西地暴迅速的解决干[监]利，占公安、石首。2. 扩大游击，助苏扩大政权深入土地革命。

3. 扩大与建立十军：（1）应迅速的将游队与赤编成红军，集中农中散的武装建立红军，编入第六军或十军；（2）作此工作宜有广大宣传，如扩大红军宣传周是要的，必使鄂西整个区域扩大此宣传，然后能集中武装。

（3）划分少年先锋一部分编入红军。

第十军问题：赤卫队与长阳、巴东编成第十军，对扩大红军便利（赤一队，长、巴一队），第十军在三月内发展到三万人。

三、职工运动：

宜昌、沙市宜注意加紧工作，其次五中心城市如新堤亦应注意。在职运总任务，鄂应督促进行。

一群报告中未提到工纠，应在沙、宜提出恢复或组织总工会，在各小城市亦应建立赤色工会。

雇农工会应与手工业工会分开，因手工业工人不是完全无产阶级。×手宜分开，宜洗刷老板，成立工会。

季候工人成份多贫农，有组织的必要，惟应注意领导者必者[为]雇与贫农，组织一建立，便要成为阶级的工会。

鄂西必加紧工运，虽宜、沙无有经验人，只要派两人去做，是有必要的。

海员工作、码头工人亦宜注意。

黄包车归车夫工会口号不好。

四、农民运动：

1. 农运有苏维埃或赤区，有工作，此外未列入议程谈。在巴东等处亦应同样发展农协、建立农委领导斗争。

2. 鄂西白区宜加紧打进去工作，派人去指导工作。在苏维埃三县已有土地革命，而各区尚未执行土地革命，未将没收的土地分给农民。要完成鄂西地暴、一面扩大红军，发展工运、兵运，同时要深入土地革命。此亦在计划中明显指出的。

3. 组织雇农工会，无论赤、白区均应加紧工作，领导雇[农]斗争，使雇[农]成领导力量。

五、士兵运动：

鄂西对兵运是任其自然的，此不好。宜马上组兵变，有计划的组织有线索处的兵变，打入民团发展兵变。在特委[计]划中亦应指（出）。在无兵变处亦应派人去做，派三千人太多，只要派有力量的去，一千人是可能的。

必使CY注意兵运，使CY能派少年先锋分子至白军中去，并指出此工作是CY最中心工作。党的兵委可与CY合着[作]组织，对兵宣传工作，在组工农会时，要使任反动士兵工作。

在特委宜经常出版散布反动军队中刊物。

六、苏维埃工作问题：

鄂西苏维埃实是革命组织形式，但已成立不必改变。鄂西苏组织在目前应以苏名发动宣传，组织地暴。在鄂西苏维埃之下，各县宜组织革委革命，完成地暴后，便组织苏维埃。

在沔阳应整顿苏使成由群众产生的组织，领导斗争。

此外关于经济问题鄂西苏维埃可采取公开形式，（指红军），红军应由苏供给，苏应有预算。

苏文化工作由CY包办是不对的，应吸引CY参加此工作是对的。县委兼苏维埃若是经群众选举的县委是可以的，但要决定于群众，惟县委若全被选为苏，则县委工作无人负责。

在苏当选的应少分配县委工作或找干事帮助。

苏是斗争的领导机关。

七、反帝工作：

反帝工作，无论在乡村或城市，在群众中应加紧宣传，在宜、沙建立反帝组织吸引学生、贫民参加。

八、宣传工作：

整个鄂西宣传工作应特别加紧。

《工农通讯》宜变为苏维埃刊物，苏应办日报。

九、青年工作：

党团过去有纠纷问题，团固有错误，但党亦有不当处，如CY，特委固不好，党应在组织保存其独立，而帮助改造，应采教育方式指出错误，不可取对立方式，使在群众中关系好。党对CY政治指导，在组织要帮助，在工作亦应经常指导，不可仅有通告的指导。党的同志在团工作，不可脱离党的关系，团在党工作的如有二人以上可建团组织。

团不可领导少先先锋与农协x。

团的工作应到白区发展，不仅限于赤区。

十、反右倾：

执行土革不坚决，证明党的右倾同样存在于鄂西，此对夺取荆沙会师武汉必动摇。故反右倾及富农影响必坚决执行，鄂西党必随时发现右倾路线坚决斗争。

十一、党的组织问题：

发展一倍组织不为多，但要加强无级基础，注意雇农及产业工人。在白色区域应广泛，赤色区域应严格。鄂西应健强地方党，提拔新的工农，洗刷旧的坏的。应使地方党部有能力解决各种问题，无论在白、赤区。

组织上的反右倾路线，宜将此次大会议决案讨论，肃清富农成份[的]路线思想。

为自首分子不能使恢复党籍，因是政治的叛变，若将来白色恐怖一来，他们是可以自首的。但在群众中可让他们去工作，并告诉他们如果是革命的，则不可消极。

十二、会场省代会议精神，布置鄂西工作：

召集鄂西代会是必要的，在六月份全国苏代会以后。

红军中派人问题可由特委讨论。

加入应由特委想办法。

沔阳书记应调到武汉。

刊物有可能时由中央直接寄。

通告由省委转。

此外鄂西杀吃鸦片的人是不对的，党应纠正。

十三、群众教育工作：

乡村群众教育工作，乡苏宜召集群众会议。

赤卫、少先、童团，宜经过组织做教育工作。

俱乐部、合作社等均可吸引群众参加。

妇女除尽可能参加上列群众组织，关于本身特殊问题可单独召集临时的妇女的群众大会。

由省委写一信指示鄂西。

注释

此文似为一九三 年湖北全省党代会期间有关领导人讨论鄂西工作的记录稿。 原文无年代，此年代为编者判定。

一群即周逸群，下同。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要胜利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一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

一 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

(一) 最近国际事变的发展：海军会议以后，各国战备的竞争更加急剧，法意冲突的尖锐，英日美极力操纵中国军阀战争，显示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更加迫切。日本极力利用白俄捣乱的阴谋，白里安组织欧洲合众国以一致进攻苏联的企图，美国指使美洲各国对苏联绝交，环绕苏联各小国波兰、立陶宛等在英法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军事的动员等，更表现着帝国主义一致向苏联进攻的紧迫。这是由于全世界资本主义都走到严重的恐慌时期，从它的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产生出这样不可解决的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各国工人阶级罢工浪潮的汹涌，失业斗争的扩大，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成绩，更增加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社会民主党以及他的左派日益丧失他在群众中的地位。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日益增高起来，尤其使我们严重注意的，普遗全世界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高涨，印度革命的高潮，安南的暴动，以及其他各殖民地的扰乱，中国革命急剧的发展，这样一切，都是在动摇帝国主义统治全世界的基础。因此帝国主义更加紧迫的企图首先进攻苏联以挽救自己的危机。所以进攻苏联的战争成为目前主要的危险。这样普遍全世界的严重的经济恐慌与政治危机，便是说明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的面前了。这一国际形势，无疑是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条件，是与一九二五年——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时完全不同的优越的条件。

(二) 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看来，中国是帝国主义一切根本矛盾最集中最尖锐的地方：中国是世界的主要帝国主义——英日美冲突最激烈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与社会主义的苏联直接接触的地方之一，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革命最深入的地方，同时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最易于尖锐化——譬如现在每次工人的经济斗争都迅速的转变为严重的政治斗争以至武装冲突。这样，一切帝国主义的矛盾都集中在中国而且最易于尖锐化，遂造成中国无可挽救的经济政治的危机，造成不断的军阀混战，造成统治阶级无法稳定而日趋崩溃的基础，造成工人阶级与广大劳苦群众只有日益走向革命来找寻自己解放的出路。所以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山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

(三)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即是世界资本主义最大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地及原料的供给地，因此中国是整个帝国主义的经济组织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假如帝国主义的统治失掉了中国，便是帝国主义——首先是英日美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末日到临。因此帝国主义必然要一致的用尽一切的可能极残酷的来镇压中国革命，所以中国革命必然要遇到与帝国主义的极残酷的战争。可是因为中国革命的爆发，可以掀动全世界大革命的客观条件，到了这一残酷战争的逼临，我们不只是可以动员国内几千万以至几万万群众对帝国主义作激烈的斗争，并且可以号召起全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的劳苦群众与帝国主义作最后的决战，无疑的，在这一最后决战的当中，可以取得我们的

完全胜利。

(四) 对于这一形势认识的错误，成为取消思想与一切右倾思想最主要的根源。陈独秀说：“中国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爆发的时候才有可能”，以及一些右倾同志认为“现在革命固然是在发展，可是将来对帝国主义没有办法”和估量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条件，要选择在“帝国主义势力比较薄弱的省区”，都是不了解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而掀起全世界大革命，中国革命便要在这一世界大革命当中取得胜利的可能的客观条件，而勇敢的争取这一前途。我们必须明确的指出这一悲观的右倾观念的错误。

二日益逼近的新的革命高潮

(五) 目前中国的经济政治状况，因为帝国主义各种根本危机的影响，特别是两年以来继续不断的国内军阀混战，已进到异常剧烈的恐慌。金融紊乱，产业衰败，失业的危机日益增加，百物昂贵，劳苦群众的生活更加痛苦。农村经济更是空前的破坏，普遍全国的灾荒兵祸，使千万群众陷于饿冻流离死亡的境地。南方大部分的区域都处在农民与地主的残酷战争当中。统治阶级的任何一派都已经无法挽救这样的危机，无法统一全国，而且都必然要更加瓦解，更加崩溃。另一方面，工农劳苦群众处在无法生存的境地，只有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这就完全说明革命的客观的条件的成熟，回答了取消派“资产阶级统治正在稳定”的谎言。并

且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飞速的向前发展，工人罢工浪潮的扩大，从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广大工人群众从国民党黄色工会欺骗之下脱离出来，

走向反黄色工会反国民党的斗争，从和平请愿的合法斗争的方式之下解放出来，走到直接斗争，以至武装冲突，这是证明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已经向着革命的高潮飞速迈进。经过今年红色五色——五一与五卅，普遍各地严重的政治斗争，这一形势更加明显。尤其是农村斗争，无疑的已经进到极广泛的高潮，不只是使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在农村中崩溃起来，而且在许多区域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与统治全国的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对立起来。经过这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必然要有更迅速的扩大。加以红军的猛烈发展，与军阀军队士兵群众的革命化，自觉叛变的增加。这一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

(六) 这样一方面，统治阶级继续削弱崩溃，另一方面，群众斗争日益逼近革命高潮，极明显的指示出这一军阀战争的前途，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与军阀统治的最后死亡。并且只有工农群众的革命暴动的胜利，才能根本消灭军阀战争，实现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因此共产党的当前的任务，就是号召广大群众，以革命斗争来反对军阀战争，坚决准备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总暴动，来推翻军阀统治，彻底消灭军阀战争，争取革命的胜利。

(七) 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是革命的先进阶级，一般的甚至落后的群众对政治斗争的积极，伟大的政治罢工在主要的城市中爆发起来。可

是如果只看到现在城市与乡村发展尚未平衡的表面的形势，而忽视工人斗争，阶级对抗的异常尖锐化，广大群众革命的决心与勇气正在飞速的增加与统治阶级统治力量的日益消弱与破产，这样形势之下，在每一个

事变上都有爆发伟大的革命斗争的可能，那末必然要形成严重的右倾甚

至取消思想。工人罢工运动尚未形成革命高潮的主要原因，决不是工人革命觉悟的落后，尤其不是工人不需要革命，而是由于正在崩溃的统治阶级要在城市作最后的挣扎，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白色恐怖与欺骗，极力来镇压工人斗争，所以城市的斗争比乡村要更加严重，更加残酷，这就说明要我们更加倍的努力于城市工作，以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可是现在工作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对工人斗争的怀疑悲观的行倾观念，肃清这样的动摇，是推动工人斗争高潮迅速到来的主要条件。

（八）就一般的说，并不是每一个工人群众的大的斗争，都可以发展成为革命高潮，而必须有其他必要的条件的配合。在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村暴动的广泛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兵士群众的动摇与自觉哗变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的严重的危机，的确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不仅是，而且在现在的形势，如果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斗争，这就是统治阶级不只是在乡村而且在城市都无力镇压革命斗争，无法统治的时候了，这就有了武装暴动的客观条件的成熟，所以我们可以指出革命高潮的爆发必须要紧接着武装暴动。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就要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不只是一要注意政治上的准备——在广大群众中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而且就要加紧组织的与技术的准备。如果我们不认清这样的客观形势，无疑的会犯到策略上的严重的右倾错误——忽视武装暴动准备的必要，而且无疑的会成为群众的尾巴，甚至阻碍革命。

（九）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因此在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并且在这一伟大斗争的本身，就是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所以革命高潮，可在这一省或那一省首先爆发，但决不能有离开全国的单独一省或几省的革命高潮。因此，党在准备全国革命高潮的时候，必须严重的注意全国的配合与发动。割据一省或几省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观念，无疑义是极端错误的。

三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与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

（十）在产业落后的中国，一般的说来，尚没有形成可以完全支配全国的产业的经济中心。而且在几个与帝国主义通商的商业经济中心支配之下（如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大连），造成政治上军阀割据的局面，因此全国的统治阶级动摇与崩溃的形势是一样，而动摇崩溃的程度却有差别。所以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十一）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是与全国革命高潮不可分离，“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六次大会决议案）。因此要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一定要注意全国工作的配合。现在军阀战争的继续扩大与加深，无疑的是更便利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条件，积极争取这一胜利的实现，是目前党的主要任务。可是要注意革命已经或者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时候，反动势力的各派，各省军阀，尤其是各国帝国主义，要暂时抛弃他们互相的冲突，联合一致的来压迫革命。以前第一次大革命时，革命政府可以割据广东一年多准备自己力量的形势，在现在苏维埃革命的阶

段，是绝对不可能的。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必然马上遇到残酷的战争，不仅是消灭反动势力的内战，而且是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压迫的国际战争。所以必须在准备全国革命高潮之下，来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革命政府才能很迅速的调动全国几千万以至几万万群众，一致坚决的与反动势力作拼死的决战，并且还要取得全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已经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援助和一致斗争，以克服反动势力，争取全国的胜利。所以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只是全国胜利的开始，只是全国革命进到更剧烈的斗争，决不会有什么“割据”“偏安”的局面。任何一个省区都必须积极准备争取一省胜利的暴动，以与这一总的形势配合。所以在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时候，必须特别注意全国工作，同时加紧，并且要注意与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联系，特别加紧中国革命在国际无产阶级中的宣传。

(十二) 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树立武装暴动的中心力量，是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主要策略。更要注意统治阶级要在城市作最后的挣扎，这残酷斗争必然比乡村更加厉害，所以要加倍的努力城市工作，在主要城市，尤其是在重要产业工人中，树立坚固的基础，唤起广大群众拚死斗争的决心，是目前最严重的工作，是战略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十三) 在中国客观的经济政治条件之下，单只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而没有农民暴动，兵士暴动，红军的有力的进攻，各种革命势力的配合，同样是不能有革命的胜利。而且在四种革命势力中，缺乏任何一种，都是不可能的。取消派轻视农民，取消红军，无疑的是企图削弱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消灭革命战斗力的反动思想。农民在革命中伟大的作用，在中国有更严重的意义；在土地革命中产生红军，更是中国特有的条件，这是托洛茨基主义取消派所绝对不能了解的。同样认(为)现在城市的工人斗争，尚未进到高潮，要农村采取保守的策略，停止红军的发展的等待观念，也是极端错误的。工人斗争固然还没有进到革命的高潮，农民暴动，士兵暴动与红军发展也还表现着不够，所以我们要特别注重工人斗争力量的加强，同时要抓住农民暴动的发展，士兵暴动的爆发与红军猛烈的扩大。

四改组派与取消派

(十四) 在革命继续急剧的向前发展当中，改组派更暴露了他统治阶级的一派，不只是在此次军阀战争中完全与帝国主义和阎冯军阀相勾结，而且在广西与法帝国主义联合一致，极残酷的摧毁龙州苏维埃，屠杀工农革命群众数千人之多。证明认[为]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中间营垒，完全是一种迷惑工农群众的谎言。不过因为他处在半在野的地位。可以喊出一些改良欺骗的口号来愚弄群众，所以他还能打入一部分群众中散布改良的幻想。特别在农村中，富农群众是他最好的基础，更易于扩大他的反革命的作用(最近在湖北苏维埃区域中，已经发现了改组派的有组织的活动，便是明显的例证)。这是要我们严重注意，积极到群众中去揭破他们反革命的面目。这一斗争，不能有丝毫的忽视。

(十五) 现在取消派无论在他的政纲上(召集国民会议)，行动上(勾结工贼破坏罢工，在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中实行反革命的阴谋)，都与改组派

没有丝毫原则上的差别。他的作用完全是欺骗群众和缓革命，成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另一工具。到革命高潮的时候，更无疑的要公开的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变成完全的法西斯蒂。所以对取消派的斗争，不只是党内思想上的斗争，而且要特别注意到群众中揭破他们反革命的作用，消灭他们的影响。

（十六）在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当中，特别是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这一工具完全破产，改组派汪精卫必然成为帝国主义最宠信的工具。取消派陈独秀各派，同样要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更积极的反革命，这是极明显的前途。只有我们从现在起，坚决的到群众中去肃清他们的影响，才能扫除他们反革命的危险。这是准备革命高潮准备革命胜利的主要任务之一。

五准备革命的转变

（十七）现在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是消灭封建势力的土地革命，无疑义的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取消派认为现在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终了的滥言，只是使我们放松民主革命的任务，放松动员广大群众实行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反动思想。可是现时无产阶级已是唯一的革命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并且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巩固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胜利，这就决定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胜利。

（十八）革命已经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必然要用尽一切力量来反对革命，武装进攻，经济怠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等。这一残酷的战争，是对帝国主义地主买办的战争，同时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战争，这时革命政府为着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不只要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企业、工厂、使民主革命彻底，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铲除反革命的武器。并且为着对付严重的经济封锁必然要实行组织生产，管理生产。同时在政治上为着对付顽强的反革命的进攻，必然需要更集中独裁的政权。这就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革命转变主要是阶级关系的转变，无产阶级专政，便已经是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所以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间隔的。

（十九）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时革命政府，如果不坚决执行阶级的策略，没收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铲除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武器，便会停止革命的深入，而且会障碍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这就是革命的自杀政策。所以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的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另一方面，如果以为“革命胜利的前夜，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开始胜利以后，革命政权一开始建立，便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的政权”，也是错误的，这就忽视了革命转变的过程（不论这一过程是如何的短促，然而必然经过的），忽视了这时反帝国主义反豪绅资产阶级的残酷的进攻，还需要在民主革命的口号和政策下来动员千万、万万的群众，来克服这一反革命的进攻。

（二十）革命胜利的开始必然就是更残酷的阶级战争，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除掉极力进行反革命的武装进攻外，必然还要用尽一切方法来引诱尚留在革命战线内的小资产阶级来反对革命。所以革命的转变的过程中不可免的要发生新的动摇与叛变。所以我们决不应幻想革命的和平转变，而要从现在起，运用我们的正确策略，加紧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雇农的独立组织，

并巩固与贫农的联合，肃清富农的影响，争取中农，以减少将来革命转变的困难，这样正确的坚决的策略，的确有决定将来革命转变更加顺利的严重意义，不容我们丝毫忽视的。

（二十一）决定革命胜利以及革命转变的另一重要条件，就是已经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有力的帮助，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依据中国半殖民地的条件，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与世界革命的胜利，将是不可分离，中国革命对帝国主义的空前猛烈的争斗，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同时没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也很难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所以特别加强中国革命在国际无产阶级中的宣传，特别是加强斗争的联系，是目前严重的任务，是准备革命胜利与革命转变主要条件之一。

六党的任务与策略路线

（二十二）在革命急剧的发展，伟大的革命巨潮已经接近的现在，党不只是一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以促进这一革命巨潮更快的爆发，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

（二十三）军阀战争这样继续扩大，使广大群众陷于流离、破产、死亡无可挽救的地位。整个国民党的统治，不只是表现到他自己已经走到最大的恐慌，特别是广大群众已经对他绝望。因此只有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在反军阀战争的中心口号之下，才更能动员广大群众。如果党不积极的提出这样的口号，而单只提出部分的经济的要求，反使群众感觉无出路而不积极的起来斗争。群众好久以前就在说：“暴动的时候通知我，我一定到来”。现在党应当勇敢的号召群众，“暴动的时候快要到了，大家组织起来”。过去党对反军阀战争的争斗注意得异常不充分，是严重的缺点。现在党必须坚决提出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特别是反军阀战争的口号，组织同盟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士暴动，号召红军积极进攻，以实现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的总路线。

执行这一路线，首先要注意到中国革命的国际的任务。中国革命的爆发，不只是一要促起帝国主义一致的压迫中国革命，而且要促起帝国主义更积极的进攻苏联。因此武装保护苏联要成为革命的中心口号之一。并且要同时注意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殖民地的革命斗争的联系，加紧中国革命在国际革命群众中的宣传。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也在日益紧张起来，因此作广泛的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和鼓动，加紧发动极广泛的反帝运动与援助殖民地革命运动，也同样是非常迫切的任务。

在反军阀战争的斗争中，必须同时加紧拥护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决议，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运动。必须告诉广大群众，只有推翻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一运动，必须深入到每个工厂、学校、农村中去，以鼓动广大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决心。

（二十四）这一路线的最中心的问题，是组织政治罢工。不只是一要注意在经济罢工中加紧政治的宣传，不只是一要领导每个经济斗争转变到政治斗争，而且是要坚决的提出政治的口号（如反对军队驻厂，反对白俄，反对拘捕工人，反对黄色工会，要求组织工会与罢工的自由，最中心的是反对军阀战争），来组织广泛群众的政治罢工。没有坚决的政治斗争，决难取得经济

的胜利，只有坚决的政治口号，才能更提高群众斗争的勇气（在战术上每个政治口号的鼓动，每个政治斗争与经济要求的联系，自然是要严重注意的）。组织五一，五卅运动的教训，一般的都是政治的宣传鼓动不够，不能勇敢的提出政治的口号来组织五一，五卅的罢工，大都只注意到以经济的口号去发动群众，这是在各地未能组织广泛的罢工的主要原因。这是极严重的右倾错误，这不只是群众的尾巴倾向，而且是障碍群众斗争的严重的错误。

（二十五）现在工人运动中一般组织的薄弱，成为最严重的弱点，我们必须加以严重的注意，用最大的努力来扩大赤色工会，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可是一定要注意到只有在坚决的政治斗争的口号之下，这一努力才能收到更大的成功。必须坚决的发动争取组织工会与罢工的自由，争取赤色工会的公开的斗争，发动反黄色工会，反国民党的斗争，才能团结更广泛的群众。如果只束缚在狭隘的秘密的范围之内，群众组织很难有广泛的发展，很难巩固起来。

（二十六）建立并扩大工人群众的武装组织（赤色先锋队与纠察队），加紧军事训练，成为目前迫切的任务。不只是为了在斗争中宣传组织纠察队的必要，而且要以准备武装暴动的口号来鼓动广大群众加入纠察队，赤色先锋队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迅速的扩大群众武装组织，才能使纠察队和赤色先锋队成为暴动的中心队伍。

（二十七）坚决的组织地方暴动，是实现目前总路线的主要任务之一。地方暴动的目的是夺取地方城市，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是农民暴动的最高形式，他的前途必然要与中心城市汇合起来，完成全国暴动的胜利。现在农村斗争，已经进到高潮，无疑的地方暴动的条件，已经是一般的成熟。党应毫不迟疑的，在号召地方暴动的口号之下，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实现这一任务。现在实现这一任务的最大障碍，是过去“游击”的观念，只是攻打城市，而不是夺取城市，没有决心将地方苏维埃政权在城市中树立起来，这是一种农民意识的反映，与目前的路线没有丝毫的共同点。地方暴动胜利以后，应当马上建立起地方苏维埃政权，并且应当马上动员广大群众实行坚决的进攻，积极的向外发展。

（二十八）猛烈扩大红军，更是目前严重的任务，特别是苏维埃区域的。在军阀制度统治的中国，没有强大的红军力量的配合，决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现在党特别是苏维埃区域的党，应当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加入红军，拥护红军，集中武装到红军中去。必须告诉广大群众，只有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完全推翻，只有全国革命的胜利，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以冲破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这一观念，是目前猛烈扩大红军的最大的障碍。第二个严重的障碍，就是没有认识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仍然株守着游击战术的军事观点，来反对红军的扩大以及扩大（进攻）的策略，这是完全不了解军事的战术，配备，编制，组织都应随着整个政治路线而改变，如果用旧的军事观念来束缚党的策略的转变，便是严重的右倾错误。

（二十九）红军的战略与战术，不只是为了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根本改变他过去的游击战术，而且要在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总的计划之下，有配合的有组织的实现他的军事作战的任务。这一任务的总的目标，便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过去的游击战术已经与这一路线绝对不相容，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现在红军另一严重的任务，

就是特别加强阶级的政治教育，目前红军的成份农民群众占了最大数量，这必须严重注意阶级的政治教育，才能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肃清一切农民意识的错误倾向。

（三十）在目前总路线之下，兵士运动的任务，不只要发动军阀军队的兵变，投到红军中来，而且要以组织反军阀战争的兵士暴动为中心战略。这就是说，不只要鼓动简单的零碎的哗变，而且要有组织，有计划，并且与各种革命势力配合的举起反军阀战争的旗帜，实行消灭军阀的暴动。这样在暴动以后，便应坚决采取进攻的战略，以瓦解军阀的军队，切实纠正过去哗变以后即行逃跑的办法。

（三十一）执行这一总路线的最大的障碍，便是与这一总路线绝不相容的右倾观念。党必须坚决的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特别是尾巴主义的倾向斗争，是执行这一总路线的前提。系统的取消主义思想的取消派，已经在事实上，从党内的反对派发展成为阶级的敌人，需要党在党内特别在群众中更坚决的斗争。可是暗藏在党内的右倾思想，因为他表面赞成党的路线，而在每个实际的策略上都发生怀疑，动摇，怠工，不积极的执行，的确是同样的成为目前的莫大的危害。不克服一切右倾的思想，党的路线与策略决不能有充分的执行。

（三十二）青年与妇女是革命斗争中一个重要力量，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忽视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的倾向，因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现在任何一个斗争上，都看到青年与妇女的积极作用，党应当积极地把他们吸引到革命的战线上。党更要多方面帮助青年团工作的转变，反对团内的清谈倾向。

七党的组织问题

（三十三）目前党的组织力量的不够（特别在城市中），是革命的主要弱点，在任何一次斗争中都极明显的表露出来。如果因组织上的弱点而怀疑现在革命形势，怀疑党的路线，是极严重的右倾观念。可是忽视党的组织的弱点，不积极的为强固党的组织而斗争，同样是严重的错误。因此特别注意强固党的组织，是执行目前总路线的总任务。

（三十四）在目前党的组织上，的确暴露出许多异常严重的弱点，首先是工人中发展的缓慢，无产阶级的基础未能迅速的扩大起来，新的工人化的干部引进得非常之少，支部生活不健全，不能在群众中实现核心的领导作用。这样党的正确的策略不能完全传达到群众中去，而群众的落后意识，却时常反映过来发生对于党的策略的动摇。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支部执行反右倾的斗争异常不够，许多地方反右倾简直还没有传达到支部中去，以至许多动摇的右倾分子尚占据着支部的领导地位，妨碍着一切策略的执行，首先就妨害着支部生活的健全。因此在支部中坚决执行反右倾的斗争，加紧支部的教育，培养支部中的干部分子，是健全支部生活、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的路线与策略能够实际的正确的执行的先决条件。这是要特别唤起各级党部严重注意的问题。

（三十五）现在党的组织上，还表现着一种小资产阶级浪漫性的危险：不能有组织的、有规律的去进行工作，督促工作，常常表现着寒热症的状态，这是大有害于工作的紧张，特别是对秘密工作的忽视，简直直接影响党的存在。最近几个省区的严重破获，主要原因都是由于不注意秘密工作。这样严重的血的教训，应该唤起全党的莫大的注意，坚决与小资产阶级浪漫倾向斗争，成为巩固党的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

红二军军委关于红二、六军会师前部队作战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中央：

今春送上详细报告一件闻已收到。兹将由鹤东下到二六军会师以前的各种情形报告如下：

一、军事：

1. 军事行动，二月间正出师东下时万涛同志赶到，得到了中央许多文件，加上他的口头报告，对于中央的路线及政治概况得了相当明了，当时早已计划由资丘经过海洋南到松滋，与六军取联络所以仍照此计划进行，但到了资丘，正向海南进迫时，郭汝栋部有三团之众夹着长王团防阻我出路，无法前进，遂计划夺取五峰县城，结果，占领五城时反动知事及豪绅地主早闻风而逃，除夺获了少数武装外另无所得，又因敌人节节向我军取包围形势，只得折回鹤峰改途东下，抵鹤峰城后，又接到鄂西特委的来信，知道蒋阎冯各派军阀的混战快要爆发，我军无疑的是要向下发展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参加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消灭军阀战争，所以积极准备东下，更成为巩固赤色区域，周围的敌人，一方面加紧整理各部，一方面设法补充加紧会合二六军打到武汉的宣传费了两周时间开始准备全于三月二十日会师东下，当时因各部已调武汉，遂计划有五峰经松滋到公安与六军会师计划完了，便依此路线东下，但五峰有孙团阻塞要道，恃险抵抗，于是首先更扑灭孙团祖孙女子三代人击毙夺得四五股反动势力完全消灭，向来阻塞沙宜交通和摧残赤色区域打通了交通要道，建立了五峰政权，遂得顺利东下，无后顾之忧（？）到了松滋刘家场侦得松邑团防闻散布各地便计划以迅速手段分别消灭反动势力，并解决经济问题，于一月之内占领松邑，大市镇磨市划市沙道观专积台等处。翌日在离公安境十里许之纸厂河集中距东有彭启龙部一团及五县联合团防千余向我军进攻，于是北进湘西澧县又击溃了张家坊的敌人军团，是数役夺获长枪共百余枝，经济也解决了一部分，可是惹动南北豪绅的大怒，勾引军队演成围剿之势。我军便追至松石澧交界之地，是时松滋有彭部及团防约两千之谱，澧县有刘铭武部及常匪千余，石门有罗逆效之常匪约千人，已成三面包围之间，前委遂决定打倒一面扑来罗逆效之激战七小时之久始将敌击溃，夺得长短枪百余枝，俘虏敌人七八十，击毙敌人无数，惟我方伤亡亦重，将近百数。此方敌人现在溃不成军但松澧敌人仍节节进逼而伤兵难以行军，更加阁部招来之谷旅又发生动摇，只得返回五属清水湾，解决谷旅枪决谷子龙、谷青轩等八人，同时将伤兵送回后方诊治，然而部又须整理才能作战，遂决定回折坪，整理一周方候鄂西特委和六军的回信取得联络后，再进经松境，已与松县委先发生关系早写信由他处转给六军整理完毕未得回音，但势不能久停决定再向淞属西斋便欲迅速的攻下公属申津渡，进占公城探访六军消息，谁知敌人决堤防守周围隔水无法进攻，而后面彭又来尾追，绕道再到张家坊。翌晨与刘部在离张家坊十余里之地相遇，当猛力向敌推破进到离澧州仅三十里之大堰挡始悉敌人三面遂分三路围攻张家坊我们仅遇着一路约一营人是役夺得枪五十余枝，子弹千余排，俘虏数十名伤亡无多。此次游击中与松委通了几次讯，知道红军集中进攻的策略，并夺取一省和几省的首要胜利的总任务和二、六军完成鄂西暴动，夺取武汉政权的任务。这时可进攻澧州，但因一来恐违背路线，二来士兵疲劳，所以又折到闸口，再计划进

攻申津渡於六月十八日攻下申津渡，本该占领县城惟因那时未得着六军消息公安河道太多，敌情不熟加以天雨河水太涨，申市又为水淹，於是再退至西斋等候消息，七月一日六军攻下公安，三日我方得信，四日即在公境会师。七日两军前委开联席会议，组织二军前委。以后详情有前委报告，兹不赘。

二、内部转变：

1. 三月二十日出发时的各部情形：（1）警备团第一营系原来特务营，成分较好。第二营原来二团在出发前三天改编的嗜烟者很多，成分较差。（2）一团系基本部队，营连排长均是同志，战斗力较强成绩亦好。（3）四团一营成分较好。第二营系谷子龙的队伍吃烟者多，成分最差。第三营是郭汝栋拖出来的在五峰回鹤时招来的，作战甚勇，但多系哥兄弟，成分不好。（4）二旅特务营也是特务营也是谷子龙的队伍成分更差。（5）第一游击司令多系神兵群众异常封建但尚勇敢可以利用作战。二路总指挥部十二团枪千余支完全系吴辅臣的群众吴团完全系五峰泰年的群众成分甚差，第二游击司令完全招来伍琴谱的残部，成分不好。

2. 东下期间新招各部：（1）在孙团招得从郭汝栋部拖来一支人枪十五支，编为独立第三团完全系棒老二成分最差，对革命毫无认识，只为金钱而来。（2）头次到纸厂招来一支讨逆军枪二十支百余人内中成分尚好。（3）到闸口警卫团收编独立营枪六支成分好工农群众多。（4）在×林子警卫团又编成第三营，枪五支成分好。（5）次到西斋招得第五游击司令陈海山部枪十多支成分差，陈本人系松滋毒恶。

3. 转变经过：在松滋第二游击司令编归五团一营，与罗逆效之作战四团三营营长阵亡，头目遂去清江湾根本解决四团二营二旅特务营，旅长团长连排长一律枪决，群众一部遣散，一部分分编各团在斥坪整理时一面加紧党的活动，一面加紧士兵委员会工作，更加紧政治训练，这是第一步的转变。二次东下因招来部队不守纪律，影响不好，遂决议设法整顿，在西斋将独立团编入各团在公安将第二游击司令陈海山枪决，好的成分编入各团，坏的遣散，警卫团独立营第三营合并为该团三营第一游击司令，提了分编各团再来的群众在十数战斗中伤了百五六十，遣散了老幼，淘汰一部分在公松一带，吸收了五六百工农分子，这成分日趋善分，不过新兵多减少了一些战斗力，这是第二步的转变。

二、六军会师过江北后，独立三团在堤役阵亡营长一，老兵二三十名遂编作一营，在厨场时编为警卫团三营二路总指挥附属十一、十二两团全并为第十五团，二路总指挥部各取消监沔赤卫队枪百六七十支人三百多，分编十团（前一团）十一团（原四团）警卫团，鄂西联县政府送入伍者约三四百人，这是第三步的转变。目前十团十一团警卫团均有枪四百支，人各七八百群众成分较好。十五团系各队伍混合的，成分最差。总计现在的成分湘鄂西工农分子占十分之七，带封建性的占十分之三。最近的成分与以前的绝不相同是值得我们报告的。

三、政治：

1. 赤区概况：经过去今两年的奋斗仅开辟了纵横约四十里之赤鹤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但在东下时，区政府尚未建立，仍是用农协名义其他施鹤巴长建五县×等特别区域均是农协，土地尚未分配。赤色区域经济枯竭生活艰苦，中农贫农多而富农少。有少数武装在赤区游击，详情已告知鄂西特委，由他们派人上去工作，以后他们当有详细报告。

2. 军队中政治上，群众政治水平太低，没有大的认识，但敌人朋友的分别是很认得清楚的，每於休息期间必加紧兵委会工作，每日早晚呼口号唱革命歌时常作政治演讲，注意政治训练，不过因政治人员太少，现在各有一政委，营连尚无即有亦无工作能力，各级政治部均未建立，仅师政治部有二三同志工作，所以要想提高士兵政治水平简直没有办法，这是中央应当注意的。

3. 对外政治工作各种标语传单布告宣言，都散发，张贴得极多，每到一处尽可能的在召集群众大会后没收大商号和豪绅的一切财物分给群众，注意军队纪律，在松滋、宣、石、澧县的群众的确受了不少的影响，惜因没有组织，或组织不健全简直没人来领导，以致未造赤区。尤其是那时松宣等县的团防已被我军打得七零八落早已逃之夭夭。群众革命情绪非常高涨，只要我们稍稍领导便可建立政治。每次所俘虏的敌人士兵均集合在一处对他们作宣传，愿干者干，不愿干者一律发洋五元至拾元准其回家，这样对敌人兵士有很大影响。

四、党务：

去年冬间同志多因组织不严密，支部生活不健全，同志多个性的发展，发生了一些不好倾向，在部队中不能取[起]大的核心领导作用，今春确实整理了二三次，始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加紧同志的训练，开了一次同志训练班，几次训练会议。各种会议照常开，党费照常缴，支部也渐能执行铁的纪律，不过批准讨论的稍觉久缺士兵同志少，在士兵群众中仍不能起大的领导作用，好在部队中旧的危险小，新的危险（取消派改组派）可说没有。在阐口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因有同志个性发展，批评后不加改正有些则一点不如意，即消极怠工，或请调工作。的确，这是严重的错误。在这次会议中，经过热烈的批评，并郑重地决议了三个纠正错误的议决案。

1. 如某同志不虚心接受，不执行党纪，将不客气的洗刷出去。

2. 消极怠工的决是CZ的表现，也只有推他出去。只知服从，但人说小话的意气而不遵照中央指示地去努力工作仍请他让出去。经过这次会议后，党的工作加倍紧张，党内又有个新的转变。组织系统另表列后。未会师以前，都是用湘鄂西前委的领导。会师后始改军委，会师时仅一百三四个同志，工农及知识分子各占半数。官长十分之六七，士兵仅十分之三四，比较有认识者占十分之七。带个人信仰者占十分之三。唯一的请求——请设法多派军政人才来二军工作，才有办法产生一批又牺牲一批，在斗争中实在无法补助。会师至今增加了六十个同志。升来者，十分之四。新同志十分之六，攻监利荆沙加了十余同志共有二百同志上下。前委发了几次通告中央重要通告，都抄下去，全部政治工作均在宣传与指导之下。

二军军委

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

——李立三在中央行动委员会上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八月六日)

同志们！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正在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已经显然表示着到了历史上伟大事变的前夜。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已经显然是推翻统治阶级与建立苏维埃政府，这使着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也更加重大。在现在形势之下，不仅要有健强的党的领导机关，并且要有全党同志的动员，自上至下的总动员。整个党的组织需要军事化，要更集中与严密的指导。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现在必需有全国总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以及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江苏总行委的成立，这些组织成立的意义是要使全党的指导更敏捷，更迅速，更巩固，这就是向忠发同志今天所报告的总行委成立的意义。总行委成立以后，是要根据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执行政治局所委托的任务，因此，现在必需将中央政治局对于全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对于目前党的任务的决定，在这里作一概括的报告，作为总行委今天讨论的基础。

甲 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特点

一 中国革命生长于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

中国革命之第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革命生长于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中。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的特征，是世界资本主义之一切内外矛盾的紧张，整个经济制度之严重的危机，显然表示要急剧的走向崩溃与死亡。中国是一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世界帝国主义制度之经济组织中的一部分，现在世界帝国主义之一切矛盾，都在中国反映出来。中国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冲突最紧张的地方，是英日美三个主要帝国主义相互冲突最激烈的地方，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同时也是半封建地主与广大农民群众的冲突最严重的地方。这一切资本帝国主义世界中的矛盾，都全数的在中国集聚起来。正因为这些国际上矛盾都集中于中国，所以造成中国之一切政治与经济的危机，革命的危机，生长成为现在中国的大革命。这一国际条件是与前一次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完全不同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在客观上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是资本主义之暂时稳定，是所谓第二时期，现在不然，现在是整个世界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全世界普遍的逼进于直接革命的形势，这是便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的。这一国际条件，可以决定中国革命的大爆发。特别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最大的殖民地，是现在帝国主义制度的一个主要经济基础，更必然要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中国革命之第一个特点。

二 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的崩溃

目前革命形势中的第二个特点，便是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之迅速的崩溃。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因为中国封建势力的存在，都利用军阀制度来做统治中国的工具。各帝国主义中间相互的竞争与冲突，又加以封建势力之争取地盘的特性，于是使中国不断的发生着军阀战争。远一点说，这种战争曾延长了二十年，近一点说，在近三年来的国民党统治之下，同样完全没有停止。这一长期的军阀战争，使广大群众陷于绝地，全国经济的大破产，使广大群众破坏[产]，失业，饥饿，死亡。在这一种形势之下，全国广大群众确是已经觉悟了，除了坚决的对军阀战争作战以外，别的是没有出路的。

特别现在全国农民暴动的发展，土地革命的深入，这是直接动摇了军阀制度的基础。数百万的军阀军队中的士兵，这些都是失业破产的农民，因此，农民暴动当然定要动摇军阀军队中的士兵。这一次的长沙事变，便是一个显然的例证。当红军进攻长沙的时候，何健的军队超过红军几倍，并且在何健军队中间，我们共产党的工作是非常薄弱的，几乎是完全没有，但是何健的军队一到与红军见面的时候，不开一枪的大批的潮水一样的投降红军。自然，这一军阀制度的崩溃，不只是简单的农民暴动的一个原因，同样有另一个原因，就数十万以至数百万的士兵群众，已经受了长期的军阀战争的痛苦。在每一次的军阀战争中，士兵群众眼看着自己弟兄变成炮灰，战场上的尸山血海，换来的不过是军阀们的升官发财。因此，广大士兵群众知道在军阀战争之下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兵士群众的哗变暴动，投降红军，不仅在一些杂色军队中看见，并且在南京政府下之主要部队中也不断的发生。这一军阀制度之迅速的崩溃，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统治崩溃的象征。这是要特别认识的第二个特点。

三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斗争的尖锐化

第三个特点便是中国阶级斗争的尖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是极端的尖锐化。这一认识在目前的有严重的策略上的实际意义。从前列宁在俄国革命中，曾指出俄国阶级斗争的一个特点，就是工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不可分离。当俄国工人提出经济要求的时候，必须与沙皇的宪兵警察发生严重的冲突，因此，经济斗争便必然要成为反对沙皇的政治斗争。这一种形势，在现在中国革命中还更要显明，中国现在阶级斗争尖锐的形势，比当时俄国还要更加十倍的严重。现在当世界资本主义战后第三时期中，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剥夺，特别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夺，客观上必然要非常残酷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之下，若不是残酷的剥削工人，则简直不能维持其存在。在这一种形势之下，所以中国的帝国主义以及资产阶级，对中国工人绝对没有改良主义的可能，而最主要最基本的唯一的方法是白色恐怖。不错，在中国也有改良主义黄色工会，但他与西欧是完全不同的。中国黄色工会只有对工人群众之口头的欺骗，绝没有在工人中可以存在发展的经济基础。因此，中国黄色工会已经完全法西斯蒂化了。完全成了国民党之御用的工具。由此造成了斗争的特点。目前中国工人斗争的形势，任何小的经济斗争都必然要成为反黄色工会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至成为直接的武装冲突。这个现象，大概每个党内参加工作的同志，在这两年的斗争实际中都可以看出。并且，在今天看来，这种形势更为显明。从北京人力车夫的武装斗争以来，以后北宁铁路工人的斗争，青岛纱厂，火柴，人力车夫的斗争，上海电灯泡厂以至现在的法界电车，我们不必详细的举例——因为根本没有一个例外——，每一个经济斗争，结果都必然成为非常严重的武装冲突，群众拘捕，巷战，屠杀。因此，我们肯定现在中国阶级斗争尖锐的形势，比俄国从前还要更加十倍的显明。

由阶级斗争的尖锐，产生出两个结果，首先便是黄色工会的官僚化，法西斯蒂化。黄色工会在现在的阶级的斗争中，就是表面的中立的地位也是不能维持的，他必然的成为国民党压迫工人的工具。北方黄色工会的领袖，一出来便要带手枪，南方黄色工会，也是一定要带手枪，才能收会费。上海在每一个罢工中，黄色工会是公开的出来阻碍罢工，破坏罢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工具。我们毫无疑问的可以肯定，黄色工会在群众中的影响，早已完全

的根本的破产了。广大的工人群众，已经无数次的直接打黄色领袖，在现在若仍然以为黄色工会在群众中很大的作用，则必然会得出非常右倾的结论。

还有第二种现象，也是由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化的条件所产生的，这就是广大工人还在没有伟大政治罢工之前，已经迫切的有了武装暴动的要求。譬如现在的工人斗争，还没有象一九二五年五卅的大罢工，也还没有象现在法国之十余万人的大罢工，但是广大工人群众确已有了武装暴动的认识，这不是理论，而是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形。如果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形的人，他必然以为这是共产党人的夸大狂，或者布浪[朗]基主义。

假使现在跑到工厂中，问工友是否需要暴动，工人一定答复是需要暴动。许多工人都说：“暴动的时候，你们都来通知我”。南京的铁路工人，当我们初次召集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只到了五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到会，他们说：“只是开会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厂中驻的有兵队。”后来我们同志又告诉他们：现在开会是为的准备暴动，于是许多工人群众都高兴了，第二次会到的人数简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纠察队立刻成立了很多，并且他们对党的信仰也异常提高了。他们大呼：“这才是办法！”在这次长沙事变中也是一样，当红军进攻长沙的时候，我们长沙党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不过只有两个支部，并且因为白色恐怖的压迫，我们支部在群众中很少活动与影响。在这一种形势之下，广大工人群众及城市贫民当红军进攻长沙的时候，依然在拥护中国苏维埃及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之下，暴动起来，响应红军。这些都证明，还没有到广大的政治罢工的实现，工人群众已经迫切的有了武装暴动的要求以至行动，这是中国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状况之下所产生出来的现象。在西欧，因为黄色工会之长期欺骗，改良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国会制度的存在，使广大工人群众在伟大的总罢工还未实现之前，很难有武装暴动的觉悟。中国工人则不然，总罢工还没有实现，但工人已经迫切的要求武装暴动了。

这是中国革命第三个特点。

四中国的农民革命

现在的中国经济状况，我认为比俄国一九一七年还更落后。就在这一经济基础上，使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比从前俄国农民还要更大。中国无产阶级若不能得着广大农民做他的同盟者，则中国革命绝没有得着胜利的可能。并且，客观的经济条件，使着中国农民仅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得着解决的土地问题的可能。中国还不象当时的俄国，俄国还曾有过地主资产阶级的斯托里平的政策，还做过些许的农业改良。中国没有任何斯托里平政策的可能，国民党改组派虽然尽量宣传二五减租，但是这种对农民的改良主义也是与对工人的一样，不过只是一些口头的欺骗，绝对不会实行的。这不是别的原因，乃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与中国之半封建式的土地关系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的帮助农民执行土地革命。这一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了解无产阶级对农民之领导的问题。许多人对于这个问题是非常机械的认识，他以为只有城市有伟大罢工的时候，然后才能说农村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许多人看领导问题是只看见了斗争的领导，而没有看见政治上的领导。固然，无产阶级在现在还没有广大的政治斗争，以领导与配合农村的斗争，这是现在之非常严重与非常严重的问题。可是，无论如何，绝不能因此说农村革命不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因为这些农民革命，都完全执行了无产阶级所提出的政纲，显然在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之下。广大的农民革命已经直接动摇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基础，

已经使国民党的统治在广大的区域完全崩溃。农民在广大区域中，都建立了苏维埃的政权，这在中国革命中是有非常伟大意义的，这是现在形势的第四个特点。

五红军的存在与发展

中国革命之第五个特点。便是中国红军之存在与发展。有许多同志以为只有革命胜利中产生红军，而不是红军促成革命。就由这一观点，便根本怀疑到红军的存在，以及整个党的策略路线。自然，取消派陈独秀们是不用说了，他们当红军占领长沙以后，曾开会讨论：“长沙是谁人打下的”？自然，取消派的无耻，他们当然可以与国民党统治阶级做一样的回答，说“长沙是土匪攻下的”。自然，这是统治阶级对于我们的污辱。我们自己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六次大会已经告诉我们，红军是由土地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在今天我们更可以补充的说，是与统治阶级的崩溃，工人斗争的尖锐，及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都是不能分离的，不如此，便不会对红军有正确的认识，并且不能决定红军发展之根本的策略问题。现在是非常显明的，现在长沙，南昌，九江，大冶，黄陂，沙市这些绕围武汉一切重要城市，或是已经被红军占领，或是完全在红军的威吓之下，这种形势，我们确不敢断定红军在什么时候可以与武汉工人暴动会合起来，占领武汉。我们固然不能预料这个日期，但占领武汉的形势是非常的显明，并且有很大的可能。不过，若是不能明了红军的意义，我们可以走到非常右的策略。在俄国革命前曾有过农民的游击战争，中国不仅有游击战争，并有正式的红军，六次大会指出红军是革命的动力之一，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据于中国政治经济之客观的条件。

乙全党的总任务

由我们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知道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严重。中国革命正遇着整个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大恐慌，军阀统治之急剧的崩溃，阶级斗争之极端的尖锐化，土地革命的深入与发展，苏维埃区域的扩大，三十万红军之迅速的发展，就在这些条件下来决定中国革命与我们党的任务。

一准备武装暴动

在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全国政治任务的决议案中，曾指出中国革命中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革命高潮到来之后，必然紧接着全国武装暴动的形势，这一指出，到今天已经更加显明了。六月十一日的政治决议案，到今天虽只有两月之久，但实际斗争生活已经完全证明了他的正确。在这两个月的全国政治生活中间，我们确已看见了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之伟大的领导作用，假使这一决议案在今日才发出，则我们便已做了全国革命斗争的尾巴。

自然，许多重要的问题，在这一决议案中都给了根本的正确的解答，这些解答在今天自然仍是完全的适用，在这里我不必重复了。今天我需要特别提出的问题，就是关于革命高潮与武装暴动的问题，这一点在今天有更严重的意义。在一般的说来，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并不一定马上就是武装暴动。譬如在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事变以后，上海三十万工人的大罢工，开始了中国革命之伟大的高潮，直到两年才有上海的三次暴动。即使以北伐为武装暴动的开始，但也在五卅事变一年以后。可是，现在中国革命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

现在革命发展的形势中，表现着在政治与产业中心城市中，还没有极广大群众的政治罢工。这是由于统治阶级在城市中，用尽一切白色恐怖的压迫，以保持着在城市中的最后挣扎。当然，在这里我们应当承认城市工人力量的

对比还是不够，但是决不能因此否认工人群众推翻统治阶级的认识和决心。的确，现在还没有赤色工会广泛的发展，还没有极广泛的政治罢工，这里一方面是由于我们运用策略的不正确，另一方面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的白色恐怖。统治阶级知道城市是他最后挣扎的基础，将他一切的反动力都集中在城市，因此，革命势力在城市中必需要有更加十倍的努力，才能冲破敌人的阵线。现在，统治阶级已经失去了广大的农村，同时，城市革命斗争之迅速发展，使反动统治在城市中已经有了巨大的动摇，这种动摇更加急剧的时候，必然就是大革命的爆发[和]统治阶级整个的死亡。在一九二五年五卅以后，有了广大的城市的革命高潮，但统治阶级在农村中的基础并没动摇，因此，很难迅速将统治阶级推翻。现在形势，统治阶级在农村中的基础，已经是严重的动摇与崩溃，若是城市爆发革命高潮，统治阶级失掉了他的镇压的能力，则马上武装暴动，那么统治阶级的基础，已经完全瓦解，无疑的便是夺取政权的时候的到来。所以在伟大的革命高潮的爆发，一定要紧接着武装暴动，甚至武装暴动与总同盟罢工同时到来。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今天伟大政治罢工还没有爆发的时候，我们便需要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不仅在政治上要准备，并且要在组织上技术上准备。若是现在不知道预先准备，一定要到总政治罢工实现以后再去准备，那么，我们便会完全丧失对革命的领导。准备暴动马上便要积极的进行，要以准备武装暴动为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不然，伟大事变的到来，将使我们措手不及。

在红军占领长沙之后，广大的工农群众要求暴动在各地都表现出非常迫切，因此，准备武装暴动在今天的意义，甚至比六月十一日的政治决议案中还要更有直接的意义。譬如现在武装暴动，我们真是不敢预定的。假使武汉的总罢工在今天实现了，我敢说 武装暴动一定要今天开始，假使明日总罢工实现了，武装暴动也一定便要在明天实现。正因为如此，所以关于武装暴动的准备，绝不是要候到总罢工实现以后，因为在那里便已经来不及了。假使在今日我们不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那我们便必然会做革命发展中的尾巴，会成为断送革命的罪人。

伟大政治罢工的实现，他已经逼近了我们的前面。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反对军阀战争的勇气，这种客观形势已经告诉我们到了伟大事变的前夜。那些认为武装暴动还是遥遥无期的人，固然是十足的取消派，但同时将今天准备武装暴动还看成只是组织广泛群众的罢工，而不需要实际的组织上技术上的准备，不需要特别加紧工人的武装组织与训练，这也是同样的机会主义。

因此，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武装暴动的目的来布置全国的工作，这确是全党在今天的总任务。

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

在准备武装暴动中，最中心的政治口号便是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最近全国军阀战争的形势已经完全证明了我们过去估计的正确。若要问最近军阀战争的前途如何？我们可以直接回答，一定是双方俱倒，革命胜利。任何人都可以懂得，现时中国已经决没有任何一个军阀可以将全中国完全统一起来。军阀战争延长了这样长久的时间，全国政治经济之大破产，使广大群众，求生无路，群众不但必然要起来反对军阀战争，并且已经起来了。城市的罢工浪潮的高涨，农村中广大的暴动，红军的猛烈发展，特别是军阀军队的激剧动摇，证明中国广大群众已经是非常坚决的反对军阀战争。很显然的，现

在只要有一个伟大的力量，他能坚决号召反对军阀战争，能勇敢的做反对军阀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则无疑的，广大群众一定会汹涌的起来拥护他。这里，首先是要求我们有真正的起来反对军阀战争的决心，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前进，一定可以取得全国最广大群众的拥护。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坚决的反对季罗维也夫及加米列夫关于武装暴动的动摇。季罗维也夫与加米列夫在当时坚决的反对暴动，以为布尔塞维克取得政权，不能得着其他政党的帮助，一定没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列宁坚决反对这种意见。列宁说，无疑的，只要布尔塞维克取得了政权，一定可以得着广大群众之热烈的拥护。特别是在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战争的口号之下，无产阶级首先可以夺取广大农民士兵的同情。在今天中国的情形看来，正与列宁所说的一样，无产阶级政党若能真正坚决的起来号召反对军阀战争，领导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则我们无疑的必然得着广大中国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拥护，建立与巩固中国的苏维埃政府，并且，不仅是我们领导了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一定可以得着广大劳苦群众的拥护，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的认识到，我们党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可能，有了这样伟大的力量。我们不仅在客观任务上应该起来反对军阀战争，并且在主观的能力上，我们有力量可以消灭军阀战争，固然，我们党在组织上还没有团结广大的工人群众，赤色工会的组织还不强大，但在政治上我们党的确已经得到中国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拥护，共产党是中国工人群众之唯一相信的领导政党，数千万的农民群众，现在已经公开的在政治上与组织上都信仰我们党的领导，作决死战争。三十万以上的红军，完全在党的直接指导之下，广大中国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都无疑的接受了我们党的政治口号。因此，我们党不仅是在客观任务上需要反对军阀战争，并且是现在中国之唯一的有力量的政党，可以领导消灭军阀战争的斗争。问题仅只在这里，就是看中国共产党是否能认清这一形势，是否真正的有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决心，中央政治局是认清这一形势的，是有了这一最大的决心的，就在这一点上，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的同志，举行全党的总动员，准备着这一伟大事变的迅速到来，坚决领导全国消灭军阀战争的革命战争。

丙 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一 更迫切的准备武汉暴动的任务

在六月十一日的政治决议案中，已经指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般的策略原则，自然在这里不必来重复的说明。在今天的形势看来，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中所指明的一切，都已经得了完全正确的证明。特别是，在执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总任务中，应当争取武汉附近省区之首先胜利，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成了非常可能与非常迫切的任务。长沙的占领，广大红军绕围武汉的发展，统治阶级之不可终日的形势，使着帝国主义的机关报已经公开承认：“武汉入共党之手，只是时间问题。”帝国主义机关报自然不会帮助共产党宣传，因为事实的真象确是如此。现在武汉的形势是非常显明的，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之严重的白色恐怖，另一方面，罢工仍然是不断的爆发。广大的工人群众，都积极的要求武装暴动。农民暴动与红军都逼近了武汉。敌人的士兵群众，甚至蒋介石在前线的基本部队都倾向我们，找寻我们的领导，这一现象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特点。在西欧其他各国中，假使没有工人的大罢工，兵士群众是很难革命化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则不然，到处的士兵，都自动的经过各方面的关系找共产党，要求领导他们兵变或暴动。许多自发

的兵变，揭起红旗子，借此找寻共产党的领导。在我们党各级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中，时常遇着许多这样的事实。这不是偶然的。这个现象的来源，是因为长期的军阀战争，使广大士兵群众在军阀长官的驱逐之下，成千成万的死亡，绝不能换取任何精神上物质上的安慰。另一方面，土地革命的深入，在广大士兵群众中有非常伟大的影响，已经使士兵群众整个的动摇起来。士兵是失业的农民，他看见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土地革命，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才使他们迅速的革命化。特别注意的，我们不能将兵士革命化与工人革命斗争分开，因为兵士革命化的原因是因为整个革命势力的发展，而整个革命的发展，完全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之下，特别是整个革命发展中，红军的发展红军之不断的胜利，更是直接影响到军阀军队的动摇，现在已经有十万以上的红军，正在非常迅速的向武汉进攻。假使在适当的配合中，我们有极大的可能，举行武汉的武装暴动，以与红军汇合起来夺取武汉。现在客观形势是已经成熟了，我们的中心任务就在加重斗争的配合，努力组织武汉工人的政治罢工与武装暴动。

二 红军进攻与无产阶级的领导

有少数同志对于红军之积极向武汉进攻，是非常怀疑的。他们以为武汉现在还没有工人斗争的高潮，若以红军的力量向武汉进攻，这似乎是以农民领导了工人，又似乎是军事投机，由此便对党在目前之总策略路线发生怀疑。这样的怀疑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完全了解，如若没有工人群众的武装暴动，单纯红军是决不能夺取武汉的，因此，党在目前之最基本最严重的工作，是要加重在武汉工人中的政治宣传与鼓动，扩大他们的组织，发动政治罢工，准备武装暴动，党绝没有单纯以红军进攻的观念，并且坚决反对单纯以红军进攻的观念。但同时，党一样坚决反对另一种观念，以为“夺取武汉仅只能组织武汉工人暴动，在武汉工人还未暴动之前，红军便不应向武汉进攻”。这完全是一种书呆子的见解。单纯用红军的力量，不去组织工人群众的政治罢工与武装暴动，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但只知道工人武装暴动，而不知道运用现在的红军，这一样的会成为严重的断送革命的罪恶。我们要夺取武汉，必然特别注意各种革命势力的汇合，一方面要加紧武汉的武装暴动的准备，特别是组织武汉工人的政治同盟罢工，同时，必须积极的领导红军向武汉进攻。如果红军更加逼近武汉，统治阶级更加失败动摇，这便是武汉暴动的更成熟的条件，无疑的我们可以领导武汉工人暴动起来，而取得完全的胜利。红军是一种革命的力量，放弃或轻视这一种革命力量，当然是革命的严重损失。第五军进攻长沙的时候，红军不过三四千人，何健的兵却有七团以上，但红军与何健部队接触的时候，何健部队都水一样的向红军投降。我们在长沙工人中的工作特别弱小，可是在何健军队日益失败的时候，长沙工人便在城内暴动起来，使何健军队更迅速的动摇而完全失败。现在红军进攻武汉的时候，又安知道不会遇着这样的形势？假使是可能的——的确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领导红军进攻武汉呢！让红军在远远的等候武汉工人暴动，恐怕只有书呆子会这样想。红军的发展，他与城市的工人斗争不可分离，党在坚决的准备武汉工人的武装暴动的时候，便同时应当指挥红军向武汉进攻。

三 坚决的反帝国主义的战争

武汉的首先胜利，必然紧接着便是残酷的国内战争，以至国际战争。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案便指明了这一点。斗争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

假使我们夺取了象武汉这样的城市，帝国主义者一定组织国民党各派军阀，联合起来以向革命势力进攻，这必然是国内战争更残酷的形势。不仅如此，帝国主义必然自己出来，直接以武力炮舰压迫革命。龙州，大冶，岳州，长沙的经验都告诉了我们，使我们可以断定，在夺取武汉以后，马上便要到来的便是更残酷的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战争。若我们企图以外交手腕来避免与帝国主义的冲突，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帝国主义是很敏明的，他知道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将要致他的死命，如果不是在他已经无力摧毁的时候，绝不会允许苏维埃政府存在，尤其不会与苏维埃政府进行和平的外交的。中国是殖民地的国家，反帝国主义是其最基本的任务，中国苏维埃革命，苏维埃政府只有在坚决反帝的斗争中才能生长起来，才能巩固起来。对于这一点，必要有很明了的认识，然后才能很坚决的发动全国之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正因为如此，所以武汉的胜利，绝不能只依靠于武汉附近省区的革命势力，而必要有全国的配合。不仅要工人的暴动，而且需要农民，士兵，红军及各种革命群众力量的配合。不但如此，因为武汉胜利要紧接着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战争，所以更必须特别加紧在国际无产阶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以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

因此，我们现在的工作布置，必需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加紧。要准备天津，武汉，上海，广州及各产业中心的政治罢工，要准备各省重要城市的暴动，要组织全国铁路海员的反对军阀战争的总罢工，要组织前线上以及后方之重要军事政治中心的兵士暴动，要配合着全国红军以向大产业中心集中发展等等，这些都是全国范围内的工作。一定要有全国的总动员，然后才能有夺取武汉的胜利。

同时，中国党必须加紧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宣传与鼓动，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起来援助中国革命。无疑的，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残酷战争，一定会发展成为全世界之最后的阶级决战。这不是我们主观上愿意如此，

而是客观形势上所决定的必然的结果。很显然的，当中国苏维埃成立之后，帝国主义绝不仅是压迫中国革命，同时一定会更加紧对于苏联的进攻。帝国主义知道苏联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当他进攻中国革命的时候，决不会放松进攻苏联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及进攻苏联的事，一定是同时并进的。在进攻苏联的战争发动以后，这便是全世界之最后的阶级决战到了。所以在中国革命爆发以后，将要转变成为国际战争，在这时候，必然要有全世界革命的大爆发，才能根本消灭帝国主义。

四兵士暴动问题

还有一个为一般同志们所怀疑的问题，这就是兵士暴动的问题。有些同志以为革命的武装暴动，一定要以工人群众为他的基本力量，假使

单只是兵士是不能暴动的。一般的说来，这个观点有一部分理由，因为若是没有广大的工人群众做革命的基本力量，则兵士是不会革命化的。可是我们必需注意，在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特点之下，虽然当工人群众之

广大政治罢工还未实现的时候，但兵士群众已经积极的普遍了武装暴动的要求。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认识军阀战争所给与广大士兵群众之直接痛苦，土地革命与红军发展所给与士兵群众之伟大的政治影响。这些都无疑的是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之下。

现在全国还没有工人暴动的时候，已经在许多地方发生了兵士暴动。即

使在将来之各处大城市中，也许会有在工人暴动之前，首先是士兵暴动做导火线，这个现象是不能避免的。假使有人由这样的事实做出结论，以为这表示兵士领导了工人，这便仍然是书呆子的见解。因为兵士暴动，是目前整个革命斗争激剧发展下面的产物，绝不是离开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的。兵士暴动之正确的出路，一定是组织苏维埃政府与执行无产阶级的政纲，这就是说，他一定要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之下，不然是不会取得胜利。

破坏统治阶级的军队，夺取反动军队中的士兵群众，这是每一个革命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政治任务，特别是在中国这一种军阀制度的国家中。并且，目前中国革命中之一个主要的动员群众的口号，就是反对军阀战争。而反军阀战争之最有力量直接行动，这是兵士暴动。因此，兵士暴动不仅是士兵群众的需要，而且是全国广大劳苦群众的迫切要求，无疑的可以得到极广泛群众的拥护，可以引起革命斗争的大爆发。

五怎样组织工人群众？

最后，还有一个为少数同志所不能了解的，就是以为“现在客观的形势虽然很便利于革命的发展，但我们党的主观的力量还很薄弱，赤色工会很少，因此，我们还不能拿准备武装暴动来动员群众，而是要很艰苦的做每一厂每一厂中的工作”。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首先在现在状况之下，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忽视了我们党主观力量之伟大，我们党在政治上已经无疑的取得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我们对于夺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这一口号，主要的一定要政治上了解，绝不能很机械的，以为赤色工会的会员占了百分之五十一的时候，才算是夺取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即使在资本主义很发展的国家中，譬如西欧各国，任何国家的赤色工会——甚至连黄色工会一齐，都不能占全国工人群众的大多数。当然在中国更是不能。现世界上只有苏联的工人有少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在工会的组织之中，在中国一定也只有革命成功以后，赤色工会才能在组织上取得工人群众的大多数。至于在政治方面，广大的工人群众——无论是先进的或是落后的——确已接受了我们的政治口号，许多自发的罢工，都揭出了党的政治口号，都坚决的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工人群众都自动的经过各种关系找取我们党的领导。这证明广大的工人群众，接受了党的政治影响。

自然，我们应当非常严重的注意组织工作，我们一定要在每一工厂每一作坊中建立坚固的组织，因为仅只有政治上的影响是非常不够的。没有坚固的组织基础，政治影响决不会巩固，决不会成为群众的革命行动。但是，问题只在这里：我们用什么口号去组织工人群众？用什么口号来扩大党之无产阶级的基础？假使我们只用经济的口号，这是绝不可能的了。事实是这样，中国阶级斗争特殊的尖锐化，工人群众每个经济斗争都遇着国民党的残酷的压迫与屠杀。广大工人群众完全知道没有坚决的反国民党的斗争决难有经济斗争的胜利，这就是造成了工人群众武装暴动的迫切要求。假使我们现在不用准备武装暴动的口号，将使广大工人群众失望消极而离开我们。准备武装暴动已经是广大的工人群众的迫切要求，只有在这个口号之下，才能动员广大工人群众，才能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扩大我们党内之无产阶级的基础。我们是要到每一工厂每一作坊中加紧组织工作，但我们必定要以准备武装暴动做组织群众的主要口号。

从总的政治上以至策略上，都说明了我们党现在已经不是在一个经[非]常工作的时期。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历史上之大转变的前夜，到了中国革命之

最紧张的关头。我们必要使全党的同志都认清目前这一政治形势，认清党的任务的重大，将全党同志都动员起来，在一致的斗争的精神之下，领导伟大的中国革命。

附：

中央临时政治局继续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及全国工作布置

(一九三一年八月三日)

柏山：对于全国的政治形势及工作的布置，我发表我的简要意见。

客观的一切事实，都证明党的路线之正确。中央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的坚决发出，在最近一切客观革命形势的发展，说明中央路线的正确与这一决议案发出的必要，否则党就成为尾巴的尾巴。现在的中心问题，已不是在这里，中心的问题，是在目前形势更加严重，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是极严重的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严重问题，党对于这一历史上的伟大问题，必须在各方准备上都应有极严重注意，不能有丝毫的忽视，这绝不是儿戏的问题，因为丝毫的疏忽，可使整个革命失败。中央坚决的决定积极准备武汉暴动、南京暴动无疑的是异常正确的，但是必须极严重的来注意如何准备这一暴动。

今天的讨论，因此必须注意下面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全国工作配合，是目前非常严重的问题。现在全国工作的配合非常不够，特别在南方与北方。在南方北方的工作，他们还没有积极的准备，他们在工作上，还是开慢车的表现，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假使武汉暴动与南京暴动胜利，蒋介石的倒台和崩溃，这是毫无问题的。问题是在帝国主义组织南方北方的军阀的进攻。武汉暴动与南京暴动的胜利，北方的冯玉祥，必以全力来冲武汉，阎锡山必以全力由津浦路攻南京，同时在“讨共”的口号之下，他们都可以取得地主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势力的拥护。如果我们在北方没有北京、天津、唐山、郑州、开封等重要中心城市的暴动的发动，必然遇到极严重的难关。这并不是说广大群众的广泛兴起，以及一切革命的武装力量，不能与之作拼死的决战，而是说必然遇到极艰苦与用非常大的力量与之作残酷的斗争，才能消灭其反动的力量，将要多牺牲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生命。因此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之后，在北方必须有在北京、天津、唐山、郑州、开封积极组织武装暴动，特别要普遍的组织兵暴。

在中央军委开始讨论军事的战略，本来决定在武汉暴动后，军事发展的计划，是集中力量向东方进攻，但昨日现江钧、同志讨论，感觉到是错了，决定改变向北方进攻，如果三四军下南昌后，则集中力量由武汉向北方猛冲，使冯玉祥的势力倒台，再由陇海向东进攻。因为在当时尚未能估计到东方工作发展这样的迅速，南方暴动的条件成熟的这样快，如无南京暴动，自然应向东进攻，但有南京暴动，则主要的敌人只是在北方，是要在消灭北方的军阀，所以武汉暴动后，决以六军力量，向北进攻配合郑州、开封的暴动以消灭冯的力量，同时在北京、天津等处组织暴动以消灭阎的力量。在北方的客观形势，群众的情绪与斗争形势，组织暴动并不是不可能，而且绝对与南方形势一样。因此北方必须以大规模的工作布置，大规模的发展罢工，特别是铁路罢工，唐山、北京、天津罢工，准备武装暴动，但还不够，必须用极大的力量做士兵运动。这绝不是依赖或专门注意士兵工作。我们必须了解如果不加紧工人运动，而仅做士兵运动，固然是错，但如仅做工人运动而不注意士兵工作，同样的是错误。尤其在现在。北方到士兵中去工作，是很

第一，当然是工人运动。特别是市政工人与造船厂工人。

第二，外国士兵中的工作，应用极大的工作力量与极耐心而艰苦的工作，才能使工作做起。我们必须有决心，就是遇到不断的牺牲，我们还是继续不断的再接再厉的工作，在这样政治影响之下，即使没有将他组织起来，但可以打破外国士兵的民族观念而使他引起阶级的觉悟。这一工作，固然是艰苦，但亦不是不可能做起来的。上海的法国士兵中，没有多少的时期，在其中亦组织了数十人，而且发动了斗争，便是明显的例证。

香港的外兵中，印度兵的工作是必须做起来的。这是在外兵中工作的必要而且比较易做的。

香港工人工作，自然特别重要，但无外兵工作的建立，暴动的前途，仍是极困难的。

香港工作与广州工作，在今天我们不能看做是并列的。必然须先派人去广州工作，但这里并不是阶段论而是在工作实际中必须如此，丝毫没有阶段论的意义。

这是南方局应注意的工作原则。

第三，满洲工作的配合。

满洲的暴动，这是国际战争的序幕。因为满洲是日帝国主义的统治，不仅是与张学良的肉搏，尤其在日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斗争，同时，日帝国主义将因此很剧激向苏联进攻。这一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苏维埃政权建立的严重意义在南京说，依 同志目前计算，以为我们在南京照现在的力量，可以固守一个月，这一个月南京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影响，是有极伟大的意义。我们无疑的可以在这一个月中发动全国几千万几万万群众起来拥护南京苏维埃，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决胜负。

中生同志在南方工作观念上的弱点，就是不愿固守南方，他以为在军事上应取进攻，如保守就是死灭。他仅机械了解了马克思的话，而不了解苏维埃政权在南京多持一天，便对中国的革命有更严重的意义。因为进攻是靠全国的进攻，而不是单靠南京的进攻。因此，我特别指出他的观念是断送革命的观念。

满洲的形势，暴动的起来，必然引起国际的战争。切实说，我们的战略，也必须掀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决战，这一点，某些同志批评这是与国际的路线不同，但我始终以为这正是国际的路线，并没有错误的。

长沙事件，帝国主义国家，不知打了多少的电报，给他的中国代表，但国际一直到了现在，还没有一个字给在中国的代表，这是国际太轻视了这一事变，并且是对中国革命估量的不足。

掀动国际的阶级决战，不仅是我们的战略，而且这完全是客观形势的必然。我们必须如此准备。

满洲暴动的起来，日帝国主义必很迅速的向苏联进攻，这一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因此，东三省必须坚决的在哈尔滨、大连、抚顺组织暴动，这一任务是极艰苦的，他不仅在张学良势力下举行暴动，同时要在日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下来举行的。

东三省的任务：

1. 在哈尔滨，大连，抚顺积极布置工作准备暴动。
2. 在铁路上用极大力量作罢工运动。东三省是铁路网的省份，铁路工作

是特别重要的。

3. 士兵运动，我们在张学良部队中一点工作也没有，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因此更应加紧士兵运动。

4.第四，说到西方的工作。如果东三省的胜利或许受到一时的挫折，那么西方工作是极严重的。应注意陕西、甘肃、新疆的工作，以与苏联打通关系。党必须注意西方工作，虽无线索，亦应设法建立工作。军委已注意西方工作，所以决定凡是甘肃等省的同志，都派回本省工作。第五，.....

这是全国工作的配合问题。

再说到国际工作问题，这一问题在今天已经是很逼切的议事日程。这必须求得国际的了解。如果我们不能求得国际的迅速了解，这是我们的错误，这须对革命负责。

国际在目前形势，我想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才有办法。首先是苏联，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固然苏联在过去是如此准备，但现在是已经迫在眼目前，应在眼目前来准备。

我因对国际问题了解还浅薄，对于各国工作应如何，我不能多说，但国际应以“保护中国革命”口号来积极动员各国支部是很必要的。我党国际必须迅速采取进攻的路线，这绝不是托洛茨基主义。五年建设的计划等，在这进攻路线下，可以得到更快的成功，否则，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掀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后的阶级决战。这一问题，非常严重，丝毫不能延缓。中国党应负起责任，求得国际了解，向国际建议，是非常必要而迫切。

现在因国际的不了解，远东局已打电报去，但是不够的，必须再去电，我觉得过一时期，应派一同志到国际去。如国际不同意，党亦必须根据实际与国际力争。我们现在必须勇敢的向国际建议。

我对于全国工作的意见是如此。以下说许多具体问题：

党在这伟大历史使命中，的确感觉到在实际工作中力量的薄弱，但党必须坚决而艰苦的负起这严重使命。我同意前次的：

1. 立即成立中央总行委，
2. 即成立南方局、北方局，
3. 设法加强满洲工作，
4. 加强西北工作，

此外还有全国苏维埃问题，临时政府问题，一切法令问题，都须有讨论，再交总行委去执行，今天必须讨论到，办法如何，待原则大家一致同意后，再讨论。

裕成：第一，我对柏山同志意见完全同意。柏山同志的意见，完全根据中央一贯的路线下来的，所以我整个同意，而且非如此不可，否则，绝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的任务。

第二，全国工作布置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武汉暴动起来，全国工作配合的如何，是决定中国革命的问题。在柏山同志提出南方北方边界的工作配合意见，我完全同意。现在第一中心问题，在武汉暴动后，全国形势的如何变动，是值得今天注意讨论的。武汉暴动起来，蒋的势力必然消灭，冯阎的形势，必如柏山同志所指出的情形。全国反动政府，必建立在北方，如果能在北方起来暴动消灭北方政府，这是革命胜利的保障。因此北方形势是极严重的。改组派在扩大会上讨论，他们首先讨论的问题，是反共的讨论，所

以北方工作的任务，是应特别注意的。

北方的客观形势，决不是例外，无论在工农兵的那一方面，都与全国一样，因此北方工作的任务，对于组织暴动，同样是极中心的工作。这一工作，特别重要的是北京、天津，因为这是反动的中心。加紧布置铁路士兵农民中的工作，使广大暴动起来，以消灭敌人的势力。在北方工作，必须在这一形势下原则上布置工作。

向着北京进攻，是很重要的决定，过去我确时[实]不知还是向南还是向北发展的问題，没有一确定的意见，今天确定了这一问題，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保南的红军，必须向着北京进攻发展，以配合全国工作。

第三，在北方的蒙古问題，是很重要的问題。武汉暴动起来，冯阎必集中到津浦京汉铁路出兵向南。内外蒙必须出兵，以进击敌人力量，这在工作配合上是很重要的。

中国与蒙古党尚没有关系，我觉得远东局必须使蒙古的党与中国发生兄弟党的关系。

在东三省的暴动起来，日帝国主义必须起来进攻，因此苏联必须有军事行动的准备。

第四，几条铁路工作，无论在南方北方的工作，铁路是极重要工作，必须组织两条路的总罢工，这是给军阀的致命伤。

北方局必须注意这几个原则，才能与南方工作的配合。

最后，恩来同志回来，必有一次更激烈的论战和斗争，我们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政治问题解决后，恩来同志可去北方局负责。我党中央总行委必须注意到这一问題，因为北方局太弱，是影响到工作的。固然北方不能与南方工作对立，但我们决不能忽视北方局工作的严重。

光生：第一，现在的形势，已到了历史上的伟大事变的前夜，所以中央的正确路线，必须坚决的执行，否则，是对政治上的罪恶。因此，对柏山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

在军阀到了最后崩溃的形势下，党如不能担负起消灭军阀战争而坚决的领导暴动，党决不能担负历史上给予的使命。

长沙事件，更加速武汉暴动的速度，在这形势下，不仅说南京苏维埃政权多存在一天，是进攻路线，即长沙的苏维埃的存在一天（当然长沙不应是保守的），同样的是极大的政治意义，如果不然，而与景德镇现象一样，则不仅是革命的损失，而且是不可宽恕的耻辱。

广东自中央六月十一日的政治决议到后，才认识政治形势的严重，但认识还是不充分的，所以工作上的执行，是跟不上客观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不能与武汉胜利工作的配合。为整个工作的布置，南方局的成立，是非常重要的。布置广州暴动，是极严重的任务。在广州暴动中推翻统治阶级并不是困难的事。改组派企图联合张桂军以消灭武汉的胜利，这不仅改组派是如此，而且帝国主义必要他如此。所以广州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保障武汉胜利，争取全国胜利，是非常重要的。

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较之北方为更明显，党的路线的坚决执行，丝毫没有疑义的。

第二，帝国主义问題。这一问題，在南方不仅安南的工作重要，而且南洋的工作，同样是极严重的关键，因为新加坡的军港，是很重要的问題，因此应使国际充分注意南洋的工作。尤其在香港暴动，南洋更是严重的关键。

此外，中央对恩来的斗争，必须是很坚决的但必能以实际问题，战胜其不正确的观念。这种不同路线，在目前形势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很快的解决，就是同样可使革命更快的发展。

南方局我与炳辉去，力量仍是很弱的，中央应注意南方局的加强。

特生：第一，今天的讨论，有极严重的意义，并且有世界的意义。

柏山同志发表的意见，在原则上我完全同意。

在今天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国际的路线，并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这决不是表功，而是事实。中国党在这两年中的工作，党工作的艰苦，完全是不能否认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第二，此次国际的来电，在第一次的讨论以及与远东局的讨论，证明国际的错误。恩来同志尤其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的责任。

据中夏、余飞同志的报告及恩来自己的通讯，都说他在国际做了三天的报告。他的报告最大的缺点，必然是1.没有将中国革命速度说明，2.没有将中国群众运动在经济基础上说明。这是恩来要负责的。昨天与远东局讨论，关于贫民运动问题，远东局同志，虽提出贫民斗争，但仅是闹荒问题，但中央则指出其实质。固然讨论贫民运动，恩来不在国内，但在阶级斗争趋势上应该了解的，我们过去没有抓紧恩来一切问题，这是我们的疏忽。

中国资产阶级绝不能在帝国主义控制下而有发展前途，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力量，我们是不能丝毫忽视，这里我绝不是说不要去组织工人群众了，而是说应十百倍的加紧工作。中国革命的领导，只有无产阶级，绝没有其他的领导，这在中国经济上政治上都可说明，而必然如此的。南京铁路工人对经济要求，表现远不如政治斗争的迫切，这完全含有列宁主义的真理。这是国际所不知道的。因此亦不能了解群众的实际要求。这是由于恩来没有说明，因此国际有此来电。如果中央机械的忠实的执行国际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就是说不能领导群众，而作敌人的奴隶，如就远东局的意见说，那末我们应下令彭德怀退出长沙了。党的策略，决不是如此，而是根据客观形势，坚决的采取进攻策略。现在的形势，军阀的崩溃，已是到了可以时日计算，我们绝不能放松客观形势，否则，是革命的罪人。

我不信军阀在目前形势倒台以后，还有恢复的可能。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在他死灭时期，根本掘其坟墓，如果我们已看见伟大事变，不抓紧使他发展，反使他停顿，这很明显的是罪恶。恩来不了解这一问题，确应对革命负责。

远东局同志，一样是如此，在一年来，没有在国际的决议上活泼的运用以指导中国党，而只是机械的执行。昨日的讨论，虽然有转变，但非常不够。中央六月十一日的决议，如不坚决的发出，则这问题更严重到万分，必至落后到不堪，十足的走到机会主义路上去。机会主义就是不能抓紧革命的转变。

我们绝不否认远东局对中国党的帮助，但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反发生了多的障碍。因此我们坚决的要请求国际改组远东局，而且要站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来解决这问题。远东局同志不在实际上去求得了解中国问题，反在反动报纸上去搜集材料作根据，他完全不了解中国报纸与西欧的不同。

第三，工作布置问题。

我完全同意柏山同志的意见。（下略）

注释

指革命冒险主义思潮。
此件入选此书有删节。

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的信

——供给中央经费问题、二军团产生及现状、派干部给鄂西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

中央：

自五月间唐亮同志来到以后，我们知道中央经济困难，当时因赤区清乡的严厉，红军的经济无出路，时须我们供给，因此只筹得五千元先解交你们。又经过短时期筹得七千元交唐亮同志带来。唐同志于七月十五日动身，到沙市时因敌人的戒严与技术问题在沙被捕，坐了十余天牢，于八月四号又转到赤区，经济损失一空。详情可问唐同志，我们亦不知底蕴。现赤区经济困难万分，红军全由此间供给，因之一时无法筹解交，唐同志急于要返，此后自当设法筹措。

此外有几件重要事件，我们虽已报告省委，但随唐同志之便，必须报告中央：

1. 二、六军已于七月间在公安会师，组织了二军团前委，编制改军、师、团、营、连。现在六军枪枝三千左右，二军枪枝二千左右，两军共五千左右（赤队已改编），人数万余。但现在前委本身右倾，当会师时，全鄂西反动统治动摇非常，尤其是沙市市面恐慌已极，市民恐涉于战匪而跑兵，当时驻军仅一师，一师人而不够。红军声势浩大，群众斗争异常高涨，我们即提出意见进占荆沙，但他们以声东击西的办法而攻监利，结果失败，到此时失败情绪笼罩起来。提出解决小的敌人恢复士气的口号，复游击潜、天一带，攻下潜城、岳口，经江陵返洪湖。据他们的来信，暂到那里练兵一星期后，再看环境决定行动。我们屡次督促进攻荆沙均不见回信，尤其是鄂西驻军全部调走，沙市仅李云龙两团人。我们现在又派人坚决督促进攻沙市，长江局办事处克明同志亦同去，结果尚不得知。同时前委对党的工作一般的忽视，每次会议的议事日程上仅是军事行动，据说内部有很多问题，因贺云青同志的关系束手。这些问题都必须中央特别注意，可以说中央的路线集中、进攻，前委只集中而不进攻。红军内的详情可问唐同志。

2. 红军军政学校现成立了三大队，学生有几百，然而没有官长，校长德清同志已到前委工作，政委、教育长[及]迫击炮、骑兵等科完全无人，这类人材，我们完全无法供给。军校工作非常重要，中央无论如何要想办法，不然军校一定成坍台形势。

3. 现在鄂西妇运无人，李灿英同志（郭亮同志老婆）在沪没什么重要工作，同时前次曾与逸群同志谈话愿来鄂西工作。我们已向省委要求转中央派他来鄂西工作，特向中央要求，请无论如何派来此地工作。祝

布尔什维克的礼！

鄂西特委

八月十日于江陵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

中央给长江局的信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

鄂委转长江局：

革命发展形势的突飞猛进，更加速武汉暴动的成熟条件，但据扬生同志的报告，说武汉仅有同志四十人，这一报告，虽不一定正确，但党的主观力量的薄弱，确在武汉目前准备武装暴动争取首先胜利的极严重问题。你们必须切实的动员全党，极猛烈的扩大组织，大批的吸收工人积极分子入党，至少每个党员每日须介绍一个同志，同时每人须组织一队赤色先锋队，加紧工人群众中组织，特别加紧京汉粤汉两条铁路罢工，海员罢工工作，以加强党的力量。同时须立即向赤色区域调大批干部到武汉工作，以迅速扩大党的工作。

长沙事件，你们没有迅速坚决的指导采取积极进攻，消灭何键力量，向武汉发展，反采取防御政策，固守长沙，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因此使何键还可能集合各方残余势力作最后的反攻，这不仅是军事上的失策，而且是政治上极大的损失。据报常德又被我们占领，九江亦在垂危，南昌更为易得，这在客观上更促进武汉暴动之更快实现，在这形势下五军仍须积极反攻长沙，猛烈的扑灭何键，采取进攻策略，迅占岳州，向武汉进迫。二、六军亦须向武汉进攻，在必要时，即使未下沙宜，亦应超沙宜攻汉阳，一军更应切断京汉线，进攻武汉，三四军如下南昌占九江，则应与八军取联络，返武汉，以使在红军的进攻下取得与工人力量的汇合，在敌人忙于应战时，武汉举行伟大的暴动，以夺取武汉。但这一工作，在红军采取集中进攻下，必须加紧组织的猛烈发展，工人运动的十倍努力扩大，邻省工作充分加紧的布置配合，才更能实现暴动胜利的保障。

蒋介石有搬走兵工厂的机器消息，究竟搬了什么机件走？以及实际情形如何？望调查报告中央。

湖北全省工作情形如何，特别是武汉，以及与邻省的工作配合与具体布置，望即做一报告来，特别关于武汉组织的情形。

长江局成立，已近半月，以后中央交通，只与长江局发生直接关系，与各省关系，均须由长江局负责，你们与各省的关系如何？以及何时与长江局发生直接交通关系？望速复。

江西方面，长江局必须注意派人去特别要赣东北积极猛烈的组织湖口暴动，彭泽暴动，占领马当，以切断长江交通。同时向赤色区域调大批干部到九江南昌工作，以建立下层群众中的工作。如南昌下后，全国革命委员会，应在南昌建立，并可暂由毛泽东任主席。

大汉等到否？望复。

长江局经费，除自给外，须速设法大批汇解到中央来，至要！

中央

江钧给中央报告

——我军向武汉、长沙进军与敌军情况，加紧准备武汉暴动问题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中央：

昨日晚据何键密报，何应钦言浏阳群众帮助红军，无法可御，只得退守。另何键致四路军驻汉办事处电言，戴斗垣被红军俘虏三营人不知下落，今早据外国报载何键于戴斗垣军于二十五日晚在湘赣边界温家集被红军打败失踪。军队瓦解，于是何键本人退出浏阳，现在何军在焦溪岭、永安市、春华山，设几道防线，何键被本人驻朗犁市、长沙，混乱万分，居民纷纷逃往汉口，日本居民将回长沙，现双又全体避入军舰，泊在水陆洲。据此情形红军进取长沙已是旦夕，又据载红军第一军第一师仍在花园小河溪一带，人数有数万，枪有一万余支，敌军戴民权被红军击败。现已退守孝感，在这种紧张形势之下，党的策略应有更具体决定特别武汉武装暴动的组织及各种配合。目前二、六军在这种情形之下，必须以动向武汉急进。在战术上讲三四五八军如立即夺取长沙时，二、六军应分一部兵力渡江到岳洲来截断武长路，阻击武汉去军。同时常德红军应立即向长沙进攻，与八五军会合，迅速将何键势力消灭，即转向武汉进攻，三、四军仍是即转攻九江、南昌。但二、六军仍向武汉，同时在鄂西巴归兴等县游击军及部分红军并号召广大群众来夺取宜昌，应将石首、公安、监利、沔阳、潜江等赤卫队（据报告将廿万）正式编成红军，以大部分去占领荆沙；另一部与二、六军汇合向武汉进攻。这样可以减少西顾。使二、六军主军[力]向武汉猛攻。第一军第一师即刻改编成军，坚决来消灭京汉线敌人，向武汉迫进。鄂西第九军速将各纵队猛烈扩集中起来，迅速与广大群众完成襄、樊、随、枣等地方暴动。将危石生消灭，出应城到京汉线，与第一军联系起来，第一军第二师应由鄂东回师，河南占领信阳与前线士兵暴动联系起来。黄梅第十五军及广蕲赤卫队迅将田家镇占领、截断长江并与三、四军相遥应，迅速占领九江，鄂东阳新、大冶，五、八军留守部分与赤卫队正式编成一独立师占领大冶向武汉进逼。另将鄂城与武昌豹子懈之赤卫队正式成立一独立师向武昌城进逼。汉川与蔡甸之游击队及红军，成立一独立师向武江、汉阳进攻。红军的战略应有如此转变，迅速与工人汇合，取得武汉暴动胜利。……（略）

中共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

(一九三 年九月)

(一) 凡有土地自己不耕种，也不雇人耕种，而只出佃，坐收租谷者为地主。凡自耕农土地有余，而兼雇人耕种或以余田出租者，及佃农虽自己无土地、资本，租得大批土地，所收获超过需要，并雇人耕种者为富农。不论自耕农、佃农，土地仅足自给者为中农（中农原分二等，一种富裕的中农，一种非富裕的中农，富裕的中农，虽兼雇少数工人耕种，因其土地数量与其人口需要刚刚相符，故仍不失其为中农，不能因其稍有余裕，便认为富农，自然，富裕的中农，接近于富农，但不能与富农同等看待）。虽有小块土地，但不能维持生活，而兼做零工及其他副业方能维持生活者为贫农。完全没有土地而专被人雇佣耕种者为雇农。

(二) 党对农民的策略，应该是抓住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雇农是乡村中的无产阶级，贫农是半无产阶级，应是党在乡村中的基本群众。中农是乡村中的小资产阶级，应是党在乡村中的同盟者。富农是乡村中的资产阶级，自地主阶级消灭之后，富农成为主要的剥削阶级，是我们的敌对阶级，但现在仍为反对富农时期，而不是消灭富农这一阶级的时期。

(三) 没收土地的标准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对于富农的土地，只没收所余出佃坐收租谷的一部分，绝对不应侵犯中农的土地。

(四) 平分土地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但较革命进步的方法，党应坚决赞成之。平分土地决不能最后解决贫苦农民的痛苦，党须向群众指出要最后解决痛苦，只有社会主义。没收地主阶级及富农所余出佃的土地，主要的是平均分给失地及少地的农民，中农土地不动，甚至土地如果有余时，还可分给非富裕的中农一点，富裕的中农亦须尽可能的不侵犯其利益。如果在中农很少的地方，失地及少地的农民群众要求将一切土地平时，党可以赞成之。

(五) 雇农可以分给土地，所谓“流氓”、“地痞”亦可分给土地，红军家属更应分给土地。总之，凡在苏维埃区域内之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不论男女老幼，有分得土地的权利。

(六) 废除租佃制度，但不禁止雇佣耕种。

(六) 分配土地，党主张以人口为标准，但有耕种能力之男女可得全份（红军虽在外，应以有耕种能力看待），否则可得半份，决不能完全以耕种能力及生产工具为标准。以生产工具为标准，完全是富农的利益，以耕种能力为标准，亦失其平，这样则无耕种能力的废残孤寡只有饿死（苏维埃政府此时不宜有抚恤废残孤寡等等机关的企图）。无耕种能力者分得土地，如不禁止雇佣耕种及不禁止土地买卖，则土地自无荒废之虑。如果平分土地，以耕种能力为标准，确为大多数群众所拥护时，党可赞成之，但须指出其不当。“土地国有”此时只是宣传口号，还不是实行口号，所以上地禁止买卖。苏维埃政府对于共同耕种，如果是群众自动的尝试，应尽可能的帮助之，但苏维埃政府自己，此时应避免苏维埃农庄的企图，如果是得群众的要求与拥护，可以试办，但系例外，自然这不能妨碍关于苏维埃农庄与集体农庄之宣传。

(八) 如果是群众的要求，土地可以数年、一年平均一次。

(九) 苏维埃须尽可能设立公共农具场，以购制及没收富农所余之农具充之，借给无农具的农民使用。

(十) 红军家属土地，可以雇佣耕种，苏维埃政府应该帮助之。

(十一) 富农为抵制雇农改良生活的适当要求而实行怠工，以土地交给苏维埃，以为 则 地，并令富农将全部农具交出，这不是没收富农土地，而是对于怠工者之适当的处罚。如果雇农对于中农有要求时，苏维埃政府无疑的应站在雇农方面，决不能因联合政策而牺牲阶级利益。

(十二) 现在就须开始作平分土地的广大宣传，特别须引起农村中基本群众（无地及少地的农民）的热烈拥护，使平分土地变成群众自己的要求与主张，而不是仅仅变成苏维埃命令主义的法令。关于平分土地的标准与方法，都须经过群众的讨论与通过，决不能只由苏维埃政府以法令强制规定及执行。苏维埃土地委员会现在就须加紧工作，在不引起群众怀疑及骚动之范围内，加紧人口调查与土地调查，制成精确统计。平分土地，无论如何，须于本年内实行，因秋收之后，正好实行。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邓中夏给长江局并转中央的报告

——第二军团军事行动及整顿内部问题，扩大湘鄂西苏区问题，湘鄂西特委组织问题

(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

长局并转中央：

前两次报告想已收到，兹继续报告于次：

(一) 第二军团军事行动问题

中夏到后，立调第二军团回来，六月二十日中夏赶到周家咀召集前委军事会议，全体接受中央所指示的路线（即渡江与一、三集团军配合行动之路线），但在未渡江以前，大家觉得有攻下监利再行渡江的必要。理由：（1）鄂西赤色区域不致因红军渡江完全抛弃。（2）攻下监利，可以立×（第二军团因二次进攻监利失败和进攻沙市去，无形中减低声威不小）可以声东击西，乘敌不备以渡江。（3）大家估计攻下监利只须三日，并可保障必胜，因此决定先攻监利再渡江。

二十二日拂晓进攻，当晚占领县城，二十三日肃清各处残敌，得见敌人报纸载一、三军团已经退往醴陵，因此渡江问题，不能不加以审慎，据白螺矶派去侦探回称，亦云一、三军团都已退去，但我们决定不管一、三军团是否退去，我们依然渡江，其任务与前不同，前在截断长武铁路并占领岳州，堵住武汉白军，好让一、三军团在湘境内覆灭所有在湘敌人，现时任务在于占领岳州，即长驱直捣长沙，以激起一、三军团之反攻。当将军队向东移动，一俟渡江船只准备妥贴以及侦查对岸地形，敌情的报告回来时即行渡江。正当地此，二十八日夜半慕汝鸣赶到，报告中央最近决定，二十九日当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随时可渡江，以与一、三军团配合行动之总原则下，暂时攻下新堤及收复沔阳，攻下新堤则我们渡江线可以扩张，并可相当解[决]经济问题。收复沔阳则可扩大及巩固赤色区域（北极会以沔阳为根据地，势极猖獗，北极会与北方之红枪会性质相同），俟新堤沔阳解决后再看形势。如果不须立时渡江或须移师向进攻沙市。

自然红军在鄂西一日，便须攻城略地，肃清一切反动武装，将各零星苏维埃区域联系成为整个苏维埃区域，这一点工作，以前确未成为鄂西党的政治观念，应须立即纠正。

(二) 第二军团内部问题

二、六两军自会师以后，叠受挫折，因此两军间不免彼此埋怨，特别是上层领袖意见很深，在进攻沙市无功以后，裂痕愈深，大有分家倾向（由二军分路游击可证），幸中夏即于此时赶到，将两军调集一处，特别是此次攻下监利，再加上中夏根据中央指示，极力用公开方式与各方不正确倾向斗争，现在算纠正不少。据中夏观察，亦确有不少进步。二军成分现已改进（但战斗力却稍减）大烟确已戒了（秘密吞烟者自仍不免，曾枪毙数人）。六军极端民主化倾向，亦有相当纠正，战斗力亦相当加强（现颇受节制指挥不止冲锋一次，可冲锋几次了。如此次进攻下监利可证）。假如我们有根正确的领导，不难整顿成劲旅，此次慕禹来得正好，恰当其时。

芸卿本人政治上确无问题，其部下大半均入党，党的观念虽弱，但均忠实勇敢，过去领导同志不从积极方面加以政治领导，而却从消极方面反对服从个人倾向，显然是左稚病的表[现]。六军同志确反映农民意识不少，而且

掩蔽自己错误，成为惯性。一切问题不示人以大公，如何能同化人！中夏正在政治方面对各方厉行反倾向斗争，同时从组织方面尽量消灭可以引起不平的现象（如经济分配问题，补充问题等）现人员大有更动，在监利集城的前委会议上，议决周逸群同志调地方工作，代理湘鄂西特委书记（中夏事实上须随军工作）及充任鄂西苏维埃联系[县]政府主席，六军军长以段德昌同志升任（照长江办事处意见），政治委员为柳克明同志。十七师长以许光达同志任之。慕禹来后，知中央决定以慕禹继任六军军长，在朱河的前委会议上认为段德昌就职不到数日，又复变动，殊属不好，由云卿提议以总指挥部参谋长孙德清同志改任二军军长（云卿专任总指挥）慕禹调任总指挥部参谋长，大家认为此种分配甚为适宜。应请中央加以批准，并用军委下命令来：

（1）第二军团总指挥贺龙专任总指挥，其留任之二军军长，以孙德昌[清]继任。

（2）第二军团第六军军长邝继勋另有任用，遗缺以十七师师长段德昌同志升任。第十七师师长以许光达同志继任。

（3）任命汤慕禹为第二军团总指挥部总参谋长。

再则，须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之两名义下命令来：

- 1、第六军政治委员以柳克明任之。
- 2、第二军政治委员以朱勉之任之。
- 3、任命刘鸣先为洪湖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

（三）湘鄂西苏维埃区域问题

从前真是笑话，不要县城，成为了党内的国是，“国是”，所以县苏维埃都设在乡里，监利县苏维埃设在剅口，沔阳县苏维埃设在峰口，潜江县苏维埃设在四面皆水的湖岛上，江陵县苏维埃设在郝穴，县城本无敌人（沔阳、潜山[江]）我们却不去拿。在乡里造洋房子以为偏安久居之计。直到最近才算是占领石首、监利县城，但同志们却不愿保守县城，还提倡一种“跑兵主义”，反动势力一来，苏维埃政府打锣叫群众跑兵，并不叫积极反抗，他们还说：“跑兵是革命的群众”，跑兵实成了两年来鄂西党毫不致[置]疑的天经地义。习非成是，此种余毒，至今深入群众中，此次由中夏召集旧特委与旧前委的联席会议，极力批评此种倾向，如果不打倒此种倾向，则湘鄂西苏维埃区域，永无扩大和巩固之可能。我们拟定第一步须将监利、沔阳、潜江、江陵、石首、公安、南县、华容、安乡九县打成一片，成为整个的苏维埃区域。除江陵外，各县苏维埃政府必须设在县城中，并在全苏区内，除红军外，须设地方性质的红色警卫队，由联县政府统一指挥，负保卫苏区之用，又须设立驿站，把各县亲密的连系起来，自监利攻下后，联县政府挪来，已开始此项工作。

旧特委与旧前委的联席会议已于二十四日在监利县城举行，讨论下列决议案：

- （1）湘鄂西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
- （2）土地问题决议案。
- （3）经济政策决议案。
- （4）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问题。
- （5）军事问题决议案。
- （6）党的组织决议案。

以上决议案已函湘鄂西特委另寄，请立即审查，加以指示。

(四) 湘鄂西特委问题

湘鄂西特委已由旧前委联席会议产生共二十一人，第二军团中占七人，其余十四人为地方党部同志，内包括有女子一人，青年一人，名单已各特委另寄，请赐批准。

特委准备委员七人，中夏（书记），逸群（在军委代理书记），周小康（组织），彭之玉（联县政府党团书记），崔琪（农民，联县政府主席），关大顺（工人，职运），贺龙，事实上，中夏、贺龙不能参加工作，特委地点，暂设监利。红军之前委，我们意见名义不必取消，但以参加特委之七人组织之，为讨论及决定战略之机关，如果红军与特委之距离太远，则尽量请特委参加，否则前委有单独决定战略之权，但须立即飞马报告特委。此种办法是否适当，请指示。

(五) 其他问题

(1) 柳克明同志，我们主张留六军工作，中央须知在上海找克昌[明]一类人容易，在鄂西则很困难。

(2) 中央独立师留在监利一部分（二百余人）特委决定归二军改编（枪枝一百三十枝）理由是 独立师事实上不能回汉川，如单独回汉川，半途必归敌人解决， 独立师政治倾向及战斗能力都非常之坏（监利县苏维埃及群众怨声载道，供给粮食，但不能为抵抗反动之用，均主张缴械，因中夏不赞成作罢）。 二军此次攻下监利，死伤大多，枪多于人（六军此次得枪甚多，亦枪多于人）当此渡江急切需要补充，故有此紧急处置。请长江局及中央批准。

(3) 孙德清同志（即现任二军军长）要求中央另调工作，是否允许请予答复。

(4) 第一次报告中所要求各事均请办理，特别是无线电话要紧要紧。又军事侦探人才××××人才，亦请派数人来。并致 布礼！

中夏

九月三十一日 牛河军次

注释

系作者判定。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有误。

附：鸣先来信

中央和中央军委：

我于九月八日起程，十三日到汉，过三天与长江局接了头。停五天即乘我们自己的帆船于二十八日到赤区白螺城（系监利一沿江市镇），时值二军团于六天前（九月二十二日）攻下监利县城 三军团 二十八日晚用马赶赴朱河二军团总指挥部与刘 同志面晤 至我个人工作问题，中军原已指定，在前委会上，乃改派为军校校长。

关于军队中政治组织系统和各部分关系，指定我作一报告，并以具体条文暂时规定政治委员职权、任务及与军官政治部等关系。下月二日部队由朱河移动，我亦于是日到监利某城，遵照前特委决定，将军校白[自]洪湖搬到监利县城，一期已毕业约三百余人，第二期正筹划中，一切均无头绪。昨经特委临时会议结果，决定目前招收第二期新生四百名，三百名在湘鄂赤区内，百名专收武汉、上海的工人（计上海五十名，武汉五十名）如工人能多更好，

但在沪、汉各不能超过百人，招收期限以十二月十五日为止。此外最重要的就是教练军官（无论政治的军事的）非常缺少，务须中军从速派来，不然下期实难进行对整个学校工作计划，并希中军能及时给以指示和意见。

此致

布礼鸣先

十月六日

注释

均缺五字以上。

长江局给中央的报告

——红军进攻长沙与撤退情形，敌人方面的军事情况 (一九三一年十月六日)

中央：

据湘委来人报告，此次红军两番进攻长沙，虽因战术上的缺点（各军作战的联系配合不充分，未能由要塞战导入运动战等），及红军本身的弱点，（缺乏铁军作中坚，红军干部不健全——充满了失败主义倾向，以及取消派的活动等）未能成功。但也没有受到很大损失。……因……（略）红军的撤退是事先有计划的，并非受严重打击后溃退。三、四军退攸县、茶陵一带，五、八军退萍乡一带，十六军（新成立的约一千枝枪）则至汨罗、岳洲一带扰乱武长路。所以在撤退的情形看来，还没有违犯集力集中的原则。他们撤退到上述地区后，经过相当休息整理，即向长沙反攻。前几天消息，三、五、四、八军，已退到计划地带，十六军已进至新墙，距岳洲二十里。日本报载驻岳洲的教导师第一团曾向红军进攻，但为红军已围击败，且有二连兵变，……而二、六军亦已退出监利，向岳洲挺进。已到车湾、朱河准备渡江。所以岳洲处境非常危急。敌人方面何健主力集中醴陵一带，其战斗兵力据湘委报告约有十六团。……根据上述情形，我们曾有一次讨论，在红军的战略上，还是应该消灭何健主力，夺取长沙。三、四、五、八军应回攻醴陵，将敌人主力包围歼灭而直攻长沙。同时二、六军与十六军配合，包围岳洲之敌，消灭之而夺取岳洲。以前我们曾决定指示二、六军回攻沙市，这是在夺取武汉计划下，红军各集团军作战的战略上说，现在要二、六军进攻岳洲，这是由于夺取长沙的军事战术上的需要。所以在实际意义上，先后亦不矛盾。此外，十五军应设法渡江，向九江南浔路进攻……（略）

但这两天反动报纸登载的消息，即三、四、五、八军却已退出湘境，有向江西进攻，夺取南昌的趋向。二、六军仍在监利南部车湾、朱河一带，尚未得到渡江的确实消息。同时在敌人方面公秉藩一师及独立十四旅（彭启彪）调赴江西，等种种布置，亦可看出局势的重心，已转到江西。而敌人来夹攻红军的积极企图。在这一具体情形之下，在我们的意见，红军还是应该回头，击破何健主力，与二、六军等配合，夺取长沙。因为湖南的敌力并不强大，平浏一带的广大赤卫队，依然原在，是红军进攻的有力助手。特别是在军事上与二、六军进攻岳洲的配合，以及政治上二次进攻长沙所给予广大群众的影响，都是红军进攻的有利条件。

但是交通阻塞，我们的指示很难迅速达到，若他们已积极向南昌进攻，那末我们当然要使红军及各种革命力量配合而使南昌的胜利迅速完成。所以我们若继续探得消息证明三、四、五、八军等进攻南昌的计划后，在红军的配合上，我们将指示十五军向九江南浔路进攻，第十军加紧向南昌进攻。二、六军方面如已渡江则与十六军配合，经过通山、通城而向南浔路九江进攻，如尚未渡江，则不必渡江，而应回攻沙市。巩固鄂西苏维埃区域。此外，并须派得力同志，迅速组织江西省委，加强九江及南昌的工作。加强南浔路的兵运……（略）

长江局

10[月]6日

长江局给中央报告

(一九三 年九月二十八日)

5. 鄂西无报告来，报载红军已攻下监利，我们已去信指示，要六军反攻沙市，并发动广大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与强固红军，巩固苏维埃区域。

邓中夏给长江局转中央信

——要改变二军团向武汉进攻及赤区反水问题，工作人员腐化等情况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五日)

长江局转中央：

我于初九日搭船动身，经过五六天才到赤色区域之白螺矶。在樟州时，我的船虽被白军拦了一次，差与白军同船行走，因应付得宜，幸未发生变故，一路平安无事。十日午抵白螺矶，此处离后方办事处尚有约九十里之路，十一日到军事政治学校，十二日才到后方办事处。兹将所得情形择要报告如下：

1. 第二军团开往江陵，进攻沙市、荆州，虽沙市未攻下，据说得省总行委命令变更策略，放弃荆州进攻武汉，于是第二军团分二路回师，一路由潜江、荆州、天门等县由襄河北，一路由江、监、沔、汉川由襄河南，此项战略显然与中央与长江局所规定者不符，当即派人飞至传达，每日一函已共去四函，嘱其将军队调回，先集中洪湖附近，候开军事会议后再行渡江，截断武长路及占领岳州。惟据我观察，第二军团是否能担此重任尚是问题，因其战斗能力实属有限，从上次进攻监利失败，此次进攻沙市无功可证，虽然如此然无论如何，须望中央决定执行。至于第二军团本身之弱点，迅速设法予以补救。

2. 监利自红军开经荆沙后，地方空虚。只是农民枪枝在扩大红军口号之下，全数提出，赤卫队亦宣布解散，因此地方毫无自卫能力，监利白党政府见此弱点，即乘虚派队清乡，于是有几乡的苏维埃政府尽被焚毁，监利白党军队虽非正式军队，但其常练队为桂系陶广残军所成。人数共七百，枪亦如之。战斗力甚强，最近亦学会我们的游击战术。分为小队四出下乡，至焚毁苏维埃机关，大杀、大枪[抢]，呼啸而去，甚至我们唯一的河口、白螺矶亦十日前被陷一次，因此农民大起恐慌，监利县党部、县苏维埃不得已搜集余枪，将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编成游击队抵抗白军，所幸数日以来接战四、五次学生皆获小胜利，前后毙死敌三十余人，学生亦损失四五人，虽未缴得敌人枪械而敌人气焰消散，但赤区恐慌状[态]仍未过去。

3. 最重要者为赤区反水问题，现监利已有数乡完全反水，与白军完全合作为之响应，并组织硬肚会、北极会等团体，甚至有一次在某处开群众大会，群众突起暴动，当场杀苏维埃工作人员四十余人及党部共产党三十余人，其严重有如此者。农民反水纯非偶然，有与经济原因甚或土地政策之不当，原来鄂西土地并未平均分配，凡从地主处没有[收]之土地只转给原佃农、贫[农]等少数，人民均未得到土地。所谓流氓、地痞即党部苏维埃负责指导责任的人，亦认为不良份子。当然不得分配土地，因此我们的基本群众雇、贫农以及失地的游民无产阶级，都未得到苏维埃的实际利益，这显然[是]过去富农路线的结果，反富农斗争方法之不当。自从此地接到中央反富农的策略以后，他们并不是动员雇农、贫农群众与富农实行阶级斗争，而是利用苏维埃权力，[对]富农实行一种特捐，甚至还有绑票的行为，最出奇的有一飞条子办法，侦知富有数钱，即由政府下条子征收其半，名为借贷实同夺取。总之，以此种办法代替阶级斗争的正确办法。最错误的是土地连中农亦不分与，将中农亦当富农看待，党的出版物公开的指出富农、中农均是反革命。以监利来说，中农确占农民之绝大多数，据说占百分之八十，我不相信有此大，因

苏维埃政策的××，于是使中农群众由怀疑动摇而跟富农走了。因此我们的同盟群众中农，亦觉苏维埃政权为不当。所有农产品完全禁止出口，以监利来说，谷米、黄豆、芝麻、棉花有得出口，现因禁止出口，于是金融异常枯竭，现只发行信用券以度日。信用券，人民虽不用，而暗中

却有拒用行为。盐与煤油大起恐慌，在现时并非不可与外面交通，如白螺可以直通汉口，而是自己封锁。总之苏维埃政府只有防止奸商的消极办法，没有活泼金融的积极政策。财政方面更是些无计划，直到现在还未实行革命的累进税，何以尚不执行，他们说有何标准呢，又[各]色

各样的捐费如互济捐、少年先锋队之费、鞋袜捐等。如一家子，父亲加入互济会，儿子加入少年先锋队，女儿加入鞋袜缝纫队，则一家人捐费就不少了。而此种捐费并非乐捐，只是强迫征收，因此这在农民看来与

国民党苛捐杂税无异，因又引起群众绝不满意。

4. 工作人员的腐化，党部苏维埃的工作人员造成另一风气，衣履极为整洁，饭食必有鱼肉，手上金[戒]指亦屡见不鲜，并且扯拼[皮]绊，即暂时夫妻，上海话所谓打炮等行为。再滥用专职，对苏维埃表示不满者，则往往加以反革命之罪，并非法拷打及逮捕下狱，农民说，现在的牢我都有份。党部苏维埃与群众之间，隔着一条深的洪[鸿]沟。一般的说各级党部各级苏维埃工作人员能力非常之弱，并不知如何领导如何工作，即不如此则饱食终日。一时风气而觉有党、红军可爱，苏维埃可恶之风，因红军中工作人员皆能刻苦，纪律亦极严肃，亦无骚扰农民行为。上述种种皆透[遭]农民斥这[责]的重要原因，现时鄂西确有极大危机，鄂西旧特委并且改组，现正派人往各地改组去，但旧特委本身对土地问题、经济政策根本不明了，他们虽从实际教训中知道现状不能继续下去，然而他们并未找到正当的补救方法。关于农民的分析仍是一踏[塌]糊涂。土地分配虽提出要分，但又提出没有残废、孤寡及革命家属的土地，又提出什么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场等幻想的办法。并说要在最近召集监利县区委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纠正这些错误，并确定新的政策。汉川红军中央独立师，前些时被敌人截击分为一、二部，仍在汉川一部，后窜监利之一部共二百余人，枪有百余支，他们到监利时正是监利反动正盛。监利县委及县苏维埃请其留此就[前]去镇压反动，该师亦允许，但给得粮食子弹充实之后，都××回汉川，他们说省委所给我们的任务是进攻武汉不应留监。但该师行至沔阳又遭失败而回监利，该县县委当不满意，甚有人主张缴该师之械者。我适到此召集县委苏维埃中央独立师军事学校共合会议，指出该师过去错误，并决定该师暂行留监游击，并将监境内学生军、农民梭标队、少年先锋队与中央独立师组织指挥机关，实行镇压反动并恢复旧有赤色区域，又由学校派人帮助该师整理。该师士兵中地方观念、极端民主化观念及浪漫不守纪律都极深。师长吴英甚好，政治委员黄一光因能力弱故观念不好。士兵中政治观念错误，多有由黄同志助长者，该师原由他一手造成，而他又是汉川人，因此对从外派来的人颇有歧视，此点我即当面批评他已接受。鄂一切重要机关并不集中后方，办事处与学校相隔一日之遥，与特委及鄂西联县政府更隔三日之程，而且途中常发生障碍，以致联络上非常困难，似此如何实行该[统]一指挥，我拟候旧特委及前委负责人到后，商议一适当地点，把些机关集中起来。这是以上数日观察所得，×行报告，当然还不详细，容后详述，望加以指导。

另有要求数项如下：

1. 请将国际最近关于中国的几个决议案及中国接受国际指示的决议火速寄来，此时正得其用。

2. 所有书籍，应大批寄来，我们已有数船×走汉口，可以代[带]《红旗日报》及[其]他单行刊物可由邮寄收到。

3. 请将中国全国地图，湖北、湖南、四川地图，湖北分县地图，武汉三镇地图，单张的或本的各样至少购五份寄来（此地一张也无）。以后还望源源寄来，越多越好，至要至要！

4. 请派得力军事政治同志来，刘鸣先、叶剑英应即刻来。伯丞[承]如留汉，非宣熊来（？）更好。列宁院工人如回汉，须派数人来此。旧特委要求李灿英同志来作妇女运动，湖北省委派来之×宇同志何以未到？

5. 洪湖军事政治学校下期招生，请于武汉招工人上，招集湘鄂籍工人百人送来。

6. 请派无线电话的同志来，并携带应用电器，又须与中央长江局约好密码。

7. 写信药水送来并示知用法。我所存留特科之铺盖行李请交人带来。此致

布尔什维克敬礼！

中夏

十月十五日

注释

此年代是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原文如此。

邓中夏关于红二、六军的报告

——我军向湘鄂西进军及整顿概况、地方工作的开展情形、请中央及长江局注意湘鄂西的干部问题等*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九日)

长江局并转中央：

朱河发一报告，计达。此后因出征，特别是因得疟疾（每日一次，特别在攻打仙桃镇时最利[厉]害，神志昏迷，困苦万状。攻下仙桃镇后方愈。但回师至监利时又复发一次，现已愈），以致直到今日方作报告。兹择其重要者报告于次：

(一) 在朱河时，原决定攻打新堤，嗣得报告，新堤工事太坚，有电网，有战壕，有土坑，最苦是战地大小，我们虽然兵多，苦于不能展开，只能用小部队，而且地形大坏，左江右湖，只能打冲锋，不能打包围。我们估计，占领新堤虽然绝对有把握，但一定须准备极大牺牲。再我们攻下新堤，主要目的在解决经济问题（如说占领新堤为通江口岸，意义虽有，坚守则难），据侦查，新堤大商家早已迁移，其收获不会比监利为多，因此前委决定，以不可弥补的牺牲，而取得有限的经济，殊为不值，故改变军事行动转向仙桃镇，攻下仙桃镇后再攻岳家口。攻下岳家口后，分两路出师：六军取天门、京山；二军取钟祥、荆门，目的不仅在解决经济问题，而且主要的在扩大赤色范围版图。九月七日很顺利的占领了仙桃镇。前委临时变更计划，决定不再北进，移师南征。理由主要的是地方组织太薄弱，譬如红军攻下仙桃收复地域百余里，然而地方组织无力接受，这样即使红军向北冒进，事实上等于太平天国[之]攻城略地，随得随丢政策，好似猢猻抓板栗，抓一个丢一个；此与扩大赤色版图意义不合。再则大军冒进，敌情固然复杂，后方失其联系，亦为军事所忌，又天门、钟、荆等县，并非富庶之区，经济只能小解决，不能大解决。因此决定红军及汉水而已，不再北进，移师南征，故占领仙桃镇只两日，便退回峰口。

(二) 此次攻打仙桃镇，系从两路进攻，二军从西路收复沔阳县城，经过张家沟里仁口消灭敌人前卫，向仙桃进攻；六军从东路经尤据彭家场，消灭敌人前卫，向仙桃进攻。两路皆有北极会匪，我军皆须搜索前进。（北极会匪者发生，专门与赤色区域为敌者也，其性质与红枪会相类，其信仰谁儒释道之家，亦以“吃灵符炮打不进”的鬼话欺骗群众，其实是出发吃灵符时，每人喝仁砂酒一大瓶，人受此刺激，的确神昏颠倒，天不怕地不怕，象火牛一样向前直奔，但不到两小时，酒解人醒，便失其效力，于是匪首解嘲说：“灵符过两小时无效”。或用其他鬼话：“被打死者系心不诚，夜有房事所致。”首匪名“老师”，设佛坛早晚拜佛。征收会费，完全胁迫，不加入者则杀其人，火其居。入会金至少一元，还不时征发，群众引为大苦，然而无可奈何，不能不在淫威下挨家加入。（再则赤色区域的策略错误，亦为促成群众加入北极会之又一原因，下面再说），再加上国民党政府现时无力统治农村，无兵可派，极力利用此种组织，该会匪得反动政府援助，故其势太张，蔓延酒阳一带，监利亦×发展多）。六日进攻，二军不战收复沔阳，即到张家沟打破敌人前卫，缴械二连，直追至新里仁口；六军收复尤据，直进抵彭家场；七日上午两路会攻仙桃，敌人不战退过汉水（俗称襄河），夹河相持，仙桃完全为我军占领。当晚召集工人数百开会，成立总工会。翌日午召集群

众大会，成立苏维埃。宣传颇为普遍，民众亦颇热烈，影响甚好，占领两日，敌人在对岸鸣枪，疏疏密密，昼夜不绝。汉口飞机，七日下午来投炸弹四枚而去，一枚炸毁房屋一栋，死市民一人，伤红军五人，市民数人；一枚伤战马一匹。我们才决定引军渡河，消灭对岸残敌，无奈所有船只尽数为敌人引往对岸，上下数十里，觅不到船只，以致未能渡河。八日晚我军退出仙桃镇，适敌人援军二团亦至，跟踪追击；西路无战事，东路至彭家场，六军给以反攻，打溃敌军，缴获敌械。九日完全安退峰口。

是役也，我军死十余人，伤二十余人，敌军死伤七八十人，缴敌械二百余支，子弹数万发，俘虏二百余人，算是一个小胜利。敌军系川军郭汝栋一团，敌人援军不大明，闻系谢彬一团及郭汝栋×汉川之一团，在政治上的胜利，特别是给北极会一大打击。本来当我军进攻，北极会武装队伍皆闻风逃匿，我们的策略是“杀尽老师，保护群众”，我们提出口号是“北极会是豪绅地主的走狗，是我们的敌人；群众受豪绅地主的压迫，是我们的亲兄弟，‘杀尽老师，保护群众’”。“北极会的群众与我们联合起来，杀尽欺骗压迫他们的老师。”这一来，的确使北极会的群众受了莫大的影响，事实上，我军所过未杀一人，未烧一屋。将北极会匪首之宣传失其根据，不仅如此，并且连带改正赤色区域群众向来对付白色区域群众策略上的错误。从前是这样的，白色区域见人杀人，见屋烧屋（实际上是农民意识原来如此），于是赤色区域交界之处三十里往往无人烟，赤白区交通完全断绝。赤色区域的人固然不敢过去，白色区域的人亦不敢过来，因为一来则杀无赦，造成一个相互仇杀的地带，地方党部及政府不仅不纠正此种错误，而且造成理论说这是赤白区域对立，他们不了解赤白区对立，是赤白区两个政权的对立，而不是赤白区两地群众对立，他们把地域的对立，代替了阶级的对立。的确这一策略可以使苏维埃区域陷于灭亡，不仅不能把赤色区域的政治影响扩大出去，而且使白色区域的群众仇视赤色区域。北极会之存在与发展，赤色区域此种策略，实为一大助力。红军此次进攻仙桃，的确影响赤色区域群众改正此种错误，譬如沔阳暴动队、赤卫队三千余人随红军前进，随红军在北极会根据地搜索，他们确未杀人放火，只在一处地方烧佛坛一问，逮捕了六百群众亦全数好言赦放。的确这一来，使北极会群众根本动摇，据我们退出白色区域以后所得的消息，北极会老师回来，群众说：“请莫再来了，你们与共产党有仇，我们与共产党是没仇的，你们如再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向赤色区域跑。”于是北极会的，现时都是白色区域的反水了，这不能不说是此次政治上的一大成功（赤白区域群众对立的现象不仅沔阳，其他各处亦有，我们已去函湘鄂委讨论此一问题，成立专门决议案，训令各县严重注意纠正，前时特委亦有委员震于北极会之发展，有用武力肃清倾向，当时×则说不用害怕，主要原因是北极会不建立在阶级利益上，何能发展，但因当时弟还未深切见到赤白区域群众对立之危险。）

（三）自我军退到峰口以后，前委决议留一星期加以整顿，慕禹传达国际新有决议，要中国造成红军铁军，使我们觉得这一任务的重要，六、二军两军是不敢自负有远能造成红军铁军的资格，然而国际既有此愿望，那么二、六两军亦不能妄自菲薄不努力，的确二六两军的毛病太多太大了，实是难于指×，最主要是红色军事教育在全军中，只是沧海一粟，军官的教育有保定的，有黄埔的，有讲武堂的，有行经的，有游击战争的，五花八色，各师之教，再则战士的成份，当然最多是农民，然而亦有不少投诚的土匪及

俘虏的兵士，现时虽然绝对不是乌合之众，然而我们不讳言我军还是以勇气胜人，而不是以战术胜敌，的确打冲锋是我军的天大本事，并且现时还进步到能打几个冲锋，但是说到战术就成问题了。二军老军务多些，还有时几分采取战术，六军多由游击战争产生，对于战术的采用就更少了，前委有决心将军队加以改造，自然此次在峰口一星期之改造整顿，只是因军队总在战争的状态中，借此一星期，做一×的整顿，还谈不上是改造的开步走（我们在宣传上虽这么说，那是另一会事）。所以这次的整顿，我们仅注意三件事，战斗的教练（择其最感迫切者加以大概的训练，如射击、驻军警戒、行军警戒、攻击、防御、夜战、遭遇战、山地战、攻城、渡河等）；政治的教练（择几个基本问题，对全军讲解，相当的作统一全军思想的尝试，题目不录）。各级机关的整顿，（尽量裁汰冗员，特别尽量裁汰闲杂人，减少行李，减少毛匹等）。现整顿期满，其结果如何，还未能做总结，此地不述。现军队已开动渡江向南华安进攻，此后战略以夺取常德为主要目的，至于与一、三军团配合行动，我们已另立专门机关与专门人员先行把交通建立起，使双方发生联系，我们已派几个人带信去了。

（四）我与云卿于十五日赶到监利县城，适在湘鄂西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夜，×底地方工作有极大进步，虽还不到一个月，举其最著者于下：

（1）上次攻打监利，被我们所击溃散在各处之常练队、现在已完全肃清，只尺八口还有一小股，从前的白色区域及汉水区域亦相当立有基础，我们一路走来见农民哨所已设立，苏维埃乡政府及少年先锋队，亦是好几处已有，虽然不如老赤色区域之整齐严肃，但大体已有规模，我们虽未下马考查，但路上所见农民确有欣然气象。

（2）监利县城甚为安静，工会已组织起来，工人亦颇积极参加工作，特别是学徒及青年农民更为热烈，十六日晚庆祝苏维埃代表大会之提灯巡行，参加者本城工人及四郊农民约近万人，而且热烈高呼口号，革命空气异常紧张，据说为鄂西空前未有的现象，由此足证群众确已起来。

（3）此次召集湘鄂西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代表八百余人，如到齐约近千人，而且成份极好，工人雇农占绝对多数，次为贫民[农]再次为中农，知识份子只数人，青年倒不少，但女子只一人，是极大缺点（此有其政治原因，就是以前苏维埃富农当权时代，其工作人员凭借政治的地位与权力，的确有假自由恋爱之名，行夺人妻女之实，自然其中有不少女子有趋炎附势的事实，农民则屈于淫威之下，敢怒而不敢言。再则女子也有浪漫放纵生活奢侈者，这一来刚刚与农民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相冲突——实际与他们以女子为私有财产的观念相冲突，苏维埃政府又不从积极方面加以解释，只从消极方面提出“反对妇女流氓化”、“反对无条件的妇女自由”口号，大贴标语，以迎合农民，红军政治部亦混蛋，也有上述口号标语，自然有其背影[景]，因红军战士也有不少老婆[婆]被人骗去者，战士愤怒已极，政治部即反映此种情绪——好了，这样便开辟封建思想复辟的道路，此次女子不被选，实以此为大原因。即此一端，又证明土地问题解决之不当），会场革命空气极高，开会六天，我们只参加两天，第一天开幕。第二天下午政治报告（中夏报告），代表讨论颇为热烈，整个大会报告将亲由特委做来。据我观察，此次大会的确是湘鄂西一大成功，此次大会之后，其影响将有不可思议的效果，现在鄂西群众的确在红军×胜之余，特别是攻下监利，其革命[热]情突飞猛进，湘鄂苏维埃县政府的声望必随此次大会而高度增加。

(4) 农民银行之建立，亦为一大成功，原先红军发有纸币，滥极了，其纸币亦极不堪，用毛边纸成一小条，而且草书油印，以致用不到数日便破碎了，所谓兑现，亦属空谈。现联县政府成立农民银行，全鄂西只有此银行发行纸币，红军及各县政府一律停止发行纸币，并由此银行将红军及各县政府纸币收回销毁，以后只此一家纸币流行。联县政府并决定于各县及各重要市镇，设立分行，并准备相当基金，实行兑现，又决定以后政府征收公益费（即累进税）只收纸币不收现金（而以现金去银行换纸币来完税），以增加纸币信用，的确现时人民乐于使用银行纸币了。如果办理得好，红军向外发展现金，再添基金，其前途实未可限量。

(5) 地方军事组织，亦开始建立，现名为红色警备队，原来赤卫队，因从前扩大红军时，将其解散，不便再用赤卫队名称，一时想不到其他适当名称，只得用了红色警卫队，后接中央局关于地方的红色军事组织大纲，可以设红色警卫队，其性质等于中央所拟的红色野战军，现既将红色警卫队名义打出，而且各县亦已沿用，似不宜于骤然更换，特委决定仍采用红色警备队，请中央同意。其他如红色补充队，红色守备队，拟照中央指示进行，地方军事组织详情由特委详报，兹不赘，自然我们已注意地方军事组织如何帮助红军发展问题，即最近则由红色警卫队准备徒手兵，整个中队×加入红军，将来则由红色守备队吸收自愿兵，关于征兵制名义，特委决定暂不抬出，免引起群众怀疑，只按照征兵制精神去做，一俟补充队守备队做到，就告诉群众，这就是征兵制，自然征兵制的思想就须开始宣传。

以上五点举其大概者而言，至于有决定没有决议案而未实行者，概不谈及，如平分土地问题，经济政策问题等。但请中央及长江局严重注意湘鄂西特委之决议案，望迅速审查，是否错误，立即指示，假使有错不少，致实行太久，一时改正不来。

报告完了，另有数事须请中央及长江局严重注意：

1. 湘鄂西干部人才实在太少，我是知道中央实情及全国现状的，提出要求实觉困难。但湘鄂西实情不能不报告，湘鄂西党最大弱点，是无产阶级成份的万分微弱，领导机关几乎绝无仅有，又何怪农民意识牢固而不可拔，巩固无产阶级领导，就现在说绝无保障，长江局及中央应尽可能的从莫×中特别是列校工人班中选派几个硬脚来（最好十几个），请求把余××派来，为二军团总政治部主任，兼党书记，并从上海、武汉工人同志中选一大批来。

2. 理论人才绝无仅有，中夏、朱勉之据说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岂不笑掉牙齿！此二人又在红军之中，打下监利时，原决定出一《鄂西苏维埃》三日刊，直到现在还未出版，真是莫大损失，比损失一万兵还大，现时策略解释之不普遍，反对倾向及纠正错误之不深入，布尔塞维克思想之极端微弱，皆因无此刊物。务望尽可能派几个此种人才来。

3. 洪湖军事政治学校只校长刘鸣先一人受过红色教育，其余军事教官大半拖枪过来的连排长，黄埔学生是顶呱呱[的]脚色，政治教官傅先夏（原名戴君实），笑是超等名角，以如此脚色而希望造成红军及地方红色军事组织干部人才，真比登天还难！鸣先变成孤掌难鸣，弟初坚决主张续办，最近有变动，主张改为教导营或教导团，即是因此。但特委最大多数委员坚持续办，既续办必须加强领导者，红军中调不出人，地方更调不出人，请长江局及中央从苏联步校学生匀出一、二人送来。

4. 无线电话成为我们火烧眉毛的迫切要求，务望派人并购买机器送来。

5. 李剑如已到，但汉川事实上送不过去，再则中央独立师变为溃不成师，其留监利一部分，上次报告已说被二军团吸收，其余留汉川一部分，渺无消息。因此前委决定李剑如同志暂留此任六军第十七师政治委员，请批准，并请勿怀疑我们拦路劫抢，一笑！

6. 红军兵士名称，我们已决定废除，改用战士或红色战士，请批准。

7. 红军的党，中央军事会议决议政治委员为党的当然书记，据我们经验，此决议有变通办理必要，第二军团一万二千余人，只五百党员，党不发展，政治委员兼党书记顾不过来，要为原因之一。苏联红军亦不是政治委员必兼党的书记。其关系如此：政治委员必参加党的会议，如党书记或党委员会，与政治委员发生不同意见时，党书记或党委员会必须服从政治委员意见。但党书记或党委员会可将不同意见，呈报上级党机关；又党书记或党委员会，有违反党路线和策略及不遵行[循]军×策略时，政治委员得将党书记撤职或整个党委员会解散及改组，但政治委员须立刻呈报上级党机关××办理，实际有益而且正确，前委决定如此办理，特委同意，请求你们批准。又特委决议在前委之下，设一组织委员会（我提议用党务委员会不必隶属前委，但被推翻），专门管理党务，此则是否适当，请批示。

并致布尔什维克敬礼

弟中夏

十月十九日于调弦

邓中夏关于红二军团的政治委员问题给长江局并转中央政治局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九日)

长江局并转中央政治局：

第二军团无产阶级成份几等于零，不仅战士如此，而各级干部亦如此。军官不用说了，政治委员完全是知识分子。整个的增加无产阶级成份，是第二[军]团的根本问题。自然这不是一时所能办到，但最低限度第一步须从政治委员改变成份着手。现时政治委员是于此，除掉几个高级政治委[员]，是中央或特委选派来以外，其余全是由军官中觉得某人宜于做军事工作，某人宜于做政治工作。凡所谓宜于政治工作的，多半就给以政治委员头衔。实际上这些份子，党的年龄，党的生活，党的认识都非常浅薄。这样成份如何能够起领导作用？的确政治委员中有狗屁不如的，政治水平低落不用说，而且浪漫不刻苦、怯惧，甚至还有开小差的。象这样的政治委员，我们说要提高政治委员威信，而威信如何能建立得起？如不改变政治委员成份，而先说提高政治委员威信，真是要笑掉人的牙齿，如说向地方党部调人来，姑不论任何地方党部，都感觉干部缺乏，事实上无人可调，即使有人调来最多系小学生（实际至少是富农子弟）或农民、贫民份子算是呱呱叫成份，而且赤色区域的党员至多只有二年农村的生活。以这样的分子来作红军政治委员，说要以无产阶级意识来征服农民意识及流氓意识，真是活见鬼！现时第二军团就连此“呜呼哀哉”的政治委员都不齐全，特别是营和连两级大部份政治委员，均付缺如（连政治委员现改名政治指导员）。因此前委决定请求中央及长江局于武汉、上海选派二百工人来。自然我们希望能选送党的年龄很长、党的生活很久的老同志来，不须训练便可充当下级政治委员。如此项人材难得，就是选送忠实勇敢、阶级性坚定之工人同志前来也是好的，因为此种工人同志到来，我们还是可以加以训练，这样总比没有好，前此洪湖军事政治学校派有专人来，我们恐怕他一人不够，特此加派袁支山同志来并带金子四千[余]两为运输此项工人<同>志之用。务望长江局及中央郑重注意迅速办理此事，选送工人最好是湘鄂川黔籍，至于汉、沪两处派多少，请你们配定，我们请求派余笃三同志来当第二军团总政[治]部主任并党书记。

并致

C礼！

弟中夏

十月十九日于调弦军次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特委关于政治经济及各种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第五号)*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中央：

兹将湘鄂西政治、经济及各种工作报告如下：

报告目次：

政治经济情形
组织工作
宣传工作
工运
苏维埃工作
土地问题
军事问题
经济政策
青年工作
妇女工作
反帝及互济会工作
破坏改组后经过情形
特委对中央意见

、政治经济情形

(一) 湘鄂西政治经济中心及其他重要市镇

沙市，现只有二十一军(川军)佟、杨二团，但其实力却不过有一团余。沙市因军阀战争的影响，红军的进攻，苏维埃区域对他的封锁，以及土匪在附近骚扰，商业衰落，商店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至为恐慌。尤其是红军攻沙市后，沙市各机关人员长在船上过夜，衣物尽量放在船上，时时准备逃跑，市上更常造谣说红军到来，白昼跑兵。宜昌系川军郭勋部(廿一军)驻防，队伍比较整齐，给养比较充足，但宜昌的经济恐慌，以及对红军进攻之恐怖，仍不减于沙市。常德、澧州近闻我二军团攻下

(二军团多日没有来信，故尚不敢确定)。沿江自白螺至郝穴三百余里一带重镇(如郝穴、藕池、石首、监利、白螺)，均为革命势力占据，新堤虽尚未经红军攻过，但是内部恐慌不减他地。近日团防夜间在市上抢劫，仙桃为红军攻下两次，大商家均已搬空。岳、临、沙洋为红军攻下一次后，情形与他市同样。

(二) 各县情形

江陵、石首、沔阳、监利、××赤区中心，其苏维埃政府日臻巩固。

潜江、天门、南县均亦正式成立县政府(潜江、华容)或革命委员会(天门)。京、荆、钟、松、枝、宜亦均为游击区域，不过占领县城至今尚能保存者仅监利、石首、华容、南县、公安、潜江四县县城均占领不久复失。最近沙市川军向江陵进攻，夺据郝穴及其他数区，监利剩余常匪，新堤驻军，开往赤区边境扰乱，沔阳仙桃驻军向酒阳进攻及占据一部份，白色区域潜江及岳口驻军，摧残天门、潜江两县赤区。赖心辉、郭勋部队以及南县、华容残余常匪进回南华县城，但不过表示豪绅地主阶级人们的前后挣扎，革命群众斗争力量仍要使他们不敢在这一赤区内安心睡觉一夜。鹤峰全县为赤区，有县苏维埃政府，惟其下层尚为农协。五峰有一半是赤区。巴东亦有一半是赤区。兴山、秭归、建始、恩施、宣恩、松滋、枝江、宜都、远安、长阳、

荆门、京山、钟祥等县，虽有赤色游击部队（或以前有），然其斗争并未深入，苏维埃政权并未建立起来，完全是豪绅地主统治。许多小块赤区及游击区域并未打成一片，现在积极从事铲除这些区域中间阻隔的反动势力。尤其注意松枝宜的工作，松枝宜若能造为苏维埃区域，则上游各县俱可联络而发展成整片赤色区域。

（三）湘鄂西政治、经济情形

总括的说来，在白色区域是一般的紊乱、衰落、破产、失业。白军团防、豪绅地主的苛捐杂税，鞭笞屠杀，焚烧掳掠，使一般群众，水深火热，求生不得。同时豪绅地主一天天不能维持其统治，而仅能逃聚于极少数之中心城市如沙市、宜昌、新堤等地，负隅图守，苟延残喘，而且最近这些地方都不敢安心居住，而相向武汉、上海跑兵去了。

附：在此报告写起时，监利又被常匪夺去了。

、组织工作

（一）党的组织状况

一、湘鄂西党的发展是顺利的形势。在国民党军阀混战之下，豪绅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之下，城市工人失业，农村农民破产，士兵团丁数月不发饷，贫民群众日益增加，所谓土匪遍地皆是，这一形势都证明工农群众都需要斗争，更加迫切，特别是白色恐怖的严厉，革命群众只有与统治阶级作垂死战的出路。同时，苏维埃政权之实际成为工农群众自己的武器，土地加深，工人群众得到赤色工会的保障，红军迅速生长，切实为工农而斗争，广大的群众已认识共产党是阶级斗争的先锋前导，许多群众都来找共产党要加入为共产党员，广大群众团结到共产党的周围来，所以在客观上党的组织发展是很顺利的。

二、自红军五月运动后，党在斗争中确有不少进步。党员数量增加，地方党部逐渐的土地工作，江、石、监、华、沔、钟县苏维埃政权之建立，红军迅速生长，保守观念右倾等不正确倾向逐渐纠正过来。这些进步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三、但是下面的几个严重弱点，还是在湘鄂西党不可忽视的：

A、党的基础转变得很慢，工人占百分之八，雇农百分之十九，小资产阶级分子党员多为腐化，同时党的组织发展太慢，全区党员约一万五千，群众数量约百万，党员占百分之一强。党的组织确偏在赤色区域，没有向白色区域发展，有许多同志以为只有先用红军打开，再发展组织（如松枝等），是特别没有从斗争中发展群众组织、党的组织。有些同志怕富农反动，不敢提出雇农雇工斗争纲领（如天门、潜江等），没有把群众严密组织到党的周围来，特别是富农活动（如潜江宁富农捐田入党，不提出雇农斗争纲领等）。这些都是组织上的右倾，是改组派活动的基础。

B、逃跑主义是目前湘鄂西党的严重现象，不坚决建立城市工作及其近郊工作，不坚决动员消灭反动势力，不相信群众力量，放弃群众而逃跑（如南县、天门跑出县境），这是保守观念之反映。

C、地方党部工作没有地方化，没有正确的建立政治生活与集体指导。地方党部执行不够，上级的决议运用到下级去很慢。

D、支部生活还是没有一般的建立起来，更没建立民主生活（很少有政治与斗争问题的讨论，并且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

四、组织工作的布置

A、特委于十一月二十二号召集全区组织会议，出席者仅特委机关附近各县——计有十六县，主要的精神是：

1. 湘鄂西革命形势前面党的任务与组织路线。
2. 湘鄂西党的组织上的进步与主要缺点的表现。
3. 目前党的组织中心任务及其决议。

4. 巩固党的基础——发展质量，工人雇农成份应占百分之七十。引进工人干部，建立工作，在斗争中与发展中。

B、扩大党的组织——在斗争中扩大党的组织，在列宁纪念日以前要发展党员一倍。

C、严密党的组织——肃清右倾改组派富农分子。

D、巩固党的纪律——在列宁主义之下，执行铁的纪律，巩固支部纪律，肃清惩办主义。

E、建立工人支部与支部生活。

F、加强教育工作与引进新干部。

G、健全地方党部。

H、加强巡视工作。

I、党员军事化与组织军事化。

J、加强对青年团的指导。

K、建立党报组织刊物与发行工作。

L、注意秘密工作。

M、在党的组织路线之下建立组织部门独立工作。

N、党在群众中的组织任务。

O、反改组派及右倾之正确路线。

五、中心区域工作

A、以宜昌为中心的附近各县工作，因种种关系，客观上等于放弃。最近用行动委员会指挥以宜昌为中心的附近各县，目前此区工作主要的是建立宜昌市的工作，扩大党的组织，造成小块苏维埃区域，变游击队组织为红军，组织联络大块苏维埃区域（自然要扩大游击战争，执行土地革命的工作，比较宜昌要建立起来争取广大群众）。

B、松滋宜公为鄂西中部之重要点，对这一县区工作，是以松滋 县委，因为机会主义路线之错误严重，最近决定从下层来 组织后

、军事工作

（一）红军

A、二军团的行动。二军团自攻下监城，即拟自白螺渡江，与一、三军团配合，夺取湖南政权，一面派探到岳州侦探敌情及一、三军团的行动，一面准备进攻新堤，以解决红军经济问题（因为攻下监城，红军本身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嗣因新堤防御太固，乃移师进攻仙桃。本应沿襄河而上，将荆、钟、潜、京、天五县的反动武装肃清，建立五县政权。殊知在仙桃休息一天，前委又以该五县非富庶之区，而土匪、红枪会又遍地皆是，地方党部又极不健全，又变更原来之计划，移师沔阳之峰口，休息七天，专事整理。特委开会，有云卿、中夏等参加，决定由石首过江，进攻南、华、安、公、澧、常等县，造成湘鄂西赤色政权。于十月二十二日南、华两县城同时攻下，各缴得敌枪二百余支。继在官塘、藕池、公安县城均缴得敌枪各二百余支不等。十一月一号以后，红军向津、澧开动，公安群众力量太弱，不能保障已得的

胜利，所以走后不上三天而公安又为敌人占领。同时，南、华两县又到有何键部队约两团之谱，南、华相继失守。因此，红军与赤区交通完全断绝，红军最近究竟到了何处，我们不得而知，攻下津市还是由津市得来的消息。

B、内部情形。二军团自攻下监城后，连得几次胜利，枪支增加到五千余，并有迫击炮五架，很能作用。沙市没有攻下，没有炮也是原因之一。惟士兵训练太差，斗争力量仍不甚强，只能打几个冲锋，没有持久作战的能力。好在几次胜利之下，士兵的勇气还好。其中党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够，这是因政治工作人员太少，而红军没有休息、训练的时间所致。改组派在红军中，尤其是六军有相当的活动，幸而破坏[获]得快，还未酿出严重事变。

(二) 苏维埃区域的军事组织，过去鄂西的党机械的执行扩大红军的策略，都把地方一切武装集中到红军中来，以致赤色区域没有保障，敌人少数武装都能到赤区清乡。红军向外发展，而赤区组织又发生动摇，至攻下监城后才根据长江局颁发的红色军事组织大纲，讨论配合鄂西实际情形，乃决定各种军事组织。

A、赤色警卫队：现在已正式成立了十个大队，因各区太宽，总队部指挥不便，乃又决定成立两个指挥部，以董朗为江左军指挥，以林丹为江右军指挥，合计枪支不过七百余支，人数将近二千，惟子弹非常缺乏，以致斗争情绪虽然高涨，而不能与敌人正式作战，尤其不能与坚强的敌人作战。不过江右军子弹稍为充足（平均每枪有四、五排）以此还能在斗争中得到发展。

B、赤色教导军：现在各县尚未完全编好，不过正在着手进行，联政府军委会办一干部大队，准于十二月一日开学，训练时间两个月，教育计划是按实际的需要，以土枪、土炮、梭标、大刀等为主要内容。比如大刀、梭标是聘国×教练来训练的，而把他内部科目科学化，使学生于最短期间得到实际本事。又如土大炮则用科学方法改造之，使每架炮能配三个罐，每连共附炮六门，每排二门，即一排炮兵只有一班有炮二门，每架以六个武士负责，其余两班则用梭标、大刀掩护大炮前进。如距敌稍远，可先用炮击，而梭标、大刀埋伏大炮之左右，候敌人冲锋接近时，则左右出伏兵袭击之，而大炮则停止射击。并只留少数人负炮及搬运责任。其余只由正面出射击。在此混战中间，我们若于大刀、梭标有点训练，必能击溃敌人。若逼敌人后退，又可以大炮击之，这些办法我们悉加研究，务使能够运用于我们的要求，但将来的成绩怎样，以后再行报告。

C、赤色守备队：现在因赤色区域日益扩大，守卫工作确实松懈，在最近敌人又乘红军向外游击，已加紧其进攻赤区工作，许多城市都已失去，许多同志对于守备工作已经相当注意了。

D、少年先锋队：关于少年先锋队成份问题，颇值得我们注意，若是不准富农参加，便是拒绝无知的儿童来革命，如准许富农参加，又恐其占取领导权。我们现在决定准许富农子弟参加少先队，但不得参加指导机关，是否有当，请指示。现在赤区都有少先队的组织，青年男女都参加，不过训练工作不够，感觉干部缺乏，团特委准备办一训练班，养成小儿队、童子团干部人材。

(三) 军校：关于军校情形，前已报告过了，现在军校第一期，已有学生三百余名，已移至石首之焦山河开办，准于十二月一日开学，不过请求中央供给我们的训练教材×××曾派来，即使介绍来的军事人材，都是介绍到二军团的，我们若是留几个人，都要遭红军负责人的批评。说我们是扣留，

我们觉得军校工作非常重要，请中央无论如何要派几个军事、政治人员来校担任训练。

刘鸣先同志现任军校校长，他不能调，而且交通不便，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人，又派回武汉去，岂不往返吗？所以特委决定他在此办学校。

（四）兵运：自今年兵运训练班公开训练，为反革命破坏后，我们已知道这种训练的方式错了。现在准备×忠实的同志及群众单独训练，秘密派到各地去做兵运，但现在还没有成绩可以报告。

、经济政策

（一）总的原则

A、赤区经济务须与白区流通，封锁是自杀政策。

B、正允与中小商人正当营业，对中小商人不要过于苛刻的限制，但遇奸商故意提高物价，扰乱经济秩序，苏维埃必须严肃处理之。

C、×产品的输出与工业品的输入，苏维埃不要企图垄断，也不要幻想赤区的工业品由苏维埃以全力来供给，这就是说，经济流通与赤区工业品的供给，必须以商人做中坚，苏维埃只是调剂作用。

D、政府的经济收入，应为公益费，支出应有精密的系统计划。

（二）具体的决议

E、公益费必须开始征收，事前应特别加紧宣传工作，使人民自动的缴纳，视缴费为应有的义务，征收标准如下：

（甲）农民以田为标准，按田之肥瘠分为上下两等，并须规定尺亩，每年秋收后征收，上等田十亩以上征收百分之十（十亩以下不收），十五亩以上收百分之十五，四十亩以上抽百分之三十。下等田十五亩以上收百分之十（十五亩以下不收），三十五亩以上抽百分之十五，六十亩以上抽百分之三十。

（乙）商人以资本计算，二百元起码收费，二百元以下不收，二百元资本以上者，抽百分之五，五百元以上者抽百分之十，一千元以上者抽百分之十五，五千元以上者抽百分之二十，一万元以上者抽百分之二十五，五万元以上者抽百分之三十，拾万元以上者抽百分之四十，每年分五、八、十二[月]三次交纳。

F、由联县政府建立农民银行，发行纸币，调济赤色区域经济，办理农民储蓄借贷，但禁止滥发纸币，各县已发出各种纸币，设法收回，统用鄂西农民银行。同时银行建立单独系统，在联县政府监督与保护之下，湘鄂西设总行，在各县设分行，在各区或市设支行或汇兑所。下级银行绝对受上级银行的支配，政府不得在银行提款，万不得已时，也只能借后加息偿还。各级银行必须办理汇兑、储蓄各事。

G、苏维埃马上组织合作社，尤其要鼓动群众自动组织合作社，调济赤区工业品的恐慌。因此，合作社一定要购买日常用品，尤应以乡为单位的普遍建立，并正式建立其系统的组织（组织法另定之）。

H、现在赤区内农民有粮食无处卖，油盐布匹与日常用品无处买，这现象必须很快的转变过来。

（甲）赤区内无论粮盐物，绝对允许流通全苏维埃区域。

（乙）赤区内无论粮食货物，一概不能规定价格。如奸商抖抬物价，苏维埃政府可以严肃处理它。

（丙）粮食绝对允许出口。

(丁) 谷米马上调查，能供给赤区群众及红军有余的允许出口。

(戊) 行可不取消，已取消者可用别的名义使之营业。

(己) 许多白区商人来赤区卖货，绝对禁止“见钱眼花”的没收，但商人一来，必须到政府[报]告其资本，政府按资去征收其公益费，发给护照，公益费五百起码，五百元以下的不收。

1. 五百元资本以上者抽百分之五。

2. 五千元以上者抽百分之七点五。

3. 一万元资本以上者抽百分之十。

4. 十万元以上者抽百分之二十。

(庚) 政府于沿江各重要市镇(如监利、藕池、郝穴)设货物登记处，专门登记赤区××产品数目、白区所运来工业品数目，并按月统计报告联县政府。登记处绝对不能收卖。

(辛) 白区商人到赤区购货，所带之现洋一律到农民银行换纸币购货。

(壬) 白区商人运货出口时，可令其运必需品进来，按价购买，打破赤区运货进口之困[难]。

、以后各级政府按月须有预算与决算，呈报上级政府批准，禁止浪费，尤其要向群众[公]开。

J、党除向下级提取党费外，绝对不向下级提款，办公费用可向同级政府领取。

K、附合作社条例：

1. 现时革命日益高涨，赤色区域日益扩大，反革命以经济加紧封锁我们，自不待言。在苏维埃下的工农群众及一切劳动群众，只在湘鄂西一带不下几十百千万，为冲破反革命经[济]封锁及解除劳苦革命群众日常食用受缺乏的痛苦起见，遂有合作社的组织。

2. 合作社分消费与生产两种，以经济和人材种种关系，暂时决定先设消费合作[社]，稍带[待]即设生产合作社。

3. 现时合作社管理组织，于各乡市设合作社，于各区设办事处，于各县设管理局，于湘鄂西设总管理局(详细组织另定之)。

4. 合作社得×苏维埃保护和监督之下征收工农及一切革命群众为社员。

5. 凡社员入社时，只征收入社金、常年金，由总管理处发给社员证书。

6. 入社、出社均系绝对自由，入社时交纳社金，出社时全数退还，但无利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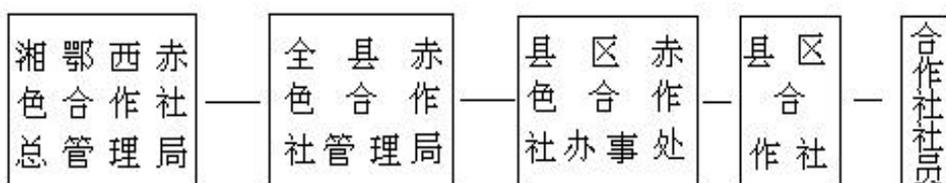
7. 凡合作社社员持有社证者，到合作社购物时，得享受一切优待条件，如发售货品首先尽社员购买，次则及于非社员。非社员购货时价则另定。

8. 凡社员有监督，不得将社证转假他人义务。

9. 合作社可由革命群众自由组织，请合作社总管理处批准编入组织以内，方得进行营业。

10. 本说明书和简章自施行日起有效。

附组织图：



、青年工作

(一)最近湘鄂西团在转变基[础]上及发展组织上均有很大的进步，不过在青年群众中的领导还是非常薄弱。成份：工人五分之一，富农分子占少数。团的主要弱点：城市工作没有大的进展，干部缺乏得厉害，团特委原是九人，因工作的变动与牺牲，现只六人了，指导上实不健全。现团决定在广[暴]节举行第二次全区代表大会，改造特委及重新布置工作，届时团的中央或湖北省委务须派人来参加。又团特委是否亦应改称湘鄂西特委，请明示。

(二)党团关系确已日益改善，不过在下级尚有取消团的现象。最近党团特委联名通告，建立党团正确关系。

(三)青年群众组织总共约八、九万人，各种组织的人数和成份尚无分别统计。团的计划，在广暴前少先队要发展到三十万，童团二十万。

、妇女工作

妇女工作停顿在封建势力下面，少数地方有相当多数的妇女参加少先队、童团或组织于贫妇协会之中，其余则仅有少数先进的妇女自愿的参加革命工作。妇女不是一般的组织起来，有些地方更因纠正过去妇女

工作方式之错误，迁就封建思想而走入取消妇女运动方面去，致特委妇女尽量编入赤色教导队、工农队（湘鄂西的农村军事组织）、少先队、童子团内，城市贫妇尽量组织于贫民协会或贫妇协会内，使一般妇女有组织的参加革命工作。

、反帝及互济会工作

赤色区域大半有反帝及互济会组织，但只是空心招牌，没有经常的反帝工作。

互济会组织较为普遍，但因工作方式不好（不懂互济会作用，只是挨户上册勒交会费或捐款），以致脱离群众，引起群众犯恨。最近已极力纠正这些错误，并且拟不日成立湘鄂西互济总会，现在正筹备中。

、特委对中央意见

(一)现有特委系与前委合并组织而成，在二军团中的特委七人不能出席特委会议，名虽特委实则前委。这样，特委无法召集全体会议（且连常会亦不能召集，因中夏与云卿在红军中），前委并非正式具有形成指导工作，两边牵扯，于工作进行上，除[诸]多妨碍，究竟特委××？乞示。

(二)全国苏维埃代表×××前委十一月七日，至今尚未得到中央关于选派代表之通知，一说大会展期至广暴纪念节举行，究竟怎样，亦希答复。

(三)洪溯军校教官实在缺乏，应请速派得力教官数人前来。

(四)特委与中央交通太不灵便，我们拟办无线电台，前数日已拨款到长江局，转请代购，以便建立中央与我们之灵便交通。

(五)我们最近未得着中央的指示，连一般的通告都未得到，务<请>经常送指示通告来，以便湘鄂西工作得××正确的路线上进行。

以上各事，前已报告，恐未达到，特再告。

湘鄂西特委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注释

原件抄者注“以下直至土地问题，原稿不清”。

此处损字十个以上。

优待红军与扩大红军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周逸群

红军是由群众斗争走到武装冲突而产生出来的，从红军的本身来说，自然是为他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在奋斗的过程中所受的一切肉体上的痛苦都是自愿的，本不希望什么优待，不过在一般群众看不过意，常常自动的替红军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因此，一般红军战士，都乐于到前线上拼命，好象不打胜仗就对不住群众似的，数年来湘鄂西的游击队，由不断的斗争生长而成为红军。假使不是群众自动的优待红军，则红军的扩大决没有这样的迅速。而且红军不得到群众的优待，即[是]红军脱离群众的表现，这不是红军的扩大问题，而是红军的生存问题。

现在湘鄂西一般群众，都知道红军是我们自己阶级的军队，优待红军是群众乐于来干的，所以各地都有拥护红军委员会的组织，不过因执行上没有很好的计划，以致有两个不好的现象：

第一，各级政府起初对于请假休息归队的战士，都是句照例发给伙食，红军里内因经济的困难，就在假条上写“仰沿途各级政府发给伙食”，不知人少政府还有办法一应付，人多就没有办法了，于是政府在事实就感觉困难，但又不敢不应付，于是由自动的优待红军，转变而为勉强的性质，及后红军日益扩大，红军战士中难免没有不良的成份，拿着红军的假条（红军假条没有经过高级机关批准，所以假条很多）作为饭票，而且一天要跑几个乡政府，甚至有在组织上闹几个月还不肯归队的，一天不做事有饭吃，又拿红军战士的招牌到处干混，别人不敢干涉他的行动，成了苏维埃的特殊阶级，这样谁个不想请假到组织上来干混呢？所以最近数月来，红军一到了赤区，请假装病的非常之多，新战士虽然增加，而老战士大半退武[伍]（不经正当手续的退武[伍]），结果，政府虽征调了不少的志愿兵，而红军不能扩大，更谈不上什么铁的红军，因为者战士都变为组织上的寄生虫，红军本身缺乏有经验的战士，如何能成为铁的红军呢？这样的优待红军，结果不惟不能扩大红军，反而使红军日渐削弱下去，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啊！

第二，在攻下监城以后，联县政府已发现了上述这一危机，于是政府负责人与红军负责人商议，以后战士请假必须有师长以上官长盖章，否则组织上恕不招待。又为减轻乡政府的负担，特规定假条上不得写明“仰沿途政府发给伙食”的字样。由县政府与联县政府及后防办事处在交通适中之地成立几个红军招待处，以为收容红军战士之所。殊不知这样一来，各县政府执行不充分（至今各县还很少有红军招待处的建立，仅联县政府的红军招待处的工作，特别紧张），而区乡政府又走到极端，一见红军战士便觉讨厌，不愿与之多谈的神气表现得非常十足，而一种骄傲怠慢的样子，好象是报复当年之恨似的。于是又惹起红军对苏维埃的不满，他们都说：苏维埃代表大会虽有优待红军的条例，都是欺骗人的鬼话。

同志们！红军的发展对于革命的前途，有很重大的关系，无论何人，不应当忽视这一问题。要知道扩大红军是苏维埃主要任务之一，但要扩大红军，必须使群众踊跃参加。苏联当国内战争剧烈的时候，正值国内大饥荒，缺乏面包，国外帝国主义实行其经济封锁政策，经济的恐慌更甚于现在湘鄂西赤色区域，当时一般群众每天黑面包都吃不饱，红军战士则每天吃的白面包还有剩余，一般群众到合作社买不着工业品，而红军战士则可买双份，至于优

待红军的家属和抚恤伤亡的战士，那更是无微不至。所以苏维埃的群众都认为当红军是一种特权，感觉不到丝毫的痛苦。俄国红军之易于扩大，而战斗力量又特别坚强，其主要原因，就是能够充分执行优待红军的策略。

同志们！我们对于优待红军的决议，执行的程度怎样呢？这可不要我多举事实来证明，只拿对于伤病战士来说，联县政府几次通告，要每县弹棉絮一百床，每区做鞋一百双，送到医院，并派代表到医院慰问，这难道又是什么办不到的事情！但是各县均未执行，至今医院没有得到一床被絮，伤病战士没有穿过一双鞋。可以说，联县政府几次的通告，等于没有！

同志们！联县政府最近又有关于优待红军的具体办法颁布，我感觉到假使同志们的观念不纠正过来，就是下一万次通告，也不过害印刷科多吃点亏罢了！

一九三 年十一月十九日于调关

中共中央给长江局转中夏同志并湘鄂西特委的指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长江局转中夏同志并湘鄂西特委：

中夏同志五次报告及特委会通过的政治土地问题两决议案均收到。关于整个政治形势，党的目前紧急任务，苏维埃区域工作计划及红军总的战略有中央最近各种文件可做根据，尤其重要的是中央三次全体会议的一切文件(国际决议案包括在内)，苏维埃的一切通令法案及选举条例，中央最近几次通告，苏区工作计划及红军编制条例政治委员条例政治工作条例党的组织法等等，这些文件，已先后送给你们，一切原则上策略上的规定，对你们区域都完全有效。现在只就你们报告中一些新的或特殊的事实加以单独的指示如下：

第一，目前的政治局势及党的紧急任务：依据国际的指示及三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我们应认清中国革命新高涨在全国总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基础上，是日益发展着的。目前军阀大混战虽在黄河流域有暂时的停止与休息，但造成军阀混战的根本原因，却丝毫没有减弱，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的掠夺和侵略却更加强了，他们中间的矛盾更尖锐了。统治阶级欺骗群众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无法解决。在这样基础上推动着的革命新高涨，自然不会减弱，尤其是日益开展着的农民战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已部分的开始了革命的国内战争，来进行消灭军阀战争的战斗，这种情形，正是革命斗争更加深入而扩大了，所以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联合一致的向红军苏维埃区域反攻，特别是当他们混战暂时休息的当儿，他们能从前线上调回一些军队，便企图实现他们的“围剿”计划，自然在他们的这一计划中，还存在着许多弱点，尤其是因为他们已在开始准备下一次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更无法将所有军队都调来进攻红色区域，但无论如何，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对于革命总是主要的危险。我们应认清这一主要危险，同时也应坚信：在革命战争事业已开始的湘鄂赣等省区，只要我们集中广大的红军，发动苏区最广泛的群众自卫，特别加紧敌人的士兵中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配合着全国敌人统治区域的城市工人斗争，农民的骚动，尤其是邻近进攻红军区域的农民游击战争，交通运输工人的罢工反抗以及敌人兵士的倒戈投到红军中来，这样配合起来扩大革命战争，则必能冲破敌人的“围剿”，必能领导革命向更高的阶段发展，首先争取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在现在全国革命新高涨的基础上，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已存在了)。特委通告第一号还因袭过去中央将高潮当为直接武装暴动形势的解释，应当改正过来，不然，将要等到全国有直接武装暴动形势(即过去所谓高潮的意思)时，才能有实现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可能，这不仅理论上讲不通，实际上便要取消了目前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并将无以解释长沙事件。因此我们政治决议案以“中国革命虽然走向平衡发展”一句开始来说明武汉为中心的附近几个省区的革命条件更为成熟些，仍然犯有中央七十号通告以来未着重说明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这将在形势的估量上与对全国策略的了解上要发生不正确的观点，望依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加以纠正。所以党目前紧急任务，便要在三中全会决定的中心任务之下，特别着重于发展革命斗争，集合革命力量，加强红军领导，扩大革命战争以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进攻红军与压迫革命。紧急的工作便是：在苏维埃区域，首先彻底实行重新分配土地，以一切工农劳动群众

武装起来保卫自己政权的口号来动员百万千万的群众，以加强红军的领导，与集中统一红军的指挥来发展革命战争，以建立与改选各级苏维埃政权来发动群众巩固后方，以发展游击战争与加紧群众工作来推广苏维埃的疆域，尤其要以派遣得力干部特别是派遣从敌人军队中过来的士兵回到敌人军队中去工作以瓦解敌人军队；在敌人统治的区域，要以发动工人革命斗争加紧反帝运动，加强敌人的士兵中的工作，要加紧发动和领导农民的游击战争和一切骚动以妨害敌人的进攻，而造成全国工农劳动群众总示威的反抗局势。这样，也就是在实际斗争上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一步（你们政治决议案上说到非苏维埃区域的中心任务，仅以准备武装暴动一语来代表是不够的，而且还袭用过去的说法“不仅是政治上的准备，而应是就应加紧组织上与技术上的准备”，这在目前情形看来，在策略方针上，这是过分估量的冒险主义错误，却在事实 and 实际工作上说来，过去不仅组织上技术上没有准备，便连政治的准备也还差得远，故现在还不是偏重问题，而是要加紧积极从实际斗争中去准备的问题，在苏区的中心任务上，你们也未提到加强红军与深入土地革命问题。）

配合这两方面任务的，就是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运动与加强无产阶级对苏区及红军的领导问题。具体的办法，现在全党正在动员进行选举苏维埃代表运动，这不仅各个苏区要选派代表到中央区去赴会，尤其重要的是要将这一临时中央政权的建立，关系到全国工农劳动群众

的革命斗争，发动他们起来直接参加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运动，为使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领导的加强，中央已决定派遣党的得力干部去加强各苏区党及军事的领导，吸引与宣传失业工人自愿到红军中去，派遣党及工会中得力的工人干部去担任苏维埃政权中红军中的主要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散乱的苏区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打成一片而得到巩固的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使苏维埃政权得到全国工农劳动群众的拥护。

第二，在目前局势下湘鄂西党的中心任务：在目前政治局势的分析下，湘鄂西党所担当的中心任务，无疑的是党要在苏区紧急执行的任务。在这里我们更应特别认清湘鄂西苏维埃区域过去所具有的弱点与党所做的错误是什么？除去你们决议案中及中夏同志报告中所指的弱点与错误外，我们认为还必须指出工人运动的缺乏以致特别影响到无产阶级在鄂西苏区的领导，苏维埃政权过去还不是真正的工农劳动群众自己的政权以致特别影响到赤白区域群众的对立与已成立的苏区的反水，还有地方武装自卫没有建立以致只有专门依靠红军防守，造成红军保守的地方观念，而不能担当起大规模的革命战争的任务。这几个错误应当与你们所重视的放弃城市的乡村割据观念，土地没有重新分配，富农中农不加分别一齐反对，经济政策不当，苏维埃工作人员腐化等等错误同居重要地位，而尤其重要的是红军的加强问题，你们在决议案上未着重指出，这也是一个缺点。自然，你们在实际工作上注意到了，但必须唤起湘鄂西全党的注意，才能更有力量。总这一切，你们的中心任务便应是：首先要加强与集中红军的领导和训练，使他能担当起目前湘鄂西革命，战争开始发展的使命。要以土地革命的利益真正落到乡村中革命群众贫农中农的身上，要赞助雇农自己分配土地的要求，要发展雇农苦力反对雇主——富农及一切剥削者的阶级斗争，要以实现工人八小时工作制及改良工人生活来发动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实际的去建立和参加工农兵会议（苏维

埃)的政权。且这一政权的建立,要成为一种运动来扩大和推动苏维埃政权而向外发展。要以发展工人对资本家雇农贫农对富农的斗争,发展一切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斗争,来巩固苏区的群众基础与加强革命战争的斗争力量,要确定有计划的经济政策财政方针来流通苏区内外的群众工作工会贫农团的组织工作来肃清苏区内部的一切反动势力与打破红白乡村的界限。要特别加紧党的工人雇农贫农中的发展,要坚决的引进斗争的干部参加指导机关实际工作,要派最得力最有威信的党员去做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要实行在革命战争中的军事纪律,尤其要反对党内一切不正确观念,主要的是右倾以及腐化官僚主义现象,这样来加紧党的领导与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在思想上,要加紧党内党外的宣传教育工作,要从思想上,同时从组织上肃清一切改组派第三党尤其是取消派的活动与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特别是富农路线与流氓意识,要特别努力于派遣工农干部,最好是从敌人军队中过来的士兵群众到敌人军队中去工作,以瓦解敌人的力量,引导敌人士兵到革命方面来。这一工作湘鄂西各级党部过去完全忽视,现在必须刻不容缓的加紧起来。你们必须完全实现上述各项任务,你们才是真真来巩固苏区根据地,真正来扩大革命战争,而与整个苏维埃运动求得切实的配合。

第三,红军的总战略及其发展方面:中夏到后,前委几次对于红军作战方向的决定和改变,一般说来是对的。只是最近你们在南华安的作战方向,确定以夺取常德为中心,却渐渐离开了第二集团军目前应以扰乱武长路威迫武汉为中心任务。来配合一三两集团军在湘赣作战的行动。最近消息你们已发展至津澧,无疑的你们要向常德进攻,假使你们是以少数力量向常德方向游击,而以主力在长江北岸实行威迫武汉的计划,则这一战略便是正确的了。因为我们所得另一消息,谢彬的一团在汉川附近为红军缴械且伤其团长,此事果确,似你们的主力还未完全南下,总之,你们现在主力必须用之干扰武长路,与威迫武汉的中心任务上同时向常德沙市等方面的游击,是必要的,一定要压迫敌人完全居于退守地位,使他们困守城市,使他们经过我们工作的结果而发生内变;这于我们是最有利的策略。你们扩大苏区到十县的范围,这仅是第一步,现在已不够了。现在必须北向天门汉川沙洋发展,南向津澧石门扩大,尤其重要的是必须由公安西向将松滋枝江宜都长阳五峰完全占领起来,一直打通到施阳与上下川东;这是你们最可靠的后方,必须有计划的来发展。自然这不是目前便要你们以二六军的主力向西发展,且这些地方敌人的力量亦还不甚集中,但你们必须以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来逐渐扩大苏区的疆土,必须要以这一工作成为湘鄂西经常而有系统的工作,要按

日计功的来求这一计划的实现。向北发展要建立在与鄂北打通与鄂东北京汉线策应的观点上;这里中央要批评你们上次仙桃镇的夺取还缺少发动群众武装自卫的工作,以致红军一退,群众不能以游击战术来骚扰敌人,仍然被敌人宰割。固然,这些地方北极会的猖獗,不容许我们工作一下子便收大效,但你们除掉红军暴动队扩大宣传外,实际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尤其是武装群众的工作,争取受北极会欺骗的群众做得还是很少这要你们更加注意的。南向发展,你们必须以动员群众为主要工作湘西群众尤其是常澧一带群众过去党是有相当工作基础的,你们在这些地方,是要以派遣工农干部首先去做秘密工作,来发动群众为先决条件,这样,在军事胜利的时候,才更有力量来巩固这一胜利。这些发动群众是必要的,然无论如何不能因此发展动摇已得胜利的沔阳监利潜江公安石首以及长江沿岸的中心区域,更不能减

弱目前以二六军为主要部队对于骚扰武长路威迫武汉的中心任务，以牵制敌人进攻一三集团军的阵地。同时为着敌人对于鄂西也采取包围计划的时候，你们必须集中红军力量，发动最广泛的群众采用游击战术疲惫敌人的主力，四处袭击敌人，以骚扰敌人后方，然后再以我们的主力击破敌人的一方，截断敌人的联系，而给以各个击破。在这种战斗的过程中一刻也不应该忽视的是要在敌人军队的内外以及沿途经过的地域，实行最广泛最有力的对敌人士兵之宣传鼓动工作，动摇他们到红军中来，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绝大的可能的优势，给敌人以最有力的迎头痛击，这是我们战胜敌人最有效的方法，而为你们所未曾重视的第一等的工作，你们从现在起更应急起直追的去进行。

第九[四]，红军问题及群众武装组织：关于红军的改造，你们才开始进行，苏区工作计划中所提出的办法与编制中的规定，在原则上你们必须求得全部的实现。自然这一改造，是要在斗争中在行动中去逐渐实现，不是要你们停止作战或是机械的一下子便做到的。二六军过去的关系不好，必须从政治上组织上求得解决，必要使二六军自己认识本身的弱点与错误，必要在巩固与加强二六军的观点上来相互批评。只有这样，才能如国际所希望有造成红色铁军的可能。群众的武装组织，你们必须依照苏区工作计划所规定，将一切工农劳动群众都动员起来，编制在赤卫队或赤色警备队的组织之内，而成为地方的武装；在这里，再依照县区来组织红军补充军（即后备军），准备随时可补充到红军中去。（红军补充军一般的原则是已经属于红军机关指挥之下的武装训练组织），此外，少年先锋队亦必须普遍的组织起来，予以军事的训练。这一切地方武装组织，是不能离开生产的，只有少数的为着需要如城市的赤色警卫队部分的充当“民警”乡村的赤卫队部分的担任警戒部署，是要暂时脱离生产的，所以要试行轮班制度。在作战的区域，赤卫队赤色警卫队全部都须经过该县苏维埃赤卫部而调到（少年先锋队则经过其本地指挥机关）红军乃至军委的指挥之下，最主要的是用来会同红军补充军实行游击战术以骚扰敌人行动与阻碍敌人进兵。目前的湘鄂西，这一任务必须立即实现起来。尤其是洪湖附近的几县，更要能如平浏一样，即使红军不在这里，地方群众的武装战斗也是能使敌人的军队不敢深入。这是苏区巩固后防巩固阵地的最根本工作之一！次之便是你们在俘虏与敌人士兵中的工作太没有了。你们上次从仙桃镇撤兵时，共俘虏了二百多名士兵，但未提到在他们中间的工作如何。假使在他们中间能有很好的宣传教育工作，放他们一些得力干部回去，必能在其他敌人部队中发生极大影响。要知红军现在与敌人大部队作战，主要的要能做到敌人部队的瓦解。你们在这一工作上，必须特别注意。

你们对汉川独立师的处置，中央是同意的，只是你们必须帮助汉川游击队的发展，来深入土地革命，扩大苏维埃区域。对于二军中吸鸦片的分子，单纯以防止甚至以枪毙的办法来解决是不妥的。他们可采用第五军的办法将一些瘾大而不能禁掉的人首先编到非战斗兵的队里去，如当伙夫输送兵等等；然后再逐渐淘汰出营。总之能禁的则禁，不能禁的则须设法淘汰，便以威令来禁，即使一时收效，还是要减弱战斗力的。同时，一般禁烟，在苏维埃区域应以有系统的教育宣传运动为主要办法，以及在“革命舆论”上的“贴黑榜”等的方法来鼓励戒烟，不应用军阀政府的高压手段，因为共产主义者应当认鸦片是一种“社会病”。关于飞机投弹的预防法，你们须预先告诉农民群众，否则会引起群众过分的恐慌，而有害于军事上防御和进攻的行动。

红军中党的工作，你们须遵照规定办理。红军之中各级党部的书记，原非要政治委员兼任，政治委员得参加于同级的党部会议，且有权撤换党的书记或解散党的委员会，其职权正如中夏来信所说。党委员会应设在政治部下，有时政治部主任可兼党委书记。党委名称应依编制统一起来。

苏维埃区域的守备问题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周逸群

我们敢肯定的说，现在的湘鄂西，甚至全中国，无论那一处的苏维埃区域，都不是“太平世界”，因为现在的苏维埃还是由斗争中力求扩大的性质，时时刻刻都是采取进攻的策略，那末，在这样阶级斗争尖锐的时代，无论怎样愚笨的敌人，自然也是从各方面企图向赤区进攻的。所以，若是只见着赤色区域的日益扩大，便以为革命成功了，忽视甚至取消守备工作，这无疑义的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在最近半月内，虽然革命势力仍然是向前发展的形势，可是何键为要恢复他的米袋子（南华安是湖南产米之区），不得不抽出一部分兵力进驻南华，川军为要占驻宜沙地盘，尤其沙市地盘，不得不趁此时机，派一部分兵力到江陵赤区屠杀，表明他是反共有功之臣，借口拒绝其他军阀来抢夺宜沙地盘，赖星辉是客无可归的老军阀，虽然受了红军严重的打击，但未完全消灭，所以红军进攻津澧的时候，赖星辉的川军又回到公安县城，潜江、天门等县的常匪土匪，亦企图向我赤区进攻，因此在最近半月内，南、华、潜、公四个县城以及郝穴等重要城市镇相继失守、告急、请援的电报，如雪片飞来，几乎动摇了全湘鄂西的赤色政权。

其实，像这样清乡，这样的屠杀政策，本是国民党对于工农群众的家常便饭，不算什么稀奇的事，不过在这几次敌人向赤区进攻的当中，各县负责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以致可耻的事变。

第一，不坚决肃清内部的反动分子，如华容发现敌人，城内外的梭标哨便要杀革命领袖，天门的游击队隐藏有土匪不可靠的成份，以致发生杀负责人拖枪逃跑的事实。

第二，忽视侦探工作和哨线，如华容、南县、郝穴的失守，敌人已临城下尚不知觉，以致仓皇出走，损失甚大（不仅损失金钱，甚至连印信文件都来不及拿走）。潜江因为没有注意哨线，以致被敌人马队冲来，六大队的枪支损失大半。

第三，没有军事上的守备工作，各县都没有依照联县政府所颁布的红色军事组织去切实执行，以致发现敌人之后，抵抗的能力非常薄弱。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不仅完成湘鄂西的暴动，而且应当从巩固的向前发展，与湘鄂赣各地的苏维埃区域取得联系，配合起来，争取武汉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建立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政权。为了要实行这一任务起见，必须注意苏维埃区域的守备问题。

自然，我们所谓苏维埃区域的守备问题，绝对不是地方主义和保守观念，因为两个阶级属性不同的政权，绝对不能长久并存的。一方面积极向敌人进攻，继续不断的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时时刻刻加强我们守备工作，防御敌人的蹶后袭击。

检阅过去和现在苏维埃区域的守备工作，确实有不少的缺点。因为赤色区域的扩大，各地哨线多有自动的撤消，这固然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各地一般的哨线，简直成了形式主义，这更是重大的缺点。一般的说来，各地哨线有以下的缺点：

没有警号的设备，以致发现敌人，报告不及，等到指挥机关接到报告时，敌人已到面前了。

各处哨线都是待行人走到面前了，才开始盘问，设遇敌人狡猾的化装来袭击，便可以打我们的哨线，捉拿放哨线的同志，而同样的指导机关得不到哨线上的警报。

各地哨线盘查行人，都是表面的敷衍文章，尤其是对于红军，对带武器的人，不敢盘查。

有些地方完全是年幼无知的小孩或残废不堪的老年人担任放哨，试问如何能达到放哨的任务。

有些地方哨位太密，有时放哨的人大多，这足以疲劳群众。

要想挽救以上这些缺点，必须依照联县政府的军事决议案，各区组织赤色守备大队，大队长以区政府之军事委员兼任之。各乡成立一个中队，大队长应当督促各中队经常受军事和政治的训练。各大队必须办到：

配置哨线于政治军事重要地点，防御敌人之袭击。放哨的同志必须明了步哨的任务和发现敌情的处置方法。经常是战斗的戒备，尤其要注意生人的往来。各大队长与中队[长]应当经常查哨，即在哨线实地纠正放哨同志的错误，同时加以详细的解释，使之明了放哨的任务。赤色守备队应当经常野外演习，尤其是初次成立，应当施以相当的军事教育。各哨位应当有警号的规定（日间鸣炮，晚间举火）。各重要哨位，应当有马哨的设备。各重要地点，应当安置土炮或地雷。最重要地点，应当建筑工事，以作抵抗线。各区应成立炮兵队，平时训练，要注意实际的演习。（11）加紧自刃战的学习，务要接近敌人以旧式武装夺取新式武装。（12）赤色守备大队应有工兵队的组织，以作破坏桥梁及安置地雷、建筑工事之用。

十一月二十一日

（载于第五期《湘鄂西苏维埃》）

注释

此处约损缺八个字。

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政治局讨论过国际来信之后，决定：

(一) 完全同意国际执委的这一封信。

(二) 认为：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之上也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三中全会没有把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斯基路线彻底的揭发出来，亦还没有对于立三同志路线的影响占着优势的时期里面政治局的工作，给以正确的估量。——立三同志的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掩盖对于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的机会主义消极态度，而在实行上领导党走上盲动冒险主义的道路。

(三) 认为：这种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在过去，这种调和态度帮助了立三同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使执行国际路线的主要任务，没有能彻底解决。

(四) 这种情形，就使三中全会对于立三同志的各个反对列宁主义的论调，没有受到必须的充分的批评。例如对于立三同志对于策略转变问题的半托洛斯基主义的理论，只批评他是机械的。

(五) 认为必须根据三中全会的议决案，根据政治局的本次决议，根据国际执委的来信，对于全党党员解释立三同志半托洛斯基路线的实质，解释这种路线是和共产国际路线互相对立的——公布上述的材料和特别发一告同志书。

(六) 认为现在要集中全力反对党内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和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这种情形——立三同志半托洛斯基主义理论的基础，现在“左倾”空谈的掩盖去掉之后，这种情形就特别的暴露出来。同时党应当加强反对托派的斗争，因为有些托派分子现在企图回到党内来加紧破坏的工作。

(七) 这次决议是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认为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反对露骨的机会主义的曲解的企图，——就是想把三中全会的议决案以及这次纠正立三同志的路线，解释成为改换党的路线——变成了退却的路线。同样，反对把三中全会和国际路线对立的企图。

(八) 立三同志以及赞成过他的同志已经承认错误，党的领导机关完全和共产国际执委同意，这些事实使政治局认为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这种“讨论”只能使党的力量离开不可迟缓的很重要的实际任务，因此决定：关于立三同志路线只限于解释工作（解释工作之中，仍旧是须要各同志的详细的讨论）。

(九) 认为团的三中全会在少共国际和党的领导之下已经一般的接受了国际的正确路线，同时，团的三中全会的决议之中，有些地方的措词是和少共国际来信不同的（对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彻底揭发，对于取消团的主张，没有认清是反对列宁主义的路线问题）。政治局认为团的中央必须把过去的错误路线，遵照着这次决议和少共国际来信彻底的纠正。

(十) 这次决议是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所以用通信方法询问所有的中央委员，是否同意，并且把这一决议报告国际执委。

注释

原文如此。

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在两个绝对不同的政权——一个是国民党的政权，它是代表豪绅资产阶级压迫工农阶级的；一个是苏维埃政权，它是代表工农阶级压迫豪绅资产阶级的。现时，它俩在对垒的当中，要拼个你死我活。当然，最后胜利定是代表工农阶级的苏维埃政权。

同志们！在这两个政权对垒的当中，国民党政府还是占据许多中心城市，他除掉用武力向我们进攻外，还有经济封锁，使我们感到极大的经济痛苦，如工业品昂贵，甚至没有等等。所以怎样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个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来说：

(一) 积极方面

1. 红军已成消灭敌人主要力量之一，我们时时刻刻不要忘记拥护红军的工作，并且每个革命群众尽可能的加入红军，使红军更加扩大起来。

2. 我们的教导军、守备队……都要赶快的严密的组织起来，按时下操，锻炼成为钢军，以备与敌人肉搏。

3. 我们要多多的制造新式大炮，并多多的制些火药出来。同时，我们的梭标，打得长长的，磨得快快的，拿在我们英勇奋斗的群众手里，跑到战线上，以一根梭标抵挡很多长枪。只要大家这样去做，马上可以攻下荆、沙，响应武汉暴动，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这时，还有什么经济封锁呢？！

(二) 消极方面

1. 希望每个革命群众深切了解苏维埃政府征收公益费的意义，到了实行征收时，都要踊跃输将，使政府得了大批收入，有统盘的计划来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2. 普遍与严密农民银行的组织，统一经济组织，实行集中现金与低利借贷，以发展苏维埃区域的工业和农业。

3. 组织合作社，大家都要踊跃加入，并且切实帮助其工作，使外面工业品源源的输入，内面农产品得以酌量运出。

消极的办法，也是要的，而且是必要的。但须在进行中打破保守观念，与积极办法配合起来，才能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载于第六期《湘鄂西苏维埃》)

监城失守与我们的教训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何谓右倾？就是对政治估量的不足，过信敌人的力量，轻视群众的力量是也。

“敌人已在实行整个清乡的计划呵！”“跑呀，敌人来了！”“跑到那里去？当然是要跑到赤区比较巩固的地方！”这些就是右倾者呼声。监城就在这种呼声中而失守了！

监府负责人听到敌人进攻监城的时候，即不犹豫的准备“跑”。既不将目前政治形势抬在面前估量一估量，敌人是否有实行整个清乡计划的可能？也不精细的客观的调查与估量敌人力量到底有好大（来攻监城之敌人，其实只有四、五百人之谱，则监府报告有一师人），更不号召和鼓动群众起来抵御，于是实行“有计划的退却”的计划而“跑”了。跑了以后，还认为毛家口不可守，一直跑到边近红湖的柳关。同时，他们在“跑”的当中——不计划的退却的当中，失掉许多用品，对于群众也没有顾及，到了现在，还有许多跑兵群众，正在寻找县政府计划工作。

本来，湘鄂西苏维埃区域，“太平”已久，对于守备工作，多未注意，一闻警耗，只有逃跑，已成一般的现象。所以近来郝穴、华城、南县、……相继失守，半由于此。我们对于监城失守，决不能认为是简单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大家要接受这一监城失守的教训：

（一）目前反动统治日益崩溃，蒋、阎战争暂告一段落，而蒋、张战争又在酝酿，整个清乡的计划，决不是在反革命的幻想当中就可以实现的。

（二）某方发现敌人，绝对不能以主观的恐怖心理来过于夸张敌人的力量，必须有精确的调查与客观的估量，而决定应付策略。

（三）我们的力量主要的是建筑在群众身上，只有我们平日军事准备工作做得完善，临时调动群众扼要以守，如监府在发现敌人的时候，马上号召群众起来，在沿江严密哨线，加紧侦探，更要架起大炮，相机轰炸，此时监城未见落在敌人之手。

（四）当然，我们在进攻或防守的时候，也要有退却的准备，到了非退却不可的时候，必须顾及群众，最好是掩护到群众中间。这样，不但是可以再图反攻，而且必须如此才能称苏维埃。

中共长江局军委办事处关于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 因为军阀战争“暂时休息”，进攻红军是目前主要危险，但因此又增加了党内右倾的客观条件，最近在红军中就在这一个基础之上发生了新的右倾倾向，如象鄂东北一军内部有人以为现在军阀战争停止了(？)，红军应当回避敌人进攻，这完全没有看清楚目前军阀战争的“暂时休息”，是为的准备新的战争，现在军阀关系正表现着一些新的结合，这是从事于新的战争的布置，就是他们在湘鄂赣进攻中也包括着许多矛盾(包括着分配与争夺湘鄂赣地盘的矛盾)。

(2) 但是进攻红军的确是目前主要危险，因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企图直接打击革命的中坚队伍，消灭革命的根据地，军阀战争新的布置是事实，但是目前进攻红军更是严重的事实，如果只看见军阀间的矛盾与新的军阀战争的准备，而忽视目前进攻红军的危险，真固然是错误的，但而简单认为军阀不打仗了(？)而得到红军战略战术上的回避逃跑的右倾结论是尤为危险，我们今天要反对忽视进攻红军危险的左倾，尤其是要集中火力反对逃跑的右倾危险，一定要知道目前革命形势是由群众部分的革命行动进行到总的进攻的过渡时机，红军已开始了国内战争的形式，如果把国内战争的形式退到游击战争的时代，那不是进步是退步，是极端右倾的机会主义。

(3) 所以目前红军的战略不是上山逃跑去做(搞)游击战争，而是如何消灭包围敌人，扩大革命战争，以便依据具体的政治军事条件，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

(4) 樟萍线的放弃与吉安退出，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一、三军团在政治路线上还没有转变，现在赣西南仍然是革命的根据地的神经中枢，只有这个神经中枢的巩固和发展，联系赣东北闽粤与湘鄂赣，才能取得占领湘鄂赣一省数省胜利的适当条件，就是说赣西南中心根据地巩固的发展，联系闽粤与湘鄂赣以便依据军事政治条件来进占南昌或长沙，各军行动配合的中心也在这里。

(5) 第三军团在新淦、新喻及袁州阵线锐缩后，在这次退守的事件中，我们觉察在物质及实力远弱于敌人的红军的作战，应尽可能的避免阵地战，而集中精锐于一、二主要战略作战点上，给敌人以突破猛攻的打击，一方面消灭他们某部主要的兵力，另一方面零乱并错落其阵线，使他们在客观上不得不撤回固守——这是红军的时代战术！在今天如果分散力量来应付敌人包围的各方面，这正中敌人包围的计划，压迫我们出(处)于退守之一途而配合不够，特别是十六军与五、八军联络击溃萍乡方面之敌，这是一个主要教训。

(6) 敌人进攻红军，以武汉、南昌为策动的中心，而武长路、南浔路、平汉路为其脉络，这一个形势就决定了红军配合的作用与行动。

(7) 目前的具体行动方针应该是这样的：

(8) 樟萍线失掉，使湘赣围攻红军的敌军，取得了完全的联络，基于以上的分析与教训与目前的形势，一、三集团军战略目的应当是集中精锐于主要作战点，给敌人以突击猛攻的打击，再卷樟萍线，切断湘赣敌人的联络，与湘鄂赣取得联络，以展开这一个局面，至于完成这一个战略计划的目的，应依据具体条件来决定。

(9) 在战略上依然要与十六军以及茶陵、攸县方面取得联络。

(10) 十六军目前进攻武长路，仅只是一个扰乱的作用，如果把作战目标放在樟萍线，这是有计划的作用，所以十六军今天应依据这一点，向这个方向出动，把平浏与赣西南联系起来，以展开这一新局面。(11) 二、六军在今天由陌(?) 澧县下常德、益阳攻长沙是不妥当的，这一个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 失掉鄂西根据地，客观上是一个游击作战的形式；(二) 削弱了整个配合的作用；(三) 如果鄂西根据地失掉，敌人从后方压迫，长沙又不可得，新的基础又不巩固，反而受制于敌人，自然要流为游击战争，如果要向湘西走，那更是错误，二、六军目前具体行动方针，应是巩固鄂西根据地，击溃向洪湖监利进攻的敌人，威胁武汉，用一部分游击队伍，扰乱武长路，破坏敌人进攻红军的联络，这对于配合作用是极大的。

(12) 鄂豫皖第一军，主力应时时威胁武汉，与整个形势配合起来，消灭当前的敌军，另一方面应在不是分散游击的原则下，以红军力量肃清内部，占领中心城市如黄麻宋埠等地，把鄂豫皖赤色区域巩固与联络起来，因为肃清内部在鄂豫皖大为重要。

(13) 鄂东之第十五军须迅速以黄梅广济为基础，发动忻春芹与园罗麻城以及黄冈等地工作，以第一军取得联系。

(14) 鄂东阳新大冶之红军须坚决向九江与德安发展，切断南浔，威迫九南两中心城市。

(15) 赣东北之第五军应以主要兵力威胁南昌，与 州方面红军取得联络。另以游击部队进占湖口，窥视南浔路，可引起敌人后方之不安。

(16) 沿长江与湘江的红军，常常用土炮射击航船等，这不是好的，本来沿江流域有许多的炮垒与土炮，可以供给我必要时的利用，在今天我们力量还不够足以袭击帝国主义，封锁长江，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我们的力量被破坏，(如帝国主义军队上岸破坏炮垒等) 另一方面对群众与海员的政治影响不好，尤其是烧船(如十六军)，我们现在应该保存并整理这些力量(如土炮炮垒等)，以给与总的任务配合，在目前应当在江边做许多宣传工作，扩大对海员以及旅客的政治影响。

对于外国教士牧师“绑票”与所谓“罚款”的办法，这一个政治影响也是极不好的，因为这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主要的应没收教堂土地，坚决准备并集聚广大群众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力量，在目前对外国教士们须向他们宣传与利用他们做宣传，在遵守苏维埃法律条件下，可允许外国教士侨居，允许商人营业。

长江局军委办事处

1930年11月28日

(载于第七期《湘鄂西苏维埃》)

论旧式武器的效力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周逸群

湘鄂西苏维埃区域最大危机，就是没有积极斗争力量，一遇敌人向赤区进攻，便实行其跑兵主义，没有计划怎样以群众的力量去消灭敌人，抵御敌人的进攻，甚至敌人还不敢来，因为我们自己先跑了，敌人不得不过来，此次监城的失守——说错了，敌人还在车湾，不是失守，是断送政权就可以证明。

湘鄂西苏维埃不是没有群众的拥护，而是我们同志不相信群众的武力，只依赖红军的枪杆，所以一遇敌人进攻，便向上级请求速调红军，甚至欺骗群众说：“红军要来了，你们不要害怕”。这是何等严重的错误！

我实在不解：为什么一般同志，尤其是农民同志，那样的迷信新式武器，难道说新式武器可以杀人，旧式武器就不能杀人吗？快枪、机关枪可以上火线，梭标、大刀就不能上火线吗？

事实决不是这样！神兵、白极会完全是旧式武装，为何能与军队作战？决不是“神”的关系，而是因为短兵相按时，新式武器不如旧式武器的效力。

假使作战完全可以用火力解决，那末，战术学上可以废除白刃战了。

现在各国兵器这样进步，效力既已增加，为什么还要注重白刃战呢？因为白刃战的目的，是在以白刃向敌冲锋而摧破之，以决战斗最后的胜负。设如遇着强硬的敌人，仅恃火战，难判雌雄，必须诉之于白刃战的最后裁判。

无论什么枪的刺刀，都不如大刀、梭标之便于使用，假使对于大刀、梭标加以整顿和训练，再利用地势和一切方法去接近敌人，必然可以用旧式武器缴敌人的新式武器。

况且我们除了刀矛之外，还可以运用土炮、土枪等旧式武器射击敌人，与梭标、大刀互相扶持，其效力必然更大，可以有把握的得到胜利。（载于第八期《湘鄂西苏维埃》）

苏维埃区域的经济问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 补天

中国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下，整个经济早已破产，加以迭遭军阀的惨祸和豪绅资产阶级的种种剥削，一般民脂民膏，都被榨取无余，呈现无可救药的状况。尤其是赤色区域，又受敌人铁桶般的封锁，以致湘鄂西甚至于全中国苏维埃区域的经济，群众经济桎梏万分，政府经济已到山穷水尽的前途。倘若仍然是打洋船、飞条子等方式来企图维持下去，谁也知道不是良策。

同志们，经济问题，在苏维埃区域无疑义的是主要的严重问题，若不设法具体解决，苏维埃区域不惟不能扩大，并且难以巩固。这样、对于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的前途，实有莫大的阻碍。为要迎合革命的高潮和完成地方的暴动任务，我对于经济问题的意见，有以下几点：

第一，征收公益费。过去苏维埃的经济收入，完全没有计划的具体办法，一般的只如挖肉补疮，甚至于各自为政的乱发纸币，以致赤区的金融愈趋紊乱，而不知确定政府的正当收入，来精确的有系统的支出。

公益费是政府的正当收入，是群众应尽的义务，只要按照累进税的原则征收，在群众方面既无大的损失，而苏维埃政府却有了正当而正确的一项大收入。这样，赤区的金融，自然再不会发生恐慌和紊乱的事实了。

第二，健全合作社的组织。赤区的金融不能调剂，群众的物质痛苦不能解除，固然是受了敌人的严厉封锁，主要的还是我们没有健全合作社的组织，不能有计划沟通输入输出。所以健全合作社，成了赤区群众迫切需要的条件。

不错，过去苏维埃政府也成立了许多合作社，但是，不惟没有组织系统，简直失掉了合作社的性质和作用，仅仅贴上一块空招牌作当地政府的一个新商店罢了。这样，赤区的金融和群众的物质痛苦，干脆的说，一辈子都不能解决。

第三，办理银行。银行是苏维埃的经济武力，目前在敌人封锁当中，我们必须凭借这一武力，才能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工商业和活泼自己的金融。过去苏维埃政府对于这一工作，不惟执行不充分，并且各自为政的乱发纸币，结果惹起群众厌恶。同时整个经济形势，都走入极端紊乱的状态，苏维埃的经济和革命前途，的确危险万状，因此，办理银行，成了苏维埃区域的主要工作之一。

综上所述，总之在目前革命形势日益逼近高潮，要夺取一省或数省政权的时候，只要有益于群众的，都须马上坚决的着手进行，何况对于整个苏维埃区域有伟大作用和严重意义的。那么，我们更应当毫不怀疑的执行，很迅速的来解决苏维埃的经济问题。

(载于第十期《湘鄂西苏维埃》)

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九日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九日)

最近在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的来信的指导之下，政治局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决议指出三中全会的错误，并且开始进行解释立三路线的工作。现在，在这解释工作的初步所表现的许多事实，使政治局认为必须根据国际来信发展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决议，更彻底的明白的指出：

(一) 六月十一日议决案是立三路线。六月十一日议决案前后——三中全会之前的最后一时期，立三路线是领导了政治局的工作。所以对于这一时期政治局工作的正确估量应当是：当时政治局的路线是和共产国际路线不一致的，是不正确的。

(二) 三中全会却承认这一时期中央的路线仍是和国际一致的，承认六月十一日议决案是一般正确的，因此，三中全会虽然一般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这是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去接受的，——就是对于立三同志的整个路线，取了调和态度，并且替这一路线辩护——这就把互相矛盾互相对立而不能并存的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混淆起来（恰如国际来信所说），这就不能彻底解决执行国际路线的任务，因此，三中全会的路线也就不正确了。

(三) 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就不能够充分正确和明了的遵照国际路线去规定新的策略和任务，更不能够使全党明白的了解了，共产国际路线之下的策略与任务，是与立三路线的策略和任务，原则在作战上特别是今天需要大规模的冲破敌人包围计划的作战上，将会蒙着很大的不利。第一次红军退出长沙，完全是吃亏在没有采访的工作。交通问题特别是苏区与敌人统治区域的来往，中央苏区与其他苏区的关系必须尽可能的与尽最大速度的将它们打通，这首先便需要交通站在整个苏区与苏区附近的敌人统治的交通要道上完全建立起来。要使苏区的交通网与我们在敌人统治区域的军事交通网能完全衔接起来。至具体的计划另文规定（见交通网之建立计划附件）。

第八，在改编红军计划之实施中，要注意反对现在红军中几种不正确的倾向，如地域观念，保守观念，小组织倾向，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无组织的倾向，农民意识流氓意识等等，这都须要根本肃清的。至改组派，取消派在红军中的活动，党必须依照红军需要统一政治指导的原则，认定他们是来破坏红军破坏共产党的领导的，对他们只有执行军队纪律的制裁。（红军纪律条例见附件）

二十八、在苏区中青年工农的武装组织，为少年先锋队，它应有独立的全国的组织系统，但在军事行动或罢工斗争时，应受农村赤卫队或城市赤色警卫队工人纠察队的指挥。少年先锋队在年龄的限制上应同于青年团，由十四岁到二十三岁，但当着青年工农已加入赤色警卫队或赤卫队时，便无须再加入少年先锋队。同时少年先锋队亦应负责介绍得力的队员到赤卫队中到红军中去，尤其是介绍青年工农到红军中去更是苏区青年团的主要任务之一。

中央政治局

中共中央致红军的训令

(一九三一年)

1. 目前政治形势与红军的任务：

目前因北方的战争暂时终结，使反动的国民党加紧了反对全国革命运动，尤其是反对苏维埃区域，（蒋介石调动大部队往苏区南京政府拨

大

批款项作为“剿共”经费编制新×等）最近向红军总攻击的开始，以及红军西暂时的失利，（放弃吉安和其他各地）……，使我们与反革命

命

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条[件]更加复杂，在这复杂环境中，我们应当给自己一个明确的估量，并依照这个估量，定出自己斗争的任务。

中国统治阶级很明显看到苏维埃运动对于他是有莫大的危险，是他们统治地位致命之点，帝国主义者知道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会破坏他们对于中国民众进行殖民地侵略的基础，他们对苏维埃运动以及红军怀着十分恐惧和阶级的死恨，所以中国的反革命也就能在帝国主义者直接指使和帮助之下，与我们苏维埃运动作决死的战斗。

无论如何要消灭苏维埃和红军——这就是国民党和反革命今天的口号，国民党为了自己的阶级的自卫，为了保持其统治权位，为了夸扬自己的表面上的和平和政治上表面稳固，并为了向帝国主义者大借款起见，这在他们确是非常重要的。

破产至极的国民党，为巩固其目前地位起见，向美帝国主义摇尾乞怜，企图取得五万万的大借款，作为加紧对中国殖民地束缚的代[价]，为了这个，他也需要消灭苏维埃区域。

同时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直接指使之下向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作决死的斗争，并与帝国主义者的其他走狗（罗马尼亚等国）一致的准备帝国主义者所预定的一九三一年的大战，其目的是在要消灭苏联，这种情况更加重了我们与反革命国民党斗争的意义，因为中东路事件已经很明显地告诉了我们在将来反苏联的战争中，国民党的军队将是在帝国主义整个战线中负担着从东方袭击苏联的任务的特别部队，所以他们摧残苏维埃运动，也就是侵略苏联的第一步。

在另一方面，为着在将来与北方军阀作战和在中国军阀的总混战中，对于这一战争的准备，在现时已经很紧张的在进行与保持后方的安全，他们也必须消灭苏区。

同时更谈不到，说中国在北方战争后，已经统一，并且已变成和平的政治与经济长时期的了，这都是帝国主义走狗反革命国民党所唱的空调，召集全国国民会议的决议，是国民对劳动群众和小资产阶级惯用的欺骗，这会议的主要意义，也不过是所制造成全国统一的幻想。用国民会议和苏维埃制度对立，来保证与苏维埃的斗争，这是统治阶级企图转移日渐革命化的群众的注意力，使其不要为他们直接的阶级目的而斗争，国民党所允许的救济灾民也就是更谈不到的事，在国民党统治和帝国主义者残酷侵略条件之下，只有更加使民众贫困，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新的军阀战争，也是不可免的，但对新的强盗战争的准备或许更费些时日，反革命必然要利用这些时日，尽量的削弱我们革命的力量，我们应该估

计到，反革命必将集中其一切空间力量来对付我们，这将更加重对我们的压迫，轻视反革命和“围剿”的力量，及过于夸大自己的力量，在现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危险。

虽然敌人有消灭我们的企图，虽然中国的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集中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我们，但是我们在目前土地革命潮流日渐发展，尤其是在苏区存在的条件之下，假使我们能坚决执行下面的条件，则不仅能击破“围剿”，破坏反革命的武装势力，保持住已得的胜利，并且可以更加扩展苏维埃运动。

A、各地方党部，尤其是各苏区党部，应当切实了解目前的伟大任务，是在组织反抗敌人“围剿”的运动，要能在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和从帝国主义压迫下求解放的两口号之下，来动员劳苦群众，要切实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夺取广大的劳动者，正确的根据共产国际的训令，领导这些群众，使其在敌人向我们总进攻的当中，为其阶级任务而斗争。

B、苏区中央局和红军的领导者朱毛两同志在所有各级党部帮助之下，切实实行各部队的集中动作，并与农民的群众斗争相配合，并且我们不要口头上而要事实上在军事以及政治上加强红军，使广大群众对红军有限的援助。

C、要更加扩大在我苏维埃区域农民的游击战争，和工业中以工人运动，并能正确的指导他们斗争，不执行或不切实执行这些条件，都会产生莫大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是在敌人开始“围剿”的结果，我们会陷于一时涣散的地位，红军会到处分散而得不到群众的充分赞助，这样，我们就会给敌人以各个击破我们的可能，不用说，在这种情形下，苏维埃运动的潮流，会一时陷于停滞的。

我们现在比任何时期都更有必要来研究过去斗争的经验，要不再重演过去的错误，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当对于苏维埃根据地问题要有十分正确的了解，过去中央在立三同志“左倾”盲动路线领导之下（这路线已被共产国际和中央最近决议痛加批评了），对于根据地问题，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们当时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占领大城市（长沙、南昌、武汉等），我们简直未注意到巩固后方建立具有坚固组织的和正确执行党的路线的苏维埃政权之根据地，我们非常夸大了自己的力量，轻视了敌人的力量，并定出在当时的条件下完全不能实现的任务（夺取武汉），因此我们错过了许多可以增强自己和削弱敌人的好机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关系很不密切，有时竟至没有关系，他们往往一开到，很少顾及到自己行动区域内苏维埃政权，我们有一军人曾在一个地方驻扎许多，连没收地主土地都未举行，所以，这一区的农民把红军看作普通军阀军队一样，而不去参加，这是无足奇怪的。这一军指挥方面，因为不会动员农民群众以致枪械剩余七八枝而没有人使用。

自然，不占领大城市，不能建立大的苏维埃根据地，不能进一步的扩张革命领域，占领中心城市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这是很明显的，但是为着执行占领大城市（长沙、汉口等）的任务，必须在我们已夺得政权的区域，巩固自己的势力，必须最高限度的巩固红军势力，消灭苏区的反革命，使红军不受敌人意外的袭击，不仅要使苏区群众对红军动作有配合行动，并要使红军所要进攻的区域内，亦有强有力的群众运动与红军配合动作，这样来扩大苏维埃区域，扩大并加强红军，发展在工业中心的革命工人运动，我们在有利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定出夺取大城市的任务，并且可以保持大城市的胜利，只有这样，才能计算到夺取大城市，不执行这些条件，而企图夺取大城

市，完全是越过当前的实际任务，是冒险的盲动主义，这只有促成失败。

2. 红军作战方略

现在反动统治阶级进攻红军的兵力，计算将调往和已调往的约十师以上，来与红军一三军团作战，企图消灭红军的主力，目前红军各部队的战斗状况见附图（但未得着一三军团最近报告，只能由敌人的报纸消息为根据）。在近在斗争的紧要关头，必须依照上述关于根据地等一般的原则，加以具体化的定出红军各部队以下列作的方略：

（1）第二军团酌派相当数目的游击指挥员或少数部队到长江北岸原有的根据地内，组织游击队和红军部队，保持并发展苏区，而以主力行动于常德益阳地带，向长沙之敌威胁，设军团行动愈能积极活动，愈能吸引进攻，第一三军团之多数敌军转西向与之作战，则第一三军团作战的顺利，更能愈有把握，其后方地区在施鹤下川东方面，此时须向该方面发展游击战争，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深入土地的革命工作。

红军各部队目前总的任务，是抵御向苏维埃区攻击的敌军，并破坏反革命的武装，使各个苏区得以巩固逐渐向前扩大，以至在三省（湘鄂赣）区中，建立整块的苏维埃区。

要能达到这个总任务，红军必须将自己的行动与在土地革命和反帝国主义口号之下的农民群众运动相配合，并要坚决的执行这个训令。

（2）应当纠正过去立三路线领导下取消发展游击战争的错误。农民的游击战争是红军的强大助力，没有普遍的发展的游击战争，红军不会得着胜利的，因此，红军的指挥员和各级党部首先是湘鄂赣闽粤各省，应当极力的实行建立游击队的工作，并尽可能的努力从游击队中建立正式红军的部队，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在敌人后方动作，消灭敌人的小部队，夺取枪械，夺取乡村或县城中的政权等等，红军的指挥员应努力指挥游击队的动作，并将其动作红军部队的战斗任务联系起来，当红军在任何退却时，必须留下有经验的干部人材在敌人后方组织游击战争，并给与以相当数目的（最小限度的）武装，过去集中农民武装的一切路线是错误的，这简直是解除农民的武装，使农民失去本身的自卫的斗争的能力，而专去依赖红军，有些地方的农民便不能与军阀积极斗争，只能消极的等待红军，红军绝不应从农民手上缴收枪支，而应从解除敌人部队以及统治阶级的反革命军事组织的武装中取得枪支，因为农民的武装是反对反动统治的自卫的工具，假使在有些区域内农民枪支很多，那末，可以集中多余枪支，但必须将当地农民一同成为红军新的部队。

（3）在任何情况下的红军动作（防御、进攻、侦探、警戒等等）都应取绝对的积极性——在敌人后方与侧方施行游击动作，使敌人永久的孤立，在必要时须突然转为反攻，以消灭敌人单独动作的部队，在退却时设立埋伏，在阴天时采用夜间动作等等。

（4）与国民党军队的积极战斗，应当和红军对敌军士兵的广大煽动工作和瓦解敌人部队，从政治上夺取敌人士兵的工作相配合，应当有组织的进行敌军兵变，散布传单，派人往敌人军中向俘虏作工作并适当的利用他们（派回他们自己的部队，编入我们的部队等等）绝对的禁止枪毙俘虏士兵，（自然，军阀的间谍和奸细除外）。

在国民党军队中士兵，是有一般的动摇现象，士兵的厌战，生活的痛苦及其军官的压迫和红军与土地革命的影响；因此，红军关于瓦解敌人部队，

以及哗变敌人的士兵到我方来的工作，应用最大的力量去进行，直到现在我们还未能到处利用这种工作的好机会，全国非苏维埃区域的各党部，亦应当尽力的实行瓦解敌人军队和政治上的夺取敌人军队兵士的工作，应组织并发动士兵的日常斗争（发恼发军服，给假期，废除肉刑等等），反抗军官的一切压迫和发动士兵对军官的阶级仇恨组织兵变，拒绝开赴前线打红军，杀官长到红军中去。

（5）在红军部队内部巩固方面，必须坚决的执行最近送给你们的军队编制，政治工作，政治委员，政治部，党和青年团的支部工作诸条例，应切记着：没有这些机关的正确和紧张的工作，以及这些机关与红军战斗员群众和指挥员间正确的相互关系，要建立有战斗的部队便是梦想，要坚决的反对认为政治工作是能写字的知识分子的事。说在红军中有三头领导（指挥员、政治委员、和党部）的一切错误的倾向，要明确的了解政治委员连政治指导员和指挥的地位、权限和任务，同样在有些部队中党部工作，好似部队的行政机关一样，或者有部队中盛行极端民主化，使党员大会来讨论命令等——这些倾向，都应坚决的肃清，在有些部队中政治委员和连政治指导员处于对部队的情状和动作不负责的旁观者地位，这简单是对政治委员和连政治指导员的作用完全曲解，应严格的执行以上所述的条例，照着这些条例，政治委员是红军中中央苏维埃政权和党的代表者，对于部队中的纪律，政治觉悟和战斗力加强等，他和指挥员负同样的责任，党与团的组织主要任务，是提高红色战斗员群众的政治觉悟，巩固部队的纪律与战斗力，政治委员兼党部书记，是不适宜的，在党部书记和政治委员的职任是不同的，党的书记，是在选出后要得到政治委员的批准，而政治委员则居于政治指挥的地位，政治委员对于部队的情状负完全责任，自然党的组织情状也要负责，假使政治委员而兼书记，会在党的组织的工作中，增添许多误会不便。

（6）要尽量提高红色战斗员工人和雇农成分，在有可能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用设立随营学校及干部学校的办法去改良指挥员的成分，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程度，在有些部队中，曾有一种极端民主化的影响，无论那一方面，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是一样，这是要废除去的，要估计到指挥员是负有战斗的配备和指挥的重大责任，他们比战斗员要多劳力与劳心，因此，站在他的工作效力上说，无论在物质上勤务上应当比一般战斗员有较好的条件，在战斗中有功劳的工人和雇农分子的战斗员，应当引进他们充当指挥员，政治委员和高级军事政治的职务（如团、师、军的指挥员，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同时也要引进政治上坚强而在战斗中和在秘密工作中来表示能执行党的路线的同志，这种引进的工作，要很好的实行。

（7）现在我们所采用对俘虏外国人的策略，用钱赎是不对的，对这问题，中央已给了苏区特别的训令，用钱赎回的条件，这种办法，并不是因为要这笔钱去救助被枪毙的革命者或阵亡军人的家属以及其他有极大政治的宣传和政治的意义的用途，因此，这样的办法，将要发生不好的政治影响，在将来的时候，假若俘了积极反对我们的外国人（教士，商人等）必须以释放我们被捕的同志若干为条件，并且说，假若不实行这个条件时，那末我们也要用我们同志在监狱里所受的待遇去处理被俘虏的外国人，至于老妇老头子小孩和佣人不要俘虏他们，要放弃在长江流域及其他流域射击外国与中国客船商船的政策，这种射击轮船或停止他前进的时候，而采取无目的射击，在政治上是绝对不利的，这是给帝国主义者舆论上造成一种武力反对我们的借

口。

(8) 红军与上海、广东、汉口等处的交通，一直到现在，很是没有很好的建立，甚至而完全没有建立，在这方面，中央正采取各种方法来进行，但红军与独立行动的各种指挥员方面，亦必须采取各种方法建立与上海、汉口、香港等处的经常交通，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经常的派通讯员到上海来作报告和规定一定的交通站（须有很多的向导）并且派小的部队到白色区来接护中央派去苏区工作的人员，中央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没有适当的交通，便不会有适当的指导，这是为调剂全中国的革命斗争所必须的事，至于说到对苏区斗争的指导，更不用说了，此外在各该区红军的指挥员与其部队的指挥员之间，亦必须建立适当的与敏捷的交通。

(9) 红军各部队的军械与军需（粮秣被服）之补充，主要的夺自敌人，其次在苏区内由当地军委筹备，人马补充，军医设备以及伤亡抚恤，应在巩固的苏区政府之下规划举行。

3. 在一般政治上和苏维埃组织方面的任务：

在最近中央送给你们的国际文件及苏区工作计划中，对于党和苏维埃的建设及土地经济政策等问题都比较有详细的指示。

现在这一训令中，认为站在组织和思想上的意义上，红军党部，是我们党的最好的队伍之一，并且在使苏维埃政权实行正确的布尔什维克政策方面，他能够并且应当对地方党部给很大的帮助，因此，中央提出，在一般政治工作方面，红军党部应执行以下的主要的原则。

(1) 党的坚固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上一致，严密的纪律和列宁主义的坚韧性，就是顺利的执行正确的列宁主义的国际路线执行土地革命，动员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向苏维埃政权进攻的基本要素，只有这种具有真正列宁主义指导的党部，我们才能够顺利的去领导工农革命斗争，在目前苏维埃区域内部敌人拼命反对苏维埃政权以及帝国主义反革命国民党向我们总进攻的条件之下，对一切违背党正确路线的倾向，都应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根据各地党部的报告，各处苏维埃政权的情形，还须要有许多的改良，对于土地问题，苏维埃问题和经济政策执行的方面，发现了许多完全与党的正确路线毫不相同的现象，特别是在土地政策方面，一方面我们看到许多“左倾”的错误（如忽视中农，组织集体农场等等企图），另一方面就有右倾机会主义的事实，如分土地给“好”地主，对贫农和中农的忽视，党的右倾政策，甚至达到这种田地，便有些同志竟感觉到党有严重的危机，并且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分子（江西）处在地主与富农的思想影响之下，因此，必须坚决并彻底的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立三路线直接的间接的影响和存在。反对对这一路线的调和错误，反对我们党内的“右倾”“左倾”这些倾向，不管他们的外表怎样，都是阶级敌人，在某部分党员中影响的反映。

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固，原则上的坚定和组织的团结，都是在与违背党的正确路线作不妥协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党员个人对党的忠实特别是党部指导者对党的忠实，都是要在他们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来检查。关于任务一节，下面再说，只有在为实现那些任务的斗争中，党部和个别党员，应当表现出他们在那一点上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

在一切有红军存在和游击运动非常发展的地方，必须彻底的执行下列的任务，连一分钟都不要忘记目前阶级的革命性质，是苏维埃制度的土地的民

族的民权革命。

(2) 要没收地主、绅士和积极反对红军以及帮助反革命的富农和其他分子的土地与财产，在有些区域，竟有把地主分为“好”“坏”，并且在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时候，使所谓好地主一样的得到土地，这是绝不容许的事，我们应当了解，目前革命阶段上，正是要加紧的反对地主阶级，因此，凡是企图假借各种名义来保存地主归有的一部分特权（分与他们的土地），是对于党之关于革命基本问题的路线最危险的曲解，这种危险曲解的具体事实，就是把坏的土地分给贫农和雇农，而同时好的土地被富农取去，这在江西平分土地的时候，已发生这种现象，必须把农民欠富有阶级的地租与一切借债完全取消，同时在土地或其他方面，进行任何设置时，不但要时常顾虑到贫农雇农的利益，并且要顾虑到中农的利益，如果我们在这问题上发生“左倾”的偏向，侵犯中农的利益，而不会运用我们的策略，去使中农成为我们在斗争中的同盟者，去反对地主绅士及农村中一切封建农奴制度关系的传播者，那末我们的工作是会遇着失败的，中央认为侵犯中农利益，把他看为地主的附和者，以及不提拔他们参加苏维埃政府机关等，都是极大的危险，会使革命受到莫大的损失，一直到现在，我们对于中农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以致使一部分农民拿着武器起来反对我们，帮助国民党军阀，枪杀我们的工作人员等等（鄂西）同时要坚决的反对一部分同志要把没收地主的土地去组织集体农场和苏维埃农场的倾向，在目前的革命阶段上，这种办法是只有损而无益的，只有当农民自动提出这问题的时候，苏维埃政府应予相当的帮助，允许实行土地共耕（也只为的是能节省耕具等），关于土地分配问题，中央根据各省不同的条件，在目前给下列的指示，凡在农民的基本群众自动提出平分一切土地的地方，必须实行平分一切土地，但须要以不与中农决裂为条件，当平分一切土地的时候，必须特别注意到分给雇农与贫农，无论如何，不许使分给他们的土地，比农村中其他分子的土地坏，要注意帮贫农经济，分配农具给雇农，至于分配土地的标准，要采用人口和劳动力的混合标准（详见中央政治局的苏维埃区域工作计划）这种方法是否比较完善，那就要看各地方的具体条件来决定，不过最主要而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要使土地分配的结果，不要富农占便宜，而使贫农雇农中农吃亏，在分配土地时。这三种农民的利益，一定要加以非常的注意，不允许分配城市工人家属的土地，红军战斗员及其家庭均应与贫农雇农一律得到土地，过去在分配土地方面，对红军战斗员的忽视，甚而不分给土地，这是绝对不容许的事。

(3) 在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方面，同样的在土地问题方面，必须坚决的执行并帮助地方党部执行国际的路线，在这里和在土地政策上，同样的要特别注意到目前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的条件。苏维埃政权与党的一切经济设施，必须根据目前阶段的革命性质加以考查，要和有些党部内的“左倾”作坚决的斗争，他们把目前革命阶段，看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于是在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方面，企图合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施，同时也必须毫无情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他们对反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并且使工人阶级变为改组派的工具。

在这个训令上，不需要再具体指出我们的经济上的任务，我们只是要提红军党部对这一问题的注意，特别是红军的给养，必须真正出之于商人富农及富裕者的身上，绝对不许给剥削者的机会，借筹款之名，行剥削劳动群众之实，同时我们认为红军中的全体党员，必须完全了解我们在经济政策方面

的指示，并且每个党员和整个红军中的党部和青年团面前的任务，是要尽可能的有组织的去夺取一切劳动群众，建立和发展工人职员的职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少年先锋、赤卫队等等，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注意到建立和发展这些群众组织，职工会和雇农工会无论组织上和政治上还是非常的薄弱，有些地方，甚至完全没有，有时候竟有这样的说法：我们既然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又何必职工会，若说到小作坊工人的组织，这是用不着的，又有说雇农既然分了土地给他，因此他已变成私有财产者的农民，那我们又何必雇农工会，这种倾向，必须加以坚决的反对，要知道，这些群众组织，都是党和苏维埃政权实行其一切设施时期最主要的支柱，没有工人的职工会，没有雇农工会（分配土地给雇农，还不能机械的取消雇农的农村无产阶级性），没有少年先锋队、赤卫队，是不能实现真正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红军中的党部，这些群众组织的建立和领导，应当积极的参加！

少年先锋队和农民赤卫队的任务，在除了与苏区内部反革命作斗争，保护苏区边界和参加一般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外，还应当是补充红军的后备军，因此，要注意到这些队员的军事训练。

不要使少年先锋队去作毁坏庙宇的工作（在江西）要使他们成为苏维埃区域的防御力量。

（5）我们的党部（红军中党部亦在内），没有充分的注意到创造在劳动群众中有威信，及能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机关与红军的指挥机关常常没有好的联系，在这一方面，红军中的党部和他的指挥机关，要负相当的责任，因为并没有把巩固苏维埃政权机关当作自己的直接任务之一，同时因为苏维埃政权的机关薄弱，结果农民凡有应该去找苏维埃解决的事情，不去找苏维埃，而去找当地的党部，党部本来是帮助和指导苏维埃的机关，结果，代替了苏维埃的作用，并且因为党部方面，没有充分注意苏维埃，结果，常常有各种冒险分子和地主、绅士的奸细钻入苏维埃里去，自觉的实行反党的富农政策，破坏革命的政权机关——苏维埃。

组织苏维埃，保证苏维埃的真正选举，提拔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到苏维埃的指导机关去，使苏维埃成为真正能够代表土地革命利益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苏维埃，这不仅是地方党部的任务，而同样的是红军中党部的任务，红军中的党部，是苏区党部中最强健的队伍，绝对不能够放弃组织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任务。

中央认为具有许多光荣胜利，及正在为中国革命而作斗争的红军与党，虽然处于艰苦困难的环境，受着统治阶级拼命的进攻，他将要用全付力量，去完全[成]共产国际及中央的指示。

这就是红军胜利的保证！

此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完）

注释

原文年代似为一九三一年夏秋。

二、六军中夏关于南渡后战争概况及今后行动原则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日)

中央：

我第二军团自南渡以来，因交通断绝，就来做报告了，兹补报告于下：

(一)南渡后战争的概况：我第二军团十人日南渡后，连战皆捷，计占领大城镇如华容、南县、藕池、公安、津市、石门、临澧等处。大小十余战，计如华容之战，南县之战……之战，公安之战闸口之战津市之战，第一次包围澧州城，夹山寺之战余氏桥之战，第二次津市之战杨林寺之战，就中以一次津市之战夹山寺之战，余氏桥之战第二次津市之战及杨林寺之战为最烈，除杨林寺之战相当失败，第二次津市之战转败为胜外，其余都系全胜兹将战略的转变……叙述。

第……三县占领，造成苏区……我二军……六军进攻华容，大获全胜……决定以十七师，取到……将其余……取道黄山头，进攻津澧，留独立团驻守……(此处一大段看不清楚)三十日我十七师进攻藕池，我二军进攻公安，亦只小战而战占领县城……十七师……进抵公安时，至闸口与敌军三团遭遇战……将其击溃，并……团长二人，旅参谋长一人，营长一人，四日我军进攻津澧，以二军全部及十六师进攻澧州，以十六师进攻津市，二军及十七师不战而进至澧州城下，敌人闭城紧守，十七师进至白洋堤，便与敌人激战，当将敌陈运夔二军击溃缴械乘胜占领城市，此时……如攻下……一次扒城无效，乃进行掘洞轰城，延至九日安乡川军来袭，与我军夹河相持两昼夜，敌……两营被我缴械，十一日我们……急切难下，川军又倾师来袭将我军全部兵力两个牵制……决定暂时放下津澧……在津市时曾讨论军事行动，都感觉我……行动未与巩固地方政权连系起来，似此与巩固……相违背。此时闻……事实上我们与后方完全隔绝，因此决定……澧城不敢攻下，则退却经营公、松、枝、宜、石、华数县……(此处一大段完全看不清楚)分三路向我军进攻，二

十三日在余氏桥与我军激战，又被我军击溃，并进击至临澧城，在石门时本准备进攻常德，但因澧城有陈运夔军，津市有……部队虽被击溃，并

未消灭，如向常德前进，则必被敌尾追，而有腹背受敌危险，故必须先消灭津澧之敌，然后向常德攻击前进，方属稳当，因此乃有进攻津澧之决定，进攻津澧，最初本拟于攻下临澧后二军……截断川军至安乡之归路，十七军由澧水北岸，从白洋堤向津市进攻，十六军则于荣家河(或其他地点)渡河与十六军取得联系，从仁和铺向津市进攻，如此以根本消灭川军，但此计划因余氏桥……前方同志得到敌人计划，知道

川军从合口新安向石门，十七师难于抵御，当率二军及十六师回……在石门重新讨论，坚决再打津澧，特别决定攻打澧城，如澧城打下则我军放心进攻常德，毫无后顾之忧。十二月一日进至澧城，仍将澧城包围，二日进攻津市，十回港一路(四十七、五十两团)进至津市街口因敌人反攻而溃败下来，白洋堤一路(四十四、五十一两团)与敌人桥河相持，入夜方渡河，占领津市，又以敌人反攻而退回，夜十一时我军两团(四十六、警卫两团)再行援助占领津市，川军半被我军击溃，最后我军损亦大，阵亡团人[长]

一人，军参谋长一人，战士四五百人，因此我六军失败情绪非常浓厚……不可用了，但我们坚决围攻澧城，极力准备本

[攻]城……工作。围至八日晚，忽得报告，何健派李觉一师来援澧州，已从合口渡江澧水南岸之停兹渡到义河宝塔湾等处发现敌人……敌人来援之兵至少至则两师以上，当下退却令，九日早三时尚梦……退却。此时使我们觉得困难的是伤兵问题，决定将伤兵运回石首后方，十日以二军进攻公安，将后方交……军则退至杨林市街河市休息，十二日前委开会讨论……决定二六两军选择阵地，以待敌至；并决定以刘家厂为根据地，二军驻……十六师驻梅溪河，十六师驻刘家厂……调回二军，十四日二军开回，前委又开会讨论……（此处一大段看不清）。

伤员往后方，以六军进攻松滋……预防敌人之乘虚袭击，当移十六师于官桥以待之，又调十六师为后援，十七日……（此处一大段看不清）随后愈战愈烈，敌火力甚猛，中间突破数次无效，街河市方面即发现枪声……（看不出没办法）损失，第二次津市之战及此次杨林市之战，我军受挫的主要原因，皆由于轻敌……（此处整页看不清）集中兵力选择阵地之计划，致有此败，真正可惜，幸而十七日晚我们已下令去……乘间退出，不然必致全军复没……我六[三]军全无损失，我六军亦仅损失四分之一强，总算不幸中之大幸。

（二）退兵走马坪及消灭改组派：甘秦张诸匪的部队，十八日晚总指挥部是夜从间道向刘家厂退却，十九日清晨至刘家厂，十七师……二十日六军之一部与十六师之部，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及四十八团之一小部分亦到……（此处一整页看不出）后六军稍为整理后，即出山与强敌作战，谁知匪走马坪，却意外的做了一件有政治意义的事，……改组派甘秦张诸联……甘匪系四川……加入改组派……（一大段看不清），曾加入过共产党，有众数百人，枪一百枝，总计三匪有众三千余人，枪二千枝他们取道鹤峰，拟转入桑植、大庸与安乡，川军赖心辉……（看不清）申言参加红军，而且声言竭诚参加红军，我们一面以数部队凭山守险……调二六两军兼程开来，准备武力解决……廿九日我们坚决将甘张秦三部完全包围缴械其团长以上完全处决，营长以下则分别，如有政治意味则亦处决，否则遣散，兵士已选择编用，其余给资遣散（约二千人，因为多为……匪，烟鬼及老豹）。这一处置我们自认是绝对正确的，甘张……（一段看不清），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总之完全与土匪军队无异，在我们没有弄清上述情形以前，我们还有保存……（一大段看不清），害几军的阴谋。真的如果我们犹为犹豫，则必然受此种叛贼的欺骗截击的危阴[险]。因此，我们亦将其部队缴械，并将秦本人处以死刑，此事的真相如此，特报告中央，并请批评。

此次上山，意外的做些大事，其重要意义倒不在于不动声色的缴得二千枝枪，而在于保全赤色区域，消灭改组派在湘西危害红军的一部分军事力量，并打破改组派各种军事计划，联合红军的计划。这次上山却意外的得些重大的政治成绩。

（三）今后军事行动的原则：我第二军团，这样绝大的部队，当然上山不是出路，如果在杨林寺不变更原来前委的决定——即集中兵力，选择阵地的决议，当然我六军不致受如此的损失，但损失并不十分严重，一俟稍为整理后，当然应坚决的将全军团出山打硬仗，不怕敌人如何强大，我们只要将敌人最弱点击破，方能解除敌人对我的包围。前委已决定二日内二军出山，

七日内六军出山，第一步先向石门。

我们要承认，渡江以来我们军事行动的最大错误，在于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没有与巩固地方政权联系起来，没有执行很巩固的向前发展的原则，以致结果虽然占领了无数城池，都随得随弃，而前方与后方完全断绝；今后当然应努力纠正这一错误，首先须将湘西现有几个反动军事实力根本肃清，然后方能将从鹤峰五峰至石首华容这一纵长线造成为整片的赤色区域，以后计划，应本此原则决定战略。关于鹤峰地方政权，由小康同志另行报告。第二军团中的高级军官及政治委员无大变动，只六军军长改任汤慕禹同志，段德昌同志，调鄂西联县政府赤色警卫队总队长，惟总指挥部的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及各军师的参谋长，尚属虚悬，请中央派人来！至于中下级军官，及政治委员则异常缺乏，亦望派人来！无线电报的人材及材料望速派人送来！……（以下不明）

弟中夏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日于走马坪

中共湘鄂西特委给中央的信

——土地问题、前委与特委组织问题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

中央：

最近几月来很少接到中央文件，工作上发生诸多困难，兹将几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写在下面：

1. 关于土地问题：中央历次指示和最近国际决议，都是说只把应当没收的土地拿来平均分配，中农土地不动，富农土地也只能没收其余出租的一部分，并明白地指出：没收一切土地是托洛斯基的路线。但在国际东方部的指示又说要平分一切土地，事实上就是没收一切土地，拿来

重新分配。这问题究竟要怎样解决？请详细指示。

2. 前次中央指出红军中取消前委，由特委直接指导。这个办法在工作上颇感不便，因地方上与红军中都不能形成集体的指导。中夏、××、克明、勉之、王×、德昌、××七人在红军中事实上仍沿用前委名义，而地方上因各地方党部工作的重要，仅得逸群、大顺、之玉、万涛、士秀、宗礼六人可担任特委工作。红军中仍然可否组织前委，特委另行可以改组？

3. 红军这次在松滋失利，还未与[取]到联系，在前线回赤区者仅四团(不完全)，其余大部分在宜都一带，军事、政治干部当更加缺乏，中央应加派同志前来工作。

4. 军校这期较上期好得多，但缺乏各种特科教官，请中央设法派来。各种书籍，尤其是夜战及各种新式战术书籍多搜集，由邮局寄来。

5. 我们与长江行委虽然有交通往还，但没有多得到指示，不知何故。以后我们究竟怎样？是否仍可与中央发生关系？

6. 封锁长江，我们始终没有多大办法，请派特殊人才前来工作。

7. 我们派邓济时同志来沪采办无线电，请即设法购置，并约定无线电号码。

湘鄂西特委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

注释

原文如此。

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

(一九三一年二月)

一、国民党军阀与站在他们后边的帝国主义强盗，虽以大量的军队向红军与苏维埃区域举行总的攻击，但现在却遭受了失败，反革命的主要兵力向江西一三集团军进攻的，一部分是被红军消灭了（如十八师五十师之被俘虏与新编第五师之被击溃），一部分是溃散了，因此只得暂时停战。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

国民党军阀与帝国主义强盗向其他红军的进攻（如向第二集团军，第一军，第九军，第十五军，第十六军，第七军等），直到现在，同样没有得到什么胜利。我们的红军在到处不仅大致能坚持主要的苏维埃区域，并且差不多所有的红军在数量上在质量上都有显著的进步（如武装的增加与斗争经验的充实），尤其是最近数月斗争的结果，使一二三集团军及第一军成为一支伟大的力量，便是其他红军也有相当的发展。成百万的农民新队伍，日渐增多的起来与中国的反革命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而农民游击运动的发展是中国土地革命中强有力的，事实上是中国英勇红军直接的得力的助手。

红军这次胜利又重新证明出：无论已被党开除的取消派右派的叛徒以及暗藏在党内的动摇分子怎样来咒骂红军是土匪是流寇，但是他们始终是中国伟大革命的真正队伍；他们是与中国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他们是为实现工农群众的阶级任务而始终在一起斗争着的。

二、中国苏区与红军的发展，已成为一个不可蔑视的力量，因此，反革命为对付这个力量，就派出比蒋阎战争时还要多的军队，来实行更大规模的总的进攻。仅仅江西一省，蒋介石就派了将近二十师的兵力，至于派去镇压整个苏区的兵力，已经超过三十师，人数则超过三十万。

这次国民党以这样大的兵力向我们“进剿”，在反方面正是表现了革命发展的力量和范围。

三、国民党军阀在第一次进攻红军失败之后，又在准备向红军作第二次的进攻。国民党自觉到自己的日暮途穷，企图以最后的挣扎，来镇压苏维埃与消灭红军。对中国革命的著名刽子手——蒋介石，除了已派往前线的大量兵力外，新近又派了十万大兵到苏区去，又用了无数金钱到苏区去，组织侦探与进行秘密恐怖，来组织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同时反革命又在非苏区内极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与工农革命群众。已被破产的国民党的刽子手企图用此种残杀酷刑来消灭中国革命。

四、照南京政府所定的计划，这次新的进攻的主要目标，仍旧是向着我们主要的力量一三集团军。国民党将以二十五师的兵力来进攻我们，同时也向着第二集团军，第一军以及其他各部队进行攻击。这个“围剿”计划，预定在六个月内实行。反革命除了积极反对红军外，还要更有系统的消灭已被白军占领的地方的所有革命的农民分子。这种非人的屠杀工作已在国民党军队的后方盛行。国民党更希望用封锁政策，来饥饿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队伍，而使他们投降于敌人。

反革命的国民党感觉到要消灭红军与镇压苏维埃决非短时间的军事行动所能奏效，于是在新的计划中，便准备用铁血、饥饿和封锁，来消灭现在苏区内以及倾向于苏区的农民群众，来消灭工农的革命运动，来镇压苏维埃与

摧毁红军。

我党和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国民党刽子手这次新计划的危险性，应当有极深刻的了解。要懂得在反对苏区与红军的斗争中，国民党任何的罪恶行动都可采行的。消灭苏维埃区域与红军，这是国民党反革命的中心任务，这是国民党整个的生死问题，同时也就是我们革命运动的根本问题。因此，这次新的“围剿”将要关系于中国工农大革命向前发展的命运。

五、应当冲破敌人的“围剿”，这是目前阶段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国民党的屠杀计划，是不足以惊骇我们的。国民党军队的兵士群众不愿攻打红军，离营逃跑的日见增多，有去当土匪的，有下乡找工作的，有投奔到苏区去的，而整队投入红军的事亦时常发生。军阀们除了用肉刑、鞭挞，枪毙和收买（这是非常的）的办法来驱使兵士攻打苏区以外，再没有别的方法了。大多数国民党军队并不是反革命手中可靠的工具。就是南京政府自己也是深刻的知道，也是不能在军队中树立起必须的军纪的，但是他又没有别的方法不派这些好几个月不发饷，没有纪律而又仇恨官长的士兵到战线上去。

工人与农民对于国民党的统治并无半点信仰。反革命之所以尚能在许多工业中心城市立足的，所以尚未被革命推翻的，就是因为靠了白色恐怖的手段，无情的压迫一切群众运动（甚至还不是革命的而是单纯的激进改良主义的表现也被禁止）以及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工作还不够。

如果我们能够消灭军阀进攻的新计划，则我们不仅能坚持了已有的苏维埃区域，并且同时还实行了现在阶段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建立湘鄂赣整片的苏维埃区域，成为这几省强有力的根据，同时更巩固了中国工农革命继续胜利的发展。要这样做，只有苏区的一切工作与非苏区的一切共产党员与革命工农的工作，真能依照国际、中央与四中全会的训令，真实的赞助红军，加紧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们中的士兵暴动（就是兵变），进行破坏与扰乱敌人后防的工作，更多的发展农民的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湘鄂赣，广东，福建，安徽等省；并且要组织工业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起来拥护苏区与红军。只有实行这些办法，上述的任务才能真正的实现。

现在除了承认与补充以前中央给你们指示外，更因为国民党军阀有了进攻红军的新计划，所以又给你们以下列的指示：

甲、关于红军与苏区方面的

1. 在第一次军阀进攻的失败之后，敌人在江西及其他各省，多半是暂时放弃积极的进攻，而采取防御的形式（如在江西各地建筑战壕，以备在新的进攻中可以实行必要的军事动作，此外又派遣新的队伍等等）。最近斗争的发动，差不多都操在红军的手中，红军应尽量利用这种优势。要击退国民党军阀的新进攻，只有各苏区红军能始终坚持自己地方的苏维埃根据地，能积极勇敢的动作，来消灭敌人活的力量（解除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增多自己的武装），能建立各苏区间的密切联系（与各个红军的队伍）以便各红军间的战斗动作能够得到一致与配合。目前红军的主要任务就是：不让敌人有整顿自己队伍的可能，要击破敌人的弱点，要扰乱敌人计划的实现。要用占优势的力量，去打击敌人。对于占优势的了解，不只是在数量上，而是与一切能够给我们在斗争中占优势的东西的配合，特别是群众动作的配合。当着进攻敌人时，要计算用强大的力量；当着敌人退却时，应进行坚决的追击，一直到完全解除敌人的武装为止。但如无胜利的把握时，即不应采取决死的战斗。并且随时要注意到在必要时有退却的可能。如形势上必须退却，则就应退却，

不要因为怕失却地域而发生姑息。我们始终不应忘记，必须保存红军的基本实力，为的是可以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要实现这个任务，必须加紧红军中的纪律与政治工作，并且无论如何，要保持红军指挥的统一。当着红军必须从旧有的苏区根据地中退出时，仍应用很大的力量，保存群众组织，发展群众斗争，组织游击队，实行游击战争，去镇压反革命从中的捣乱，去阻止国民党军队的前进，而继续深入这一区域的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以便向外发展。

2. 要尽量在战区内扩大与指导农民游击战争，地方与红军中的党部应派遣得力干部与工人来执行这种工作，要晓得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及其后方，如无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红军是很难得到决定胜负的胜利的。推动成百万的农民群众起来反对国民党的进攻苏区，这就是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应当使劳动群众了解，在必要时红军的退却并非失败。他们对红军最好的帮助，不是在于与红军的队伍一齐退，而是留在当地能继续进行反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使他做到瓦解，如拒绝供给敌人粮食，不替敌人作向导，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隐藏我们自己的力量不使敌人知道，为红军作侦探，并在兵士中宣传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煽动兵士倒戈，组织兵士暴动与哗变等等。这就是红军队伍临时退却时革命农民群众的任务，因为群众与红军一同进退，固然可以使敌人受到大的损失，但同时亦可使我们因供给军队与广大退却群众的给养，发生食粮不足的困难。

3. 红军的基本任务，除了以武装力量对付国民党的军队外，还要用红军的全部人员与政治机关去做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用传单标语以及开联欢会等等的政治宣传，去夺取他的兵士群众，并在我们俘虏的兵士中进行适当的工作。派遣红军专门工作人员到敌人军队中去，组织兵变与煽动倒戈，侦探，扰乱与破坏敌人的后方等等，所有这些方法，红军应尽量地使用。这种工作，应与红军的武装战斗，不断的同时进行。国民党军队的现状，兵士群众的情绪及其不愿与红军作战的表示，再加以我们坚决勇敢而灵活的政治与组织工作，我们夺取国民党军队中兵士群众中的同情，是一定有保障的。

4. 苏区中党的组织及红军应灵敏的坚决的执行国际及中央在土地问题经济政策上的训令，应扩大已有的与建立未有的工会，雇农工会和贫农团，最高限度的加强苏维埃政府的机关，使苏维埃和他的机关实际能表现出是在执行劳动群众的利益，使苏维埃获得这些群众的信仰。并且必须更加坚决的与地主残余和富农及其组织的 AB 团等等斗争，必须特别注意武装农民的自卫力量和少年先锋队，以作红军的后备队与直接的帮助者。应更加努力的进行在江西召集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运动。

所有这些工作，红军应在战线上武装战斗的可能下作最努力的参加。

乙、关于非苏区党部方面的

在叙述了苏区和红军的任务之后，非苏区的任务也就明显了。他的主要任务如下：

1. 根据国际指示及四中全会与政治局的决议，党和群众的工作，都应积极起来，主要的是组织和扩大职工会，在工业中心组织工人运动来保护苏维埃区域。在这一切工作中，必须求得彻底的转变。

2. 各地党部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扩大全国的农民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福建等省。

3. 必须最高限度的加强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革命工作，其目的在于组织兵

士暴动和吸引他们到革命方面来。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把国民党手中的武装夺取过来，破坏他的军队的前途，但现在的环境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好。敌人的兵士群众很明显的不愿同我们打仗，他们对于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情绪一天增高一天，这是因为政治上生活上的痛苦所造成（不发饷，不给军用品，肉刑，鞭挞和枪毙等等）。直到现在，我们利用正在发展的兵士群众的不满去做工作，还是极端不够。许多地方，成群的军队兵士跑去当土匪，而没有跑到苏维埃区域去，假使不是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不足，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可以解释呢？为夺取国民党军队而斗争，是目前党的主要口号之一。每一个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每一个工人农民，都应当知道为夺取国民党军队而斗争的重要，要尽力分化他们和使他们革命化起来。没有在反动军队中的工作，我们就不能帮助苏区。没有国民党军队的分化，就谈不到红军的重大胜利。

4. 必须立刻恢复广州、长沙、九江、南昌、武汉、萍乡、汕头和其他大的人口多的战线区的党的组织，要晓得没有党的组织，是有可能领导这些区内的工农革命运动的。

5. 全国各工业中心的党部，应以上海为例，进行征调工人到苏区去做苏维埃和军事的工作。

中央认为我们党是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与组织者，如果坚决的执行上一次和这一次训令中所指出的所有任务，而根本肃清立三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那末，反革命向苏区的新进攻，不可免的要象第一次计划一样的失败，我们的运动就是更加向前发展。只有击破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我们才有可能建立巩固的打成一片的湘鄂赣三省的广大的苏维埃区域，才可以造成任何反革命力量都不能击破的革命根据地。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中央

中共湘鄂西特委给克昌转中央的信

(一九三一年二月八日)

克昌同志转中央：

1. 湘鄂西赤色区域在两三月之内，经常在白军包围中。监利、沔阳、潜江、郝穴前均相继失守，赤区中心亦桎[遭]敌人摧残，以致有部分的坍台。我们虽能用地方武装配合群众力量与敌人肉搏，究不能消灭强大的敌人。现虽有石、华两县完全赤区，亦在风雨飘摇之中。红军医院、兵工厂等，一至于二月一日被白军占领，烧掠一个干净，损失坏枪、机器达十万元以上。二军团自游击湘西，至今两三月之久，未有与我们发生关系，我们已分途去函数次，迄未见复。

2. 我们与苏区中央局关系究竟怎样建立，请告。前日我们已派人去了，未回。我们已与湘北特委发生直接关系，特告。

3. 红军与军校关于军事、政治干部都非常缺乏，请多派人来。

此致

布尔塞维克敬礼

湘鄂西特委会

二月八日于石首调关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央给湘鄂西特委信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日)

湘鄂西特委：

××同志一月二日，特委一月十日，××同志二月三日的三个报告收到，从敌人方面得到的消息，亦可看出最近红军进退的状况，同时经过四中全会，中央正在积极的领导全党执行路线上的大转变，因此，中央有必要给你们以新的指示。这里必须指明，国际去年的各种决议与来信，四中全会的决议以及四中全会前后根据国际路线指示各地红军与苏区党部的训令，必须成为你们行动的基本方针。至苏区工作计划大纲的主要错误，在对立三路线没有揭发而调和，应依照中央训令改正。

一、去年十一月收到的国际来信，明确的指出中共中央去年六月十一日决议发布后，反国际的立三路线遂占据了领导地位而统治着全党，领导全党走上冒险盲动主义的道路。中央政治局在接受国际来信后，仍经过对立三路线调和的犹豫，最后始发出九十六号通告，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于今年一月七日在国际代表直接领导之下召开了扩大的四中全会。在四中全会上接受了国际路线，彻底的揭发了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在秋白同志领导之下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同时又改造了中央政治局，撤销了几个对立三路线主要负责的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并增加了中央委员新的成分。四中全会上不仅反对了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并严厉的指斥了右倾机会主义一切曲解国际路线与反四中全会反国际路线反党的企图。四中全会后，右派更明显的进行这一活动，以罗章龙为领袖的小组织，公开的组织第二党，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江苏顺直第二省委，派人到顺直满洲香港进行分裂活动，更派人到苏区去捣乱红军苏维埃及党的领导。右派反党反国际的纲领，是在假的立三路线旗帜之下，提出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已经破坏了中国革命与红军，从这种右倾悲观估量出发，遂要求退却的路线，而有些立三主义者，也竟从立三主义的泥坑转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怀抱里，实行其“左”右派的联合。中央现正在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并开除不可挽救的第二党领袖罗章龙、王克全、张金刃等。湘鄂西特委和全体同志，应在四中全会和接受国际路线下，依照中央最近一切决定彻底的肃清立三路线及右倾机会主义在湘鄂西工作中的影响，而坚决的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

二、依据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决议来检查湘鄂西党的工作，应当指明湘鄂西党直至现在还在继续和扩大立三路线之执行。自然我们决不否认湘鄂西行[几]年来苏维埃运动之发展和红军之扩大，党起了极大的领导作用，但我们必须彻底的检查湘鄂西党的严重错误与寻求造成这种错误的根源，然后才能实行彻底的路线上的大转变，而领导革命更加向前发展，湘鄂西党自××同志到后，仍然是否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而说中国革命发展走向平衡，因此，你们没有巩固苏区建立根据地与改造红军的根本认识，而只凭脱离群众的单纯的军事行动企图取得大城市乃至最大城市。这完完全全是立三路线之不要根据地的冒险盲动主义的策略。××同志的报告也曾提到根据地，但他所说的根据地是打常德要以津澧为根据地，打津澧要以石门为根据地，这是军事作战的支持点，而不是国际路线所要求的有群众的，彻底平分土地的，建立群众的苏维埃政权的，有红军可以依据而推动着革命向前发展的根据地。去年××初到时打仙桃镇的行动以及南渡后的一切军事行动，由整个革

命战争的配合说来，攻打仙桃镇以威胁武汉，攻下津澧以威胁常德长沙，这对一三集团军在江西的作战是很有利益的，只是红军的行动若不配合着广大的群众的斗争，不执行没收地主土地与平分一切土地的任务，不发动起广大劳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不肃清一切反动组织与解除他们的武装，则不仅苏区根据地无从建立与巩固，便连军事的胜利也将随着红军的撤退而消失。所以××一月二日的报告，除掉“攻城略地”的叙述，并且带领着二六军实行“上山”逃跑主义外，连土地革命的影子都找不到，这又是立三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了前线上这种冒险攻坚脱离群众的军事行动，于是在后方就必然使富农路线继续存在与发展。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你们不平分一切土地，要平分时便依人口为标准，连地主家属在内，还要先实行调查，劳动力中分大脚妇与小脚妇，并且还以富农作中农算，对组织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完全怠工，并说雇农分了土地后便没有雇农了，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常不是发动群众从下而上的选举出来的，以致许多富农腐化分子盘据了政府机关，使贫苦农民看成为“苏维埃老爷”，说“红军太好，苏维埃太坏”；并且这种腐化分子又利用苏维埃机关擅作威福，不发动乡村中基本农民群众以斗争力量去消灭阶级的敌人与进行反富农的斗争，只简单的执行捕杀；累进所得税的规定是不执行的，反而向基本农民群众实行派捐的办法，于是济难会，少年先锋队，赤卫队等都成了收捐的“衙门”这样，农民群众便说，“现在的牢，我们都有分”，以致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减弱起来、群众只认共产党比国民党较好一点……东来是东的百姓，西来是西的百姓”；——这一切都明明白白是富农路线的统治。所以对城市工作便是完全取消的，对工人斗争（江陵沔阳）竟借口苏维埃是工人政府而去制止，这完全是离开阶级立场之可耻的机会主义；对真正到敌人军队中夺取士兵群众的工作便完全忽视；对红军的巩固与加强完全是消极的，只等中央派工人成分和干部去加强领导，而没有计划在当地去实现国际决议所指示的加增雇农贫农在红军中的成分，加强工人干部的领导，提高党的威信与政治工作，巩固铁的纪律等等办法。同时却也提过“没收一切商店”，“集体农场”等“左倾”的政策，这无疑的只能帮助了富农路线的发展而使苏维埃政权更加困难起来。在鄂西富农路线之所以如此发展，也正有他阶级的基础。在七千党员中，据你们的报告，工人雇农贫成分不到半数，显然无疑的，富农甚至地主的残余都侵入到党内，政权的领导机关，红军的干部也有不少的富农，自然“左倾”空喊的立三路线遂更容易为这些分子所接受，而掩盖着富农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继续，于是湘鄂西的党，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与群众关系便大大受了损伤，而土地革命的果实竟被富农攫去。以监利失守竟因群众不来报信，致红军仓皇无抵抗的退出，洪湖根据地中心丧失（？）得如此之快，南岸二集团军的“上山”都明显看出红军与群众关系的薄弱，党缺少发动群众巩固这些地域的基本观念；因此，更加助长了苏区内部反动势力如北极会，改组派等发展，加以夺取敌人士兵工作又完全没有，于是更便于国民党反革命的进攻。但××最近来信及特委的报告，却未曾给这次红军失利以正确的估计，而××仍然单纯的计算到“一俟整理后，当然将全军出去打硬仗……前委已决定二日内二军上山，七日内六军上山，第一步先向石门”这证明××同志的领导是对国际路线没有丝毫了解与接受，他是对国际路线的两面派，他一方面传达国际路线，而一方面却又在执行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路线乃至富农路线。中央除批评××同志领导错误外，同时要向你们指出，当××离开中央时，中央正

在实行对立三路线调和的开始，直到十一月给他们的指示信，虽然在许多部分策略上的解决是正确的，但因为承继三

中全会调和主义的立场没有指出××同志在鄂西领导的立三路线实际上是帮助湘鄂西富农路线发展的严重错误，所以这种指示，是不能给你们以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的方针的。

三、现在敌人正在继续增加兵力，以进攻红军与苏区，湘鄂西是重要苏区根据地之一，亦受着五六师以上兵力的“围剿”。一般的说来，在

敌人第一次的“围剿”中各地红军大多得着相当胜利的，尤其是一三集团军最近曾消灭鲁涤平两师以上的兵力。湘鄂西这次作战的经过，如果是发动了群众，巩固着根据地向前发展，无疑的是可以冲破敌人第一次“围剿”的，依据现在的形势……（略）。白军在江北所占领的地域，施行极端的白色恐怖，农民群众被杀的近万，房屋家具被烧毁，洪湖的后

方，更遭受极大的损害，——这些地方都是经过长期斗争的区域，阶级的死[仇]恨将要引起广大农民群众再起的反抗斗争，在这里，要根本肃清立三路线不要根据地的冒进政策，同时也就绝对不容许立三路线所掩藏的上山逃跑主义，因为他正是冒进政策遇到挫折后之必然结果。尤其是经过失败的地方，一切消沉，失望，悲观，分散，逃跑等等右倾观念，都将汇合起来在立三路线揭发之后，会要求党实行退却的路线，——实际上就是富农的投降路线，这必须湘鄂西党予以坚决的反对！现在正确的方针，除掉一般的己见中央两次给红军及苏区党部的训令外，在湘鄂西要特别注意的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彻底的赞助和实现基本农民群众平分一切土地的要求，解除当地的反动武装，无条件的武装基本农

民群众去扩大游击战争，普遍的建立与改选苏维埃政权，实行自己的政纲，组织手工业工人雇农的阶级工会，加紧他们加工资与改良生活的斗争，并组织与领导贫农团，成为乡村苏维埃的柱石，以加强反富农斗争的力量而使中农围绕着他，更要特别注意敌人士兵中的工作，以夺取敌人的军队，并引进大批雇农贫农，到红军赤卫队中去，训练工人干部去当军事政治的指挥员，要提高党在红军赤卫队中的威信与加强政治工作，和巩固铁的纪律，这样来巩固红军与苏区根据地，这样来调动一切群众力量去冲破敌人的“围剿”，关于第二集团军他的目前中心任务，应使他所在的地域旨先实行没收地主土地与平分一切土地的政权，要广大的发动群众建立当地的苏维埃政权，要肃清一切地方的反动武装来武装农民实行自卫，要加强象五峰鹤峰这些地方的党的工作，以巩固这一后方根据地的领导，同时二集团军行动……（略）要能在配分群众的斗争利用敌人的弱点的条件下，击破这一线敌人的后方，以震动敌人的整个阵线，而江左江右的两大游击队也当更加紧在敌人与二集团军作战的后方做扰乱的工作，以便利二集团军来各个击破敌人。

江右的四团任务应深入南华安的土地革命与巩固这些地域的苏维埃运动，这对于牵制津澧常德的敌军去攻打二军团是要很大作用的，同时他对于岳阳也是一种威胁。江左游击队在他的目前任务上，是应加紧扩大群众的游击战争，从发动群众斗争巩固乡村阶级战线与彻底平分土地来恢复原来的苏维埃区域与发展新的苏维埃区域。在恢复失败区域工作上，特委应万分加紧。不论南岸北岸赤卫队与白军作战应尽可能的避免正面的硬拼，应配合着广大的群众的力量实行袭击；对于敌人已用大部队来占领的这些城市，必须以广

大群众围困城市的办法断绝敌人的交通和给养来围困他，并加紧在城市中的秘密工作，在适当的时机利用敌人的弱点来袭击他，务使敌人不能实现“彻底清乡”的计划。在北岸的游击队在与二军团取得联络后，二军团应拨一小部分武装到北岸，组织游击队肃清地方上的反动武装以扩大游击区域，但现时特委却不能等待这一武装的才去实行游击与保卫苏区的任务。

湘鄂西这一广大苏区的发展前途应当是：北岸的苏维埃运动在与二集团军主力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下，……（略）。二集团军在这一巩固的根据地地区上，应时刻不忘消灭敌人的主力以便选择着适合政治军事环境的交通要道与中心城市向前发展。

四、关于个别而是重要的几个问题，在这里分别指示你们：

第一，关于土地农民问题，中央前次指示大致可用。最近中央又送去苏大会的土地法草案是根本改正去年三中全会前颁发的土地法草案的错误的，你们应根据这一草案的一般原则去执行。你们与×××报告，都说对于平分一切土地发生怀疑，因而迟缓执行，这是错误的。中国土地的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在消灭地主阶级与封建剥削，而使雇农贫农中农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平分一切土地，正是在没收地主土地之后，同样要动摇富农的土地，不使富农攫得土地革命的果实。所以在法案上规定出同样没收富农的土地，但富农如愿继续自己耕种得分配他坏的土地。

中农则不然，平时不一定动他的土地，只要基本农民群众愿意，有时一切原有的土地所以关系都改变了。总之，平分一切土地的目的是在以当地所有土地的收获量做基础，平分给乡村中自己耕种的农民，在富农须分给坏地，而地主残余与家属却绝不能分得土地，只能罚做苦工，因此平分一切土地绝不等于没收一切土地，这一口号表现着没有阶级的意义。（是那一阶级来没收那一阶级？）而且要动摇着广大的自耕农的中农与贫农，是一危险的口号，特委对于这一问题的动摇，并不如你们在红旗上所说，因为反对没收一切土地所以不能主张平分一切土地，其实因为党有了富农路线的领导，所以对于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便要说是接近脱洛斯基主义了。对于雇农与红军及其家属，必须分配他们以上地，并要好的土地。反富农的斗争必须十二万分的加张，党内的富农分子要立刻开除出党，政权中红军中以及一切群众组织中的富农分子，要从斗争中将他们洗刷出。贫农团的组织只限于乡村，要先从苏维埃政府中的贫农雇农分子组织起，发展到贫农中的积极分子以至包含到全乡村的贫农。雇农要在这里面起领导作用，即以雇农工会的乡村小组整个加入，贫农团要成为乡村苏维埃的柱石，吸引着中农在他的周围，而巩固反富农的斗争。

五、红军的改造与巩固，是目前苏维埃区域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在湘鄂西这一任务尤为严重，二六军的成份，六军原来虽多是农民，但并不都是真正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农民或其子弟（因为没有彻底平分土地），而二军更多是土匪出身的成份，又没分得土地，因此，他们对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保卫观念是不强固的，这里，就存在着一种危险，现在要广大的征调自愿的雇农贫农与中农到红军中去，这就必须实现彻底平分一切土地的农民基本群众的要求，只有基本农民群众都已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则他们自己及其子弟加入红军去保卫和扩大土地革命胜利的决心和需要也才愈加增高。同时分配土地给红军及其家属与优待红军的一切办法必须尽量实行，这样红军成份的改造与扩大，必然能见诸事实。红军中的工人干部你们应选拔当地的手

工业工人与雇农给以短期的训练，首先分配他们去担任政治委员或连排长或做政治工作，似学习军事经验，兵士中有战斗经验的人，也应引进他去充当指挥的干部，政治委员的领导在红军中必须提高起来，他要成为监督行政代表党指导政治工作的中心人物。铁的纪律必须成为巩固红军的必要前提，而且要养成每个红军人人自觉的遵守。红军的群众工作，你们必须依去年十一月的中央训令全部执行。只有使红军真正成为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的阶级军队，使红军真正成为实行土地政纲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军队，则红军才能得到广大群众坚固的拥护，鄂西群众拒绝为红军做被的严重现象，才不至于复现。二六军的改编，中央决定苏大会后改为第三军。军事学校的学生成份必须将富农清洗出去。

此致

布尔什维克敬礼！

中央

附：特委二月分三封短信，因在昨日始收到，故只能大体的说到，不再详细复你们了。

湘鄂西特委致邓中夏信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六日)

在实话报上已看到开了四中全会，请将决议案从速寄来，并请将中央的各种刊物、书籍，以后少点都可以，必须要迅速寄下，以免失掉时间性。

近来长江局对我处指示简直没有，顶好我处以后与中央直接发生关系，请答复。

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内的附件，附图，我们一点也没有，请即刻寄来，因为对于红军的编制，工会的组织等，我们都没有办法。

兹将特委给邓中夏的信录如下，请阅：

“中夏同志：特委紧急会议决议案是你亲笔写的，巩固苏区根据地这一路线是你来传达的，你又最后指出湘鄂西的逃跑主义的危机，但是你在行动上完全违背这一路线，自二军团走后，有四个多月没有与赤区取得联系，又正当白军加紧进攻赤区之时，我们只有坏枪数百支，而子弹又非常缺乏，敌人一万余枪向我们进攻，兵工厂、医院均被焚毁，损失二十余万元，牺牲群众万余人，沔阳群众完全反水，数百里赤区几乎一处不被白军摧残，我们认为湘鄂西的党现在遭受了这一严重的打击与困难，完全要你负责。因为你根本违背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实行逃跑主义不要群众和苏维埃根据地，疯狂似的乱跑，把中国革命向后抛置。我们写给你们信不下数十信，均置之不理，不知是何用意特此向你提出严重的警告。希即星夜驰援赤区，并转知小康同志先来。你们回苏区的路线，是由公安或安乡，到石首华容。余情由状民同志面告。不赘。”

湘鄂西特委会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六日

中共湘鄂西特委给中央的信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中央：

关于土地问题有两点还未了解，请答复。

1. 国际东方部对中国土地问题决议说，要平分一切土地，连农民的私有土地都包括在内，事实上就是没收一切土地拿来平均分配了。过去认为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是托洛斯基主义，究竟应怎样？

2. 土地出租问题，过去认为坐收地租的便是地主，现在土地平均分配后，是否可以出租？理由怎样？

湘鄂西特委

中央给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第二集团军前委，各军前委，各特区军委，
各集团军与各军的军长政治委员的公函

——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补充指示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

亲爱的同志们！

中央这次给你们训令(一九三一，二月)是关于国民党军阀准备第二次大进攻苏区与红军时，苏区与非苏区各级指导机关与红军的一般任务与战略的指示。你们应迅速的使红军兵士明了，根据战斗的环境情形，研究并决定方法，以便迅速的见诸实行。现在为了补充这个训令，特给你们这封秘密的信，更具体的指示你们怎样应付军阀的新进攻。望即按照执行。

(一) 国民党军阀进攻各苏区的整个计划，我们还没得着确讯，仅知道些在江西方面的消息(谍报的材料附上)。他们认为江西苏区是主要的危险，在第二次进攻各苏区时，除了一般的加紧进攻外，最主要的是进攻江西苏区与打击红军一三集团军，故残酷斗争的重心当在江西。

他们第二次进攻时期决定六个月，整个进攻计划，分为四个步骤进行。第一，调遣并集中部队，以及建筑军事工程；第二，在战线区域，实行清乡，消灭革命分子，巩固政权；第三，大举进攻以破坏红军；第四，取包围形势封锁红军。关于总攻击期，我们尚未得着确实消息，但应估计到已快要开始，因为清乡系与集中军队同时并举，而集中又是非常迅速的。(当地已有什师，所需增加的已不多了。)

(二) 敌人在第一次进攻失败后，他们知道了我们的力量，知道了广大的农民群众正在誓死拥护红军，知道了只给我们一个短促的打击，要消灭苏区与红军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第二次新进攻计划的战略要点，准备在较长的时间内和我们作有系统的斗争以消灭苏区，并正确的估计到要同红军作战，同时必须与农民斗争；因此须有相当的时间，预计约须六个月。此外，国民党军阀更鉴于在第一次进攻时，各派的军阀们，各行其是，相互间无具体的计划和密切的联系，指挥不能统一，这亦是失败原因之一。所以在第二次进攻时，想要改正这个错误和弱点，蒋介石遂委任何应钦为进攻苏区的总指挥。在军事上来讲，何应钦是个比较能干而努力的军官，并能收相当统一指挥之效。现在我们虽无确实的根据，但对此必须要估计到的。

根据我们所得的材料，敌人似乎不采取“包围苏维埃区域”的计划了。这也是他们学得了斗争的经验，知道前次围攻苏区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可靠的部队不够。要想围剿红军，消灭苏区，必须有大批可靠的部队，加以苏区领土的宽广，红军又能打破任何包围的敌人，所以他们现在预定不取包围形式，而取集中力量，以便打击我们，这亦是应该估计到并且应该准备怎样应付的。

(三) 我们为了要有正确的战略，指明我们的前途，首先对反革命营垒，必须作个简单的分析：目前国内正遇着非常紧张的财政与经济的恐慌。帝国主义者，虽已允诺借款(帝国主义者因鉴于银价低落，故允借给中国大量银块以加重奴役，而金子是不借的)，但至今未支付分文。军队与官僚大宗款项的支付与消蚀，苛捐杂税田赋的加重，物价的腾贵，资本向工人阶级猛烈的进攻，失业工人的日见增加，甚至连黄色工会都要取消，不断的逮捕与屠杀共产党员，即略有革命嫌疑的分子，亦遭逮捕，屠杀无辜的工农日必数起，

这样来施行疯狂的白色恐怖。

南京政府同张学良，虽尚未正式开火，但互争雄长，裂痕毕露，迟早必走到公开的战争。冯玉祥盘踞山西，指挥着旧属部下，静待时机，最中心的是窃伺着蒋张的隙缝，准备卷土重来。张发奎白崇禧企图割据广西与西南各省。吴佩孚已重新起来，率领了三万军队，直捣甘肃与陕西的南部，并打算组织中国的西北政府。四川军阀的割据与他们中间相互的火并，已成为经常状态，从未对南京政府表示过服从。

这就是国民党所谓的统一（尚无须说到苏区，更是统一的好标志了），而南京政府却自己替自己吹嘘，来掩人耳目，高唱什么“统一”“和平”，其实正如破衣烂布，日见破裂。并且更实行欺骗政策，以国民会议来号召，定期今年五月五日开幕，为的好取得落后的庸人来歌颂国民党统治的巩固。

统治阶级为着保持统治地位，正与苏维埃区域作殊死的斗争。南京政府认为在目前环境之下同我们斗争是最根本的任务，比其他任何任务都更要重要与紧急。他们深深知道，如不解决这一任务，则南京政府不久就要走上死亡的道路；所以他们不惜竭尽全力来反对我们，而我们对敌人这一进攻亦正不可一刻忘记的！

国民党的军队，是些不健全的，士兵的生活是极痛苦的。他们没有任何一师，能经常领得军饷，没有任何一个兵士能按时得着月饷，自然他们的战斗力也就薄弱了。在江西的二十师及正在开拔的各师，还比较有战斗力，其他则都很薄弱，他们遂不能很严厉的反抗我们。自然国民党在进攻以前，还会用些改良欺骗政策，发给一部分的军饷及较好的衣食以诱骗士兵作战，但如果我们能深入到苏区及非苏区的敌人广大军队的士兵群众中去，加紧破坏他们军队的工作，削弱他们改良欺骗的影响，破坏他们战斗的力量，则他们虽有三十万以上的军队，亦将无能为力了。我们在此已特别注意这一工作，并刚开始相当的结果。

（四）反革命营垒中的情形既如此，即令军阀如何加紧来消灭我们，我们依然要提出击退敌人第二次的进攻是我们的任务，这就是说我们在湖北，湖南，江西，有可能建立巩固的苏区的基础，你们应将另一训令迅速执行，以求任务的实现。国民党不惜一切来反对我们，但终是孤注一掷。他们的失败，即是我们事业的成功！我们的任务是击溃他们的实力，破坏并解除他们的武装。各区红军应最高限度的坚决的去执行这一任务。我们应当担负起来，而且能够，并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执行这个任务。在战略上，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他，这也是可采用的战略。总之不应执着一端，而固守某一办法成为不可改变的定理，这是容易造成失败的前提的。我们作战，只有一个是不易的法则，即是时刻不忘与群众武装斗争的配合，此外，都是要我们站在主动地位而支配作战形势的。

同时，我们认为也必须要估计到另一个前途，因为纵令我们有最顺利的斗争条件，我们还不能有一切胜利的保障。如万一我们在江西或其他区域，未能击退军阀的进攻，则将采取何种策略？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要使红军的基本力量受着摧残，必须非常慎重的应付决定胜负的战斗，因为某区的红军基本力量的破坏，就是说遭受着很大的失败，必致该区红军，难于灵敏行动。若遇环境不利，

不能作殊死战的时候，为着阻止敌人的猛攻，应一面继续战斗，以掩护基本部队的撤退（基本军，师，团），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在这种情形之下江西（shjn jucz）的红军，可退至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第二集团军可退至鄂西，湘西北及川东，其他各军退却的方向，可由该军军长及政治委员决定，当着特委或军委在该地时，则应由特委与军委决定。

凡红军所在地尚未实行分配土地与建立政权的时候，必须立即动员群众，实行党对土地问题的口号，组织新的地方苏维埃政府。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这样做，我们的事业，还是没有失败的。环境变更依然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我们能变更自己的斗争策略，扩张已有的而组织新的区域，直至在一省或几省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夺取基本的根据地以扩大全国革命。

（五）在这次训令中，已详细说过我们目前的任务。那些任务都是非常迫切重要的。无论是在前进或退却的时候，都应根据各地具体环境，临机应变，坚决执行。我们不再重赘，现在只指出在这次训令中没有提到的几个重要问题或说得太简单的问题。

苏区内的阶级斗争是非常尖锐化的。阶级的敌人不仅企图从苏区外边来破坏我们（军阀的进攻），而且企图利用苏区内仇视我们的分子，实行内外夹攻。同时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富农，地主残余及其附庸——陈独秀派，托洛茨基派，改组派，AB团都是不遗余力的来破坏我们。我们党的组织和红军的领导是处于非常复杂的环境中。阶级的敌人，企图以挑拨离间的方法，破坏我们队伍的统—，破坏或拉拢这个反对那个，以减弱我们的战斗力，陷我们于最后的失败。

我们绝不能在江西（shjn jucz）或也许在其他区域（我们所以说也许，因为还没有接到报告）已经是万般如意了。敌人在他的工作中，已有了很大结果。陈独秀主义者一直到现在，还说红军是土匪，托洛茨基则认为不然，命令陈独秀主义者加入红军中进行破坏的工作。南京政府亦以巨款，向苏区进行斗争，企图收买我们的个别的工作人员，以破坏我们。

我们应永远估计到：在阶级敌人的破坏工作中，如果我们要是破坏自己的统—，即在我们负指导工作的同志中，虽仅有很小的裂痕，都必然是给敌人利用来破坏我们的最好机会。所以我们只有团结一致，使我们的队伍象钢铁一般的坚固，为国际的路线而斗争，反对阶级敌人的奸细，巩固党与红军的纪律，坚固党与红军的统—领导，这才是击退军阀进攻，得到胜利的根本必须先决条件。中央特别指示并警醒各地做指导工作的同志注意这一问题。最近在江西（shjn jucz）的领导机关中已有意见的分歧，无论如何应立即消灭这种分歧的意见，应将一切力量集中起来，针对着军阀的进攻。

（六）现在各部红军中都组织了政治机关（军师团的政治委员，营连的指导员，政治部等），但在第七军则比较薄弱不健全，它没有充分注意建立苏维埃政权，没有分配土地，没有组织农民，你们要采取最有力的方法，努力去消灭这种绝不容许的现象。政治机关没有努力的工作，便不是也不能使红军成为有阶级觉悟而有战斗力的队伍。红军如果不宣传分配土地，不帮助农民分配土地，不煽动与帮助农民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就不能成为革命的军队，也就不会是红军。这就是红军与军阀军队的不同。正因为红军中政治工作的不充分，使党对土地问题的路线，就不能执行，或不能充分执行。所以过去在福建某部队中曾发现红军兵士逃跑甚至倒戈相向来反对红军的事

实。

中央热烈迫切的希望你们特别注意信中指示的问题，并将一切指示迅速切实执行。

（七）党在非苏区内当更加努力的帮助红军。我们当从各方面来进行，用最高限度的力量来帮助红军，帮助你们。此致

同志的敬礼！

中央

注释

副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共湘鄂西特委关于苏区内军事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三月三日)

中央：

(1) 自二军团离开赤区游击湘西之后，白军即加紧进攻赤区，而赤区的武装，过去因为在立三路线之下，已完全集中到红军中去了，虽然由二军团拨了几十支快枪，而子弹平均不上一排，统计各县枪支不过三百多支，以此敌人向苏区进攻难以抵御，虽经党的领导运用群众力量和旧式武器的效力，与敌人支持三、四月之久。结果武器有相当的发展，而赤区中的中心城市如监利、沔阳、潜江三县城及郝穴、新厂、毛家口等均相继失守，洪湖中心×被摧毁，第一、二医院和兵工厂，均被破坏，公家损失达二十万元以上，群众×××××不下数万户，牵去耕牛达三、四千头，这些损失我们无法统计。白军更惨无人道的奸淫妇女，屠杀群众不计其数。最近敌人更进占藕池，有进攻石城的可能。如石城失守，则调弦亦难保守。如此则湘鄂西的赤区，无一片干净土了，而联县政府与特委均要过游击生活了。

(2) 进攻赤区的白军的主力，是徐源泉之四十八师，系北洋军队，战斗力×××能实行蒋介石所×“步步为营”的办法，因为北[白]军长于防御，所以进攻夜袭均未能[成]功，只能增加敌人的恐惧心理而矣。而且敌人明知我们二军团已远离赤区，更有轻视赤区的观念，就敢于长驱直入，甚至我们在火线上向他宣传，要他们缴枪，他们回说：缴枪？是红军回来了差不多，谁不知道你们是小红军？

(3) 除了徐源泉部之外，还有四十四师萧之楚部，自沔阳、潜江进逼洪湖。容景芳旅由新堤进逼螺山。监利县城系刘培绪全旅。张英师系川军，由南县进攻华城。李国均旅由安乡进逼藕池。陈诚部由岳州开来两团人以及各县残余团队。合计有枪三万余支。

(4) 本来以这样少的地方武装，当然不能抵御这样强大的反动势力，早就有完全塌台的危险。不过因为：(a) 军团在松滋、杨林寺失败，逃回赤区的有两团人，可是合计不上一千枪，子弹非常缺乏，力量虽不大，可是增加了赤区大部分武装，卒能配合群众与白军激战十余次，夺获机关枪、迫击炮各二架；(b) 军团虽未回赤区，虽然与我们失了联系，可是尚能在松滋、石门一带游击，消极的可以牵制进攻赤区的白军不少。但最近二军团更往上逃跑了，跑到鹤峰去了，所以湘西部队都能够抽调来进攻赤区。现在形势，湘鄂西赤区确实危险万状。

(5) 此次湘鄂西赤区遭此严重打击，完全是二军团行动的错误。他们两次占领津市，不知回赤区一转，加以补充再向外发展，尤其是后一次由津市退回公安，而不到石首来。中夏同志来信，反要特委全体到松滋去同他们开会，将大部分红军移至松滋，以致遭受敌人的袭击，而有杨林寺之惨败。他们退回鹤峰以后，仍然可以由松滋经公安到石首赤区，岂知他们又不此样图谋而又攻石门，又在石门失利，而又缩回鹤峰。最近又有到宜都之说，不知确否。他们此次的行动，完全和中央及国际的路线相反，他们始则价[假]左倾的空谈，而实行其不要后方的冒进主义，继则见军阀战争停顿，白军包围赤区的声浪很高，又实行其不要群众不要苏区的上山主义、逃跑主义。他们或许要说鹤峰也是苏区，而不知鹤峰虽然表面上是苏维埃政权，但是没有群众基础，根本不能来[成]为苏维埃根据地。他们更忘记了中央的指示，二军

团主要的要威逼武汉，要截断武长铁路。

（6）我们现在最感困难的问题，就是伤病兵大多（有千余人），万一敌人进占石城、调弦，则我们的退路完全没有了。这些伤病兵无论如何不能抬起过游击生活，而又没有方法安插。

（7）我们本来决定“三八”召集第二次特委扩大会，讨论四中全会的决议，现在形势日[益]险恶，各县交通渐次断切，尤其是特委所在地（调弦）亦将遭受敌人的摧残，所以暂时停止开会。

（8）我们遭受此次这样大的挫折与困难，完全是立三路线纠正得大迟。数月来，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以致不能及时的纠正二军团的错误行动，及至三中全会决议到后，而二军团的交通更不容易通了。这是过去长江局没有充分的指示，而中央以为有长江局的指示，遂不能与我们发生关系了。又加中夏同志来后，其本人既不能深切了解中央与国际的路线，而又实行其家长制度，事事不征求我们意见，而独断独行（如此次撤换德昌同志的军长职务没有经过特委通过），因此种种原因，遂铸来现在的局势。我们希望中央根据这个报告，予以明白的指示，以挽救此一危机。

此致

布礼！

湘鄂西特委

三月三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中共湘鄂西特委给中央的信

——反“围剿”的军事部署及“进剿”白军近况等* (一九三一年三月七日)

中央：

1. 阳日 反攻石首不得手，敌人向调关节节进逼，辅以飞机、兵舰。特委决定将医院及各机关笨重物品移至洪湖，以作万一的准备，而仍以新六军及军校扼守焦山河、调关之线，加紧布置地雷及各种防御工作，尽量与敌人支持。同时抽调赤色警卫队、江右各大队巩固华容，并以主力占领注滋口，进攻明山头，威胁南县，以牵制敌人。且以新六军之另一部配合监利地方武装，发动广大群众袭击敌人，以巩固洪湖政权，并转移敌人进攻调关之目标。

近几日形势又渐趋和缓，因南县方面敌人力量薄弱，已受了我们的威胁。官垱、梅田湖一带李国均部没有什么动作，仅石首徐源泉部每日以小部队向我们侦察，经我军几次迎头痛击，已向前推进十余里了。据说二军团又接近公安，若然，则苏区即可转危为安。子弹到时，我们决再举行反攻，现在子弹完全打完了。

2. 兹又几个问题，请答复：

(1) 土地是否禁止租佃制？

(2) 湘鄂西是否应改为湘鄂边？

(3) 为什么这次文件上又说是湘鄂边中央分局？

(4) 军团是否应改为集团军？

3. 红军编制表、党的组织法两种文件我们未见到，请补发。

4. 关于苏区情形、党的工作及红军状况，最近准备另作详细报告。

湘鄂西特委

三月七日

附：

摘抄《湘鄂西特委三月二十日给济时同志信》

湘鄂西赤区中心除调关、石滋、白螺等处外，无地不受白军蹂躏，焚烧民房数千间，一、二医院及兵工厂均被捣毁，仅苏维埃便已损失二十万元，同志及群众都有牺牲，不过武装反增加了数百支步枪、两架水机关、两架迫击炮，可惜子弹缺乏，水机关[枪]不过推着好看而已（我们的兵工厂和军医院是二月一日被白军焚烧的）。目前第一个问题，只要子弹有办法，还可在清乡当中扩大我们的武装，扩大苏区。再，军医院既烧，数千伤兵无医疗治，是非常疼心的事。至于采办军械及药品的经济，无多大问题。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即七日。

中共湘鄂西特委关于红二军团与苏区失掉联系后的经过报告*

(一九三一年三月七日)

中央：

国民党军阀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利用军阀战争暂时的停顿，大举围攻苏区。五月以来时时都在血肉相搏中。湘鄂西过去在立三路线笼罩之下，一切地方武装完全集到红军中去，剥[削]弱了群众自卫的能力，而二军团游击湘西（×县）与苏区失掉联系，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现各地政权均受极严重的挫折，的确走入了最紧急的时机。兹将经过情形报告于下：

自去年九月间红军配合江、石、监、华四县十余万群众攻下监利以后，监、沔、石、华、潜、南、公七个县城均为革命势力占领。湘鄂西苏区上抵沙市近郊，下抵仙桃后川，北至天门，南至安乡，纵横千余里，造成整个赤色疆域。当时因一、二军二次反攻长沙失利，二军团威胁武长路任务不能达到，乃决定进攻津、澧、常、桃，以压长沙之背，红军遂全部入湘西。因此巩固苏区的任务，惟一的是依靠群众力量。二军所留之枪好坏共仅八十余支，集中各地武装一共仅三百上下。当时的布置是：1. 依照长江军委颁布之红色军事组织大纲，把所有群众一律武装起来。a. 赤色警部〔卫〕队（野战军），江、石、监，沔、潜、华、南、公、天、松各县成立一大队，经常在外游击，仍系志愿兵制，用新式武装，脱离生产。b. 赤色教导军（红军后备军）以十八岁以上到三十岁之壮健男子编成，以县为军管区，区为团管区，乡为连管区。各级苏维埃军委兼该管区之赤教军官。江、石、监、沔、潜、华各成立一军，使用旧式武器，不脱离生产，随时可动员到前线参加作战。其他各县未正式成立。c. 赤色守备队，以三十岁以上之男子及壮健妇女编成，担任哨卫及肃反等责任。后为指挥便利起见，江左江右各设立指挥部，以统一军事行动之指挥。2. 重新改选各级苏维埃，并改选湘鄂西联县苏维埃。同时进行清理苏维埃运动，驱逐富农以及腐化官僚化分子出苏维埃。3. 按照人口及劳动力混合为标准，以乡为单位，重新分配土地（仅平分所没收之地主阶级土地），4. 加紧肃反工作，破获江、石、监、沔各地非法组织（改组派）并歼灭其首领。5. 转变党的阶级基础。在十月革命、广州暴动各纪念运动中，都吸收了很多工人党员。以上布置可说都得到不少的成绩，特委及联府均由监移驻调弦，以便与二军团取得联系，向湘西、武长路推进。接着敌人便大举向赤区进攻，白军刘培绪旅进驻监城，川军郭勋部进占郝穴，四十八师进逼沔城、潜城，川军张英师进据华城。特委号召全党，坚决反对逃跑主义，领导群众死力保卫苏维埃政权。于各县鼓动群众的斗争勇气，组织挺进队，运用刀刃战术夜袭敌人。曾以群众力量先后克复酒阳、华容两县城，进逼仙桃、南县，四次夜袭郝穴，虽来得手，而郝穴、监利敌人非常恐慌，死守不敢下乡烧杀。赤区疆域，除监、潜两县城及郝穴市而外，未受若何损失，时值二军团由津、澧退回松、公一带，中夏同志不但回顾苏区，反要特委全部到松滋开会。特委当即派人前去回商，要其回师苏区，巩固的向外发展，以及收复已失苏区及造成公、南两县赤色区域。殊未及会晤，即遭杨林寺之惨败（松滋境内），他们竟率全部逃跑上山（鹤峰），仅溃回六军四十八、五十一两团之各一部及二军之十二团，合计枪一千左右，而子弹则每枪数粒，或则全无。初编为六军，以德昌同志任军长（二军团派德昌回后方工作）。以后敌人更增加徐源泉全部占据我河城、峰口、柳关、毛家口等处，进围洪湖，

监、沔政权，塌台大半。白军陈诚师亦同时进据华容，形势日益严重。洪湖险要，尽为突破，医院亦遭焚毁。幸我们集中力量，连鱼须之役，击溃川军，缴获子弹甚多，士气为之一振。遂以红军配合江右武装群众，再次攻下华容，又能支持危局。旧历年关得二军团由鹤峰来信，大夸其上山后之收获（缴覃伯谦、甘占元枪二千余支），并要我们集中力量，进攻南县、安乡，响应他们入石门、津、澄的行动，完全未提及回苏区的话。我们当即回信，以其违反国际和中央路线批评，坚决纠正这种藉“左”倾空谈的错误。他们进行[攻]石门遭受打击，又复退回鹤峰老山上去。敌人第一步进攻洪湖计划已达到，知我们重要机关多迁来石首，于是又开始第二步围攻石首的计划。敌人乘我红军过江左进攻江陵胡家场之际，进驻堤头汪家桥，突破我在北区之冯家小河口之线，将我兵工厂及医院破坏，全区民房焚烧殆尽，损失达二十万以上。及我红军由江陵回师反攻，敌人始退出石北区范围。拖予铺一战，大获胜利，缴获步枪百余支，迫击炮两架，水机关两挺。但我军死伤亦甚大。四十八团团团长桂伦同志及团政委均阵亡。同时川匪复陷我华容。当夜反攻，敌人受创虽巨，但死守不出未能得手，我四十八团政委谭杭同志饮弹阵亡。相持至二月下旬，方四次克复华城，并肃清华容全境之敌。在这一形势之下，敌人不〔又〕调集各方丑类，进行第三步计划，江陵之沙岗，石首之藕池，监利之朱河三地同时失守，又转入极严重的境地。昨日我军为击破敌人的围攻，进攻连鱼须对岸梅田湖之川匪，缴得长短枪二百余支，而藕池敌人乘虚陷我石城。今晨拂晓，我红军及江右赤色警卫队配合群众力量反攻石城，尚无结果。现时形势，洪湖已渐和缓，沔阳赤色政权恢复大半，现正积极计划进占峰口，监利亦尚能在洪湖附近勉强支持。因敌人力量集中在江右方面，监、酒敌人势力较弱，已返攻为守。但江、潜两县几全部塌台，石、华两县仍在敌人环攻中。计进攻湘鄂西苏区的白军，有徐源泉部六旅三团，萧之楚一师，张英一师，李国均一旅以及各地团匪，合计武装在三万以上，而川军郭勋部则进攻长阳归巴赤区，川军罗、季两旅及湘军陈渠珍、李觉等则进攻五鹤赤区。总之，除华、石之调弦及桃花山一带而外，其他各地，均遭白军蹂躏，被屠杀的群众将以万计，烧毁的房屋不知其数。在这敌人围攻的过程中，全凭群众力量去抵御，因新六军的力量有限，并且四处受敌，更无法兼顾，所以我们的主要方法是，运用游击战术，各个击破敌人，并发动广大群众将敌人所驻地紧紧地箍着，断绝敌人的交通，挠乱敌人的后方。同时加紧瓦解白军的工作，以动摇敌军。但敌人亦异常狡诈，步步为营，波浪式的推进，每到一地即逼迫群众反水，组织铲共团，而党的领导薄弱的地方，如潜江、沔阳的一部分群众，经不起敌人摧残的烧杀，大多数受其牢笼反水。我们认为在敌人的围攻中，其所以受着这样大的困难与挫折，当然在工作上有许多缺点，党的领导力的微弱，苏维埃政权得不到广大群众生死存亡的拥护，群众缺乏自卫的能力，使苏区不能铁一样的坚固。同时，城市工人斗争未能发动起来，白区游击战争还不普遍，瓦解白军工作不充分，因此不能牵制敌人进攻苏区。但二军团远离苏区，一味逃跑，置苏区于不顾，也是造成这种形势的主要原因。一直到现在，二军团还是没有信音。现在我们地方武装已发展到一千五百支〔人〕左右，新六军亦有相当发展，交通较便，以大部新式武装配合群众力量，仍可与敌人周旋，而留江右赤色警卫队（三、八、九、十四（个）大队约枪七百支）于右、华一带，以牵制敌人。

上月曾作数次零碎报告，请根据这些报告给以详细指示。

湘鄂西特委

三月七日于石首调弦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所判定。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二军团前委的信

——关于取消前委，改编二军团为三军，撤消邓中夏职务，派唐赤英为三军政委等问题*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二军团前委：

1. 兹遵照中央决定，撤销中夏同志各种职务，并派赤英同志前来代理政委工作，全军同志应在云清、赤英两同志领导之下，坚决执行中央及中央分局的指示（见另训），彻底转变二军〔团〕政治路线。

2. 依照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前委应取消，由总指挥、政委负全数责任，在必要时可开军事会议。二军团改编为第三军，共编为二师，仍以〔德清〕为军长，赤英代政委，其余负责同志依次改编，以下改编为原则。

3. 剑如同志如工作积极，能改正过去一切错误，执行路线的转变，仍留军中工作。

4. 部队东下时，须留比较可靠武装，并放得力军事人才巩固五鹤政权。决定以小康为中央分局特〔派〕员，留在各当地指导县工作。

中央分局

三月二十一日附：

中夏、云青、勉之、德清、

接照中央决定，湘鄂西特区党中央分局已于三月二十六日组织成立。中央分局根据中央对红军的训令，中央对湘鄂西党务、军事、政治工作及二军团的任务的指示信，对于二集团军的同志有下列的指示：

一、四中全会的总结与党的路线转变。共产国际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给中国党的公开信指出：中国党的领导是执行以李立三同志为领导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这个路线是与共产国际去年七月规定的中国党的路线原则上绝不相同。立三路线没有估计到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实际上取消了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否认中国现在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实际上是忽视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放弃对于工人运动的领导；不从斗争力量对比出发去分析革命运动形势，而空喊暴动，实际上是取消党对群众斗争的领导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就是真正暴动的准备工作，不估计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弱点，实际上放弃土地革命和巩固红军苏维埃的任务；而且还认为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一定就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没有间隔的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而且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在全世界已经成熟，实际上就是取消中国革命首先胜利的前途。因此，立三路线是在左倾空谈之下遮盖着消极，实质上亦就是机会主义，例如，托洛次基主义亦是这样的。立三路线引导到消极，引导到失败，而可以引导到危险的冒险。

党的三中全会对于立三路线完全采取了调和路线，实际上是继存立三路线，这就是因为在两面派的秋白同志领导之下所造成的错误。而且在共产国际十二月来信之后，党的中央虽然开始向国际路线的转变，但是还是没有揭发三中全会是路线错误。经过国际的纠正和党的群众的反抗，中央在八十六号通告时表示回到国际路线。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在国际直接的领导之下，举行了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四中全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和过去来信，纠正路线的错误，改组了中央政治局。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年代为编者判定。
原文有几个人名缺损。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综合报告

(一九三一年四月三日)

中央：

兹有数事报告：

(1) 军团方面已派唐赤英同志同交通去了。另外还派一交通从他一条路前去送讯。昨晚得到一个从二军团回来的兵士说，二军团已到松滋宜，但尚无确讯来。

(2) 新堤之敌因花园敌军叛变已开走。朱家河之敌被我军（段德昌军）击退，退守监利。还有开往沙市的敌人似重视江南南华安，对江北取守势，或系二军团下来沙市变动，我们现在是集中红军击破敌人弱点，发动游击战争，从各方骚扰。

(3) 此间军事政治学校拟即 一班新生 名。从上海来的工人同志及此地挑选出之雇农、贫农、红军士兵预备作二军团内之政治指导员，请中央派几个军事、政治教官来。

(4) 此间医院伤兵一千多名，因此医生须多派几个来。

(5) 学习农村工作之学生，务请派五个以上的来。

(6) 中央各种重要文件及《实话》、《群众日报》，可由邮寄来，一个星期可收到，请即刻对此方写指示信。

(7) 湘北特委（平江、岳阳）他们有无发〔线〕电，但没有人，请派两人来，一在此问，一派到湘北去。将来还请派一个到二军团来。

(8) 我们过去讯湘北特委，要他们通知湘东特委，孔荷宠军应在湘赣交界发展，阻止敌军湘赣交通，扩大苏区，独立师应配合平江力量进据岳阳、临湘，发展游击战争，以威胁武长路，使敌人不能集中力量去打击南华安。湘北工作应以平江为根据，发展鄂南、湘北，与湘东联系，造成一整个苏区，不必急急占领岳阳（因他们有此提议）。这样提议，是否正确，请指示。

(9) 湘北 无人主持。 湘西没有工作。这是湘鄂赣区之一弱点，请中央注意。

(10) 据报说常德的湖南省委已破获，因此我们不敢派人去发生关系。听说破获原因是自首分子告密。宁迪卿事（据护牺说），中央须注意。

少共中央须即派代表来。

湘鄂西中央分局

四月三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原文约缺七、八个字。

红三军经营荆当远新根据地的计划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

“本军北渡的主要目的，当然是解江陵、石首监利、沔阳赤区之围，惟江、石、监、酒赤区现在白军重重包围之中，本军不宜陷入重围，而应采取击魏救赵之计，占领荆当远为根据地”，“这样去解江、石、监、沔之围才是正确的”。

“本军过去未坚决执行很巩固地向前发展的原则，以致轻于脱离后方，已经铸成大错，当然我们现时不能一错再错，如果此时不顾一切冲入江、石、监、沔赤区，无异自投罗网……江、石、监、沔赤区……小部队跑兵虽可幸存，……但无地势是资依据……而且湖港分歧，大部队难以展开，大部队当然不能藏躲，藏躲是自取灭亡”。

“虽然江、石、监、沔赤区危急，无疑本军应当援救，但援救必选择稳当方法，方于赤区有益，于本军无害。”“从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亦死”。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分局三十号中央五号）

——关于军事、土地、苏维埃、群团、红军、兵运情况及党的状况*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

中央：

现在将这一方面的实际状况报告你们：

（一）军事情形

湘鄂西苏区在今年三月间尚有石首、华容（江南）和监利、沔阳、江陵、潜江六县。石首、华容两县县城是我们占据的，当时联县政府及特委设在石首之调关，监利、沔阳、江陵、潜江只是占据乡村，潜江只是小块苏区。另外，汉川有几块苏区，因为过去汉川的党不是湘鄂西特委所管辖，所以没有与此间打成一片。

敌人“围剿”首先就是向江右（即江南）进攻，石首、华容、调关相继失守，红军段德昌部（新六军）与政府及党特委就渡江到洪湖，以江右地方武装约千枝，以段玉林同志率领与敌周旋。三月二十七曾与朱河敌人一战，我军略有胜利，但伤亡不小，敌人旋即撤退，我们占领朱河（监利之一大市镇）。四月五日我军进攻峰口，伤亡颇大，敌人亦受损失，旋即撤退，我们占铜峰口。自四月五日至十五日，我军整理休息两星期（因为没有子弹）移师向江陵方面发展，占领新沟嘴，缴敌人枪百余枝，敌人即以二团人向我军攻击，被我军击破，获枪二、三百枝，获迫击炮四门，机关枪两架。在四月十五日，敌人对我江左江右同时进攻，江右围攻桃花山，江左同时占领朱河、峰口（此时红军正在江陵作战），江右围攻之结果，敌人完全占领桃花山，赤卫队段玉林部大部分下铜

[洞]庭湖，一部分渡江从江陵到洪湖。

四月二十日前后，我们的估计，敌人在江右既获胜利，必移一部分兵力向江左进攻，“围剿”洪湖。我们认为在军事上已非常危险，当时就

想调红军回〔回〕监利击破朱河之敌人，但是以敌我力量和地势上讲很少把握，如果不能在敌人包围中击破其一点，红军就必须为保全实力起

见实行退却。当时就有两种提议，或由江陵、潜江出荆门一带，将来可与二军团容易联络，或由沔阳出汉川。正在讨论中，从接来上海报纸知道二军团已到荆门一带，于是便决心派红军出荆门，规定红军段德昌部（现改三军第九师，实只一团人）九师的任务，仍是在巩固赤区原则之下去与二军团配合，目的地是到潜江。在讨论中也就感觉着出去接二军团与巩固苏区两个任务，就很难兼顾，九师出发游击到江陵之龙湾、熊口一带，敌人进扰我们的后方，同时二军团又无确讯，因此九师又撤回后方。后来我们知道二军团已退回远安、南漳，因此认为去配合二军团已无希望，决定九师在最近要回监利击破朱河之敌。在五月五日，敌人以一团人进驻黄穴日，正值九师回来，迎头出击，因为战略上的错误，没有结果。

现在军事的情形，是敌人从江陵、潜江、监利三方来包围我们，大约有八团人，沔阳方面之敌大约一师一旅，还可与这方敌人联络，现在包围洪湖之敌已在十余团人左右。中央分局于五月七日开军事会议讨论，五月八日又重新讨论，一致认为现在的形势已异常严重，最后决定移师向沔阳方面给敌人以打击，冲破这方面的包围。如果

一月以来，军事上的结论：敌人虽以大量的兵力向我进攻，大约三十团

以上，但是我们实有打击敌人的可能，如新沟嘴、余家埠之胜利。同时我们军事上却有许多错误，在调关失守后移师渡江是正确的，去进攻峰口，原则是执行选择敌人弱点的计划，可是因为情形不明（当地群众是反水的，连沔阳县委也不知道），却受了很大伤亡。在四月十五，江右失败以后，我们已估计到敌人必移师“围剿”洪湖，当时没有趁敌人兵力尚没有集中选择一点给敌人以打击，却移师去接二军团，这是一个错误（这点是我现时的意见，没有经过讨论——夏曦）。现时敌人既大举“围剿”洪湖，我们仍必须下极大决心去打破敌人“围剿”，要到了万分无把握时，才在保全红军实力原则之下出去游击。

如果红军出外游击，现时后方和江右主要的是发动游击战争，每县总有几个游击队，并且有统一的指挥，我们务须尽可能的保护医院。

后方现时最感困难的，第一，是被迫群众问题。被迫群众就是从石首、华容、江陵逃兵而来的群众，大约还有五千人左右（从前有万余人，现已回去数千人）麇集洪湖附近，靠联县政府发伙食吃饭，现时我们极力鼓动他们回家和准备安插，但是回家很少办法，因为群众都怕回去，安插也很少办法，一旦洪湖政权失守，这些被迫群众更成问题。现时我们正与各方计议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就是医院问题，伤病兵达千余人，要保存其安全，现时有部分是散在民间，但是这些伤兵又有大部分在民间滋事，要钱，要衣，群众自然不愿意，这自然是兵士和群众中党的工作不够，也即是因为红军成份问题。

（二）经济问题

此间苏区因为水路很多，敌人并不能封锁，小商人亦在营业，输出品如棉花、豆（现在已经很少了）亦可到外面去交换。但是现在的困难问题是金融问题，苏维埃政府一切开支专靠纸币，政府发纸币现已达五十万元，自调关失守后，不能兑现，现在每月开支达十五万元，专靠发行纸币开支，现在一方面尽量节省开支，一方面设法筹集现款。但是苏区不扩大，这些困难是很难解决的，因为纸币的不能兑现，有现金者就完全收藏，因此金融不能活泼，商业就很停滞。第二，是粮食问题。洪湖本来米粮仅足自给，现在加被迫群众五千人，红军及机关人员六千，每日粮食就要米五十石以上，现在正吸收富农的多余粮食，拿一部分分给雇农、贫农，一部分集中储藏为红军之用。

（三）土地问题

湘鄂西苏区过去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平分和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雇农与小手工业工人不分土地（如沔阳）。没收的土地有的地方是平分了的，有的土地还在原佃农手里。没收之耕牛不拿出分配而拿来发卖？自然还是归之富农，因此贫农分得土地，因为没有耕牛耕具，他甚至不能完全耕种他的土地。还有秘密还租的事（最近调查出），中央分局成立后，即提出彻底平分一切土地，发动春耕运动，加紧反富农斗争。具体办法是没收富农多余耕牛耕具，没收多余粮食，加紧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进一步的没收富农土地与彻底平分。现在没收富农多余耕具、粮食的斗争，已在监利发动，有的富农私藏粮食一家五、六十石，盐几石。在这一斗争中，一般雇农、贫农，均非常表示积极。现在我们已经决定立刻没收富农的土地，给以坏的土地，分给贫农、雇农。预计一个月，在监利、沔阳、汉川三县就要完全做到。

我们认为彻底平分一切土地，是绝对必须的，没收地主与富农的土地，

平分给无地少地的雇农、贫农，这已经立刻可以办到，这即是彻底平分的一个主要步骤。在某种情形之下，彻底平分就完成了，但在某种情形之下，为了要彻底平分，还要动摇中农（主要是富裕的中农）的土地，则要依照实际情形而定。如果基本农民群众（包括贫农、中农）愿意对基本中农不致妨碍时即刻实行，如果要妨碍基本农民群众时则另设法解决（据说在某一乡中农是百分之七十）。我们现在对中农土地以不动为原则。还有些地方，没收地主的土地已经平分了，现在只没收富农的土地平分。其他一般土地是否重新分配，视当地情形而定。

反富农的斗争，必须成为一个群众的。所以现在正在加紧雇农工会、贫农团的工作，从斗争中建立和扩大这些组织。

（四）苏维埃

苏维埃工作非常不够，严格的说，没有真正的苏维埃，一方面党代替了许多苏维埃的工作，一方面党没有正确的领导苏维埃的工作。联县政府每日的事务就是应付伤兵和被迫群众，毫无组织纪律，一个病兵他就可以找主席团要求两天伙食说半天。乡村苏维埃政府一天忙的是放哨，打路条，开饭。区苏维埃只是一个传达机关，同时苏维埃又什么事包办，不去动员群众，动员群众只是用命令主义，群众做什么事也要等待苏维埃的命令。村苏维埃开会时，什么工会、互济会、党、少共都派代表做报告，讨论的并不是真正苏维埃的工作，只是一些照例的抽象的演说。改选苏维埃由党规定名单在群众中通过，等于包办。最近我们已注意纠正，要来一个彻底改选苏维埃的运动。

（五）群众组织工作

此间一切团体，均是命令式成立的，所有同资格的人通通加入，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差不多都有了，实际没有工作。在反富农斗争中，雇农工会、贫农团已起活跃的作用。职工运动过去是命令式的增加工资五成（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又增加三成，机械的规定一个月多少工资。如少共去年规定青年工人每月工资三十串，有的不到三十串的固然增加了，有的超过三十串的反而减少了。现在职工运动还没有转变。

（六）党内状况

现在与中央分局能发生关系之党的组织是监利、沔阳、汉川、石首、华容、宜昌、沙市、天门、江陵几县。监利、沔阳、汉川是苏区，石首、华容、江陵是失败区域，宜昌、沙市、天门是白色区域。

苏区的党下层非常腐化，照例开会，没有工作，党员发展的速度非常之慢，党内隐藏地主、富农分子。如沔阳，据县委说富农分子就有百分之十。党内命令主义非常浓厚，丝毫没有自我批评，党的指导机关只是忙于军事上的应付，最近方开始转变于群众工作和党的组织问题。党内理论水平线非常薄弱，一般同志只知照上级命令做事，根本就没有懂得什么是路线，有些同时藉口于反对形式主义，实际就走到杂乱无章。中央分局对于建立党的下层秘密组织已十分注意，现在江陵、石首、华容都能有秘密组织，监利、沔阳亦已建立下层秘密基础，这算是组织上的一转变。现在决定一训练班造就党的干部，并已经派一些巡视员到区委、支部去巡视。最近党报也停版了。现在已找到专人负责，即可出版。党内材料已出版《湘鄂西通讯》第一期。妇女工作最近才开始注意。少共工作还没有大的转变。一般宣传鼓动非常抽象。

（七）士兵运动

以前对于士兵运动一般忽视，最近派了二、三十人出去，约有通讯处。

兵运委员会已组织，对于训练俘虏还能充分注意。最近岳维竣兵变一连人来，还有两三连正在接头，我们已特别注意这一工作。我们拟从兵变过来及在此地当过兵的北方人，训练大批派送出去。

（八）红军状况

段德昌部先编成一独立团，最近已编成第九师名义，实只一团。另编有一个警卫团（步枪九百），江左我们就有两团兵力。此外汉川游击队约有一营人，预备编成警卫第三团，段玉林部（在江右约枪八百），编成警卫第二团。警卫团之意义就是无论在何时决不脱离苏区，红军在必要时可以外出。另外还组织有一教导团训练新兵，人数有五百人，尚在继续补充。游击队一县都有几个，作用是骚扰敌人，杀反动领袖。农民武装统编成为教导军，教导军就是一种民兵制度。从教导军中，每于作战时挑选一部分志愿的组成挺进队、红色武装队，现在正加紧注意此种挺进队的形式。红军中政治工作一般都不十分好。

（九）与二军团关系及二军团现状

二军团自去年十月到现在，脱离苏区已八个月，与此间关系非常隔阂。三月间曾来一交通，后来中央分局派唐赤英同志同此交通回去，直到现在，唐赤英同志没有讯来，不知是否达到？我们派出的交通，于四月初回来，只是回了一封很简短的讯，据交通说，他们对回赤区非常迟疑。现在我们已派鲁易同志从宜昌方面到二军团去，至于二军团之行踪，我们所得材料，与报上所载相同。他们实力还有一万人，到荆门时并未受什么损失，徐源泉派出二团人就因为他们吓退了。二军团现在的问题是失败情绪和政治领导问题。他们预备以远安为门户向北推进，大约他们的主力现在南漳一带，很显然的，他们是由冒险的立三路线进到退守山地。中央分局写给他们的讯已有五、六封，现在又派交通去和鲁易同志去，但不知能否转变他们的路线。二军团之十七师，听说还在江南松、枝、宜一带游击，师长是许光达，政委是李剑如。由此地到五、鹤或远安、南漳非常不便，现在只是从宜昌方面派人去。

（十）总结

湘鄂西苏区的群众基础和游击队，敌人无论如何是无法消灭的。现在党的中心任务是要积极领导这一反富农和平分土地的斗争，从斗争之中建立贫农团、雇农工会，改造党和苏维埃，这就可以保障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的前途。从军事上来观察，则现在环境已非常严重了，我们已作从公开转入秘密环境的种种准备。但是我们所采取的策略，正在用尽我们的力量来打击敌人的“围剿”，红军必到万不得已时才采取退却的策略。现在沔阳方面，敌军异常动摇，汉川苏区正在发展，洪湖的群众基础比较巩固，我们完全自信可以取得胜利的前途。在今天说，军事上还是在作进攻敌人某一点点的准备。

湘鄂西中央分局

五月十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原文缺三十余字。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分局六十二号 中央六号）

——关于平分土地、二军团近况、军事发展情形、中央分局和省委的组织问题等*

（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中央：

兹将此间情形简单报告如下：

1. 平分一切土地与反富农斗争，已在监利、沔阳、江陵开始，现在华容、石首均将开始。在这一斗争之中，已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雇农工会、贫农团的组织已普遍，特别是贫农团甚为活跃。在斗争之中改造党与苏维埃亦在加紧。

2. 最近华容敌人大部撤退，江右徐源泉部正在换防，沔阳岳维竣部兵变数连（可惜只有一连到红军，其余因没有接好头，拖到当土匪去了），敌人“围剿”已在松懈。

我军近来增加枪枝一百余枝，五月二十八日在沔阳之瞿家湾即我们政府所在地一带附近二十里之三官殿消灭敌军两连。江右红军在敌人数次“围剿”中，无甚损失。五月十八日敌人“围剿”洞庭，江右赤军渡江左，反消灭敌人两排，缴枪五十枝。现在徐源泉两师调长沙，荆沙归郭勋接防，宜昌归王陵基接防，江右藕池以西归郭勋，藕池以东归张英，包围我们的尽是川军。沔阳岳维竣部听说亦有肖之楚来接防消息。我第九师段德昌部与警卫第一团周荣光部仍在江左活动，江右军段玉林部在江右华容东山一带游击。现在正是我们冲破敌人“围剿”的时机，军事上我们已采积极活动策略，并拟将所有部队统一指挥。目前是巩固现有苏区，在适当时机，集中兵力向外发展，同时组织很多游击队，预备在红军向外发展时可以巩固地方。

3. 二军团始终没有取得联系，赤英去了没有来讯，也许遇险，我很反悔派他去。鲁易同志和宜昌县委书记赶到南漳没有赶到他们，路上无法走通，已经回来。现在二军团在湖北、河南、陕西交界之光华、容城一带。宜昌报纸登载二军团决议案，大意如下：（1）认为洪湖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已无希望可救，于回赤区，等于下井救人，将自投陷井；（2）认为现在只有造新苏区，以荆门、当阳、远安为新苏区（其实该处群众力量非常薄弱，不能做根据地）；（3）遇了敌人一团都不打仗。观于此决议案，二军团完全在机会主义的领导之下，此时无回赤区希望。我们现又派人去并向中夏提出严重警告，他如不将二军团领导回赤区，要向中央提出他的党籍问题。因为据我们从军事上估计，回来是毫不成问题的事。二军团当中有同志反对中夏主张，中夏说他从国际回来，他的路线是国际路线，所以其他同志哑口无言。我们现在并不等待他们。

4. 南方军阀混战，必会在湖南爆发。我们推想，徐源泉、何成浚有去解决何键之可能。我们对军阀混战的分析，认为必然爆发，但敌人“围剿”危险还是存在。因此，现在积极进行平分土地以动员群众，集中军队以冲破“围剿”。准备组织大规模反军阀战争的群众运动，宣传士兵不去参加军阀混战，投入红军。我们认为在此次军阀战争中，我们有冲破敌人“围剿”进入到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之前途，有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前途。具体说，如果江西和湘鄂西“围剿”冲破，有占领长沙的前途（自然不能蹈立三路线的覆辙），希望中央有详细讨论、具体布置和指示。我觉得湘鄂西苏区与中央交通最灵

便，可是中央对湘鄂西工作并不十分注意。自夏曦来后，中央没有一个指示信来。自然我们报告太少（有两次报告），过去中央只认（为）湘鄂西军事系牵制一、三军团作战，其实湘鄂西苏区占很重要地位，北向发展可与鄂豫皖苏区打成一片，汉川苏区向汉阳发展，隔江与岳阳、平江取得联系，可作湖南工作中心，特别在此时非常重要，望中央特别注意。

5. 现定四月十五日 开湘鄂西扩大会议，总结党的工作和反富农斗争中之种种问题。二十日开少共扩大会议。二十五日开湘鄂西工会代表会。在党的扩大会中特重新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统一军队指挥，并决定党代表大会在七月半，苏维埃代表大会大约在“八一”（召开）。最近监利、沔阳、汉川都举行了党的扩大会议或代表大会，同时正在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主要问题是平分土地和反富农斗争的动员。中央分局机关报《红旗日报》已出版半个月了，每日发行两千份。少共、红军医院及各县委均有机关报。党校现开办，学生五十人，还有苏维埃人员训练班三十人。军校现招新生五十人。

6. 锡根同志来说，中央决定此间另组织湘鄂西省委，中央分局另行组织，锡根任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任省委书记。我们以中央决议立即执行，即要锡根同志在省委未成立之前担任书记，但锡根意等省委成立后，再行来开始新的中央分局的工作。因汉川同时开党大会、苏大会，锡根同志便去汉川了。我们准备十五日扩大会议选举省委。但我们再三考虑，觉得省委成立以后，中央分局与省委指导作用仍是重复，比如决定一问题，省委讨论后又拿到中央分局去讨论，其实中央分局三人，省委又占两个，如锡根参加省委讨论，中央分局又讨论什么事？如说中央分局讨论策略，省委讨论其他，那省委成了组织部的作用，将使理论策略的指导与实际工作的指导分开。我们认为中央（决）定组织省委由地方选举是非常正确的，所以组织省委不成问题。至于中央分局，我们向中央建议不必组织。锡根同志可以中央代表名义指导省委工作，参加省委会议，如此似觉简便，不知中央以为如何？中央分局，中央指定三人，除徐、夏两人外，不知是谁？我们揣想或者是周逸群同志。逸群自去江右巡视，即遭“围剿”，旋即下洞庭。敌人第二次围洞庭，逸群与军队分离，传说已遭不幸，又说已脱险，但至今无消息，诚是此间工作之大损失。锡根同志第二次申请书未见。他近两月来政治态度若何，请中央稍为通知。但是我们因为信仰中央，对锡根同志口头传达之组织改变，我们完全执行。

7. 我们现向中央具体请求下列几事：

对全国时局策略上的指示。

对湘鄂西工作的指示。

派一最得力之军事人才来，如刘伯承或聂云臻同志，因为要统一此间军事指挥，必须有一最得力之军事指挥人才，现在我们正为此感觉困难。

要少共中央派一得力人来。

职工运动的派两个来，我们要派到宜昌、沙市去。

理论人才请速派两个来，对于政府经济财政问题有研究的请派两个来。

请中央讨论二军团行动问题，并给中夏以严重处分。因为二军团的同志还在相信中夏是执行国际路线，并请中央对二军团写一信，一方面寄我们，一方面由中央直接派人去找二军团，在政治上挽救这部红军。二军团军官对党关系很好，士兵成分亦好，他们误认中夏路线为党的路线。

请中央通知中央分局与省委间之关系及中央分局与省委各自工作的范围。

我们预备派人到四川省委问他们在川军中有无工作，请中央通知(四)川省委，并请中央注意此事。

可以派到湖南中部、西部去工作之同志请中央派来。张国诚(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可否调来？他是湘西上游人。

(11) 请中央速设立汉口交通处，我们也在设法建立。中央与此间交通线，我们可建设三、四路，现正在进行中，我们相信与此间交通无论如何不会断绝。

(12) 我们向中央宣传部建议，应该经常印发关于国际以及国内时局分析之文章寄苏区，因为我们接不到党报，特别是国际消息材料。我们现在有时不知道自己苏区以外的事，简直世外桃源。得一张《申报》，如获奇宝，最近邮政破获，我们已另设法去定报纸。扩大会议后，我们将收得材料写成详细报告寄中央。近日太忙，不及详写。

附：工兵人才请派一两个来。

《土地问题决议》、《组织问题决议》附上，请审查。

湘鄂西中央分局

五月三十一号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此处当为“六月十五日”之误。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给云卿的信

——要求云清率队回洪湖苏区*（一九三一年六月五日）

云清同志：

上海一别，又有几年了。你在湘西的奋斗，我在国际时闻之兴奋。在三月间，中央派我到湘鄂西及二军团工作，代理中夏同志职务。那知到了洪湖，离你的 有千里之远，本想前来，但因此间工作还没 。前次派人到你那里来，尚未打通联系，真是十分 。现在军阀混战爆发， 大有发展，亟盼你率队回来指挥湘鄂西整个军事行动，务希依照中央分局决定执行，这是中国革命所加于你的任务，而且这是一个光荣胜利的前途。我一定能够担负这个伟大的使命。此致布礼！

夏曦

六月五日

注 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边特委致湘鄂西中央分局信

——特委名单及分工，党的路线的转变及请求* (一九三一年六月九日)

中央分局：

我们本想作一详细报告，因工作与时间不允许，只得去此简单报告你们。

(一) 赤英同志在四月二十七到此，三军已于四月三日出动，因此赶不上，我们即于五月二日召集一分区特委扩大会议(四月二日由小康所领导的五县代表大会所成立的特委)。此次扩大会议由赤英所领导，主要的任务：(1) 反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彻底转变党的组织基础。(2) 改组分区特委为湘鄂边特委，由小康与赤英提交大会通过：周小康、董大山、向经武、王丙南、陈叶平、陈奇谟、屈国元、杨英、孟〔董〕朗九同志为特委，以小康为书记，大山组织兼秘书，经武宣传，小康、经武、大山三人为常委，CY特派员庄兰香参加，特委本决定十一人，现只九人，余两人请中央分局派来，这一名单请中央分局批准。

(二) 扩大会议后，已开始党的路线的转变：

1. 土地问题：豪绅地主家属，不〔已〕分得土地，领导群众去没收，重新分配给贫农和红军家属，富农的好土地鼓动贫农去掉换(赤英同志说，富农应分田，不过分坏的。分局指示信富农不分土地，疑是写错，所以我们执行掉换富农好土地)，对否，请示知。在彻底平均分配土地的斗争中改造各级苏维埃政府。

2. 三军离开此地，留一部分枪支编一庞大而不实的教导师，现已改编一充实的独立团，并实行征调雇农贫农工人参加红军。

3. 正在加紧武装群众的工作，将苏……(此处有缺漏——抄者注)朗担任职……小康、大山二人……未找着一个，宣传部组织……以致各部工作未曾充分建立起来。

(八) 请求：(1) 须很快的派两个富有……经验和理论基础的同志前来参加……层干部亦须多派些来。(2) 将国际中央和中央分局所有文件须设法将全部寄给我们，以便照新路线和策略来执行。(3) 转请中央到宜昌与我们建立发行网。

湘鄂边特委

六月九日于鹤峰五里坪

注释

此系原件所注。

原文如此。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等给中夏、云卿等的信

——命令带二军团回洪湖苏区*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二日)

中夏、云卿、勉之、德清、王鹤、一鸣诸同志：

我们很多很多人想和你们发生联系，始终没有达到。我们非常担心你们的行动，你们现在脱离苏区、脱离群众的上山逃跑，这完全是错误的，这可使得我第二军团要遭受更大的失败。南昌暴动之教训可为殷鉴。

现在军阀混战爆发，改组派与西山派联合成立广东政府。“围剿”我们之徐源泉部已调往长沙，现在郭勋接防荆、沙、徐德佐旅在沙洋，兵口大约三团人，范石生久已开往汉口，京山听说现在没有军队，江陵、监利、沔阳、汉川、石首、华容大部分，但我第九师屡次胜利。你们现在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回到苏区，才可以巩固的发展，在四师巩固苏区口号之下，就可以提高士气。

你们现在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中夏应负主要的责任。三月中，中央来信撤销中夏工作，指他对国际路线是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中央分局现在给中夏一个严重警告，并预定表明：如不服从回赤区之命令，即要开除中夏的党籍，前委同志要受组织上的处分，开回赤区对于你们是绝对的命令。

同志们：你们过去斗争光荣历史，不要被机会主义的中夏路线送掉，快来争取当前的胜利。

此致

布尔雪维克的党礼！

湘鄂西苏区中央分局

夏曦 徐锡庚

周逸群 万涛等

彭之玉 崔琪

六月十二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桂生给中央的电报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二日)

中央昨军来电收到我三军第九师段德昌部现在江陵境内活动阳日缴敌枪二百余逼近普济距沙市百里意在巩固和恢复苏区同日我军警卫第一团占据嘉鱼宝塔洲二小时获枪百余枝敌军郭勋驻防石首华容岳维峻部驻云沔阳容景芳部驻汉川(容部最近进据)苏区南河渡石首华容监利荆沙三河均为我取守势我军大可发展请派刘伯承同志前来指挥军事二军团至今没有与我们取得联系当再派人去请中央将湘鄂敌军移动军——战争消息每日电知日每日用军密发如不能仍须用电台码。

桂生

文日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苏区农民土地问题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八日)

(一) 湘鄂西的党过去在土地问题上主要的错误

平分土地是土地革命中最主要的办法，可是湘鄂西的党在立三路线非常发展的富农路线之下，没有这样实行。虽曾没收地主、富农出租的土地（事实上是没收富农坏的土地），但地主的房屋、耕具没有没收，地主的家属还分得土地（按照人口），有些地方甚至还有秘密还租的事实。至于分配土地，有的地方完全没有分配，还保持着在原佃农的手里；有的地方完全按照人口或生产工具分配，使富农获得土地革命的利益。在分配中，常和苏维埃机关内富农、官僚分子操纵把持，将好土地分配自己和家属及亲戚朋友，坏土地分配贫农。贫农在分得坏土地后，因为耕牛耕具的无法解决，又不准出租和买卖，所以实际就等于没有分配土地。至于雇农，一方面因为我们空喊“组织集体农场”和“维持无产阶级”而没有分得土地或分得很少。另一方面却因为富农怠工而被辞退失业，以致形成一般贫雇农不要土地的现象。至于中农，则更因为苏维埃机关内富农作怪，而且得到立三路线的空谈社会主义的帮助，时有侵犯他们的事。此种都是引起雇农、贫农、中农对党和苏维埃怀疑和不满意的原因。因之在国民党围攻苏区的时候，有些农民群众不但不能积极的为着土地革命的利益与为着拥护苏维埃政权与敌人抵抗，而反有时很快的形成或全区或全县的反水现象。这些现象都是证明我们过去湘鄂西党的土地问题上犯了左倾空谈掩盖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今年四月中，中央分局成立，开始向国际路线的转变，提出没收和分配富农的土地、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提出了要发动反富农斗争的春耕运动。但是一方面因为军事上的异常紧张，一方面没有坚决的迅速的采取具体办法动员广大群众去实现这些口号。这种对于解决土地任务的迟延，这是一种严厉的政治上的错误，但是在红五月中，已开始坚决的转变。

(二) 平分土地与反富农斗争决议之正确

一月来，平分土地的斗争，完全证明中央分局五月十四号彻底平分土地决议之正确。他不仅坚决的指出巩固苏区与击破敌人的“围剿”的主要方针，并且同时又明显的指出了执行此伟大的历史任务应有条件，虽然各地平分土地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但我们就已有的材料可以肯定的说，五月的决议是唯一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他是在国际路线指导之下湘鄂西的路线转变的最大事实。

注释

本文时间为编者判定。

中共湘鄂西省委给中央的电报

——周逸群牺牲，请示中央分局委员名单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八日)

中央：

逸众〔群〕因往洞庭巡视工作回至华容贾家凉（亭），在附近被白军击毙，现将洪湖军校改为逸众〔群〕军政校以纪念他。我们现在开扩大会，中央分局名单，锡根已忘记，请再电告。我九师文（十二）早在江陵普济观与川军杨佚偈团激战八小时获胜，缴械五十枝，毙敌百余，俘二十余人。巧电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年代。

“文”即十二日。

“巧电”即十八日电。

中共中央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给二军团全体同志的信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贺龙同志转二军团全体同志：

自从二军团离开了苏区根据地以后它所遇的生活就是逃跑的生活。二军团的领导者，邓中夏同志，已经完全忘记了工农红军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所负的重要使命，他已经忘记了发展工农群众的斗争，已经忘记土地革命的基本任务，他所执行的完全是一贯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中央认为中夏同志的领导除了使中国革命的失败，使二军团受到严重损失之外，不会其他好的结果。中央曾经不止一次决定把中夏同志调回中央，并且要湘鄂西中央分局执行这一决定，然而因为交通的阻碍，二军团不但[断]的逃跑，没有法子把中央的决定传达到你们那里，但在中央责成湘鄂西分局及省委，无论如何要把中央这一封传〔信〕给你们。要你们坚决的起来，信上，中央决定立即撤消中夏同志反对中夏同志执行的立三路线之机会主义的错误，迅速的转变到国际的路线之下来。

中央必须告诉二军团全体同志，中夏同志在国际的时候，曾经犯过严重的反国际的错误，曾经被国际撤消他的工作，派回中国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那知道在瞿秋白李立三同志领导之下的那时的中央不但不给中夏同志以下层的群众工作，反给他以这样重要的责任，使他继续反国际路线的错误，这真是把派别利益看做高出于中国革命的利益，这真是对于中国革命的罪过。

脱离革命根据地，放弃发展群众斗争，与组织群众的工作，完全放弃工会工作不进行改进与巩固红军的任务，把土地革命的果实，交给富农充满了官僚主义与悲观失望的情绪。这是中夏同志的机会主义最明显的表现，他完全不知道利用革命群众的斗争来抵抗敌人进攻，以至来消灭敌人，他甚至以为退回洪湖等于下井救人将自投陷井，他甚至主张在敌人一团力量的前面，都该逃跑，他并且拿创造新的苏区的“左”的假话来掩盖他的这种露骨的机会主义。

二军团的全体同志，我们坚决的相信只有我们真能执行国际路线，发动千百万工农群众的斗争，敌人是没有法子消灭我们的湘鄂中央分局与省委(即等于过去的特委)，自从开始根据国际路线实行转变以来，不但没有失去固有苏区根据地，而且还能做到苏区的巩固与红军的发展。江西与鄂豫皖等苏区近来都开始执行国际路线得到了空前的伟大胜利，只有在中夏同志领导之下的二军团才一天到晚在逃跑的恐怖中间过着失望的生活。

二军团的全体同志！要保存与发展二军团，要帮助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必须立即撤消邓中夏同志的机会主义的领导，中央认为二军团真正站到国际路线上来，为了苏维埃革命的胜利而斗争。

同志们，目前的政治形势，对于二军团向着湘鄂西原有革命根据地方向发展的可能是非常有利的，湘鄂西苏区民众现在正渴望着二军团的到临，给他们以帮助，当然，我们相信湘鄂西的党没有二军团，他们也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的红军，并且他们现在也正在这样做，但二军团如若能回到原有苏区，则对于他们当然有绝大的帮助。但是你们要注意，中央要你们回向原有的苏区，绝不是要你们从武当山一下子又跑到洪湖与会时无异沿途也不发动群众斗争与组织群众，也不没收地主土地，与平分一切土地，也不做建立苏维埃

政权的运动，而只是领导红军乱跑，这必然又给敌人以长途和打击的机会，这仍是脱离群众的立三路线。

江西红军伟大的胜利，现在使蒋介石不能不集中他所视为最得力的亲信部队，到江西去做决死的战争，这自然要轻松了敌人军队对于湘鄂西苏区的进攻，这是给我们的机会，去击破与消灭后防与滇防的敌军，现在滇防徐源泉后防的军队川军，战斗力的弱，是大家都知道的。

同志们，因此，你们的中心任务是：

一、立刻撤消邓中夏同志机会主义的领导，坚决的执行国际及四中全会的路线，如唐赤英同志已到你们那里，即以赤英同志代理中夏同志的职务，为保证国际路线在二军团中无条件的执行与红军中思想的统一和领导的巩固，中夏同志必须立刻离开二军团，绝对不容许中夏同志在二军团中发展与领导任何反抗国际路线与中央决定的争论，这不仅因为中夏同志执行立三路线掩盖下的富农路线的破产，已成为争变[辩]的事实，更主要的因为这种争论是破坏红军巩固统一的犯罪行为。

二、二军团必须立刻回湘鄂西原有苏区根据地的方向发展，要沿途发展与组织群众，要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要武装斗争的农民群众，要组织游击队，要扰乱与袭击敌人在可能的击破敌人的一方，乃至消灭敌人一方的主力，这样来与原有根据地的红军及工农群众斗争发生联系，以便进而击破围剿，现在苏区的红军，而与原有苏区扩成一片；这样来巩固与扩大湘鄂西的苏维埃区域。

中央坚决的相信，你们在中国红军空前的胜利面前，在湘鄂西工农群众对于二军团热烈的拥护和期待的面前，必能团结象一个人一样迅速完成这两个中心任务。

此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中央

夏曦致中央电

——关于红军战绩，请中央派军事、政治工作干部等问题*
(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

中央：

我军上月二十九号在普济观、(郝)穴附近与郭勋××激战，[消]灭敌人一营以上兵力，缴枪一百支，俘虏×五×名，击毙敌人大约二百名，赣×湘鄂(西)红军击破郭勋“围剿”部队之般(?)二次胜利，二军团在此×岳一带××取联系，中央有适当人派×叁×。

、聂荣珍同志可否派来，方维夏清派来任军事政治工作，张×诚请派来以×××往湘鄂西工作，唯一、谢觉斋、林炳、李亚农亦请派来，(懂)经济财(政)学识，经验老，请派全济来，请派能看英文报纸之知识分子来，艾逸之，宋盘铭同志回沪否？请复。汉川近遭“围剿”，我军炮被×夺。

桂生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原文如此。

红三军前委关于区内情况及意图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七月四日)

中央：

六月七日经过鄂豫边特写上一短信，不知收到否，那封信的意思：

(一) 指出我们过去×××错误的×××土(对×××××)

(二) 北渡后的经过，造成荆当远为根据地以解江石监酒之围失败的经过。

(三) 对××在××助鄂××特造成××××××九调根据地同时为本军根据地在向荆当远发展与江石监酒联系起来。

×××对我们×××的指示×××××××不到半月不×全，因政治形势有急剧变化，就是鄂北军事形势×有很大××××策势，大部分在×××××对于我军已解除包围形势，北鄂汉水以西的各县群众。

鄂×××此地有最近期间造成新的赤区的大可能，我们现在正在四去游击肃清道(?)路×××××××我的意思策以房均保南荆当远为中心区域，北托(?)与鄂豫边连系起来，南与江石监沔赤区连系起来。

以本×××干来完成鄂北鄂西统一的大事业。这一原则上的建议，我们希望中央加以批准。我×××××××鄂西鄂××××为一×××特区，建立党的政权的军事统一机关。我们请求中央××没有×××××能干××××××××××解决××××××××××本军过去错误问题。

还须×××××下列问题请求解决。

派一大批军事人材(上中下各级都要)，特别须派一军事参谋长来人要善于作战，可以×××军委。

派一大批的×××××来，要有最好老工人同志，能作政治委员。

××××××××××特别是无线电侦察长人材。

×××委×人来鄂边特委与我们建立交通，暂时一切秘密文件可由边特转。

此致

[敬] 礼!

第三军前委中夏

七月四日

中共宜昌特委给枝宜县委的指示信

——游击队工作、群运工作、政权工作* (一九三一年七月六日)

枝宜县委：

特委听了逸群同志口头报告后，对于你们最近打鸦雀岭在工作上的错误，有〔以〕下的具体指示：

一、发动群众去进攻敌人是对的，但是你们没有估计敌人力量，选择敌人弱点进攻，只是顺着群众意识。因群众愤恨鸦雀岭的团匪，如黑土坡只有二十条枪的团匪，你们不去消灭，这是表示跟着群众尾巴跑。这次动员了七八百群众，应当有计划的作战，如进攻退却定要有把握的在战斗艺术上得到胜利，你们对群众队伍是没有组织好，对于武装没有配合好，甚至游击队反落在群众后面（群众已经把敌人围着了，游击队还在后面冲锋）。县委没有到前线上指挥（当然不是全体的去，要分配一两人去指挥），坐在屋里做欢胜会，这是机会主义官僚式的表现，对于战斗技术，没有学会我们的游击运动，是打的拂晓（为什么不在夜里去打），幸敌人没有反攻，不然广大群众既没有掩护，定要遭到失败。因此，你们对于怎样发动群众，怎样去进攻敌人，进攻后的群众工作问题，这些实际问题，没有加以丝毫讨论和布置。

二、二次又动员了五六百群众打横店子，敌人有七八十条枪（为什么不去消灭黑土坡等处二十条枪小的敌人），结果，只骚扰了一次。不错，我们的游击战术，是由袭击转到消灭敌人，但是要普遍的发动群众骚动工作，如乡区农民委员会都能自动的、经常的做这一工作，使敌人惊惶失措，日夜不安。挑选精干群众组织游击队（各乡都要组织赤卫队或农民自卫队武装组织），选择敌人弱点去消灭敌人，若像你们这样的劳师动众，顾头不顾尾的去干，一定会受到累，不会发展群众自己斗争经验。你们是不干就不干，要干就大干的办法，这仍然是盲动主义的表现，没有正确的运用我们游击运动积极进攻敌人的策略。

三、打鸦雀岭过后，你们对敌人估量，马上有极严重压迫来，这样估量是不为过分。但在你们工作布置上（据逸群同志说，是这次县委会决定），是放哨，消灭敌人侦探。你〔们〕决议中心点，是落在避免敌人、退却路线上面，这是没有估计到自己力量，不很相信群众的表现。应当抓紧群众〔斗〕争情绪的高涨，发动群众骚动工作，配合游击队积极行动，以群众斗争力量冲破敌人压迫，要在反清乡斗争中来武装群众，特别是要加紧白区工作，扩大游击区域，把有组织地方联系起来打成一片。

四、对于土地问题，你们在群众运动中开始做了些什么？群众情绪怎样？我们完全不知道，希你们详细报告。但是我们要着重指出的，目前群众运动的开展已经迫切在土地问题上，你们不要丝毫的犹疑，把土地问题提到群众中讨论，鼓动他们要马上动手起来，要反对迟疑怕闹大了、时候还没到的右倾观念，要把土地问题、政权问题编成提纲，交支部作深刻的讨论。

五、在这斗争中要由下而上的改造群众组织，经群众大会代表会选举，使群众建立自己的工作。这样农民委员会在群众中，才能作有威信的领导。据逸群同志说：你们已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不知是否事实？

六、对拥红工作没有开始，你们要马上组织拥红委员会，替红军募给养（一个铜元都好）。组织慰劳队，到苏区去慰劳红军、慰劳伤兵。加紧白军

士兵工作，去参加红军，主要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政治影响。

宜昌特委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中共宜昌特委给中央的报告

——宜昌党的沿革、组织状况及各种工作情况* (一九三一年七月九日)

中央：

湘鄂西省委因交通时常阻隔，影响宜昌工作的关系，两月前曾介绍我们与你发生关系，我们写过两封信给你们，但两月来没有得着你们的回信。现特派交通前来，将宜昌党的始末、工作现况及以后工作布置，简单的报告你们，希望你们与我们发生亲密的联系。

一、宜昌党的始末

国共分家以前，宜昌各县即有党的组织，成份尽为知识份子。分家后，竟遭盲动主义的打击失败。一九二八、二九、三〇，三年中，曾五次建宜昌工作。以〔因〕技术和工作方式的错误，结果得着负责同志的叛变牺牲，影响了全盘工作的六次坍台。从前团的最高负责人徐宝元、邓锡堂等现尚盘踞宜昌，经常作反动工作，三〇年七月，湘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宜昌区荆门、当阳、远安、枝江、松滋、宜都、长阳、秭归、兴山、巴东各县工作与特委久已失掉联系，各县工作多未建立，因此决定张宗礼同志为宜昌区的特派员，来找各县线索，工作了两个月，即成立宜昌中心县委，指挥长阳、当阳、远安、宜昌各县工作。去年十一月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改宜昌中心县为特委。今年二月，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遂改为宜昌特委，说因工作范围扩大的关系，湘鄂西省委扩大会议中决定宜昌成为道委，现在还没有正式成立。与特委发生关系的，有长阳、当阳、荆门、远安、松滋、枝江、宜都、沙市、公安、宜昌十县。

二、目前工作状况

1. 特委本身——湘鄂西中央分局对特委本身组织，只决定了张宗礼（知）、刘云生（知）、余智生（贫农）、关大顺（工人）、赵德昌（雇农）五人。最近以特委委员关大顺消沉，赵德昌逃跑，余智生因环境关系不能集中宜昌，能经常会面的只有宗礼同志、云生同志二人。同时以各县工作情形，彼〔比〕起从前的关系，无法召集代表会及扩大会来解决特委本身组织，因此一切工作都没有集中讨论，没有深入，完全是独脚戏的一、二人工作。

2. 组织——现时宜昌区虽有荆门、宜都、松滋、公安、长阳、宜昌六个县委，当阳、远安两个临时县委，沙市一个市委，同志七百人，群众三千余人，但不注意从斗争〔中〕来发展组织，完全和平发展。以红军号召、封建关系拉拢的党员群众，多半存有雇佣观念、风头色彩、等待红军等脱离群众的错误观念。尤其教育训练工作的缺乏，使一般同志政治理论水平低到零度。

3. 宣传——过去宣传工作，就是单纯的贴几张政治口号的标语（如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没有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中联系到我们的政纲。最近以纠正这一错误的关系，藉口说敌人的利害，停止了宣传鼓动工作的执行。

4. 工运——宜昌区主要的工人区成立宜昌、沙市——尤其是沙市，但宜沙党的基础完全建立在雇佣劳动上面，同志没有钱，就要脱离党的现象。负责人不深入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斗争情绪，以致许多罢工斗争（沙市成衣工人的三次罢工，宜昌木瓦工人罢工，铁匠工人罢工）党不能集中指导，扩大罢工斗争的宣传，发动更广泛的罢工斗争，以致每次斗争都是走到消沉失败。

5. 游击战争——过去游击战争，在立三路线的工作方式下，完全是脱离群众的单纯的军事行动，结果失败，同志消沉。现在纠正这一错误，又机械的用了由群众日常斗争中发动游击战争的原则。群众斗争的情绪已超过日常斗争的阶段，而党偏要把群众的情绪抑制拉转了，发动日常生活斗争，以致群众多脱离党，党的游击战争仍不能普遍的发动。

6. 青年团——现已成立了临时特委会，以三人组织。宜都、松滋仅有团员四十人，但组织观念多半薄弱。现少共省委已派了人前来建立宜昌团的工作。

7. 今后工作布置：

(1) 决定九月间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道委，以便完全道委的本身工作。代表会未举行前，坚决执行集中指导，三天一次常委会，尽量召集宜昌县委列席，于必要组织委员会，来专门讨论宜昌问题。

(2) 组织工作：征收党员群众，党要从斗争中来吸收群众，启发有阶级觉悟，对组织基础的转变和处分同志必须采取说服精神，教育同志，分配适当工作，使之在工作中得到兴趣。

(3) 宣传工作：以宜昌党的组织划为宣传队，小组长担任队长，根据工人生活的恶化联系到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拥护苏区红军，向广泛的群众作普遍的宣传，促一般群众阶级的觉悟。每个队员每日宣传的结果报告队长，同时每队每五天发一次手报（如手掌大）。队长对每个同志的工作一定要检阅，每周开一次宣传会议，检查和讨论宣传工作的缺点与建立……。

(4) 工运工作：以沙市纺纱厂为中心工作，尽量收集女同志打入进去。宜昌以码头、车夫为中心，坚决派同志打入下层。

(5) 游击战争一定要根据群众斗争的情绪来发动，决定远安、当阳数县马上组织游击战争，以争取更广大的群众。

(6) 兵运——已决定了三同志马上打入二十一军九旅中去，同时向省委调一员兵运工作的同志来建立这一工作。

几个请求：

(1) 我们的文件都非常缺乏，请你们经常供给我们各种文件，或由我们交通带来，或由邮局寄秘密的来。

(2) 沙市纺纱厂完全是二十五岁以上的女工。在宜昌区找一个能活动的女同志非常困难。请你们找几个女同志来，到沙市纺纱厂中去建立党的工作。

(3) 军事工作的人材你处如有，可找两个来，或担任游击队长或负兵运责任。

(4) 秘密写信的方法，我们只知道米汤，别的方法请你们告诉我们。我们和你们通信处，暂时不能建立，我们交通来后，一定要给他点文件、书来，同时要告诉我们一个通信处，以便随时报告我们的工作。

宜昌特委

七月九日

附：湘鄂西省委介绍宜昌特委交通员的信

中央：

兹介绍宜昌道委交通蔡一才同志前来中央，以便宜昌和你们发生直接关系，希接洽为要！

布礼！

湘鄂西省委

七月二十七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关于召开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对非苏区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二日)

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在彻底平分一切土地，加紧反富农斗争与改造苏维埃，建立苏维埃一切工作过程中，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阀第三次“围剿”苏区和红军的严重局势之下，为要总结各苏区斗争已往的经验，定出正确领导的具体方针，领导广大群众起来加紧执行与完成平分一切土地，真正改造苏维埃，实现苏维埃一切政纲。同时要吸引积极勇敢的工农领袖，参加最高政权机关，健全各种委员会的组织，充实各种工作的内容，更有计划的向前推进苏维埃一切工作，最高限度的发动群众斗争，来击破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特决定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开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这一意义与任务，的确非常严重！这一大会的召集，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改选，她具有很大的斗争任务。我们要把她造成一个最广泛的群众运动。因此，苏维埃主席团对非苏区之进行三次大会的工作，有以下的决定：

一、各非区接此通告后，即应依照当地实际环境召集所属之各种群众组织的会员大会，或活动分子会议，报告三次代表大会的意义与任务。并当场选举出席三次大会的代表，当选为出席代表的必须工人、农人（富农不在此例），或革命的知识分子。代表人数不能确定、最好是多选几个来。

二、宜昌、沙市、打包厂、纱厂、面厂、车夫、码头工人以及其他工人集团，须以企业或工会为单位。开代表会或群众会，各选举二人以上的代表。此外可尽量组织参观团。

三、农村的工会，须单独的选举出席代表，每一工会的代表，是二人至四人不等。赤色农协、白军士兵当然亦可按人数的多寡选举出席代表，每一县满三人者，则必须在出发之前，组织代表团。

四、各该当地群众组织的高级机关，须将当地政治经济情形，工农生活状态以及工作生活状况等，作一有系统的报告，并要根据群众的要求提出建议到大会报告。出席代表应当（把）这些了解清楚。

五、各县除选派代表出席外，还要尽可能的组织参观团来苏区参观。

六、各地须酌量当地实际情形利用各种机会，有计划的进行拥护三代大会的宣传，但须与群众迫切要求联系起来，如在墙壁上用粉笔写“拥护湘鄂西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是拥护自己的利益”，“苏区工人八小时工作”，“选举自己的代表出席湘鄂西三代大会”，“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等等口号。

七、当着敌人“围剿”苏区和红军，各地必须在“反对国民党军阀‘围剿’苏区和红军”的口号之下，抓住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一切不满，如反对拉夫、筹饷，反对清乡戒严，发动小的部分的政治经济斗争，一直组织游击战争，以扰乱敌人后防，同时在这斗争中加紧发展与整理各群众组织，这是给三代大会以极大的帮助。

八、要以“白军士兵到苏区平分土地去”，“白军士兵不替军阀挡[当]炮灰”等口号来宣传士兵。特别是要派遣忠勇份子到白军中去工作，发动斗争，组织兵暴与兵变，杀死反动长官，到红军中来。

九、在九月一日，各地必须尽可能的举行飞行集会，散发传单标语，以及动员群众做骚动工作。

十、各地代表的路费，要发动群众起来，为了拥护湘鄂西三代大会举行

群众募捐运动，这才使三代大会的影响深入到群众中去更有意义。
联府主席团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综合报告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中央：

兹将此间状况简单函告于后：

(一) 军事方面

自徐源泉调开，“围剿”较为轻松，当敌人在江陵方面调防撤防时，即派第九师在江陵方面打击敌人。第一次给沙岗撤退之敌人徐源泉部队以打击，缴枪数十支；第二次与郭勋侬、杨两团作战，缴枪百余支；第三次郭勋侬统率其全力七、八、九三团来普济观，我军与其主力第九团战，消灭其一营，缴枪三百支。但郭勋亦异常狡黠，第二日仍执行原定计划，以三团进攻沙岗，并与监利敌人取得联系，我九师安全退却，因地势不好，未与抵抗。后来监敌又截击我军后路，但我军已退回。同时，监利之尺八口被敌占领，当派第九师去进攻尺八口，因连日大雨以及稍迟延，敌人已退却。

现在沙市至江陵，仍只郭勋三团，监利刘培绪一旅，沔阳岳×一师，汉川容景芳一旅，这是江左情形；江右张英一师，岳州驻军仍时有一团人到华容骚扰。敌均驻守重要市镇，如监利之车湾，勋城之枣口、汪家桥，沔阳之峰口、府场、沔城、彭家场(×树×)、仙桃，汉川之南河渡，江陵之沙岗，华容、石首之焦山河、调关以及两个县城。敌人现在对我取守势，他是凭借极坚固之工事，我们去进攻非常困难，我们曾进攻过汪家桥、府场、新厂、峰口，每次死伤达二百人左右，不能攻下。

本来最近要去包围沔阳敌人，但是月来淫雨为灾，沔阳已被淹十分之八，不能行军。

我们既不能进攻敌人，敌人又不出来，红军又不能脱离苏区远去，最近九师行动就是困难了。最近九师在赤白附近之上匪区域行动一次，但是只缴枪二十支，土匪逃去枪枝八十多支，杀了反动分子共二百人，土匪自己溺死二百余人。现已占领此区域，组织了工会、贫农团、苏维埃，并组织了一个游击队在该处。最近九师已到江陵、监利边境老新口、龙湾一带游击，目的在肃清当地土匪与威胁江陵的敌人。

军事上我们最近定有新的计划，应当电告，此处不详述。

(二) 现时我们最感困难之问题就是水灾

沔阳田亩已被淹十分之八，汉川十分之八，轻者[监利]十分之四，石首也被淹一部分。现时最大之问题，就是监利车湾的江堤，如果该堤崩溃，则江左苏区尽成泽国，江右 不方便，这个水灾比较“围剿”还厉害！水灾的结果，第一使我们军事上困难；第二粮食万分困难；第三没有农产品运出，盐、布、药、军用品 到白区购买。现在群众正在饥荒与没有盐吃，要到外面逃荒，又怕白色恐怖。目前我们应付方法：第一，正在设法挽救车湾之堤，现在在华容赤境开一道河(三里多长)，想引江水缓流，已经动员开工，但恐缓不济急；第二，群众逃荒零星出去；第三，发展赤白区交界区游击战争，去抢地主、富农一些米、盐回来；第四，在苏区现在差不多要平均吃饭，沔阳贫农已在向富农再没收其粮食，并向中农提出联盟借贷；第五，在洞庭湖一带“劫掠”盐船。

(三) 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举其大要

1. 工会工作。五、六、七三个月组织志愿加入农村工人已有一万八千人，

苏区二次工人代表大会七月二十日举行，到代表一百二十人。总工会已成立，当另有详细报告。省苏维埃最近成立劳工委员会。

2. 平分土地已完成大部分，正搜集各种材料作详细报告。贫农团有极大作用，工会没有组织的领导，现正改正这错误。

3. 汉川、监利、沔阳、华容均已举行县苏代表大会。石首正在举行，驱除苏维埃富农分子，已大部分执行。联县苏维埃，最近工作的加紧，最近开过经济、军事、文化等联席会议，并有巡视员巡视下面工作，定九月一日举行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起草各草案，从事选举宣传运动。

4. 关于各县地方的武装 红军×成志愿性的，如紧训练。现在除九师外，地方武装在一千五百人枪以上，每×平均二百多枪。汉川、沔阳之游击队，最近颇有胜利，缴获枪枝数十支。

5. 党内富农分子洗刷一部分，提拔工农干部已不少，县委书记均换了工人同志，但党内工作一般还非常薄弱，工作方式还须大大转变。

6. 省委宣传工作已经建立，党与苏维埃合办之《红旗日报》从五月出版到现在，现已改《工农日报》，归苏维埃出版。×××《红旗》周刊并出版“什么是苏联”、“帝国主义在华××××”、“红军之战术”、“××××”，党报已办两期。组织部已建立单独工作，有巡视员（以前××××）独立工作。妇委工作已建立，开过各县妇委联席会议。联县政府党团能经常开会解决问题，唯工作发展还慢，工作还不集体化。

7. 士兵运动。俘虏工作还做得好，经常办有训练班、××××作风。白军工作也派出二、三十人打入，但无回讯。×××××宣传工作，现已注意，省委之下，有士兵委员会。

8. 反帝工作现已注意，准备八月内召集一反帝代表大会，互济会工作迄未整顿，陷于停顿状态，现正××改善。

9. 白区工作。现在白区组织：鄂西方面天门、潜江、荆门、当阳、远安、松滋、枝江、宜都、宜昌、沙市、湘西之南县、安乡已发生关系。宜昌、沙市有进步，特别是沙市已在领导工人和农民的斗争。其他各县才开始整顿或尚在发生关系，注意不够。鄂西之五峰、鹤峰苏区与归、兴、巴白区没有发生关系。

10. 二军团已派两人去，现在又派人去。对二军团的行动，中央已指出一原则，要向原有苏区方向发展。不过一下子跑回洪湖，我们觉得此项原则太宽泛，如果二军团依据××××自是办法，而且不违犯中央的原则。对于整个×敌人“围剿”的作用简直太小，我们决定要他们下来占领荆、当、远（××不能回洪湖），回洪湖再集中的向外发展。将来车湾倒崩，当另作别论。

11.

12. 改组派在苏区内颇活动，现在加紧××，并已逮捕了一部分人，已组织政治保卫局，惟反改组派宣传还不够得很，秘密的政治保卫工作还未建立。

13. 关于党内斗争。在工作上时常指出各种错误，但还没有很严重的在党员群众面前对付各种倾向，现在已在注意抓住每一错误的政治意义教育同志。

14. 中央分局与省委已分开。现因加紧江南工作，锡根同志已到江右去巡视，现在省委帮助工作。盘铭已到。

15. 潘家珣同志对中央来函不×，并谓中央组织路线错误，对右派斗争方法不正确。省委将另有决议。

中央训令、中央六月十日来讯及六月十九日来讯均收到。关于土地问题及中央训令意见与潘家珣同志问题另函××。×在苏区各地已普遍举行追悼向忠发同志运动，各党报均出特刊。

此致

布礼！湘鄂西中央分局

七月二十六日

注释

本文有八月十八日及九月一日带到中央的两个原件，两件皆有残缺处，且有多处不同。采取互补原则进行校勘。

原文无年代，此年代为编者判定。

缺字十个左右。

原文空缺。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西省委给云卿、中夏等的信

——对二军团机会主义路线的批评，改组前委和对今后军事路线的几点指示*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云卿、中夏、同志：

你们取得联系 (在四月二十四日)。

我们在六月二十×日 从获得敌人文件中×出你们 在宜昌报上发表过 自然没有 我们应 完全是××主义的 与陈独秀

(11)一贯的军事投机的思想系统 (12)。

我们对于江右监、沔××的赤区的存在与发展×××××是掘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人死，不仅 (13)问题，事实上已经回答了你们 (从去年我们 (14)现在已编定一师人) (15)张英、徐德佐、容景芳 (16)敌人反攻为守，我们××与敌人一团以上之兵力作战，最近因为军阀混战的紧张口(17)敌人进攻我们的力量，拖枪的士兵××来参加红军，他们还说××二军团来了，我们大部分拖来！这些事实就证明，你们对××××的赤区的估计的破产。

你们这种错误估计的来源就是丝毫没有看到群众的力量，就是丝毫没有与敌人斗争的勇气。你们估计江右监、沔、华只容许小的部队××，只容许小部队躲藏，你们只从地势上来估计自己的力量。×你们的说法×湖只藏×小部队躲藏，不适宜大部队躲藏，为什么你们丝毫不估计到××群众的力量呢？丝毫不说到怎样反抗国民党的围剿而只讲到躲藏呢？××就地势讲，洪湖地势有些不便于我们，同时有些也不便于敌人向我们进攻，你们只看到有山就是地势足资保据，有水就只能跑兵，事实上你们凭山势之险却被郭勋打败了，过着跑兵的生活，此地红军却给郭勋以迎头的痛击，消灭佟、杨两团二百余人，消灭其第九团整个一营。同志们：你们毫不估计群众的力量，毫不讲求怎样提高自己的战斗力，这就是你们政策错误根源之一。陈独秀说中国红军是土匪，他们的生长是因为敌人的不注意。你在估计红军和苏维埃时，丝毫不估计到群众的力量与××群众的力量，这与陈独秀有什么分别？你们的×一种错误，便是丝毫没有看到现在正是中国革命高涨的时候，不估计各地工农运动高涨和红军的胜利，也不估计到反革命营垒的崩溃，你们预料一到荆当远，徐源泉、郭勋、范石生、肖之楚以及沿汉水之驻军都将来包围你们，为什么不估计到鄂豫皖和江右监沔华赤区牵制的力量？事实上追击你们的仅郭勋和范石生之一旅，假使你们先来通知我们，使你们到荆门时，九师出而夹击，则完全可给郭勋、徐源泉以严重打击。

你们对于敌人的围剿，完全抱着一个躲避观念，去年×××鹤峰，必待军阀混战之爆发，今年××敌人二营以上，××打了。你们预料敌人必会包围荆当远，而××很大的部队，你们又决定二营以上都不打，这不是预定逃跑×××，为什么又要下来呢？你们想在政治方面求得荆当远根据地的巩固，原则上看来是对的，但是荆当远群众基础如此薄弱，(假)使你们不先在军事上能够求得巩固(如武装地方农民群众给敌人围剿部队以迎头痛击，建筑工事)，不企图从与敌人武装斗争之中来巩固，这依然是不正确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现在事实已回答你们，你们造新根据地的企图又受着失败了，并不是造新根据地不是不可靠的，像你们这样没有斗争的勇气，夸大敌人力

量，又不依靠旧的根据地，又不去武装荆当远的农民群众（反把他们带跑了，破坏了这些地方的群众基础），自然只有遭受着失败。

你们全没有想到政治工作在军队的伟大作用，提高战斗力的伟大作用。你们的整个计划，××谈到军队中的政治作用，怎样提高自己的战斗力。

（18）石、监、沔、华的农民，你们告诉他×××是没有希望了，新根据地有一个荆当远，但敌人必有部队包围，二营以上我们都打不了，我们还是要退却的。你们这样的政治路线，怎样能够提高红色战斗的情绪呢？假使你们提出打回赤区去，我们想每个红色战士都要拼命××。假使你们回来了，以万余之武装巩固的××发展，江西和鄂豫皖之胜利我们定可做到，则所给予敌人之打击和革命之推动，其意义何等伟大！中央批评中夏同志完全忘记了工农红军×中国苏维埃革命所负的主要使命，这是完全正确的。

同志们：我们对于二军团过去英勇斗争的历史，对于你们现在的××，我们完全记得。但是对于你们政治上的错误，就必须××揭发出来，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告诉你们，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且也是你们所乐闻的。因为只有彻底了解斗争中的经验，才能勇敢的领导群众斗争。毫无疑问的，二军团这种政治路线，是邓中夏同志的领导，在思想上职责上中夏同志要负完全的责任。因为中夏以中央代表的资格，而且他还自诩为从国际回来的。所以，同志们为了尊重中央××中夏同志的领导，而且尊重红军中政治委员的地位××。××四中全会以后，中央即决定撤销中夏的职务。

关于中夏路线的错误，中央已另有信给你们。我们××你们完全接受中央的来讯，立即改变你们的政治路线，××你们的行动和工作，我们有下列具体的规定：

（1）中夏立即离开二军团，经建立交通线以后送回××工作。如中夏有对抗中央决定之表示和企图，应×受党和军事纪律之制裁。军事、政治领导由云清、勉之、××、王鹤、一鸣、黎禹诸同志组织前委，集体领导，云清任前××记，政治委员亦由云清兼代，如赤英到，赤英代理政治委员。

（2）你们即须派交通十余人出来建立与宜昌、沙市及此间之交通线。

（3）关于你们的行动，你们可分一小部分游击队在归兴巴游击，大部须以坚心占领荆当远，并派游击队到潜江、江陵附近游击，以便与我们取得联系。

（4）假如你们不能占领荆当远时，你们就径直打回赤区，倚据原有赤区，再作巩固的向外发展，绝对不准许再在外作逃跑式游击。

（5）你们须特别加紧自己部队的政治工作，使全军队指挥员至战士，均非常坚定勇敢，同时注意作瓦解敌人士兵的工作。

（6）切不可相信土匪、民团收可为自用，务须彻底解决。

（7）占领一地，即须发动工人、贫农与中农联合，没收豪绅地主土地财产分配，×与富农斗争。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和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要拨少数枪枝武装当地农民发动游击战争。武装当地农民是发展红军与巩固根据地的唯一办法。

（8）对于敌人进攻之部队，务须与其先头部队迎头痛击或抄其后路。

现在据报载，范石生已调开襄樊，只有李柱中一旅，徐源泉部早已调去长沙。沙市、江陵郭勋五团，宜昌王舫三十三团，潜江、沙洋、天门徐德佐一旅。据传闻郭勋××开三团回宜昌，宜昌川军开始回川，因为四川军阀又开始内哄。这样，更便利于你们来执行当前的任务。

此致

布礼！

湘鄂西中央分局

夏曦 徐锡根 宋盘铭

湘鄂西省委

崔琪万涛杨光华 × × ×

七月二十八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一（18）缺十几字至几十字不等。

徐锡根致二军团信

——敦促二军团回湘鄂西苏区*（一九三一年七月）

中夏、云清及前委诸同志：

我刚从上海来，中央决定我担任中央分局的工作，关于 内
对于第二军（团）行动之命令，我完全同意。 党内争斗和中国革
命发展的事实，完全证明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路线之正确。我盼望第二军
（团）的同志立刻改变机会主义的路线，执行中央分局的命令，回来巩固苏
区， 的向前发展。军事必须有正确的政治领导，必须与斗争的工农群众
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执行当前的任务。比如从前南昌暴动的教训，可作为
经验。第三军如果不改正错误路线， 政治 ，必要受到更大的失败，
这是要预先提醒你们的。

此致

布礼！

徐锡根

注释

原文无时间，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原文缺六字。

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日)

(一) 虽然水灾增加了我们湘鄂西苏区经济上军事上的困难，但是我们无论在任何困难之下，巩固湘鄂西苏维埃政权是目前红军第一等战斗的任务。根据全国革命局势的发展与苏维埃群众的力量，同时还有一部分苏区的收成，巩固苏区是可能的。我们首先须反对以为在水灾严重之下巩固苏区没有可能的取消派情绪，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现在决不是退却的，而是在巩固与发展苏区的基础上，依据于现实环境所应采取的适当的进攻的军事布置。

(二) 九师目前唯一的任务就是在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原则之下，保存红军基本实力的条件之下图军事上的发展，因此决定以二十五团巩固后方，二十六团向潜江、天门发展。二十六团的具体任务是：

1. 最主要的任务首先必须以极大决心给徐德佐旅以严重打击，消灭其实力，击破敌人“围剿”我们之一方。

2. 发展潜江、天门游击战争（从夺得敌人武装中分一部分武装给当地农民），并使潜江、天门与监利、沔阳、汉川边区联成一片。

3. 尽可能的占领天门，巩固这一区域。

4. 保证随时（在后方有必要时或前方失利时）可以回到赤区。

5. 保持与后方之一定的交通线，以便输送和取得政治消息与指示。

(三) 在占领区域之主要的政治行动的口号是：

1. 没收地主阶级土地、财产、粮食、房屋、分给工人、贫农、中农。

2. 没收富农土地，分配以坏土地；没收富农多余的粮食、工具，分给工人、贫农、中农。

3. 组织工人独立组织，增加工资。

4. 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

5. 武装农民，发展农民战争。

同时宣传平分一切土地，并在农民自愿的条件之下实行。在政治宣传中指出：红军是帮助当地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而战的，是在共产党指导之下，为了共产党的政纲而战的（打破红军好，共产党不好的反动口号）。在占领区域，红军应成为群众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帮助当地党组织雇农工会、农民委员会，革命委员会（进一步的组织苏维埃）、工农赤卫军、游击队，发动群众为了上述的口号而争斗。潜、天一部分正受水灾，应根据省委关于水灾的决议提出适当的口号。同时该地白极会和土匪很多，一定要提出瓦解白极会和土匪的工作计划，要以土地革命的影响去争取白极会中、土匪中的下层群众。

(四) 红军对白区作战必然要加紧政治工作中之住民的一部分，但同时应该加紧在部队中的政治工作，特别是战时的政治工作，不是要将工作中心暂时移置在住民中工作，要提高部队的政治情绪和纪律的坚固，要保证红军与住民正确的关系。要防止开小差（此在九师有过两次）、掉队等事情发生。要防止这些事，不仅要加紧执行纪律，建立政治保卫工作，最主要的是在提高政治上的自觉，对于敌军的政治工作，必须注意考查敌人部队的政治情绪，以及敌军方面的政治工作，提出对于敌军适当的口号。给敌军宣传以反抗。

(五) 在战术问题，必须比以前要注意警戒、侦探、交通三个任务，这也是根据于由赤区转到白区作战的条件而提出的。对于敌情的估计，不可单

依据住民的报告。

（六）为了执行这个决议，除了师司令部赴前方指挥外，并推军委主席万涛同志到部队中去指挥一切工作，他对于一切政治、军事有最后决定权。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年代为编者判定。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西省委给红三军的信

——关于目前军事形势与三军的任务与路线*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二日)

兹有数事通知：

(一) 北方石友三、孙殿英等××××改组派政府× 战线在正太路一带。山东表面拥蒋× 背后有日帝国主义援助× 张学良× 向拥蒋，此中内幕× 不十分明悉。广东反动政府正出兵湘赣，南方军阀混战爆发在即。

(二) 鄂豫皖红军第四军前半月在应山、孝感一带截断京汉路。× 据反动报载，江西红军主力似已退闽。

(三) 江陵、监利、沔阳、汉川均已成大海，一片汪洋，高地已成岛屿，敌我分据相持。我们现组织水上游击队巩固江面，游击战争大有发展。九师主力已移师潜江，二十五团于八月二十五日占领潜江城，二十六团十六日进攻沙洋，尚未得报告。我们目的在占领天门、潜江与沔阳、汉川打成一片，大约可以完功。华容苏区仍有一部分旱地可望丰收。宜昌、沙市还是王陵基、郭勋部队驻防，大约七、八团人。

(四) 三军的任务。现在必须政治上、军事上巩固现在占领区域(××光化一带)，主要是巩固雇农工会、贫农团、苏维埃组织，吸引工人、贫民积极分子建立党的组织，平分土地，发展经济斗争，武装当地农民，发展游击战争。此外则加强红军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必须纠正中夏同志以前的富农路线、取消工人运动、不注意红军政治工作等重大错误。军事上须向荆门方向发展，至少经常派游击队到这方面游击，以威胁宜沙，同时与第九军取联系。九军应向钟祥方向发展，此间××来×京山、应城发展，与鄂皖(他们已发展至××)及第九军与三军七、八师成犄角之势。七月二十八日指示信二、四两项作为无效。

(五) 责成你们务须立刻派人到宜昌或直到洪湖与此间建立交通关系，在宜昌必须建立与你们的交通处，省委已通知宜昌道委了，你们的红色战士有从郧阳及光化带回洪湖的有三人，为什么你们不派交通来。此祝胜利！

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

省 委杨光华

八月十二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年代为编者判定。

原文缺十几个字。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水灾、军事发展、白区工作、破获改组派等问题*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八日)

中央：

兹将此间情形简单报告如左：

(一) 监利、沔阳、汉川、江陵苏区(江左全体苏区)百分之九十五被水淹没，一片汪洋，如困大海，灾民近百万。江右亦淹没一部分，×东山未×水。现时群众在×一部分是在赤白交界区域到白区游击，没收地主豪绅粮食，一部分已出外逃荒，大部分则还在堤上或船上，有半月粮食的，有一月或两月粮食的。党除发动游击战争外，并领导逃荒到白区发动灾民斗争，尽可能巩固水面苏区，正在组织许多水上游击队。

(二) 军事方面。江右江左在下车湾方面已被敌人截断，正在另辟交通路。敌人有围攻东山之势，调关、焦山河、华城驻张英一师，从巴陵方面来驻扎×新州×××传闻，带有一团人。近日传闻监利之敌开过江右两团人，×此华容苏区情形严重，正在秋收，敌人×有乘机抢谷之势。江右我×只有三百左右，尚可发动游击战争，所虑者敌人掠夺谷米而去。九师原来准备渡江右，因水势增涨，而且作战没有把握(过江右只能胜利，败则无退路，水势更涨，更经危险)因此，中止过江。在江左苏区，红军已成饥军(有十来天没有吃饭，吃的杂粮)，因此决定移师潜江、天门，并消灭徐德佐旅。八月十五日，我九师二十五团占领潜江城，缴获枪枝子弹颇多。二十六团已过潜江周家嘴，准备于十六日进攻沙洋，尚未得前线报告。潜、天两县去年曾经占领，过后便失败，有秘密组织与汉川、沔阳、监利交界赤区毗连。关于九师行动决议附上。在占领潜江以后，我们正在起草新决议怎样应付敌人“围剿”和巩固占领区域。沔阳、江陵、汉川游击战争，近日以来非常发展，敌军哗变拖枪之事很多。石首前日由李宗鉴部(新七旅)兵变一连加入红军，仙桃岳军最近兵变两三连人(从前我们本有围攻岳郭的计划，亦因水灾停止)。

(三) 现在我们加强白区工作，已派去宜昌道委四人、应城一人，昆弟已去宜昌工作。荆门、当阳、远安、松滋、枝江、宜都、万安、应城、云梦、汉阳、天门各县均有组织。湖南南县、安乡、澧县、临澧、益阳、沅江、湘潭已去恢复组织。鄂豫皖已发生交通关系。湖北特委亦间接有关系，惟二军团与五鹤苏区及归兴巴还未发生关系。传闻二军团在郟阳获胜，缴敌枪一团人。五鹤×有三军独立团王炳南部，陈叶平任政委，据报常向澧县一带游击。二军团已派交通二人，现又陆续派去。

(四) 最近破获改组派甚多，逮捕数十人。从前二军中在此下级干部多已加入，并牵及红军中干部一、二人。现在一方面加紧反改组派宣传，一方面正在严格审讯。惟改组派在湘鄂西有较大组织，不可否认。黄极会、白极会等，亦系改组派领导，最近在消灭这些组织颇有成效。

(五) 崔琪同志他是省委书记，他是农民，参加游击战争甚久，非常忠实积极，任监利县委书记亦久。任省委工作十数日即病请假，把他送来上海医病，他可将此同情情形向中央报告一部分(因为他只参加省委工作十数日)。如有党校，他病好后亦可住党校。他的医药费已发五十元，请中央再补助一部分。王兰英同志亦到上海医病，他的医药费已发三十元。

(六) 潘家珣同志给以劝告，派往洞庭区工作。庄东旭同志老病，经医生证明已请假，请中央务必派一能担任宣传部长的同志（我提议×××或×××），政治工作人员请多派些来，能做职工运动的清派几个来，以使派往孝感、京汉路、湖南粤汉路、应城盐矿去工作。

中央分局 夏曦

省 委 杨光华

八月十八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年代为编者判定。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军事行动及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中央：

我们根据军事行动决议，调红军第九师从江陵向潜江、天门方面发展，以二十六团攻沙洋，二十五团攻潜城，敌人系新三旅徐德佐所部，实力只二千上下，从九月十三日起截至二十四日止，情形如下：

(一) 二十六团于十三日占领周家咀，敌退潜城，当晚又占领黄家场，所得军用品甚多，于十七日攻下沙洋，消灭新三旅第二团全团，特务营全营，卫×连全连。

(二) 十五团于十四晨刻占领直路河，夺获敌械百余，俘虏数十名，晚刻又占领莲花寺，敌向潜城方面溃退。十五日午后二时三十分，在潜城南十五里之杨家场与新三旅之薛部第一、第三两营及其二营之第七连骑兵一连激战。结果消灭敌人一营，敌受创退潜城，我军跟踪进击，于是晚占领潜城，残敌乘夜逃窜张截港，策口两处，十八日我团前线已进逼该两处之敌，二十四日四十三师萧之楚部之两团与薛旅残余，进攻我二十五团，我军诱敌深入，正面退出潜城，敌之骑兵直扑县城，我左右伏兵抄出，正面反攻，缴敌步枪、拨壳、花机关、马匹甚多，敌之前锋部队丧失，当即停止前进。

(三) 汉川之游击队于一星期前，已经进逼天门城下。

此次九师出动，增加枪械有一团实数以上，徐旅全部消灭，江、沔、汉苏区已经巩固的向外扩大，潜江赤色政权已经恢复。

湘鄂西省委

八月二十五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夏曦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军事情况与三军干部问题，请求将鄂北特委划归湘鄂西指挥等。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中央：

九师行动决议，前已付上。九师一部于八月十五[日]占领潜江城，一部于十七日占领沙洋，一部于二十一日占领荆门。徐德佐旅已消灭二团。潜江已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计划将鄂中钟祥、京山、天门、潜江、荆门各县造成赤区，南与汉川、酒阳、监利老苏区打成一片，北与鄂北特委取联系，东与鄂豫皖联络，西与三军取联系，在军事上颇有把握。兹向中央请求数事：

1. 红军扩大，亟须干部，请派可任团政治委员之人才数人（如陈铁铮、宋少华，请调来）、军事人才参谋人才及有特殊技能的多派来。
2. 文人无论土货、洋货、程度高低，能写信的写钢板的都要。
3. 湖南、湖北做过工作或者湖南、湖北的干部亦尽量派来。
4. 中央有无湖南、湖北详细军用地图？有，请弄一份来。
5. 罗迈同志可否派来？何胡子已说派往中央区，请派此间来。
6. 孝感一带，京汉路工作有线索，请派人来。应城盐工八千余人，工运干部派一部分来。
7. 鄂北特委现在已说是鄂豫边特委，九师已与他们发生关系，他们已有二十余县组织，原第九军仅有枪六百支，我已函他们将九军改成鄂北独立团，要他们占领钟祥，并派刘鸣先同志代表中央分局去指挥工作。他们才接到四中决议，与中央关系当然不密切，请中央将鄂北特委划归中央分局指导，以便统一军事行动。
8. 三军政治委员我不能兼顾，中央分局决定派万涛同志担任，他已随九师出发。万涛，四川人，由湖北省委派到洪湖工作已两三年，去年任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在特委任组织部长，现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之一（主席团三人，即贺龙、夏曦、万涛）。他前曾到过中央，恩来同志大概认识他。就此问同志说，以他为适宜。请中央批准。

夏曦

八月二十六日于潜江县城

注瞩

原文无年代，此年代为编者判定。

三军前委给县委信

(一九三一年八月)

巴归兴县委：

从美中同志及其他同志口头报告中，使我们知道巴归兴赤区的现状，与失败的原因，前委为要使你们了解过去前委的错误。要从过去的失败中取得经验，与教训，来纠正过去的错误与改造巴归兴的赤区，决定给你们以下的指示：

(1) 过去工作的错误：

1. 你们过去工作主要的错误，是土地革命的工作丝毫没有执行。在目前，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中，只有坚决的彻底的执行土地革命的工作，才能根本推翻中国封建势力，根本产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基础。巴归兴赤区虽有数年的历史，但是一直到现在，不仅土地没有分配，甚至连土地革命的宣传也没有，因此，你们不能使广大的劳苦农民群众他们的本身阶级利益上发动他们伟大的阶级斗争。巴归兴赤区，可说不是由土地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几个英雄的共产党员“打出来的天下”，这样当然不能使群众从本身阶级利益上拥护革命积极参加革命，当然不能肃清豪绅地主阶级的势力。过去苏维埃政府被新式豪绅把持，有些区域的群众反水，土地革命没有执行是主要原因。

2. 过去巴归兴的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是委派的，或是由某区的新式豪绅自动组织起来的。完全没有经过群众公开选举的路线。苏维埃政府是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委员应是由广大群众会议选举出来的贫苦农民中积极勇敢的领袖。因为巴归兴过去土地革命斗争没有发动与委派制度的存在，所以豪绅富农混入苏维埃政府，（产共团当过司书的混入苏维埃政府就是实例）用换汤不换药的旧的方法行使苏维埃的职权，这样决不能使群众认识苏维埃是他们自己的政府而拥护他。

3. 红军是保护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力量，红军的战士，应是分得土地积极勇敢的分子，红军应有铁的纪律与严格的训练，这样才能使红军担任保障苏维埃政权，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的任务，但是巴归兴的红军，可说是来去无常的“乌合之众”既无纪律又无训练。所以不能作战，所以常常发生侵犯工农利益的行动。

4. 关于赤白对立也是造成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1) 对黄带子会一类的组织的策略的错误，过去你们完全用武力统一政策，对付这一类的组织没有采用夺取下层群众，从土地革命斗争中根本消灭其组织的策略，这样反使豪绅加紧欺骗其群众来反对赤区，与使豪绅肃时除掉互相的冲突而不致联合反对我们。(2) 是领导饥荒斗争的策略不正确。解决饥荒的主要办法是领导群众分豪绅地主的粮食，进而分配土地更领导群众向外发展（向外发展不是不分贫富的打给养而是打土豪）打破敌人的封锁，在白区打上豪要注意将没收的财物分一部分给当地的劳苦群众。你们过去所领导的这一斗争的唯一办法是成群结队的向白区统治区域不分贫富的抢给养，这样更加紧赤白的仇恨与对立，这是不对的，这样更使外面的粮食和油盐被人封锁而不能进赤区来，使赤区的饥荒更形严重。

5. 巴归兴是贫瘠的地方，只有向外发展来扩大赤区才能保障赤色区域。过去你们蛰居一隅的保守观念没有积极地去打破敌人的封锁，与向外扩大赤

区扩大经济来源造成坐吃山空的现象；

以上均是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

(2) 今后的工作方针：

1. 迅速解决土地问题：现在是秋收的时候，你们应马上加紧土地革命的宣传联系到饥荒斗争的鼓动，从分豪绅地主阶级的粮食进行分土地。寄来中国苏维埃政府土地法草案与房县苏维埃出版的“怎样实行土地革命”及前委关于平分土地的通告，作你们的参考。你们应详细讨论与了解，决定适合当地情形的策略，马上执行。前委不明了巴归兴的土地实际情形，只有作此原则的指示。

2. 改造各级苏维埃政府与建立群众组织，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应加紧苏维埃的宣传，批评过去苏维埃的错误，从这个斗争中由群众大会选举改造苏维埃政府，必须注意豪绅的走狗富农以及旧的官吏与衙役，绝对不能参加苏维埃政府。过去一切不良分子应尽量在群众中指出其罪恶，交群众大会处置。同时必须在斗争中建立各业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阶级斗争的组织，使之成为苏维埃政府支柱与反豪绅、反富农的战斗机关。至于少年先锋队、劳动童子团也应广泛建立起来。（参考各种群众组织法）

3. 健强红军，扩大红军。在斗争中应加紧号召广大分得土地的农民与苦力为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与拥护苏维埃政权而参加红军，而组织广泛的红色补充军，使群众从本身的阶级利益而自觉需要武装与自动的参加红军。你们应依照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军问题决议案，从事改造红军，你们必须特别注意加紧政治军事训练。要做到驻军时三操两讲，行军半天休息时一操一讲，要经常集合队伍作精神讲话，要训练每个战士成为建立苏维埃分土地的宣传员组织员。

4. 恢复苏维埃区域与扩大苏维埃区域，恢复赤区你们要不仅依靠武装力量，主要的靠群众力量，就是说使群众从土地革命斗争来反豪绅、反富农要土地，配合红军的行动来恢复赤区。你们必须领导群众坚决肃反，杀尽一切土豪省绅及其走狗。至于恢复反水区域，对反动的领袖与反水的领袖要经过群众路线解决。当然你们要扩大我们的宣传和鼓动来说服群众，在作战的时候，可以坚决的用红色恐怖镇压反动势力，战事一过即应用宣传鼓动方法发动群众来肃反，但是你们必须纠正以为白区的群众都是反动的成见，你们必须用一翻工夫，向赤区群众解释，前委认为现有赤区又小又穷又是川鄂咽喉，是军阀的出入必经之地，为要保全赤区与解决目前饥荒问题你们必须向外发展，前委认为你们必须向宋洛河阳日湾发展，这样一方面可以与房县、保康赤区取得联系，将来更可以与荆当远取得联系，使你们可以与均房保南荆当远赤区取得物质上的援助，同时使你们可以在军事上有退步，而进退自如。

5. 对于黄带子会等，前委将三军在房县对红枪会的策略的文件寄来给你们，希你们迅速将过去错误纠正过来，按照当地情形定出更有具体的策略，你们可将过去策略的错误与新转变的策略公开向群众宣传。这一方面可以教育群众，一方面可以夺取白区群众。（注意，前委文件是党内秘密的，公开宣传只能说杀土豪劣绅，不要直率提出只杀红枪会的领袖，不杀他的群众，就是反动领袖也只能以豪绅治罪，不要以红枪会的领袖的罪名，理由详见前委文件。）

6. 关于党的组织，过去不仅成分坏而且一盘散沙，在恢复赤区工作中你们要将动摇分子一律清洗刷出去，从斗争中吸收大量的雇农贫农入党。团的

组织也应建立起来。

你们接到这指示后，应讨论具体执行的方法，并须经常作报告来前委。

附注：这封信是八月分给的，本失掉了时间性的作用，但内容对我们的工作仍相切合，可作我们的参考。故翻印出来。

巴归兴县委会翻印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年代为编者判定。

湘鄂边特委致湘鄂西中央分局信

(一九三一年九月六日)

中央分局：

我们本想作一详细报告，因工作和时间不允许，只得去此单简报告你们。

(一) 赤英同志在四月二十七日到此，三军已于四月三日出动，因此赶不上，我们即于五月二日召集一分区特委扩大会议(四月二日由小康所领导的五县代表大会所成立的特委)，此次扩大会议由赤英所领导，主要的任务：
1. 反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彻底转变党的组织基础。
2. 改组分区特委为湘鄂边特委，由小康与赤英提交大会通过：周小康、董大山、向经武、王炳南、陈协平、陈奇谟、屈国元、杨英、孟朗九同志为特委委员，以小康为书记，大山组织兼秘书，经武宣传，小康经武大山三人为常委，CY特派员庄兰香参加，特委本决定十一人，现只九人，余两人请中央分局派来，这一名单请中央分局批准。

(二) 扩大会议后，已开始党的路线的转变：
1. 土地问题——豪绅地主家属，不分得土地，领导群众去没收，重新分配给贫农和红军家属，富农的好土地发动贫农去掉换(赤英同志说，富农应分田，不过分坏田，分局指示信富农不分土地，疑是写错，所以我们执行掉换富农好土地，对否，请示知。在彻底平均分配土地的斗争中改造各级苏维埃政府。
2. 三军离开此地，留一部分枪支编一庞大而不实的教导团，现已改编一充实的独立团，并实行征调雇农贫农工人参加红军。
3. 正在加紧武装群众的工作，苏……(此处有缺一抄者注)朗担任职……小康大山二人……未找着一个，宣传部组织……以致各部工作未曾充分建立起来。

(三) 请求——
1. 须很快的派两个富有……经验和理论基础的同志前来参加……基层干部亦须多派些来。
2. 将国际中央和中央分局所有文件须设法将全部寄给我们，以便照新路线和策略来执行。
3. 转请中央到宜昌与我们建立发行网。

湘鄂边特委

(1931年)9月6日于鹤峰五里坪

唐赤英关于湘鄂西军事工作意见给中央政治局暨中央军委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

中央政治局暨中央军委：

一、今天(九月十日)上午，中央军委工作的徐世辅同志来传达关于中央军委最近根据了湘鄂西中分的报告和我此次的报告，讨论了一个初步的结果而起草好了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指示信(可惜此次的讨论我未曾参加)的内容。这指示信的内容除了一般的军事工作，大致我是可以同意的。但关于湘鄂西红军的行动和发展的方向及其发展的前途问题，我是不同意的，而且是不能同意的。因此，在中央政治局未通过这一指示信以前，我不能不将我不同的意见提到中央政治局，请政治局详加讨论，使湘鄂西的工作更开展的得到完满的进行，以实现湘鄂赣苏区打成一片的胜利的可能前途。

二、徐世辅同志传达的意见是：“……现在第三次的包围已经打破，蒋介石损失了六万……又值粤桂军向长沙进攻的时候，北方军阀内部混乱的时候，而南京政府的军事中心地有三个：一是长沙，二是武汉，三是南昌……，他方面湖北的水灾使许多灾民没有出路，特别是鄂西的仙桃镇，蔡甸(接近汉阳)等更多，而有很充分的群众基础。因此，现在湘鄂西的红军应当向武汉方面发展，红军的主力在仙桃镇、蔡甸发展，以威逼武汉，以切断武长路，更进一步向应城、安陆方面发展，与鄂东北取得联系，以切断津[京]汉线……。如果湘鄂西的红军能够积极向武汉方面发展，以威逼武汉，那末，则徐源泉等师不敢往前线(长沙)开动，而蒋介石则必由江西调兵入湘……，这样，湘鄂西的红军能够在武汉方面牵制了蒋介石的两师、三师，则这时中央区的红军就能击破吉安、吉水而便利的进取南昌……。那末南昌打下，这时湘鄂赣三省的胜利的前途又是如何呢？……我们应当明白：三个区域的红军(湘鄂西的、江西的、鄂东北的)应当配合的一致的作战，才有大的意义。如果湘鄂西红军的主力放在南岸来(石首、华容、南县、公安)，是没有多少作用，且蒋介石简直不会理你的！南岸方面，现在已经有一千多游击队的武装，但已经足够扩大区域之责了。我们现在应当认识和了解：游击队和赤卫队是扩大苏区和巩固苏区的，而红军应当是拿来作战！”

这以上的指示，一方面大部分是由徐世辅同志一直的传达中说出来的，有极少的几点是经我不同意这个指示而反驳他以后而补充出来的。世辅同志并申明(在他传达这个意见时)，这个意见是由伯承与他所提出而讨论的结果。

我们现在看了这封指示信草案的内容后，完全不是一个简单的错误问题，我认为还是一个路线的错误问题，这是很明显的。中央军委的这一个指示，完全证实还不了解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意义和发展的前途，更不了解国际指出巩固根据地的四大根本条件(见军事问题决议)，因此更不会而且不能了解和估量到中央最近所指出争取湘鄂赣苏区打成一片所应采取的策略，以及现在几个中心苏区本身和红军本[身]等缺点、弱点及其应当必须解决和准备的是些甚么？！同时，对于中央最近指示，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与反动统治阶级决胜负的必需条件的意义和实质，亦是不了解的！

所以有了这些，自然会走到一种神奇古怪的非策略的非辩证的了解和估量——“左”倾的空谈，以为“扩大苏区是游击队的任务，而红军是用来作战的。”殊不知，专以游击队来扩大苏区是有限的，而且在有些条件之下，

还不一定可能，或者要限于防守，我总不懂得：为甚么红军作战胜利的结果，而不是扩大或增加了新的苏区和夺取了敌人的武装来武装了自己以及充实了红军的军实，而竟把扩大苏区与红军作战对立起来呢？！以为：因为红军不去做扩大苏区的任务了，而湘鄂西的红军就要向武汉方面发展，占领了汉阳附近的蔡甸，以威逼武汉，就可以使徐源泉等两三师不敢调动，则中央区的红军就可打下吉水、吉安而顺利的取得南昌，这简直是神奇的怪论！简直不懂得敌我力量对比下我应采取何种策略！完全没有去考虑和了解到中央区的红军三次都采取诱敌深入的攻势防御的战术是一回甚么事？！以为：中央区的红军占领南昌后，北方军队即必南下，这时，湘鄂西的红军即向北去切断津[京]汉线，则蒋介石就可投诚，或弃械而逃，那末共产党就可进取武汉，三省就胜利了。这是在亭子间里空想，纸上用兵！

总之，世辅同志所传达关于中央军委根据其讨论的结果所起草的指示信的内容，完全是把国际关于苏维埃运动与根据地的一切内容和实质通通忘记而抛弃了！完全把红军几次突破敌人包缴[剿]的教训和经验一概抹煞，一点未去利用！？完全站在极“左”的非策略的词句之下，充分的表现了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的实质！这种实质的反映，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小资产阶级的感情革命的表现，以为红军胜利了，蒋介石损失了六万，军阀战争又爆发了，这时红军便要积极进攻中心城市：进取南昌，威逼武汉，切断武长、津[京]汉二线，以完全[成]三省的胜利。这是列宁所谓的鼠目寸光的“近视眼”（机会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是不能得到国际路线的真正的进攻！而便利了敌人的进攻！这是十六、七世纪的军事专家的见解。现在蒋介石几次“缴[剿]赤”的惨败的教训之下，如果以这样的眼光和见解去向他（蒋）建议的话，他都会拒绝而一点不会感激的！

三、我的意见是甚么？我从各方面简要的提出几点：

1. 目前中国的形势已经是成为两个政权对立——以新政权来代替旧政权的严重形势；已成为以革命战争来消灭军[阀]战争的——国内战争的严重形势。现在波及十六、七省水灾，灾民达万万以上（反动报纸最近布露）；军阀混战现已爆发，使人民经济更沦于破产。这些都是：客观上革命危机的深入和日愈剧烈化起来！因此，中国的形势一方面表明了反动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在经济上的统治完全破产；他方面，中国的工农红军逐次打破反动统治阶级的总进攻，而使苏维埃运动在全中国占着主要的严重形势。

2. 我们的党现在应当是很镇静的，很策略的执行列宁的国际路线的真正进攻！那末，我们就应当从最近的战斗中得到经验和教训，了解苏维埃运动的弱点、缺点和现在状况：

苏维埃运动中的几个中心苏区（中央区、湘鄂西、鄂豫皖）才开始从立三路线的统治之下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实行国际路线的大转变。

各苏区还没有完全的充分的从国际路线的基础上巩固起来。

我们三次打破敌人的进攻，还是采取的诱敌深入的攻势防御的战术，还不是采取完全进攻的开展的突击战术以出击敌人，这是在我们主观力量的对比上还没有具备着开展的出击敌人的必需的条件。现在我们应当来解决这些弱点和缺点。

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党应当鲜明的进一步的指示苏区的党以国际路线为武器的彻底解决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一）扩大新的苏区；

（二）增强红军的数量是当前苏维埃区域的现实前提。自然，在这种严

重

时局中，我们的党早已指出：刻不容缓的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其他各中心区亦应立即建立最高的特区苏维埃政府。这里，是列宁主义的国际路线的真正进攻！这是湘鄂赣苏区造成一片的必要前提，

这里绝不是非策略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近视眼”的见解，以为只以

游击队来扩大苏区，这是立三路线取消游击队和游击战争极端的反面！以

为红军目前就只专攻取中心城市，切断武长线，切断津[京]汉线，威逼武汉……这些都是“左”倾空谈，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的复活——在革命危机剧烈化和苏维埃运动在全国占着主要的形势的时候！

3. 我们要决定湘鄂西苏区红军的行动时，除了上面所述的情形必须估计外，还须了解湘鄂西苏区的现实情形：

现在洪湖方面据八号来的交通说，现已有一师和一个独立团以及桃花山和东山等处的千余枪的游击队，合计群众的武装，在六、七千左

右，他们现在的行动本要南渡，但因北岸的敌人先行南渡而断绝了交通，故他乘敌人之南移而向北进攻，目下已进到潜江、沙洋（他们又得到消

息，说七、八两师又回到荆门、远安方面来了，所[以]第九师（德昌部）拟深入荆门接七、八两师。这×我以为只限于全区 洪湖 的军事环境许可时，否则只须尽可能的用军事的力量去帮助七、八师回来）。

湘鄂边区（即武[五]、鹤、长、石、桑五县）的独立第二团（新的编制）在短期内帮助地方武装解决苏区内（五峰）的反动武装，可能全部向东（松枝、枝江、宜都等）发展。

据七月七号（？）由房县方面来的第三军的交通欧阳静同志（系八月十一号到上海，九月初我曾与他说过一次）的谈话，实际知道第三军共有人数只有六千到七千，枪枝在红军身上背着的四千左右，马驮着的约一千枝（云清同志 贺龙 非常消极，要求中央调他的工作，克明 军政治部主任、德清 七师师长 都请调工作。有许多同志都申明保留他们的意见。因此，他们要求中央派一个能负完[全]责任、解决一切问题的同志。这里我们知道这一部分红军在领导上是十分严重的）。南渡以来，在中夏、贺龙同志的政治的军事的错误路线的领导之下，红军的数量、质量、战斗力和党的领导都削弱了！八月下旬反动报纸载：李桂中部已把贺龙部击溃为两部，一向竹山、竹溪，一向荆门、远安。

湘鄂西整个的苏区已经从立三路线下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目前正在执行国际路线，使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从国际路线的基础上巩固起来，准备着新的开展的战斗——革命战争。

现在湘鄂西主要的具体工作是：A、立即打破敌人现有的包围和进攻，恢复过去被敌人摧毁的政权，首先就是北岸的监利，两阳、潜江、天门等。B、其次，就是以红军的主力南渡，与桃花山、东山的游击队配合，恢复华容、石首、南县、安乡、公安以及松滋、枝江、宜都的政权，与五峰、鹤峰、长阳、石门、桑植的苏区打成一片。这时以主力向东南方面（常德、湘中方面）发展，这是有利的。这里不仅是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发展胜利时是有利的，或者纵然遭受到严重的打击或失利，于红军的前途都是有利的。关于此点在红

军的第一次训令上已经明显的指出。C、因此给湘鄂西的党目前在军事上就是积极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战争，以突破敌人现有的包围和进攻，恢复南、北岸的政权与湘鄂边（五、鹤、长，石、桑）的苏维埃区域打成一片，使这些区域的政权和红军完全在土地革命的群众的基础上巩固起来，是当前迫不及待的紧急任务。这是列宁的国际路线的真正进攻，是争取湘鄂赣苏区打成一片的必要的的前提。D、北岸的监利、沔阳、潜江、天门、应城这一大的区域，除了堤坎和农民的耕种地外，完全是水。原来的洪湖军校因为地域关系不能达到训练的要求，现已解散，准备移到南岸（最近的将来）。因此，站在国际巩固根据地的“便于红军的训练”的条件下，湘鄂西的红军发展前途和方向亦必须南渡，以及向湘中和常德方面发展。E、关于七、八两师：如果反动报载是正确的话，那末他们已有一部（？）向着洪湖方面回来了，这是要在军事上尽可能帮助他们回来的。至于其他的一部分（由房县到竹山、竹溪的）对应当如上次我与中央同我谈话所决定的：积极设法与房县方面建立交通关系，然后派负责的同志去××和改变。

4.最后，因为有了徐世辅同志的谈话（至少亦是中央军委一部分同志的意见），不能不再要申述几句。我认为：在争取湘鄂赣苏区打成一片的可能前途的工作中，如果不企于湘鄂赣的群众的基础上、新的苏区的扩大上，而现在只以单纯的军事力量来向中心城市进攻，实行以红军威逼武汉，切断津[京]汉路，切断武长路来争取数省的首先胜利，这是不要群众的军事机会主义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的复活！我站在布尔[塞维]克党的立场上，请求中央在目前红军在军事上得着大的胜利的时候，反动统治阶级内部混乱和革命危机加深与剧烈化的时候，而苏维埃运动在全中国占着主要的形势的时候，预先警醒这些同志，不要犯着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使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在这时活跃起来！

5.我最后还须申明几点：关于湘鄂西军事工作的意见，前次中央来同我谈话同志已经是同意的，而且认为必须这样执行。今天因为听了世辅同志的传达，我不能不把这种意见提到政治局。本来是个草案的内容，用不着这样的提出来，不过因为至少已是一部分同志的意见，所以必须要向中央政治局报告的。

专此敬致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唐赤英

九月十日写于中央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原文如此。

唐赤英、夏曦对于湘鄂西军事方面的意见的报告述要*

(一九三一年九月)

甲、关于一般的军事不是孤立的，而是政治上的一部分。所以，谈军事之前，先将湘鄂西底政治情形连带地略说几句，虽然中央政治局对于该处有详细的讨论，有专门的指示，而不是这一述要底职责。我所见的文件不多，说的或有漏点，但就所见到的是：

一、湘鄂西的党，一经中夏同志领导以后，是把立三路线发挥尽致了，尤其表现于军事上面。他对于时局估量，将军阀战争认为是时局主要问题，同时，将政治任务认定是准备全国总暴动，是夺取大城市。他底行动，是离开群众的，甚至于是牺牲群众的（征发粮食及于贫农，以致贫农“反水”，而他自己说：“这是饥军与饥民争食！”），是专靠红军打“天下”的。看他的《北渡军事计划》，其要点是：到达远安、荆门、当阳，进逼宜、沙，联络洪湖；不成功，则退往房县。这一计划，一方面是表现他不认定革命群众是巩固的后方，而认定敌人少山地多是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是表现他想拿这空浮无着的计划专来掩盖他带起大军退入深山，让第一、三军团去受敌人打击的企图与事实。因为他在事实上专做其计划中的不成功的方面，退了房县，而且退了竹溪（见《申报》）。这一种不顾全局单独自私的农民意识的动作，在无产阶级领导的红军中，是不容许存在的。如果他拟这一计划，而在领到中央给红军第一、第二次的训令以后，则此种不服从命令之重大事实，更不可成为“效尤”的例子。游击队动作，因其深入敌境，既无正面，又无后方，所以部队宜小，以便运动轻捷，而红军既已成为大的兵团，其动作是要有正面，要有后方的，所以国际指示说：要有后方的巩固的发展。中夏同志以第二军团若大的兵团，在无红色群众的地域进行游击队动作，是根本违反了红军军事原则，如何不失败呢！

二、夏曦与赤英同志到湘鄂西去后，对于立三路线的一切设施是有转变的，尤其是夏曦同志底的工作精神注重组织革命战争上面。然而还有不够的地方，如就洪湖方面说，灾民斗争未能积极地扩大他们的斗争到苏区以外，就中发动游击队动作，扩大红军；而于军事上并未变更以前平分兵力的空疏部署，其给与的任务又不显明，所以，演成一个“偷安江左”的局面，而对于敌人向中央区的第三次“围剿”影响甚小的。并就鹤峰方面来说，党的领导、党员成分、土地等问题非常严重，当然不是一个会议席上所能转变的，且其中土地问题、经济问题等尚无明确的解答。至于军事部署。可说是重心不定，段落不明，分工不清。

总而言之，湘鄂西——尤其中的鹤峰方面的问题，主要在加强党的领导。此后的注意力除加强交通工作，迅速实现中央活的指导以外，湘鄂西本身须办党务的政治训练班，造就干部人才，以利工作的推行。至于第二军团的政委问题，须派一干员前去充任，才能转变这深入的立三政治路线（鹤峰方面亦须派干员前去）。

三、蒋介石亲提三十万大军对江西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就各方消息说来已经失败了，已证明红军是任何力量不能消灭的了。但是，反动的统治阶级在他未消亡以前，绝不会减弱消灭红军的企图与动作，虽然在现时风传的广东出兵湖南声中，而其主力仍是在江西。为使南京军阀将来并抽调江西北面的兵力以对广东军阀作战，也是一时战役上之应用，而其战略上之主要

点仍在消灭红军。且红军如于其混战之际得着进展，则又是促成各交战军阀之合作的。在现在形势看来，南京军阀因为要集中兵力南下，是可以放弃河南的。但是，武汉仅就举事而论，为军事工业的中心——汉冶萍，所以，制造杀人利器的他不但是不放弃，而且是加意固守的，特别是在红军第四军向武汉威胁时。何健对于军阀混战中向来采用编幅政策，所以他的后方照例是在湘西——常德方向；他在这一回也不会成为例外的。宜沙的四川军队是为取得宜沙地盘而来，现南京军阀虽要用他在宜沙压迫革命，但不愿他接近武汉——军事工业中心。照这样的敌情而论，现第二军团如对敌人战略要点——武汉、常德、长沙施以威胁，无论是从减弱敌人攻红军的兵力来看，或从对军阀混战所取的失败主义来说，都有重大意义的。

乙、关于第二军团的

现第二军团是飘浮无定的，我们对于他的联络应即从四川城口、湖北鄖阳两方派人前去传达中央路线，并给以军事训令。但是在什么地方才可以与他取得联络，此时无从推测。所以对他的军事训令，要估计到这一点而给以相当的目的：

其一，如第二军团接到此项军事训令之地点较便于到达长江北岸洪湖、枣阳、随县之苏区时，则即开往两阳、监利、潜江、襄阳、桐柏等处，而以之为活动地域。其任务：

1. 巩固并扩大苏区。

2. 协同第九军对平汉路信阳南段和武汉威胁，以牵制敌人之兵力，而减弱攻我中央区红军的敌人。此是该军团主要发展方面，可以使鄂豫皖打成一片，而又可以在平汉线上取得军械军需的。

3. 沿襄河流域发展。

4. 向长江监利上下流发展，以与南岸苏区呼应，水道通亦可减少经济上之困难。

其二，如第二军团接到此次军事之地点较便于到达长江南岸桑植、长阳、南、华之苏区时，则即开往鹤峰、桑植、大庸、长阳、华容等处而以之为活动地域。其任务：

1. 巩固并扩大苏区。

2. 对常德、长沙威胁，以牵制敌人之兵力，而减弱攻中央区及湘东红军的敌人，此是该军团主要发展方向。

3. 沿长江之松滋、宜昌段发展。

4. 沿沅江流域发展。

丙、关于德昌、玉林两同志所部之两团的

一、段玉林所部兵力除以一小部留长江南岸原有苏区游击以保持并发展苏区外，其主力应即调往北岸苏区归段德昌指挥。这样地集中两团兵力，才能有力地遂行下项任务。

二、该两团之任务是：肃清北岸苏区局部底残匪，使之巩固并扩大起来；其主要发展方向，在威胁汉阳以牵制敌人主力而减弱攻我中央区红军的敌人；其次则沿长江或沿襄河上流发展。

三、若将来第二军团归还某岸苏区时，则该两团的动作须受该军团长统一指挥。

丁、关于王炳南所部之一团

该团任务是：集中全力肃清其苏区内部底残匪，使之巩固而扩大起来；

其主要发展方向在向长阳、公安方面，以企图与长江南岸公、石苏区打成一片；其次，对四川万县方向发展。

戊、关于赤卫队与游击队

苏区赤卫队具体任务：

- 1.担任苏区卫戍勤务，巩固苏区。
- 2.选出补充队战士，补充红军。
- 3.发展游击队，扩大苏区。

由此看来，游击底兵力除必要时机外，勿庸拨出红军军队任之，以致分散了兵力。当此灾民斗争之际，实为苏区与非苏区发动游击队动作最有力的一个条件。对于此项工作，须特别加强起来。

己、关于军队教育问题

长江北岸苏区内之军事学校，即作为该军团之随营学校。鹤峰苏区内则由步兵团中成一个教导队，均在军委或政治委员严格领导之下办理，以造就干部人才而改进军队底战斗技能。其教育以合实际迫切要求为原则，具体些说，少学科，多术科，而术科又多演习，少场操，射击教育亦须特别注重。

注释

原文无时间，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程祖武关于豫鄂边苏区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关于豫鄂边区经济政治情形，由豫鄂边特报告过了。兹仅将豫鄂成立到现在及中间经过，反动派合剿，种种情形报告于下：

(1) 自民国十九年阴历八月中，豫鄂两特委，中央命令实行合并，成为豫鄂边特委，同时豫鄂边，特委也在这会议中产生出来的，当时就指定程祖武为豫鄂边区主席，杜业春、吴寿青、金复光、汪勤生（以上皆知识分子）王兴仁、李光恕（二农人）周学敏（手工人）王士明（士兵）等九人共同担任边区工作，以后因种种原故都未到职，只有祖武、亚春到了，故在八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枣阳西乡蔡阳铺（赤区中心）到会的群众万余人。

(2) 工作分配：以亚春、寿青、祖武三人组织常委会，其他为执委，担任各县委员会的工作。

(3) 工作的进行，边区内部组织，常委会以下，组织六个委员会，（土地、经济、文化、军事、肃反、裁判等）又组织一个警卫队，担任保护和肃清当地反动派责任，又开始向外没收土豪省绅的土地，公产庙产祠堂产及一切中小地主，土地分配及[给]贫农雇农耕种，自去年八月到今年五月，襄阳方面的土地分配了十分之六七，枣阳方面分配十分之四五，宣城方面分配十分之七八，钟祥方面分配十分之二三，枣阳襄阳都成立县苏，宣城成立两个区苏，钟祥成立一个区苏。

(4) 各县苏府的职员成分，枣阳各级苏府，职员，多为无产和贫苦农民，知识分子为五分之一，襄阳各级苏府职员，知识分子占三分之一，其余是农民，中间参加还有少数流氓无产阶级与民众影响有些不好，宣城各级苏府职员流氓无产阶级为二分之一，余为农民，钟祥各级苏府职员是半知识分子，半贫农。

(5) 各县苏府职员的生活，枣阳职员生活，较县苏优美，襄阳各级职员生活具优美，宣城各级职员生活腐化，兼有贫穷情形，钟祥各级职员生活中等。

(6) 赤区民众组织，甲、雇农工会，枣阳成立四个雇农工会，一个雇农总会，人数五百余，枣阳才开始组织，宣城成立一个分会，人数百余，钟祥没有，乙、劳动妇女救济会组织，枣阳有一总会二分会，人数四百余，宣城有三百余，钟祥才开始。丙、劳动童子团的组织，枣阳有三百名左右，襄阳有二百二十人，宣城有八十名，钟祥没有。丁、警卫队枣阳有八十名，襄阳有五十名，宣城有三十名，钟祥有十五名。戊、红色补充团，枣阳有八团，襄阳有六团，宣城有四团，钟祥有二团。

(7) 红军：第九军第二十六师有四百五十人，长短枪四百二十支，内中成分一部是十六军老人，一部分是被反动派压迫来的农民，一部是贫苦农民，这三部分成立起来的。因为上级负责任的（陆春山贾布严）观点错误，常抱避坚虚的主义，就是布置好了，他们也不得去了，以后又换有点经验的军事负责者，又被军阀会剿……性（赵章任）现在师长和政治委员，不懂军事，又不知政治，对内训练也没有一点，简直乱撞乱抓，加之党的工作太差，不能起领导作用，所以不能发展，困守赤区。

(8) 自去年豫鄂边区成立，到今年五月，不但没有得着中央的一点指导，连豫鄂特委也很少指示加以对各种工作，又没有一点经验，全靠自己摸索，

地方党部组织又差，不能起到领导作用，各级苏府职员无一点经验又多是农民，每每一个通告下去，不能执行，处处还要亲自去跑，而边区委员又少，不够分配，又一般老同志，因十七军失败情绪太深，不敢勇猛去干，生活上有点腐化，多与民众相脱离，故赤区民众不勇敢起来……维护自己政府等。

(9) 反动派的会剿：自去年八月到今年三月，经过三次会剿，去年四十八师和五十一师会剿，将襄阳赤卫队和苏府都受了很大的打击，因此赤区缩小，一部分赤卫队被缴械，枣阳西乡赤队哗变，赤区变成白区，阴历十二月又会剿，几乎将二十六师和赤卫队消灭，以后退到京山才避免过去，到今年正月鄂豫边区苏代表大会，已将开始，五十一师和四十八师，又来进攻赤区，将红军和赤区赤队都已消灭将尽，恰遇三军到了鄂北，南漳一带，而小军阀范石生只顾防堵红军，于是二十六师将鄂北赤区乘机恢复。

(10) 我自去年八月担任豫鄂边工作，到今年正月二十六师师长赵章任担任师长，将部队带到荆门一带，后因反动派军阀追击，才又将队伍带到赤区，总共经过十一次败仗，中间只胜一次，恰遇三军到鄂北，才将恢复起来。各民众团体设施起来，因我个人感觉对赤区缺少经验，又对党的目前策略欠了解，故在赤区工作，完全靠着自己去摸，因此，在工作上无大发展，想受点训练，再担任工作。

(11) 我要求派二人去豫鄂边特委，负党的工作，至少也要派一人去担任书记，不然党的工作，无法进行，派三人到红军二十六师工作，(师长、政治委员、书记)派一人到豫鄂边区……委会工作。

以上是今年的简单报告，你们有工夫可再作一次详细的报告。

(完)

雪怀关于豫鄂边区特委最近工作报告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一、党的工作

去年五月张李二同志由中央回去接得中央指示，即令豫南鄂北两特委合并。遣至八月豫南鄂北联席会，才合并组织豫鄂边区特委，那时正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南阳各县的暴动遭受了三次的失败，而鄂北的暴动也遭受了几次的失败，干部牺牲，组织塌台，故边特才成立时即忙于恢复各县组织，而缘于干部的缺乏，故始终对于各县党的指导上感觉薄弱，甚至于边特的执委多兼任中委，各县及红军边苏的工作；党委跑到各县巡视，即不能集中，实际上形成书记一个独干。

今年正月李同志由中央返里，那时鄂北赤区和九军二十六师，正值蒋介石的严重会剿时期，二十六师在重重白军与反动民团包围之中，因屡次战败而溃散，赤区变成白区，三月三军游击到鄂北白军压力集中，对付贺龙之部，襄东白色压力减轻。因是赤区及二十六师得以恢复。三月九日边区扩大会议开始接受四中决议及国际路线，即派常委宋同志过鄂北去纠正立三路线，改造赤区及红军工作，在襄宜二县依照新的路线去做，故目前土地已完全分配，群众斗争情绪也很高涨，群众团体如雇农工会、贫农团、红色补充军、童子团、互济会皆已组织起来，而枣阳同志犯着右倾机会主义的遗毒太深（如县书阳）以地方观念笼罩县委意识，反对国际路线，县委则对上应付对下敷衍，工作停留在右倾腐化的几个老干部身上，以致形成党与群众关系的恶化故枣阳赤区始终是动摇的，现枣委书记已撤职处分，这是襄中工作的简单经过。

2. 至于河中先发动的即是均县，春间我们到了河口，均县九军第二纵队才二十余支枪，适值均西抗捐斗争，农民自发的与民团武装冲突，第一次胜利，由于反动县府即调全县民团去会剿马家岗，那时农友公开的来找党去领导，我们即决定斗争计划，将二纵队开过去援助，于是第二次斗争又得到胜利，全县的武装群众斗争即掀动起来了，这时自军开了一团人去镇压，恰赶着三军开到均县攻下了“石花街连攻下均县郢阳遂占领武当山在襄樊汉江以西，保康房县均谷一带开展六七县的新赤区”。现在均县土地正在分配，惟房、保因党的领导力量薄弱，赤区工作也较差，可是这几县的群众斗争情绪则很高涨，较之襄枣一带的工作却好多了。

3. 南中是白区，一切劳苦群众受到鄂北赤区及红军的影响，情绪也都很高涨，不过在主观上党的领导力量太薄弱了，加之在立三路线时代几次暴动的失败，造成群众的失败情绪，故虽经红军的游击尚未能造成赤区。最近决定在南阳各县组织一个游击队，以摧毁封锁势力，推动西南工作。

4. 唐河县委犯了严重右倾（幻想运用封建武装发动）已通令解散，另成新县委。

二、红军工作

九军军部未成立起来，仅廿六师约四五百人，士兵成分太复杂，因为十七军鄂北盲动失败，这些同志及士兵流亡在外，有多少当土匪的养成了流氓土匪生活，仅是由他们用几支枪发动起来的（并不是由群众斗争发动的）故很不容易训练，加之那时的师长张同志未受到党的训练，完全应用冯玉祥的治病[兵]方式培养个人信仰，不执行党的路线，而政治委员曾昭时同志复从中迎合，虚伪应付，不切实纠正士兵错误以致形成骑兵大队的哗变（现曾

同志仍在河南省委负责)。今着李同志由中央回去带回由中央派去的王明赵华任李政何尚志毕 XX，他们就职了，正值白军严重围剿之时，何尚志在到日之晨攻王义镇之战即受伤，后被护[捕]牺牲，廿六师长赵幸任就职一星期余亦阵亡，老毕在南漳之战被捕，李政现又负伤，从去腊(注：阴历十二月)至今年二月二十余次战争失败，于是赤区即变为白区，而九军廿六师也即溃散了。恰好三军游击到鄂北，白军压力集中到河西，河东赤区得已恢复，廿六师的武装及士兵得重振旗鼓集合起来，不过目前的失败情绪很深，战斗力很弱，且无人担负军事政治训练，这是他始终不能扩大的原因。

三、苏维埃工作

边区革委会是去岁八月成立起来的，因为负责人材太缺乏，对于赤区许多建设工作都未能做到。在边区革委指导之下，有枣阳县苏襄阳县苏宜东区苏。去岁的错误是仅知打土豪买枪而不知怎样去领导群众斗争，组织武装群众，且走的是富农路线，不坚决分配土地，不坚决领导雇农及贫农的斗争，且因各级苏府的职员的生活腐化行动恶劣以致失掉群众的信仰，故使[始]终赤区未能扩大。三月由三军到鄂北在均保房谷开展的新赤区，均县的工作比较好点，而房保则因党的领导力量薄弱，故甚至有些新式豪绅即滚到革命方面来，在地方抓取政权发展武装。现在已决定派人去切实领导，并决定将边区苏府移向河西以便于指挥，可是一致[直]到现在边苏的上级干部尚是无人，也如廿六师是同样的缺乏政治人材，使工作上受到莫大的损失。

总之，一切工作漫无头绪，一方面是由于老干部牺牲太多，新干部未培养出来，而顶重要的即是长期与中央断绝关系，一切的新的策略路线都不易接到而本地同志又缺乏军事政治以及苏区工作的经验。故急要中央速派：1. 边待书记一人；2. 巡视员按期每月去一次；3. 九军政治委员一人；4. 边区苏府尽可能多派几人去。

这是一个大概的报告，详情面告。

雪怀

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关于反对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草案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前委讨论了中央和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来讯及听到万涛同志的报告以后，除完全同意外，并成立以下的决议：

1. 中夏同志在三军中的政治领导，所执行的完全是立三路线，最后是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脱离苏区根据地，不坚决执行平分土地与反对富农，放弃在政治上巩固红军的任务，实行上山躲避，充满着悲观失望的情绪，这些都是立三路线之机会主义最露骨的表现。

2. 中夏同志不了解阶级力量对比的关系，他看见军阀混战的暂时停止，便认为反动营垒的矛盾已经减少，苏区已经没有希望，红军也只有逃跑，这就是说苏区和红军只能在军阀混战的条件之下得着存在与发展，没有军阀混战，苏区和红军是没有办法的，这与陈独秀所说的“中国红军的生长是因为敌人的不注意”没有丝毫区别。

3. 中夏同志完全不相信群众力量，曲解国际所说的革命根据地军事阵地，所以他认为有山就是地势足资依据，其他是可以不管的。这种单纯军事投机的观点，是立三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之一。并且他还惯拿创造新的根据地“左”的假话来掩盖他的错误，来贯彻他无条件放弃原有苏区的错误主张。

4. 从单纯的军事投机观点出发，完全放弃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政治部所做的，仅仅是对外的一点宣传任务，更主张的由于这种军事投机所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的发展。使红军中失掉了政治前途，几致使红军解体。红军中所发生的个别逃跑现象，完全是由于这种悲观失望情绪的结果。这也就证明了中夏同志政治领导的破产。

5. 中夏同志错误领导造成的结果，当着统治阶级集中力量“围剿”苏区和红军的时候，三军不能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抵抗敌人的进攻，反而逃避上山，使苏区和红军同样遭受大大的挫折，增加江西红军主力作战的许多困难，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的“围剿”，把中国革命向后抛置。

6. 中夏同志初来时，虽曾口头上传达过国际路线，但他所执行的一贯的与国际路线相反。中央批评他是对国际路线的两面派，完全是正确的。中夏同志现在藉口不懂得国际路线，是企图掩饰他自己的错误的一种滑稽的说法。

7. 前委认为，中夏同志承认错误的程度是万分不够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只承认他是个别的错误，是对国际路线的调和，这是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

8. 前委认为上次扩大会议所作出的结论，说过去三军的政治路线是在“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之间摇摆”，这是不正确的。前委根据中央及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取消这一结论。

9. 前委完全同意中央撤消中夏同志工作的决定，并立刻执行了中央的决定，前委要求中央撤消中夏同志原有一切工作，另派中夏同志以下层的群众工作，使他在实际工作中去纠正他的错误。

10. 过去三军在中夏同志的家长制度领导之下，政治路线的错误，当然主要的是应该中夏同志负责，但前委其他的同志，特别是个别赞助中夏同志意见[的]同志，也应该负相当的责任。前委认为现在决不能说中夏同志工作撤消后，第三军中的立三路线及右倾机会主义已经不危险了，政治工作及党

内领导的微弱，正是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最好的隐藏所。因此前委要求全部工作要迅速执行坚决的转变，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立三路线左倾的空谈，同时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保证国际路线在三军中的巩固与执行。

11. 前委认为四中全会以来，中央给红军的一切指示及最近中央和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来信，是第三军目前行动的基本原则，我们完全接受这些指示，并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去完全实现出来。同时要把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深入到红色战士群众中去，特别指出红军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非常危险的，以提高党在红军中的威信。

12. 此外还有两个急迫需要执行的：第一，第三军要向着湘鄂西原有苏区根据地方向发展，与后方取得亲密的联系，巩固的扩大苏区。第二，改造并加强三军中的政治工作，改造三军中的社会成分，使三军成为政治上真正巩固的“铁”的红军。

鄂豫边特委雪怀军事工作报告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日)

中央军委：

兹将最近九军廿六师及九军第二纵队与豫南鄂北几部分的白军中的军事工作报告如下：

(一) 红军工作：

一、九军廿六师

1. 廿六师的成立及其经过

(1) 十七(1928年)年的盲动时期，鄂北曾经发动起游击战争，创造了襄枣的赤区及工农革命军，那时仅有二百多支枪，在七月至八月经桂系军阀三军人的会剿，结果到八月底因子弹断绝，而插枪失败，这些红军士兵即逃亡到外县，或有的即到土匪中过土匪生活，并有一部分到民团中去。去年春天，由于本国革命的高涨及本地经济破产，土匪遍野，民团无法维持其统治，遂由这些逃亡归来的同志，号召旧日的工农革命军的兵士，用两支半枪发动起来，(军事投机式的而非由于群众日常斗争的扩大，而开展的游击战争)解除了地主民团的武装，赶走了土匪，遂又创造了襄枣的赤区。

(2) 那时政治委员是北特负责同志杨秀阡，经他带着很英勇的打下了蔡阳，璩湾，古城，三个镇市，即发展到三千一百余支枪。不幸在攻黄、黄龙(?) 垱之后，而杨同志牺牲了。

(3) 此时军中无人领导，即由河口找来张香山同志负责，他是一个由冯玉祥军中还伍回来才加入党的同志，对党的认识不清，遂运用冯玉祥的治兵方式专以培植个人信仰而迎合那些流氓士兵的意识，士兵的行动近乎土匪，他且鼓动士兵反对政治部及党的负责人，以致使红军毫无军事政治训练，他的战术则处处要进攻党，白军一来即带着逃跑，白军去了返回到赤区内吃饭，致使赤区群众对红军发生恶感，甚至于党的力量布置好了民团豪绅寨子而他不去打，待事后泄露，民团中反地方党的同志，多遭屠杀，这时的红军可说是脱离群众，脱离了党，且脱离了边区革命委员会，形成了个尾大不掉的东西——为时在去岁六月，有三百余支枪。

(4) 八月联席会，豫南鄂北两个特委全并，成立豫鄂边区特委，才决定留曾昭时同志(河南省委巡视员)任廿六师政治委员，以期加紧军事政治训练，可是他上队了，仍为张得山同志恶化，各处党所布置好的镇市，(即民团士兵能开门内应)他们不去打，致各地组织受到很大的摧残，还有一件最痛心的事情，即骑兵大队的哗变。

(5) 先是红军南征，钟祥围攻丰乐河六天始下，这四五十个豪绅民团丁投降，曾同志则将他放在一块，编成骑兵大队，而且用民团长来当我们的骑兵大队长，二次南征参谋长姚洗心同志数次向他报告说骑兵要变，而他专横自特，置若罔闻，到变的那一天，当地农民又来报告，而曾政治委员反责骂农民造谣，结果是日夜卒拖枪哗变了，损失50多匹好马，四十多支长枪，12(?)架盒子。

(6) 自是红军声威一落千丈，白军民团即计划总围剿，屡战屡败已是成了崩溃的现象。

(7) 冬月特委过去撤换了张(师长)曾(政治委员)以边区革命委员会吴寿青任师长职锐意洗刷，改造成红军成分，加紧训练，但同志缺乏军事经

验，仍屡次战败，冲不破白军的包围。

(8) 今年正月，由中央派去之赵侗(?) 任师长职颇得一般士兵的信仰，军纪风纪为之一振，可是这正当白军包围之时，参谋长何尚志在到的那天，攻璩湾之后即受伤，后亦牺牲。赵同志就职后七天，在枣阳三区打了一仗，不幸他又于斯役阵亡，士兵失败情绪更高，简置(直)是不愿同白军作战了。

(9) 继此，以程祖武同志任师长职，军队脱离赤区。渡汉口而西抵南漳，这时军纪风纪均较以前好了，在白区颇得群众信仰，在南漳一战又遭受个失败，遂又回到苏区，(这时赤区已变成白区)白军民团重重包围，屡战不胜，因而溃散，还有一部分是插枪了。

(10) 月三军由鄂西到南漳，白军遂开到河西防堵三军，而河东(襄枣)赤区始得已恢复原状，在赤区以内扫除地主民团及匪军的反动势力，帮助农民分得土地，以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恢复红军威信，但因师长及政治委员负责无人，而军事政治训练仍付缺如，这是边特极迫切的要求中央军委迅速派人去的原因。

2. 九军廿六师的编制

(1) 数量：目前有500人，枪四百多支，380支长枪，30多架盒子，三架手提机关，两架小机关。

(2) 士兵成分：25%是过去工农革命军的老兵士，这些人多半带些流氓习惯，雇农占15%，贫农佃农及中农占60%(?)。

(3) 廿六师的编制是三三制的梯队形式，即廿六师共分三个纵队，另外一特务队，每纵队分三大队，每大队分三分队。

司令部设师长政治委员各一人，参谋长一人，经理部是经理主任一人，经理员数人，政治部设主任一人，政治员十数人。

各纵队有政治委员一人，大队分队皆有政治指导员一人。

(4) 大[火]力及战斗力皆很薄弱，仍是军[采]用的游击战术。

二、九军第二纵队

1. 成立及其经过

(1) 去岁在立三的路线指导之下，均县曾发动起来。而开展了游击战争，那时约有四十多支枪，由于行动不好，为群众脱离，后被白军民团围剿失败。

(2) 今春又重新集合了二百多支枪，改编成九军第二纵队，遂在均县东乡开展了七十里长的一个赤区，后因均西马岗的武装农民的抗捐斗争起来了，遂将二纵队开去援助而由党决定发动全县斗争来响应，得了两次胜利，遂发展到六十余支枪，迫后三军攻下均县，遂在此一帆风顺的过程中，屡次围剿了民团及白军的武装，到现在已扩大到四百多支枪，准局[备]改编成25师，此外均县红色补充军，有六七大队，约五百多支枪。

(3) 他的编制是纵队之下三个大队，一大队，三中队，一中队，三分队，纵队都设纵队长一人，政治委员一人，经理，政治部的组织另[与]二十六师同。

三、群众武装

在襄枣宜赤区内各县，红色补充军及赤卫队，警卫队，暴动队约三百支枪，至为防剿保安的群众武装组织，则无详细的调查。

(二) 白军工作

(1) 在襄阳所驻的白军，是51师的范石生部，在其中党的组织有三十

多个同志，兵士群众约十人，工作则没有多大的进展，因为军委负责及这些同志都是湖南来 未 阳十七军失败逃到白军来的，故至现在，他们失败情绪还很深，几乎连宣传工作都不敢做。

(2) 鄂北游击军张恒全部，有我们的同志三十多人，这些同志的成分十分之六是农民(而在 51 师内十分之九是知识分子)，惟因上级负现人的右倾，不敢领导士兵斗争及兵变。

(3) 在郟阳的一师白军是张连山部，其中没有我们的组织。

(4) 南阳的白军是 75 师来天才部，据河南省委说他那里还有组织，不过未给我们接到头，最近由我在里面发展了三个同志。

(三) 民团工作

(1) 唐河县民团及北区民团中，我们已派进去二个队长，打入同志 30 人，以便从中发展下级组织，以响应几[九]军的游击，而造成豫南新苏区，并另外集合汝阳及唐县卿县同志们所有的枪支成立一个游击队，好在鄂北以外豫南开展游击战争，以摧毁河南封建豪绅地主的武装，扩大苏区和红军。

(四) 我们的要求

(1) 给九军廿六师派一政治委员去。

(2) 从九军廿六师派一师长去。

豫鄂边特委雪怀

1931 年 10 月 2 日

注释

原文如此。

万涛自永隆河给湘鄂西省委信

(一九三一年十月五日)

省委并转中央分局：

× 为军事行动的××，无法写出详细的××，现在只简单的说到几个问题。

(一) 九师行动的经过

九师根据省委的决定，××××打击徐德佐的主力，这个任务可是不策调到的。当我们占领沙洋时，从几种敌人文件中，清出远安县长告急公函，说三军之一部已入南漳，有进窥远安之势。我们的× 在南漳境地活动，我们知占领荆门，一定可以取得联系，而且××不×，与原来任务无大××，×到了荆门XX仍不明了，× 据荆委报告，荆委在仙居的组织与南委有关系，××我们决定进占仙居，在仙居约一周，组织二区革命委员会，群众起来参加打豪绅以及没收反动财产的二千余人，当时九师拨枪二十支，成立荆南游击支队(×××××收枪一百支×××)。此时三军音信全无，我们×××××在鄂北赤区，帮助他们执行工作的转变，消灭了几部反动武装。××××南下到京、天时，三军×××士奇同志×一营兵力，与我们取得联系，以上是九师行动的经过情形。

(二) 关于三军政治路线问题

九月二十八日，我与德昌、××、×五、×允同志等×发赶到吴家集与三军各负责同志会晤，当晚在刘×集举行省委会议，团长以上同志均出席，会议上对于中央及中央分局指示，完全接受，当场有严厉的批评，并作出结论和决议。

中夏同志承认错误的程度是不够的，他借口不懂国际路线，只承认是个别的错误，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他××的×××说“三军的政治路线是在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之间摇摆”。这次会议上一致承认了这个结论。但他的观点现在策有大的转变，他对我谈话“三军应当找一个东固”，可是他单纯的军事投机，忽视群众力量的机会主义观点，还没有××××的。

(三) 目前三军的政治军事工作概况

三军自实行了上山××以后，实力遭受大大的损失，××十七师所存不到一营，各部枪支大多用马驼着，因悲观失望的反映，经常发生开小差或拖枪跑，这次如再不取得联系，接续上山，则必然会使三军解体，这也就证明了中夏同志政治领导的破产。

现七、八两师，仅各两团，师部一特务营，军部直辖教导团、手枪队，现教导团尚留房县未下来，九师除二十六团外，二十七团已成立，

关

于各独立部队，现决定了重新改编，原有××教导第一师现改为独立第一团，以王×南同志为团长，小严兼政委。江[归]、兴、巴教导第二

师

改为独立第二团，以黄大刚同志为团长，余又明同志为政委。均、房一带武装改编为独立第三团，以张[汤]慕禹同志为团长，金生同志为政委。鄂北九军改编为独立第四团，以余×堂同志为团长，葛三×同志为政委。汉川独立团改编为独立第五团。

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可说完全没有。政治所做的，仅仅是对外一点宣传

工作，党做内部工作，政治部做对外的的工作，×军及两师政治部×
××未来，工作×很困难转变。现以鲁易同志为军政治部主任，准备直接来帮助各团连建立工作。至于部队中成份，俘虏要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团长以上均系知识分子，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四）目前的行动

扩大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以军长，军参谋长（孙××）、军政治部主任、军政委、各师长组织前委，会议上××决定向洪湖方向发展，九月二十九日东渡汉水，十月二日进攻钟祥之敌，稍获补充，现各部已×至永隆河，钟祥留有枪一百五十支，组织了钟祥游击大队，现决以一部至潜江，运伤病战士及笨重物品回苏区，大部以决心消灭徐德佐、岳维竣等部，××天、京各属政权，×第×师向外发展，但省委一定要和大批工作人员来做地方工作，并在××同志到潜江组织运输处以便把白区的用品及×米运向赤区，汉川同样要建立运输队。

（五）其他

1. 房县以柳克明同志留当地指导工作，除独立团外，另组织有几个游击队，至于各政治部教导团等，现在设法下来由×容、勉之负责。

2. 鄂北现由我们提议，组织了分特，我主张顶好是改为鄂北道委，由省委去指挥，自[因]他们与中央无关系，鄂北是鄂豫边特指挥，分南阳、河口、枣阳三个中心县委，组织不健全，不能指挥工作。

3. 剑如同志在三军中的政治立场是正确的，是与中夏同志作坚决斗争的，工作也非常积极，我提议以剑如作九师政委，培英做七师政委，中央分局是否同意，请速示。

4. 多派政治工作人员来加强三军的政治工作，请求派潘家辰去做军政治部宣传。

5. 红军编制及各种文件，请即寄来。

6. 军事政治工作人员要多派些人来。

万涛

十月五日于永隆河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原文缺六至九个字。

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对第三军的训令

——关于三军的任务及发展路线*

(一九三一年十月八日)

(一) 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于本月(十月)八日午后一时收到第三军军长贺龙及政委万涛同志的报告, 以及二十七团政委金庆堂同志自前防回来的报告。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

1. 第九师出潜江后, 改变军事计划, 而冒进的脱离苏区, 以致江左红军不能抽调, 而使南岸的苏维埃之政权, 除石首第七区外, 全体摧残, 被屠杀的群众将达到万数。第三军此次南下, 竟将各军、师政治部及教导团留在后防, 而同时第三军到达 X 州时所发出的函件, 以及新二十七

团政委之 XX 完全证明: 第三军的领导同志还没有决心来 x x 巩固苏维埃政权, 和巩固的向前发展的 x x。这根本是表现了第三军的领导脱离

苏区, 不要后方, 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 实质的 x x 表现, 特别表现的不懂得扩大红军的新的基础的应有的准备工作。这是在目前

国民党、帝国主义以全力来进攻苏维埃运动和消灭红军的国内战争的严重形势下, 决不容许的错误。

2. 第三军当前最迫切的第一等任务, 首先应当是与整个湘鄂西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行动联系起来, 以潜江为后防, 以国际路线为武器, 来解决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在这一根据地的基础上巩固的向前发展。只有这样, 才能使苏维埃运动得到应有的胜利。

3. 革命军事委员会应明显的指出(本日午前一时发出这训令已指出) 较适合于这些条件, 而便于巩固向前发展的原则, 应当以潜江为后防。革命军事委员会警告你们, 第三军的指导同志应立即站在湘鄂西整个苏区的军事行动上、苏维埃当前的紧急任务上, 不容许抛弃或忽视

现存的苏区去创造所谓第二苏区, 更不容许你们或许于军事上遭受到打击或部分军事上的失利时仍逃跑到房县。

4. 革命军事委员会还应进一步的指出, 在第三军甫下后所得到的信件(由金庆堂同志带来的), 已表现了第三军在行动上和实际工作中的几个严重的实际错误: 第一是丝毫不顾及到后防根据地的任何情形; 第二是轻敌, 没有估计到荆、沙之敌; 第三是没有站在省革命军事委员会整个军事行动计划上来决定第三军自己的行动; 第四是完全把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后方办事处的作用, 而忽视其领导, 为“红军军事指挥系统”所绝对不容许的; 第五是第三军出发时没有留下必需的部队来巩固和发展房县的苏区。总之, 这些错误都证明了第三军的领导同志还没有懂得国际路线和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

(二) 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

1. 第九师二十六团与二十七团于占领张截港后, 应以一部兵力(不是主力)立即接第二十五团的防区, 巩固潜江政权, 并向荆门、沙洋及市之敌警戒。同时派出一得力的游击队 x 襄河南河与我进口岳口之部队取得战斗上的联系, 以袭击岳口方面之敌。

2. 这时荆、沙之敌, 如确知他们未有反攻之行动时, 则第九师即以主力迅速与七、八两师解决岳口之敌。

3. 目前张截港仍未攻克, 则第七、八两师应速即以主力连同第九师消灭张截港之敌, 而与我襄河南岸之部队切实取得联系。这时荆、沙之敌仍无变

化时，则第三军主力迅速进攻岳口而威逼仙桃。

4. 无论进攻岳口之部队是胜利或失利，而荆、沙之敌有变化时，则第三军之主力应立即向潜江集中。

5. 第三军，特别是第九师，目前速即向荆、抄方面派出侦探。

6. 第二十五团于第九师之一部接替防务时，立即开赴周老咀拼命南渡。

(三) 为了加强第三军目前行动起见，特委托代表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唐赤英同志，与代表湘鄂西省委及苏维埃政府之彭之玉同志，以及第三军军长贺龙同志组织前敌革命军事委员会，彭之玉同志为前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书记。

此令

第三军军长贺龙

政委刀涛

夏曦

主席团 贺龙(唐赤英代)

万涛(彭之玉代)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三军回苏区之经过及其内部问题， 各方之敌情及我方军事布置*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五日)

中央：

现三军七、八、九师已于十月八日全部到洪湖苏区，兹将各种简单情形报告如下：

一、三军回苏区的经过

在九师游击沙洋之时，省委给予九师行动的任务，是打击新三旅徐德佐主力，击破敌人“围剿”的一方，发展天门、潜江游击的战争，尽可能的占领天门并巩固之，以与汉川、酒阳、江陵、监利苏区打成一片，而保障随时回到苏区的可能。但九师攻下沙洋后，因从获得文件中看出远安县长告急公函，说三军之一部已入南漳，有时窥远安之势。即变更省委决议，向荆门发展，打下荆门，后由荆门到荆北之仙居（据说仙居的党与南漳的党有关系），企图与三军取得联系，在仙居约一星期之久，仍不知三军所在，音讯全无，九师即东渡汉水到鄂北苏区，在鄂北打了几仗，消灭了几部反动武装，三军自此得信，即由房县出动来与九师会合（三军由房县出动，原出来收编九师的，中夏说，我们只要能收编一个九师，何愁不能回房县），会合之后，即在刘[猴]集地方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团长以上的同志均出席），讨论并接受中央和中央分局的指示，当场决定三军向洪湖方面发展，十月二日即进攻钟祥之敌，稍获补充（城未攻下），直进京山、天门交界之永[隆]河地方，她与后方发生关系。

二、三军内部各问题

三军因中夏同志机会主义的领导，实行上山躲避，以致三军的实力大遭损失，政治工作薄弱，等于没有。兹分述于下：

1. 实力方面——现是三个师的单位，共七、八、九三师。第七师分十九与二十两团，十九团有兵力五连，二十团有兵力五连，两团各附先锋队一队（即神兵队），师部直辖特务营，内有手枪、机炮、步枪各一连

（机枪三架，迫击炮三架）。第八师分二十二与二十三两团，二十二团有

兵力十连，二十三团有兵力九连，师部直辖特务营，内亦有手枪、机炮、步枪各一连（两架机枪，两架炮）。第九师除二十五团以外（此团约枪一千一百支，在九师出沙洋之时，未随九师出发，在替江巩固后方），二十六团有兵力十三连，二十七团有兵力一连，师部直辖手枪、骑兵、机炮各一连。军部直辖一手枪队。经理部有一监视大队，政治部有政治保卫

队一分队。总计三军全部枪支，除二十五团外，实只五千支枪左右，此外军部教导团约枪千支，现留在房县。

2. 政治工作——三军在过去可以说没有政治工作，军政治部以及七、八两师政治部，都是空洞的一个形式机关，所做的除贴标语、发传单而外，看不见其他工作，各团仅有宣传队没有政治部的组织，各连指导员都没有什么工作，而且还有很多连根本没有指导员，是以党来做内部工作，政治部做对外宣传工作、政治机关没有系统上的工作关系，一切问题完全集中到前委或各师师委解决，现军政治部及七、八两师政治部都留在房县未下来（此点更

可证明三军无回洪湖根据地的决心)。此次连贴标语发传单的工作都办不到了。惟其政治工作的缺乏，所以官兵的悲观失望的情绪很浓厚，在房县时师政治部发生开小差、拖枪跑，此限于七、八两师，九师较七、八两师好，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较健全，政治工作都有一点，官兵的战斗勇气较高，纪律较严，党在红军中的威信相当的提高了些。

3.七、八两师的士兵成份，俘虏约占全数十分之六，官长和政治工作人员均系知识分子。九师的兵士成份，十分之九是湘鄂西苏区的农民、工人、俘虏约占全数十分之一，最近因缺乏卫生的讲求，天气渐冷，棉衣不能及时发给，夜间又无棉被盖，受寒以致有三分之一的病兵，干部又有些病了，病兵离开队伍以后，又无新兵补充，因为群众一部分到外面逃荒去了，在苏区内部的均有家属的羁绊，为了谋一家人生活的关系，均不愿参加故也。

三、现在各方面的敌情

原七、八师未回苏区以前，围绕在湘鄂西苏区的反动武装，计在涪阳、汉川的有三十四师一师人，外加湖北保安团一团人，共七团兵力，分布于沔城仙桃、彭家场、通江口、府场、分水咀、脉旺咀、张家湾等处；在沙市、荆门的约川军五团兵力，分布于沙市郝穴、普济、荆洲、荆门城、石灰桥、后港一带；天门岳口虽有四十一师一团人，新三旅残部二团；监利约川军两团，分布于监城上下车湾、连刀河、木马河、堤头等处；在石华方面有张英部约一旅，共三团不足，分布于调关、焦山河、华城，派出一团兼担花山清乡；藕他、石城、王海一带有刘湘部王宗一旅，实力约两团分布着，外有李觉一团兵力在桃花山一带（现东山政权完全被李觉、张英两部占领，东山政权塌台，损失很大）；应城一团兵力系徐源泉的特务团，云只有练队，京山无驻军。自三军回到苏区后，加重了敌人的视线。据昨天前方来讯，新二旅增援岳口，约三团兵力，外加四十一师一团，并说张淮本人到达岳口，对三军取进攻形势，统计反动武装约二十四团兵力。

四、我们在军事行动上的布置

苏区周围共有二十四团兵力，但敌人有以下的弱点：敌人指挥不统一。敌人兵力动摇。因水灾关系各军间的联络不易亲切。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战略，配合群众的力量，可以予各方敌人以严重打击。兹将我们最近的军事布置报告于下：

- 1.以二十五团秘密而迅速渡江右，予江右敌人以打击，恢复江右政权。
- 2.以汉川独立团（实际只有一营兵力）在汉川襄河北岸积极活动，向天门东境推进，予岳口、天门之敌以威胁，同时使武汉增援襄河之白军有所牵制。
- 3.三军主力到襄河北岸发展，向[伺]机攻下并占领岳口、天门，赤化天门，使潜、天、酒、汉、江各苏区打成一片，凭借这大块苏区向京山、钟祥、应城方向发展，与鄂北、鄂豫皖苏区取得联系（这是我们军事上总的方向）。
- 4.我们为要保证红军的给养，已于十二号动员七、八两师去打沙洋，结果已攻下，不过在给养上稍有相当的解决。
- 5.现岳口已增兵到五团人，工事非常坚强，现去打下岳口是不可能了，准备动时，予以迎头痛击。

五、其他

- 1.中夏问题——中夏已撤职，由军委会公开发表查办，中央分局和

省委组织一调查委员会，详细调查中夏以及其他负责同志的错误经过，分别予中夏以及其他同志的口出结论报告中央解决。

2. 九师行动错误问题——九师打下沙洋后，即违反省委决议，实际是脱离苏区不要后方的冒险轻进的行动。万涛、德昌、培英同志应负责任，现由军委会公开明令撤销万涛同志政治委员之职，调后方工作，德昌、培英两同志予以警告。

3. 省委为要实际转变三军中的政治路线，加强三军政治的领导，要求湘鄂西中央分局派夏同志暂时去担任政治委员的工作。

4. 省委为要使湘鄂西苏区巩固的向外发展，使三军 的力量，决定将二十五团编为三军独立团第二团，保持经常在江右的战斗力量，使江右苏区巩固的向外发展，补充汉川 支 一部分武装，充实其武装实力，使之从汉川苏区向应城、天门发展。此外还须从三军内部提一部分武装去扩充警 营成为一团的力量，经常在江陵、监利、沔阳、潜江活动，以巩固这几县的苏区。三军实际的编为一师人，三军军部直辖三团，另外不成立师。这是省委的意见，还未拿到前方决定，是否有当，请指

示。

5. 广泛的号召群众和共产党党员、青年团团员来参加红军，逐渐转变三军的社会成分，多派遣政治上较坚定、成分较发的 政治干部到

三军中去工作，其详另有军委报告。

6. 请中央多派师团政治工作人员来，因为三军政治工作太薄弱，同时省委无法供给三军政治干部，并请把红军编制法寄来。

7. 这次运来的无线电机在武汉已被 抄去未 ，同时此间无线电负责同志早已因病牺牲（前已通知），请中央另调此种技师来，并要他把

发音与收音机上各种零件重买一批设法运来。

湘鄂西省委

十月十五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对第三军的训令

——关于三军的任务和目前军事行动的策略路线*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六日)

第三军 军长贺龙

第三军政 委夏曦：

(一) 中华苏维××× ××紧急任务× 所××政治使命，是要于现在的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用自己的主力打破敌人较弱的一方，或攻破一部分的包围和封锁，以扩大新的苏区和增大红军的数量，这样才能保障湘鄂西苏区不再×入第二军团时和第九师主力离开苏区的覆辙，×遭受到严重的打击。

(二) 在× 第二军团的当前紧急任务，是集中主力××突击× 消灭：岳口与× 汝方面之敌； 苏区内部之江陵× 监利方面和沔阳府场、× × × 方面之敌部； 南岸之石首与华容（此区域约敌四团）等。这些都是我第三军主力之活××和主要的作战区域及其应有的攻击目标，这是以×××革命根据地后方，执行巩固向前发展的国际路线。如果岳口方面已增兵的时候，岳口、沔阳方面之敌，我们没有击破的这两方面的任何一方面的的时候，还没有组织群众的武装力量来包围和封锁这两方面敌人的时候，敌人的力量不在各种条件之下流通（？）的时候，这×我第三军如从天门、应城发展是不适宜的，是有被敌人打断和×××××主力以致使我红军离开根据地的可能。

(三) 我第三军为了要执行这一任务，必须把第三军变成活的力量使之随时能运动自如。要达到此点，立即坚决的对于按照中央军委起草的红军编制草案改编我们自己的部队，使我第三军坚实起来，更灵活起来，成为红军中的铁军。加强苏区内的地方武装力量，从三军中抽出一部分枪枝来钳制苏区周围的敌人，并向非苏区推进。只有这样，才能使我第三军灵活起来成为最坚实的突击部队，在任何一主要的作战区域去击破敌人的包围和封锁，亦只有这样，才能××湘鄂西在军事上得更大的胜利。

此令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六日注释

原文缺六个字。

原文如此。

附各方情况说明：

1. 石、华之敌共约四团，四营在海×、河口等处一营麻×，一营藕池、杨林寺……
2. 监利县为川匪……
3. 荆沙约团余部×潜××驻川匪一营……
4. 沔阳方面无大的××，仙桃驻两团，沔城驻团余，三×场现增至六连，经常向赤区扰乱。
5. 岳口住四十一师一团、新二旅全部，现有进攻××河、张家港形势，天门×新二旅××匪，枪约千余。

中夏给中央的信

——承认对三军领导的错误*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六日)

中央：

我已完全遵照中央命令，离开三军，回到洪湖。

自我接到中央命令以后，我在三军除得万涛同志同意与贺龙同志谈过一次话以外，未与任何同志谈话，总之，我没有丝毫违抗中央的言论与行为。

关于我在三军领导的错误，去年？失败上山等已大部分了解，此次口到洪湖，谈到中央文件，更加深切的了解。这一切候中央分局审查以后，再来中央听最后的审查。

我现在做一年来的报告，做成即交中央，大概在半个月以后。

此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中夏

十月十六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原文如此。

1. 训令一般的正确，但对于万涛来讯所说南下后布置的错误，不是说三军仍是立三路线的错误，只是个别的立三路线的错误。

2. 军部受军委会指挥。

3. 军委会组织五个人的主席团，名单如下：贺龙、夏曦、杨光华（省委书记）、彭之玉（省政府主席）、唐赤英（军委参谋长），主席团不另设总主席。

（六）中央分局问题

因为现在的必要，决定夏曦去三军执行政委，宋盘铭兼指导党和少共工作，分局一个月开会一次。因此请中央须立刻解决三军政治委员问题，并专派一人来加强中央分局以帮助省委工作，锡根请促其快回。将来夏曦到三军工作，锡根可指导党工作。同时须派一理论上有基础的来办党报，我们不要派几人，只要求派一个理论上有基础的同志来。

（七）请派几个工人同志能当团政治委员的来，并赈炮兵人才、工兵人才、无线电人才来。

无线电生喻同志已病死，此间无线电没人招呼，三军须装设军用无线电。

（八）中夏问题

俟调查一切做成结论后交中央。

附告：三军回来时，夏曦适抱病不能起床，昨天才开始工作。

中央分局曦

十月十六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鄂北情形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七日)

中央：

按万涛同志的谈话中得到鄂北情形，特报告如下：

(一) 组织情形

鄂北原有鄂北特委与豫西北特委，去年十二月才恢复起来，组织鄂豫边特委，党的领导力量非常薄弱。他们共组织有三个中心县委，南阳一个，老河口一个，襄阳一个。共发展有二十几县组织，大部分都是白色。

鄂北苏区成一下字形式，枣阳有三个区苏维埃，襄阳有二个区苏维埃，宜城有一个区苏维埃，这三县都有县苏维埃，鄂北仍是革命委员会的组织。

鄂豫边特委对苏区的指导非常不够，只派有一个巡视员在苏区指挥，特委机关仍没在白区，工作不但薄弱而且没有，这里因反动[派]没有注意，同时又是三军在房县一带活动，所以苏区至今尚能保存。

苏区党的组织，刚才注意整理，过去鄂北党都被豪绅把持着，现在不过是由豪绅路线转为富农路线（当然工人贫农成分简直没有，甚至中农都不多），我九师去后，即将当地党的组织重新组织了一鄂北分特，指导党的工作，现在虽已组织了，但鄂豫边特委尚不知道，委员成分，除找着一个中农外，其余都是豪绅富农。

(二) 土地问题

从四中全会后，中央文件已由鄂豫皖转去了一点，但不十分完全。平分土地工作虽有一点，大部都是错误的，并且非常滑稽，仍是佃租式的没收，真正平分了一次的只有襄阳二区比较好点，现在他们才开始准备重新平分一次。

(三) 军事情形

鄂北苏区现有第九军二十六师，师下分三纵队，纵队下分三大队，大队下分三中队，中队下分三分队，外有一个手枪连，共有五连实力。各县有一游击队。军队中的成份和质量非常不好，政治工作更谈不上，九师去后，即调了许多下层干部去补充，并又拨了百多支枪交他们了，将第九军改成了一鄂北独立团。

(四) 苏维埃工作

区乡苏维埃的主要工作是做骚动工作和找经济对象，对于平分土地的工作，就是拿苏维埃政府的名义打一次锣就算平分了，对于群众工作更谈不上，加工会、青年团的组织简直没有，贫农团的组织虽部分的有，多半是富农加入的，中农都很少。

(五) 九师去后，万涛同志只将湘鄂西苏区的一切情形和工作方式指示他们，他们已了解了一般，以后鄂北苏区工作情形大概与湘鄂西情形相同。

(六) 现在我们准备派人去与他们取联络，建立经常的交通关系，并在可能范围内调一部分干部去帮助工作。区内最好中央在最近要派一得力干部去加强党的指导，并且是否可直接划归我们指挥，候复！

湘鄂西省委

十月十七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湘鄂西万涛关于九师行动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

省委转中央：

关于九师行动问题，夏曦同志两次提议，要我向中央报告。同时，我也感觉为要使中央更明了这一事实起见，也有向中央报告的必要。

八月三日军委会议，规定九师行动是：进攻沙洋，打击徐德佐的主力，折入天门，造成天门的赤区。接着又在周老嘴开军委会议，决定以九师之二十五团留守赤区，司令部率二十六团及教导营直出沙洋（如万一打不下沙洋，可绕出沙洋之北），折入钟祥，经京山以至天门之皂市，与汉川独立团取联系，造成天门东北一带的赤区（因为当时估计潜江及回南一带均被水淹），同时又决定如能与三军取联系时，须与三军取联系，并且对于与三军取联系有一实际的计划（如决定三军的工作人员及内部问题等）。所以九师行动的立场，主要的是造成天门东北一带的苏区，其次是要与三军取联系，同时省委决定要我随九师，主要是为三军问题（讨论过两次）。

九师出发，以二十五团至监酒边掩护，回熊口至调矶途中，堤溃三口，路虽仅十里，三天三晚才渡过去。我军沿襄河西岸进至黄家场，潜城敌人被胁退走，二十五团乘之占领潜城（当时前方对这个传闻的消息将信将疑，因潜城是出于意外占领）。八月十六日占领沙洋，将徐德佐驻沙洋全部解决。在敌人文件中，得着远安县长告急电报说三军已到南漳，有进窥远安的形势。又据荆门县委和当地群众报告，说荆门现在进返红军。当时我们的判断，三军已走到了南漳之东南区中，我们如进占荆门，便可与之取得联系。同时鉴于上次三军到了荆门，又复跑到房县，如不去与之联系，又怕有这个危险，并且沙洋距荆门仅一百三十里，预计不过五天，即马上渡襄河，也要至石牌一带才能渡（因沙洋对河水深了），此行是执行军委决定的一部分，对我们到天门任务，也无大的妨碍。到荆门后，据区委报告，北乡之仙居支部与南漳县委有关系，找着南漳县委，当然可与三军取得联系。在仙居住了一周（南漳县委约定一周可得三军的回信）尚未接得三军正式回信，遂决定渡河。因病兵太多，又在襄枣宜苏区边界（距渡河点三十里）休息了十日之久，帮助苏区执行转变。当时三军已得到我们的信，来到仙居刘猴集一带，并派一营人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当即于九月二十八赶到刘猴集与三军各负责同志会面，开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的决议，改变了三军政治路线，决定了三军的行动。三十日全部渡襄河。十月一日集合全军讲话，全军政治情绪大为增高。二日攻钟祥之敌，稍获胜利。三日抵永隆河，决定以九师入潜江，打通与后方的联系，七、八两师攻岳口之敌，把天、潜苏区打成一片，执行巩固发展。这是九师行动经过的实际情况。

在沙洋时去与三军取联系，我承认是有错误的，把到天门的任务延缓，急于去与三军取联系，虽然这中间有许多原因，但我决不借这些原因来掩盖我一点错误都没有。十月十一日我在省委会议席上的结论是：“光执行了联系三军的任务，延缓了到天门任务。”赤英以及省委的同志都同意我的结论。夏曦同志举问说：“攻场是主要任务，如在途中遇着敌人，我们须要驱逐，但这是次要的任务。”我的回答是：“因为途中遇着了敌人，我们驱逐敌人行迥远了，致延缓了到天门任务的时间。”这个解答也是大家同意的。

现在我有几个个别问题，意见是不同的：

1. 违抗军委命令，脱离苏区——出沙洋，折入京山，造成天门的赤区，这固然是军委的决定。要与三军取联系同样是军委的决定。假使九师没有与三军取联系的任务，那末，由沙洋到荆门，正如所说的“违抗军委命令，脱离苏区”。当时有便利的条件，有取联系的可能，如不去取联系，是不是又是错误的呢？又违抗了命令呢？事实上，九师不去取联系，三军绝对不会下来的，而且三军有解体的危险。因此，我不同意武断的说“违抗军委命令，脱离苏区”。我还是坚持我在省委会议上的意见。

2. 轻敌与形成第二中央苏区——我由沙洋给省委的报告，“纵然宜沙敌人出击也不要紧”，因为我们的归路是京山、天门，川军隔襄河不能截断我们的归路，所以我以为不是轻敌。我又提议：“湘鄂西苏区，应巩固的向汉水北岸发展，把天门、京山、应城占领起来，将来更进一步的，军事上与第四军、第九军取得联系，湘鄂西与鄂豫皖及鄂北苏区打成一片，这一伟大的力量可以形成第二中央苏区，这是执行湘鄂赣苏区打成一片的实际步骤。”我并不是主张离开巩固发展的原则，抛弃原有苏区，另行创造第二中央苏区。“政治上轻敌，第二中央苏区，所以在实际行动上就不要后方。”这样解释，我便是一贯的有系统的立三主义者，我是绝对不承认的。

3. 九师反革命了——夏曦同志对二十五团负责同志说：“不要提九师了，九师反革命了！”这样说法就太严重了，中夏同志一年来领导三军上山逃跑，使苏区和红军同样遭受大的挫折，我们也只能说：“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的开战。”也不能说三军已经反革命了。反革命的罪名，我是绝对不承认的。

4. 九师行动是决议——当时没有决定占领潜江，沿着苏区巩固的向外发展，决定先出沙洋，折入京山、天门，与汉川独立团取联系，造成天门东北一带的苏区。当时在军委会上，德昌同志曾这样问过：“这是不是脱离了苏区呢？”之玉同志又说：“我们不知要几个月才会得着呢？”当时并没有具体的解答。这个决定事实上是冒险轻进，是脱离苏区的，夏曦同志起初还说过：“如万一失利，可向鄂豫皖”，“无论如何要保持伸缩的余地。”是我提出来的，是夏曦同志赞同的。当然，这个决定，我也要负责任。

5. 军委对三军第二号训令——训令上说：“三军南下后，由永隆河所发的信件及二十七团政委的报告，完全表示三军的领导者没有具[决]心来执行巩固苏区的任务，仍然是不要群众，不要后方，反国际路线，立三主义的具体表现。”我不了解这些该从何说起！训令上又说：“军委更应进一步的指出，三军在南下后，由永隆河的来信，在实际行动中，又表现出几个严重的实际错误：第一，是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第二，是轻敌，没有估计到荆沙的敌人；第三，没有站在军委整个计划上来决定三军的行动；第四，把军委当作后方办事处而忽视其领导作用；第五，没有留下必需的部队来巩固和发展房县的苏区。”这几点，我是丝毫不了解！三军全部在潜江附近，完全与后方取得联系，进攻岳口，目的就是要把天、潜苏区打成一片，并可以解决苏区内给养和日用品的困难，怎样说是不是要苏区，不要群众呢？岳口敌人 一团一营，川军在荆门相距很远，而且隔襄河，同时，军委第一次训令要我们“攻岳口，威胁仙桃”。怎样说得是轻敌呢？为什么又说违反了军委整个计划呢？房县组织一个独立团，鄂北第九军改编为一个独立团，都是九师未出发之前决定的，怎么又说说是擅自处理，忽视军委的领导作用呢？如若把向军委请求补充新战士和加派政治工作人员解释成把军委当着后方办事处，那就更成问题了！当然，写报告时，我因行军多[忽]忙，未用什么“呈

为”什么“理合”等官僚格式，不恭（？）之处，我是承认的。房县独立团配合游击队，枪支在一千以上，怎样说没有留下必需的部队呢？，但中央分局曾决定七、八两师的主力一定要下来，未必现在下来错了吗？这些，不仅我不了解，前方同志都不了解。

6. 前敌军委的组织——军委决定以赤英、之玉、云卿三人组织前敌军委，我认为是不妥的。中央分局和省委说完全不信任我的领导，就应该一点不含糊的调动我的工作，并且九师出发时决定要我做三军政委工作，我就几次请求不去，为什么既组织前敌军委代替政委的职权，而又不调我的工作？未后赤英又说：“准备要你参加。”事实上前敌军委不要政委参加，破坏了红军中的政委制度，同时，之玉、赤英的不能经常到前方工作，究竟谁个负责呢？明明这是做不通的。

未了，我还有几点意见：

第一，我对巩固苏区是积极的，特别是在敌人围攻中，我并没有消极的情绪，苏区的同志都可以知道。在第二次“围剿”中，有人提出退却路线，红军出外面发展新的苏区，吸引敌人到苏区外面作战，我曾坚决的反对。

第二，我在湘鄂西工作很久，对各方情形比较熟悉，回到省委工作是适宜的，但如因九师行动的关系而施行“撤职”，我认为是不对的。

第三，夏曦同志到三军中工作，事实上中央分局等于取消了，对全部工作的领导是有妨碍的，我认为不妥。

第四，中央顶好迅速解决三军政委的问题，派人来三军做政委工作，或加派人来担任中央分局的工作。

万涛

十月十八日于潜江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年代为编者判定。

中共宜昌道委对中央的第一次报告

——目前政治形势、各县工作概况、十一月份工作计划*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中央：

从前我们与你处只发生了交通关系，现在我们进一步的要求与你们发生组织上的关系。兹将我处政治情形和工作状况报告于下，望给指示。

一、目前宜昌区政治情形：

1. 鄂西防务完全是川军刘湘的部队，刘湘现在还是在万县，巩固其原有地盘。他在宜昌成立有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部，职责由二十一军参谋长袁成武代理，下属三个“剿匪”司令部。第一路“剿匪”司令部张邦本（九旅旅长）驻宜昌，第二路“剿匪”司令郭勋驻沙市，现又组织第三路“剿匪”。司令部驻监利，由二十一军佟毅独立团担任“剿匪”司令。他们防务的分配：宜昌二团，当阳二营，远安一营，长阳二营，松滋、宜都二营（为张邦本的部队），沙市二团，郝穴、普济观一团，荆州一团（为郭勋部队），监利二团（为佟毅部队原有独立团改编，只有两团人），最近刘湘更调有二团人来宜昌，增加鄂西的防务，更将施南、鹤峰的游击司令罗启疆（约团人左右）调到公安，以更加巩固其在鄂西的地盘。

2. 刘湘对鄂西的地盘非常重视，所以现在鄂西的川军，都极力的扩充力量和地盘，宜昌、沙市以及各县，他们都在招兵买马。现在川军同何成浚的意见非常深刻，尤其是刘湘对何成浚忽视鄂西灾荒的不满，表现得至为露骨。最近蒋介石在江西失败，想重新把徐源泉调回鄂西，但川军刘湘不理，不肯退出防地，只得将徐源泉临时分配为湘鄂川边督办。

3. 鄂西区的工农兵士群众，受着苏区和红军的影响，对革命非常兴奋，尤其是沙市、公安、宜都等处的群众，在极端白色恐怖下面，还有决心与勇气去袭击民团。各县的工农群众，都有志愿到红军中去的心理。至于土地革命的影响，使白军士兵更其动摇，在半月前，宜昌川军曾有一排人哗变，拖枪跑了。

4. 鄂西的经济状况，因水灾的扩大，土匪的劫抢，豪绅地主租课、高利贷的剥削，党捐、会费捐、田亩捐以及意想不到的捐税，日益加重工农贫民群众。因此在鄂西经济已经走到破产时期，尤其是农村经济破产，表现得更为明显。广大的破产的农民群众，都源源的跑到城市中拉车子、抬码头。

5. 鄂西水灾区域非常扩大，宜昌、沙市、公安、当阳、荆门都有大部分农民群众遭到水灾的横暴，统计被灾的群众，约在五万以上，尤其沙市街上，遍地都是灾民。一般灾民公开的说，是从苏区逃荒来的。最初沙市反动统治驱逐灾民，后以灾民的骗赖斗争（硬不到别处去），沙市反动警备司令部每日发钱一串，发给良民证回家。而群众却在沙市自找工做，而沙市的纺纱厂、打包厂都借着这一机会来更加深的榨取灾民血汗。当阳灾民斗争爆发直接抢米，反动统治虽用马上筹备的欺骗宣传，仍不能和缓灾民的斗争。现在这一斗争，在各县正在蓬勃的涨着。

6. 红军第三军贺龙部，已于半月前在南漳、荆门交界之盐池庙、刘猴集与三军九师段德昌部及鄂北九军（不详）会师，击破了张邦本、郭勋的部队两团。会师后，九军仍回鄂北，九师由天门、钟祥到沔阳，三军则直接攻下沙洋，由潜江回洪湖去了。这一胜利，震动宜昌区劳苦工农群众耳目，却更

给予了川军以极大的恐怖。

二、各县工作：

我们的工作范围，有宜昌、沙市、公安、宜都、松滋枝江、荆门、当阳、远安、长阳、秭归、兴山、巴东共有十三县。现宜昌成立县委，沙市成立市委，远安成立临时县委。长阳原有一部分苏区，现已与我们断绝关系。归兴巴合成一县委，从去年到现在一直没有打能交通路线，无从了解其工作。现只将与我们将发生密切关系的各县工作分述于下：

（一）宜昌：

1. 宜昌现以关大顺（道委常委，工人）、李祖铭（知）、谢兴山（车夫）、杨兴华（农）、毛雨亭（锯匠工人）五人组织县委会。关同志担任书记，现时还能集中指导。

2. 在城市中有车夫支部一个（七人），土工支部一个（四人），锯工支部一个（五人），妇女支部一个（五人）。但党对群众领导的力量非常薄弱，党的策略不能运用到工作上，现只有锯工赤色支部一个，群众七人，曾经发动过两次反对出会费的斗争，结果，得到了相当的胜利。现在又准备发动，“工资要发现”的斗争，锯工只有百人，马上可以影响八九十人，已决定“比期要工钱”的斗争，马上去发动这一次斗争。

3. 农村中河西有支部二个，同志二十五人，杨X路有支部一个，同志五人，西柳溪支部一个，同志八人。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发动灾民斗争，提出“联合外来的灾民到大户家里去吃饭”的口号，在斗争中发展农民协会、雇农工会的组织。

（二）沙市：

1. 沙市工作从团省委派来的方魁被捕后，影响了沙市工作完全坍台。现已决定成立临时市委会，去积极恢复组织。据报告已恢复了一个车夫支部、榨坊工人支部，其余正在设法活动中。

2. 由苏区逃到沙市的灾民非常多，他们的情绪同样的高涨，现在已决[定]派同志打入，去领导他们的斗争。

3. 榨坊工人有一千多人，现在市委报告，榨坊工人要增加工资，如果资方不承认，并马上有爆发罢工的形势。现在我们派省委巡视员张昆弟同志前去专门指导。

4. 纺纱厂、打包厂因方魁叛变坍台后，现在还未恢复。

（三）公安：

1. 公安没有集中过讨论工作，彼此都是闹个人意气，分配某一同志在某地工作，就是某个同志自己的工作，好象有地域界限的形式。县委书记半在公安，半在沙市，完全没有执行他的任务。县委主要工作就是做经济运动，所以枪支都是在县委负责人手里。专门以土匪名义抢钱，并动员全党同志专门找经济对象，结果经济还是困难。并只个人单独做经济运动，得的钱物均由个人支配。这样，一般下级同志非常不满，并有要到道委报告的。现已彻底改造指导机关，提拔积极工农份子参加工作，并派唐映峰同志去帮助一同工作。

2. 在公安，群众斗争情绪非常高涨，因直接受到苏区红军革命影响，曾在极白色的恐怖下，还要求打民团，夜里去冲编练队的哨线。但公安党在失败的情绪反映下，非常怕斗争，反说群众要大干不愿小干。现在几次讨论，他们已了解了国际路线，注意要斗争问题，对饥民斗争已讨论出很多方式，

开始进行。

3. 群众斗争，主要的是饥民斗争，在鄂西已发动了二百余人“吃大户”。但没有去组织他们，没有正确路线去领导他们，未能发展更广大的饥民群众。现在决定组织饥民委员会，专门领导斗争。提出到“大户家里去吃饭”到“大户家里去住”等及更实际的口号来发动群众的斗争。被水淹的地方，一般群众要求反对出裸钱，这一斗争情绪非常高涨，因为秋收完全没有，老板的课租毫无出处。只要领导正确，一定可以发动起来。

4. 仍成立游击队，只十五人，杨某为队长，刘某同志为政委，三五条枪的敌人清乡，一定袭击，同时加紧发动群众日常斗争，配合起来发动游击战争。

5. 公安兵运工作非常重要，编练队、团防较其他地方更厉害。一定要设法派同志打入，破坏反动组织，发动团土斗争，削弱反动力量。还有红军遗留的一百余战士，决定他们加以训练，分途打入白军中、团防中去。

（四）松枝：

1. 松枝党已经发动饥民斗争，他们决定以一百人为限制，怕人多了又要惹起反动派的注意，充分表现失败情绪的反映，怕斗争，走到了右倾道路。决定纠正这一错误观念，马上汇合广大的饥民斗争，来组织饥民委员会、分谷委员会、农民协会等。按照群众的情绪准备群众的武装，配合起来发动游击战争。

2. 不注意党的组织发展，仍然只有四十几个同志。他们机械的运用由农协中来介绍党员。决定在饥民斗争及各种斗争中改造党的组织，于一月内发展党员两倍。

3. 欧晋扬方面（原系土匪，曾受贺龙编为游击队，最近听说有受民团编遣消息），据各他说，他还没有受民团的编制，因为张海涛是从六军（即现三军）七师与徐光达闹个人意气跑出来的，因怕党的处分就要欧晋扬与我们不接头。现派陈卓人同志前去，代表道委的意见与张海涛解释，了解其实际情形后，再给以详细指示。

（五）宜都：

1. 宜都党的组织不但没有发展，反而缩减了好多。党在群众中一点影响也没有，只知有武装的红军游击队的号召。县委大部工作都去办游击队，没有做党的工作。结果党没有组织，同时可以自由跑动，群众中没有党的支部。因此他们组织群众是不要群众斗争的，是准备游击队住的。完全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

2. 最近敌人压迫非常厉害，宜昌、宜都等处，民团联合包围清乡，现将长枪暂时秘密起来，以连枪编成游击队配合群众斗争，袭击少数敌人，消灭反水领袖。

3. 从来没有发动过群众斗争，最近豪绅多数用骡马驮[驮]米出境，现在发动擅驮[驮]子划口袋的斗争，但还是以游击队号召，很少群众参加。现决定把这一斗争从广泛群众中鼓动起来，扩大这一斗争的范围。分粮斗争也曾发动过，一般群众非常害怕，要有枪支保护才敢做，多半是出于勉强，脱离不了命令主义。在一般群众的心理只要减租，现在支部中讨论结果，减租口号确可以动员广大群众，已决定由这一口号来发动群众的斗争。

（六）当阳：

1. 当阳党从改造后有新的发展，已成立三个区委，统计在二百五十人以

上。并在秋收斗争中，党内富农份子，已表现出不赞成斗争，公开反对斗争的现象，如反对发生谷息的问题，支部中讨论时，富农提出反对说“这种斗争大抵对于人大多”，但结果群众得到五六成还息的胜利，党内富农亦因之消沉，自动退出党。现已决定，当阳开始注意从各种群众斗争中来肃清富农，在群众中作反富农的宣传鼓动。

2. 过去当阳党没有发动过任何斗争，也没有群众组织，所以党在群众中毫无作用。这次在秋收斗争中发动了各种斗争，在斗争中组织群众，一般群众因受红军两次的影响，斗争情绪非常热烈，凡有党支部的地方，已成立了农协的组织，现有区农协三个，马上预备成立县农协，并成立了一个雇农工会，有三十六人。

3. 群众斗争主要的是水灾区域的饥荒斗争。在县委下组织饥民斗争委员会，专门计划领导和发动饥民斗争的办法。先发动饥民起来反对谷米出境。因沙市商家到河溶贩卖大批米谷，由河溶运出口，饥民就波弄河的水来浪沉民船，但没有分谷的勇气。现又走到抢米直接斗争形势，并决定扩大范围，号召水灾区域的饥民与非灾区的广大群众都起来参加这一斗争，在斗争中准备群众的武装，防止敌人的反攻。

4. 生谷息，是豪绅地主在五六月间利用贫若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借给六、八串钱，秋收后还谷一石（谷价已涨至三十串一石），群众非常痛恨，所以这次反生谷息斗争，群众得到了五、六成还谷息的胜利。

5. 地主对今年收获要十足的还租，现已由减租走到了抗租的形势。6. 当阳工作在新的发展下，下级干部最感困难，但组织范围已扩大到荆门西南区，在工作上和地域上都较便利。

（七）荆门：

荆门工作从三军九师游击后，亦恢复组织，现已正式成立县委，有同志二百余人。群众因为受到红军和苏区的影响，情绪非常高涨，他们已正式成立有游击队，枪五、六十支，灾民群众参加者有七、八人。我们同他们的交通关系刚才建立，还没有得着他们的详细报告。

（八）远安：

1. 远安党的组织已发展了五十几个同志，有三百多群众，成立有纸厂工会，骡夫工会（是老板赶骡子）。最近发动了抗租斗争，因今年地主一定要十足的收租，引动了广大群众的反抗，地主接二连三的威逼，群众斗争已降到了“减租”的斗争，党却坚持着“抗租”的口号，对群众宣布，我们到宜昌去调枪，你们过了八月三十完租。远安同志急于星火地跑到宜昌来。现我们已决定以“减租”为中心鼓动口号，来发动秋收斗争，并马上派余之生（道委委员）去领导。

2. 对纸厂工会工作，决定他们加紧对赤色会员的训练，提“大家要吃三顿饭”、“二十九要发现”等口号，发动纸厂工人斗争，在斗争中广[扩]大工人组织。

3. 一般同志受红军的影响（红军游击过两次）非常兴奋，民团、大刀会等组织中都有党的同志。不过组织范围太狭，只三、四区有组织，没有决定中心区域工作，以致洋坪、县城内均没有党的组织。

（九）长阳：

长阳原有苏区，并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因交通上的关系，曾受湘鄂边特委指挥。他们从五月间把赤色队调到鹤峰，反革命即冲破了苏区。现在反动

派正在实行改良主义的欺骗，发良民证、发路费，群众多半受其欺骗。但从九月到现在，一直与我们断绝了交通关系，现我们已由松滋坚决的派人去打通路线，不久即有报告转来。

三、十一月份工作计划：

1. 道常委会虽已建立起来，而能够经常担负工作的，还只有张宗礼、刘云生二同志。开会时关大顺、郑文端二同志对于政治问题以及各县工作方面不能发表意见，仅在事务方面能说几句话，这样常委会仍然不健全。在这月道委要加紧本身教育工作，任何问题给他们以相当的了解。中央及省委各种文件，由张、刘两同志在常[委]会中详细报告，提出具体问题讨论，并联系到实际工作，加紧他们实际工作的学习。现关同志担任宜昌县委书记，郑同志到农村中去巡视。具体的规定他们的工作，一礼拜回来讨论一次，一定要在这月内收到效果。

2. 训练班这月至少要开办两次，每次人数三人至七人不等，时间大概三日，由道委的巡视员及宜昌工作人员[一]起，训练材料及训练工作计划由组部与宣部负责准备，交常委会通过。并规定各县县委也要按照这一计划开办训练班，材料由道委负责供给。

3. 道委对下级的指示信及工作决议，多半是隔靴搔痒官样文章，没有注意下级的接受程度和实际工作状况。一般的说来，了解原则还是好的，至于怎样运用到工作上去，很少同志注意和了解，这个原因完全是道委的巡视工作未建立。现决定在十一月中，除向省委要求调一人来充当巡视员外，并在各县提拔三个工农干部为巡视员，经常巡视到各县支部中去，从实际工作中来帮助下级工作。

4. 对兵运工作，目前仍无头绪，虽发下一个士兵工作通告，但下级仍未建立。在十一月中要坚决的督促各县成立士兵运动委员会，讨论出每月工作计划，每月训练出十个至二十个党员群众，按期的利用川军、民团募兵的机会，分途打入进去。尤其是公安一百多红军士兵，公安县委应加以详细训练，分途打入川军同民团中去。

5. 宜昌车夫支部虽有七同志，在群众[中]活动能力异常不够，决定在群众中提出“不出党捐五十文”到现在仍未发动起来。宜昌县委要加强这一支部的教育工作，主要的要在车夫中建立赤色工会的组织。

中心工作锯工支部虽只有五个同志，但领导有十几个群众的赤色锯工支部，最近又准备发动到比期发工钱的斗争，现已有十几个木匠团结在这一影响之下。道委要马上召集宜昌县委开会讨论，定出建立中心支部的工作计划和领导，比期要工钱的斗争办法，使这一斗争继续扩大，影响宜昌全体工人，扩大和建立赤色工会的组织，吸收积极工人到党内来。

6. 沙市工作原来是有基础的，因为指导机关政治领导的薄弱，不能很快的推进工作，党的组织散漫，在群众中没有领导作用。据报告，沙市最近榨坊工人马上要增加工资的斗争可影响一千多人，决定由张昆弟同志前去指导外，并派胡平同志（道委委员）担任市委秘书，加强市委的政治领导，并要在十一[月]中提拔积极工人同志，充实指导机关。

7. 当阳党已领导孙家场、黄家场、草铺一带广大饥民群众的斗争，分粮、抢米船的斗争以及灾民少还租不还高利贷的斗争，结果均得到相当的胜利。在这一斗争中发展了党员二百余人，群众五百余人，雇农工会一个，三十六人，可以说有相当的成绩。但是当阳党在斗争中只防止敌人以武力的压迫，

没有注意到敌人的欺骗政策。当阳反动政府派人勘灾，承认五千元的赈款，即把群众斗争缓和下去，但是现在赈款仍没发到，就是发来也不过杯水车薪，尤其是秋耕没有种子，灾民没有棉衣，抓着这些迫切的要求，可以马上发动起来，道委并决定马上派人去领导。

8. 宜都党仍然放松了党的组织工作，到现在只发展了党员一倍，支部工作还是未健全，对于群众运动更其幼稚，已经公开了的群众，还不把他们组织在农民协会之内，尤其是现在豪绅地主组织大刀会，以残酷的白色恐怖来压迫革命，他们对于这一问题，只知用游击队来解决，不知扩大党的革命影响到大刀会中去，来夺取其群众，决定他们马上在群众中揭破豪绅地主、宫农强压贫若农民组织大刀会，是为他的利益，不加入大刀会要出钱，这完全是豪绅地主、富农的压迫手段等黑幕。同时檀驼[驮]子的斗争，的确可以动员广大群众，现在应有计划的来布置发动这一斗争，由这一斗争一直发动到年关斗争。

9. 公安工作因白色恐怖的严厉，在工作上感受很多的困难。党的指导机关完全是停在旧的干部上，有派别观念和喜闹无原则的纠纷，所以在工作上更不容易推动。现我们虽派同志去帮助工作，但还不够，一定要另派人到公安工作，在一月内召集代表大会，改组县委。

四、其他：

1. 蔡士材同志前来，我们决定与你们发生组织上的关系，请予接洽谈话并给以指示。

2. 交通问题，现我们已决定另行增加一人，下月即可实现，经济由我们完全负责，我们同意。现在我们对两个交通的预算来回路费六十五元（生活费十五元在外），以后他们的经济不要你们负责。

3. 在宜昌建立交通站的问题，现时我们已在尽量物色人才，并到省委要求建设费去了，下月即可实现。

4. 现在有一个谢大镛，是宜昌人，在上海读书，他说是团的同志，在一九三一年上海闸北区发生组织关系的。曾经加入过右派，写过申明书，因以后中央没有派人去找他，遂脱离了组织。现在他坚决的要我们恢复他的工作，要求到红军中去。请中央转团中央调查，是否有这个人，有这回事，并马上答复我们以便决定。

宜昌道委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原文如此。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西省委给中央的信

——关于九师问题，彭玉阶、周先光党籍问题，中央分局负责人及团的工作问题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中央：

从前中央分局和省委关于九师行动问题向中央所作之几次报告，有许多是非事实。现中央分局和省委正在详细讨论与考审事实当中，不久即可做出结论，并向中央作经过的详细报告，要求中央暂不根据以前之报告作出结论。俟中央分局和省委把最后结论和详细报告送给中央后，望中央据此作最后结论。

关于彭玉阶、周先光两人问题，听说他俩在沪东区要求恢复党籍，我们认为他俩是在武汉叛变过了的，并且有很多同志证明他俩叛变的事实，我们不同意恢复他俩的党籍（武昌整个的组织完全系彭玉阶破坏），并向中央提议特别注意他俩的行动（恐他还有大的企图）。

关于中央分局的领导问题，夏曦同志已到三军中工作去了，现只宋盘名同志一个人，对于后方一切党的领导和各方面的工作，事实上很薄弱，望中央即刻解决此问题。

前次要求中央派遣苏维埃财政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人员来湘鄂西工作，请即设法派来。

关于此间团的工作，团中央很久未与团省委发生关系（文件未有一件来），望中央转知团中央注意此间团工作的领导，并请求团中央设法派几个作团工作的人来。

再，前此余×安交通带来之黄龙、吴近二同志均未达此间，详情由余交通而告。他所带来文件已完全收到。

中央分局宋盘名

党省委杨光华

十月二十四日

湘鄂西万涛为九师行动问题致中央信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中 央：

关于九师行动问题，十月十九日在潜江举行省委谈话会（因省委代理书记未到会），完全同意了我书面报告上的意见。最后夏曦同志提出几点意见与我有争执，他认为：第一，联系三军是违反军委命令，抛弃主要任务；第二，八月三日军委的会议是冒险轻进，有立三路线的残余，但没有脱离苏区的危险。二十一日省会[委]会议，审查谈话会议的材料，作出整个的结论，并认为所争执的两点：第一，联系三军是执行了次要的任务，延缓了主要任务的时间；第二，冒险轻进已经包含了脱离苏区的危险。事实上当时的决定是有脱离苏区的危险。

此外，现在我对夏西同志最近对中央的报告中，还有以下的申明：

一、“九师错误，彼等均已承认”问题——我们承认在沙洋时急于去联系三军，放松了主要任务是错误的。但其他非事实的罪名，我们在未了解以前是不承认的。

二、处罚问题——对我们处罚问题，我上次报告中××到，对德昌与培英的处罚，夏西同志到前方××不宣布，不知是什么原故。

三、南下后是否立三路线问题——既认为政治路线是一个大的转变，同时反说仍是反国际路线，是立三路线的具体表现呢？完全是自相矛盾的。

四、不同意组织前敌军委的问题——当时在会议上曾问过之玉、赤英是否可以讨论，然后才有人发言，并申明过，在省委未变更这个决定以前，是绝对执行的，不能笼统的说“前方同志不同意这个办法”，因为前方同志并没有人反对，只是对省委提出建议。

五、对军委提出的六个要求问题——军委要集体领导；训令要慎重；军委要增加有军事学识和经验的人；军委只应规定大的原则方面；加派三军政治军事人才；确定军事系统关系。这是德昌同志个人的提议，并不是前方多数同志的意见。如怀疑这带有军委与军部的权根问题，同时或许还有对人的问题，这个估计完全是错误的。现在我敢担保三军内部绝没有这些问题，过去的坏现象，已经克服下去了。九师行动问题，虽然有些争执，但绝对不能解释成为无原则的纠纷！

总之，过去省委和中央分局关于九师行动问题的报告有许多是非事实的。这点省委会议上大家公开承认的，赤英同志并批评是机关工作的方式。因此，我请求中央根据最近各种材料作出结论。

万涛

十月二十五日于省委会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夏西即夏曦，下同。

宋盘铭关于湘鄂西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一、目前湘鄂西的政治形势及党的任务

在目前中国工农红军几次的冲破敌人的围剿，使反动统治阶级的危机和恐慌加深了，这种危机在湘鄂西同样的表示出来。特别是湘鄂西的红军配合着广大劳苦群众的力量，在敌人三次“围剿”中冲破了敌人围剿一方以后，及现在红军三军主力从上边下来，更引起了敌人对湘鄂西苏区的注意，苏区周围的敌人现在积极的准备向苏区进攻，集中二十至三十团以上的兵力，特别最近潜江县的失守及我们红军受到一部的损失，这更明显的证明了敌人对苏区围剿严重，虽然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我们击破了一方，但是因为在水灾中，党的领导在工作上有了些错误。又：那时江右军的改编削弱了右江的地方武装，另一方是水灾中九师出去没有执行主要任务错误，使红军主力脱离了苏区太久，不能迅速的过江，结果是江右的苏维埃政权受了很大挫折，受了临时的失败，使劳苦的农民群众受到了肉体上的摧残。在目前恢复江右的苏维埃政权是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用一切的力量来动员群众，配合红军的主力来击退敌人的进攻，相机去恢复江右政权，这就是党的主要的中心任务。在这任务之下，特别要坚决的打击党内的一种右倾观念和一部同志们的一种不正确的估计，看到了这些困难就觉得没有办法了的悲观失望的情绪。

虽然现在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我们应当注意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湘鄂西敌人内部是有很多矛盾的，因为围绕着我们周围的军队不是一个系统的，有川军，有北方军队，他们的指挥上有时还不能统一起来。我们估计敌人还是有这许多的弱点，我们还是可以利用的，目前湘鄂西的实际情形完全证明了中央对冲破敌人三次“围剿”紧急任务的正确。

二、最近湘鄂西党的组织状况

a、自从水灾以后，党对各级党部的领导是削弱了，党员数量是减少了，水灾以前有三万多党员，水灾直到现在组织方面的数量没有一个详细的统计，最近大概的数量有一万三、四千人。群众组织也减少了，赤色职工会的会员从前发展到两万多会员，各县的工会建立了沔阳、监利、石首、华容、江陵、汉川等几县，还有潜江、天门等县准备建立（这是我去时的）。现在会员减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水灾，大部分的群众到白区去逃荒去了，再加上江右政权的失守，群众组织受摧残。雇农工会的会员也没有详细统计，贫农团的组织不健全。

在湘鄂西省委领导之下的有一个道委，就是宜昌道委，道委所在地是宜昌。道委之下有县委，主要的是白区，有组织的县份是公安、宜都、荆门、枝江等数县。沙市有党的组织，纱厂内有一个支部，车夫有支部，码头工人有支部，还有街道支部，这些支部的生活是不十分健全的，在斗争中还是不能起领导的作用。宜昌道委的本身是不够健全的，不能顾这些县委。同时，最近有一个团的同志叛变，在街上找我们负责的同志及破坏我们的组织，使得道委负责的同志不便活动，最近工作上更发生了些困难。湘鄂西党省委对道委的领导也不健全，除道委外，在省委领导下的还有几个特委，就是湘鄂边特委（五合丰〔五峰、鹤峰〕等县，是苏区）；鄂豫边特委（以前九军的地方），现在房县苏区也划给他们指导，他们除苏区外，还有白区；有湘北

特委，这里包括岳、临等县，从前有个时候与我们脱离了关系，现在关系又恢复了，但是对他们的领导还是不好，这里是白区，有一个小的游击队，现在省委给了他们一个任务，要他们建立武长路一带的工作。在省委直接领导之下的有八县是有苏区的（沔阳、监利、石首、华容、江陵、潜江、汉川、天门），这八县平均起来每县有一半是我们的，不过县城都不在我们手里，只有潜江县城是我们的，现在失守了。这几县内党的工作最好的还是监利、沔阳、江陵，其他县委都是不健全，从前石、华比较好些，现在已失去了。还有几个白区的县份也是在省委直接领导之下的，为应城、云梦、孝感、京山等县，都有党的组织，不过不好。

一般的说来，湘鄂西省党的组织是不十分健全的，支部生活不好，对同志的政治教育工作做得太差。同志成份方面，百分之七十是贫雇农，富农占百分之七、八，中农占百分之十，其他分子占百分之十二，如天门这些新苏区内富农分子是比较多些。同时，党内还存在有少数阶级异己分子、敌人，如改组派这种分子潜伏在党内，在潜工还发现过党的区委书记和区政府的秘书是改组派，被破获了，还有党区委负责的同志也是改组派的暗探。这样看来，在党的组织内潜伏的反动分子还是有的，这种主要的是党的改造工作做得不好和自我批评没有广泛的自下而上的发展同志的自我批评，对这种坏分子没有很快的揭发出来，因此使他们潜伏在党内。

b、红军中党的工作做得不好。现在六、七千红军中，党、团员还不到三千同志。红军中党的支部不能经常的开会，师委现在是取消了，团委的组织不健全，没有做什么工作，党在红军中的影响不十分大，二十六、二十五两团比较好些，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九团党的工作比较坏。党的同志在部队内不能起领导作用，政治教育工作做得不很好。

c、党省委总的领导方面，因为干部的关系，不能抓着全盘的工作，对群众组织的领导不好，对团的领导一贯是取消观念，从省委一直到各区都是一样。党对职工运动是忽视的，对士兵运动没有注意，对白区工作的领导不好。总的说来，党省委的领导是不集体，各部工作没有建立起来，省委经常只有一两人做工作，省委本身的工作没有计划。但虽有这些缺点，但党的路线是转变了，对土地问题是正确解决了，对白区已有很大的注意，派了很多干部去建立白区工作，如应城、云梦、沙市、宜昌等地。对各种倾向作了很大的斗争，尤其是右倾。

三、土地问题的解决

在老苏区的土地都按着中央所规定的依人口劳动力的原则平均分配了，有以前没有分配好的也重新分配过。不过在新发展的苏区，土地问题解决是太差，没有把新发展的苏区马上分配，使贫雇（农）得到土地革命中的自身利益。往往用一种老的工作方式登门造册的办法，不去发动群众的斗争，结果使得积极参加革命的贫雇农分子有一种不好感觉，红军战士的家属及其本人都分得了上好的土地，并且苏维埃政府还提出优待红军家属条例，实行了青年十四岁以上分得全份土地。在洪湖边上的贫雇农里面也有分配，依鱼为业的就可在他所分得的水面上弄鱼。平分土地时也有广大群众参加，如在水灾时提更进一步的反富农斗争的口号，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在这种口号之下，一般群众都是很积极的参加，表现得最积极的是监、酒、石。华的群众，不过在平分土地中还有许多的缺点和错误是应当指出来的：

党对平分土地的领导还没有加紧，还不能很迅速的去纠正下级在平分

土地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错误。

下级往往发生一些过早的现象，如在水灾时期中，主张没收富农粮食、现金、船只等充公，表现出是一种过早的办法，实际上动摇了中农的利益。

在平分土地中还有代表富农利益分子的表现，如对分土地怠工、认私人感情、怕斗争等等现象。

四、水灾时期党的工作及灾后的解决

今年的水灾对湘鄂西的苏区是非常之严重，但是党在水灾中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把一部分的灾民设法使他们到苏区外去逃荒去了，解决了一部分没到外去逃荒去的群众生活，党领导了灾民群众的斗争，苏维埃政府对解决灾民问题也想了不少的办法。现在的水灾是已经过去了，但是基本问题还有，就是苏区的生产问题。现在因为大水渐退，春种迫近，同时大部的群众到白区去逃荒还要回来，对生产问题成了问题。党为了要解决明年苏区内部的困难，因此提出了苏区的生产的问题，现在正在用一切力量去动员群众把退出来的地耕种，苏维埃政府帮助群众解决种子问题。为了要使明年的春收有保障，因此就必须把今年大水冲坏了的堤修起来，不修对于明年苏区的收成是没有保障的。现在正在准备修堤工作，因为经济困难，修堤工作现在不能马上进行。

五、军事方面的情形及我们现在的布置

敌军情形：江右政权还没有恢复，现在潜江也失守了。江右的敌军，有张英的三团人住在华容县城及各主要城市，有李党的两团人住在石首一带，还有一团多人的民团，还有铲共队、义勇队、常练队反动组织，大约有一团多人。还有李宗监两团川军，在江右围剿我们的部队，大约有八、九团敌军。在潜江有八团敌军。沔阳五团是岳维竣的队伍。新堤还有一个新五旅一团多人。监利、江陵有川军。围绕着苏区的敌人大概有二、三十团，都在准备向我们进攻，不过是没有一直[致]的行动，对我们还是有利的。尤其是最近潜江的失守，敌人加紧的进攻，我们的布置是集中力量（红军的主力）来打击敌人围剿的一方，别方面更依地方武装来巩固。现在主要的困难是给养问题，现有的一切粮食只能供给一个月，现在军事上的发展也是有许多困难，这是因为党过去对红军给养问题没有注意，现在才决定动员群众力量为保障红军给养而斗争的任务。具体的决定就是把没收来的东西（主要的是粮食）要十分之五给红军，十分之二给群众，十分之三给当地政府。除此外，党在群众内要用宣传鼓动的方法，使在拥护红军的口号之下，送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给红军，要保障红军的战斗力，第一给养上必须要有保障（关于军事上详细情形另有报告）。

六、苏维埃政府的工作

省苏维埃政府做工作的干部，可以说没有一个中心领导，从前苏维埃的主席是周逸群同志，逸群牺牲以后就没有人专门负责。虽然中央从前决定要锡根同志负责，但锡根被派到江右去了，以后又生病，实际上是没有做多少工作的，同志也没有专门负这个责任。现在政府内经常做工作的只有一个秘书。彭之玉虽然是在做政府工作的，往往把他拉到党委做事，一个人兼几职，又是政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团，又兼党省委宣传部长，这是干部的情形。

政府的分工，有财政部，是名义上的，没有建立起单独的工作。有土地农民部，是彭之玉负责，也是没有什么工作。以前有个文化委员会，现在负责的同志被派去做白区工作去了，文化工作是无形停止了。这就是政府内的

分工。政府之下的交通工作和政治保安局的工作，做得非常坏，政府对他们没有什么领导，对军事工作，政府更没有过问军事问题，总是党来解决。有些工作表面是政府做的，实际上是党，这样形成了党包办一切，结果什么也没有弄好。

省政府对各级苏维埃的领导非常不够。没有劳工部的组织，对各种法令的执行也还有很多的缺点，特别是对婚姻法令的执行。对青年保护法也是没有切实的实行，部分的执行了，还实行得不够。对青年的教育工作，一点也没有注意。

现在苏维埃政府除了每天出一出《工农日报》外，别的事很少，没有注意到建立合作社这类的工作。过去的工作一切的重心都是解决水灾问题，对保障红军给养，过去是没有注意的，党同样没有指示。可以说现在湘鄂西苏维埃工作还没有建立起来，缺点非常之多。

七、现在湘鄂西财政经济状况

以前本来就很困难，加上今年又遇了水灾，使经济、财政上更发生了些困难，土地税今年也不能够征收。军事最近的失利，使经济上更没有来源了。各县也不能交钱到省苏维埃来，苏区的营业税也没有征收，每月的收入非常少。现×多，三军全军及后防各级机关、医院每月用费，除粮食外，还须要两万多元。

现在财政上以及经济上到了山穷水尽，现有的钱只有一千余元。财政问题目前解决的办法：

决定征收营业税，在主要的河流要道建立海关登记处，征收法我们另有决议，大约一个月内可以收到二千五百元。

决定各县要交款到省政府来，具体的分配法是：沔阳二千六百元，监利一千五百元，汉川和独立团每月交二千五百元，江陵一千五百元，天门一千元，还不够的由省政府设法解决。

要组织特务队去找经济案子及例外的收入来维持。

动员游击队到白区去游击，想各种的方法去解决，主要困难是红军给养问题难解决。

九、目前几个要解决的问题

a、根据地及发展的方向问题：

因为今年的水灾及江右潜江的失利和现在财政的困难，敌人围剿的严重，使苏区发展的方向发生了一种困难，我们同样的注意到了向襄河北岸京山、天门、应城等县去发展，与襄、枣、宜苏区打成一片，与鄂豫皖苏区取得联系来完成湘鄂西与鄂豫皖打成一片的任务。不过这里有许多的困难，主要的困难是我们的主力一过襄河，很容易被敌人切断交通关系，这样一来，红军是有脱离苏区根据地的危险。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决定红军的主力究竟是否过去这个问题，这是要请中央很快解决的。我们原来的根据地，群众基础是有，不过就是经济上没有办法，红军的给养很难解决。军事最近的失败，要执行巩固的向外发展的任务有很多困难。主要的是子弹缺乏，红军没有饭吃，出京山又有脱离苏区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发展方向及我们的任务，到底应当怎样，请中央很快解决。

b、九师行动错误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些文件，关于这问题我不另写，中央可以根据我们以前的文件和我口头意见，作出最后的结论。同时对于一部分干部的处罚问题，中央可以作一个最后的决定。

c、干部问题。省委没有宣传部长，没有做教育文化工作的干事，请中央帮我们解决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可以办训练班来解决。

军事上的领导。我们向中央提议要派得力的干部去做军事工作，因云清同志军事上没有好多办法，政治委员要中央派一个人去代理夏曦同志的工作，主要的是因为他做这工作不适宜，最好派一个军事政治上较好的同志去，夏曦依然回到后方来做中央局的工作，这些干部问题请中央快点解决，否则湘鄂西的军事领导真成问题，请中央注意。

d、最近三军行动问题：

最近有很多的争论，主要的是三军出去不出去的问题。在潜江失败后，夏曦就提出向外发展，红军的主力到京山去，可以把鄂北作后方去造新的根据地，到敌人围剿之外边去打击敌人，帮助老根据地的巩固。他提议出去的主要理由是：苏区内没有给养。子弹的缺乏。在苏区打击敌人比较困难。财政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因此，就应当立刻出去向外发展。省委大多数的同志认为这样是退却的意见，我们是不同意的。

我们主张红军的主力暂时不出苏区。理由是：

苏区内部的敌人还没有消灭，他们时时可以出来扰乱我们的后方，这样的出去是没有把握的。

红军出苏区不注意各种环境，是容易中敌人第二次及现在以来所用的围剿计划，使红军脱离根据地、离开群众后他来消灭你的根据地，再来进攻红军的主力。我们认为：红军假若离开了群众，作战是很困难的。

我们主张巩固向外发展，首先来消灭内部的敌人，为了要使红军不脱离苏区作战，对给养首先要有保障。

我们认为红军暂时不出去，给养问题是有保障的，我们现有的粮食还可以供给一个月，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动员群众力量来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做这一工作，红军给养问题的解决主要的要靠斗争。

因为这次打了败仗，士兵都有失败情绪，这样出去是不好的。同时，三军才下来，马上又出去，对群众的影响是不好的。

因为在这种条件之下，暂时不出去是比较好些，红军的行动与根据地问题是不能分开的，关于行动问题就可以与发展问题共同解决。

十、最后，中央分局的领导过去本来就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没有开过会，没有正式的讨论过问题，对各种问题从改组后到现在没有单独的讨论过

最近锡根回来了，夏曦到前防队伍内去了，后防只有我一个人，现在我又来上海，那里一个人没有了。中央对这些问题最好是很快解决，我提议一定要很快的加强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领导。

我要申明的：我在那里大部分是做团的工作，对党的工作和一般问题不十分详细，只能写此简单报告，以便中央解决湘鄂西问题时做参考材料。

盘铭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中央

注释

原文缺<八>。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九师行动结论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一、省委八月三日对九师行动的决议，未决定占领潜江巩固的向外发展，而令其绕道进攻沙洋，转入天门（并说如攻不下沙洋、可绕出沙洋之北），以与汉沔苏区联系，造成天门东北一带的赤区。后省委会议和军委会议又决定在能与三军取联系时，则须与之取联系，但这是次要的任务。为要执行这一任务，派万涛同志随军出发，领导九师行动，责成万涛同志转变三军政治路线，接充三军政委。这一决定的本身是含有冒险轻进的立三主义的残余，有脱离苏区的危险。

二、九师攻下沙洋后，从敌人电报中，得到三军已在南漳活动，有进逼远安之势的消息，九师遂攻荆门，去与三军取联系。后虽会师于刘猴集，经钟祥回师天门，攻岳口、张截港，直抵苏区。但因周转延误时日，延缓了主要任务的执行，这确是九师在当时偏重于执行联系三军的错误，九师负责同志应负责任，尤其是万涛同志。

三、九师攻下沙洋之时，二十五团意外占领潜城，当时石、华敌人积极进攻江南苏区，因为必要巩固潜江和大水不便运兵的关系，所以江南连遭敌人摧残，无法抽调二十五团驰往救援。这一主要错误，固然是省委忽视江南地方武装和对九师行动决议基本错误所形成，但九师放松占领天门，当然有相互关系。

四、省委起初未看清九师行动的错误，自己应负主要责任，而把一切错误归于九师负责同志和万涛同志的身上，同时不去考究事实，竟凭空提出许多非事实的批评，这是省委的机关工作方式的表现。当时撤销万涛同志政委职权是不正确的。后省委会议认为万涛同志不应撤职，是调到后方工作，在军事紧张时期，轻易调动军事上主要负责同志，处置也是不郑重的。特别是只顾解决九师错误问题，而忽视了敌人的进攻，影响军事的失利，这在军事上更是大的错误。

五、组织前敌军委，不要政委参加，更是不正确的，这是破坏了红军政委制度，这是儿戏的处理军事。同时决定九师同志的处罚，又不当面宣布，这是非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式。

六、根据以上各点，省委最后决定，万涛同志是调回省委工作，另给予警告，德昌。培英同志同样给予警告，并要该三同志对此处罚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接收〔受〕。

七、整个错误省委应负责任。并将此决议报告中央，请求批准。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省委扩大会代表反对夏曦在中央分局及军队中的领导路线问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日)

中央：

关于湘鄂西的工作及一切情形，曾托宋盘铭同志向中央当面报告，省委本决定最近对中央作一个关于由水灾发生至现在时期中，全部工作的详细书面报告，但这一。报告未做好以前，有一点比较严重的问题，有先向中央报告的必要。

这次省委扩大会议（十一月二十日），关于中央分局的领导问题，争执甚烈，各地到会的代表，极大多数对中央分局的领导公开表示怀疑，理由是：

（一）水灾未发生前，有两次因敌人进攻形势很紧急，夏曦同志在军事上两次提出退却，主张红军离开苏区；

（二）这次潜江失败，完全是犹豫动摇所致，应由夏牺[曦]同志负责，他在紧急时候又提出退却路线，红军主力离开苏区，留下一团人分散游击，党、政府、军委均只留少数人工作；

（三）这次讨论红军行动，夏同志发言当中认为：

A、湘鄂西苏区地势不好，夹在长江、汉水之间，不便向外发展；

B、苏区给养毫无办法；

C、现红军战斗力减弱了，不能打硬仗，只有去找团防打；

D、红军应迅速过襄河北岸，造成新的苏区，因为京山有“山”，地势好。

（四）包办一切，工作上的寒热症，一切决定都少实现，中央分局扩大会的政治决议，现在还未发出（以上一、二、三、四各项，宋同志都知道，第三项是宋同志走后才发生的），因此，他们大多数一致的意见，认为：夏牺[曦]同志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有的说是一贯的取消主义。在会议上，省委常委的发言和结论，极力解释和纠正这些意见，认为中央分局的领导，总的政治路线还是正确的，是依照中央的指示来领导湘鄂西工作的。但有时在某些问题的解决上是有错误的，有右倾的表现，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的残余，但绝对不能说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或取消主义。这一结论，他们虽未怎样反对，但他们还是没有打消他们的意见，到在散会后还是说，他是有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不过因地方干部的反反对，使他还没有形成一个路线。夏牺[曦]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省委认为不适宜的，曾托宋同志向中央报告，同时红军中一般干部均对军部不满，当然对夏同志的信仰也很低，请中央迅速解决这一问题。至于夏牺[曦]同志在中央分局的领导，省委没有具体意见，的确他有些观点是成问题，请中央酌量解决。但现在中央分局事实上早已没有了，中央须派人来建立和加强对湘鄂西党的领导。宋同志应迅速回来。

现三军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已攻下皂市，伤病[兵]送回苏区了；开几次行动中得枪七八百支，部队有了相当补充，不过军部尚无正式报告来，不知何故，特告。

省委

十二月三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

——关于敌军进攻的军事布置，红军的行动方向与编制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四日）

（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于日益巩固与怒长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正在着着的准备着新的进攻。在军事上，固然，在“对日宣战”“蒋介石北上收回失地”与“宁粤协作”的口号之下，调动和动员了新的进攻的部队，规定了新的进攻的作战计划。在政治上，更其用尽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捏造各种谣言与假文件，企图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唯一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描写成为杀人放火的穷凶极恶的匪徒与阴谋家的小团体，甚而至于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积极地利用一切在野派别与[叛]徒“理论家”来努力地准备进攻苏区的舆论。

在军事方面，敌人进攻苏区的新计划，大致是对于江西中央苏区取暂时的守势，而向鄂豫皖苏区作大举的进攻。派遣较大的兵力，将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来加紧“围剿”湘鄂西、湘鄂赣与湘赣边各苏区。在中央区，赣南敌军现蒋蔡十九路军已离开赣州，粤军一时尚未接防；吉安富田万安一带，原有八师兵力，现赵观涛师拟调京汉线，蒋鼎文师调抚州，李抱冰师调南丰，富田敌军撤到吉水。广昌宁都屯集孙连仲两师及毛炳文许克祥等三师残部。据此，敌人似拟侧重临川至宁广线的兵力以固南昌，对于赣江上游及赣南防守较松。闽西方面，永定龙岩苏区恢复，及与中央区联系一起后，张贞刘和鼎均取守势。在赣东北方面，敌军陈调元部第五十五师驻万年乐平一带，第十八师戴旅驻贵溪，浙江警备师（两团）驻常山玉山等[华]埠一带，此处尚有第四师与江西警卫团分驻苏区边境，闽北为刘和鼎部队，向十军取包围堵截的形势，步步为营，建筑炮垒与防御工事。在湘鄂赣与湘赣边两区，湖北敌人对鄂东南取守势，湖南平例的湘军约五师与修铜之谭道源师正向红军十六军取积极的进攻。罗霖部亦从吉安出动进攻红七军于莲花一带，株萍线与湘军约二师正向湘东南独立师进攻。在广东方面，敌人对于东江红军与游击队正计划“包剿”，对于闽赣边红军则取堵截形势。在湘鄂西，敌军据襄河两岸（潜江、沔阳、天门、汉川各县）而守的有十四团兵力正与驻在监利的川军五团相互策应的以步步为营的策略向苏区中心进攻。此外，在宜昌周围的约有川军十团，江右有川湘军近十团，襄樊的敌人兵力则较弱。很明显的，鄂豫皖现在成为敌人进攻的中心目标，现在环绕在鄂豫皖苏区周围的约有十二师兵力，皖西有陈调元、王均部三师，豫南有吉鸿昌部队约二师，平汉线上有胡宗南、顾祝同、刘峙、徐庭瑶的四师以及沿长江向黄冈圻水进攻之萧之楚、徐源泉、夏斗寅部三师。屯集郑州的战斗飞机已有十四架，还有十四架正待命出发，每机都带有充足的毒瓦斯炸弹。此外敌人更经常的以飞机飞入苏区，投掷炸弹，轰炸群众与房屋（全苏大会开幕时，敌人曾以十数架飞机去轰炸，大会幸未遭殃，在群众热烈的拥护与庆祝之中，安然的开会与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二）敌人的政治的、舆论的、经济的与军事的进攻苏区的准备与行动，正在加倍的积极的进行。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矛盾的空前紧张，各派军阀内部矛盾之激烈，军事指挥之无法统一，国民经济的破产与崩溃，反动统治财政状况的山穷水尽，都是敌人的不能克服的弱点，在苏维埃运动方面：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锻炼与产生出来的工农红军，得着广大的农民群众的热忱

与拥护，与红色战士闻所未闻的英勇善战；全国革命急剧的高涨，满洲之失陷警醒了一大批群众的民族的醒悟，与对于出卖民族利益的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统治）的愤感与痛恨；使得统治阶级更困难的造成进攻苏区的舆论，更容易使群众了解国民党的无耻；空前的灾荒，千百万的农民正在饥饿与寒冷的冬天面前战栗，由饥饿而产生的革命的火焰将燃烧于全国的反动统治的领土上，变成苏维埃运动的狂热。资本向极端恶劣的工人生活水平的残酷的进攻，饿死与反攻成为工人阶级惟一的选择，蓬勃的工人争斗，粉碎了国民党禁止罢工的命令，与红军战士的争斗遥相呼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反动统治的新的进攻，将和以前一样受到惨败，其结果必然是蒋介石报纸上的“胜利”，无数的白军士兵兄弟哗变到红军中去，土豪地[主]的悲呼惨叫，与工农士兵的热烈兴奋，红军的更进[加]的壮大与强固，苏维埃革命获得一省数省的首要胜利。

（三）为着利用目前极端顺利的客观环境，粉碎敌人新的进攻，获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争取这个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党在苏维埃区域应该毫无二语地执行一切正确的土地劳动与经济政策，加紧动员和组织群众，广泛的宣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成功与其决议，加紧发动由满洲事变而起反帝运动的领导，将苏维埃革命与民族解放的纲领提出来，广大在群众中宣传鼓动，揭破国民党的出卖民族利益与民族的耻辱。发动苏区周围反动统治区域中的工人农民与荒民的争斗，领导与开展这些区域中的游击运动，在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任务之下，应该首先将大江以南与大江以北的各个苏区汇成两个大的苏区，在这一任务之下，红军的行动应该更加积极化，更加互相策应，互相牵制敌人。只有全国红军有彼此呼应的整个计划的配合的行动，才能打破敌人现在所取的各个击破的策略，才能够真实的帮助现在敌人进攻的中心——鄂豫皖苏区，才能取得与巩固我们的胜利。所以，目前红军行动的总方向应该首先是使中央区（闽西在内）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在这一总的发展方向之下各苏区的行动方针应该是：A、中央区应以红军主力军配合群众行动向西进攻，迫吉安赣州与湘赣边苏区打成一片，另以少数部队与赤卫队佯攻宁广南丰线以助势并牵制敌人。对赣南（寻邬、崇义、安远、信丰、南康、大庾、上犹、孝悌等县）闽西北（清流、宁化、归化等县）应发展广大的游击运动，与土地革命，阻滞敌人，巩固后方与扩大苏区。对于闽粤赣及湘鄂赣两苏区要保持绝对的联络，并与赣东北取得联系。

B、湘赣边红军独立师应以吉赣线附近为主要行动方向与红军一方面军配合行动，完成赣南苏区打成一片的任务，以游击队的行动与湘鄂赣苏区取得密切联系，并发展遂川、崇义、泰和、万安一带及湘东南的游击运动，推广苏区与土地革命的发展。

C、闽粤赣在中央区的帮助之下，首先取得永定、上杭、武平，恢复龙岩大埔苏区，巩固的向闽北发展。应设法帮助漳浦的游击队壮大起来。东江海陆丰苏维埃区应该巩固自己的根据地，恢复和发展韩江上游的根据地与闽粤赣和中央苏区联系起来。

D、赣东北应在巩固原有的根据地的条件之下将红军主力军移向信河南岸与闽北苏区打成一片，而向资溪临川方向发展，并努力争取与中央区的联系，以配合一方面军的行动，要真实的组织省委所规定的五大区域（金资贵余，上广，华德婺，上玉德与万余间）的游击运动。

E、湘鄂赣十六军主力可向樟树方面移动，威胁敌人进攻苏区的后方，以帮助中央区与红军一方面军，占取赣南的一二中心城市，并巩固之。同时并帮助鄂东南与鄂南及株萍武长路附近的苏维埃运动与土地革命更加开展与深入；以便与鄂豫皖互相策应及取得联系，造成时时可以威胁敌人进攻其他苏区的后方的形势。

F、琼崖与广西右江两苏区应各自巩固的向前发展，琼崖苏区不应硬攻海口，宜广大的发展琼东琼南各区苏维埃土地革命运动，根本铲除地主在乡村的武装，右江苏区应注意到贵州南部与湖南西南部的发展，造成湘贵桂边的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

G、鄂豫皖在使皖西析黄与黄麻光罗打成一片而得到巩固的发展的条件之下，应乘敌人进攻的军事布置尚未周齐之时，以红军主力击破敌人一方，实现各个击破的策略，造成在京汉路与长江边运动自如的形势；与鄂北红军游击运动的发展应取得联系，以便能时时以京汉路沿线的游击运动骚扰敌人交通要道；与湘鄂西在湘河北岸的发展亦须密切的联系起来，以便在应城、孝感、安陆的苏维埃运动更进[加]的发展之下，汇合起来。皖西鄂东与豫南应以极大的力量去发展游击运动，才能顺利的击破敌人进攻的企图。

H、湘鄂西在绝不抛弃襄河南岸（洪湖）的原有根据地的条件之下，红军主力军可以移到襄河北岸傍着原有苏区准备时时可以击破敌人一方，以发展新的苏维埃与红军的根据地，同时应留少数部队配合群众赤卫队支持原有根据地并恢复与发展江右的苏维埃运动，造成对长江上游的威胁。五鹤桑石的苏区，应扩大游击运动深入土地革命而逐渐向宜沙方面进展。房郧独立师应在巩固原有根据地之下，争取与鄂北九军的联系。

1、这里首先应该将襄樊枣阳的苏区巩固起来，西与房县保康苏区联系，向南发展与湘鄂西苏区打成一片，并与鄂豫苏区取得密切联系。

根据上面的指示，红军各军与苏区最高党部应估计到敌人的变动，决定自己的军事计划。应严重的注意到红军的有力发展，须建筑在现在根据地的巩固之上。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同样，红军行动的积极化与互相呼应是目前最主要的，保守与等待，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

（四）在指示出的红军的积极化的必须与行动方向之下，红军的扩大与巩固，建立强有力的红军的铁军是头一等的任务；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应十倍地加强，四中全会后的政治工作条例必须全部地实现起来；红军的编制亦应按照各军的实际情形与中央的红军编制条例重新改编。现在红军一方面军应即改组为一、二、六、七、八、十等六军，赣东北十军应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先编一师，湘赣边编足一师。红军十六军仍旧，应将现有三师尽量扩充，东江红军成立一独立师。以上各军在打通后统归第一方面军指挥，鄂豫皖第四军应扩充编成第四第九两军。湘鄂西第三军应先编足两师。鄂北红九军改成独立师，在此三部分打通后，应成立红军第二方面军，归鄂豫皖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管辖。地方武装应每县成立赤卫军一师至两师。归军分区指挥部指挥，暂不脱离生产。此外各地的独立师与中央警卫师则脱离生产。地方武装

应有一部分编成游击队在苏区周围进行游击活动。

中央坚信，目前良好的客观环境，红军战士的英勇善战，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勃发与其拥护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热忱，党员群众的艰苦卓绝的工作与努力，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将在最短时期中实现起来，反动统治的丧钟是在响着，苏维埃运动的烈焰，正在燎原，努力吧！为着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的胜利！

中央

注释

原文如此。

邓中夏问题材料之二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 万涛

究竟是湘鄂西特委误了中夏同志？还是中夏同志自己错了？

邓中夏同志在湘鄂西的党和红军第二军团的领导，执行了一贯的机会主义的结果，使苏区大大的缩小，红军亦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这都是无庸争辩的事实。然而奇怪得很！中夏同志却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说是湘鄂西把他误了！

他的理由是：上山到五鹤后，他已经“正确”了，却被错误的特委（？）

要他“回到洪湖”，又使他们过了几个月流寇生活，这完全是非事实的，是我们苏区群众惯说的活：“抢掩护”，企图借此来掩盖他的错误罢了！事实是这样：当时在立三路线领导下的特委，当然是有不少错误的，主要的错误是太相信了中夏同志，以为中夏同志是正确（7）的（中央的代表，又从国际回来）但是在第二军团由石门反攻津、澄时，特委即提出：“假说真的一、三军团又进攻长沙，则我们应配合这一行动，这消息如不确实，则二军团应回到南华安与公安一线，波浪式的向外推进。”及接到中夏同志退到杨林寺时的来信，要特委全体到公安开会，特委马上反对他的意见，要他将第二军团迅速开回南华安与公安一线，“有阵地的向前进攻，有后方的向外扩大”在他们上山以后，特委又连派二十多起交通找他们，要他们回到苏区与广大群众配合起来，冲破敌人的“包围”。这些意见，我认为完全是正确的。

真的中夏同志当时能接受特委的意见，或是在攻津、澧时回到苏区，或是在杨林寺时回到苏区，再不然在初退到五鹤时回苏区，那不但不错，而且是对的，非常对的。即退一步说，在他们到荆门时，回到苏区，也还是好。但他硬要把中央在三月的指示和特委在一月以前的指示对立起来，说中央是对的，特委是错的，因为特委的错使他也错。真是妙不可言的“逻辑学”，其实无非是故意借此企图混淆目标，来这[遮]掩自己的错误。我要特别申明的，我决不是无故嫁祸（？）于中夏同志，因为过去的特委是我与逸群、崔滇、之玉四人负责，特别是我与逸群同志要负责（因为崔滇、之玉主要的是做政府工作）。要把事实弄个清楚，是我的应有责任。不然，逸群同志死而有知，×不算要学中夏同志大叫其“天”、“冤枉”！

万涛

注释

此为湘鄂西《工农日报》刊载时间。

原文如此。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中夏错误问题给中央的信*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

中央：

关于中夏同志在湘鄂西的党和二军团中领导的错误，现省委已作出决议。兹将三军前委决议及中夏同志报告的结论寄来（他的报告共八万字，待以后继续送来），作为中央解决他的问题的参考材料（但他的结论是他昨日又重新改过的，把他原来认为是：“他一误于调和路线时代的中央，再误于特委”等类的话省掉了）。省委认为中夏同志对他自己的错误，完全企图摆脱，是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请中央对他给以组织上严厉制裁。

湘鄂西省委

十二月八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年代。

邓中夏报告的总结

——对三军错误领导的检讨*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

本报告的立场

列宁说：“政党对自己的错误之态度如何，是最重要的最可靠的标准之一，判定这个党是否事实上能够执行其对于本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责任。公开承认错误，寻求此错误的原因，分析其所以发生此错误的环境，细心审查纠正此错误的方法，——这便是认真的党的标志，这便是教育并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见《左派幼稚病》）。

党员也是一样，我便是从这个立场做这个七、八万字的报告。

时期的总结

第一时期，在洪湖赤区时（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至十月十八日共一个月），我们的策略路线可以说没有什么错误，打下监利渡口，打下仙桃不再北进，都不是“不要根据地的冒险盲动主义的立三路线。”

第二时期，南渡进取常澧时（从十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九日共一个月零二十天），总的策略路线完全是盲动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他的特点是脱离群众脱离后方根据地的只凭军事行动的向中心城市发展，这是错误非常之错误的。虽然我们在冒进之中曾有几次的警觉与动摇，但这样警觉与动摇，终归不能并且不敢冲出立三路线的“中心城市发展论”的圈圈以外，所以我们虽曾企图执行“很巩固的向前发展”的转变，然而不能是依据原有后方根据地（洪湖赤区）的巩固向前发展，不仅不能是企图于军行（事）所至之地造成新的后方根据地（津澧）的巩固向前发展，所以这种转变只能帮助于军事所到之地，加重发动地方群众工作，而不能帮助总的策略路线的改正。此时中央对于我们没有丝毫的指示与帮助，湘鄂西特委无疑完全同意我们的策略路线。我们南渡以后，虽然占领南县、华容、藕池、公安、津市、石门、临澧等城市，到此来除华容以外，其余皆随红军之撤退而放弃了；所建立的地方政权以及一切群众工作亦随着而消失了。这便是我们坚决执行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之结果。

第三时期，退兵杨林市时（从十月十日至十九日共十天），我个人估计到目前敌人必有大举包围，因侦探工作的糟糕，以致我未能坚信这一估计。同时我提出“集中兵力选择阵地打破敌人大包围”这一战略，就纯粹军事观点说虽是适合的，但就政治观点说，它仍然是立三路线的冒险盲动主义的策略。这是错误非常之错误的。可惜事实上因运送回兵问题，连这个错误策略也抛弃了，以致遭到意外的惨败。立三路线是冒险轻进的向中心城市发展，是反对上山主义的，我们事实上也是一贯的反对上山主义，然而结果不能不上山，为的是冒险不成，回头来却与后方根据地隔断了，无路可走，不能不上山，我们终于做了上山主义的俘虏，“这又是立三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至于“上山逃跑”四个字相连，如果“逃跑”二字是作避免与敌人作战解释，作不愿或不敢冲破敌人“围剿”解释，是与事实不符，因为后来事实上，我们是在不断的残酷战争中生活着。

第四时期，败退五鹤后（从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共三个月零十天），在败退上山时，我们在实际的经验中，已经使我们觉悟到没有坚决执行“很巩固的向前发展”的错误，我们采取以鹤峰、石门为后方

向外发展的策略，但我们在战略上是长驱攻坚为主要的方针，这仍是立三路线的余毒。杨林市、磨岗隘两次大败以后，本军团受了重伤，无疑的需要整理训练一下，才能再战，这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整理训练，为的是准备冲破敌人包围。我们此时反对避免作战的右倾躲避主义，也反对冲回洪湖的“左”倾冒险主义。我们认定凭借五鹤石长冲破敌人包围向外发展，是我们唯一的正确出路。我们为了坚定这一策略路线，曾与“左”右倾作坚决的热烈的斗争，我们提出“困难中的奋斗”口号，我们的行向是针对着公、松、枝、宜至津渣一线，企图利用敌人弱点击破敌人这一线的后方，所以我们曾有盘据渔洋关的企图。我们并有凭借五鹤石长的坚定性，但我们还没有注意到桑植、大庸、施南、七 的经营问题，更不用说到上下川东问题，像去年十二月（？）中央第一次给红军的训令那样说：“第二军团……其后方地在施鹤下川东方向……”象今年三月一日中央给湘鄂西特委的信那样说：“施鹤巴东与桑植、大庸应成为这广大苏区可靠的后方并联系上下川东的发展；二军团主力在这一巩固的根据地上……向前发展”。中央这两种文件，我们都没有收到，以致不能把“凭借五鹤石长冲破敌人包围向外发展”的策略路线，更端正起来充实起来坚定起来。

因此，我们机械的执行湘鄂西特委回师解围的命令，而轻于脱离五鹤石长，以致一错再错，在党的纪律上说，我们丝毫没有错误，因为我们毫不迟疑的执行力了特委回师解围的命令，但在政治上说，我们错误了，错误在没有不动摇的坚持“凭借五鹤石长冲破敌人包围，向外发展”的原来的策略路线。

第五时期，北渡，救授洪湖赤区时（从四月一日至五月十一日，共一个月零十天），我们为了驰援洪湖赤区，脱离五鹤石长，一千余里的长途行军，斩关夺隘，撞县冲州，这仍然是冒险轻进的立三路线。到远安，对于解洪湖赤区之围，我们采取站在敌人包围外来打，我现在还认为是对的，既然站在敌人包围外来打，不能不另造一个新的后方以为立足之地，我现在也认为是对的，因为在江左军来信所说洪湖赤区“敌人重重包围，赤区通通倒台，多数群众反水”那样情况之下只能如此做，为了“保存红军实力不能不如此做，至于我们为了坚定从敌人包围外来打的策略，会有那样过分的“落井救人”的说法，无疑的那种说法是错误的，是最下流的机会主义的说法。至于新根据地的条件问题，我们当时没有国际路线的了解，机械的应用朱毛的旧经验（有群众，有地势，有给养）这是错误的。不到一个月，解决洪湖赤区之围成了幻想，造成荆当远为根据地也成了幻想，表面上虽是军事的错误（特别是当阳和马良坪的两次战争）和对大道会 策略的错误，根本的错误在于我们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没有正确的了解与估计，没有看清楚在与敌人实逼处此的荆当远，在还来不及发动广大群众斗争的时间内，是不能在荆当远立足的，因为荆当远邻近宜沙，不似闽西僻处一隅。虽然我们是在不得已之中定出不得已的策略，在我们主观上是很想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然而这一策略仍然是立三路线之另一表现，因为它仍然包含冒险主义的实质。

第六时期，败退鄂北到与九师会师（从五月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七日，共四个半月），我们可以[说]是执行力了国际路线的转变。我们经营均房保南为暂时根据地，巩固的向荆当远发展，与江石监沔赤区连系起来的决定与实行，以及我们对于湘西、鄂西、鄂北、豫南统一的建议，是与中央指示相符合。虽然我们最后跑上六七百里与九师会师不免有些冒失，然而我们急于需要得到党的指示，不能不如此。

我们应负的责任

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对于二军团（现称第三军）政治领导的错误，无疑应由我负主要的责任。虽然我在第二军团没有最后决定权，然而不论任何同志的意见，经过前委的决议，我就应该完全负责。我在上面分析错误中，虽然指出调和时代中央、湘鄂西特委的指示，以及德昌、容先同志来信，仲理、守贵同志口头报告和江左军来信，对于我们的错误有影响，然而绝对不是企图借这一切来推脱我的责任。事实已经很清楚洪湖赤区的被摧残，第二军团有削弱（枪支虽然还有增加），都应该由我责任。我在上面七、八万字的报告中，虽然我已经了解的做了相当结论，当然这些结论不会是完全正确的，我诚恳希望党加以审查和指示。如果在党的审查和指示中，发现新的错误，我无疑的用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来接受。我在此申明，我是一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研究的党员，要犯可怜的以至可耻的政治错误，无疑是不能的，我希望党给我以深刻的纠正和教育。党按照我所犯错误的程度，给我任何处罚（除开除党籍外）我都接受。我请求这份报告送到国际。

中夏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于洪湖赤区

注释

原文如此。

中共湘鄂西省委对邓中夏同志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九日)

一、过去湘鄂西的党与红军第二军团，在中夏同志领导之下，没有执行巩固的发展，而使红军脱离苏区，以至上山逃跑，致在敌人“围剿”当中，苏区大大的缩小，红军亦遭受严重的损失。尤其是不能牵制敌人力量向中央苏区进攻，增加我江西红军主力作战许多困难，这一严重的政治错误，应由中夏同志负主要责任。

二、中夏同志在湘鄂西的党和红军二军团中的领导，所执行的完完全全是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富农路线，冒险轻进，脱离苏区），因为执行立三路线碰着失败，走到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山逃跑，过分估量敌人，对革命悲观失望）。这些事实，已经很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无庸争辩的。

三、中夏同志主要错误的特点，是完全不信任群众力量，百分之百的上山主义。在进攻津、涪时，就提“离水就陆”的怪理论（？），以后曲解革命根据地是“山势险要足资依据”，选择五鹤为根据地的主要条件是这样，经营荆当远为新根据地的主要条件也是这样，以及最后退到鄂北还是这样，并认为江西红军的胜利完全是“东固地势形势”。因为他对革命根据地的认识，是从“山”出发，所以一切行动都把“山”放在第一位，以为只要有“山势依据”，“何处不可以争取群众”。因此也就对于没有“山”的洪湖根据地存在着厌弃和取消的观念，写出“离水就陆”，“洪湖只适宜小的部队跑兵躲藏”，“回洪湖是等于落井救人”等最下流最可耻的机会主义的说法！甚至对洪湖根据地取鄙视和敌视的态度，说洪湖有什么好处？“有柞火（即性交）打不要钱”，来抑制红军中的干部和战士群众回到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这是诬蔑革命的罪过行为！

四、在中夏同志这种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之下，当然谈不上实行党的政纲。中央批评他“已经忘记了工农红军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所负重要使命，已经忘记了土地革命的基本任务……放弃发展群众斗争与组织群众的工作，完全放弃工会工作，不进行改造与巩固红军的任务”，这完全是正确的，但他却处处拿“创造新根据地”的“左”的假话来掩盖他的机会主义的真面目。

五、省委认为中夏同志没有丝毫诚恳态度来认识他自己的错误，企图把错误向旁边推倭，自然在他的报告中承认了一些错误，但他的结论是“一误子调和时代的中央，再误于错误的湘鄂西特委”，反过来说，并不是他错了，完全是中央和特委把他误了。事实上调和时代的中央，当然对他的错误来源有关系，但中夏同志初到湘鄂西来时，就传达了“要巩固的发展”的国际路线，而他所执行的却是恰恰相反，省委也绝对不否认当时在立三路线领导下的特委的错误，但在二军团由石门反攻津渣时，特委即提出要“二军团回到南华安、公安一线，波浪势[式]的向外推进”，及后接到中夏退到杨林市时的来信，特委又提出“二军<团>回到南华安与公安一线，有后方的向前进攻，有阵地的向外扩大”。这个意见是绝对正确的，二军团上山以后，特委先后派出三十多起交通，要“二军团回到苏区，配合广大群众的斗争力量，冲破敌人的包围”，这也是正确的。因此，中夏同志绝对不能把他脱离苏区上山逃跑的错误，完全委之于调和路线时代的中央，更不能把北渡后所过的数月来的流寇生涯委之于特委。假设中夏同志能及时同意特委的意见，在津澧时

即回到苏区，或初退五鹤时回到苏区，事实上是可能的，那不但不错，而且完全是对的，到荆门时立即回到苏区，也还是对的。同时中夏同志把中央在三月的指示和特委在一月以前的指示对立起来，故意把中央六月二十九(日)对二军团的指示和中央分局及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对二军团对立起来，更是有意的企图混淆目标，遮掩自己的错误。并且不承认中央和中央分局批评的在国际时“曾犯过反国际的错误”与“联合富农”，他认为是造谣陷害，这完全是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

六、省委完全同意三军前委对中夏同志的决议，并同意请求中央撤销他的一切工作，派到下层群众工作去，了解他的错误。此外，省委决定给中夏同志最后严重警告，请求中央讨论他的党籍问题。

(此件带到时间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原文如此。

中共宜昌道委十一月份给中央的报告

——各种工作情况及缺点，十二月份工作计划*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

中央：

我们在八次常委会中，结束了十一月份工作。现在把我们这里的情形，分项报告你们，希望你们讨论此报告后，针对着我们的工作现状，给以具体指示。

一、目前鄂西政治情形

(一) 川二十一军在鄂西数目和布防状况：

1. 刘湘在宜昌设有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部，直辖有第一、二、三路“剿匪”司令。第一路司令为郭勋，部队三团，分驻沙市、郝穴、沙岗、普济观、观音、石灰桥等处；第二路司令为张邦本，部队三团，散布在荆门、宜昌、远安等处；最近这两路在荆、潜、石灰桥与红军战斗的结果，均有数百以上的人枪损失，现在设法补充。特别是在红军巩固潜江的时候，川军曾在宜昌随便拉人当兵；第三路为杨佟两独立团，现驻监利，其详不知。

2. 川军除上面一、二、三路司令为“剿匪”基本部队外，尚有蓝文斌旅改编之刘续新旅（因犯案撤职）两团人，分驻宜昌、沙市、公安；陈兰亭二团一营分驻宜昌、宜都、长阳；王宏柱师一团驻施南；戴天民旅前经红军击溃，仅存团人左右，分散归兴巴一带。

3. 除上列为刘湘，此外尚有刘湘改编赖心辉的部队张英师三团人，驻南县、安乡、华容、石首一带；李宗监一团左右，驻石首、藕池；罗启江旅二团驻沔阳。

4. 以上川军均受刘湘指挥，共二十团一营，约三万人左右，徒手约五分之一，所有枪支三分之二是川造，战斗力为中等，但山战较为健强。

5. 鄂西川军内部有不少冲突，如陈兰亭原系拖客出身，共有二师实力，有一师人受刘湘编制，一师仍在川鄂交界处流荡。湘欲收编其两师为自己武力，曾阴谋拘陈菊亭于万县，现在陈已发觉，自动出川。现湘极力安慰发饷，发军用品，免其叛变。同时赖心辉所部之张英、李宗监、罗启江均极不满刘湘，时与赖电往还。

6. 最近他们的行动，刘续新有调青滩剿赤说（川鄂交界地），张邦本有调二营人到远安进攻房县（政治保安大队）举动。但他们注意力均集中于荆当远。（以上多系宜昌县委报告）。

7. 冬衣现在尚未发给，月饱竟欠至五月之多，一般兵士非常不满。（宜昌县委报告）

(二) 各县民团及豪绅地主反动力量：

1. 宜昌有常练队伍中队，共八、九百人，每中队有三分队，分驻于罗田溪、安安庙、鸦雀岭、土门垭、西坝等处。他们以河西、罗田溪、鸦雀岭几次赤军起事，龙窝神匪嚣张，乡村除紧张自治会工作外，均加紧常备队的组织。最近他们以红三军的东下，宜昌工人斗争的渐趋激昂，遂起组织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来巩固宜昌的冬防。同时内部士兵传出消息，何成浚要改编宜昌民团，兵官均非常动摇（宜昌县委报告）。

2. 松滋、枝江、宜都反动民团武装约八百余人，宜都三中队，松枝两县五中队（欧阳晋一队在内），每队七八十人。松枝豪绅较精明，对编练队的

组织为普遍严审，如沙道观、米积台一带竟有无徽章不能入境的现象。宜都在江北一带的豪绅，以几次安福区群众斗争与游击工作的发展，豪绅多跑到有军队或民团的地方。同时他们以地域观念（枝江不来宜都清乡），豪绅民团利害的关系（民团下乡清乡即搜括[刮]豪绅地主的谷米），时常发生纵错的明争暗斗。最近他们为各自保存利益计，曾组织一部分走狗作神兵大刀会、编练队的工作，经常向革命势力进攻。特别是安福寺民团（三十人）以昼伏夜出、时出时没、声东击西的手段，经常的、残酷的向革命势力进攻（于十月十七日拂晓，经当、宜游击队同群众包围，将该民团和横店子民团，二处被红军共得枪三十余支）。（宜都县委报告）

3. 当阳除民团二中队约三百人分驻河溶、县城外，尚有王德昌、李凤山两股民团（土匪改编），在荆南一带劫抢行人，乱征捐税。当阳政权多集中学生手里，他们以当阳水灾的扩大，灾民几次在河溶抢米斗争的关系，知道武力不足以镇压、消灭斗争，遂进行欺骗宣传，用赈济口号来缓和群众的情绪。群众同时以红军攻下石灰桥，当阳河溶民团表现特别恐慌。（当阳报告）

4. 公安编练队的组织的普遍与严密，为鄂西各县<之>冠，无徽章的行人被其拘留暗杀的不知凡几。现正从事秘密没收共产党员与革命份子，这些残酷<的>反革命行动，以石雨亭为罪魁，但现在较为和缓。（公安报告）

5. 长阳最近县长施行其改良欺骗，对群众说：“民团不好，引起你们来革什么命，来误入歧途，参加‘共匪，工作’”。遂假解除民团首领的权柄，而替以亲信为走狗。这一阴谋执行的结果，首先有任金声的叛变，最近李华岳（住资邱）以任金声的被捕，伍白云、伍斌权被县长的杀死，遂举部叛变，并向长阳县县长与李华岳激战于都镇湾，县长击毙，都镇湾为李华岳占领。但乡村豪绅地主、富农对自治会的组织都已普遍成立。（长阳特支报告）

（三）鄂西的经济状况：

1. 在鄂西各县半受水灾，当阳之黄家场、孙家场、陈家场、黄家店子、河溶、双洞子、半月区等处，枝江的江口、凤台、马山等处，松滋的沙道观、米积台等处，宜都的安福区附近，宜昌的西乡，都受到空前绝大的水灾。受灾区域总计约二百方里，灾民约五万左右，最近还有多数逃亡在外，少数在家者又无法从事冬耕与打破年节的难关。特别是当阳水灾的浩大，房屋倾圮，室如×罄，真令人伤心惨目。这可见农村经济破产之一斑。（当、松、枝、公报告）

2. 今年水灾的演成与反动统治所谓剿赤军的扩大，与军费的浩繁，却给予了各县反动经济上的一个严重打击，于是翻新出奇，什么阿捐（烟苗）、普通捐、枪捐等以及月捐、营业捐、团防捐、印花捐、佃户捐（找屋住要向公安局领佃户证、搬家证等）等等，向贫农、中农与城市小商人进攻，同时他们尽量的出卖公产（如宜昌县出卖南湖），以维持其统治。但事实上的证明，仍未能冲破这一难关。宜昌团士两月未发饷，兵士要求退伍，民团拦土以维持经济。（宜昌、当阳、松枝报告）

3. 农村中的豪绅地主富农却借着这一水灾的机会，来放高利贷，生谷息，加紧向农民群众剥削，于是促进了农村经济更加速度的破产。（当阳报告）

4. 工人群众以米油盐及百货的高涨，生活更难维持，特别是这次水灾的影响，大批灾民跑到城市中来，资本家更加残酷的剥削工人，减工资，使工人更遭受穷厄的命运。（宜昌报告）

（四）国民党各派活动与军警冲突及其在群众中的影响：

1. 宜昌国民党在群众中的信仰，已经在群众继续不断的斗争中一揭无余，特别是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等，群众已认识了国民党没有用，不能真正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至于工人群众各种小的斗争，国民党反来干涉禁止，帮助老板，这些更其使群众认识了它的真面目。（宜昌报告）

2. 国民党包办下的工会，除沙市、宜昌有些外，各县都没有。至于国民党的工会是没有一个群众的，是老板与工人共同组织的，开会时工人从没有到过会，到会的却都是老板及老板的走狗。因此我们称之国民党行会。（宜昌报告）

3. 在日本出兵强占满洲之后，宜昌国民党为防止反日运动，即在群众情绪较为激昂时，首先成立义勇军，并向群众宣传要真正反日，只有加入义勇军，否则就是非法行动与组织。但他们又严格的限定，限定义义勇军的资格，凡欲加入义勇军的费五元，并要铺保两个。这明明是拒绝、和缓镇压革命群众反日的手段。（宜昌报告）

4. 国民党改组派在鄂西出现很少，除长阳知事龚（忘其名）到处施行改良手段，对民众说：民团不好，换领袖，赤匪不杀，给路费。足证其为改良派份子外，其他则当阳改组派较为嚣张。因为当阳政权完全集

中于国共合作时的学生手里，到处不用武力镇压革命运动（实际没有好大武力），只用会说的走狗，专门向群众作欺骗宣传。如对河溶等处灾民斗争用缓和的赈济等名词。（当阳报告）

5. 国民党与川军的冲突时常发现，特别是宜昌市党部与一路司令，及二路司令与江陵县党部的冲突，表现更为明显。宜昌市党部的《中山

日报》与一路司令部办的《星光报》曾发生过剧烈的斗争，结果经国民党省党部多方调解，宜昌市党部赔礼，才算无事。郭勋以“剿匪”伤兵大多，江陵县党部不负责筹款，曾唆使军人捣乱公安局。（沙市、宜昌报告）

6. 在鄂西各县活动的，除国民党改组派外，其他各派无若何表现。

（五）群众斗争情绪：

1. 这次红三军冲破了红[洪]湖的“围剿”，起[启]发了广大群众对工农红军深刻的认识，特别在沙市、宜昌表现得更明显，一般群众都渴望着红军到来，并有多数群众志愿参加红军。（宜昌、沙市报告）

2. 灾民斗争，曾经过豪绅地主以及反动统治的赈灾欺骗，有一时的和缓。但以事实的证明，赈款纷至沓来，灾民并未得着一文，因此灾民都在这结果中揭破了反革命的欺骗，都认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以及国民党是剥削群众。欺骗群众的。在松枝、当阳、宜都等处，还在继续不断的爆发着群众的吃大户、抢米等等斗争。（枝、宜、当报告）

3. 因系着水灾而来的就是土方斗争与做堤的斗争，现在有广泛的灾民，在豪绅地主富农以田亩摊捐与大家做堤的情形下，都存在着愤懑和积极反对的情绪。（公安、当阳报告）

4. 农村中的雇农都由菜蔬不好起早睡迟的日常小的斗争，转变到减少工作时间和改良待遇的斗争。（当阳报告）

5. 城市中工人斗争情绪，也伴着经济恐慌随时激昂，如车夫因警察不好已发觉了国民党的压迫欺骗。锯工因不出工具刀而走到了不加入国民党的行会的斗争，码头工人因渝沪轮船直航，已觉得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恶。（宜昌报告）

6. 反帝斗争，日本这次强占满洲，宜昌群众虽然没有公开表示，但

在一般群众闲谈中，可以了解群众对国民党不抵抗镇静，对宜昌滨江路的步哨增加与日本领事府军队的守卫等事实，在足以引起群众对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视，（宜昌报告）

7.在宜都安福区一带的群众，因为常练队继续不断的劫抢烧杀，已激起了群众对安福民团豪绅地主有必死的决心（故有十七日群众围剿该团的武装），与要求要土地革命的表现。他们准备着很多的鞭炮与梭标，去杀土劣和参加红军解决安福民团的行动。（宜都报告）

二、目前工作状况

1.道委因感受干部的困难，在整个工作布置上，成了脚疼医脚手疼医手的现象。而在一般工作同志（中），都不愿艰苦耐劳的想出种种方法，去开辟新的工作，只愿做以前旧的工作方式，演成了形式主义的指挥工作，因此在我们转变中的工作，仍然是做得不够。

2.在道委下的工作，整个的都是在闹经济问题，尤其是公安县委的工作，可说是以全力在做经济运动，结果还无钱用。因他对于经济成了无原则的开支，在县委供养不做工作的人员有五十多个（江陵、石首被难同志）。区委委员都是泊来品，都开支生活费，并有区委每月开支二百元的事情。就别的县份说，都是要钱，因为在同志和群众的家里吃饭都要钱，负责工作的人员都是无业的游民，成了动辄要钱非钱不可的严重现象，党的生命变成了经济生命。就一般负责同志讲，这是事实问题。现时我们对这一问题，特别发出紧急通知，以政治教育动员全党同志来转变这一观念。

3.目前我们的工作中心是宜昌、当阳的工作。宜昌城市工作完全是新的发展，一般的工人同志非常兴奋，能继续不断的领导和发动群众斗争，并且是一天一天的扩大的现象。当阳工作也很快的在发展，不过对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斗争还是非常薄弱。别的地方不但没有工作，连党的组织都陷于狭隘范围以内。即有工作，亦不过限于有组织的群众和党内。最近远安工作又有新的发展，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工作。沙市从派胡平同志去后，现时还没有多的成效，连交通关系也不能建立起来。

4.党的教育问题，现在可说才开始注意，一般同志政治水平低落到零度，当然是不容易转变和推进新的工作。就宜昌工人同志说，是由正确斗争中发展出来的，的确容易接受训练，并且富有创造性，能自动建立工作。

5.道委工作，多半限于经济，有钱才有办法，好象无钱就无办法的样子。因为经济来源的不经常，时刻都在闹经济恐慌，影响整个工作的确不小。

三、各县工作情形

（一）宜昌

1.在宜昌城市中中共有支部六个，同志二十九人。锯工支部为中心支部，有同志十三人，内有四个干部；盆荡支部同志三人；车夫支部同志六人；贫民支部同志四人（内蔑工一个）；妇女支部同志三人。外有青工支部一个，同志三人（锯工二、木工一），现时尚未交给青年团。乡村中河西陈家棚、刘家棚共有同志十余人，杨×路同志五人，他们在执行立三路线时遭受严重打击，均非常消沉、但城市中一般工人同志则非常兴奋积极。

2.宜昌城市中群众组织，有一个锯工赤色工会，盆荡五人团，车夫赤色工会小组，贫民弟兄团，姊妹会，青年弟兄团，共六个群众组织。锯工赤色名曰“师友会”，有会员九十三人，每十人选举一个代表，共九个代表，成立锯工代表委员会，内有同志三人组织党团，专门讨论党的策略，再在斗争

委员会中间发表，来领导锯工斗争和扩大锯工赤色工会的组织。盆荡群众五人成立五人团，车夫群众三人、贫民弟兄团群众八人（内有驳船水手二人），姊妹会群众四人，青年弟兄团群众二人。农村中农协塌台后，现时尚未恢复。

3. 宜昌目前工人斗争情绪是逐步高涨，现时已经由日常小的斗争中认识了国民党榨压工人的罪恶，工人不斗争则已，一斗争即充分的带着政治性。

4. 现在宜昌党在群众中的宣传鼓动口号，是“要不出捐只有反对国民党”，在锯工方面斗争口号为“不出月捐”；盆荡方面为“伙食平等”；车夫方面为“不出五十文的党捐”；青年兄弟团方面为“不做夜工”。这些口号在群众中已收得效果，特别是锯工中的国民党行会，在我们几次斗争<后>已完全取得锯工群众信仰，通同[共]只有百一十人，即有九十三人加入我们领导<的>赤色工会。

5. 宜昌海员、码头与煤厂工人，已有新的线索，不久即可建立这几处的工作。

（二）沙市

1. 沙市从我们决定胡平同志担任市委秘书加强其党的政治领导外，到现在还整理。

2. 已有组织的同志只有木工同志一个支部，同志六人，其他零星散碎的同志共十五人。他们并未开过会，都是负责人劝说式、劝告式的向同志讲一番就算了事。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党的生活，尤其纱厂、打包厂仍然没有办法。

3. 沙市近郊，草市、张家场，原有线索可寻的。我们七次常委会，决定他们以坚决的勇气去建立近郊工作，并与江陵县委组织捕东区工作委员会取密切联系。（捕东即岑河口，草市即离城马山一带，均为沙市近郊）。

（三）当阳

1. 当阳有五个区委，三个特支，共同同志三百三十人。第一区为河溶，成立特支，同志三十六人，有三个支分部；二区为陈家场、黄家店一带，成立区委，有同志九十人，分九个支部；三区为曾家港，成立区委，有同志四十五人，分五个支部；四区为孙家场、黄家场一带，成立区委，有支部四个，同志五十六个；五区为草铺，成立区委，有同志四十九人，分五个支部；六区为荆西，成立特支，同志十七人；七区为荆南，成立区委，同志三十二人，分四个支部；九子山特支一个，同志八人。

2. 群众组织，二区已成立区农协，五人负责，成立有党团，群众有百一十人。五区成立区农协，有群众七十五人。七区成立区农协，有群众六十三人。现决定十二月尾成立县农民协会或县[农]协筹备处。

3. 二区有雇农工会一个，三个分会，会员三十八人，一区有雇工会一外，会员八人。现正在领导他们要求增加工资。

4. 现在有中心支部一个，同志三十人，有八、九个是干部。现在他们三次执委会决定在五区、一区建立两个中心支部，来推动和帮助其他支部工作的前进。

5. 现在在群众中的宣传鼓动口号为：要反对捐税只有推翻地主的统治。在灾民斗争中的口号为：到大户家里去吃饭，吃腊肉腊鱼。在雇工方面为：增加工资一半。在贫民方面为：反对生谷息。

（四）宜都

1. 宜都有同志九十二人。鸦雀岭周围一个区委，有同志二十五个，分三

个支部。张家店子一个中心支部，同志十五人。问安寺中心支部一个，同志二十八人，分三个支分部。江口后乡一个支部，同志八人。陈家院子、横溪河成立一个中心支部，分三个支分部，同志十六人。

2.群众组织，问安寺乡农协一个，人数三十九个。陈家院、横溪河乡农协一个，分会三个，群众四十五人。

3.现在他们的中心鼓动口号为“揸驼[驮]子”。同时会同游击队（二大队）加紧陈家院、横溪河一带的肃反工作。

（五）松枝

1.松枝有区委二个，特支一个，同志五十一人。一区在洋溪后乡，有同志二十人，成立区委；二区在金鸡山成立区委，有同志二十三人；特支在米、沙一带有同志十人。

2.群众有一百八十六人，乡农协五个。群众对农协的信仰均非常薄，并有寻常不到会的现象。

3.现在他们的中心工作为怎样去领导灾民斗争。他们在灾民中的中心口号为：到大户家里去吃饭，去分棉衣。最近并有几处灾民自动的斗争。

（六）公安

1.公安县是在立三主义时受毒最深的，同志们不知道有党，只认识个人，党员不到支部会，县委不过问支部工作，支部是没有群众的。现时他们在转变的中间，是注意教育工作，但成效非常迟缓。

2.组织连县委也没有统计，大概有支部五个，同志百余人。同志不知道怎样去和群众谈话，要钱不做工作，表现得十足。

3.我们派有巡视员帮助了一月工作，现在已开办了一个训练班。

4.群众对苏区和红军的影响非常深刻，他们的斗争情绪非常高涨，特别是现在反出土方钱的斗争，表现更为激昂。

（七）远安

1.远安有支部两个，同志五十六人，现正着手成立赤色工会小组。农民群众有八十几人，但未正式成立农协组织。

2.群众斗争情绪较为高涨，他们最近曾经领导过杀土豪的斗争，到的群众有五六十人，因调查不详，以致那豪绅逃跑。

（八）长阳

1.组织与苏区完全坍台，县委负责人李书田前已跑来宜昌，无意中与我们会面，以后决定他绕道到湘鄂边道委回长工作。但他事先同他皮拌拐了党的二十元逃走。现决定永远开除党籍。

2.清江河北岸，距长阳城二十余里之西柳溪，原为长县委指挥，现因为长县同志逃跑、牺牲，我们决定该地成立特支，直受道委指挥。决定余之生同志为特派员，专门去建立和发动那里的工作。该地同志现计四人，成立三个支分部。

四、青年团的工作

1.团道委以工作范围的狭隘和本身干部的缺乏，直到现在还是有名无实。现在他们的分工，是区同亮同志帮助公安工作，周益泉同志帮助宜都工作，刘视章同志帮助沙市工作。每半月集中开会一次。决定十二月尾在宜昌建立一个秘书处，来实行指导的工作。

2.公安成立临时县委，有两个区委，两个特支，同志七十余人，少队群众百二十人。他们从立三主义转变到国际路线中间，表现特别怕斗争，消极

怠工的现象。

3. 当阳有区委一人，特支二个，团员七十余人。现成立县委，决定在十二月尾建立两个中心支部，来发动傍[旁]的支部工作。同时支部同志表现得特别要钱，并有团员当土匪抢钱的事实。

4. 宜都成立特支，有团员二十余人，成立两个支部。团员多半怕，不到会，要钱的观念较当阳更深，团员三人当土匪（借党的名义）。决定开除团籍，执行纪律。

5. 宜昌、松枝各有团员六人，以团的干部缺乏，到现在还未有正式划分。

6. 宜昌区青年团与团省委，可说是没有一点关系，一切工作上的领导与路线上的转变，他们一点也没有知道，如果团省委在事实上不能指挥宜昌工作时，希望团中央把各种文件，随我们交通带点来，以便他们在工作上、路线上有相当的了解。

五、游击队工作

1. 游击队的组织。第一大队在当阳，有连枪五支，长枪二十支，原系黄冠伯同志从荆门仙刘集区拖来，现在已有队员三十人，决定最近将长枪完全拖出（从前埋藏）。第二大队在宜都，有连枪九支，长枪十一支，孟怕平同志负责。第三大队在公安，有连枪十三支。

2. 第一大队在当阳经常的杀土豪劣绅反动派。二大队在宜都除做经济运动外，旁的工作一点未做。三大队简直谈不上什么，不但没有工作，连吃饭的钱都成问题。

3. 目前在当阳召集一个当委、宜委与一二大队开一个联席会议，决定了目前游击的任务，是用很多的方法，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来发动和帮助群众的各种斗争，来执行单独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用声东击西、埋伏袭击、绕围等等战策来消灭安福寺、河溶、问安寺、半月山等处反动民团，与当地党部和区委支部发生亲密关系，来肃清一切反动派。

4. 一大队游击区域是荆当远，可分开时五人为一班。散布于草铺、河溶、孙家场、陈家场并南西一带。二大队游击区域是宜都、枝江，分散时则以安福、问安寺、江口后乡、白洋为小的游击区域。

六、经济问题

（一）经济的来源和开支

1. 决定一、二大队以少数力量，注意于经济运动的发展。经济运动的原则，以没收豪绅地主反动派现金之一部分为标准。对于大的资本家，并用绑票的手段，勒收其经济后，处以死刑和释放。

2. 决定第一大队每月供给五百元，二大队每月供给三百元，当阳特务队每月供给二百元。

3. 经济开支的原则，以交通费、巡视费、城市工作费为单位。乡村中的津贴极力减少，并发有紧急通知，在支部中讨论，只津贴工作费。最多不能有三人的干部脱离职业。

（二）十一月份决算

1. 生活费一五·。2. 津贴费四五二·四五，3. 特别费六二·九。4. 交通费二五四·二五。5. 招待费七·。6. 宣传费一七·六。7. 办公费一三·六五。8. 机关费一七·。

总共付九二九·九五

（三）我们十二月份的预算

1.生活费(十五元一人,九元十人)一五·。2.交通费三·。
。3.机关费一五·。4.宣传费三·。5.办公费七·。6.
建设费四·。7.特别费三·。8.招待费(招待练习班学生费)
五·。9.巡视费一·。10.训练班费三·。11.津
贴费:沙市六·,宜昌六·,团道委三·,其他津贴一七·。总共一
三五·。

七、十一月份工作检阅

我们检阅十一月份工作,觉得还有下列几项大的错误与缺点:

1.整个党的工作路线,由立三路线转变到国际路线中间,全党都表示着怕斗争,不敢斗争,不接近群众的右倾危机。一般党员群众都存着依靠红军等待红军的心理,忘却了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因此,在鄂西党的主要危机是要纠正和防止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

2.道委工作多半是少数同志应付式的工作,对任何问题解决,任何工作的执行都没有注意怎样来抓着中心,那样是目前工作中心的中心。如宜昌区党在立三路线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的工作中心是什么,怎样来建立这一中心工作问题,道委从没有注意到。

3.对全党同志,缺乏政治上的领导,只注意事务问题,只晓得干喊干叫。如全党同志雇佣式观念的普遍发展,党的负责同志只在劝说式的向同志讲,没有把这一问题来变作政治问题,把他深入到支部中去,来参加同志的政治教育,使同志站在政治上来了解这一问题。

4.各部门工作仍然没有单独建立,如职工运动委员会,士兵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在形式上虽然成立,以致影响了一切工作的进行。

5.在日本强占满洲的事变中,宜昌一部分群众也跟着全国群众反日高涨[潮],曾经表示过积极反日情绪。但道委除发了一个反日特刊外,连反日的宣传品也没有,更其谈不上怎样来将群众的日常生活的斗争联系到反日斗争,将反日斗争联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等问题。

6.对一切问题讨论和解决;仍然是极少数发言,不能使这一问题更深刻化、具体化。因此多数同志对问题的讨论多半隔膜,不能把讨论的问题,正确的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7.没有发动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下级以为上级万能,只知道机械的服从。上级带着命令色彩,没有民主化的意识,以致不能发动下级对上级严切的自我批评,使党内“左”右倾残余,仍然不能很快的赶出去。

8.教育训练工作的确忽视,特别对犯错误同志的教育,道委一点也没有注意。如寿全同志没详细的谈话,即分配他的工作等。

9.工作多半限于经济问题。道委事先未计划到来发展和节省经济,一到经济断绝,即表示着皇皇然无所措手足的样子,好象一切工作都要停止的现象。

八、我们十二月份工作计划(八次常会决议)

(一)教育训练干部问题

1.决定文端、宗礼、雨三同志成立教育委员会,编制训练干部大纲,发交各县同志,摘要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与中央各种文件的要义,配合宜昌及各种实际状况,做成极简单而明显的文章,经常在一个健全支部上面登载,专门作训练同志的材料。

2.每月道委在宜昌办一次高级训练班,调各县委负责同志前来,专门讨

论党的策略、路线与转变工作中各种困难问题。

3. 固定当阳、宜都、荆门为一训练区，以（环境可能）当开办训练班的地址；公安、松滋为训练区，松枝为训练班校址；沙市、宜昌为训练区，宜昌为校址。除宜昌训练区不定期由道委常委经常开办训练班外，决定在当阳区与松枝区，道委每月到少要派巡视员开办一次流动训练班。

4. 道委马上成立列宁读书班，决定宗礼同志为读书班主任。马上整理道委所成各种文件，及时来分配各县来接头的同志翻阅，并与之详细讨论。

5. 除道委注意训练各县中心干部外，各县委要按照道委的训练大纲来训练各区委、各支部的中心干部。支部要注意从斗争中来登记积极份子，供给县委作训练班的学生。

6. 各县委在党内经常举办列宁读书班、研究小组。在群众中组织读书班、听讲队、说书班、阅报班等。这些细则，由教育委员详细讨论订出。

7. 坚决打通同省委的交通路线，经常组织参加团，派遣到苏区里住党校、军事政治学校及苏维埃政府工会所办的各种专门训练班。

（二）年关斗争的工作问题

1. 决定当阳、荆门为中心区域。

2. 在年关斗争以前，各县党要加紧群众斗争、各种斗争的领导，使这些斗争成为年关斗争的前卫，使这些斗争与年关斗争密切联系起来，使群众在这些斗争中都感着年关难过与年关斗争的必要。

3. 年关斗争的中心口号，在灾民贫民中是“到大户家里去吃饭，吃腊肉腊鱼，到大户家里去分团年米，到大户家里去分棉衣”。在工人中是“要算帐，要拿倒帐一半，要分红利（帮工要向老板分利，不是店员）。”

4. 在当阳、荆门要发动群众行动，在腊月三十日到豪绅地主的家里去抢米、分衣服、抢腊肉腊鱼等斗争。

5. 从腊月十五日起到正月十五日止为年关斗争期。群众在这一月内要尽量发展各种斗争，使鄂西各县造成一个骚动局面。

6. 在群众中来组织过年会，过年团，过年十人团等加强群众的组织性，组织多数的零碎的过年会，来组织一个大的群众的赤色组织。在斗争激昂的时候，可挑选群众中的积极勇敢份子，收集旧式武装，成立过年自卫队，来保护群众，<防>过年斗争中的敌人反攻。

7. 游击队在年关斗争之前，要加强骚动工作，尽量的来配合群众来作肃反工作。并在腊月三十日相机的消灭一、二个反动民团。

8. 在宣传方面。城市中要发拜年片、歌谣、小传单到贫民工人家去。乡村中在要路上制壁报、歌谣、火屎队等。在群众斗争中一定要联系反日、反国民党、反清乡、反民团的宣传。

9. 各县在年关的斗争中，发展党员一倍，发展群众二倍。

10. 城市以阳历为标准，乡村以阴历为标准。

（三）互济会的工作问题

1. 决定文端、祖铭、雨廷三同志组织宜昌互济总会筹备处，并指定文端同志为筹备主任。

2. 向一、二大队募洋 百元，作为互济会的基金。

3. 马上开筹备会讨论出具体工作计划，并出不经常的小册子（名曰《跳舞》），同时制定简章和死难革命同志调查表。

4. 请求省委和中央转省互济总会或全互总会，经常指示和供给各种刊

物。

（四）内部工作

1. 组织部马上召集教育委员会，制定关于训练干部方面的各种文件，制定干部问题的通知（报告纲领）及经常担任编辑一个健全支部，与马上开办训练班。

2. 宣传部马上摘录中央宣传材料的要义，经常出版《实话》，供给党部作宣传鼓动工作实际材料，同时改《宜昌工农周报》为《跳舞》，每三日出版一小张，内容为诗歌、戏剧、笑话、短篇故事。

3. 秘书处决定收集各县报告与道委的指示信，每半月或一月出版《党内通讯》一期。

（五）荆门工作

1. 决定当阳县委所指挥的荆南特支与荆南区划为特区，作恢复和发展荆门工作的基础。

2. 派大顺同志为特区的特派员，马上去建立工作。并成立荆门工作委员会，在年关斗争中成立荆门县委。在荆门县委未成立之先，特区与当县委发生亲密工作的关系。我们意见，沙洋成为特区，直属省委指挥，怎样？

九、对省委的批评和建议及其他

1. 现时我们来苏区参观、住训练班、开会，参加红军的群众及各种人员，均因与省委交通线的动摇无法进行。省委说：交通线未建立前，可由中央间接与省委发生关系。这是不积极负责建立交通线的口吻。以后要以大力注意赤白交界岑河口一带工作，以便发生亲密的交通关系。只空叫江陵县委负责是不够的。

2. 省委对白区的工作观，的确有点薄弱，好象是已经派了几个同志都不错，让他们自己去闹吧，对宜昌没有帮助一个下级干部即是明证。

3. 我们听说红军在潜江受大损失，觉得省委决定红军冲破敌人“围剿”红[洪]湖形势后，而不能运用中央紧急任务的决议，迅速集中红军主力，向敌弱点进攻，击破敌人一部主力，反从容整理坐待敌人反攻。敌已步步为营向潜江进逼，红军不相机抽出和突击敌人臂部，而命令死守潜江，以致遭受这次严重损失，的确是对苏区巩固扩大的策略之运用有些机械。同时希望省委在巩固扩大的策略下，把视线注意于白区工作。

十、我们十一月份出版刊物和文件的统计

1. 道委指示信二十一件：宜昌二、宜都五，当阳四，沙市三，公安三，松枝二，长阳一，远安一。

2. 刊物：一个《健全支部》（一、二、三、四）期，鄂西《工农周报》（一、二、三、四）。

3. 通知二份，通告三份。

4. 翻印的：《中央紧急任务决议》、《中央关于干部问题决议》。

宜昌道委

十二月十日

注释

原文原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总数似有误。

中共宜昌道委致中央的信

——关于游击队的任务、编制及训练等问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中央：

目前第一、二游击大队已于十二月十七日解决了安福寺、横店子的反动民团（当阳、宜都交界之地），共得到步枪二十三支，连枪两条。在这次行动中，一、二大队均代[带]花，现已决定派谭映峰同志到一大队担任政委、代理队长，董光柏同志到二大队担任政委、代理队长。

目前我们对游击（队）的编制是，一大队成立三分队，每分队二班，每班五人到十人。以分队为单位去发动各处工作。

一大队以当阳之黄家店、荆门之西乡、南乡为隐藏地，以江陵之捕东、当阳、荆门为游击区域。二大队以松枝之金鸡山为隐藏地，松滋、枝江、宜都、宜昌为游击区域。游击队的主要工作是扰乱敌人后方，掘坏反革命交通要道，破坏电信、电话等工作。

目前，对游击队的策略训练是以中央翻译之《游击队怎样干》为材料。政治方面，以道委出版之《健全支部》上游击队的任务为材料，来加强游击队员的训练。

宜昌道委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鄂豫边特委鄖属分特给县委信

(一九三一年)

巴兴归三县县委并转全体同志：

分特听了胡荣大鹏两同志的报告，知道巴兴归三县的同志已经从敌人围攻中很艰苦的将赤区恢复了，这种英勇奋斗的精神和局部的成功，是分特没有料到，这不能不算是三县同志努力的结果。

三县的党脱离上级指导已经有一年多了，虽然与三军发生了关系因为二军党在邓中夏同志领导之下发生了许多错误，对于三县的指示有许多缺点，根据胡黄两同志的报告，知道过去三县党的实际情形，对于三县的党，有下列指示：

(1) 关于党的问题：自有组织以来，就是空架子，完全没有怎样去扩大和严密，党的计划停止在保守状态当中，县委应当号召全体同志，与这种倾向斗争，应当坚决的扩大党的组织，且要从扩大的当中吸引贫农、雇农来转变党的基础。

(2) 对于党内许多不正确的倾向必须严厉纠正，尤其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在巴兴归的党内表现得特别严重，在可能的时候，党内的应该提交党员讨论，但是不是说没有经过党员大会讨论通过就可以不执行的，党是用民主集中制，无论什么问题如果下级不同意上级的决定应当报告上级，在没有接到上级答复以前，应当按照上级决定的执行。这才是对的。

(3) 巴兴归的党第二个严重问题就是右倾的问题，在土地问题上，已经有右倾的表现，富农的好土地并没有更换，同志方面有找个人掩护的事实，党必须在斗争中来纠正这些右倾的观念，从斗争中洗刷一切动摇犹豫的分子，党一定要认识不要因同志少就放松这一点，更不要因某某是老同志就不敢洗刷他。

(4) 腐化的倾向也特别表现得严重，同志中因恋爱的问题而妨害了工作，甚至因为结了婚就要政府或党来供给他的生活费，这种腐化的倾向必须纠正。

(5) 在赤区中党的组织仍然不必公开，党的主张应当绝对的公开，应当用党的名义发表党的主张，党的机关，在环境许可时可以公开，一、二负责人在不可避免时如群众大会中代表党讲演，可以公开，但是其他的同志应当绝对秘密，并且同志没得上级的许可，不许公开自己一个共产党员。

(6) 党内纪律的执行必须用教育的方式，如某个同志犯了错误，应当在党员大会中提出批评，或者处罚，严重的可以发通告，这样可以教育一般同志，使他们不致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时又可使一般同志督促犯错误的同志去纠正错误。

(7) 城市工作应当特别注意，应当很艰苦的职业化的去建立城市工作，特别在已东、牛口、兴山、秭归等地城市工作，应当在城市中去建立贫农委员会，劳动妇女协会，去发动城市贫民的日常斗争，(如要求减低半价等)在这些斗争中去建立党的基础，去建立苏维埃基础，在城市中各种群众的组织应当力求公开，在公开群众的组织，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应当有预备委员，这种预备委员是秘密的，万一贫民斗争失败，受了摧残，仍然可以继续干起来，城市中的组织不一律叫做贫民委员会或者工会，只要适合于斗争，无论什么名义都可以的，名义可不一定统

若是城市中有黄色工会，我们应打进去，提出工人要求，揭露他们的欺骗政策，提出黄色政纲，打击黄色工会的领袖，夺取群众，使他变成赤色工会。

关于士兵工作另文，希详细讨论执行。

党应当注意从斗争中提拔积极的勇敢的贫农。雇农加入党的领导机关，提拔新的工作干部，同时应当注意新同志的教育训练工作。

在新同志初入党的时候，应当给他们一点基本教训，分配同志的工作应当很具体的使他们知道怎样去干，工作完毕后，一定要有报告从报告当中去批评同志的工作。

对于新的干部应当时常分级训练，时常开小组长训练班，支书训练班等。在这些训练班当中不要高谈高深的理论，而多谈实际问题。

从县委一直到支部，小组都要建议日常工作，党应当对于全区域的工作有一个整个的计划。

党应当建立巡视工作，经常派人到各地去巡视，这样党的策略路线容易传达到一般同志。

1. 巴东赤区政府委员，过去都是党指派的，没有经过群众路线的选举，演成党来包办政府，或代替政府的现象，因此苏维埃得不着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认识与拥护，这一错误应当很快地纠正过来，应当为土地革命斗争当中经群众路线而选举积极勇敢分子参加，同时苏维埃政府应当防止富农混入阻碍土地革命。

2. 贫农团、雇农工会群众团体应该很快地组织起来，过去只有苏维埃政府的组织，没有要群众团体，到了反富农斗争日益尖锐的时期，只有苏维埃与富农的对抗，而不是贫农与富农的阶级斗争，雇农是农村的无产阶级是革命的积极分子，应当独立组织雇农工会，加强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

3. 关于土地问题，应当依照新的土地法草案，坚决的打击富农，只分坏田给富农。

4. 利用群众关系去解经济封锁的困难，同时应当鼓励生产，提高生产，集中粮食，建设机关，购买子弹，对牛口甘市镇可暂不采取占领政策。

5. 巴归兴的党在未与湘鄂西省委发生关系时，应受鄂豫特属分特的指挥，与<湘>鄂西省委发生关系后，除了<湘>鄂西省委指挥外，应与鄂豫边特属分特发生横的关系。

6. 巴归兴党的组织限巴东一隅，巴归兴县委应当有计划的将兴山秭归很迅速扩展起来，一方向荆当远推进，另一方与房县求得联系，很巩固的向外发展有后方的向外推进，尤其是注意国际的指示，将各个赤区联系起来。

7. 四游击大队宜调巴东恢复赤区，肃清一切反动分子，可是应当留一部分住中央军委委员会鄂北红色干部学校，同时应当留一部分与房县合并组织游击队，游击于巴房之间，造成赤区的联系。

8. 政府与党的工作，应当在党的整个政治任务之下，建立日常工作，以期很迅速的完成政治任务。

9. 红军应当是土地革命斗争当中产生出来的，是自愿参加的，纠正过去调队的压迫的性质的错误。

巴归兴县委翻印 PGN0780.TXT/PGN>

